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7)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七卷

目 录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 的第一篇宣言	3—9
弗·恩格斯。战争短评	11—277
战争短评(一)	13—17
战争短评(二)	18—21
战争短评(三)	22—24
战争短评(四)	25—30
普军的胜利	31—35
战争短评(五)	36—39
战争短评(六)	40—43
战争短评(七)	44—47
战争短评(八)	48—52
战争短评(九)	53—56
战争短评(十)	57—60
战争的危机	61—65
战争短评(十一)	66—72
战争短评(十二)	73—76
战争短评(十三)	77—79
战争短评(十四)	80—83

战争短评(十五)·····	84—88
法军的失败·····	89—93
战争短评(十六)·····	94—98
战争短评(十七)·····	99—102
军队的盛衰·····	103—107
战争短评(十八)·····	108—111
如何击败普军·····	112—115
战争短评(十九)·····	116—119
关于谈判的消息·····	120—123
战争短评(二十)·····	124—127
战争短评(二十一)·····	128—131
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	132—135
战争短评(二十二)·····	136—139
战争短评(二十三)·····	140—147
麦茨的命运·····	144—147
战争短评(二十四)·····	148—152
萨拉哥沙——巴黎·····	153—156
战争短评(二十五)·····	157—160
麦茨陷落·····	161—164
战争短评(二十六)·····	165—168
法皇的辩白·····	169—175
法国境内的战斗·····	176—180
战争短评(二十七)·····	181—184
筑垒的首都·····	185—189
战争短评(二十八)·····	190—198
法国的军事形势·····	194—198
战争短评(二十九)·····	199—203

战争短评(三十)·····	204—207
战争的前途·····	208—213
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214—218
战争短评(三十一)·····	219—224
战争短评(三十二)·····	225—228
德军在法国的状况·····	229—232
战争短评(三十三)·····	233—237
战争短评(三十四)·····	238—242
战争短评(三十五)·····	243—247
战争短评(三十六)·····	248—253
战争短评(三十七)·····	254—257
战争短评(三十八)·····	258—261
战争短评(三十九)·····	262—265
战争短评(四十)·····	266—269
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	270—273
布尔巴基的复灭·····	274—277
卡·马克思。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27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关于卡尔·布林德·····	279—28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的信·····	282—284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 第二篇宣言·····	285—294
卡·马克思。 [*]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的被捕·····	295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第六次	

* 用星花(*)标出的篇名都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编者注

代表大会	296—298
卡·马克思。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299—301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 现阶段的立场的决议草案	302
弗·恩格斯。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303—306
弗·恩格斯。俄国状况	307—31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致“泰晤士报”编辑	311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 声明	312—313
卡·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314—316
卡·马克思。致“工人报”编辑部	317
卡·马克思。致“泰晤士报”编辑	318—319
弗·恩格斯。* 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	320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	321
弗·恩格斯。再论“福格特先生”	322—330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331—389
一	335—345
二	346—354
三	355—370
四	371—385
附录	386—389
(一)	386—387
(二)	387—389
卡·马克思。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的信	390—39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	

的通告的声明	392—394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 ..	395—396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旗帜报”编辑部的信	397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的信的声明	398—399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 编辑部的信	400
卡·马克思。致“每日新闻”编辑	401—402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 的信的声明	403—404
卡·马克思。致“新自由报”编辑弗里德兰德	405—406
卡·马克思。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	407
弗·恩格斯。* 宣言“法兰西内战”和英国报纸	408—410
卡·马克思。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	411—415
卡·马克思。致“晨报”编辑	416
卡·马克思。致“旗帜报”编辑	417
弗·恩格斯。* 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	418—420
卡·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附函	421
弗·恩格斯。致“泰晤士报”编辑	422—423
卡·马克思。致“国际报”编辑	424
卡·马克思。致“舆论”周报编辑	425
卡·马克思。致“舆论”周报编辑	426—427
卡·马克思。致“高卢人报”编辑	428—429
卡·马克思。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	430—433
卡·马克思。致“真理报”编辑	434—435
卡·马克思。致“旗帜晚报”编辑	43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就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 工作给总委员会的建议·····	43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 初步草案·····	438—439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17—23日·····	441—465
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1871年 9月18日在代表会议一个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443—444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9月21日 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445—446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年9月21日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449—45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71年9月17日至23日 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	451—461
卡·马克思。伦敦代表会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 分裂的决议·····	462—465
卡·马克思。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	466
卡·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871年9月25日 在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	467—468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	469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 的声明·····	470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 章程的决议·····	471—474
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475—492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的信的声明·····	493—495
弗·恩格斯。 [*] 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	496—498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 决议草案	499—504
卡·马克思。总委员会给“法兰克福报和商报” 编辑部的声明	505
弗·恩格斯。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 委员会	506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给“意大利无产者报”编辑部 的声明	507—508
弗·恩格斯。给朱·博里昂尼的委托书	509
弗·恩格斯。 [*] 关于欧洲各国的国际支部的状况	510
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 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	511—513
卡·马克思。致“东邮报”编辑	516—522
弗·恩格斯。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	516—522
卡·马克思。致“东邮报”编辑	523
卡·马克思。致“东邮报”编辑	524—525
弗·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	526—52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 警察暴行的声明	529—530
卡·马克思的遗稿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	533—662
“法兰西内战”初稿	535—620
国防政府	535—572
公社	573—579

1. 为工人阶级采取的措施·····	573—574
2. 为工人阶级,但主要是为中等阶级采取的措施·····	574—575
3. 一般措施·····	575—577
4. 公安措施·····	577—579
5. 财政措施·····	579
公社·····	580—611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580—583
公社的性质·····	584—594
农民·····	594—598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598
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社会各阶级的公社革命·····	599—600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600—602
公社(社会措施)·····	602—606
“地主议会”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606—611
* 片断·····	612—620
“法兰西内战”二稿·····	621—662
(1) 国防政府。巴黎的议员特罗胥、法夫尔、皮卡尔、费里·····	621—625
(2) 梯也尔、杜弗尔、普野—克尔帮约·····	625—629
(3) 地主议会·····	629—632
(5) 内战的开始。3月18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马。 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	632—641
(6) 公社·····	641—647
(7) 结束语·····	647—650
* 片断·····	650—662
附 录	
卡·马克思关于国防政府的发言记录·····	665—666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三月十八日革命的发言记录·····	667—668
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发言记录·····	669—670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671—672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673—674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675—676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677—678
卡·马克思驳资产阶级报刊诬蔑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发言报道·····	679—680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	681—686
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报道·····	687—689
弗·恩格斯关于召开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记录·····	690
卡·马克思驳奥哲尔的发言报道·····	691—692
卡·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	693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	694—695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	696—698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记录·····	699—700
卡·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记录·····	701—702
卡·马克思关于秘密团体的发言记录·····	703
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	704—715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716
注释·····	719—82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824—858
人名索引·····	859—893
期刊索引·····	894—897
地名索引·····	898—907
译后记·····	908

插 图

马尔斯—拉—土尔会战（1870年8月16日）和格腊韦洛特— 圣普里瓦会战（1870年8月18日）	67
色当会战（1870年9月1—2日）	91
“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的扉页	333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提纲手稿	447
“法兰西内战”初稿中的一段手稿	591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70年7月—1872年2月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f November, 1864, we said:—"I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requires their fraternal concurrence, how are they to fulfil that great mission with a foreign policy in pursuit of criminal designs, playing upon national prejudices and squandering in piratical wars the people's blood and treasure?" We defined the foreign policy aimed at by the International in these words:—"Vindicate the simple laws of morals and justice, which ought to govern the relations of private individuals, as the laws paramount of the intercourse of nations."

No wonder that Louis Bonaparte, who usurped his power by exploiting the war of classes in France, and perpetuated it by periodical wars abroad, should from the first have treated the International as a dangerous foe. On the eve of the plebiscite he ordered a raid on the member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throughout France, at Paris, Lyons, Rouen, Marseilles, Brest, &c., on the pretext that the International was a secret society dabbling in a complot for his assassination, a pretext soon after exposed in its full absurdity by his own judges. What was the real crime of the French branch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hey told the French people publicly and emphatically that voting the plebiscite was voting despotism at home and war abroad. It has been, in fact, their work that in all the great towns, in all the industrial centres of France, the working class rose like one man to reject the plebiscite. Unfortunately the balance was turned by the heavy ignorance of the rural districts. The Stock Exchanges, the Cabinets, the ruling classes and the press of Europe celebrated the plebiscite as a signal victory of the French Emperor over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and it was the signal for the assassination, not of an individual, but of nations.

The war plot of July, 1870, is but an amended edition of the *coup d'état* of December, 1851. At first view the thing seemed so absurd that France would not believe in its real good earnest. It rather believed the deputy denouncing the ministerial war talk as a mere stock jobbing trick. When, on July 15th, war was at last offici-

载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7月23日
关于普法战争宣言的传单的第一页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¹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 1864 年 11 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已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末当存在着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时，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要求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²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了自己的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做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在巴黎、里昂、卢昂、马赛、布勒斯特以及其他地方，即在法国全境向国际工人协会各领导委员会的委员举行进攻，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正在阴谋杀害他；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³。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过究竟何在呢？就在于它们曾经公开而断然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

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由于它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了全民投票。不幸的是，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占了上风。欧洲各国的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辉煌胜利；实际上，全民投票并不是要杀害某一个人，而是要杀害几国人民的信号。

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 coup d'état (政变)⁴ 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是如此的荒谬，以致法国不愿意相信战争传闻的真实性。它宁肯相信那个认为部长俩的好战言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①。当7月15日终于正式向立法团宣布了关于战争的消息时，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用费，甚至梯也尔也申斥说战争是一种“很讨厌的”事情；巴黎所有一切独立的报纸都谴责了这个战争，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这时，国际的巴黎会员又开始活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⁵上，他们公布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在我们从中摘引如下几段：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荣誉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 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决反对那些能赎免‘血税’并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黠武号召！…… 德国弟兄们！我们相互仇视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 全世界的工人们！不论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

^① 茹尔·法夫尔。——编者注

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总是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作为我们牢不可破的团结的保证。”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类似的宣言。我们在这里只能引用一个由塞纳河岸讷伊支部发出的宣言，它公布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⁶上，其中说：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完全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赞同国际对战争的抗议。”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这点不久就为一个有趣的事件所证明了。当时，在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初次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匪帮被换上了工人服装，放到巴黎街道上去表演战争狂热^①，市郊的真正工人们立刻就出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拥护和平的示威，使得警察局长比埃特里不得不立即下令今后完全禁止在街上举行任何示威游行，借口是说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表达了自己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已经发泄了自己无穷尽的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

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

① 1891年德文版为“用印第安人的战舞煽起战争狂热”——译者注

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如果萨多瓦之役⁸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那末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蹂躏德国。普鲁士在得胜之后，难道有片刻想过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它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并且还加上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实际的专制制度和虚伪的民主精神，它的政治欺骗把戏和财政欺诈手腕，它的漂亮的言词和最下流的诈骗行为。这样，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盛行的波拿巴制度，现在在它的另一岸上也同样盛行起来了。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战争，还能期待什么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得到了很广泛的传播，并扎下了很深的根，使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工人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坚决排斥任何对法国持民族仇恨态度的思想，并且通过一个决议，其中说道：

“我们反对一切战争，特别是反对王朝战争……我们被迫参加这场作为不可避免的坏事的防御战争，深感悲痛，但同时我们号召德国全体工人阶级设法防止这种深重社会灾难的重演，力求使各国人民都有权力来自己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从而使各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开姆尼斯，代表5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如

下的决议：

“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 我们很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伸给我们的兄弟的手…… 我们谨记着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⁹

国际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说：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 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全世界工人团结的共同事业。”

唯愿如此！

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显现出俄国的阴森形象。不祥的征兆是，现今这场战争的信号，恰巧是在俄国政府已经完成了对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建筑工程并且已向普鲁特河方面集中了军队的时刻发出的。虽然德国人完全可以指望在自己反对波拿巴侵犯的防御战争中得到同情，但是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哥萨克援助或只是接受这种援助，他们便立刻会失去这种同情。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它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匐跪倒在沙皇脚下。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恶的战争怎样结束，全世界工人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官方的法国和官方的德国彼此进行同室操戈的斗争，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音讯。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暗的旧社会相对立，

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
 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先声就是国际工人协会。

* * *

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乔治·米尔纳
马丁·詹·布恩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	查理·默里
考威尔·斯特普尼	乔治·奥哲尔
约翰·黑尔斯	詹姆斯·帕涅尔
威廉·黑尔斯	普芬德
乔治·哈里斯	吕耳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约瑟夫·谢泼德
勒格廖利耶	斯托耳
马·林特恩	施穆茨
莫里斯·捷维	威·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耳曼·荣克……………瑞士
 卓万尼·波拉……………意大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本杰明·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7月23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7月19—23日
1870年7月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刊印，
1870年8—9月又用德文、法文和俄文
印成传单，并在期刊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英文第1版传单，
并根据1870年的英文第2
版以及1870年的经作者同
意的德译本校对过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

战争短评¹⁰

弗·恩格斯写于 1870 年 7 月底
—1871 年 2 月
载于 1870 年 7 月底—1871 年 2 月
“派尔—麦尔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弗·恩格斯

THE
PALM MALL GAZETTE

An Evening Newspaper and Review

No. 1703-Vor XII FRIDAY, JULY 29, 1870 price 2d; Stampd. 3d

战争短评(一)

到目前为止几乎还一弹未发,但是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并且是以法皇的希望破灭而结束的。要了解这一点,只要概略地观察一下政治和军事形势就够了。

正如现在大家都了解的那样,路易一拿破仑本来以为,他能够使北德意志联邦¹¹受到南德意志各邦的孤立,并利用不久前归并普鲁士的地区¹²所存在的不满情绪。如果以一切可能聚集的兵力向莱茵河猛进,在盖尔曼尔斯海姆和美因兹之间某处渡过莱茵河,向法兰克福和维尔茨堡方向进攻,这个目的是可能达到的。那时法军就能控制南北之间的交通线,迫使普鲁士极其匆忙地把现有的全部军队调向美因河,而不管他们作战准备的程度如何。普鲁士的动员工作的整个过程就会遭到破坏,而入侵的法军就能稳操胜算,一一击破先后从各地开来的普军。不仅从政治上看,而且从军事上看,都是应该这样做的。法国的基于兵制度使它能够比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¹³远为迅速地集中一支譬如 12—15 万人的军队。法军的平时编制不同于战时编制的,仅在于归休人员的数量和没有后备部队,后者在出征前才编成。而普军平时编制的

人数还不到战时编制人数的三分之一，并且其余的三分之二无论是兵士还是军官平时都不在军队服役。这样大量的人员的动员工作是需要时间的；此外，这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因为敌军的突然入侵而被完全打乱。正因为如此，法皇才这样急于发动战争。如果说法皇不打算采取这种突击的行动，那末格腊蒙的强硬口吻和仓促的宣战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德意志民族感情的突然的强烈的迸发，粉碎了任何一个这样的计划。现在路易—拿破仑面对着的不是普王威廉·“亚涅山大”^①，而是德意志民族。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有12—15万人的军队，也休想猛然渡过莱茵河。于是就需要用现有的全部兵力来进行正规战以代替突然袭击了。近卫军、巴黎军团、里昂军团和夏龙兵营的一个军，用来实现原来的计划也许是够用的，可是现在即使用来组成一支入侵大军的核心理也几乎不够了。于是，开始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即酝酿大规模战争的阶段，从这一天起，法皇必然成功的希望开始消失了。

现在我们把双方准备互相残杀的兵力作一对比。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只谈步兵。步兵是决定战斗胜负的兵种。而在骑兵和炮兵（包括多管炮¹⁴和其他奏奇效的兵器）方面的微弱优势，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没有很大意义的。

法国现有376个步兵营（38个近卫营、20个 chasseurs（猎兵）营、300个基干营、9个朱阿夫营、9个土尔科营¹⁵等等）；平时每营8个连。战时300个基干营各留2个连在后方用来编组后

① 原文《Annexander》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结合词，它由《Annexion》（“兼并”）和《Alexander》（“亚历山大”）两词组成。“亚历山大”附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编者注

备部队，因此每营只有 6 个连开赴前线。在这种场合，每个基干团（三营制）留下的 6 个后备连中，4 个连以归休兵和预备兵补充后扩编为第四营，其余的 2 个连大概应作为后备部队，以后可编成第五营。但是，要编成这些第四营并使它们做好战斗准备，当然需要一些时间，至少要 6 个星期左右。目前，这些营同流动自卫军¹⁶一样，只能算做警备部队。因此，法国用来进行最初的决战的仅有上述 376 个营。

据我们现有的资料看来，其中有 299 个营属于莱茵军团（由第一至第六的 6 个军和近卫军组成），再加上大概准备派往波罗的海的第七军（由蒙多邦将军指挥），一共是 340 个营，因此，只剩下 36 个营担任阿尔及尔、殖民地和法国内地的防务。由此可见，法国为了对付德国已经派出了它现有的可以用于这一目的的全部兵力，而且至少在 9 月初以前不可能用新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去加强自己的军队。

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方。北德意志军队有 13 个军，共 368 个步兵营，平均每个军有 28 个营。每营平时约 540 人，战时约 1000 人。接到动员令后，每团（三营制）抽调一些军官去编组第四营。这时，预备兵立刻应召归队，这些人都在团内服过两三年兵役，并且直到 27 岁都有服役的义务。用他们来补充 3 个基干营并组成由后备军补充的各第四营的主干，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各基干营在数日内就可做好出征的准备，各第四营随后经过四五个星期也可以做好准备。同时，每有一个基干团就相应地编成一个后备军的二营制团，其成员是 28 岁到 36 岁的人员。这两个营编好后，便立即开始编组后备军的第三营。完成这一切工作（包括骑兵和炮兵的动员工作在内）正好需要 13 天；因为动员的第一日

曾定为7月16日，所以到今天这一切工作已经完成，或者应该完成。目前，北德意志大概有358个基干营担任野战任务，后备军198个营担任警备勤务。这些部队最迟于8月下半月必将得到114个第四基干营和93个后备军第三营的加强。在所有这些部队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服满兵役的。此外，还应该加上黑森—达姆斯塔德、巴登、维尔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军队，共计104个基干营。但是，因为后备军制度在这些邦内还没有来得及彻底实行，所以在那里可以用于作战的兵力不会多于70或80个营。

后备军主要担任警备勤务，不过在1866年的战争中，有相当一部分后备军作为预备部队开到前线进行野战。没有疑问，这一次也将会这样做。

在13个北德意志军中，目前在莱茵河地区的有10个军，共计280个营；此外，还有南德意志军队约70个营，两者共计350个营。现在担任岸防任务和作为预备队的还有3个军，计84个营，为了防守沿岸地区，有1个军再加上后备军就足够了。其余2个军，据我们所知，大概也在开往莱茵河途中。到8月20日，这些部队至少将得到100个第四营和后备军40—50个营的加强，而且这些营的人员在战斗素质上都超过法军那些主要由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编成的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这样，法国的受过训练的兵士不超过55万人，而这样的兵士单是北德意志就有95万人。德国的优势正在于此，而决战越向后推迟，这个优势就越明显，到9月底，这个优势的作用将达到顶点。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用不着对柏林方面传出的以下的消息感到奇怪，即德军统帅部希望德国领土不受到战争的浩劫；换句话说，如果德军在最近的将来不遭受攻击，那末他们自己将转入进

攻。至于在路易-拿破仑不先发制人的条件下，德军将如何实行这一进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载于 1870 年 7 月 29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03 号

署名：Z.

战争短评(二)

星期五(7月29日)早晨,法军的前进运动开始了。向哪一个方向运动呢?一看地图就可以得到答案。

在莱茵河左岸,河谷在西面和佛日山脉相毗连,这支山脉自伯尔福向凯则尔斯劳顿绵延。从凯则尔斯劳顿向北,山势逐渐平坦,到美因兹附近渐渐成为平原。

摩塞尔河谷在莱茵普鲁士形成了一个深邃而曲折的峡谷,这是河流通过高原时冲蚀而成的。高原在河谷的南面形成一支相当大的山脉,叫做霍赫瓦尔特山脉。这支山脉愈接近莱茵河,就愈带有高原的性质,一直到它的最边缘的丘陵同佛日山脉的远支脉相会合的地方为止。

无论是佛日山脉还是霍赫瓦尔特山脉,都不是军队完全不能通过的。它们都有一些很好的大道贯穿其间,但是其中没有一个地区是便于20—30万大军行动的。不过,在佛日山脉和霍赫瓦尔特山脉之间却有一条宽达25—30英里的宽阔的通道,这里地势起伏,道路四通八达,是极便于大军运动的地区。此外,从麦茨到美因兹的道路也经过这里,而美因兹是法军可能进攻的第一个重要地点。

因此,这里就有了一个自然界规定好的作战方向。一旦德军侵入法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如果双方军队对此都有准备的

话)一定发生在洛林的边缘地区,即摩塞尔河以东和南锡—斯特拉斯堡铁路线以北的地区。¹⁷如果法军从上周集中的阵地前进,那末第一次重大的会战也同样将发生在这个通道内的某地,或者在通道以外的美因兹城下。

法军集中的情况如下:3个军(第三、四、五军)配置在第一线,即提翁维耳、圣阿沃耳德和比奇;2个军(第一和第二军)配置在第二线,即斯特拉斯堡和麦茨;近卫军配置在南锡,第六军配置在夏龙,作为预备队。最近几天内,第二线的军队已推进到第一线的间隙内,近卫军被调到麦茨,斯特拉斯堡则留有流动自卫军。这样,法军的全部兵力都已集中在提翁维耳和比奇之间,也就是在那两支山脉之间的通道前面。从这些前提得出的必然结论是:法军企图进入这个通道。

因此,法军的入侵将从夺取萨尔河和布利斯河上的渡口开始,接着可能占领托莱—霍姆堡一线,然后占领比肯斐特—兰德施土尔一线或者奥伯斯坦—凯则尔斯劳顿一线等等,当然,要有一个前提,即这些进攻行动不被德军的进攻所阻遏。在山区,无疑将出现双方的翼侧部队,他们之间也将发生战斗;但是,真正的会战可能发生在刚才谈到的那个地区。

关于德军的部署,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我们推测,如果他们打算在莱茵河左岸迎击敌人,那末他们的集中地区就在美因兹直前方,也就是在通道的另一端。否则,他们就将留在右岸,在宾根和曼海姆之间,根据情况在美因兹上方或下方集中。至于美因兹,过去它是抵御不了线膛炮的轰击的,但是在距垒墙4000—5000码处构筑了新的独立堡垒线以后,它的安全似乎已经得到充分的保证。

现在有充分根据来推测，德军至多比法军迟两三天就将做好进攻准备，并力图开始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会战，将和索尔费里诺会战¹⁸类似，即两军全线展开，彼此迎面前进。

在这里，特别巧妙而灵活的机动是不会有有的。在使用这样庞大的军队的情况下，要保证他们按照预定的计划从事简单的向敌运动，是相当困难的。哪一方采取冒险的机动，那一方就会早在这个机动实现以前就被对方大军简单的前进运动所击破。

现在，在柏林对于冯·维德恩先生的论述莱茵诺要塞的著作¹⁹谈论得很多。据作者说，从巴塞尔到穆尔格河的一段莱茵河上根本没有构筑工事，南德意志和奥地利在这个方向上抵御法军袭击的唯一设施，是坚固的乌尔姆要塞。这个要塞自1806年以来由一支巴伐利亚人和维尔腾堡人混合编成的1万人的部队防守。这支部队在战时可能增至25000人，此外，在要塞围墙以内的营垒里面还可驻屯25000人。拉施塔特被认为是法军前进途中最大的障碍，它位于穆尔赫河流过的谷地。这个城市的防御工事由瞰制四周地区的、并用围墙连结起来的三座大堡垒组成。南面和西面的堡垒，即“列奥波特”堡垒和“弗里德里希”堡垒，位于穆尔格河左岸；北面的堡垒叫做“路德维希”堡垒，位于右岸，在右岸还有一个可以驻屯25000人的营垒。拉施塔特距离莱茵河4英里，河流和要塞之间是一片森林，因此，这个要塞不能阻止军队在这里渡河。其次一个要塞是兰道，过去它由三个堡垒组成：一个在南面，一个在东面，一个在西北面。这些堡垒和兰道城之间隔着一片位于克渭希河两岸的沼泽地。南面和东面的堡垒近来已经废弃，现在只有西北面那一个堡垒可用于防御。在这个地区内

最重要而且形势最好的要塞是跨莱茵河两岸的盖尔曼尔斯海姆。它瞰制着两岸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并且实际上使敌人无法一直进到美因兹和科布伦茨。这个要塞可以大大便于军队进入莱茵普法尔茨，因为除现在已有的一座浮桥外，还可在要塞的火炮掩护下再架设两三座桥。盖尔曼尔斯海姆还可作为沿克渭希河一线配置的左翼军队的作战基地。美因兹是莱茵河上最重要的要塞之一，但是，它为邻近的一些高地瞰制，这就需要增加城内的工事，因此城内未必能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大量守备部队。在美因兹和宾根之间的整个地区，现在已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而在美因兹和美因河口之间（在莱茵河对岸）筑有3个大营垒。至于科布伦茨，冯·维德恩先生认为，要想围攻这个要塞，并且指望获得胜利，就需要六倍于要塞守军的兵力。敌人可能从那个叫做库科普弗的高地轰击“亚历山大”堡垒而开始攻击，在这个高地上，敌人的部队可以利用森林作掩护。作者还描述了科伦和威塞尔的工事，但是，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以外，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

载于1870年8月1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05号

本文前一部分的署名：Z.

战争短评(三)

普军的作战计划终于开始明朗化了。读者记得，虽然在莱茵河右岸有大批军队由东向西和西南调动，但是，很少听到这些军队在紧靠受威胁的边境集中的消息。各要塞已从附近的部队得到了大量增援。在萨尔布吕肯附近，步兵第四十团的500人和枪骑兵第七团的3个连（两者均属第八军）曾同敌人进行互射；巴伐利亚猎兵和巴登龙骑兵已将前哨线推进到莱茵河边。但是，在这个由几支轻装部队组成的掩护部队的近后方，看来并没有配置大量军队。在这些小战斗中没有任何一次提到有炮兵参加。在特利尔完全没有军队。另一方面，我们听说在比利时边境附近有大量军队，科伦附近（这里的莱茵河左岸整个地区，几乎直到亚琛，都有丰富的马料）有3万骑兵，美因兹前面有7万人。这一切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好像普军几乎犯罪似地分散了兵力，而法军却与此相反，它紧密地集中在距边境仅数小时行程的地方。但是突然从各地接二连三传来了一些消息，这些消息看来已把这个秘密揭开了。

曾冒险进入特利尔的一位“时报”²⁰记者，在7月25日和26日看到各兵种的大批部队通过这个城市开向萨尔河一线。大约与此同时，萨尔布吕肯薄弱的守备部队得到了大量援兵，他们可能是从第八军司令部驻地科布伦茨调来的。路过特利尔的部队，大概属于从北面越过艾费耳高原开来的另一个军。最后，我们从私人方面获

悉,7月27日第七军已经由亚琛经特利尔向边境行军。

这样,我们看到,至少有3个军约10万人已调到了萨尔河一线,其中第七、八两个军属于斯坦美兹将军指挥的北方军团(包括第七、八、九、十军)。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这个军团目前全部集中在萨尔堡和萨尔布吕肯之间。如果在科伦近郊真有3万(或者接近此数)骑兵,那末这些骑兵一定会越过艾费耳高原并渡过摩塞尔河向萨尔河前进。这整个的部署似乎说明,德军将以自己的右翼在麦茨和萨尔鲁伊之间地区向尼德河上游谷地进行主攻。如果预备队的骑兵确实已经往上述方向前进,那末,我们的推测便是有把握的。

这个计划要求德军全部集中在佛日山脉和摩塞尔河之间。中央军团(由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包括第二、三、四、十二军)看来会占领同斯坦美兹的左侧相毗连的阵地,或者集结在他的后方作为预备队。南方军团(由王储^①指挥,包括第五军、近卫军和南德意志的军队)大概在茨魏布吕肯地区的某地形成左翼。至于目前所有这些军队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调到阵地上去,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第三军已经开始乘火车经科伦沿莱茵河左岸向南前进。但是,我们可以推测,那个曾经筹划把10万到15万人的军队从遥远的、而且看来是从各个不同的地方迅速集中到萨尔河一带的人,也会给其余部队指出同样的向心运动的路线。

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而且它也许和其他任何一个可能提出来的计划同样有效。这个计划预定进行这样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德军左翼从茨魏布吕肯起几乎一直到萨尔鲁伊止,应当完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全采取守势，而右翼则从萨尔鲁伊和萨尔鲁伊以西出发，在所有的预备队的支援下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向敌人进攻，并以全部预备队骑兵进行侧敌运动，切断敌人同麦茨的交通线。如果这个计划成功而德军赢得第一次大会战的胜利，那末，法军不仅有失掉同他们的最近的基地麦茨和摩塞尔河的联系的危险，而且可能被逐到使德军得以插到他们和巴黎之间的位置。

德军在这种形势下，加上同科布伦茨和科伦的交通线十分安全，甚至能够冒失败的危险，因为这样的失败对他们来说远不会招致那么致命的后果。然而，这终究是一个冒险的计划。要使溃败的军队，特别是它的右翼，平安地通过摩塞尔河及其支流的隧道撤退，是异常困难的。而且无疑地，许多兵士会被俘虏，相当一部分炮兵会损失，而在莱茵各要塞的掩护下重新编组军队也要很多时间。如果毛奇将军没有确信他的兵力占有压倒优势以致几乎必胜无疑的话，此外，如果他不知道法军不能在他正从各地向选定为第一次会战的地点调集兵力时袭击他的部队的话，那末，采用这个计划就是轻率的。事实是否如此，我们可能很快就知道，甚至可能就在明天。

但在目前应当记住，任何时候都不应当确信这些战略计划会完全带来一切预期的效果。障碍随时随地都会发生，例如：部队可能在需要他们的时候不能准时来到；敌人可能突然移动，也可能已采取了意外的戒备措施；此外，激烈而顽强的战斗或者某一个将军的健全的理智，也往往能使败军避免因失败而造成的最坏的结局，即避免失去同自己基地的交通线。

载于 1870 年 8 月 2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06 号
署名：Z.

战争短评(四)

7月28日，法皇到达麦茨，次日晨接任莱茵军团总指挥。按照拿破仑的传统，这一天应当是积极行动的开始；但是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没有听说关于整个莱茵军团出动的消息。30日，一小队普军在萨尔布吕肯附近击退了法军的侦察队。8月2日，第二军（由佛罗萨尔将军指挥）的第二师（由巴泰将军指挥）占领了萨尔布吕肯以南的高地，用炮火赶走了城里的德军，但是没有试图渡河并以猛攻夺取北岸那些瞰制城市的高地。因此，在这次进攻中萨尔河防线并没有被突破。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法军前进的消息，因此，法军在8月2日战斗中所获得的优势现在还几乎等于零。

法皇从巴黎动身前往麦茨的时候曾企图立刻越过国界，对于这一点，现在恐怕不能怀疑了。如果他这样做了的话，他就能够彻底打乱敌方的准备工作。7月29日和30日，德军还远没有集中完毕。南德意志的军队还在从各地徒步或者乘火车向莱茵河上各桥口集结。普鲁士的预备队骑兵连续不断地经过科布伦茨和埃伦布莱施坦向南进发。第七军在亚琛和特利尔之间，距离任何一条铁路都很远。第十军正从汉诺威出发，而近卫军也正从柏林乘火车出发。在这个时机，法军如果坚决进攻，几乎一定能进到美因兹外围的堡垒，并且能取得对德军退却纵队的相当大的优势，也

许甚至有可能在莱茵河上架桥，并在右岸建立桥头堡来掩护桥梁。无论如何，战争就会在敌人国土上进行，而这就会大大鼓舞法军的士气。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机没有发起这样的进攻呢？原因很简单，如果说法军兵士已经准备就绪，那末他们的军需部门还没有准备好。我们用不着引用德方的任何传闻，我们有让罗上尉（前法国军官，现为“时报”随军记者）的证明。他明确地指出，出征所必需的各种物资在8月1日才开始分配，部队缺少行军水壶、行军锅和其他行军装具，肉是腐烂的，而面包又常常是发霉的。也许可以说，第二帝国的军队在此以前已经由于第二帝国本身而遭受了失败。在必须依靠久已形成的一整套贪污致富的办法向帝国的支持者慷慨行贿的制度下，不可能设想这种办法不风行于军需部门。据鲁艾先生的供认，这场战争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准备了；但是对于各种储备物资的准备，特别是装具的准备，显然注意得最少；而正是在这方面产生的混乱使得作战行动在战争最紧要的关头推迟了几乎一个星期。

这一周的拖延大大改变了德军的处境。这一拖延使他们有时间把自己的军队调到前线，并集中在预定的阵地上。我们的读者都知道，我们推测德军全部兵力现在都已集中在莱茵河左岸大体上与法军相对的位置上。这个看法已由星期二以来所得到的一切官方和私人的消息证实了（星期二，我们曾经使“泰晤士报”有可能借用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全部看法，而该报在今天早晨竟坚持把这些看法说成是它自己的²¹）。斯坦美兹、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和王储分别指挥的3个军团共有13个军，至少有43—45万人。同他们对抗的全部兵力中受过训练的兵士充其量也不会比33—

35万超过很多。如果说不止此数，那末其余的就是那些未经训练的和最近才编成的营了。但是，上述德军兵力还远不是德国的全部力量。仅拿野战部队数量来说，就有3个军（第一、六、十一军）还没有计算在里面。这3个军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驻防地点，并且发现第十一军的各团在莱茵河左岸和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我们还确切地知道目前在汉诺威、不来梅以及它们的郊区除后备军外没有其他部队。这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至少这3个军的大部分也已经开往前线，而在这种情况下，德军已有的优势兵力又增加了大约4—6万人。即使还有后备军的一些师调到萨尔河前线，这也不会使我们感到奇怪。现在，后备军中有21万名兵士已完全做好了准备，各第四营和其他基干营计18万人也几乎准备就绪；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可能用来进行第一次决定性的攻击。但愿谁也不要认为，这些兵员在某种程度上仅存在于纸上。1866年的动员证明，他们确实存在，而目前的动员再度证明，受过训练的、做好出征准备的人员比需要的还多。这些数字似乎是难以相信的，然而，甚至就是这些数字也还不是德国的全部军事实力。

因此，在本周末法皇将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如果说在上周他想前进而不能前进，那末现在他既不能前进也不想前进了。关于敌军的兵力，他并不是不了解，这一点在来自巴黎的消息中可以看到一些迹象。这个消息指出，25万普军集中在萨尔鲁伊和诺伊恩基尔兴之间。至于哪些部队在诺伊恩基尔兴和凯则尔斯劳顿之间，巴黎的消息却没有提到。因此，法军一直到星期四都没有采取行动，部分的原因可能就是作战计划有了改变，他们可能放弃进攻而准备采取守势，利用在筑垒阵地上严阵以待时后装枪和

线膛炮给军队所造成的优势,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这些武器将使军队的威力大为增强。但是,做出这样的决定必定使法国人在战争一开始就大失所望。不经过一次大会战就牺牲洛林和阿尔萨斯的一半土地(而我们怀疑,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能找到比麦茨近郊的阵地更靠近边境的有利阵地),这会给法皇带来严重的后果。

为了对付法军这样的行动,德军可能采取上述计划。他们可能力图在敌人到达麦茨之前就把他们卷入大会战,并在萨尔鲁伊和麦茨之间急速前进。不管怎样,他们总会力图从侧面绕过法军的筑垒阵地而切断他们同后方的交通线。

一支 30 万人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食,它不能让它的补给线被截断,即使是几天也不能。截断它的补给线,就可以迫使它离开自己的阵地,进行野战,那时它就丧失了这些阵地的有利条件。不管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是我们可以确信,最近一定会采取行动。75 万人是不能够长久集中在一块 50 平方英里的地区的。由于无法供养这样的人,这一方或那一方将不得不采取行动。

最后重复一遍,我们是从法军和德军双方都把现有的全部兵力调到前线参加第一次大会战这样一个推测出发的。而在这种场合下,我们仍然坚持这样的意见,即德军在数量上将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只要他们不犯大错误,就足以取得胜利。一切官方和私人的消息都证实了我们这个推测。但是,不言而喻,这一切不能认为是绝对肯定的。我们不得不依据那些可能造成误解的材料来做结论。甚至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会采取什么样的部署;同样不能预言,这一方或另一方指挥官会犯什么样的错误,或者相反,会发挥什么样的天才。

今天我们最后要谈的,是关于德军攻击阿尔萨斯的维桑堡防

线²²的问题，德军方面参加会战的有普鲁士第五军、第十一军和巴伐利亚第二军的部队。这样我们就有了直接的证据说明，不仅第十一军，而且王储的全部主力都在普法尔茨。消息中提到的“皇家近卫掷弹兵”团，是掷弹兵第七团，即西普鲁士第二团，它和第五十八团一样，属于第五军。普鲁士的作战方法总是先以一个军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同时把另一个军的部队调来。但是这次在至多一个军就可以成功地进行的战斗行动中，却使用了普鲁士和巴伐利亚3个军的部队。看来，用3个军来威胁亚尔萨斯，是为了给法军制造印象。此外，沿莱茵河谷向上游的进攻可能在斯特拉斯堡附近被阻，而越过佛日山脉进行侧敌运动时，山道可能被比奇、法耳斯布尔和拉—普提特—比埃尔这些不大的要塞封锁，这些要塞完全能够阻止军队沿大道运动。我们估计，当德军这3个军的三四个旅攻击维桑堡时，这些军的主力大概经兰道和皮尔马森斯向茨魏布吕肯前进。如果上述各旅成功，麦克马洪的几个师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向莱茵河）前进。他们在那里根本不能造成任何威胁，因为沿平原向普法尔茨的任何入侵都会在兰道和盖尔曼尔斯海姆附近被阻。

这次维桑堡会战，显然是在德军几乎稳操胜算的兵力优势下进行的。这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重大的冲突，它对军队士气的影响必然是很大的，特别是因为对筑垒阵地的强攻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困难的任务。尽管法军有线膛炮、多管炮和沙斯波式步枪²³，德军却用刺刀把他们逐出了筑垒阵地，这一事实对两军都会发生影响。这无疑是刺刀成功地对付后装步枪的第一个战例，因此这次会战将是值得纪念的。

由于这个原因，这次会战打乱了拿破仑的计划。这样一个消

息，如果不和其他地方获胜的消息放在一起，即使说得极其轻描淡写，也不能让法军知道。而这个消息又无法隐瞒 12 小时以上。因此，我们可以预料，法皇将派出他的军队去寻求这种胜利，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得到法军胜利的消息，那就奇怪了。但是同时，德军可能也会出动，因此，双方的先头部队将在几个地方而不是在一个地方发生接触。今天，或者至迟明天，预料第一次决战就要开始。

载于 1870 年 8 月 6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10 号

普军的胜利

德军第三军团迅速的行动使毛奇的计划日益明朗化。这个军团一定是通过曼海姆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两地的桥梁，可能还通过这两地之间的军用浮桥而在普法尔茨集中的。集中在莱茵河谷的军队，在沿着从兰道和纽施塔特经过哈尔特高原向西延伸的道路运动以前，可以用来进攻法军的右翼。握有优势兵力而且有兰道在近后方的这样一次进攻，是完全没有危险的，而且能够获得重大的战果。这时，如果能够诱使相当大的一部分法军离开主力来到莱茵河谷，击败他们，并溯河谷而上把他们逐向斯特拉斯堡，那末这部分法军就不能参加决战了，而德军第三军团则因离法军主力非常近，仍能参加决战。无论如何，如果德军的主攻是针对法军的左翼（不管许多军事的和非军事的饶舌家如何反对，我们仍然认为是这样），那末向法军右翼进攻，就会迷惑他们。

对维桑堡突然而成功的攻击，说明德军掌握了关于法军部署的情报，而这些情报促使他们采取了这一机动。法军急于报复，于是冒失地落入了圈套。麦克马洪元帅立即把所属各军调向维桑堡，而要完成这个机动，据说他需要两天的时间。但是王储却打算给他这个时间，他立即利用自己的优势，于星期六在维桑堡西南约 15 英里的索尔河畔维尔附近攻击法军²⁴。麦克马洪的阵地据他自己说是坚固的。但是到下午 5 时他就被逐出了阵地，并且据

王储推测，他已率领自己的全部兵力退向比奇。这样，他也许能摆脱被逐到离开战斗行动中心的斯特拉斯堡的厄运，而有可能与主力保持联络。但是，根据最新的法国电讯得知，他实际上已退向南锡，他的司令部目前在萨韦尔恩。

法军为阻止德军进攻而派出的2个军包括7个步兵师，据我们估计，其中至少有5个师参加了战斗。在会战过程中他们全部相继开到战场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已不能恢复均势，就像逐一开到马振塔战场的奥地利各旅未能做到这点一样²⁵。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军全部兵力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这里被击溃了。德军方面参加会战的可能仍然是那些以前卫攻占维桑堡的部队，也就是巴伐利亚第二军、北德意志第五军和第十一军。其中第五军包括2个波兹南团、5个西里西亚团和1个威斯特伐利亚团；第十一军包括1个波美拉尼亚团、4个黑森—加塞尔和拿骚团，3个绍林吉亚团。由此可见，参战的有来自德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军队。

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最使我们惊异的是双方军队在战略上和战术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所扮演的角色与根据传统所能预料的恰恰相反。德军进攻，法军防御。德军行动神速，并且用他们指挥自如的大量兵力作战；而法军就连自己也承认，他们的军队经过两周的集中，仍然相当分散，还需要两天的时间才能把两个军集中起来。结果，他们被各个击破。根据法国人调动军队的情况看来，可以把他们当做是奥地利人。这怎么解释呢？理由很简单：这在第二帝国中是必然的事情。维桑堡附近的打击，足以使整个巴黎震动，无疑地也足以扰乱军心。必须进行报复，于是立即派麦克马洪率领两个军来实行这个报复。这一步肯定是错的，但是

又不得不走，而且已以走了——所得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如果麦克马洪元帅得不到强大的增援而不能再次迎击王储，那末后者再向南前进 15 英里左右，就能占领斯特拉斯堡—南锡铁路，并向南锡迅速前进，因此也就能迂回法军在麦茨前方所能指望扼守的任何一条防线。无疑，正是因为害怕这一点，法军才不得不放弃萨尔区。王储在派遣他的前卫去追击麦克马洪以后，也可以立即转向右面，越过山区向皮包马森斯和茨魏布吕肯运动，以便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左翼很好地会师。后者在这个期间一直在美因兹和萨尔布吕肯之间某地，而法军却硬说他在特利尔附近。至于弗罗萨尔将军指挥的军在福尔巴赫的失败²⁶，对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运动会有什么影响（看来，普军在这以后已于昨日向圣阿沃耳德推进），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

如果说第二帝国在维桑堡会战以后十分需要胜利，那末现在，在维尔特会战和福尔巴赫会战以后，它就更加需要胜利了。如果说维桑堡会战已足以破坏法军右翼原定的全部作战计划，那末星期六的会战就必然打乱了整个法军的一切准备措施。法军已丧失了一切主动权。它的行动与其说是决定于军事上的考虑，不如说是出于政治上的必要。一支 30 万人的军队几乎都在敌人的视野之内。如果不根据敌人营垒中所发生的情况，而根据巴黎所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那末它就已经失败一半了。当然，谁也不能确切地预言决战（如果它不是已经在进行，那末也是迫在眉睫了）的结局。但是，我们可以说，如果拿破仑第三把星期四^①以来所实行的那种战略再实行一个星期，那末，仅仅

^① 8月4日。——编者注

这一点就足以使世界上最好最大的军队复灭。

法皇拿破仑的电报只是加深了普军关于这些会战的报道所造成的印象。星期六午夜，他只是公布了一些事实：

“麦克马洪元帅战胜。佛罗萨尔将军被迫退却。”

3 小时后得到的消息说，法皇同麦克马洪元帅的联系被截断了。星期日早晨 6 时，当局承认佛罗萨尔将军在萨尔布吕肯以西很远的地方，也就是在福尔巴赫遭受失败，这就从实质上证实了这次失败的严重性；其次宣称：“被分割的军队正向麦茨集中”，也就承认了无法立即阻止德军进攻。后来发出的一个电报却令人难以理解：

“退却将井然有序地进行。”(?)

是谁退却呢？不会是麦克马洪元帅，因为同他的联系仍然中断；也不会是佛罗萨尔将军，因为法皇接着说：“从佛罗萨尔将军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如果在早晨 8 时 25 分，法皇只能用未来语气说明他尚不知位置何在的那些军队行将进行的退却，那末，他在这以前 8 个小时发出的、用现在语气说的“退却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的电报，会有什么意义呢，后来的所有这些消息和最初的消息一样，都贯穿着一个精神，即：《Tout Peut se rétablir》（“一切都可以补救”）。普军的胜利很大，以致不容法皇采用他自然想要采用的那种手法。他不可能大胆地隐瞒真相而把希望寄托于以后会战获胜时一起发表消息来抵销失败的印象。现在已经不可能在法国人民面前隐瞒法军两个军团失败的事实来保持他们的自豪感，因此他只有指望利用法国人过去在得到类似的灾难的消息时在心中产生的那种挽回失去的东西的强烈愿望。法

皇在给皇后和大臣们的私人电报中，无疑给他们规定了公开讲话的范围，甚至更有可能从麦茨给他们送去了有关的声明的原稿。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不管法国人民的心情如何，所有当权者，上自皇帝起，都完全丧气了，这件事本身的意义是特别重大的。巴黎宣布了戒严，这不容置辩地说明，如果普军获得新的胜利，那会造成怎样的局面。而内阁的宣言的结语是：

“我们将努力作战，祖国将得救。”

得救！法国人也许会自问：从什么中得救？从普军为了防止法军入侵德国而进行的入侵中得救。如果普军被击败，而同样的号召从柏林发出来，那末它的意思就清楚了，因为法军每一个新的胜利都会意味着法国对德国领土新的兼并。但是，如果普鲁士政府将来做得十分恰当的话，那末法军的失败将只意味着法国阻碍普鲁士顺利地推行它的德意志政策的企图失败了；我们很难相信，*en masse*（全民）武装（据说，法国大臣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会使他们重新发动一个进攻战。

载于 1870 年 8 月 8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11 号

战争短评(五)

星期六，即8月6日，是战争初期极关重要的日子。德方最初的报道十分含蓄，与其说是指明这一天所获的战果的重要意义，不如说是隐译它的重要意义。只是根据后来的较全面的报告以及法军报告中某些尴尬的自白，我们才得以判断星期六军事形势所起的全部变化。

当麦克马洪在佛日山脉的东面山坡遭受失败的时候，佛罗萨尔的3个师和巴赞军至少1个团（第六十九团），共42个营，被第七军（威斯特伐里亚军）的卡梅克师和第八军（莱茵军）的2个师，即巴尔涅科夫师和施图普纳格耳师，共37个营，从萨尔布吕肯以南的高地一直驱逐到福尔巴赫以西。因为德军各营编制员额较多，所以双方参加作战的人数大致相等，但是法军具有阵地的优势。佛罗萨尔左侧有巴赞和拉德米罗的7个步兵师，在后面又有2个近卫师。但是，除上述1个团以外，所有这些师都没有一兵一卒去援助不幸的佛罗萨尔。他在惨败后不得不退却，现在也和巴赞、拉德米罗和近卫军一样，正使全部部队向麦茨退却。德军追击退却的法军，星期日已到达了圣阿沃耳德，于是整个洛林，一直到麦茨为止，都已暴露在德军的进攻面前。

同时，麦克马洪、德·法伊和康罗贝尔，不是像以前指出的那样退向比奇，而是退向南锡。麦克马洪的司令部星期日曾设在

萨韦尔恩。由此可见，这3个军不仅被击败，而且被击退到和其余军队退却路线不同的方向去了。这样，我们昨天所分析的王储在进攻中所努力争取的那些战略上的优势，看来已经获得了，至少是部分地获得了。当法皇一直向西退却时，麦克马洪愈来愈偏向南去，因此到其他4个军在麦茨掩护下集中的时候他未必能到达吕内维尔。但是从萨尔格明到吕内维尔，比从萨韦尔恩到吕内维尔仅仅远几英里。因此，不能设想，当斯坦美兹在追击法皇，而王储力图在佛日山脉狭窄的山道中追上麦克马洪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星期日他在布利斯堡，而他的前卫在藏尔格明附近某地）竟会袖手旁观。整个洛林北部都是骑兵的出色战场，而在吕内维尔平时经常设有骑兵司令部，指挥驻在郊区的很大一部分法国骑兵。德军骑兵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占很大的优势，因此很难设想他们不会立刻把这一兵种的大量部队派到吕内维尔方向，以便切断麦克马洪同法皇之间的交通线，并破坏斯特拉斯堡—南锡线上的铁路桥梁，并在可能时破坏麦泰河上的桥梁。德军甚至可能成功地以步兵部队楔入这两股被分割的法军之间，使麦克马洪不得不更向南退却和绕更远的道路去恢复他同其余军队的联系。从法皇承认星期六同麦克马洪的联系被截断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这一类事件已经发生了。同时，关于法军大本营拟向夏龙转移的消息，也是法军害怕更严重的后果的不祥之兆。

这样看来，法军8个军中已有4个军全部或者几乎全部被击溃了，并且每次都是被各个击破的；而其中之一的第七军（由费里克斯·杜埃指挥）的下落则完全不明。导致这种错误的战略，真像奥地利人在完全束手无策时采用的战略。这种战略使我们联想到的不是拿破仑，而是博利约、马克和居莱之流。请设想一下弗

罗萨尔的处境，他在福尔巴赫作战终日，而在他左侧距萨尔河防线不到 10 英里或者大约 10 英里的地方，7 个师竟袖手旁观！如果不设想他们当面的德军既足以阻止他们前去援救弗罗萨尔，又足以阻止他们单独进行攻击来支援他，那末这就完全不能令人理解了。但是这个唯一可能提出的理由只有如我们一贯指出的那样，在德军打算以其极右翼进行决定性的攻击的条件下，才可以成立。向麦茨仓卒退却，又一次证实了这个看法。这次退却很像是在阵地和麦茨的交通线受到威胁时企图及时退出阵地的行动。我们虽然不知道，哪些德军部队在正面同拉德米罗和巴赞所属各师对垒以及可能从翼侧迂回他们，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斯坦美兹的 7 个或者更多的师中仅有 3 个师参加了战斗。

在这期间，又开来了另外一个北德意志军——第六军，即上西里西亚军。这个军在上星期四经过科伦，现在由斯坦美兹或弗里德里希—卡尔指挥。关于弗里德里希—卡尔，“泰晤士报”仍然坚持说他在极右翼特利尔附近，虽然该报的同一号上登载了一则电讯，说 he 已从霍姆堡向布利斯堡前进。现在，德军无论在兵力和士气上或者在战略上都具有极大的优势，以致他们在某些时候几乎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即使法皇打算把 4 个军留在麦茨的营垒内，——否则他就得不停地一直退到巴黎，此外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那也无法阻止德军进攻，就同贝奈德克在 1866 年在奥里缪茨城的掩护下重新集结他的军队而未能阻止普军向维也纳进攻²⁷一样。贝奈德克！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的胜利者怎能和他相比！但是，这是一个最恰当不过的比较。同贝奈德克一样，法皇把军队集中在一个可以向任何方向运动的阵地上，而且是在敌人集中前整整两个星期就集中好了。同贝奈德克一样，路

易—拿破仑采取了巧妙的行动，使自己的各军都因敌人在数量上或在指挥上占优势而被各个击破。但是，我们担心类似之处就到此为止。虽然贝奈德克一个星期中每天都打败仗，他终究还保存了足够的兵力在萨多瓦进行最后的奋战。至于拿破仑，从各方面看来，他的军队经过两天战斗后几乎已绝望地被分割了，因此，他甚至不能试图进行一次决战了。

我们认为，原来打算向波罗的海进行的远征，如果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佯动的话，那末现在可以放弃了。每一个营都要用在东部边境。法军 376 个营中有 300 个营分属于 6 个基干军和 1 个近卫军，这些军据我们了解都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之间。第七基干军（由杜埃指挥），即另外 40 个营，可能已被派往波罗的海，也可能同主力会合。其余 36 个营勉强够用于阿尔及尔和在国内担任各种勤务。法皇还有哪些兵力去增援呢？这些兵力就是现在正在编成的 100 个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但是，这二者——前者大部分，后者全部——都是由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编成的。什么时候各第四营可以完成出征准备，我们不知道，但是不论他们是否完成准备，他们都必须出征。至于流动自卫军目前的状况，我们可以从上星期夏龙兵营的事件²⁸来作判断。无论是各第四营还是流动自卫军无疑都是良好的兵士材料，但还不是兵士，还不是能够经得住那些善于夺取多管炮的人的攻击的军队。另一方面，再过 10 天左右，德军能够补充 19 万到 20 万人的第四营和其他部队，这是精锐部队；此外还将得到至少是同样数目的后备军，他们全部适于担任野战勤务。

载于 1870 年 8 月 9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12 号

战争短评(六)

以往恐怕没有一次战争像拿破仑“到柏林的军事散步”这样极端忽视普通理智的常规，这一点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莱茵河的争夺战是拿破仑最后的和最大的一张王牌；但是同时，这次战争的失败也就意味着第二帝国的崩溃。这在德国是了解得很清楚的。经常期待对法战争的爆发，曾经是很多德国人不得不容忍 1866 年的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德国是分裂了，那末在另一方面说却是加强了，北德意志的军事组织所提供的安全保证，比那个较大的但涣散的旧德意志联邦²⁹的军事组织所提供的要大得多。这个新的军事组织预定能在 11 天内使编入各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的 552000 名常备军和 205000 名后备军完成战斗准备，并且再经过两三个星期，又使 187000 名完全适于野战的补充部队（Ersatztruppen）做好战斗准备。这并不是秘密。这些部队怎样分编为各军以及每个营应在哪个地区编组的全部计划曾不止一次地公布过。而且，1866 年的动员证明，这个组织并非一纸空文。每一个人都按照规定进行了登记；大家也都很清楚，每个后备军管区司令部都已准备好每人的征集令，只等填写日期了。然而在沙皇看来，这些庞大的兵力仅仅见于纸上。他到战争开始时所征集的全部兵力，至多是莱茵军团的 36 万人和准备向波罗的海远征的 3—4 万人，共计约 40 万人。在兵力对比如

此不利以及法军新编部队（第四营）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战斗准备的情况下，沙皇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乘德国还在忙于动员的时候进行突然袭击。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机会是怎样被错过了，甚至第二个取胜的机会，即向莱茵河进攻的机会，又是怎样被错过了。现在，我们还要指出另一个错误。

法军的部署到宣战的时候是很好的。这显然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作战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个军在提翁维耳、圣阿沃耳德和比奇，直接在边境附近，为第一线；2个军在麦茨和斯特拉斯堡，为第二线；2个军作为预备队，在南锡附近；第八军在伯尔福。所有这些军队依靠铁路在几天内就可集中起来从洛林渡过萨尔河进攻，或者从亚尔萨斯渡过莱茵河进攻，并且根据情况向北或向东进击。但是，这个部署只适于进攻。对于防御，它完全不适用。如进行防御，军队部署的首要条件是：前进部队同主力应保持适当距离，以便能够及时获得关于敌人进攻的情报，并在敌人到达前集中好军队。假定两翼部队向中央集中需要行军一天，那末前进部队至少必须同中央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而在这里，拉德米罗、弗罗萨尔和德·法伊3个军，以后还有麦克马洪军的一部，都直接配置在边境附近，而且分布在从维桑堡到锡埃尔克全长至少为90英里的一线上。为了要把两翼部队集中到中央，就需要行军整整两天；不但如此，甚至当得知德军就在前面几英里的时候，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缩短战线，或者把前进部队推进到适当距离上，以保证及时获得关于敌人行将进攻的情报。因此，几个军被各个击破，还有什么奇怪呢？

接着造成的一个错误，就是麦克马洪把1个师配置在佛日山脉以东维桑堡附近一个招引敌人优势兵力攻击的阵地上。杜埃的

失败使麦克马洪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企图在佛日山脉以东重新进行战斗，结果使右翼更加远离中央，并使自己同中央的交通线失掉掩护。当右翼（麦克马洪军，此外至少还有法伊和康罗贝尔两军的各一部）在维尔特被击败时，中央（现在查明有弗罗萨尔军和巴赞军的两个师）在萨尔布吕肯的前面遭到了惨败。其余的部队相距太远，不能前来援助。拉德米罗仍在布宗维耳附近，巴赞的残部和近卫军在布累附近，康罗贝尔的主力到了南锡附近，德·法伊军的一部已完全不知去向，而费里克斯·杜埃，据我们现在所知，8月1日曾在亚尔萨斯最南端的阿耳特基尔克，距维尔特战场几乎有120英里，而且看来又没有足够的铁路运输工具。所有的措施只说明了疑惑、犹豫、动摇，并且这是在战争的最紧要的关头产生的。

兵士对于他们的敌人得到了什么印象呢？固然，法皇在最后的时刻告诉了他的兵士，说他们将同“欧洲最好的军队之一”交手，这当然很好，但是在多年来一直向他们灌输了轻视普军的思想之后，这些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让罗上尉在“时报”上所写的报道，就是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我们在以前曾引用过他的另一篇报道^①，他是在3年前才退役的）。他在对普军说来是“炮火的洗礼”的战斗中被普军俘掳，在普军那里呆了两天，看到了普军第八军的大部分部队。在他看到普军实际上同他所想像的竟有这么大的区别以后，他大为吃惊。他被带到普军营地时产生的第一个印象便是：

“一进入森林，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哨兵站在树下，各营集结在大道两旁。但愿谁也不要使用同我们国家和我们目前的局势不相称的手法来欺骗世人：我刚走几步，便看到了一支优秀的军队（une belle et bonne

^① 见本卷第26页。——编者注

armée) 和一个为战争而严密组织起来民族所固有的特征。这些特征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一切方面。兵士的举止、在比我们严格得多的纪律下他们在每一个动作上对首长意志的服从, 一些人的爽朗活泼、另一些人的严肃果敢、大多数人所表现的爱国心、军官在一切方面经常表现的那种勤恳态度以及特别使我们羡慕的士官的品德——这就是立刻使我为之惊异的一切, 这就是自从我在这个军队和这个国家过了两天以后经常在脑海里萦回的一切。在那里, 每隔一定距离所树立的各地后备军的各营番号的标记使我想到, 这个国家在危险临头和雄心勃发的时刻能够如何充分地发挥力量。”

在德军方面, 一切都和法军完全不同。他们当然恰当地估计了法军的战斗素质。德军的集中既迅速又缜密。所有能上前线的人都已派往前线。现在既然发现北德意志第一军在萨尔布吕肯已经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会合, 那末, 这就无疑说明这支 55 万人的常备军的所有人员、马匹和火炮都已开到前线, 在那里他们将同南德意志的军队会合。而且这个巨大的数量优势的作用, 到现在又由于军队指挥的卓越而进一步增强了。

载于 1870 年 8 月 11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14 号

战争短评(七)

整个这一星期，人们都在等待着曾被法国公报说成是迫在眉睫的麦茨大会战。然而，我们的军事评论家没有一个人认为需要说明，这个行将到来的会战无非是转移巴黎民众视线的一种手法而已。麦茨会战！为什么法军要进行这个会战？他们在这个要塞掩护下集中了4个军；他们企图把康罗贝尔4个师中的某些师也调到那里去；他们可以指望很快得到关于其余3个军（麦克马洪军、德·法伊军和杜埃军）到达南锡附近的摩塞尔河并在该河西岸得到掩护的消息。他们在全部军队还没有重新会合以前，在麦茨的堡垒还保证他们不受攻击的时候，为什么要进行决战呢？而德军又何必对这些堡垒进行无准备的强攻而碰得头破血流呢？只有在法军全部在麦茨城下会合以后，而不是在这以前，才可能期待法军向摩塞尔河以东出击，并在他们的要塞前面进行会战。不过，这一切还只是将要实现，并且将来总的说来能否实现，现在还值得怀疑。

在上星期日^①，麦克马洪被迫放弃了萨韦尔恩，该城在当夜就被德军占领。和他在一起的，有他自己那个军的残部和杜埃军的1个师（由孔塞—杜美尼耳指挥）的残部，此外，还有掩护他退却

^① 8月7日。——编者注

的德·法伊军的1个师。在当天傍晚，德军第一和第二军团通过福尔巴赫几乎推进到了圣阿沃耳德。这两个地方都比萨韦尔恩接近南锡；而且比萨韦尔恩大大接近蓬塔木松和迪厄卢阿尔，即两个位于南锡和麦茨之间的摩塞尔河畔的地点。现在，当德军需要尽快地在摩塞尔河上控制或建立一个渡口，而且根据各种非常明显的理由，这个渡口必定要设在麦茨的上方的时候，当他们比麦克马洪更接近该河，因而迅速挺进就能阻碍他同巴赞会合的时候，当他们的兵力绰绰有余的时候，他们企图采取这一类的行动，难道还不明显吗？如我们所预言的，他们的骑兵已经在迅速通过洛林整个北部，看来不久以前已同麦克马洪的右翼接触。星期三这支骑兵已通过格罗—坦肯，该地距萨韦尔恩和南锡间的直通大道仅25英里左右。因此，德军将确切知道麦克马洪的位置而相机行事。我们不久就会知道，他们是在南锡（更准确地说，在弗鲁阿尔）和麦茨之间的某处到达摩塞尔河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自上星期六以来没有听到任何战斗消息的原因。现在，兵士的两腿正在全力工作；麦克马洪同弗里德里希—卡尔正进行着一场竞赛，看谁先渡过河。如果弗里德里希—卡尔在这场竞赛中获胜，我们就会看到，法军将从麦茨出动，当然这不是为了在麦茨城下进行会战，而是为了防守摩塞尔河的渡口。这确实可以依靠在右岸或左岸的攻击来达到。在福尔巴赫缴获的两个舟桥纵列也许很快就会得到使用。

关于德·法伊，我们没有听到任何肯定的消息。固然，麦茨发表的一个公报说他已经同军团会合。但是同哪个军团呢？同巴赞的，还是同麦克马洪的？如果这整个公报还有一点真实性的话，那来他显然是同后者的军团会合了，因为自从同他的联系中断以

来，德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就位于他和巴赞之间。杜埃军（8月4日仍在瑞士边境的巴塞尔附近）的其余两个师现在一定是因为德军向斯特拉斯堡进攻而被截断了同法军其余部队的联系；他们只有经过维祖耳才能同其余的法军会合。至于康罗贝尔的部队，我们意外地发现他至少有1个师（由马丹普雷指挥）在巴黎，这个师在那里不是对付德军，而是对付共和党人。该师的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八团曾被提到是星期二参加保护立法团的军队的一部分³⁰。其余的部队现在应当在麦茨，这样就使那里的军队增加到15个（步兵）师，但是其中3个师由于在施皮歇恩战败，已被完全击溃。

至于施皮歇恩会战，说法军在这次会战中因为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而被击败，那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有斯坦美兹和阿尔文斯累本两位将军的相当完整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德军方面有哪些部队参加了会战。攻击由第十四师担任，由我们的老相识第四十团支援，总共是15个营。这就是同佛罗萨尔陆续调来的3个师（共39个营）作战6小时之久的全部步兵部队。当这些部队几乎被击败，但是仍然扼守着在会战开始时所攻占的施皮歇恩各高地时，第三军（勃兰登堡军）的第五师赶来了。该师4个团中至少有3个团参加了战斗，这样，德军参加战斗的最多共有24个或者27个营。他们把法军逐出了阵地，而且只是在法军开始退却以后，沿罗塞耳河谷绕过法军右侧的第十三师的先头部队才到达战场，攻击了福尔巴赫，并切断了直通麦茨的道路，使法军有秩序的退却变成了溃逃。在战斗结束时，德军还有1个师（第六师）已准备好进入战斗，而且事实上也小部分地参加了战斗。但是就在这时，又开来了法军的蒙托东师和卡斯塔尼师（均属巴赞军），而属于后一师的第六十九团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因

来，德军纵队的先头部队就位于他和巴赞之间。杜埃军（8月4日仍在瑞士边境的巴塞尔附近）的其余两个师现在一定是因为德军向斯特拉斯堡进攻而被截断了同法军其余部队的联系；他们只有经过维祖耳才能同其余的法军会合。至于康罗贝尔的部队，我们意外地发现他至少有1个师（由马丹普雷指挥）在巴黎，这个师在那里不是对付德军，而是对付共和党人。该师的第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八团曾被提到是星期二参加保护立法团的军队的一部分³⁰。其余的部队现在应当在麦茨，这样就使那里的军队增加到15个（步兵）师，但是其中3个师由于在施皮歇恩战败，已被完全击溃。

至于施皮歇恩会战，说法军在这次会战中因为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而被击败，那是不对的。我们现在有斯坦美兹和阿尔文斯累本两位将军的相当完整的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德军方面有哪些部队参加了会战。攻击由第十四师担任，由我们的老相识第四十团支援，总共是15个营。这就是同佛罗萨尔陆续调来的3个师（共39个营）作战6小时之久的全部步兵部队。当这些部队几乎被击败，但是仍然扼守着在会战开始时所攻占的施皮歇恩各高地时，第三军（勃兰登堡军）的第五师赶来了。该师4个团中至少有3个团参加了战斗，这样，德军参加战斗的最多共有24个或者27个营。他们把法军逐出了阵地，而且只是在法军开始退却以后，沿罗塞耳河谷绕过法军右侧的第十三师的先头部队才到达战场，攻击了福尔巴赫，并切断了直通麦茨的道路，使法军有秩序的退却变成了溃逃。在战斗结束时，德军还有1个师（第六师）已准备好进入战斗，而且事实上也小部分地参加了战斗。但是就在这时，又开来了法军的蒙托东师和卡斯塔尼师（均属巴赞军），而属于后一师的第六十九团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因

战争短评(八)

麦克马洪在什么地方呢？德军骑兵一直奔袭到吕内维尔和南锡的门口，看来没有同他遭遇；否则，我们一定会听到发生战斗的消息。而且，如果他安全到达南锡并因此而同麦茨的军队恢复了联络的话，那末法军大本营无疑会立即宣布这样一件令人快慰的事情。从对麦克马洪的行踪保持完全缄默这一点，我们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麦克马洪认为从萨韦包恩取直路到吕内维尔和南锡过于危险，为了不使自己的右翼暴露在敌人面前，便绕道向南退却，而在巴荣或者甚至在巴荣上方渡过摩塞尔河。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那末他就很少有希望能在什么时候到达麦茨。在这种情况下，法皇或者麦茨的另一位指挥官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立刻向马尔纳河岸夏龙（可能同麦克马洪会合的最近地点）退却对军队是不是更好些。因此，我们觉得关于法军朝这个方向总退却的消息是确实的。

同时，我们听到法军有大量增援部队的消息。新任陆军大臣向议院保证说，4天以后，一定有两个军，每军35000人，被派往前线。但是他们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莱茵军团的8个军和准备向波罗的海远征的部队以及在阿尔及尔的驻军，是法国陆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在内）的全部兵力。我们知道，康罗贝尔军和波罗的海远征军共4万人现在在巴黎。我们从德让将军在议院的演说

中得知，各第四营现在还远没有准备好，它们需要补充，而且势必抽调流动自卫军人员才能补充起来。那末，这7万人特别是在蒙多邦·德·八里桥^①将军还打算（这是很可能的）把4万人尽可能留在巴黎的情况下，将从哪里来呢？但是，如果他的话真的有某种意义，那末这2个军就应当是指驻在巴黎的部队和至今一直被认为是莱茵军团的一部分的康罗贝尔军。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真正的增援部队只是巴黎的守备部队，这样，作战部队的总数将由25个师增加到28个师，但其中至少有7个师已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我们还听说特罗胥将军被任命为正在巴黎建立的第十二军的军长，而旺代将军(?)被任命为正在里昂建立的第十三军的军长。到目前为止，法军是由近卫军和第一至第七各军组成的。关于第八、九、十、十一军的番号，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而现在，人们突然向我们说起第十二和第十三军。我们看到，除了第十二军（如果这指的是巴黎守备部队）以外，目前没有任何部队可以编成这些军中的一个军。这一切看来是一种在纸上建立军队以求恢复公众信任的可怜诡计，不然，声称扩编5个军而其中4个军至今还不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无法解释了。

正在打算建立一支新军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有哪些兵源呢？首先是宪兵，它可供编成1个骑兵团和1个步兵团。这是很好的部队，但它的人数不超过3000人，还必须从法国各地召集来。关于douaniers（海关警备队）的情况也是如此，它预计编成24个营；

① 即古赞—蒙多邦，法国将军，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曾指挥侵略军，因在北京和通州之间的八里桥战胜清兵，由拿破仑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封号。——译者注

但是，我们怀疑它的人数甚至能否够得上这个数目的一半。其次是 1858—1863 年应征入伍的老兵，其中未婚者已经按特别法令征召入伍。他们的总数可达 20 万人，这是军队最宝贵的补充人员。其中一小半就足够补充各第四营，其余则可编成新的营。但是，这里又来了困难：军官从哪里来呢？他们不得不从作战部队中抽调，虽然这可以用提升大量士官为少尉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这样又会削弱那些抽出他们的部队。所有这三类人合计起来，至多增加 22—23 万人，而且在有利的情况下，也至少需要 14—20 天，才能使其中一部分做好准备以便加入作战部队。但是不幸，情况对他们并不有利。现在已经公认，法军中不仅是军需部门，而且整个军事行政机构都十分无能，它们甚至无法保证边境上的军队的供应。既然从来没有人想到过前线需要后备兵力，那末又怎能谈到给他们准备武器和装具呢？除了各第四营以外，是否还有什么新编部队能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准备，这确实是很值得怀疑的。此外不应当忘记，这些人当中谁也没有使用过后装枪，他们完全不懂得由于使用这种武器而采取的新战术。如果说目前法军的基干部队，像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往往慌乱地盲目地射击而浪费弹药，那末这些新编的营在遇到那些看来很少因战斗的喧嚣而影响行动的沉着和射击的准确的敌人时又将如何呢？

余下的还有流动自卫军、全部 30 岁以下的未婚男子和地方国民自卫军。谈到流动自卫军，那末甚至它的小部分有点正规组织的部队，一派到夏龙，看来也就瓦解了。纪律根本不存在，而军官由于其中大多数人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职责，看来已日益丧失了威信；兵士连武器都没有，现在这整个组织好像正在全面瓦解中。德让将军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建议以流动自卫军补充各第四营。

但是,如果全民武装中这支似乎是有组织的部队都完全无用,那末对其余的部队又能有什么指望呢?纵然军官、装具和武器都为他们准备齐全了,但是把他们训练成为兵士又需要多少时间呢?何况对于应付紧急情况事先毫无准备。每一个能服役的军官都已经用上了。法军没有德军那种“一年志愿兵”制所提供的几乎用之不尽的后备军官(德军每年大约有这种志愿兵7000人入伍,在服役期满时几乎其中每一个人都完全胜任军官的职务)。装具和武器看来也缺乏;据说,甚至需要把过时的燧发枪从兵器库中拿出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这20万人对法国能有什么价值呢?当然法国人可以随便援引国民公会的例子,援引卡诺和他从无到有地建立边境部队的例子³¹等等。虽然我们不愿断言法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可是终究不应忘记同盟国军在国民公会的成功上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这些进攻法国的军队每路平均有4万人;他们共有三四路,各自单独行动——一路在些耳德河,另一路在摩塞尔河,第三路在亚尔萨斯,等等。国民公会曾用大量稍微受过一点训练的新兵来抵抗每一路人数不多的军队,这些新兵活动在当时完全依赖仓库补给的敌人的翼侧和后方,迫使敌人全部尽量地靠近边境。他们在经过了5年战争后,锻炼成了真正的兵士,最后终于把敌人逐过莱茵河。但是,可不可以姑且设想,这种战术能够对付目前这一支虽分编为3个独立的军团、但始终能集中在可以相互支援的距离上的庞大的入侵军或者德军会让法国人有时时间去发挥他们还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在力量呢?只有当法国人准备做他们从来还没有做过的事,即让巴黎和它的守备部队听从自己的命运摆布,而以卢瓦尔河线为作战基地继续战斗的时候,这些潜在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才有可能发挥出来。也许事情永远不会

发展到这个地步，但是当法国还没有准备这样做以前，最好不要谈全民武装。

载于 1870 年 8 月 15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17 号

战争短评(九)

“法军开始向摩塞尔河左岸渡河。今日(星期日)晨, 侦察部队没有报告发现普军前卫; 而当军队半数渡过该河时, 普军以大量兵力向我军攻击, 但经4小时战斗后, 受重创败退。”

这是路透先生在星期一^①傍晚转发的法皇公报所宣称的。但是, 公报中有一个严重的错误。虽然敌人的大量兵力就集结在附近, 可是法皇却明确地声称, 侦察部队没有报告发现敌军。不过除此以外, 好像不可能有任何报道比这个公报更真实更认真了。在我们眼前是一幅鲜明的图景: 法军整个忙于渡河这一冒险行动, 而狡猾的、总是善于乘隙袭击敌人的普军, 正当法军有一半兵力渡到对岸时, 便向他们攻击; 接着, 法军进行了英勇的防御, 最后经过超人的努力终于转入猛烈进攻, 使普军受重创败退。这真是绘声绘色, 缺少的只有一点, 就是这一切所发生的地区的名称。

根据这个公报我们只能设想, 这次渡河和企图阻挠渡河的行动(这一行动已被如此胜利地击退了)是在平地上发生的。但是, 既然法军渡河的所有桥梁都在麦茨城内因而敌人根本无法到达, 既然沿河有五六英里长的一段由麦茨周围的堡垒掩护, 而且有足够的、同样安全的地点可供架设许多浮桥,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① 8月15日。——编者注

情呢？难道法军参谋部是想使我们相信，法军违背理智地忽视了所有这些有利条件，把军队开出麦茨，在平地上架设桥梁，并在敌人视野内和行动可及的范围内渡河，只是为了促成整整一星期以来所许下的“麦茨会战”吗？

如果法军利用麦茨要塞范围内的桥梁渡过摩塞尔河，那末，当这些法军还留在右岸（在独立堡垒线以内他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普军怎么能攻击他们呢？这些堡垒的炮兵是能够很快地把这片地区变成火海而使任何来袭的军队无法接近的。

这一切似乎令人难以置信。法军参谋部至少可以指出这个地区的名称，以便我们能按地图彻底研究这次光辉的会战的各个阶段。但是，它不打算报道这个地名。幸而普军并不是这样讳莫如深，他们宣布战斗是在庞日附近通往麦茨的道路上发生的³²。我们一看地图，一切就都清楚了。庞日不在摩塞尔河上，而在离摩塞尔河 8 英里的尼德河上，距离麦茨的独立堡垒线约 4 英里。如果法军曾经渡摩塞尔河，并且有一半部队已经到达对岸，那末从军事观点来看，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把大量兵力放在庞日或它的附近。如果有大量兵力被派到那里，那末这就不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

拿破仑被迫放弃麦茨和摩塞尔河防线，当然不能够不战而退，而且如有可能还要争取在一个真正的或者表面的胜利以后才开始退却，这次退却至少要退到夏龙。机会是好的。当他的军队一半已经渡过河时，另一半本来能够从各堡垒之间向麦茨以东出动，将普军先头部队向后压缩，造成一次总会战，其规模只求引诱敌人进入各堡垒的火炮射程以内，然后全线发起有效的进攻，把敌人击退到对堡垒没有威胁的地方。这样一个计划是不至于完全失胜

的；它一定可以达到具有胜利外表的结局。这样也许能在军队中，甚至还可能在巴黎恢复威信，使向夏龙的退却少丢一些面子。

这些理由正可以说明那个看来并不复杂而实际上荒谬的麦茨公报。这个公报的每一个字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正确的，然而把整个上下文联系起来一看就可发现，它是企图造成一种完全虚假的印象。这些理由也说明了为什么双方都能自称获得了胜利。普军把法军一直驱逐到他们的堡垒的掩护之下；但因为过于接近这些堡垒，普军又不得不退却。这就是关于有名的“麦茨会战”所能说的一切。这次会战完全可以不进行，因为它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于零。我们看到，八里桥伯爵在议院的演说要谨慎得多。

他说：“发生的战事不能称为会战，而是局部的战斗，而每个懂军事的人都应当明白，普军在战斗中失利，不得不撤离法军的退却线。”

元帅最后的断言看来只在短时间内是真实的，因为普军无疑在马尔斯—拉—土尔和格腊韦洛特严重地扰乱了退却的法军。

对拿破仑和他的军队来说，确实是撤离麦茨的时候了。当法军在摩塞尔河边踌躇不前的时候，德军骑兵在科梅尔西附近渡过了麦士河，破坏了由此通往巴尔勒杜克的铁路。他们还到了维涅耳，威胁着从麦茨向凡尔登退却的纵队的翼侧。从一个骑兵连如何进入南锡，征收了5万法郎和强迫该城居民破坏铁路等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骑兵曾大胆地干了些什么。法军骑兵在什么地方呢？编入8个军的那43个团和属于莱茵军团的预备队骑兵12个团又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土尔要塞是德军进军道路上唯一的障碍，但是它如果不控制着铁路，是不会有任意意义的。德军当然需要铁路，因此无疑将采取措施迅速攻占土尔。土尔是一个没有独立堡垒的旧式

要塞，因而完全不能抵御炮击。我们可能不久就会听到，这个要塞在野炮轰击 12 小时或许还要短的时间以后就投降了。

如果麦克马洪真的像法国报纸所报道的那样，离开了他的军团，在维尔特会战结束两天后到达了南锡，那末我们就可以推测，他指挥的那个军已完全瓦解了，而且德·法伊的部队也染上了这个病症。现在德军几乎与自己两侧的两个法军军团在同一线上向马尔纳河前进。巴赞运动的方向是从麦茨经凡尔登和圣梅努到夏龙，德军是从南锡经科梅尔西和巴尔勒杜克到维特里，麦克马洪的部队（因为即使元帅本人在夏龙同法皇相会，但是他肯定没有把自己的军团带去）在南面的某地运动，但无疑地也是向维特里方向运动。因此，法军两个军团的会合已越来越成问题了。如果杜埃的部队不能及时地由伯尔福经维祖耳和肖蒙开到维特里，那末他们可能不得不取道特鲁瓦和巴黎来同军团会合，因为对法国兵来说乘火车通过维特里不久将是不可能的了。

载于 1870 年 8 月 18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20 号

战争短评(十)

毛奇将军虽然已经老了，但是他的计划无疑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有一次，他曾经把自己的军队集中成一个拳头楔入法军的一翼和他们其余部队之间。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现在又在重复同一种战法，而且看来获得了同样的成功。如果毛奇继续直接向马尔纳河挺进，并且只是在法军向同一地点平行行军时扰乱他们的右翼和后方，那末根据大多数军事评论家的意见，这已经做得足够了。但是，当时很难料想到，他会使他的兵士的双腿做出现在显然已经做出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努力。德军个别部队对法军从麦茨向凡尔登运动的长的行军纵队的暴露翼侧和后方采取的行动，我们原以为是一般的攻击，现在了解到这只是以大兵力进攻这个纵队以前的一种侦察行动。德军3个或4个军自麦茨南面沿一条半圆形的路线前进；他们的先头部队在星期二^①早晨到达了法军的行军路线上，并且立即袭击了法军。法军在星期日开始从麦茨退却；当天傍晚在庞日和贝耳克卢瓦堡垒之间发生的小战斗，可能耽搁了这次运动，但是星期一退却仍在继续，并且在星期二还没有结束。退却至少是以2个独立的纵队沿着在麦茨以西5英里的格腊韦洛特分叉的两条道路进行的；北面一条经过栋库尔和埃

^① 8月16日。——编者注

坦，南面一条经过维昂维耳、马尔斯—拉—土尔和弗伦，然后又凡尔登会合。德军的攻击是在马尔斯—拉—土尔附近进行的³³；战斗继续了一整天，结果据德军的公报说法军被击败，损失2面鹰徽旗和7门火炮，被俘2000人，并且被赶回麦茨。与此同时，巴赞也自称取得了胜利。他宣布，他的部队击退了德军，并且在夺得的阵地上过了一夜。但是在他星期三傍晚发出的电报中，包含两个预兆某种非常不祥的东西的说法。巴赞在这个电报中说，星期二他全天都在栋库尔和维昂维耳之间作战，这就是说，这次会战中他的战线是在栋库尔到维昂维耳之间，面朝西，而德军则截断了通往凡尔登的两条道路。不管巴赞怎样自称胜利，他毕竟不能说已经打通了去凡尔登的道路，哪怕是其中的一条也好。如果他做到了这点，那末无疑地，他的责任就是在当天夜晚尽快地继续退却，因为敌军到早晨几乎肯定将得到增援。但是他停下来了，并且“在夺得的阵地上”过了一夜，姑不论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他还在那里继续停留到星期三下午4时，甚至在这以后他宣布的也还不是打算继续运动，而是延迟几个小时再继续运动以便大量补充弹药。因此，我们可以相信，星期三的夜间也是在同一地点度过的；而且因为他能够获得弹药补充的唯一地点是麦茨，所以我们有充分根据得出以下的结论：“夺得的阵地”是在后方，而向凡尔登退却的道路仍然被德军截断，现在巴赞元帅只有退回麦茨，或者试图经由一条更加靠北的道路逃走。

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而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现有的材料还能作出什么别的解释，——那就是说，一部分法军同其余法军的联系又被截断了。我们不知道，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在德军到达前，有哪些部队开往凡尔登去了。但是被赶回麦

茨的无疑是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不管他们的价值如何，企图在夏龙集中的大军还得减少这样一个数量的部队。固然还有一条出路，巴赞可能试图从这里逃走。靠近比利时边境有一条铁路从提翁维耳通往隆吉翁、蒙梅迪和梅济埃尔，在梅济埃尔它同通往兰斯和夏龙的另一条铁路相交。但是利用这条靠近国界的铁路或者仅仅向这条铁路开进的任何军队，都可能被敌人的追兵逼到边境上而不得不投降，或者越过国界而被比利时军队解除武装。此外，在这条边远的铁路线上，也很少可能找到足够的车辆来运送大量部队。并且，我们还接到从凡尔登来的消息说，大概是在麦茨和提翁维耳之间渡过摩塞尔河的普军，星期三已经到达布里埃，即到达由麦茨直达这条铁路还可以通行的地段的道路。如果巴赞企图在这个方向上运动来挽救他的败军，那末他们至少会弄到全部瓦解的地步。一旦敌人位于败军运动的捷径上，长时间的退却就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行动。麦克马洪的部队便是证明，他的部队还在一小股一小股地乘火车来到夏龙。12日约有5000人到达；他们的情形怎样，让“世纪报”³⁴来报道吧：各个兵种和各个团的兵士混在一起；没有武器，没有弹药，也没有背囊；骑兵没有马，炮兵没有炮；真是一群杂七杂八、漫无组织、士气沮丧的乌合之众，要把这些人重新编成步兵营、骑兵连和炮兵连，就得好几个星期。记者们由于怕泄露会被敌人利用的消息而避免叙述在夏龙的基干部队的状况，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应当在夏龙集中的大军，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在那里集中起来了。自从康罗贝尔的军队一部分调到巴黎，一部分调到麦茨以后，在夏龙就只有18个营的流动自卫军，而他们在目前这种战争中是不屑一提的。此后，从巴黎派来了一些海军陆战队；如果巴赞所

作的部署还有一点合理的东西的话，那末杜埃军剩下的 2 个师这时也应当来到；也许那里还有一些第四营，但是数量当然不会多。在最近几天可能开来几个由宪兵和 douaniers（海关警备队）新编成的团，还可能开来一些不大的自由射手³⁵部队；但是把所有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撇开不谈，在德军来到以前可能集中在夏龙的这支大军的主要部分，无论如何都只有用从麦茨退来的部队组成。而现在，在星期二的会战以后，这些部队的情形如何，有待进一步了解。

在任命特罗胥将军为“正在巴黎建立的”第十二军军长以后，不久又任命他为巴黎的防守司令，这证明并不打算把现在驻在巴黎的大量军队派往前线。巴黎需要镇压。但是，当上星期二会战的真相大白的时候，谁还能够镇压住巴黎的人民呢？

载于 1870 年 8 月 19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21 号

战争的危机

法皇离开了军队，但是他的那位灾星还留在军队里面，他就是在这位灾星的怂恿之下迫不及待地宣战的，但是宣战以后却做不出任何决定。军队最迟应当在7月20日以前做好进军准备。7月20日到了，但是什么都还没有做。29日，拿破仑第三在麦茨担任了总司令，当时还有时间可以几乎不受阻挡地一直进攻到莱茵河；但是军队按兵不动。犹豫不决看来非常严重，甚至法皇不能决定进攻还是采取守势。德军各路纵队的先头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向普法尔茨集中，并且每天都可能发起进攻。尽管如此，法军依然停留在边境的阵地上；这些阵地原是为了进攻而设的，根本不适于防御，但是进攻一直没有进行，而防御很快就成了法军唯一的出路。从7月29日到8月5日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是整个战争的特点。直接配置在边境上的法军，没有向主力前面的适当距离上派出前进部队，而弥补这个缺陷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向敌国领土派出前进部队；或者把他们留在当时所占有的边境的阵地上，而把主力进一步集中起来，后撤一日行程。但是前一个办法一定会引起在完全不受法皇控制的条件下同敌军冲突，而后一个办法从政治上考虑是不可能采取的，因为不允许在第一次的会战以前就退却。这样一来，犹豫不决在继续，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就好像期待敌人也染上犹豫不决的病症，也按兵不动似的。但是敌

人行动起来了。敌人就在自己的部队全部到达前线的前一天，即 8 月 4 日，决定利用法军的错误部署。维桑堡会战使麦克马洪和法伊两个军的全部兵力更加远离法军阵地的中央，而 8 月 6 日，当德军已经完全准备就绪时，德军第三军团在维尔特击败了麦克马洪的 6 个师，迫使他们和德·法伊剩下的 2 个师经过萨韦尔恩退向吕内维尔。在这时候，德军第一和第二军团的先头部队在施皮歇恩击败了佛罗萨尔的部队和巴赞部队的一部，迫使法军的整个中央和左翼退到麦茨。这样，在法军两支退却部队之间便横隔着整个洛林；而德军骑兵，随后是步兵则在这个宽阔的通道上疾进，以便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曾有人责备王储没有追击麦克马洪的败军直到萨韦尔恩以至更远的地方。但是在维尔特会战以后，追击是进行得完全正确的。当败军向南被驱逐到相当远的地方，以致只有绕道才能同其余法军会合的时候，追击的德军便一直插在这两支法军之间，直奔南锡。现在从结果看来，这种追击方法（即拿破仑在耶拿会战 36 后所采取的方法）至少和紧跟在逃命的敌人之后进行追击的方法同样有效。这 8 个师的残部，或者是已同主力失去联系，或者是在同主力会合时已经溃不成军。

关于战争开始时犹豫不决所造成的后果就谈这些。当然可以期待不重犯这种错误。法皇把总指挥权交给了巴赞元帅，而巴赞元帅无论如何应当知道，不论他是否采取行动，敌人都是不会白白浪费时间的。

从福尔巴赫到麦茨的距离略少于 50 英里。而大多数军离麦茨不到 30 英里。3 天之内他们就能全部顺利到达麦茨的掩护范围内，第四天就能开始向凡尔登和夏龙退却，因为对于这一退却的必要性再不能有所怀疑了。麦克马洪元帅的 8 个师和杜埃将军剩

下的2个师（占法军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看来不可能在比夏龙更近的另一个地点同巴赞会合。巴赞有12个师，包括皇家近卫军在内；因此，即使在康罗贝尔的3个师同他会合之后，他的兵力包括骑兵和炮兵在内也不可能超过18万人，这样的兵力是根本不足以在战场上同敌人抗衡的。因此，如果 he 不想把整个法国奉献给入侵者，如果他不想使自己困在一个饥饿很快会迫使他投降或者迫使他在听任敌人摆布的条件下作战的地方，那末 he 对于立即从麦茨退却的必要性看来就不能有丝毫的怀疑。然而 he 仍在原地未动。8月11日，德军骑兵已进到吕内维尔，而他仍然没有任何移动的征候。12日，德军骑兵渡过了摩塞尔河，在南锡强征物资，破坏麦茨和弗鲁阿尔之间的铁路，并且到达了蓬塔木松。8月13日，德军步兵进占蓬塔木松，从这时起德军就控制了摩塞尔河两岸。星期日，即8月14日，巴赞终于开始让他的军队渡到该河的左岸。在庞日发生了一次战斗，结果退却无疑地又被耽搁了。可以认为，向夏龙的退却实际上是从星期一重辎重队和炮兵出发时开始的。但是就在同一天，德军骑兵到达了麦士河彼岸的科梅尔西和距法军退却线不过10英里的维涅耳。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出有多少法军在星期一和星期二清晨开出，但是无疑地，当德军第三军和预备队骑兵在星期二（即8月16日）上午9时左右在马尔斯—拉—土尔附近向行进中的法军纵队发起攻击时，法军的主力还在后面。结果是大家知道的：巴赞的退却完全受阻；他自己在17日发出的电报表明，他所做到的最多不过是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他这时唯一的希望却是离开这些阵地。

星期三，即8月17日，看来双方军队都处于暂息中；但到了星期四，巴赞对顺利退却所能抱的一切希望，最后都破灭了。那

天早晨，普军向他发起攻击，经过 9 小时的战斗以后，

“法军被彻底击败，他们同巴黎的交通线被截断，并被逐回麦茨”³⁷。

在当日傍晚或者在第二日，莱茵军团必定回到那个在本星期初离开的要塞。由于法军被困在那里，德军很容易切断他们的一切供应线，加之这个地方由于长期驻军早已被搜刮一空，而一切还能够收集到的东西无疑也是包围的军队自己所需要的。因此，饥饿一定会很快迫使巴赞出动；只不过还很难说向什么方向。向西面运动，一定会受到占压倒优势的敌军的阻挡；向北面运动则过于危险；向东南运动可能有部分的成功，但不会产生任何直接的结果。即使他能够率领溃军到达伯尔福或伯桑松，他对于战争的命运也不可能发生什么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战争第二阶段的犹豫不决给法军造成的处境。无疑，巴黎的政府对于这一切都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把流动自卫军从夏龙召回巴黎就证明了这一点。从巴赞的主力被截断时起，本来只不过是军队集合地点的夏龙的阵地，便失去了一切意义。现在，一切兵力最近的集合地点是巴黎，从今以后所有军队都应当开往巴黎。但是，没有任何兵力能够在战场上同现在可能正向法国首都挺进的德军第三军团抗衡。法国人很快就会体验到，巴黎防御工事的作用是否和它的修建费用相称。

虽然这种最后的惨败好几天来就在逼近，但是还很难想像，它实际上已经到来。现实出乎一切意料之外。两个星期以前英国人还在设想，法军赢得第一次大会战将会发生什么后果。他们最担心的威胁就是拿破仑第三可能利用最初的胜利来要挟迅速缔结一个牺牲比利时的和约。但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快就放心了。维尔特

和福尔巴赫两次会战表明，法军是不会得到任何戏剧性的胜利的。德国已无所惧于法国这样一个事实，看来预示着战争会迅速结束。人们曾认为，很快就会有这样的时刻，即法国人承认反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企图已经失败，因此他们就用不着再进行战争了；而德国人在得到了他们所迫切要求的承认以后，也不见得会继续这场危险而又没有把握的战争。但在本星期的前5天里，情况又起了根本的变化。法国的军事力量看来已被全部摧毁，现在德国人的野心除非遇到那种很值得怀疑的障碍——德国人的自制力，似乎再也受不到别的限制了。我们暂时还不能判断这次惨败在政治上会造成什么后果。我们只能惊叹这次惨败的规模和突然，赞叹法军忍受这次惨败的能力。他们经过一连4天几乎毫不间断的战斗之后，第五天还能够在人们所能想像的最不利的条件下抵抗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的敌军的进攻达9小时之久，这个事实给他们的英勇和坚定的精神带来了无上的荣誉。法军甚至在战绩最辉煌的战争中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比这次从麦茨的悲惨的退却中所得到的更加当之无愧的光荣。

载于1870年8月20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22号

战争短评(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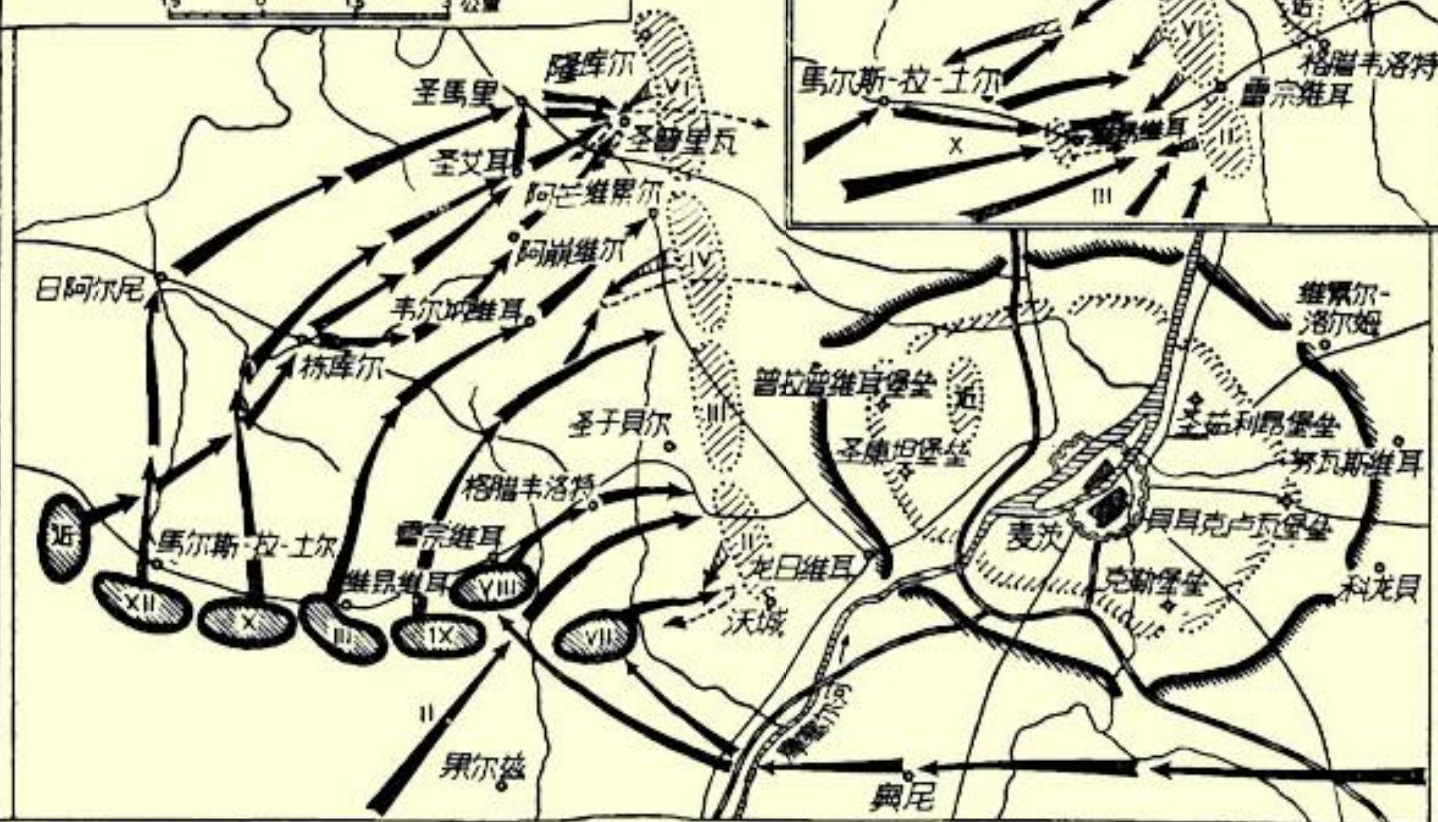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上星期在麦茨周围进行的三次激战的全部详情，但是我们得到了足够的消息，现在可以对实际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8月14日（星期日）的会战，是德军为了阻滞法军向凡尔登退却而发起的。德军发现，佛罗萨尔军残部于星期日午后在龙日维耳方向渡过摩塞尔河；驻在麦茨东面的部队也有移动的征候。第一军（东普鲁士军）和第七军（威斯特伐里亚和汉诺威军）奉命进攻。他们追击法军，直到他们自己进入堡垒的火力范围内为止；但是法军预料到这一行动，事先在摩塞尔河谷和一个狭谷（有一条小河由东向西穿过狭谷，在麦茨北面流入摩塞尔河）的掩蔽阵地上集中了大量兵力。这支兵力突然袭击已经遭到堡垒火力杀伤的德军的右翼，并且据说曾迫使德军狼狈后退。此后法军大概又退回去了，因为大家确知，德军控制着堡垒火力范围以外的战场，而且仅在拂晓以后才返回原来的露营地。这些情况我们是从一些参战人员的私人信件中和“曼彻斯特卫报”³⁸星期一刊载的一位记者的麦茨通讯中得悉的。这位记者在上星期一早晨曾到过战场，看到战场由普军占领，他们正在救护还遗留在那里的法军伤员。双方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认为他们达到了这次会战的预定目的：法军把德军引入陷阱并使他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德军则阻滞了

格腊韦洛特-圣普里瓦会战(1870年8月18日)
和麦茨的包围

0 1 2 3 公里

马尔斯-拉-土尔会战
(1870年8月16日)



普 军

法 军

麦茨的包围



部署和行动

I, II, V, VIII, IX, X, XII

近

近卫军



部署和行动

I, II, IV, VI

近

近卫军

普军

法军

战争短评（十一）

法军的退却，直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法军退却必经的路线为止。德军方面参加会战的有2个军，共4个师；法军方面则有德坎军、拉德米罗军和部分近卫军，即在7个师以上。可见，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同时据说，法军阵地由于构筑散兵坑和战壕而大大巩固了，他们从这些工事中比平常更镇静地进行了射击。

到8月16日(星期二)，莱茵军团向凡尔登的退却总的来说还没有开始。这时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先头部队，即第三军(勃兰登堡军)，恰好到达了马尔斯—拉—土尔的郊区。他们立即向法军攻击，牵制法军达6小时之久。后来他们因有第十军(汉诺威和威斯特伐利亚军)全部以及第八军(莱茵军)、第九军(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和梅克伦堡军)各一部来加强，不但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还击退了敌人，缴获2面鹰徽旗、7门火炮，并俘掳2000多人。同他们作战的法军是德坎军、拉德米罗军、弗罗萨尔军，并且至少还有康罗贝尔军的一部(康罗贝尔军是最近几天当经过弗鲁阿尔的铁路还通车的时候从夏龙来到麦茨的)和近卫军，总数为14—15个师。因此，即使参加这次会战的不是巴赞的全部军队(这是很可能的)，法军仍然再一次以数量上占优势的兵力对抗德军的8个师。这是应当注意的，因为法军的公报仍在继续用敌人在数量上经常占优势这个理由来解释一切失败。法军自己谈到，17日格腊韦洛特附近的后卫战是在他们16日所占领的阵地后面5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法军的退却确实被阻止了。但同时，德军在星期二只能用4个军进攻的这个事实证明，他们没有获得全胜。让罗上尉17日从布里埃到达孔弗朗，发现那里有法国近卫军的2个骑兵团，他们已经军心涣散，

一听到有人喊“普军来了！”就立即逃窜。这就证明，即使经过埃坦的一条道路在16日傍晚可能还没有被德军实际占领，但是他们已经非常接近，因此，不经过新的战斗，法军要沿这条道路退却是不可能的。但是，巴赞似乎已放弃了退却的一切念头，他在格腊韦洛特附近构筑了非常坚固的阵地，在那里等待德军攻击，这一攻击随后在18日发生了。

从马尔斯-拉-土尔经格腊韦洛特到麦茨的道路所通过的台地有许多深谷，它们是由许多从北向南流入摩塞尔河的溪流形成的。其中有一个深谷紧靠着格腊韦洛特（在它的西面），另外两个深谷平行地位于第一个深谷的后面。每个深谷都形成坚固的防御阵地，并且它们又都用土质工事以及在战术要地的庄园和村落内设置的街垒和射孔来加强了。在这个坚固的筑垒阵地上迎击敌人，予以重创，最后以强大的《retour offensif》（“反攻”）将敌人击退，从而打通去凡尔登的道路，——显然这就是巴赞的唯一希望。然而敌人进攻的兵力这样大，进攻得这样坚决，以致阵地被逐一攻占，莱茵军团被驱逐到麦茨火炮的掩护之下。同法军14—15个师实际作战的德军有12个师，另有4个师作为预备队。双方参加会战的人数几乎相等，总的来说德军略占优势，因为他们的6个军中有4个军几乎是完整无损的；但是这个数量上的微弱优势无论如何不能抵销法军阵地的威力。

法国舆论仍然不敢承认，巴赞和他的军队实际上陷入的境地，与波拿巴将军1796年在曼都亚给武尔姆泽尔造成的境地以及1805年在乌尔姆给马克造成的境地非常相似³⁹。声名赫赫的莱茵军团——法国的希望和力量——在两个星期的作战以后竟不得不选择：或者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冲出敌阵，或者投降；这是法国

人所无法置信的。他们寻求各种解释。有些人说，巴赞似乎是为了使麦克马洪和巴黎赢得时间而牺牲自己的。只要他在麦茨拖住德军 3 个军团中的 2 个军团，巴黎就能组织自己的防御，而麦克马洪就会有时间去建立新的军团。所以，巴赞继续留在麦茨并不是因为他别无出路，而是因为法国的利益要求这样。但是，试问组成麦克马洪的新军团的部队在哪里呢？他自己的军，现在最多有 15000 人；德·法伊的残部（他们经过长时间的绕道退却已溃乱不堪，据说当他到达维特里—勒—弗朗斯瓦时只剩下 7000—8000 人）；还可能有康罗贝尔军的 1 个师；费里克斯·杜埃军的 2 个师（大概谁也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合计约 4 万人，包括曾被编入拟议中的波罗的海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在内。这个数目包括了麦茨以外的法国原有军队所留下的全部步兵营和骑兵连。此外还可能有一些第四营。现在到达巴黎的第四营看来数量很多，但很大一部分是由新兵补充的。这些部队的总数大约可达 13—15 万人；但就质量来说，这个新军团不能同原来的莱茵军团相比。编入这个新军团中的原有各团必然是士气极度低落的。新的各营仓卒组成，其中有很多新兵，而且不可能有像原来的军团那样好的军官。骑兵和炮兵的比重看来不大；骑兵大部分在麦茨，而装备新的炮兵连所需的储备物资如挽具等等，在许多场合看来只见于纸上。在星期日的“时报”上，让罗就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至于流动自卫军，在他们从夏龙调回巴黎附近的圣摩尔以后，由于给养不足似乎已完全瓦解了。要争取时间建立这样的军队，法国必得牺牲最精锐的整个军团。如果这个军团确实被困在麦茨的话，那末它就真的被牺牲了。如果巴赞是故意使他的军队陷入目前的境地，那末他所犯的错误之大，使这次战争中曾经犯过的一切错

误都显得微不足道。至于昨天“旗帜报”40散布的巴赞已从麦茨撤退并在蒙梅迪同麦克马洪会师的消息，该报今天早晨发表的一篇军事评论的作者已给以充分有力的驳斥。即使巴赞的某些部队在不久前的马尔斯-拉-土尔附近的战斗以后或在战斗过程中得以逃向北方，但是他的主力仍然被围困在麦茨。

载于1870年8月24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25号

战争短评(十二)

战争中最近的两个事件是：王储正向夏龙以西挺进，而麦克马洪把他的全部军队撤离兰斯，但撤到哪里，就不确切知道了。据法方报道，麦克马洪认为，战争进展太慢；为了迅速结束战争，据说他离开兰斯去援救巴赞了。这的确会加快几乎是最后的危机的到来。

在我们于星期三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曾估计麦克马洪的兵力为 13—15 万人，并且假定从巴黎来的所有部队都已并入他的军队^①。我们曾假定，在夏龙，麦克马洪有他自己的和德·法伊的残部，还有杜埃的 2 个师（现在得知他们是乘火车绕道巴黎到达那里的）以及波罗的海远征军的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这是对的。不过我们现在得知：在巴黎周围的堡垒中仍然有基干部队；麦克马洪和弗罗萨尔的一部分军队，特别是骑兵，已返回巴黎进行整编；这样，留在麦克马洪兵营中的正规部队只有 8 万人左右。因此我们可以从估计的数字中减去整整 25000 人，而确定麦克马洪军队的人数最多为 11—12 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未经训练的新兵。而据说他就是带着这一支军队前往麦茨去援救巴赞的。

目前麦克马洪当面最接近的敌人是王储军团。这个军团的先

^① 见本卷第 71 页。——编者注

头部队于 8 月 24 日占领了原来的夏龙兵营，这是我们根据巴尔勒杜克来的电讯得知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这个城市里当时曾驻有司令部。麦克马洪去麦茨最近的道路是经过凡尔登。从兰斯到凡尔登沿几乎是笔直的乡村土路，整整有 70 英里，沿大路经过圣梅努，则在 80 英里以上，而且要通过夏龙兵营，也就是说要通过德军占领的地区。从巴尔勒杜克到凡尔登不到 40 英里。

因此，如果麦克马洪选择上述通往凡尔登的道路中的一条，那末王储军团就不但可以乘他行军的时候向翼侧攻击，并且可以在麦克马洪还没有从凡尔登到达麦士河右岸以前早就渡过麦士河，而与凡尔登和麦茨之间的德军其余两个军团会合。即使王储已经前进到维特里—勒—弗朗斯瓦，或者即使他需要多花一天的时间来集中在行军时沿正面展开来的军队，情况也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因为双方路程相差很远，而王储的路程要近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怀疑，麦克马洪会选用上述道路中的一条，而不立即摆脱王储军团的直接行动范围，从兰斯取道武济埃、格朗普雷和发棱到达凡尔登，或者经武济埃到斯特内，在那里渡过麦士河，然后向东南前往麦茨。不过，这只给他一个暂时的便利，却使最后的失败更加确定无疑了。这两条路线都绕得更远，因此使王储有更多的时间让他的部队同麦茨附近的军队会合，以使用压倒优势的兵力对付麦克马洪和巴赞。

这样，不论麦克马洪选择哪条路线去麦茨，他都不能摆脱王储，而王储还可以选择单独作战或者与德军其他军团共同作战。由此可见，在麦克马洪没有完全摆脱王储以前，他去援救巴赞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对他来说，最短、最快而且最可靠的去麦茨的路线是直接穿过德军的第三军团。如果他直接向第三军团前进，一

遭遇上就攻击它，打败它并向东南方向追击它几天，使自己的军队乘胜插入第三军团和德军其他2个军团之间（就像王储曾经做给他看的那样），那时，而不是更早，他才有可能到达麦茨解救巴赞。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如果他感到自己对这种行动力能胜任，他是会立刻这样做的。因此，撤离兰斯是另一回事。这与其说是企图使巴赞摆脱斯坦美兹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不如说是麦克马洪企图摆脱王储。而从这点来看，这样做是再坏不过的了。所有直通巴黎的交通线都放弃给敌人；法国最后可用的军队从中心被引到外缘，并被故意地配置在离中心比敌人目前离中心还要远的地方。如果在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情况下采取这个行动，也许是有道理的；但现在是在兵力比敌人弱得无可补救、差不多必败无疑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这个失败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不论这个失败是在哪里发生的，它都会使战败的军队的残部更加远离巴黎而接近北部边境，在那里他们可能被赶到中立国领土去，或者被迫投降。如果麦克马洪真的采取了上述运动，那末他就是蓄意使自己的军队所处的境地同拿破仑在1806年以绕过绍林吉亚山南端的侧敌行军使耶拿的普军所处的境地完全一样。当时兵力较弱、士气较差的普军被故意置于这样的境地，即失败后唯一的退路是通向中立国领土或大海的狭窄地带。拿破仑由于先于普军到达施特廷而迫使他们投降了⁴¹。麦克马洪的军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沙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降⁴²。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可向北部的要塞——瓦朗西恩、利尔等——退却而得救，但到了那里以后，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将成为威胁。那时法国便只有听任入侵者宰割了。

全部计划看来是这样轻率，以致只能解释为出自政治上的需

要。这最像一种 *coup de désespoir* (绝望的行为)。造成的印象是：在让巴黎能够完全了解局势的真相以前，必须冒一下险，做出点什么。这不是战略家的计划，而是习惯于同非正规部队作战的“阿尔及利亚人”⁴³的计划，这不是军人的计划，而是最近 19 年来在法国为所欲为的那些政治和军事冒险家的计划。这完全符合麦克马洪为了替这一决定辩解而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他不去援救巴赞，“人们会说什么呢”？是的，但是如果他使自己陷入比巴赞更坏的境地，“人们会说什么呢”？这就是第二帝国的全部丑态。装作平安无事，掩饰失败，这是最主要的。拿破仑孤注一掷，终于失败了。而现在麦克马洪只有十分之一的取胜的希望，但他又打算押上 *va banque* (全部赌注)。法国愈快地摆脱这些人愈好。它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此。

载于 1870 年 8 月 26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27 号

战争短评(十三)⁴⁴

昨天，电报传来了一个轰动我们报界同人的消息。这个来自柏林的消息说，国王大本营已转移到巴尔勒杜克，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各军仍留在原地对付巴赞军团，而其余德军则“已坚决地向巴黎挺进”。

德军在移动时从来都是保守秘密的。只有在完成移动和实行突击以后，我们才知道军队的去向。但是很奇怪，这回却突然一反常规，素来守口如瓶的毛奇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便忽然向全世界宣称，他正向巴黎挺进，而且是“坚决地”挺进。

就在这时候我们还听说，王储的先头部队正日益接近巴黎，而他的骑兵也正在日益向南挺进。据说，甚至在梯叶里堡，即差不多是在夏龙到巴黎的中途，也见到可怕的枪骑兵了。

这条关于普鲁士国王的意图的消息恰恰要在现在来公布，而德军骑兵也就在这个时候加倍积极地行动起来，这里有没有一眼看不透的特殊的原因呢？

让我们来对一下日期吧。在星期一(22日)傍晚，麦克马洪开始经过兰斯沿去勒太耳的大道运动，他的纵队接连不断地通过兰斯城达14小时以上。至迟在星期三傍晚关于这一移动的消息可以传到德军大本营。这个运动只能表明一点，即他企图把巴赞从陷阱中解救出来。麦克马洪在他所选定的方向上前进得愈远，他同巴黎

的交通线以及他的退路受到的威胁就愈大，他就愈加陷于德军和比利时边境之间。只要他渡过麦士河（据说他打算在斯特内对面的拉涅维耳强渡麦士河），他的退路就很容易被切断。但是还有什么比所谓当他赶去援救巴赞的时候，德军在麦茨只留下了较少的兵力而以大部分兵力“坚决地”向巴黎挺进的这个消息，更能促使麦克马洪坚持这个危险的行动呢？于是，星期三晚间上述消息便由电报从蓬塔木松传到柏林，从柏林传到伦敦，再从伦敦传到巴黎和兰斯，从那里麦克马洪无疑立刻得到了这个消息，而当他向斯特内、隆吉翁和布里埃方向前进时，王储军团留下一两个军在现在已无任何军队同他们对抗的香槟省，便可以把其余部队调向圣米耶耳，在那里渡过麦士河，经过弗伦进到一个威胁着麦克马洪军团同麦士河的交通线、但同麦茨的德军保持着可以支援的距离的阵地。如果这个成功了，而且麦克马洪在这种情况下被击败了的话，那末他的军队就不得不进入中立国领土或者向德军投降。

德军大本营很清楚地知道麦克马洪的移动，这是没有疑问的。自从巴赞由于雷宗维耳会战（官方称为格腊韦洛特会战）而被困于麦茨以后，麦克马洪军团就不但成了王储军团的当前目标，而且成了可以从麦茨城下抽出的其他一切部队的当前目标。诚然，1814年布吕歇尔和施瓦尔岑堡在奥布河岸阿尔西和夏龙之间会合后，同盟国军根本不顾拿破仑向莱茵河的进军而直捣巴黎⁴⁵，并因此决定了战局。但是当时拿破仑已在阿尔西附近被击败，并且无力抵抗同盟国军；当时法国没有一支他可以解救的、被同盟国军围困在边境的要塞里的军队，而且，主要的是巴黎没有构筑工事。现在则相反，不论麦克马洪军团在数量上和士气上所具有的军事价值如何，如果包围麦茨的德军兵力只足以扼阻巴赞的话，麦克马洪军

团无疑是完全足以解除麦茨的包围的。另一方面,无论怎样估计巴黎的筑垒工事,谁也不会那样轻率地设想它们会像耶利哥的城墙一样只要进攻者的羊角声一响就塌陷下来。它们至少将迫使敌人或者进行长期的包围用饥饿来击破防御者,或者开始(也许还不止开始)正规围攻。因此,当德军“坚决地”进到巴黎城下而被它的堡垒牢牢地阻挡住时,麦克马洪便可击败麦茨城下的德军而同巴赞会合,那时,法国在德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上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足以迫使德军比进攻时更加“坚决地”退却。

因此,如果麦克马洪军团过于强大,以致德军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忽视它,那末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大部分报界同人认为极端重要的那个关于威廉国王坚决向巴黎挺进的消息,是伪造的,是为了迷惑敌人而故意散布的,如果确实是不慎泄露出来的真实情报,那也是在尚未获悉麦克马洪最近的行动以前做出的决定,因此它很快就会撤销。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可能有一两个军继续向巴黎前进,但德国现有全部军队的主要部分将向东北挺进,以充分利用几乎是麦克马洪亲自送到他们手上的有利条件⁴⁶。

载于1870年8月27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28号

战争短评(十四)

德军的行动又比麦克马洪迅速。至少包括 2 个军（普鲁士近卫军和第十二军，即萨克森皇家军）——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的第四军团在萨克森王储阿尔伯特的指挥下很快前进到麦士河，夺取了斯特内和凡尔登之间的某地渡口，并使他们的骑兵渡过了河。阿尔良山的通道已被他们控制。上星期四^①，他们在圣梅努附近俘虏了流动自卫军 800 人，星期六又在比桑西附近击败了法军一个骑兵旅。上星期四他们在行进的途中向凡尔登派出了强有力的侦察队，但当他们查明这个要塞已经准备好迎战时，便放弃了以主力进攻这个要塞的意图。

在这个期间，麦克马洪带着一支据法方报道有 15 万人的装备精良、火炮弹药和粮食充足的军队，在 22 日和 23 日离开兰斯后，到 25 日傍晚还没有通过离兰斯约 23 英里的勒太耳。他在那里停留了多久以及什么时候离开，我们不确切知道。但是在比桑西（离勒太耳约 20 英里，位于通往斯特内的大道上）附近发生的小规模骑兵战斗表明，他的步兵甚至到星期六还没有到达那里。这样迟缓的运动同德军的敏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毫无疑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军团的编成造成的。这个军团是由在不同程

^① 8 月 25 日。——编者注

度上士气沮丧的部队以及新兵占多数的新编部队组成的；这些新编部队中有些简直是志愿部队，而志愿部队的许多军官都是非基干军官。显然，这样的军团不可能具有原“莱茵军团”的纪律和团结精神，而要使 12—15 万这样的兵士迅速而有秩序地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还有辎重队。莱茵军团重辎重队的大部分当然在 14 日和 15 日离开了麦茨，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像到，它们的状况并不美妙；而且可以料想，弹药储备和马匹状况也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最后，法军的军需工作自战争开始以来无疑地没有改进，因此在一个极其贫瘠的地区内保证一支大军的补给，不是容易的事。但是纵然充分考虑到了这一切障碍，仍不能不承认，麦克马洪的迟缓也明显地反映了他的犹豫不决。既然他已放弃经过凡尔登的直路，那末他去援救巴赞的最近的路线是经过斯特内，而他也正是向这个方向运动的。但是他从勒太耳出发以前一定已经得悉，德军已占领了麦士河上的渡口，因此在去斯特内的途中他的纵队的右侧是不安全的。看来，德军的迅速前进打乱了他的计划。我们获悉，星期五他仍然在勒太耳，在那里他得到了来自巴黎的生力军，而准备在第二天向梅济埃尔前进；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没有得到过关于大冲突的可靠消息。这意味着他几乎完全放弃了解救巴赞的计划，因为在梅济埃尔和斯特内之间沿麦士河右岸法国那片狭窄地带运动，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和危险，可能重新受阻，并使敌人有充裕的时间从四面包围他。而现在已经丝毫不用怀疑，为了这个目的，王储军团已向北面派遣了充足的兵力。我们听到的有关第三军团的行踪的全部消息都表明，它正沿最便于达到这一目的三条大道向北运动，即：埃佩尔讷—兰斯—勒太耳；夏龙—武济埃；巴尔勒杜克—发棱—格朗普雷。关

于圣梅努战斗的电讯是由巴尔勒杜克发出的，因此击败流动自卫军并占领该城的，可能正是第三军团的一部。

但是，如果麦克马洪确实向梅济埃尔前进，那末他的企图是什么呢？我们怀疑，他本人是否充分明了他想做的事。现在我们知道，他这次北进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兵士不服从引起的。他们不满意从夏龙兵营向兰斯“退却”，并且坚决地要求带领他们去迎击敌人。于是，解救巴赞的进军便开始了。到上周末，麦克马洪可能完全相信，他的军队不具备向斯特内直接进军所必需的运动力了，他现在最好是选择经过梅济埃尔的那条比较安全的道路。这无疑会耽搁预定的对巴赞的援救，并可能使这个援救无法实现。但是，麦克马洪什么时候曾经多少相信他能够实现它呢？我们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此外，向梅济埃尔前进，无论如何将会阻滞敌人向巴黎进军，使巴黎人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防御工事，并赢得时间以便在卢瓦尔河以南和在里昂建立预备部队；而在必要时，他难道不能沿北部边境退到三层要塞带，并在其间找到一个“四边形要塞区”吗？可能就是这样一些动摇不定的念头使麦克马洪（当然丝毫不像一个战略家）由于第一步走错而陷于困境之后又走错第二步。因此，我们看到：法国现在拥有的，也许是在这次战争中整个将来拥有的最后一支可用于野战的军队，正在自动走向灭亡，只有敌人最荒唐的错误才能使它免于这种灭亡；但是直到现在这个敌人还没有犯过一次错误。

我们说，这也许是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拥有的最后一支可用于野战的军队。如果麦克马洪不能救出巴赞，那末就无需对巴赞抱希望了，而麦克马洪是否能救出巴赞是十分可疑的。麦克马洪军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分散在北部边境的各要塞内，在那里他

们就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了。目前人们所谈论的预备部队，将由未经训练的新兵和一些老兵混合编成，而且必然是主要由非基干军官来指挥；这些部队的士兵将装备各式各样的武器；他们将完全不会使用后装枪，这就等于说，他们的弹药还没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就会消耗完了，总之，他们将不适于野战，不适于任何行动，而只能防守要塞。当德军不但已经把自己的步兵营和骑兵连重新补充齐全，而且继续把后备军一个师接着一个师地派往法国的时候，法军的各第四营却还没有编组完毕。在各第四营中只有 66 个营已经编成《régiments de marche》（“补充团”），并已派往巴黎或麦克马洪那里去了，其余 34 个营在几天以前还没有做好出发的准备。军队的组织到处都显得不适用了。一个高尚而勇敢的民族眼看着自己为了自卫而作的一切努力白费，这是因为 20 年来它听凭一群冒险家主宰它的命运，而这些冒险家已经把行政机关、政府、陆军、海军，实际上把整个法国都变成了他们牟取暴利的源泉。

载于 1870 年 8 月 31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31 号

战争短评(十五)

8月26日,当我们所有的报界同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大谈王储“坚决地”向巴黎进军的巨大意义而无暇顾及麦克马洪的时候,我们曾大胆指出,目前真正重要的行动是法国所报道的麦克马洪解救麦茨的行动。我们说过,一旦失败,“麦克马洪的军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法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降”^①。

我们那时所推测的现在差不多实现了。麦克马洪指挥的是:第一军(他自己的那个军)、第五军(以前由德·法伊,现在由文普芬指挥)、第七军(由杜埃指挥)、第十二军(由勒布伦指挥)以及在8月29日以前所能从巴黎派来的部队(其中甚至包括来自圣摩尔的那些不服从的流动自卫军);此外,还有原来留在夏龙的康罗贝尔军的骑兵。麦克马洪的全部兵力可能达15万人,其中老部队大概不到一半;其余的为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两者的数量大致相等。据说这个军团有不少炮兵,但大部分必定是新编成的炮兵连;同时还听说它的骑兵非常薄弱。即使这个军团的人数比我们估计的要多,但多出的人数也一定是新兵,并不会增强它的实力,因此如我们所预料的,它的实力未必抵得上一支10万人的优

^① 见本卷第75页。——编者注

良军队。

麦克马洪离开兰斯向勒太耳和麦士河进发是在 22 日傍晚,但第十三军直到 28 日和 29 日才从巴黎出发,由于经兰斯直达勒太耳的铁路这时已经受到敌人威胁,这支部队便不得不沿法国北部铁路经圣昆廷、阿温和伊尔松绕道前进。这支部队在 30 日或 31 日以前不可能到达,而这时激战已经开始,所以麦克马洪等待的这支部队终于没有在需要的时刻到达,因为当麦克马洪在勒太耳、梅济埃尔和斯特内之间浪费时间的时候,德军正从四面八方逼近。8 月 27 日,麦克马洪的一个先头骑兵旅在比桑西被击败。28 日,阿尔良山的一个重要道路交叉点武济埃落入德军手中;德军两个骑兵连攻击并夺取了符里济村;那里防守的是步兵,他们被迫投降,——顺便说一句,这种战功过去只有过一个例子,即 1831 年波兰骑兵攻占了俄国步兵和骑兵所防守的丹贝—韦耳克⁴⁷。关于 29 日的战斗,我们没有得到可靠方面的任何消息,但是在 30 日(星期二),德军集中了足够的兵力,攻击并挫败了麦克马洪。德方的消息说在博蒙附近发生过会战,并且在努瓦尔(在从斯特内到比桑西的道路上)附近发生过战斗⁴⁸;而比利时的消息却说在麦士河右岸,在穆宗和卡里尼扬之间有过军事行动。这两种说法很容易取得一致。如果比利时的电讯基本上是正确的,那末德军第四军团(第四军、第十二军和近卫军)所属第四军和第十二军看来曾经配置在摩塞尔河左岸,并同巴伐利亚第一军,即从南面开来的第三军团的第一部分在这里会合。他们在博蒙同当时显然是从梅济埃尔向斯特内方向运动的麦克马洪的主力遭遇,便向它发起了攻击,同时一部分兵力,可能是巴伐利亚部队,攻击了法军的右侧并包围了它,把法军从他们直接的退路赶到穆宗附近的麦士河边,在那里通过桥梁时

的困难和因此而造成的迟缓，使法军人员大量被俘，火炮和物资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就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德军第十二军的前卫（似乎派往另一方向）同法军第五军（由文普芬指挥）遭遇，后者很可能是经勒申—波浦勒、巴尔河谷和比桑西向德军翼侧运动的。战斗发生在博蒙以南约 7 英里的努瓦尔，结果德军获胜，也就是说在博蒙会战进行的时候，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文普芬的侧敌运动。据比利时消息，麦克马洪的第三部分兵力可能是沿麦士河右岸前进的，据说他们前一天夜间曾在卡里尼扬和穆宗之间的窝州宿营，但是这个军也遭到了德军（可能是近卫军）的攻击，完全被击败，据说还损失了 4 门多管炮。

这三次冲突 ensemble（合起来）（如果认为比利时的消息基本上正确的话）表明，麦克马洪完全失败了，这个失败是我们再三预言过的。同它对抗的德军有 4 个军，现在计算约有 10 万人，然而是否全都参加了战斗还值得怀疑。我们已经说过，麦克马洪的部队就其实力来说大致相当于同等数量的优良部队。他们的抵抗力根本不能与原莱茵军团相比；这可以从德国官方电讯“我方损失不大”这句话以及从法军被俘人数上看出来。虽然现在企图去批判麦克马洪在准备和进行这次会战时的战术部署还嫌太早，因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他的战略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批判。他错过了使他能够得救的一切机会。他在勒太耳和梅济埃尔之间占领的阵地，使他能够进行战斗以保证他向郎城和苏瓦松退却，并由此回到巴黎或者去法国西部。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却按另一种方式作战，好像他唯一的退路是梅济埃尔，好像比利时是属于他的。据说他现在正在色当；在这个时候胜利的德军定将占领这个要塞前面的以及梅济埃尔附近的麦士河左岸一线。

在最近的一天,他们的左翼将从梅济埃尔一直伸到罗克鲁阿附近的比利时边境,那时,麦克马洪就将被困在我们6天前便已指出的那个狭窄的地带了。

他既然到了那里,那就很少有选择出路的余地了。他周围有4个要塞,即色当、梅济埃尔、罗克鲁阿和沙尔蒙;但在这块12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前有占优势的敌军,后有中立国,他是不可能利用这个四边形要塞区的。他不是迫于饥饿而投降,便是被击溃而不得不向普军或比军投降。但是麦克马洪还有一条路可走。我们刚才说过,他行动的情况就好像比利时是属于他的。如果他真的这样想,那又将怎样呢?如果他那种莫名其妙的战略的奥妙全在于把比利时看做属于法国,而决计利用它的领土,那又将怎样呢?从沙尔蒙有一条直路经过比利时境内的菲利普维耳到达莫贝日附近的法国领土。这条道路的长度只有法国境内的梅济埃尔到莫贝日的距离的一半。如果麦克马洪企图在万不得已时利用这条道路逃命,那又将怎样呢?他可以认为,比军对他所率领的这样强大的军队是无力进行有效抵抗的;而如果在比军不能阻止麦克马洪的情况下,德军也尾随麦克马洪进入比利时国境(这是很可能的),那时就将发生新的政治纠纷,这可能改善法国目前的处境而不会使之恶化。此外,麦克马洪只要能够把一支德军巡逻队赶进比利时领土,那末破坏中立就成为事实,这就为他自己随后侵犯比利时主权提供了借口。这种念头可能在这个老阿尔及利亚人的脑子里出现过,因为这种思想符合于非洲的作战方法,而且看来也只有用这种思想才能解释他所采取的战略。但是,甚至他的这个机会也可能被剥夺。如果王储以他惯有的速度来行动,也许他就能够先于麦克马洪到达蒙特尔梅和塞木瓦河同麦士河的汇合点;那时,麦克马洪就要被困

于塞木瓦河和色当之间那块差不多只够作为他的军队安营的地方，而失去取捷径通过中立国的任何希望。

载于 1870 年 9 月 2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33 号

法军的失败

一支处于绝境的大军是不会立即投降的。首先需要三次会战，才使巴赞的军队懂得他们已经真正被困在麦茨；然后又需要本星期三和星期四一场昼夜不停历时 36 小时的苦战⁴⁹，才使他们相信（如果这能够使他们相信的话），他们已完全无法从普军设下的陷阱中逃脱。星期二的会战同样不足以迫使麦克马洪投降。还需要星期四的一场会战——看来是最大的流血最多的一场会战⁵⁰——和麦克马洪本人的受伤，才使他明了他的真正处境。关于博蒙和卡里尼扬附近会战的最初报道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一点不符事实，即在博蒙作战的法军各个军沿麦士河左岸向色当的退路并没有被完全截断。这些部队中的一部分大概沿左岸退向色当，——至少星期四在左岸又发生过战斗。其次，关于努瓦尔战斗的日期产生了一些怀疑，柏林参谋部有意把这次战斗说成是在星期一发生的。这个日期当然会使德军的几则电讯更好地吻合，而这个日期如果确实，那末关于法军第五军的迂回运动的说法就不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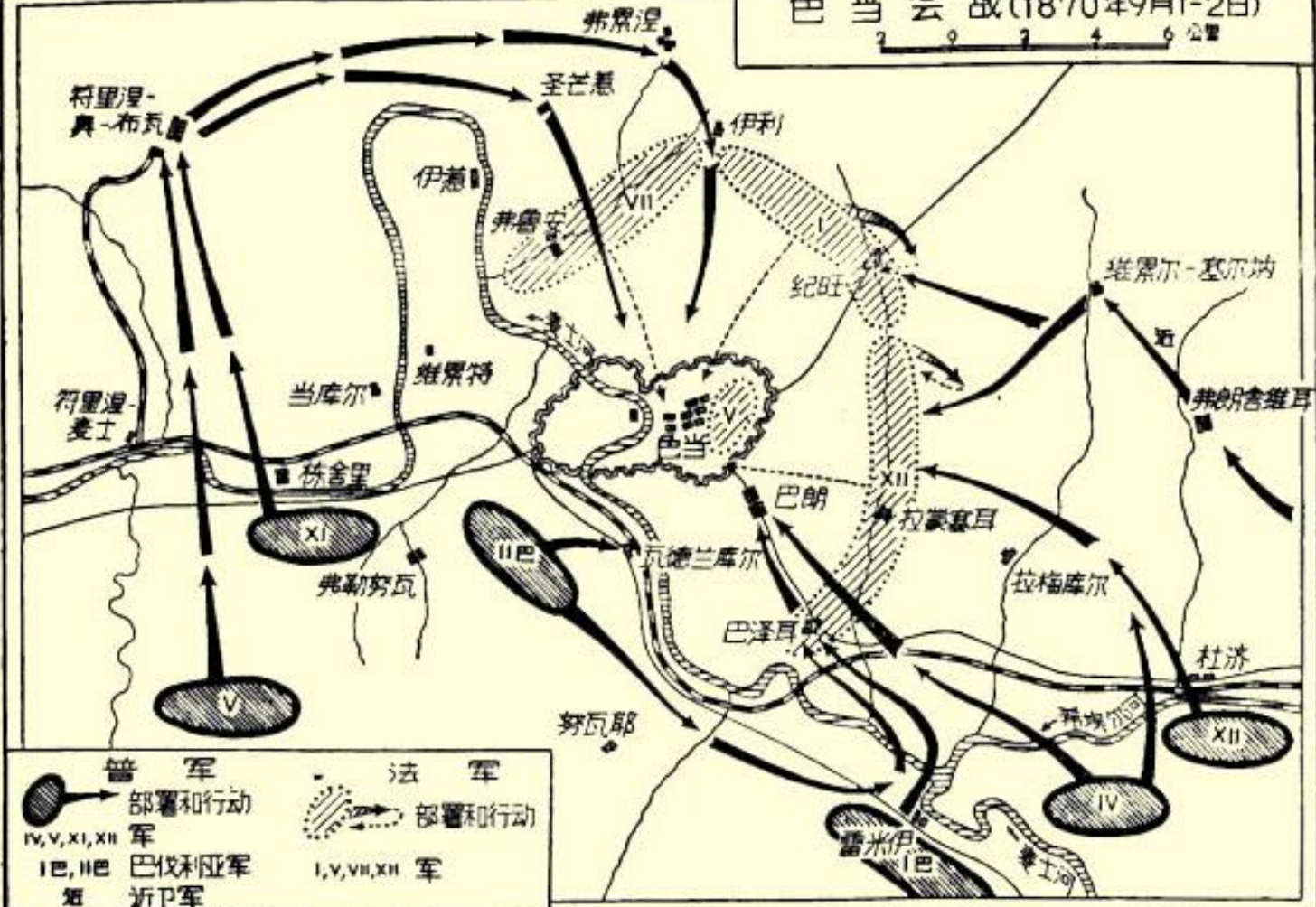
星期二作战的结果，对于参加作战的法军各个军来说是惨痛的。20 多门火炮、11 门多管炮、7000 多名俘虏，这几乎等于维尔特会战的结果，但是德军取得这个战果却容易得多，牺牲也少得多。麦士河两岸的法军都被驱逐到色当的近郊。这次会战以后，他们在左岸的阵地看来只限于以下地区：西至巴尔河和阿尔登运河，这两




条河经过同一个河谷在色当和梅济埃尔之间的维累尔附近流入麦士河；东至一个雏谷和一条从罗库尔流到雷米伊附近注入麦士河的溪流。这样，在两翼有了保证以后，法军主力大概占领了中间的台地，准备迎击来自任何方面的进攻。在麦士河右岸，法军在星期二会战以后大概渡过了希埃尔河，这条河在色当上方约 4 英里处雷米伊对面流入麦士河。在这块地方有三个平行的雏谷，从比利时边境向北和向南延伸。其中第一和第二个雏谷通到希埃尔河，第三个雏谷最大，在色当直前方通到麦士河。在第二个雏谷内，离它的起点不远处有塞尔讷村；在第三个雏谷的北端，在它同通往比利时的布荣的大路相交的地方是纪旺；往南，在这个雏谷同通往斯特内和蒙梅迪的道路相交的地方是巴泽耳村。在星期四的会战中，这三个雏谷一定成了法军依次防守的三道防线，他们对于最后的也是最坚固的一道防线当然防守得最为顽强。这一部分战场和格腊韦洛特附近的战场相似，但是那里的雏谷可以而且事实上已经被德军从它们起端的台地迂回过去，而这里紧靠比利时国境，要想迂回是很危险的，因此几乎只能直接从正面攻击。

当法军在这个阵地上进行巩固并调集没有参加星期二会战的部队（其中大概有第十二军，包括来自巴黎的流动自卫军在内）的时候，德军便有了一天的时间来集结军队；因此他们在星期四发起进攻时，在现地已经有了第四军团（近卫军、第四军和第十二军）的全部和第三军团的 3 个军（第五军、第十一军和 1 个巴伐利亚军），这些兵力在士气方面也许还在数量方面胜过麦克马洪的军队。会战从早上 7 时半开始，而且到下午 4 时 1 刻普鲁士国王发电报时还在继续进行；这时德军在各方面都在顺利进攻。根据比利时的消息，巴泽耳、雷米伊和维累尔—塞尔讷诸村已在燃烧中，而纪旺小

色当会战(1870年9月1-2日)

0 2 4 6 公里



	普军		法军
IV, V, XI, XII 军	部署和行动		部署和行动
I, II, III 巴伐利亚军	近卫军		
			I, V, VII, XII 军

色 当 会 战

礼拜堂已落入德军手中。这就表明,在麦士河左岸,法军在退却时两翼可以依托的两个村庄不是被占就是被毁得不能用来进行防御了;同时右岸的第一和第二道防线已被德军攻占,而巴泽耳和纪旺之间的第三道防线,法军也已准备随时放弃。在这种情况下,到天黑时德军无疑地一定取得了胜利,而法军则被击退到色当。这实际上已为比利时的电讯证实了,这些电讯称,麦克马洪已经完全被包围,几千名法军越过边境而被解除武装。

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马洪只有在二者中选择其一:或者投降,或者强行通过比利时领土。这支败军被困在色当及其周围地区,也就是被困在至多只够安营的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是不能坚守的;即使他们能够保持和梅济埃尔(位于色当以西约 10 英里)之间的联络,他们仍然是被困在一片非常狭窄的地带内而无法立足。因此,无力突破敌人重围的麦克马洪,必然或者通过比利时领土,或者投降。而结果是,麦克马洪因负伤体弱摆脱了定下这个痛苦的决心的责任。宣布法军投降的责任便落到文普芬将军的身上。如果巴赞企图从麦茨突围而遭到坚决回击的消息传到麦克马洪那里,那末这个消息必然会加速上述结局的到来。德军预见到了巴赞的意图,并且到处都做好了回击的准备。不仅斯坦美兹,而且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这可以从提到第一军和第九军这一点看出)也都在戒备中,同时周密构筑的堑壕网更加强了麦茨周围的拦障。

载于 1870 年 9 月 3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34 号

战争短评(十六)

色当的投降决定了法国最后一支野战军的命运。它同时也决定了麦茨和巴赞军团的命运，关于解救巴赞军团的问题现在已经谈不上了；这个军团同样将被迫投降，可能是在这个星期，而几乎肯定地不会迟于下个星期。

剩下的一个巨大的营垒——巴黎，是法国最后的希望。巴黎的筑垒工事は集古今筑垒工事之大成，然而这些工事还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因此关于它们的价值，意见不仅分歧，甚至彼此完全矛盾。考察一下与此有关的事实，我们就会有可靠的根据做出自己的结论。

蒙塔朗贝尔是法国骑兵军官，同时是一位具有卓越的也许是绝伦的天才的军事工程师。他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第一个建议实行并亲自制订了在要塞周围可使要塞免遭炮击的距离上建立独立堡垒的计划。在他以前，外国工事——卫城、眼镜堡等——或多或少都是和要塞围墙连在一起的，它们同要塞围墙的距离恐怕从来没有比斜堤脚同要塞围墙的距离更远。他提出在离要塞围墙600—1200码甚至更远的地方，建立一些足以独立抵御围攻的又大又坚固的堡垒。在法国，这个新理论许多年来都受到轻视，而在德国，由于1815年以后莱茵河线需要筑垒，它却获得了热心的拥护者。在科伦、科布伦茨、美因兹，后来又又在乌尔姆、拉施塔

特和盖尔曼尔斯海姆等城的周围，都建立了独立堡垒。这时，阿斯特等人对蒙塔朗贝尔的建议稍有修改，从而产生了以德国派著称的一种新的筑城体系。法国人逐渐地也开始认识到独立堡垒的好处，而在构筑巴黎的防御工事期间，他们立刻明白了：如果没有独立堡垒的掩护，在城市周围构筑很长的要塞围墙是无益的，因为在要塞围墙的某处打开缺口，就会使整个要塞陷落。

现代战争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这种以主堡为核心而在周围设有独立堡垒的营垒的重要意义。曼都亚就它的地位说来是一个营垒，1807年的但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这样的营垒，而且这是阻止过拿破仑第一的仅有的两个要塞。1813年，但泽依靠它的独立堡垒（大部分是野战工事）又有可能进行了长期的抵抗。⁵¹1849年拉德茨基在伦巴第的整个战局都有赖于维罗那营垒，而这个营垒本身就是著名的四边形要塞区⁵²的核心。同样，整个克里木战争也取决于塞瓦斯托波尔营垒的命运；而塞瓦斯托波尔所以能够坚持那么久，只是因为联军无法完全包围它，无法阻止被围者获得补给和援军。⁵³

塞瓦斯托波尔对于我们是最合适的例子，因为它的筑垒面积，比前几个营垒都要大。但是巴黎比塞瓦斯托波尔要大得多，环绕它的堡垒线长约24英里。而要塞的威力是否也会相应地增大呢？

筑垒工事本身是可以作为榜样的。它们非常简单：一道由棱堡组成的普通的要塞围墙，在中堤之前连一个三角堡也没有；堡垒大部分是带棱堡的四角或五角形堡垒，完全没有三角堡或其他外围工事；有些地方设有角堡或冠堡⁵⁴，以掩护外面的高地。这些工事与其说是为了消极防御，不如说是为了积极防御而设的。人们估计，巴黎的守备部队将走到平地上，利用堡垒作为两侧的支

撑点，经常进行大规模的出击，使敌人不可能对任何两三个堡垒进行正规的围攻。这样，堡垒就可以阻止敌人过于接近城市的守备部队，而守备部队也应当防止攻城炮队轰击堡垒；他们应当经常破坏围攻者的工程作业。此外，堡垒到要塞围墙的距离使得敌人至少在夺取两三个堡垒以前，是无法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炮击的。再补充一点：处于塞纳河和马尔纳河汇合处的这个城市的位置，这两条河的非常曲折的河道以及受威胁最大的东北方的群山，是极有利的自然条件，这些条件在设计要塞工事时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如果上面这些条件都能实现，而 200 万居民能够按时得到粮食供应的话，巴黎无疑将是一个非常坚固的要塞。供应居民的粮食的采购工作如果及时着手并且不断做下去，那末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很值得怀疑的是，这在目前是否已经做了。以前的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些仓忙决定的甚至是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例如，没有饲料而豢养备用的牲畜，显然是十分荒唐的。可以料想：如果德军将像通常那样坚决地行动，那末他们将会发现，巴黎没有足够的粮食以应付长期的围攻。

但是关于主要的条件，即关于积极防御（守备部队不是从要塞围墙后面杀伤敌人，而是走出要塞去攻击敌人）能够说些什么呢？要想充分发挥防御工事的威力，要想不让敌人利用要塞的弱点（即在主壕附近没有作掩护用的外围工事），在巴黎的保卫者中间就必须有一支正规部队。这就是这些筑垒工事的设计者的主导思想。他们认为，被击败的法军一发现他们无力在平地上阻止敌人，就应当退向巴黎，参加首都的保卫战；或者直接地参加，即组成足够强大的守备部队，不断攻击敌人，阻止敌人进行正规的

围攻以至全面的包围；或者间接地参加，即在卢瓦尔河以南占领阵地，充实兵力，然后一遇到有利时机便攻击围攻者的薄弱地点（在非常长的包围线上是一定会出现薄弱地点的）。

但是，法军统帅部在这次战争中的全部行为促使巴黎丧失了进行防御的唯一最重要的条件。全部法军只剩下了留在巴黎的部队和维努亚将军的一个军（即第十三军，原来由特罗胥指挥），共约5万人；这些部队大部分，甚至全部是由第四营和流动自卫军组成的。此外也许还可以加上2—3万人的第四营和外地来的数量不确定的流动自卫军，即没有受过训练的，根本不适于野战的新兵。在色当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过，在战斗中这种部队的用处是多么小。无疑地，当后有堡垒可以退守的时候，他们将会比较可靠，而几个星期的教育、训练和战斗，当然也会提高他们的战斗素质。但是像巴黎这样大的要塞的积极防御，则要求大量的兵力在平地上进行机动，要求在担任掩护的堡垒前相当的距离上进行正规战，要求作突破包围线或阻止敌人完成包围的尝试。而要攻击比较强大的敌人，就需要突然和勇猛，因此部队应当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教育，目前巴黎的守备部队未必是适用的。

我们估计，联合起来的德军第三、第四两个军团的18万人，将在下星期内出现在巴黎附近，用骑兵机动部队包围巴黎，破坏铁路，从而消除大量补给的一切可能，并准备进行正规包围，这一包围将在第一、第二军团攻陷麦茨后到达这里时完成。此后，德军还会有足够的兵力，可以派往卢瓦尔河以南去肃清这个地区，并粉碎编成新的法军的一切企图。如果巴黎不投降，正规围攻就将开始，而在法军没有进行积极防御的条件下，围攻的进展是会快一些的。如果只从军事方面考虑，那末事态的正常发展过程就是

这样；但是现在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军事方面的考虑可能被政治事件压倒，而预言这种事件却不是本文的任务。

载于 1870 年 9 月 7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37 号

战争短评(十七)

当德军向巴黎挺进(他们到达那里以后战争的新阶段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时间来回顾一下在野战部队后方各个要塞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除色当(它必然随着麦克马洪军团的投降而陷落了)外,德军还占领了4个要塞:拉-普提特-比埃尔、维特里(没有经过战斗)、利希滕堡和马尔萨耳(只经过短时间的炮击)。他们只封锁了比奇,现在正围攻斯特拉斯堡;他们炮击了法耳斯布尔、土尔和蒙梅迪,但暂时还没有结果;他们打算几天以后对土尔和麦茨开始正规围攻。

除了有离城很远的独立堡垒作掩护的麦茨以外,所有其他进行过抵抗的要塞,都遭到了炮击。这个措施常常是正规围攻战的组成部分。起初,炮击的主要目的是摧毁被围者的粮库和弹药库,但是自从人们通常都把这些东西藏进专门构筑的防弹地窖以后,炮击便愈来愈多地用于烧毁和破坏要塞内尽可能多的建筑物。毁坏要塞内居民的财物和粮食,已成为对居民施加压力并通过他们对守军及其司令官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如果守军薄弱,训练不良,士气涣散,而司令官又缺乏毅力时,常常只使用炮击便能迫使要塞投降。1815年滑铁卢会战55以后,情况尤其是这样,那时主要由国民自卫军防守的许多要塞,不待敌人开始正规围攻而仅仅在遭

到短时间的炮击以后便投降了。阿温、吉兹、莫贝日、兰德列西、马里昂堡、菲利普维耳等地，都是经过几小时、最多几天的炮击就陷落了。无疑地，正是这些令人难忘的胜利，以及关于大多数边境要塞的守备部队主要是由流动自卫军和地方国民自卫军组成的这个消息，使得德军再度试验这个方法。此外，自从使用线膛炮以来，甚至野炮的炮弹也几乎完全是榴弹，所以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用任何一个军的普通野炮去轰击要塞和烧毁它的建筑物，而不必像从前那样等待臼炮和重型攻城榴弹炮的到来。

虽然在现代战争中炮击要塞内的民房的做法得到了承认，但终究不应当忘记，这种方法总是非常残酷的，并且至少在没有足够的把握使要塞投降和没有一定的必要时，这种方法是不应当采取的。如果说对法耳斯布尔、利希滕堡和土尔这样的要塞进行炮击，那末可以用以下的理由来解释，即这些要塞控制着一些山道和铁路，而直接掌握这些山道和铁路对入侵者特别重要，况且又有根据指望经过几天的炮击便可达到这个目的。既然其中两个要塞至今一直被守住，这就给守军和居民增添了更大的光荣。至于对斯特拉斯堡进行正规围攻前对它炮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斯特拉斯堡是一个有 8 万多人口的城市，周围环绕着十六世纪的旧式筑垒工事。沃邦在城外靠近莱茵河的一面建筑了一座卫城，并用连续的工事线把它和城市的要塞围墙连结起来（这在当时称为营垒），从而加固了这些工事。因为卫城瞰制城市，就是在城市投降之后也能独立地进行防御，所以夺取卫城和城市两者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一开始就去攻击卫城，以免需要先后进行两次围攻；但是卫城的防御工事这样坚固，它所处的莱茵河附近低洼沼泽地带的地位又给迅速进行掘壕作业造成这样多的困难，以致情况可能

和往常一样,要求先攻击城市;随着城市的陷落,在软弱无能的司令官看来,继续防守孤零零的卫城除了可以保证较好的投降条件以外,在很大程度上就已失去了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只攻占了城市,那末还要去夺取卫城,并且一个顽强的司令官是可以把城市和其中驻守的敌军置于自己的火力之下而继续抵抗的。

在这些情况下,炮击城市有什么益处呢?至多居民可以瓦解大部分守军的士气,并迫使司令官放弃城市,带领 3000—5000 名精兵退入卫城继续防守,并用炮火控制城市。乌里克(这个勇敢的老军人的姓就是这样的,根本不是乌尔利希)将军的性格大家是很熟悉的,所以谁也不会怀疑,不论发射多少炮弹都不能吓倒他,都不能使他献出城市和卫城。炮击一个有独立的居高临下的卫城的城市,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徒劳无益的暴行。当然,在围攻时流弹和偶然的炮击常常使被围攻的城市受到损失,但是同这个不幸城市的居民在城市遭到 6 天正规的不断的炮击期间所受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比起来,是算不了什么的。

德军说,他们必须快一些占领这个城市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他们想在缔结和约后保有这个城市。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这次残酷无比的炮击就不但是罪恶,而且是极大的错误。用爆炸弹烧杀大量居民来换取必定被兼并的城市的居民的同情,这真是一种绝妙的方法!炮击是否使城市甚至是早一天投降了呢?看不出这一点。如果德军想要兼并这个城市,并根除居民对于法军的同情,他们就应当用尽量短期的正规围攻夺取城市,然后围攻卫城并迫使守军司令官作出抉择:或者放弃他所拥有的某些防御手段,或者使城市遭受炮轰。

实际上,对斯特拉斯堡发射的大量炮弹并没有使正规围攻成

为不必要。8月29日,德军不得不在要塞西北方希耳提甘附近距防御工事500—650码处挖掘第一道平行壕。9月3日,在距工事330码处挖掘了第二道平行壕(有些记者误称为第三道平行壕);漫无目的的炮击奉普鲁士国王的命令已经暂时停止;可能要到17日或20日才能在要塞围墙上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但是在目前任何预言都是冒险的。这是第一个使用现代线膛炮发射装有着发信管的炮弹来对付石质工事的围攻战例。在破坏幽里希的防御工事的试验中,普军曾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在石墙上打开了缺口,而且从远距离上用间接射击(即炮兵连在看不到目标的情况下进行射击)摧毁了地堡;但这只是平时的试验,还应当在这次战争中加以证实。斯特拉斯堡将清楚地向我们说明,现代重型线膛炮在围攻战中应当如何行动,因此这个围攻在这方面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载于1870年9月9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39号

军队的盛衰

当路易一拿破仑依靠农民的选票和他们的子弟(兵士)的刺刀而建立“标志着和平”⁵⁶的帝国的时候,法国军队除了传统的地位以外,在欧洲并不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从1815年起,和平降临了,这个和平对于某些国家的军队来说曾被1848年和1849年的事件破坏。奥军在意大利打了胜仗,而在匈牙利打了败仗;无论是俄国在匈牙利还是普鲁士在南德意志,都没有取得值得一提的胜利⁵⁷;俄国在高加索,法国在阿尔及尔都进行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但是从1815年以来,大国的军队一次也没有在战场上交过锋。路易一菲利浦留下来的法军远不是一支善战的军队;固然,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特别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非洲战争而建立的精锐部队(chasseurs-à-pied(猎步兵)、朱阿夫兵、土尔科兵、骑马的 chasseurs d'Afrique(非洲猎兵))很受重视,但是在法国,步兵的主要部分、骑兵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却完全被忽视了。共和国也没有改善军队的状况。然而出现了标志着和平的帝国,而《si vis pacem, para bellum》(“如果你希望和平,就要准备战争”),军队立刻就成了注意的中心。当时,法国有大量比较年轻的、曾经在非洲(当那里还进行着激烈战斗时)担任过要职的军官。法国阿尔及利亚特种部队无疑是欧洲最好的部队。这些部队由于拥有大量代役兵⁵⁸,也就有比大陆其他任何强国都多得多的、久经战斗的

职业兵,真正的老兵。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尽可能把大部分军队提高到特种部队的水平。这一点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以前只在这些特种部队中采用的《pas gymnastique》(英军的“跑步”)已经推广到全体步兵中,因此机动的速度达到了各国军队从未有过的水平。骑兵尽可能装备了良马;全军的武器装备也都经过了检验和补充。最后,克里木战争爆发了。法军的组织显得比英军优越得多;由于在联军中占的比重,大部分的光荣(不管是什么样的光荣)自然也属于法军;那次完全以围攻一个大要塞为中心的战争的特点,使法国人固有的数学天才通过他们的军事工程师充分地发挥出来了。结果,克里木战争再度使法国军队跃居欧洲首位。

接着,使用步枪和线膛炮的时代来到了。线膛枪火力较滑膛枪火力具有无可伦比的优点,因此人们不用滑膛枪了,在某些场合则把滑膛枪普遍改制成线膛枪。普鲁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把旧式枪改制成了步枪;英国逐渐给全体步兵装备了恩菲耳德式步枪,奥地利则给步兵装备了精良的小口径步枪(罗伦兹式)。只有法国还继续使用旧式滑膛枪,而步枪则仍然只供特种部队使用。它的大部分炮兵仍然使用十二磅短管炮(这是皇帝的得意杰作,但因装药量小,效果还不如旧式火炮),与此同时编成了一些四磅线膛炮连,以备一旦爆发战争时使用。这种炮的构造是不完善的,因为这是从十五世纪以来最早的一种线膛炮;但是它的效力仍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种滑膛野炮。

意大利战争⁵⁹爆发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奥地利军队行动松懈,很少能经得起特别的紧张;实际上他们除了人多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他们的指挥官里面有几位是当时最好的将军,但有很多是当时最坏的将军。这些最坏的将军大部分是仗着宫廷的势力爬上高

位的。奥地利将军的失策和法国兵士较强的虚荣心，使法军得到了勉强得来的胜利。在马振塔会战中，法军没有获得半点战利品；而在索尔费里诺会战中，也只获得很少的战利品；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在战争的真正困难——四边形要塞区的争夺战——还没有出现以前，战争就闭幕了。

这次战争以后，法国军队成了欧洲军队的榜样。如果说克里木战争后法军的 *chasseur-à-pied* (猎步兵) 成了《beau idéal》（“十分理想”）的步兵，那末现在整个法军都得到了这样的赞誉。人们在研究法军的各种组织；法军的兵营成了各国军官的学校。几乎全欧洲都坚信法军是不可战胜的。在这个期间法军把它所有的旧式滑膛枪都改成了线膛枪，同时给全部炮兵装备了线膛炮。

但是这次使法国军队跃居欧洲首位的战争，也激起了其他国家的努力，结果先出现了同它匹敌的人，后来就出现了超过它的人。普鲁士军队像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军队一样，在 1815 年到 1850 年期间由于无所作为而受到了腐蚀，但是和平时期的这种腐蚀对普鲁士的战争机器的损害比对任何国家都大。根据当时普鲁士的制度，每个旅有一个常备军的团和一个后备军的团；所以在动员时，有一半野战部队必须重新编组。常备军和后备军的武器装备都很缺乏；而负责官员还常常有些小的贪污行为。总之，当 1850 年同奥地利的冲突迫使普鲁士进行动员时，整个军事制度便显出完全无能为力，而普鲁士则不得不通过“卡夫丁峡谷”⁶⁰。普鲁士立刻不惜重资更换了全部武器装备，对军队的整个组织也重新作了审查，但是只涉及一些枝节问题。当 1859 年意大利战争引起一次新的动员时，武器装备已经改善了（虽然当时数量也还不足）；然而，在民族战争时也许士气高昂的后备军，曾在可能引起任何一个

交战国战争的军事示威中显得完全无法控制。于是普鲁士决定进行军队的改组。

这次背着议会进行的改组的结果,后备军的 32 个步兵团全部被留下来服现役,他们的队伍依靠多征新兵的办法逐渐得到补充,最后这些团被改编为常备军的团,使常备军的团由 40 个增加到 72 个。炮兵的数量有了相应的增加,骑兵也增加了,但增加的比例小得多。军队人数增加的比例大致相当于从 1815 年到 1860 年普鲁士人口增长(从 1050 万增加到了 1850 万人)的比例。尽管第二议院反对⁶¹,改组实际上仍然生效。此外,还从各方面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一支用步枪装备全体步兵的军队。以前只用来装备小部分步兵的后装针发枪,现在已用来装备全体步兵,而且还有了储备。进行了好几年的线膛炮的试验工作也已完成,新型火炮已逐渐代替了滑膛炮。由拘泥旧习的老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传下来的过多的阅兵操练,日益让位于一种较好的训练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训练执行警戒勤务和进行散兵战,而这两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部队为榜样的。对于独立行动的各营,连纵队成了基本的战斗队形。打靶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骑兵也大大改善了。养马业多年来很受重视,尤其是在以养马业发达著称的东普鲁士;普遍用阿拉伯种马进行了杂交,成绩现在已开始显示出来。东普鲁士马虽然不如英国骑兵的马高大和跑得快,但是作为战马却比英国马强得多,行军的耐力比英国马大 4 倍。长期被完全忽视的军官专业训练,也重新提到了所要求达到的很高的水平。总之,整个普鲁士军队起了根本的变化。丹麦战争⁶²就足以向每个能够理解的人说明,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人们没有注意这一点。1866 年的劈雷响了,不了解这一点已经再也

不可能了。随后，北德意志军队推行了普鲁士制度，南德意志各邦的军队也基本上推行了这种制度。结果证明，这种新制度实行起来是多么容易。于是，1870年到来了。

但是1870年的法军已不是1859年的法军了。盗用公款、营私舞弊和普遍的假公济私——形成第二帝国制度的主要基础的这一切也已侵蚀了军队。既然欧斯曼及其党羽从大规模的巴黎投机事业中获得了数百万暴利⁶³，既然整个公共工程部门、政府签订的每个合同以及政府中的每个职位都被公然无耻地当作搜刮民财的手段，那末作为路易—拿破仑一切方面的依仗的并且由那些同更幸运的寄食朝廷的文官一样贪财的人们指挥的这支军队，又怎能独善其身呢？既然人们知道，政府收了代役金而通常并不用去雇佣代役兵（这当然是部队中每个军官都知道的），既然陆军部为了筹集资金秘密供皇帝挥霍而开始用其他办法盗窃军用物资；既然军队中的要职因此必然被那些参与这个密谋，因而不论怎样胡作非为和玩忽职守也不致被撤换的人窃踞，那末，道德败坏的现象也就在部队的军官中间蔓延开来。我们不想肯定说，侵吞公款在他们中间已是普遍现象，但是藐视上级、玩忽职守和纪律松弛却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上级有威望的话，军官们难道还敢常常乘坐马车行军吗？整个制度都已腐朽透了；笼罩着第二帝国的贪污腐败的空气最后也侵袭到这个帝国的主要支柱——军队中来了。而在经受考验的时刻里，这支军队除了光荣的传统和兵士的天赋的勇敢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抵抗敌人，但是仅仅靠这一点是不足以保持欧洲第一流军队的地位的。

载于1870年9月10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40号

战争短评(十八)

关于目前在法国进行的围攻,看来仍然存在着很不正确的见解。我们的某些报界同人,如“泰晤士报”倾向于这种见解,即认为德军虽然长于野战,却不善于围攻;另一些人认为,围攻斯特拉斯堡与其说是为了夺取城市,不如说是为了进行试验,为了实际锻炼德军的工程师和炮兵专家。所以有这种种说法,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斯特拉斯堡、土尔、麦茨还是法耳斯布尔都还没有投降。显然这些人完全忘记了,在这次战争以前的最近一次围攻,即塞瓦斯托波尔尔围攻中,在挖好堑壕以后,还用了11个月的时间才迫使要塞投降。

为了纠正只有不懂军事的人们才会有的一种肤浅的见解,必须提醒他们,究竟什么是围攻。大部分要塞的围墙都筑有棱堡,也就是在围墙的每个拐角处都有叫做棱堡的五角形突出部,它以火力掩护工事前面的地区和直接位于这些工事脚下的护堡壕。在护堡壕内,每两个棱堡之间有一个独立的三角形工事,叫做三角堡,它掩护棱堡的一部分和掩护中堤(即棱堡之间的那一段围墙);三角堡的周围有护堡壕。在主壕的外侧有隐蔽路——受到斜堤顶(高约7英尺、外侧成缓坡的土堤)掩护的宽道。在许多场合,为了增加攻击的困难,还补充构筑其他的工事。在所有这些工事的围墙的下部都筑有石砌部分,或者有水壕掩护,使敌人无法对尚未遭到破坏的工事进行强攻;这些工事的配置是这样的:内层工事总是瞰制外层工事,即前者位于比后者高的地方,而外层工事也从自己的

高耸的围墙上瞰制周围地区。

攻击这种要塞仍然沿用沃邦改进的那种方法,虽然在要塞前面是大片平坦地区的情况下,被围者的线膛炮可能迫使围攻者对这个方法稍加改变。但是因为几乎所有这些要塞都是在滑膛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建筑的,所以通常都没有考虑到距工事 800 码以外的地区,而围攻者几乎经常不用正规的堑壕就能够隐蔽地接近到这个距离。当然,首先必须包围要塞,驱逐其警戒部队和其他部队,侦察要塞的工事,运来攻城炮、弹药和其他储备品,并建立仓库。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野炮轰击也是在这个准备阶段,这一阶段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斯特拉斯堡从 8 月 10 日起受到松缓的包围,20 日左右受到紧密的包围,从 23 日到 28 日受到了炮击,但正规围攻直到 29 日才开始。挖掘第一道平行壕(即把挖出的土朝要塞的一面堆积以掩蔽并保护在其中通行的人员的堑壕)被认为是正规围攻的开始。第一道平行壕通常在 600—700 码的距离上环绕着要塞的工事。在平行壕中设有纵射炮队,它们配置在棱堡各个正面(即以火力控制前面的地区的围墙)的延长线上;这是为了对付要塞的整个将受到攻击的部分的。这些炮队的任务是顺上述棱堡正面进行射击,以击毁棱堡正面上的火炮并杀伤炮手。为此,至少要有 20 个每队有 2—3 门重炮的纵射炮队,共约 50 门重炮。通常,在第一道平行壕内还配置一些臼炮,用以轰击城市或守备部队的掩蔽的防弹的仓库。有了现代火炮以后,臼炮仅用以轰击上述的后一种目标,而轰击前一种目标,现在用线膛炮就够了。

从第一道平行壕向前挖掘接近壕,其延长线不与要塞工事相交,这样,任何一个工事都不能对它们进行纵射;这些接近壕成锯齿形曲折前伸,到距要塞工事 350 码的地方即挖掘第二道平行壕

——堑壕，它和第一道平行壕相类似，但较短。第二道平行壕通常在掘壕作业开始后的第四夜或第五夜挖掘。在第二道平行壕内配置有反炮台炮队，每个被攻击的正面前都有一个，并且几乎与正面平行；这些炮队的任务是击毁敌方火炮，破坏炮队直前的围墙，同时与纵射炮队构成交叉火力。反炮台炮队共需大口径火炮约 60 门。然后，围攻者再向前挖掘锯齿形壕，锯齿形壕愈靠近要塞便愈短，而彼此相距也愈近。在距要塞工事约 150 码处，挖掘配置臼炮队的半平行壕，在距要塞工事约 60 码的斜堤脚下挖掘第三道平行壕，其中也配置臼炮队。第三道平行壕可在掘壕作业开始后的第九夜或第十夜完成。

在距筑垒工事这样近的地方，真正的困难便开始了。这时，虽然被围者的炮火在其控制的平地的范围内几乎已被压制下去，但要塞围墙上的步枪火力现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它将极其严重地延缓堑壕内的作业。这时掘壕作业必须更为谨慎并且按另一种计划进行，这种计划我们不能在这里详尽地说明。第十一夜，围攻者可以推进到隐蔽路的凸角处，正对着棱堡和三角堡的突出部；第十六天，他们可以挖好王冠形堑壕，也就是说在斜堤顶外侧沿斜堤顶挖好与隐蔽路平行的堑壕。只有这时，他们才能够配置炮队用来破坏围墙的石砌部分，以便保证部队越过护堡壕进入要塞，并压制住棱堡侧面上对护堡壕进行纵射并阻碍部队越过护堡壕的火炮。到第十七天，可能击毁棱堡的侧面以及配置在上面的火炮；那时才可能打开缺口。到下一个夜里，便可能下到护堡壕，构筑好通过护堡壕的隐蔽路，以保护强攻部队不受侧射火力的杀伤，而强攻就可开始。

我们曾在以上的叙述中对于围攻一种最薄弱、最简单的要塞

(沃邦式六角堡)的过程作一概述,并计算出在围攻没有被成功的出击打乱,而防御者没有发挥特别的积极性和勇敢精神,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兵器的条件下,围攻的各个阶段所需要的时间。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甚至就在这样一种有利的情况下也至少需要 17 天,才能在要塞的主墙上打开缺口,从而为强攻要塞开辟道路。当守军有充足的兵力和给养时,是没有任何军事上的理由足以迫使他们在这个期限以前投降的;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被围者至少坚守这样一段时间,是起码的职责。然而有人对于斯特拉斯堡还没有被攻下这一点表示不满,而斯特拉斯堡受到正规围攻才不过 14 天,而且在被攻击的正面上又有外围工事,因而它至少能比平均期限多支持 5 天。他们对于麦茨、土尔和法耳斯布尔至今没有投降表示不满。可是要知道,我们还不知道围攻土尔的堑壕(哪怕是一道堑壕)挖掘了没有,而关于其他要塞,我们知道,它们还根本没有受到正规围攻。至于麦茨,看来现在并不打算对它进行正规围攻;显然,夺取麦茨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围困巴赞军团。这些性急的评论家们应当知道,很少有这样的要塞司令,当他还掌握比较充足的守备部队和必需的储备品的时候,便向 4 名枪骑兵组成的侦察队投降,或者甚至只受到炮击便投降。如果说施特廷于 1807 年向一个骑兵团投降,如果说法国边境要塞于 1815 年曾在短时间的炮击后或者甚至只是由于惧怕炮击而投降,那末我们不应当忘记,维尔特和施皮歇恩两次失败合起来也不能同耶拿或者滑铁卢的失败相比;此外,法军中有很多军官甚至能够用由流动自卫军组成的守备部队抵抗住正规围攻,怀疑这一点是毫无根据的。

载于 1870 年 9 月 15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44 号

如何击败普军

1859年意大利战争后，在法国的军事力量达到全盛的时期，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也就是现在将巴赞军团围困在麦茨的那位亲王，写了一本“如何击败法军”的小册子⁶⁴。现在，当德国按照普鲁士制度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正所向无敌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将来究竟是谁并且用什么方法击败普军。当德国最初仅仅为了抵御法国 chauvinisme（沙文主义）而进行的战争看来正逐渐地但是确实地变为一种为了新的德国 chauvinisme 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的时候，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多兵之旅必获胜”，——拿破仑喜欢这样解释作战胜负的原因。而普鲁士正是按照这个原则行动的。它设法创建“多兵之旅”。当1807年拿破仑禁止它保持4万人以上的军队时，它开始使新兵经过6个月的训练后复员回家，而代之以另一批新兵；因此到了1813年，它能够从450万人口中派出一支25万人的作战军队。后来，这条现役期短、预备役期长的原则获得更加充分的运用，而且变成符合君主专制制度的需要。兵士服2—3年的现役，不仅是为了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同时也是为了经过严格的训练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

普鲁士制度的弱点也正在这里。它必须兼顾两个不同的、归根到底是互不相容的任务。一方面，要求把每个体格适于服役的男子

都变成兵士，并建立一支常备军；常备军的唯一目的是成为国民学习使用武器的学校，并在遭到外来攻击时成为团结国民的核心。从这方面来说，上述制度是纯粹防御性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就是这一支军队又应当是半专制政府的武力后盾和主要支柱；为了这个目的，就需要把这个对国民进行军事训练的学校变成培养绝对服从上级的精神和忠君的精神的学校。而这一点只有通过长期的服役才能做到。在这里这两个任务的不相容也就表现出来了。防御性的对外政策要求在短期内训练大量兵员，以便在遭到外来攻击时拥有大批后备力量；而对内政策却要求用较长时间来训练数量有限的兵员，以便在国内发生暴动时有一支可靠的军队。这个半专制君主国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它规定兵士的现役期为整整3年，并根据财政状况限制征集的人数。备受赞扬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已经变为征兵制，和其他国家的征兵制不同的地方只是它更为严格。这个征兵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花费更多的钱，占用更多的人员，而服预备役的时间也比任何国家长得多。同时，原来为了自卫而武装起来的民众，现在变成了驯服的、准备随时进攻的军队，变成了寡头统治集团的政策工具。

1861年，普鲁士的人口略多于1800万，并且每年有227000名年满20岁的青年应当服兵役。其中足有一半在体格上立刻或者至多再过一两年便可以服役。但每年应征入伍的新兵不是114000人，而是不得超过63000人，可见几乎有一半身体健康适于服役的男子没有受军事训练。凡在战时到过普鲁士的人，都会因看到大批身体健壮的20—32岁的青年安闲地呆在家里而感到惊讶。特派记者战时在普鲁士所看到的那种“暂时失去生活气息”的情形，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想像罢了。

从 1866 年以来，北德意志联邦在 3000 万人口中每年征集的新兵不超过 93000 人。如果将体格适于服役的青年男子全部挑选出来，那末即使经过最严格的体格检查，其数目也至少可以达到 17 万人。一方面由于王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由于财政上的需要，才限制了征集的人数。军队仍然是对内实现专制制度的目的、对外进行寡头统治集团所需要的战争的驯服的工具；但是全国所有防御的力量远不是都已经准备好而可以使用的。

虽然如此，这个制度比大陆上其他大国军队的过时的基于兵制度还是有极大的优越性。按照人口比例，普鲁士征集了比他们多一倍的兵士。普鲁士依靠它的制度能够把这些人训练成好兵；这个制度消耗着国家的资源，因此，如果不是路易—拿破仑经常企图侵占莱茵河疆界，如果不是人民渴望德国的统一而本能地把这支军队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工具，那末人民对于这种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容忍的。一旦莱茵河地区的安全和德国的统一有了保证，这个军事制度就必将成为不能忍受。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如何击败普军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一个具有同样多人口、同样才能、同样勇敢和同样文明的国家，实现了普鲁士仅仅在纸上谈到过的一切，即把每一个体格适于服兵役的国民都变成兵士；如果这个国家把平时的现役期和受训时间缩短为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所真正需要的时间；如果它保持必要的组织，以便像普鲁士最近所做的那样以有效的方法来充实它的战时编制，那末我们肯定地说，这个国家对普鲁士化的德国会具有和普鲁士化的德国在这次战争中对法国所具有的一样巨大的优势。普鲁士的第一流权威人士（包括陆军大臣冯·罗昂将军）认为，两年的服役期完全足以把一个农村青年训练成一个好兵。如果国王陛下

的那些迂腐的军官们允许的话，我们甚至愿意指出，对于绝大部分的新兵有 18 个月（即两个夏季和一个冬季）的时间就足够了。但是精确的服役期限的长短是次要的问题。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普鲁士人服役 6 个月以后便有了出色的成绩，而且这还是些刚刚摆脱农奴地位的人。主要的问题在于真正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

如果战争将一直继续到德国的庸人现在所叫嚣的那种可悲的结局，即肢解法国，那末我们可以相信，法国人一定会采取这样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他们虽然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但不是一个善战的民族。他们已厌恶在像法国军队这样一种实行现役期很长而受过训练的后备人员不多的基干兵制度的军队中服役。他们很愿意在现役期短而预备役期长的军队里服役；他们甚至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如果这能够使他们洗雪耻辱并恢复法国领土完整的话。而到了那时，“多兵之旅”就将属于法国，只要德国不采用同样的制度，那末这支多兵之旅的行动就将和这次战争中的多兵之旅的行动一样取得同样的结果。但有以下的不同：正像普鲁士后备军制度同法国的基干兵制度相比是一个进步（因为它缩短了服役期而增加了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的人数）一样，这个新的真正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同普鲁士的制度相比也将是一个进步。战时军队的数量将有更大规模的增加，而平时军队的数量则将减少；每一个国民都将亲自而不是通过代役兵来参加解决政府之间的争端的武装斗争；防御将更加坚强，而进攻将更为困难，因此军队的扩大本身，归根到底将节省开支，并将成为和平的保证。

载于 1870 年 9 月 17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46 号

战争短评(十九)

巴黎的筑垒工事已经证实了它的价值。德军一个多星期未能攻占这个城市，就是因为它有了这些工事。1814年，蒙马特尔各高地上半天的战斗便使巴黎投降了。1815年，在战局开始时构筑的许多土质工事曾阻滞了敌人一些时候；但是，如果不是同盟国军坚信巴黎会不战而降，那末这些工事的抵抗时间就会是很短的⁶⁵。在目前的战争中，德军对外交界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外交界不要干涉他们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在9月中旬以前一直是迅速、勇猛而又坚决的，但是自从德军的各路部队进入巴黎这个巨大营垒的控制范围的那一天起，便变得缓慢、犹豫而又 tatonnante（畏缩）了。这是很自然的。即使你率领一支20万或25万之众的军队开到这样大的一个城市附近，单是包围它就需要时间，需要谨慎。甚至这样多的兵力也未必足以从四面八方完全包围它，尽管像现在这样，城内没有一支适于进行大规模会战和野战的军队。巴黎没有这样一支军队，这从杜克罗将军在默东附近出击的悲惨结果⁶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这一次，基干部队表现得确实比流动自卫军差，他们由有名的朱阿夫兵带头真的“溜之大吉”了。这是容易说明的。老兵，主要是曾经在维尔特作过战的麦克马洪、德·法伊和费里克斯·杜埃等军的兵士，经过两次一败涂地的退却和6个星期接连不断的失败，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十分自然，

这些情况对于雇佣兵，即朱阿夫兵（他们大部分是代役兵，不配有别的叫法）的影响特别大。而人们曾经指望通过这些人来稳定那些未经训练即补充到各减员的基干营去的新兵。在这次战争以后，还可能有一些小规模出击，并可能取得某些胜利，但是地上的会战未必会再发生了。

另外，德军肯定说，他们的火炮已从索城附近的高地上控制着巴黎；但是对这种说法不可相信。在封特内-奥-罗兹上方他们可以配置任何一个炮队的最近的各高地，距离旺夫堡垒约 1500 米，因而距市中心就有 8000 米即 8700 码。德军并没有比所谓六磅线膛炮（炮弹重约 15 磅）的威力更大的野炮，即使他们有十二磅线膛炮（炮弹重 32 磅），这些炮以其炮架所允许的射角射击时，其最大射程也不超过 4500—5000 米。因此，这种吹嘘是吓不倒巴黎人的。至少在两座堡垒失守以前，巴黎是用不着害怕炮击的；但是就是到那时，由于炮弹在广阔的市区散布面很大，造成的破坏也是比较轻微的，对人们的精神影响则几乎等于零。请看看轰击斯特拉斯堡用了多少炮兵！即使我们考虑到只是在要塞工事的一个不大的地段上依靠平行壕进行正规围攻，要迫使巴黎投降，又需要比这多多少少的炮兵啊！在德军未能把这样的炮兵连同弹药和所需的其他一切物品一起调集到巴黎城下以前，巴黎是安全的。只有当全部攻城手段都已准备妥当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危险。

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出，巴黎的筑垒工事有多么大的力量。如果给这个消极的力量，即这种单纯的抵抗力量再加上积极的力量，即一支真正的军队的进攻力量，那末这些工事的价值就会立即提高。围攻军不可避免地塞纳河和马尔纳河分割成至少三个单独部分，并且这三个部分一定要经过在他们阵地后方架设的桥梁才能

取得联络,也就是说,只有费时绕道才能取得联络;在这种情况下,巴黎的军队的主力就能够以优势兵力任意攻击敌军的任何一部分,予以杀伤,破坏他们已经开始构筑的任何工事,并且在围攻者的援军赶到以前,在堡垒的掩护下退回。如果巴黎现有的军队比起围攻军来并不太弱,那它就可以使敌人无法完全包围要塞,或者可以随时突破这种包围。如果一个被围攻的要塞有可能得到外援,那末对它进行完全包围是多么必要,这从塞瓦斯托波尔的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次围攻拖延了很久,就是因为俄军通过要塞的北区源源不断地调来援军,直到最后这条通路才被切断。巴黎城下的战事愈发展下去,波拿巴的将军们在这次战争中的十足的轻举妄动就愈明显;由于这种轻举妄动,两个军团已经被断送了,而巴黎也没有留下主要的防御手段,即以攻击回答攻击的力量。

至于这样一个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我们认为困难倒比小要塞被围时少。像巴黎这样一个首都,不仅有良好的商业组织可随时供应粮食,而且是广大地区的农产品的主要市场和集散地。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会很容易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设法采购充足的粮食,以备整个中等围攻期之需。虽然我们不能断定是否已经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和不能迅速做到这一点。

无论如何,如果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那样,战争将进行到“可悲的结局”,那末在围攻作业开始以后抵抗大概不会是长期的。内岸的石砌部分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而中堤前面没有三角堡,也有利于围攻军前进和在要塞围墙上打开缺口。堡垒不大,只能容纳有限的守军;如果没有军队通过堡垒之间的间隙地出动支援,它们是不能有力地抵抗强攻的。但是,如果堑壕能够

直达堡垒的斜堤而不被巴黎军队的出击破坏，那末这一事实说明，巴黎军队在数量上、组织上和士气上都太弱了，不能在强攻的夜间有胜利把握地进行出击。

只要拿下几座堡垒，预料城市就会放弃绝望的战斗。不然，围攻一定再次进行，打开几个缺口，然后再度建议城市投降。如果这一建议再度遭到拒绝，那末就可能发生同样绝望的街垒战。我们希望巴黎免于遭受这种无谓的牺牲。

载于 1870 年 9 月 27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54 号

关于谈判的消息⁶⁷

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昨天根据茹尔·法夫尔先生的说法向读者报道关于谈判的消息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当然，关于俾斯麦企图兼并麦茨、萨兰堡和“苏瓦松”的说法这一类不大的错误除外。法夫尔先生显然不了解苏瓦松的地理位置。伯爵提到的萨尔布尔，早就被指出位于新的战略边界线的范围内，而苏瓦松则和巴黎或特鲁瓦一样远离这条战略边界线。法夫尔先生在叙述这次谈判时，也许没有完全准确地转述个别词句；但是，当他叙述那些被普鲁士半官方报纸反驳的事实的时候，中立的欧洲通常总是宁愿相信他的话。因此，如果现在柏林对法夫尔先生关于建议交出蒙瓦勒里安的说法有争论的话，那末没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是法夫尔先生凭空捏造的，或者是他完全误解了俾斯麦伯爵的意思。

法夫尔先生的叙述清楚地表明，他对于实际情况的了解是多么差，他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多么混乱和模糊。他是为了进行应当导向和平的停战谈判而来的。我们想原谅他那认为法国还有力量迫使它的敌人放弃一切割地要求的看法，但是很难说，他希望在什么条件下达成停战。德方最后坚持的条款是要求交出斯特拉斯堡、土尔和凡尔登，同时这些地方的守备部队应当成为战俘。对交出土尔和凡尔登看来已有某种程度的同意。但是斯特拉斯堡呢？法夫尔先生把这个要求看作是一种真正的侮辱，他说：

“伯爵先生，您忘记了您是在跟一个法国人谈话。牺牲一支全世界人士特别是我们所景仰的英勇的守备部队，是怯懦的行为，我不能答应转达您向我们提出了这种条件。”

我们看到，这个回答对实际情形考虑得多么少，我们在这个回答中只看到了一种爱国感情的迸发。既然在巴黎这种感情的确非常强烈，在这样的时刻当然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感情；但是也应当仔细衡量一下现有的事实。斯特拉斯堡受到正规围攻已经很久，因此可以肯定地相信它很快就要陷落。一个受到正规围攻的要塞可以抵抗一定的时期，而当它竭尽全力防御时甚至还可以多支持几天，但是如果军队不来援救，那末就可十分准确地得出结论说，它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特罗胥和巴黎的高级军事工程人员对这一点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军队可以前来援救斯特拉斯堡；然而，特罗胥在政府中的同僚茹尔·法夫尔看来并没有注意这一切。他从交出斯特拉斯堡的要求中看到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对于他自己、对于斯特拉斯堡的守备部队以及对于法国人民的侮辱。但是主要的当事人，即乌里克将军和他的守备部队，为了保护自己的荣誉无疑已经尽力而为了。如果使他们避免进行最后几天完全绝望的战斗，可以增加拯救法国的微弱的希望，那末这样做对于他们就不是侮辱，而是完全应得的奖赏。乌里克将军无疑宁愿按照政府的命令在敌方做出同等让步的条件下投降，而不愿在强攻的威胁和毫无补偿的情况下投降。

在这期间，土尔和斯特拉斯堡陷落了，而当麦茨还在坚守的时候，凡尔登对于德军毫无军事价值。因此，德军甚至不待同意停战就几乎获得了俾斯麦向茹尔·法夫尔所讨价还价的一切。这样一来，就使人觉得，从来还没有一个战胜国提出过比这更温和

更宽大的停战条件，也从来没有一个战败国比这更轻率地拒绝过这些条件。茹尔·法夫尔在这次谈判中当然没有显示出才智，尽管他的本能看来是相当好的，而俾斯麦却扮演了一个宽宏大量的胜利者的新角色。德方的建议，像法夫尔先生所理解的那样，是非常有利的，而且如果这个建议仅仅是像法夫尔所想的那样，那就应当立刻接受。但是，在建议中包含着比法夫尔所看到的更多的东西。

在平面上的两军之间，缔结停战协定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规定一条分界线，也就是说在交战双方之间规定一个中立地带，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现在，在平地上只有一方的军队，另一方的军队虽然还存在，但是困在要塞中，这些要塞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敌人包围着。所有这些要塞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停战期间它们的地位将怎么样呢？俾斯麦对这一切竭力避开不谈。如果缔结了一个为期两周的停战协定，而其中关于这些城市却一字未提，那末，不言而喻，除了不对守备部队和要塞工事采取军事行动以外，一切都应当维持 *status quo*（现状）。这样，比奇、麦茨、法耳斯布爾、巴黎以及谁知道还有多少的别的要塞，仍然被围困，它们的一切供应和交通线仍然被切断；要塞中的人们和没有缔结停战协定时一样，继续消耗贮粮。因此，停战给围攻者带来的结果，就会几乎同继续作战时一样。并且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在停战期间，这些要塞有一个或几个把贮粮全部吃光了，他们为了不致饿死而不得不立刻向围攻军投降。由此可见，一贯狡猾的俾斯麦伯爵是打算利用停战来迫使敌人的要塞投降的。当然，如果谈判继续进行，并且到了起草协定的时候，法军参谋部会识破这一点，并且一定会提出有关被围城市方面的要求，那时这个诡计

大概就会被拆穿了。但是，茹尔·法夫尔先生从自己方面来说，应当彻底研究俾斯麦的建议，并且识破他的阴谋。如果法夫尔先生问一问在停战期间那些被围城市的地位将会怎样，他就不会让俾斯麦伯爵得到一个在全世界面前炫耀他那虚假的宽宏大量的机会。然而法夫尔先生没有能力揭穿这种虚假的宽宏大量，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根本不难。他没有这样做，却对于把斯特拉斯堡连同其守备部队作为战俘一起交出的这个要求勃然大怒，以致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甚至在最近两个月的惨痛教训之后，法国政府的代表还不能判断实际情况，因为他仍然 *sous la domination de la phrase*（为一些词句左右）。

载于1870年10月1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58号

战争短评(二十)

即使在导致法国几个军团实际复灭的莫名其妙的错误发生后，法国实际上被仅仅占领其八分之一领土的胜利者控制的这个事实，仍然使人惊奇。真正被德军占领的不过是由斯特拉斯堡到凡尔赛和由凡尔赛到色当的这一线。在这个狭窄的地带，法军仍然扼守着巴黎、麦茨、蒙梅迪、凡尔登、提翁维耳、比奇和法耳斯布尔等要塞。对这些要塞的监视、封锁或围攻几乎用去了德军迄今派到法国的全部兵力。可能德军还有足够的骑兵用来扫荡巴黎周围直到奥尔良、卢昂、亚眠甚至更远的地区的敌人；但是休想目前真正占领某一广大地区。是的，在亚尔萨斯，在斯特拉斯堡以南现在驻有4万到5万后备军，而且这支军队如果同斯特拉斯堡城下的围攻军的大部分部队会合起来，其数量可能增加一倍。这支军队大概是用来向法国南部进军的，因为有人断定，这些军队将向伯尔福、伯桑松和里昂进军。这三个要塞都是巨大的营垒，并在距要塞主墙相当远的地方筑有独立堡垒；要想同时围攻或者甚至严密封锁这三个要塞，都需要比这支军队的现有数量还要多的兵力。因此，我们相信，这种论断纯粹是为了转移视线而散布的，其实新开来的德军对这些要塞将只给以最小的注意；他们将进入勃艮第最富庶的地区——索恩河谷，把它劫掠一空，然后向卢瓦尔河前进，以便同包围巴黎的军队取得联系，相机行动。甚

至这支强大的部队在同包围巴黎的军队取得直接联系（取得这种联系后就不必同莱茵河取得直接的单独的联系）以前，只能用来进行袭击，而不能控制广大地区。因此，在最近几个星期内，他们的军事行动不会扩大德军实际占领的法国领土，德军占领的地区仍将限于法国全部领土的八分之一；但是，尽管法国不愿意承认，它实际上已经被征服了。这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呢？

其主要原因是法国的整个行政管理系统，特别是军事指挥管理系统过于集中。直到最近时期，法国为了军事目的还把全国划分为 23 个军区；尽可能在每个军区都驻守一个配有骑兵和炮兵的步兵师。各师的师长和陆军部之间没有中间环节。此外，这些师是单纯的行政组织而不是作战组织。师属的各个团从没有打算在战时合编成旅；它们只是平时在惩戒方面隶属于同一位将军。一旦有战争威胁，它们可能被派到完全不同的军、师或旅去。师司令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司令部除外），即直属于将军本人的司令部根本就没有。在路易一拿破仑统治时期，这 23 个师曾合编为 6 个军，每个军由一个法国元帅指挥。但是这些军和原来的师一样，也不是适应战争的固定编制。它们是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军事目的编成的⁶⁸。这些军没有真正的司令部。它们同普鲁士的军完全相反，普鲁士的每个军都有固定的战时编制，有定额的步兵、骑兵、炮兵和工兵，并且设有保持作战准备的军事指挥、卫生、军法和行政等部门。法国军队的行政管理机关（如军需部门等）不是接受指挥官（元帅或将军）的命令，而是直接接受巴黎的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巴黎陷于瘫痪状态，如果同巴黎的交通线被切断，那末各地便没有任何组织核心，并同样地陷入瘫痪状态，也许更严重，因为长期来被尊崇的各地对于巴黎及其主

动权的依赖，已经传统地成为国家信条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违犯它不仅是罪恶，而且是冒渎神灵。

除这个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是次要的，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未必亚于前者。这原因就是国内历史发展的结果，法国的中心距东北边境太近。三百年以前，这个情况有大得多的意义。当时，巴黎位于国境边缘。法国对德国和西班牙（当时西班牙统治着比利时）进行的几乎连绵不断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从东面和东北面夺取更大的地区来掩护巴黎。自从亨利二世于 1552 年强占了麦茨、土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管区的时候起到革命时止，阿尔图阿、佛兰德和埃诺的一部分、洛林、亚尔萨斯和蒙贝利亚尔等地先后被用同样方法并入法国，作为最先抵御敌人向巴黎进攻的缓冲地带。我们应当承认，居民的种族、语言和习惯注定要使几乎所有这些地区成为法国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并且法国主要由于 1780—1798 年的革命得以完全同化其余的地区。但是甚至在当时，巴黎仍然经常遭受危险。从贝云到佩皮尼扬以及从昂提布到日内瓦的陆地国界距巴黎很远。从日内瓦经巴塞尔到亚尔萨斯的劳特堡的国界离巴黎的距离也一样；这样，国界就形成了一条以巴黎为圆心的、半径为 250 英里的弧线。但是国界在劳特堡离开了这条弧线而形成了一根弦，这根弦上有一点距巴黎仅 120 英里。关于法国的国界，拉瓦累在他的沙文主义著作⁶⁹中曾经说过：《Là où le Rhin nous quitte, le danger commence》（“在莱茵河离开我们的地方，危险便开始了”）。但是，如果我们把上述弧线从劳特堡向北延伸，那我们就会发现，它几乎全部沿着莱茵河到达海边。这就是法国要求取得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的真正原因。只有在取得这个边界以后，巴黎才能在

它的最暴露的一面也得到与它的距离都是相等的边境的掩护，而且有一条河流作为国界。如果巴黎在军事上的安全是欧洲政治的指导原则，那末，毫无疑问法国是有权要求这一点的。幸而情形不是这样；既然法国宁愿把巴黎作为首都，那它在享有巴黎的有利条件时，同等地，当然也要接受以巴黎为首都的不利方面，这些不利方面之一就是：占领法国的一小部分领土（包括巴黎），就会使整个国家的活动瘫痪下来。但是如果情形是这样，即法国没有因为其首都得不到掩护而具有取得莱茵河的权利，那末，德国就应当记住，同类性质的军事理由也不能使它有更多的权利要求取得法国的领土。

载于 1870 年 10 月 3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59 号

战争短评(二十一)

如果相信巴黎用气球送来的消息，那末这个城市现在有庞大的军队在防守。那里有从各地来的流动自卫军 10—20 万人；有巴黎的国民自卫军 250 个营，每营 1500 人，而据某些人的说法，则达到 1800—1900 人，按最低数字计算，总共也有 375000 人；除海军陆战队、水兵、自由射手等以外，在那里至少还有 5 万基干部队。而且据最近的消息说，如果这些军队全部被击溃，那也还有 50 万能拿武器的市民，准备在需要时接替他们。

巴黎周围的德军包括 6 个北德意志军（第四、五、六、十一、十二军和近卫军）、2 个巴伐利亚军和 1 个维尔腾堡师，共计 8 个半军，约 20 万到 23 万人，决不会更多。尽管德军分散在至少有 80 英里长的包围线上，但是大家知道，他们仍然把城内这支庞大的军队围困住了，截断了他们的补给线，控制了从巴黎出来的所有大小道路，并且到目前为止一直胜利地击退了守军的一切出击。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大概不容怀疑，关于巴黎有大量武装力量的消息是虚构的。如果把人们常说的 60 万武装人员这个数目减少到 35 万或者 40 万，那末这比较接近真实。但是不能否认，在巴黎城内防守的武装人员，比在城外攻击这个要塞的要多得多。

第二，巴黎守备部队的战斗素质差别很大。我们可以认为其中

只有现在防守外围堡垒的海军陆战队和水兵是真正可靠的部队。基干部队是麦克马洪军团的残部，它补充了预备兵，但其中大部分是未经训练的新兵；9月19日默东附近的战斗表明，基干部队的士气低落。流动自卫军本身的素质很好，但现在才进行基本训练；它缺少军官，而且装备着三种不同的步枪：沙斯波式步枪、改良的米涅式步枪和未改良的米涅式步枪。无论怎样努力，无论怎样同敌人互射，都不能在短期内使他们具备坚定性，而只有这种坚定性才能够帮助他们完成最必要的任务，即在平地上迎击并击败敌军。流动自卫军组织上的基本缺陷，是缺乏有经验的教官、军官和士官，这个缺陷妨碍了把他们训练成为好兵。但是，看来他们仍不失为巴黎防卫中最好的部队；至少，他们大概是愿意遵守纪律的。地方国民自卫军的成分非常复杂。其中由工人组成的来自郊区的各个营，是十分自觉并且坚决作战的；只要有在人格上和政治上都为他们信赖的人来领导他们，他们就会服从指挥，会表现出那种特有的本能的纪律性；但是任何其他的指挥官，他们都不会服从。此外，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有经验的军官，如果事情没有发展到在街垒进行决战，那末他们的优良的战斗素质是得不到检验的。但是，八里桥所武装起来的很大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是由资产阶级，主要是由小商人组成的。这些人根本不愿意打仗。他们在武装起来以后，所做的事情就是保卫他们的商店和住宅；而如果敌人从远距离上炮击他们的住宅和商店，他们的战斗热情想必就会消失。同时，他们与其说是组织起来对付外部敌人的一种力量，不如说是对付内部敌人的一种力量。他们过去的一切传统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当中十个有九个确信，这样一种内部敌人此刻正隐藏在巴黎的中心，在等待好机会袭击他们。他们大部分是结了婚的人，不习惯于艰

苦和危险，并且事实上他们已经对每隔三天必须在城墙上露宿一夜的辛苦的勤务发出怨言了。在这些部队中，会有一些连甚至营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勇敢作战；但是就整体来说，他们是不可靠的，在执行正规的、艰苦的勤务时更是如此。

从巴黎守军的这种情况来看，就无怪乎包围巴黎的德军虽然远不是那样多，而且很分散，但是并不害怕巴黎的任何攻击。事实上，至今所进行的一切战斗都表明，巴黎军团（假如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是不能进行野战的。9月19日对包围军所作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击是相当典型的。2个普鲁士团（第七团和第四十七团）就把杜克罗将军的1个军（约3—4万人）牵制了一个半小时，直到2个巴伐利亚团前来增援和1个巴伐利亚旅袭击法军的翼侧为止；结果法军狼狈退却，放弃了一座有8门火炮的多面堡，并且有大量人员被俘。德军参加这次战斗的人数不可能超过15000人。从此以后，法军的出击完全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进行。他们放弃了进行决战的一切企图；他们只用小兵力袭击敌人的前哨和其他小部队；如果有1旅、1师或者更大的法国部队越出堡垒线，那他们也只限于佯攻。这些战斗的目的与其说是打击敌人，不如说是在实战中训练新兵。无疑地，这些战斗将使他们逐渐获得训练，但是在集中于巴黎的难以指挥的大量人员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在规模这样有限的实践中得到好处。

特罗胥将军于9月30日发表的文告清楚地表明，他在19日的战斗以后已完全看清了他所指挥的军队的素质。当然，他把失败几乎完全归咎于基干部队，而对流动自卫军则非常宽容；但是这只能证明，他认为（也是正确地认为）流动自卫军是他指挥的军队中最好的部队。他的文告以及此后在战术上的改变都肯定地

说明，他对他的军队在平地上作战的能力并没有抱任何幻想。此外他还应当知道，法国可能剩下的号称里昂军团 70、卢瓦尔军团等的其余一切部队，其成分和他自己的部队完全相同；因此，他不能指望援军来解除对巴黎的封锁，即解巴黎之围。所以我们对于特罗胥似乎在内阁里反对和平谈判的提议的这个消息感到惊奇。这个消息无疑是从柏林来的，而柏林不是提供有关巴黎情况的公正情报的可靠来源。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相信，特罗胥抱有胜利的希望。从他在 1867 年对于军队组织的意见⁷¹来看，他是坚决拥护像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实行的那种四年现役和三年预备役制度的。他甚至认为，普鲁士规定的服役期限（2 年或 3 年）根本不足以训练出好兵来。现在历史的嘲弄使他陷入了这样的境地，即他率领完全没有经验的、几乎没有经过训练的和不守纪律的兵士，来同他不久前还认为是只经过一半训练的普军作战；而且他这次作战是在这支普军一个月中就粉碎了法国的全部正规军以后。

载于 1870 年 10 月 6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62 号

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原则

几个星期以前，我们曾指出，普鲁士的兵役制度远不是完善的^①。据宣称，它要使每个国民都成为兵士。用普鲁士官方的话来讲，军队不是别的，只是“全民学习作战的学校”；但是进这个学校的只占居民中很小的比例。我们现在再来谈谈这个问题，并举出一些精确的数字来说明它。

根据普鲁士统计局的材料⁷²，从1831年到1854年，实际入伍的人平均每年占适龄青年的9.84%；适于服役但未应征入伍的每年占8.28%；由于生理缺陷根本不适于服役的占6.40%；暂时不适于服役而要在下一年度重新检查体格的占53.28%；其余的人有的未报到，有的属于其他各类人员，他们数量很小，不值得在这里一谈。这样看来，在这24年当中，经过这个全民军事学校的青年公民还不到十分之一；而这竟被称为“全民武装”⁷³！

1861年的统计数字如下：1861年年满20岁的适龄青年为217438人；待命征集入伍的以往各年度的适龄青年为348364人；合计565802人。其中未报到的148946人，占26.32%；根本不适于服役的17727人，占3.05%；编为补充兵⁷⁴的，即平时免役而战时仍须服役的76590人，占13.5%；暂时不适于服役而需要重新

^① 见本卷第112—114页。——编者注

检查体格的 230236 人,占 40.79%;由于其他原因而免役的 22369 人,占 3.98%;剩下适于服役的有 69934 人,占 12.36%,其中实际入伍的只有 59459 人,占 10.5%。

无疑地,从 1866 年以来,每年入伍人数的百分比提高了,但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现在,北德意志的男子最多只有 12—13% 服兵役。这当然和那些“特派记者”在德国动员时期所作的兴高采烈的描述截然不同。据他们说,每个身体健康适于服役的男子都穿上了军装,背上了步枪或者跨上了战马;各种生计都已停顿;工厂停工了,商店关门了,庄稼留在田里没有人收割;一切生产都停顿了,一切商业都停止经营了,实际上呈现出了一种“暂时失去生活气息”的状态。一个民族的所有力量处于极度紧张中的这种状态只要继续几个月,就一定会使它筋疲力竭。老百姓变成兵士的规模之大当然是居住在德国以外的人所想像不到的;但是现在,在 100 万以上的人脱离老百姓的生活以后,如果原来那些记者们再去看一看德国,那末他们一定会看到,工厂在工作,庄稼已经收割,商店和事务所照常营业。如果说生产曾经停顿过,那是因为订货不多,而不是因为缺少工人;在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健壮的青年,他们和那些已经到法国去的青年一样能够拿起武器。

这一切都可从上述数字中得到说明。服过兵役的男子的数目当然不超过全部成年男子的 12%。因此在动员时征集入伍的人数不可能超过 12%,还有整整 88% 的人留在家里;当然,其中一部分将在战争期间为了补充战斗和疾病所造成的损失而被征入伍。这样,每半年还可以征集 2—3%,但是仍然有绝大部分男子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征集入伍。“全民武装”——这完全是一句空话。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早已指出过。普鲁士王朝和普鲁士

政府只要继续奉行自己的传统政策，他们就需要一支军队作为执行这个政策的驯服工具。根据普鲁士的经验，要把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训练得适于执行这种任务，就必须使他在军队中服3年现役。甚至普鲁士最顽固的守旧派军人从来没有肯定地说过，步兵——他们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可能在2年内学会履行自己的一切军职，但是正如在1861—1866年议院辩论中所指出的，真正的军人精神，绝对服从的习惯，只有到第三年才能养成。而在规定的军费预算额下，兵士服役时间愈长，入伍的新兵便愈少。现在，如果服现役的期限是3年，每年有9万新兵入伍，如果是2年，每年可以有135000人入伍受到训练，如果是18个月，每年可以有18万人入伍受到训练。从我们列举的数字中看得很清楚，要做到这一点，身体合格的男子的数量是足够的，这从下面的数字中看得更清楚。因此，我们看到，“全民武装”这句空话是用来掩盖建立一支以实行寡头政治的对外政策和反动的对内政策为目的的庞大的军队。“全民武装”决不是符合俾斯麦的目的的合适工具。

北德意志联邦的人口近3000万。战时军队的人数按整数算有95万，即仅占人口的3.17%。每年年满20岁的青年约占人口的1.23%，即36万人。根据德意志小邦的经验来看，其中立刻或者在2年以内可以服现役的足有一半，约18万人。其余的大部分适于担任警备勤务；但是我们可以暂且不把他们计算在内。普鲁士的统计数字看来同这个数字不一样，普鲁士的统计数字基于一些明显的原因必然要编造得从外表上看来同“全民武装”这个幻想相吻合。但是，这里也就暴露了真相。1861年除了适于服现役的69934人以外，还有76590人编为补充兵，这样就使适于服役的人数总计为146524人，其中只有59459人即40%被征入伍。无论如何，我

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认为,有一半青年适于服现役。在这种情形下,每年可以有 18 万新兵编入基干部队,然后像现在一样保持 12 年的兵役义务。这就会提供 216 万受过训练的兵士,那末,即使完全扣除由于死亡或其他原因而造成的减员,这个数目也比现有军队的人数多一倍以上。如果对另一半青年在年满 25 岁时再进行一次体格检查,那末从中至少还可以征集 50—60 万人甚至更多的很好的守备部队。如果有 6—8% 的居民事先受过军事训练和教育,并在国家遭到进攻时应征入伍,而且和现在所做的一样在平时保持所有部队所需的骨干,这才真正是“全民武装”;但是,这将不是为寡头政治的利益去进行战争、为进行掠夺或者在国内推行反动政策效劳的军队了。

毕竟,这只是把普鲁士的空话变成现实。既然单是这种近似的“全民武装”就具有这样大的力量,那末真正的全民武装又会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呢?而我们可以相信,法国会以某种形式把这种近似的全民武装变成真正的全民武装,如果普鲁士坚持侵略,迫使法国这样做的话。法国将成为一个举国皆兵的国家,并且在几年以后,能够以一种绝对优势的兵力使普鲁士惊讶,正像今年夏天普鲁士曾经使全世界惊讶一样。但是,难道普鲁士就不可以做到这一点吗?当然可以,不过那时的普鲁士就不再是今天的普鲁士了。它将赢得防御力量,同时减弱了进攻力量。它将有更多的兵士,但是这些兵士在战争开始时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入侵准备;普鲁士将不得不放弃一切侵略的念头,至于它现行的对内政策,那将遇到严重的威胁。

载于 1870 年 10 月 8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64 号

战争短评(二十二)

在前面一篇短评中,我们曾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甚至现在在斯特拉斯堡陷落后,尽管入侵的军队还没有占领法国领土的六分之一,但它在法国的这支庞大的军队,几乎已全部使用上了^①。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再谈谈它。

在麦茨附近,被困在它的堡垒线以内的巴赞军团牵制了德军8个军(第一、二、三、七、八、九、十军以及黑森师和库梅尔将军指挥的1个后备军的师),共计16个步兵师。在巴黎附近占用了17个步兵师(近卫军、北德意志第四、五、六、十一、十二军、巴伐利亚第一军和第二军以及维尔腾堡师)。新编的第十三军、第十四军(大部分是后备军编成的)和上述各军的某些部队,则占领已征服的地区,监视、封锁或者围攻占领区内仍在法军手中的要塞。德军现有的可用于积极行动的兵力,只有斯特拉斯堡投降后抽出的第十五军(巴登师和至少1个后备军的师)。这个军应从后备军的生力部队中得到补充,然后在更往南的方向上采取某些性质尚无法确知的行动。

现在,这些兵力几乎包括德国现有的全部已组织起来的部队,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外,即第四基干营不包括在内。这与奥地利战

^① 见本卷第124—125页。——编者注

争时期的做法不同,那时它们都被派去同敌人作战,而这次这 114 个第四营都留在国内;根据它们的最初的任务,它们应作为骨干去训练和编组那些征来补充各团由于战斗或疾病所造成的损失的新兵。只要把营内 1000 名新兵训练到能够在前线担任战斗勤务,便把他们补充到本团的 3 个基干营去;这种工作在 9 月中旬麦茨激战以后曾大规模地进行。但是,第四营的军官和军士仍留在原处,准备接收和训练另 1000 名补充兵或本年度的新兵。在现在这种不能确切预料结束时间的残酷的战争中,这种措施是绝对必要的;但是目前,这一措施使德军不能把这 114 个营以及相应数量的骑兵和炮兵共计 20 万人用去作战。除这部分兵力以外,全部德军都被用来占领不足六分之一的法国领土和包围这片领土上的麦茨和巴黎这两个大要塞,因此德军可以用来在占领区以外的地方继续作战的最多有 6 万人。而这是法国在要塞以外完全没有能进行认真抵抗的军队的时候的情况。

如果在现代战争中以要塞为核心的大营垒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需要例证的话,那末这里就有这样的例证。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会说明,被围的部队根本没有很好地利用所说的两个营垒。就麦茨要塞的规模和意义来说,它的守备部队太多了,而巴黎则几乎完全没有适于在野战条件下行动的真正部队。然而前一个要塞目前还是牵制了至少 24 万敌军,后一个要塞牵制了 25 万敌军;因此,如果法国在卢瓦尔河以南哪怕有 20 万真正的兵士,围攻巴黎就不可能了。不幸的是法国没有这 20 万兵士,而且看来一般也不会在需要的时间内把他们征集、组织和训练出来。因此,这两个巨大的防御中心的陷落只是几个星期以内的事。麦茨的军队直到现在始终出色地保持着纪律和战斗素质,但是他们的攻击所经常遇到的还

击最后必将打破他们得救的一切希望。法国兵士是优秀的要塞防御者，并且他们在被围攻时远比在野战中能够经得起失败；但是，如果士气沮丧的现象一旦在他们中间出现，也就迅速地、不可遏制地蔓延起来。至于巴黎，我们对于甘必大先生所说的巴黎有 40 万国民自卫军、10 万流动自卫军和 6 万基干部队的话，就像他所说的巴黎现在正在制造无数的加农炮和多管炮以及巴黎街垒威力巨大的话一样，是不会过于按字面去理解的。但是无疑地，巴黎有充分的可能进行极其顽强的防御，虽然这种防御由于守备部队的性质必然是消极的，而且会失去最有力的手段——向围攻的敌军进行猛烈的攻击。

无论如何，非常明显的是如果法国人还有真正的民族热忱，那末一切都还是可以做到的。当入侵敌军除去 6 万名兵士和只能进行袭击但不能制服敌人的骑兵外，全部兵力都被牵制在占领区内时，法国在其余六分之五的地区内可以建立足够多的武装部队，用来到处袭扰敌军，切断他们的交通线，破坏桥梁和铁路，毁掉他们后方的粮食和弹药，以此迫使他们从两大军团中抽出大量兵力，以致巴赞可能设法从麦茨突围，而巴黎的包围成为泡影。这些武装部队的活动现在就已经成为使德军严重不安的根源，虽然暂时还不是一种危险；当巴黎周围地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消耗殆尽而德军不得不到更远的地区去征发时，这种不安还将随之增长。目前在阿尔萨斯建立的德军新部队，不论它们将向南方进行什么远征，大概都会很快被调回来，因为德军必须保证自己的交通线和占领巴黎周围的广大地区。但是，如果法国人民像西班牙人在 1808 年⁷⁵那样为高涨的民族热忱所激励，如果每个城市 and 几乎每个村镇都变成要塞，每个农民和市民都变成战士，那末德军的命运将会怎样

呢?那时,甚至各第四营的 20 万人都不足以征服这样的民族了。但是这种高涨的民族热忱今天在文明国家中已不常见。它可以在墨西哥人和土耳其人中间找到,但是在追逐金钱的西欧,它的源泉已经枯竭;而第二帝国这个梦魔使法国窒息的这 20 年,绝没有使它的民族性格受到锻炼。结果我们看到:说得多而做得少;表面的事做得多而组织工作几乎完全被忽视;真正的抵抗很少而对敌人的屈服很多;真正的兵士很少而自由射手很多。

载于 1870 年 10 月 11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66 号

战争短评(二十三)

柏林普军参谋部的军官们大概开始忍耐不住了。他们通过“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⁷⁶驻柏林记者告诉我们说,已经在几天之内在巴黎城下准备好攻城兵器,围攻很快就要开始。对于这个准备工作,我们有怀疑。第一,我们知道,唯一可以使用的铁路线上靠近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的几个隧道已被退却的法军炸毁,至今仍然没有修复;第二,我们还知道,对于巴黎这样大的要塞进行有效的正规围攻所需攻城兵器的数量很大,即使铁路时刻畅通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它们运齐;第三,虽然从柏林发出这个消息以后已经过去五六天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听到已挖掘好第一道平行壕的消息。因此,我们应当得出结论:所谓围攻或者说正规攻击的准备指的是非正规攻击也就是炮击的准备。

但是,要想抱着某种迫使巴黎投降的希望去炮击它,就需要比正规围攻多得多的火炮。在正规围攻时,可以限于攻击防线的一点或两点;而在炮击时,却必须对整个广大市区连续不断地发射大量的炮弹,到处造成居民无力扑灭的大火灾,并且使灭火工作过分危险。要知道我们曾经见过,甚至 85000 人的斯特拉斯堡也能够出色地经受住几乎空前猛烈的炮击,并且除了某些准确划定了的不得不牺牲的地区以外,都顺利地制止了火势的蔓延。这是因为城市的面积较大的缘故。一个只有 5000 到 10000 人的不大的要塞,如果

没有大量的防弹掩蔽部,就容易因遭受炮击而被迫投降;但是一个有 5 万到 10 万人的城市却能够经受住猛烈的炮击,如果它像法国的大部分城市那样,用方块石建筑的或者房屋有很厚的砖墙,就更加如此。巴黎在筑垒线以内的地区面积,长 12 公里,宽 10 公里;在旧城⁷⁷,即市内建筑物最稠密的部分的面积长 9 公里,宽 7 公里,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市区的面积约为 5000 万平方米,即将近 6000 万平方米。平均每小时向这个地区的每 1000 平方米内发射一发炮弹,那末一小时就需要 6 万发炮弹,一昼夜就需要 150 万发炮弹;为此至少需要 2000 门重炮。但是每小时向长宽都几乎各为 100 英尺的地区发射一发炮弹,那末这就是微弱的炮击。固然,可以暂时集中炮火轰击一个或者几个街区,直到它们被彻底炸毁时为止,然后再把炮火转向邻近的街区;但是要使这种炮击奏效,就要在几乎和正规围攻同样长、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进行,而且靠这种做法逼使要塞投降的把握无疑更小了。

此外,巴黎在它的各堡垒陷落以前实际上处在有效的炮击距离以外。现在围攻者在城外夏提荣附近占领的离城最近的高地,距离几乎正好位于市中心的司法厅⁷⁸也足有 8000 米(相当于 8700 码或 5 英里)。在南面,敌人离市中心的距离到处都大致和这里的相等。在东北方面,堡垒线距市中心有 10000 米(11000 多码),所以在这个地区内,任何一个炮队都还要配置在再远 2000 码,也就是说,配置在距离司法厅七八英里的地方。在西北方面,塞纳河湾和蒙瓦勒里安堡垒很好地掩护着城市,以致炮队只能配置在闭合的多面堡内或正规的平行壕内,这就是说在正规围攻开始以前炮击(我们认为这是它的序幕)是不可能的。

现在,口径为 5、6、7、8、9 英寸,发射炮弹重 25 到 300 磅或

300 磅以上的普鲁士重型线膛炮的射程可以达到 5 英里，这是毋庸置疑的。1864 年，在哈美马尔克就曾经用二十四磅线膛炮从 5700 步（等于 4750 码或将近 3 英里）的距离上轰击了宗德堡⁷⁹，虽然这还是旧式青铜炮，发射重 68 磅的炮弹时只能经受重量不超过 4—5 磅的装药。射角必然很大，并且不得不专门改造了炮架，因为它在使用较大装药时要损坏。普鲁士的新式钢铸炮能够经受比炮弹重得多的装药，但是想达到 5 英里的射程，还是需要很大的射角，而炮架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造；如果炮架不加改造就用来射击与它不相适应的目标，那末很快就会被损坏。使用全装药，甚至以 5—6 度这样不大的角度进行射击，也比任何东西都更迅速地损坏炮架，何况现在所需的射角平均至少为 15 度，因此炮架就会和巴黎的房屋一样迅速地被破坏。即使把这种困难也撇开不谈，那末距市中心 5 英里的炮队对巴黎进行的炮击充其量也只能是局部的炮击。它所造成的破坏足以引起愤怒，但不足以引起畏惧。在这样的距离上，炮弹不可能十分准确地命中指定的市区。即使下命令避免射击某些地区，但医院、博物馆、图书馆等不管从炮队所在的高地上看得多么清楚，也未必能够幸免。军事建筑物、兵工厂、弹药库、器材库等，即使围攻者观察得到，也不能十分有把握地加以击毁；因此说炮击的目的是破坏被围者的防御手段这种通常的借口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上面所谈的一切，是以围攻者拥有进行真正有效的炮击的手段，即大约 2000 门大口径线膛炮和白炮为前提的。倘若如我们现在所预料的，德军的攻城炮兵纵列大约是 400 到 500 门火炮，那末这是不足以对城市发生迫使它投降的影响的。

虽然炮击要塞还被认为是战争公法允许的，但这种手段毕竟会给居民带来许多灾难，所以在我们的时代，谁施行炮击而没有足

够的把握用这种方法迫使要塞投降,谁就会受到历史的谴责。维克多·雨果认为,巴黎是神圣的城市(最神圣的城市)!攻击巴黎的任何企图都是冒渎神灵的行为,他的沙文主义观点使我们发笑。我们看待巴黎同看待任何其他筑垒城市一样,如果它决心防守,那末它就要经受敌人进行正规围攻、使用攻城堑壕和攻城炮以及流弹破坏非军事建筑物所造成的危险。但是,如果将来终于对巴黎进行炮击(尽管单凭炮击并不能迫使巴黎投降),那末这将是一个只有少数人会认为应当由毛奇的参谋部负责的军事错误。有人会说,巴黎遭受炮击是出于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是出于军事上的理由。

载于 1870 年 10 月 13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68 号

麦茨的命运

如果相信柏林来的消息，那末普军参谋部似乎认为，巴黎将先于麦茨被攻克。但是这个看法显然既以政治上的理由为根据，也以军事上的理由为根据。俾斯麦伯爵所期待的巴黎市内的骚动还没有开始；但是他们估计，只要在城市上空一响起围攻者的重炮的吼声，城内就必然发生纷争和内战。巴黎人至今还没有使德军大本营对他们的这种看法得到证实；可能他们直到最后也不会使它得到证实。如果是这样，那末本月底攻占巴黎的打算几乎肯定要落空，而麦茨可能先于巴黎投降。

作为要塞，麦茨比巴黎坚固得多。巴黎的工事是根据这样一种设想构筑的，即全部或至少大部分战败的法军会退到这里，并以不断向敌人攻击的方法进行防御，而敌人由于企图包围该城，在其不得不占领的长长的战线上的各点的兵力不可避免地会减弱。所以巴黎工事本身的抵抗力并不很大，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事先根据现在波拿巴主义者的战略的错误所造成的这种情况来采取措施，那就会使工程费用大量增加，而防守的时间未必会因此而延长两个星期以上。此外，在被围攻期间或被围攻前构筑土质工事也可以大大加强要塞工事。而麦茨的情形完全不同。它是科尔蒙太涅以及上一世纪其他许多卓越的工程师遗留给现代的一个有着很坚固的防御工事的要塞。第二帝国为了使它甚至能防御线膛炮的轰击，并

使整个要塞变成一个仅次于巴黎的巨大营垒，又在它的周围距市中心 2.5—3 英里的地方增设了 7 个很大的独立堡垒。因此，即使麦茨城内只有一般的战时守备部队，对它的围攻也会是很长时间的战斗行动。但是，现在在这些堡垒的掩护下有 10 万人，因此围攻麦茨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仍然为法军控制着的地区一直伸展到堡垒线以外整整 2 英里处；要把法军击回堡垒线以内并夺取挖掘堑壕所需的地区，就要进行一系列只有在塞瓦斯托波尔才见过的那种白刃战。假定守军不因频繁的战斗而士气沮丧，而围攻军也不因损失大量兵员而削弱，那末战斗就可能持续许多月。正因为如此，德军没有打算进行正规围攻，而是力图用饥困的方法迫使这个要塞投降。只要严密封锁，那末城内的 10 万大军和大约 6 万市民以及逃到堡垒线以内避难的大量乡村居民，迟早总会吃完贮粮。甚至也可能在这以前就会由于守军的士气沮丧而交出要塞。当一支军队看到自己被紧紧包围，而突破包围圈的一切尝试全归无效，得到外援的一切希望也都破灭的时候，即使最好的军队也会在显然仅仅是为了保持军旗的荣誉而不得不忍受的苦难、匮乏、困难和危险的折磨下，逐渐失去纪律和团结精神。

有一个时期，我们曾徒劳无益地力图寻求这种军心涣散的征候。麦茨城内的贮粮比人们估计的要多得多，因而麦茨的军队有够吃相当长时期的粮食。不过贮粮虽然很足，看来质量却很坏，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贮粮对军队来说只是偶然遗留在城内的物资，而根本不是为了现在这个目的而准备的。因此，兵士的食物最后变得不但不合他们的习惯，而且完全不符合标准，并引起了各种疾病；由于这些致病的原因的影响日益加强，疾病也日益严重。看来封锁的这一阶段现在已经到来了。麦茨所缺乏的物资包括面包

(法国农民的主要的和习惯的食物)和食盐。食盐是保持健康所绝对必需的,而因为法国人几乎只靠面包来供给淀粉以增加脂肪,所以面包也和食盐一样是绝对必需的。由于兵士和居民被迫以肉食为主,据说已发生痢疾和坏血病。虽然我们不能过于相信逃兵的供词,因为逃兵通常所说的都是他们认为可以讨好于俘获他们的人的话,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事情也必然是这样。不言而喻,由于这个原因,军心涣散的可能性会迅速增大。

呆在麦茨附近的一位很有才干的“每日新闻”记者,在报道10月7日巴赞出击的情形时写道,在法军占领圣埃鲁瓦堡垒(位于麦茨以北,在摩塞尔河谷内)以北的几个村庄以后,便在河旁靠近自己右翼的地方组成了一支不下3万人的部队,向德军前进。这个纵队或者这个由几路纵队组成的部队的使命显然是突破包围圈。完成这样的任务需要极大的决心。这些纵队必须直接进入那些集中火力射击他们的部队和炮队所排成的半圆形内;在与敌人大部兵力直接接触以前,敌人的火力是会不断加强的,而那时,如果法军能够击溃敌人,敌人的火力马上就会大大减弱,但是如果他们被迫退却,那就会再次遭到敌人同样的交叉射击。兵士们看来是懂得这一点的;此外,对于这次需要全力以赴的战斗,巴赞大概使用了 he 最好的部队。但是据说这些部队甚至没有到达大部分德军的步枪射击范围以内。他们在到达危险点以前,敌人的炮兵和散兵线的火力便打乱了他们的队形:“密集的纵队起先是动摇,接着便溃散了”。

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那些在维昂维耳、格腊韦洛特会战以及最近各次出击期间,无论在猛烈的火力下或白刃

格斗中都能勇敢作战的人们有这样的表现。看来,这种甚至没有能力试图认真完成所受领的任务的情况证明,麦茨的军队已不是从前的军队了。这可能还不是军心涣散的征候,而只不过是说明士气低落、悲观失望,说明他们感到任何尝试都已徒劳无益。但是这种情况离真正的军心涣散已经不远了,对于法国兵士来说尤其如此。虽然根据这些征候就预言麦茨将很快陷落还为时过早,但是如果我们不久以后还看不到麦茨防御力量减弱的其他征候,那毕竟是值得奇怪的。

麦茨投降比巴黎陷落对战争进程所产生的精神影响要小得多,但物质影响要大得多。如果巴黎被攻占,法国也许会屈服,但是这种必要性不会比现在更大。因为现在包围巴黎的军队绝大部分那时必须扼守这一城市和它的近郊,所以德军能不能抽出充分的兵力前进到波尔多,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麦茨投降,德军就可以抽出 20 万以上的兵力,而根据各地在要塞以外的法军部队的现状来看,这样一支军队是完全可以在这个无人防御的国土上长驱直入和为所欲为的。曾经被两个大营垒阻挡住的进一步扩大占领范围的行动立即就会重新开始,而现在可能是很有效的开展游击战的一切尝试,那时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

载于 1870 年 10 月 17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71 号

战争短评(二十四)

巴黎被围已整整一个月了。在这个期间,我们关于巴黎两个情况的预言^①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第一,巴黎无从指望任何法军及时前来解围。在卢瓦尔军团内骑兵和野战炮兵极为不足,而步兵除极少数以外,不是新编的部队,便是士气沮丧的老部队,军官配备不齐全;这些部队完全没有团结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他们在平地上同冯·德尔·坦恩率领的那些老练的、为不断的胜利所鼓舞的兵士交锋。即使卢瓦尔军团增加到10万或者12万人(这在巴黎陷落以前还可能作到),它也无济解围。德军依靠骑兵和野战炮兵的巨大优势(只要攻城炮兵纵列及其人员一到巴黎,就可从巴黎城下大量地抽调骑兵和野战炮兵),以及依靠自己的步兵在质量方面的优势,可以有把握地用少数的兵力来迎击这样的军队。此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可能把现在巴黎以东和以北50—60英里的地区进行扫荡的部队以及包围部队中的一两个师暂时派去增援冯·德尔·坦恩。至于说里昂军团,如果它还有什么部队确实存在的话,那末他们全部都将忙于对付韦德尔将军的北德意志第十四军(现在厄比纳尔和维祖耳)和在第十四军后面或右侧前进的第十五军。由布尔巴基指挥的北方军团还没有编成。就现有的全部

^① 见本卷第130—131页。——编者注

消息来看,诺曼底和皮卡尔第的流动自卫军极端缺乏军官并且训练很差;而地方国民自卫军,可能还有大部分流动自卫军,则用来担任集中在梅济埃尔和哈佛尔之间 25 个或更多的要塞的守备任务。因此,从这方面未必可以指望得到有效的援助,巴黎也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了。

第二,现已了解清楚,巴黎的守备部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这支守备部队的成分和巴黎以外的军队相同,它同样缺少骑兵和野战炮兵。9月19日和30日以及10月13日的三次出击,完全证明了他们无力给包围部队以稍微严重的打击。据包围部队说:“法军就这样连我们的第一线也没有能够突破。”虽然特罗胥将军公开声明,他所以不愿意在平地上攻击敌人是因为缺乏野战炮兵,并且他在没有得到足够的野战炮兵以前,是不会再走出要塞的,但是他不可能不知道,世界上任何野战炮兵都不能防止他第一次 en masse(大规模)出击的惨败的结局。但是到了他的野战炮兵准备就绪——如果这不是单纯的借口的话——的时候,德军炮队轰击堡垒的炮火和紧闭的包围圈将使它无法在平地上使用。

看来,特罗胥和他的司令部对于这一点非常清楚。他们的一切措施都说明是单纯的消极防御,除了为满足无法约束的守备部队的坚决要求而必须进行出击以外,已不进行任何大规模出击了。垒墙不可能长期经受德军重炮的轰击,关于这些重炮,将在下面较详细地谈到。可能会像柏林参谋部所期望的那样,两三天的时间就足以击毁南面各堡垒垒墙上的火炮,在远距离上用间接射击的方法破坏护堡壕内岸一两处石砌部分,然后对堡垒进行强攻,而配置在制高点上的炮队采用火力阻止堡垒后面的工事给堡垒有效的支援。无论是堡垒的结构或是地形对此都不会有丝毫妨碍。巴黎周

围所有堡垒的护堡壕的内岸，即垒墙的外侧，都是只在地平面以下的部分才用石砌，通常认为这是不足以使工事预防用云梯进行强攻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从军队将经常用积极的方法防御巴黎这个设想来看是合乎情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甚至可能还是一个优点，因为对低处的石砌部分，炮队从观察不到的地方进行间接射击是很难命中的。因此，如果只从炮队所在的高地不能以曲射火力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要在远距离上打开缺口就更加困难了；不过，这只有在现地才能做出判断。

无论如何，不应期望南面的这些堡垒在高地的瞰制下并在重型线膛炮最有效的射程内能进行长期抵抗。不过，守备部队主要还在这些堡垒的紧后面，在堡垒和要塞围墙之间，发挥了积极性。这里到处都构筑了许多土质工事；虽然不言而喻，我们不了解它们的全部详情，但可以相信，它们的设计和施工都非常周密，有预见性，而且很巧妙，法国工程师们就因这一切而在两百多年来一直名列前茅。显然，这里正是防御者选来作战的地方，这里的雏谷和丘陵斜坡，以及大多为石质建筑物的工厂和村庄，可减轻工程作业，也有利于只经过一些训练的新编部队进行抵抗。我们认为，正是在这里德军将要进行最艰巨的工作。的确，我们从“每日新闻”上的柏林消息得知，德军满足于占领一部分堡垒，而用饥困的办法来完成其余的任务。但是我们认为，只要他们不炸毁堡垒，不重新退到他们现在的阵地上，而仅仅进行围困，那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竟然这样做，那末法军就能够利用反接近壕逐渐夺回失地。因此我们估计，德军的企图是扼守所有能攻占的堡垒作为适合的炮兵阵地以进行射击，用流弹恐吓居民，或者用他们所有的火炮进行最猛烈的轰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无法避开防御者在选定的和为

此准备的地区内对他们的挑战,因为那些堡垒将处在新工事的近距离有效火力范围以内。在这里,我们可能会亲眼看到这次战争中有某种研究价值的、对于军事科学甚至可能是最有意义的最后一次搏斗。在这里,防御者将重新有可能发动攻势(虽然其规模较小),并借此恢复一定程度的均势,延长抵抗的时间,直到迫于饥饿而投降为止。因为我们应当注意到,巴黎已经用去了一个月的贮粮,而巴黎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再维持一个月以上的贮粮。

关于德军的攻城炮,看来在“特派记者”中存在着很大的概念上的混乱。如果注意到德军炮兵各种口径的火炮的命名所根据的原则至少和英国所根据的原则同样荒谬和互相矛盾的话,那末这就完全可以理解了。现在,当这些重炮随时都可能开火的时候,大概应当对这个问题稍加说明。在斯特拉斯堡城下使用的旧式攻城炮有二十五磅臼炮和五十磅臼炮,这些炮现在已调到巴黎附近。它们是根据与炮膛直径相适应的球形石弹的重量来称呼的。其中一种口径大约为 $8\frac{1}{2}$ 英寸,另一种为 $8\frac{3}{4}$ 英寸,而现在发射的球形炮弹的实际重量,前者为 64 磅,后者为 125 磅。其次,还有一种口径为 21 厘米即 $8\frac{1}{4}$ 英寸的线膛臼炮,它发射的长炮弹长 20 英寸,重量略大于 200 磅。这些臼炮所以有巨大的效能,不仅是因为膛线使炮弹具有更大的命中率,而且主要是因为这种着发性的长炮弹落下时,其较重的、装有着发信管的头部总是朝前,能保证装药在弹体同目标接触的瞬间爆炸,因而冲击力和爆炸力能够同时发生作用。在那里的线膛炮有十二磅加农炮和二十四磅加农炮,这是根据膛膛未加膛线以前通常发射的球形实心弹的重量来称呼的。它们的口径分别约为 $4\frac{1}{2}$ 英寸和 $5\frac{1}{2}$ 英寸,其炮弹的重量各为 33

磅和 64 磅。此外,还有一些重型线膛炮已运往巴黎,这些炮是用在装甲舰上和用在海岸防御中对付装甲舰的。关于这些炮的构造的准确而详细的情况从来没有公布过,但它们的口径为 7、8 和 9 英寸,炮弹重量相应地约为 120、200 和 300 磅。在塞瓦斯托波尔双方使用过的最重的火炮是英国的六十八磅海军炮、8 英寸和 10 英寸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以及法国的 $8\frac{3}{4}$ 英寸和 12 英寸的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而最重的 12 英寸球形炮弹重约 180 磅。因此,就使用的炮弹的重量和数量而言,巴黎的围攻将超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就像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超过以前的一切围攻一样。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德军攻城炮兵纵列的火炮数量将如我们所料,大约为 400 门。

载于 1870 年 10 月 21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75 号

萨拉哥沙——巴黎

为了对于巴黎的围攻和防御这样大规模的作战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应当回顾一下战争史，看看过去哪一次大规模的围攻可以（哪怕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我们可能将要见到的情形的先例。如果巴黎的防御是在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如果像塞瓦斯托波尔尔那样有野战部队前来援助或加强守备部队，那末塞瓦斯托波尔尔就可以作为这样的例子。但是，巴黎却是在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防御的：它既没有能够进行积极防御和野战的守备部队，也没有获得外援的可靠的希望。因此，历史上最大的塞瓦斯托波尔尔围攻（其规模仅次于我们即将看到的围攻），不能对将要在巴黎发生的情形提供正确的概念；而只有在围攻的较后阶段，并且主要是通过对照，才可以同克里木战争中的事件相比较。

美国战争⁸⁰时期的历次围攻也不是合适的例子。这些围攻发生在战争的这样的时期，即不但南军，而且连北军也随南军之后失去了未经训练的民军的特点，并具有了正规军的性质。在所有这些围攻中，防御都是非常积极的。无论在维克斯堡或在里士满，在围攻之前都进行过长时间的战斗来争夺所有能配置攻城炮队的地区，并且除了格兰特对里士满的最后一次围攻外，都有增援被围者的尝试⁸¹。但是，在巴黎这里，我们看到的守备部队却是些新兵，他们只得到分散在城外的同样一些新兵的微弱支援，而攻击他们的

是一支使用一切现代战争手段的正规军。要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我们就必须回头看一看武装的民众不得不对正规军作战并且确实进行了大规模战斗的最近一次战争,即比利牛斯半岛战争。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在许多方面看来都合适的极好的例子,这便是萨拉哥沙。

萨拉哥沙的直径仅为巴黎的三分之一,它的面积仅为巴黎的九分之一,而它的防御工事虽然是仓卒构筑起来的,并且没有独立堡垒,但就其总的防御能力来说却和巴黎的防御工事相似。萨拉哥沙的守备部队有 25000 名西班牙兵士,他们是在土德拉附近战败后退到这里来的⁸²,其中真正的基干部队兵士不超过 1 万人,其余都是新兵;此外,还有武装的农民和当地居民,他们使萨拉哥沙的守军增加到 4 万人。城内有 160 门火炮。在城外,在邻近的各省集聚了约 3 万人,准备前来援助。另一方,法国元帅苏舍以不超过 26000 人的兵力沿埃布罗河两岸包围这个要塞,另以 9000 人在卡拉太尤德掩护围攻。因此,双方的兵力对比与目前巴黎城内外双方的兵力对比几乎相同,即被围的军队比围攻的军队几乎多一倍。但是,萨拉哥沙人也像目前巴黎人一样,没有能力出来在平地上迎击围攻者。在被围的萨拉哥沙城以外的西班牙人,也没有一次能有效地破坏围攻。

对城市的包围在 1808 年 12 月 19 日完成;到 29 日,就得以在距要塞主墙仅 350 码的地方挖掘了第一道平行壕。1809 年 1 月 2 日,在距要塞主墙 100 码的地方挖掘了第二道平行壕;11 日就打开了缺口,并且以强攻夺占了整个被攻击的正面。但是当时,在由正规军防守的平常的要塞停止了抵抗的地方,人民的抵抗行动刚刚开始。法军强攻的那一部分要塞围墙同城市的其余部分被防守

者用新构筑的防御工事隔开了。横贯所有通往围墙的街道，都迅速地筑起了土质工事，由炮兵防守，并且在它们后面的一定距离上也筑起了工事。在具有炎热的南欧的厚实建筑物风格、墙壁极厚的房屋内，开了射孔，因此步兵坚定地扼守了这些房屋。法军曾不断地进行炮击，但是因为他们的重型白炮很少，所以对城市并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如此，炮击还是连续进行了41天。为了迫使城市投降，为了逐一占领房屋，法军不得不采取最慢的方法——埋放炸药。最后，到了城内三分之一的建筑物都被毁坏，而剩下的房屋也不能居住的时候，萨拉哥沙于2月20日投降了。在被围初期城内原有的10万人中，牺牲了54000人。

这次防御从某一点上说是卓越的，所获得的荣誉完全当之无愧。但是，这个城市毕竟总共只抵抗了63天。包围用了10天，围攻要塞用了14天，围攻城内工事和争夺房屋用了39天。牺牲的人数同防御的持续时间和实际取得的结果对比，无论如何是不相称的。如果萨拉哥沙有2万精兵防守，那末他们的出击就会阻止苏舍以他现有的兵力继续围攻，而要塞就可能留在西班牙人手里直到1809年奥地利战争⁸³结束时为止。

我们当然不认为巴黎会成为第二个萨拉哥沙。巴黎的房屋无论怎样坚固，在厚实程度上都不能同这个西班牙城市的房屋相比；我们也没有根据设想巴黎居民会表现出1809年西班牙人那样的狂热，或半数居民会甘愿战死或病死。但是，在萨拉哥沙要塞围墙被攻破后，在市区的街道上、房屋内和寺院内展开的那种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在巴黎的堡垒和城墙之间的筑垒村庄和土质工事内再次出现。正如我们昨天在“战争短评（二十四）”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看来这里是防御的重心。在这里，缺乏经验的流动自卫军甚

至可以在几乎是均势的条件下迎击进攻的敌人，并且迫使他们采取比柏林参谋部显然想像的更为正规的行动，因为柏林参谋部还在不久以前曾指望在攻城炮队开火后 12 天或 14 天就迫使巴黎投降。此外，在这里同防御者作战，就需要进攻者如此充分地使用臼炮和发射爆炸弹的加农炮，以致即使对城市进行局部的（但至少是大规模的）炮击，在一定时期内也可能是无法想像的。在任何情况下，要塞围墙以外的村庄，不论位于德军攻击正面和法军防线之间的哪个地点，都将不得不牺牲。如果牺牲这些村庄可以保存城市的话，那末这对于防御说来就更好了。

我们甚至无法大概说出，要塞围墙以外的地区可以防守多久。这将决定于那里的工事本身的坚固程度，防御者的士气以及敌人的攻击方法。如果抵抗坚决，德军为了保存兵力，将主要依靠炮兵的火力。由于德军能够向任何一个地点集中猛烈的炮火，他们要进到要塞围墙下，无论如何未必需要超过两三个星期。破坏并用强攻夺取要塞围墙将是几天的事情。不过，即使到了那时，防御者也没有停止抵抗的绝对必要；但是，关于这些可能性最好是等到它们更接近于现实的时候再来研究。在这以前，我们也不谈罗什弗尔先生的街垒⁸⁴的优缺点。总之，我们认为，如果利用堡垒和要塞围墙之间新筑的工事进行真正坚决的抵抗，那末进攻者将限于尽可能（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防御者的力量）用炮兵进行曲射和直射，以及试图用饥困的办法迫使巴黎投降。

载于 1870 年 10 月 22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76 号

战争短评(二十五)

当停战谈判⁸⁵正在进行的时候,分析一下德军各军的部署也许是适宜的,因为看来这种部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了的。所以我们谈德军,是因为关于法军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法军除了那些被围困在麦茨的部队以外,几乎全是新兵。关于他们的组织情况报纸上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消息,而这个情况不可能不天天在变化。此外,这些部队在历次战斗中都表明或多或少地不适于离开要塞作战,这种素质使得关于他们的组织和人数的问题,几乎毫无意义了。

至于德军,我们知道,他们出动了北德意志的 13 个军(包括近卫军)、黑森的 1 个师、巴登的 1 个师、维尔腾堡的 1 个师和巴伐利亚的 2 个军。北德意志第九军第十七师(其中 1 个旅由梅克伦堡人编成)在法国舰队离开波罗的海以前,一直留在沿海地带。代替这个师而编入第九军的是第二十五师即黑森师,它直到现在还在这个军的编成内。同第十七师一起留在国内的,还有后备军 9 个师(其中 1 个是近卫师,其余是普鲁士 8 个旧省⁸⁶的各 1 个师;自从 1866 年普鲁士的制度在整个北德意志实行以来的这段时间,刚足以在那里训练出必要数量的预备兵,但暂时还不足以训练出后备军)。当法国舰队被召回,以及第四基干营补充完毕的时候,便有可能使用这些兵力;他们被编成了新的军,派往法国。在战争结束以

前,我们未必会得知所有这些军的编成的详情,但是迄今所知道的使我们对兵力部署计划的总的性质有了相当明确的概念。在麦茨附近,有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所统率的第一、二、三、七、八、九和第十军,其中第九军现在是由第十八师和第二十五师编成的;此外,还有后备军的2个师,其中1个师是库梅尔将军指挥的第一师(东普鲁士师),另1个师番号不明。在那里共计有16个步兵师。

在巴黎城下,有王储所统率的北德意志的第五、六、十一军,巴伐利亚的2个军和后备军的1个近卫师,萨克森王储所统率的北德意志的第四军和第十二军和普鲁士近卫军,梅克伦堡大公所统率的第十三军和维尔腾堡的1个师。第十三军由上面提到过的第十七师和后备军的1个师编成。在这支共计20个师的军队中,有4个师被派去执行单独的任务。首先,冯·德尔·坦恩率领巴伐利亚的2个师和北德意志第二十二师(属第十一军)向南部和西部进军,以使用他的巴伐利亚部队扼守奥尔良和卢瓦尔河一线;与此同时第二十二师(由维提希将军指挥)先后占领了夏托登和沙特尔。其次,第十七师被调往巴黎东北,占领了郎城、苏瓦松、博韦、圣昆廷等地。而其他部队——显然是多半由骑兵组成的游动队——几乎进到了卢昂的门口。如果我们认为他们的兵力也相当1个师,那末就会看出,从巴黎城下的军队中共计抽出了5个师去扫荡各地,征集牲畜和粮秣,防止建立武装部队,并且把现在图尔政府⁸⁷可能派出的任何新的部队远远地阻挡住。这样,实际用于包围的还有15个步兵师,即7个半军。

梅克伦堡大公除了指挥第十三军外,还指挥香槟省和洛林以西其他占领区内的所有独立作战的部队,色当、兰斯、埃佩尔讷、夏龙和维特里的守备部队以及围攻凡尔登的部队。后者是由后备军,

主要是后备军第八师编成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守备部队几乎全是后备军,分别归这两个省的军事总督指挥。此外,还有在铁路和大路沿线配置的部队,他们的唯一责任就是维护这些道路完好以利军事运输。这些部队是由各基干军派出的兵力组成的,其人数至少相当于1个师,由《Etappen-Commandant》(“兵站司令”)指挥。

巴登师和另一个后备军的师组成第十四军,这个军在韦德尔将军指挥下现正向伯桑松前进,与此同时,施美林将军率领第四预备师刚刚胜利地结束了对塞累斯塔的围攻,现在正开始夺取讷布里扎克。我们在这里第一次遇到“预备师”的提法,在普鲁士的军语里,预备师同后备军的师的概念是有重大差别的。事实上,在后备军的9个师中,到现在我们已知道6个师的去向,并且完全可以推测,其余3个师被用作阿尔萨斯、洛林和莱茵河一部分要塞的守备部队。“预备师”这个术语的使用,证明各基干团的第四营现已逐渐开入法国领土。每个军有9个,有时是10个第四营;它们合编为预备师,这些师的数量与军的数量相等,而且所用的番号大概也与所属的军相同。由此可见,第四预备师是由在普鲁士的萨克森补充的第四军各第四营编成的。这个师是新编的第十五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军的另一个师是哪个师,我们不知道,——也许它就是勒文费耳德将军所率领的刚从西里西亚出发前往斯特拉斯堡的3个师中的1个;这样,其余2个师就编为第十六军。这用去了13个预备师中的4个师,其余的还可以使用的9个师可能在北德意志。

至于这些部队的人数,在巴黎城下的北德意志各营,无疑地又平均补充到750人;巴伐利亚各营的人数,据报道则较少。骑兵每

连原为 150 人，现在平均未必超过 100 人；总之，在巴黎城下的每个军平均为 25000 人，这样，实际在那里的全部军队共约 19 万人。在麦茨城下的各营，由于病员很多，人数可能少些，平均未必能有 700 人。后备军各营的人数恐怕不到 500 人。

最近，波兰报刊开始把普军很大一部分荣誉说成是波兰人的。实际情况是：普鲁士操波兰语的居民总数约为 200 万人，即占北德意志全部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这里我们还把上西里西亚的“水上波兰人”和东普鲁士的马祖尔人⁸⁸也包括在内，而他们听到自己被称为波兰人，是会大吃一惊的。第一、二、五、六军夹杂有波兰兵士，但是波兰人实际上仅仅在第五军的一个师、还可能在第六军的一个旅里占大多数。普鲁士政府的政策，是尽量把军队中的波兰人分编到许多军里。这样，西普鲁士的波兰人便分编在第一军和第二军，而波兹南的波兰人则被分编在第二军和第五军，而且德军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使每个军的兵士大多数为德国人。

现在，对凡尔登的围攻正在紧张地进行。城市和卫城的工事虽不十分坚固，但是有很深的、灌满了水的护城壕。10 月 11 日和 12 日，守备部队被逐出了要塞周围的村庄，于是包围就完成了；13 日，配置在距工事 700—1300 码的地方的 48 门加农炮和白炮（在色当缴获的法国炮）开始了轰击。14 日，从色当调来了一些旧式的法国二十四磅炮；次日，又调来了一些曾用以攻占土尔的新式的普鲁士二十四磅线膛炮。18 日，这些火炮全部开火。城市由于建筑物非常密集，看来遭到了严重破坏。

载于 1870 年 10 月 27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80 号

麦茨的陷落

目前的战争是投降的战争，其中每次投降在规模上好像注定要超过前一次。起初是 84000 人在色当缴械投降，而与这相同的，或者甚至有点相似的事件，在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甚至在奥地利的历次战争中都没有见过。现在发生了 17 万人同麦茨要塞一起投降的事件，这超过了色当，就像色当超过以往历次投降一样。麦茨是否还要被巴黎超过呢？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那末这一点几乎可以不用怀疑。

有三个基本错误把拿破仑从 8 月 2 日引导到 9 月 2 日，由萨尔布吕肯引导到色当，并使法国实际上丧失了全部军队，这些错误就是：第一，法军在迎击敌人的进攻时所处的阵地，使获胜的德军能够楔入法军分散的各军之间，结果把法军割裂为两支独立的部队，并使它们彼此不能会合，甚至不能配合作战；第二，巴赞军团在麦茨行动迟疑，结果被紧紧地围困在那里；第三，援救巴赞所用的兵力和所沿的路线，简直是唆使敌人俘掳全部援军。第一个错误的后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个错误的后果，在色当充分表现出来了；第二个错误的后果，我们刚刚在麦茨看到。拿破仑曾经给“莱茵军团”安排了在遍设要塞的国土上艰苦奋战的前景，现在他们全部正是在这些要塞内或在前往这些要塞的途中，不过已经身为战俘了，而法国不仅是在实质上，而且是不折不扣地丧

失了几乎所有的正规军。

兵员的损失和随麦茨一起交出的物资方面的损失（数量想必是巨大的）本身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最沉重的打击。对法国来说，最坏的是连同这些人员和物资一起还丧失了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需要的那个军事组织。法国有大量的兵员，甚至受过训练的 25 岁到 35 岁的人也不下 30 万。物资可以从国内仓库和工厂调拨以及向国外购买来补充。在现在的情况下，任何能用的后装枪都可以使用，不管它的构造怎样，也不管一种枪的弹药是否适用于另一种。如果政府有效地利用电报和轮船，并且愿意使用一切有用的东西，那末现在就可能握有比所能使用的还要多的武器和弹药。在这个期间甚至还可以得到野炮。然而，最需要的还是能够把所有这些武装的人员组成军队的坚强的组织。这个组织体现在正规军的军官和军士的身上，而在他们缴械以后，利用这个组织的可能性就会最终消失。法军因战斗伤亡和投降而减少的军官人数目前不会少于 10000—12000 人，军士的损失大约要多两倍。在这样数量的组织力量一下子从国防体系中失去以后，要把一群普通人变成整连整营的兵士，那是极端困难的。谁要是见过民众队伍——无论是巴登的 Freischaaren，在布尔河作战的扬基志愿兵，法国的流动自卫军或是不列颠志愿军⁸⁹——的操练或战斗，谁就会立刻明白，这些军队无能和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军官不了解自己的职责；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法国有谁能教会他们执行自己的职责呢？为数很少的领半薪的退役的或残弱的老军官是不足以实现这个目的的；他们也不可能用在一切场合；须知训练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的；训练不仅要靠讲解，而且要靠动作和示范。各营为数不多的新军官或刚刚提升的军士，如果经常

观察老军官的动作，那末很快就会熟悉自己的职务。但是，如果几乎所有的军官都是新的，甚至连可以提升为军官的老军士也很少，那将怎么办呢？目前那些几乎在每次战斗中都表明不适于以大集团进行野战的兵士，如果能编入巴赞原来的营，或者哪怕是仅由巴赞的军官和军士来指挥，就会很快学会作战。而法国在这次战争中把几乎最后残存的军事组织丧失得一干二净，主要是由于麦茨投降。

关于防御的情形，我们只有在听到防御者自己的说明以后，才能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是，如果真的有 17 万能拿武器的人投降了的话，那末可以推想防御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从 8 月底以来，包围军从来没有两倍于被围军队的兵力。包围军的人数看来在 20—23 万人之间，同时仅仅第一线的部队就分布在周长不下 27 英里的包围圈上。这就是说，主力一定要占领周长至少为 36—40 英里的包围圈。此外，这个圆圈被摩塞尔河分为两部分，而这条河只有经过第一线后面一定距离内的桥梁才可以渡过。如果说这支 17 万人的军队无论在这个圆圈的哪一点都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在敌人足够数量的援兵到达以前进行突围，那末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或者包围军的部署值得特别赞扬，或者是被围者从来没有尽力设法突围。我们大概会了解到，目前也像整个这次战争一样，政治上的考虑使得军事行动陷于瘫痪。

如果现在不缔结和约，那末法国不久就将感受到这个新的灾难的后果。我们估计，德军将留下后备军 2 个师作为麦茨的守备部队。第二军已在前往巴黎的途中，但这决不是说，这个军将参加对首都的包围。然而即使它参加包围，毛奇可以向任何地点调动的兵力仍然有 6 个军，即至少有 13—14 万人。军队同德国的交通线不

需要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派遣许多部队就可以维持；为了这个目的，他只需派遣少数兵力，如果一般地说还有这种需要的话。其余的兵力可以用来侵入法国西部和南部。全部兵力集中在一起是不必要的。他们可能将分为两三部分，这同冯·德尔·坦恩的军合在一起至少有 15 万人，并且可能奉命向法国那些迄今尚未被德军占领的地区进军。一个军几乎无疑地一定以 5 条铁路线的会合点勒芒为中心，占领富庶的诺曼底省和曼恩省，直到卢瓦尔河为止。另一个军将在肃清卢瓦尔河上从图尔到涅维尔一线的敌人，并占领或破坏布尔日的军火库和兵工厂以后，向波尔多方向挺进。这个军可能从麦茨出发，路经尚未征发一空的肖蒙和奥塞尔。第三个军可能径直向南前进，以便同韦德尔将军取得联系。因为法国内地几乎完全没有名副其实的要塞，所以在这里除了新兵短暂的抵抗和民众比较消极的但又比较顽强的抵抗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全抵抗了。至于毛奇是企图用这些一下子腾出来的全部军队去围攻更多的要塞还是甚至攻占像瑟堡这样的要塞军港，这要将来见分晓；现在，除了控制铁路干线的法耳斯布尔和伯尔福——当然还有巴黎——以外，他是不需要夺取更多的要塞的。

载于 1870 年 10 月 29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82 号

战争短评(二十六)

现在已没有任何理由再怀疑,在麦茨投降的军队确实是173000人,其中14万人是能拿武器的,3万多人是病号和伤员。“每日新闻”在来自柏林的电讯中报道了据该报说是关于这些军队编成的全部详情的消息:67个步兵团,13个 chasseurs-à-pied (猎步兵)营,18个第四营和后备营,36个骑兵团,其中有10个胸甲骑兵团,1个吉德⁹⁰团,11个龙骑兵团,2个枪骑兵团、3个骠骑兵团、6个 chasseurs-à-cheval (猎骑兵)团和3个 chasseurs d'Afrique (非洲猎兵)团,此外还有6个后备骑兵连。大概这个消息来自柏林的普军参谋部,并且综合了麦茨的法军兵力编成的情况,这个综合报告不是根据预先的、间接的材料便是根据法军在投降时交给战胜者的清册做出的。后者的可能性看来最大。我们知道,在麦茨曾有过以下的步兵部队:近卫军(8个团,即30个步兵营和1个猎步兵营)、弗罗萨尔的第二军(3个师)、德坎的第三军(以前由巴赞指挥,计4个师)、拉德米罗的第四军(3个师)、康罗贝尔的第六军(3个师)和德·法伊的第五军的1个师,共计14个基干师,其中除了康罗贝尔的2个师没有猎步兵以外,每个师的编制内都是1个猎步兵营和4个基干团(12个基干营)。这共计12个猎步兵营和168个基干营;加上近卫军,就有13个猎步兵营和198个步兵营;再加上18个后备营,总共有229个营。这要比“每日新闻”所报道的总

数 221 个营略多一些。另一方面，这里列出的只有 64 个步兵团，而我们上述报界同人报道的数字则为 67 个。从这里我们应该得出结论，所差的 3 个团是麦茨的警备部队，因此没有计算在“莱茵军团”的编制内。至于营的数目上的不一致，这是很容易解释的。许多团在 8 月的各次战斗中和 9、10 两月的各次出击中遭受的损失以及疾病所造成的减员，显然弄得不得不把 3 个营合编成 2 个营，甚至可能合编成 1 个营。

这样一支与莱比锡城下的拿破仑军队⁹¹同样庞大的兵力，竟会被迫投降，这是战史上前所未闻的事件，甚至在这一事件发生以后的现在，也是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支军队的兵力同胜利者的兵力作一对比，那末这就更无法想像了。8 月 18 日，巴赞由格腊韦洛特各高地被击退到麦茨堡垒的炮火掩护范围以内；几天以后，要塞完全被围。但是，曾在格腊韦洛特附近作战的德军中，有 3 个军共 75 个营拨归萨克森王储指挥；这至迟是 8 月 24 日的事情，因为 3 天以后他的骑兵在比桑西附近击溃了麦克马洪的 *chasseurs-à-cheval*。德军在麦茨附近只剩下 7 个军（175 个营）和后备军 12 个营，共 187 个营，以包围一支至少有 221 个营的军队！当时，巴赞一定有 16 万人，甚至更多。普军当然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他们的预备部队的生力军来弥补最近会战中的损失；但是不能设想他们的营又补充到了 1000 人的足额。纵然设想普军把这些营的人数补充到 1000 人（后备军则除外，每营编制只有 500—600 人），那末他们也不会超过 182000 人，或者再加上骑兵和炮兵，共约 24 万人，这就是说，仅仅比麦茨被围的军队多一半，同时，这 24 万人曾分散配置在一个长达 27 英里的战线上，而且他们还被一条无法徒涉的河流分为两个单独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不容怀疑，如果

巴赞真正试图以他的大量军队突围的话,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除非真的设想法军在格腊韦洛特会战以后已经不再是从前那样的法军了,而这样设想是没有任何理由的。

在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巴赞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放弃了从麦茨突围的打算,这在本“短评”的笔者看来是毫无疑问的。每天的拖延减少了他在这方面成功的希望,这也是无疑的,虽然现在普军自己好像认为,如果他们处于这种境地,他们是能够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的。但是仍然令人莫解的是巴赞在8月底和9月初的无所作为或者至少是犹豫不决。8月31日,他曾试图向东北方向进攻,并且在当天整个夜间和第二天早晨仍然继续进攻;但是,普军3个师却足以把他驱逐到堡垒的炮火掩护范围内。如果注意到他所能用以进攻的大量的兵力,那末,这次进攻看来是非常无力的。一位统率着16个师的精锐步兵的将军,居然被敌军3个师击退,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么!

至于谈到那些据说使巴赞在9月4日革命以后无所作为的政治上的理由以及他在被围的后期在敌人的纵容下所参与的政治阴谋⁹²,那末它们是完全符合于第二帝国的利益的,因为它们的目的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恢复这一帝国。如果一位指挥当时法国仅有的一支正规军的将军竟会想到在侵入本国的敌军的帮助下恢复已复灭的王朝,那末这只能说明,第二帝国对于法国人的性格的无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巴赞以往的军事生涯绝不是光彩的。他的墨西哥远征⁹³仅仅证明,他关心奖赏甚于关心本国的荣誉和威望。他被任命为莱茵军团总司令完全出于偶然;他获得这个职位不是因为他是可能的人选中最适合的,而是因为他不是最不合适的一个;决定性的理由不

管是什么,总之不是纯军事的。巴赞将成为一个遗臭万年的人物,他在法国的战史上干下了最可耻的行径:阻碍了 16 万法军去突破当时在人数上肯定少于他们的德军的包围,并且在断粮时把他们作为战俘献给了敌人。

载于 1870 年 11 月 4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87 号

法皇的辩白

如同其他遭到不幸的伟大人物一样，路易一拿破仑好像也意识到，他必须向公众说明那些使他不得不完全违背自己的意志由萨尔布吕肯退到色当的原因；因此，我们现在获得了一份应当看作是他的说明的材料⁹⁴。既然无论从文件本身还是从外在情况来看都没有任何根据怀疑这份文件是伪造的，——不如说是相反，——那末我们此刻认为它是真实的。而且，仅仅出于礼貌也几乎应当这样做，因为如果说有过哪一个文件既在整体上又在细节上证实了“派尔一麦尔新闻”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的话，那末这就是法皇的这个自我辩白了。

路易一拿破仑告诉我们，他深知德军在兵力上的巨大优势，他曾经希望用下面这个方法来抵销这个优势，那就是迅速攻入南德意志，迫使南德意志保持中立，并依靠最初的胜利来保证他同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盟。为此，15万人应当集中在麦茨，10万人集中在斯特拉斯堡，5万人集中在夏龙。前两支迅速集中的军队预计在卡尔斯卢厄附近渡过莱茵河，同时夏龙的5万人应当向麦茨前进，以对付敌人向进攻军队的翼侧和后方采取的任何运动。但是当法皇刚到达麦茨的时候，这个计划便成为泡影了。他发现那里只有10万人，斯特拉斯堡只有4万人，而康罗贝尔指挥的预备队到处都有，偏偏就是在他们应当在的夏龙没有。其次，军队没有行军最

必需的物品：背囊、帐篷、行军锅和饭盒。此外，对于敌人的位置又一无所知。事实上，大胆而迅速的进攻一开始就变成小心谨慎的防御了。

对于“派尔—麦尔新闻”的读者说来，上述这一切未必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们的“战争短评”曾经把上述进攻计划当作法国人所能采用的最合理的计划而概略地谈到过，同时还指出过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的原因^①。但是对于作为法皇最初失败的直接原因的那个情况，他却没有说明，那就是：他既然早已放弃进攻的意图，为什么还错误地把几个军留在边境附近的进攻阵地上呢？至于他所列举的数字，我们马上就会来作批判性的分析。

法皇认为法国军事指挥管理瓦解的原因是

“我们的军事组织存在着五十年来一直存在的缺陷”。

但是，这个组织经受考验现在确实不是第一次。在克里木战争中，它曾相当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意大利战争开始时，它曾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当时，在英国和德国，它被奉为军队组织的典范。没有疑问。甚至在那时，它已经出现许多缺陷了。但是，那时的军事组织和现在的军事组织之间有一个差别：那时它起作用而现在则不起作用。然而，法皇却不愿说明这个变化，虽然需要说明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因为第二帝国的最大弱点正是在这里，它以形形色色的营私舞弊的行为败坏了这个组织的机能。

当军队退到麦茨时，

“它的兵力在康罗贝尔元帅率领 2 个师和预备队到达以后增为 14 万人”。

^① 见本卷第 18—19、25—26 页。——编者注

在我们拿这个说法同不久前在麦茨缴械的军队人数对照的时候，便不得不更仔细地考察法皇所说的数字。斯特拉斯堡的军队原定由麦克马洪、德·法伊和杜埃的几个军组成，共计 10 个师，总数 10 万人；但是现在却说这支军队不超过 4 万人。即使我们把杜埃军的 3 个师完全撇开不谈（虽然其中有 1 个师在维尔特会战时或会战后曾前往援助麦克马洪），那末平均每个师（13 个营）也不到 6000 人，即每营仅有 430 人，何况一部分被编入骑兵和炮兵的人还根本没有考虑在内。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完全了解盛行贪污浪费的第二帝国，我们也不能强使自己相信，在征集预备兵和归休兵 20 天以后，这支军队会是 90 个这样的营，它们的战斗人员平均是 430 人，而不是 900 人。至于麦茨的军队，那末那里的近卫军和 10 个基干师共有 161 个营；即使我们假定小册子中所指的 10 万人仅仅是步兵，而完全不考虑一部分人被编入骑兵或炮兵，那末每营仍然不超过 620 人，这个数字无疑低于实际数字。更奇怪的是，这支军队在退到麦茨以后，由于康罗贝尔的 2 个师以及预备队的到来增加到 14 万人。因此，新增的兵力为 4 万人。然而，在施皮歇恩会战后到达麦茨的“预备队”只可能包括骑兵和炮兵（因为近卫军早已到达麦茨），所以它的人数不会超过 2 万人。由此可见，其余的 2 万人就是康罗贝尔的 2 个师，如以 25 个营计算，每营为 800 人，这就是说，根据这个计算，准备最不充分的康罗贝尔的各营反而比那些早已集中和准备就绪的各营人数要多得多。然而，如果说麦茨的军队在 8 月 14 日、16 日和 18 日这几次会战以前仅有 14 万人，那末除去这三天的损失（一定不下 5 万人），除去以后出击中的损失和因病死亡的人数后，巴赞怎么还能够向普军交出 173000 人当俘虏呢？我们所以要分析这些数字，只是想说明这些数字彼此矛盾，

以及与这次战争中众所周知的事实相矛盾。这些数字完全不确实，一下子就可以推翻。

除了军队组织以外，还有其他情况阻碍了皇帝之鹰飞向胜利。这首先是“恶劣的天气”，其次是“辎重的牵累”，最后是

“我们对敌军的位置和兵力常常一无所知”。

的确这是三个非常伤脑筋的情况。但是恶劣的天气对于双方都是一样的；要知道，国王威廉在所有他虔诚地说到天意的场合，从来都没有提到德军阵地上阳光普照，而法军阵地上阴雨连绵。此外，德军也不是没有辎重的牵累。至于不了解敌军的位置，那末这里有一封拿破仑第一给他哥哥约瑟夫的信，当时约瑟夫在西班牙也曾抱怨过同样的困难；这封信对发泄这类怨言的将军来说远不是称赞的信⁹⁵。信中提到，如果将军不知道敌人的位置，那末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且这只证明他们不了解自己的职责。当读到这一类替如此拙劣的指挥辩白的时候，人们有时会怀疑，这个小册子是否真的是写给成年人阅读的。

对于路易一拿破仑就他自己所起的作用的叙述，他的朋友并不十分高兴。在维尔特和施皮歇恩会战后，他“决定立刻把军队撤到夏龙兵营”。但是，这个计划起初虽经内阁同意，但两天以后又被认为“会对舆论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法皇在接到艾·奥利维耶先生(1)谈到这一点的信件后，便放弃了这个计划。他把军队带往摩塞尔河左岸，然后因为“没有预见到全面的会战而只估计到局部的冲突”，便离开军队前往夏龙。在他一离开后，就发生了8月16日和18日的会战，结果巴赞和他的军队被困在麦茨。与此同时，皇后和内阁越权背着皇帝召开了议院会议，而随着这个拥有非常权力的机构——阿尔卡迪亚村女⁹⁶的立法团——的会议的召开，帝国

的命运便被决定了。大家知道,包括 25 名议员的反对派掌握了全权,并且“麻痹了多数派的爱国心,并使政府有成效的活动陷于瘫痪”,正如我们大家所记得的,这里谈到的并不是伪善的奥利维耶政府,而是粗暴的八里桥政府。

“此后,大臣们好像害怕提起皇帝的名字;而他本人,在仅仅为了重握权柄而离开了军队并放弃了指挥权以后,不久便发现,要把他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已经不可能了。”

事实上,人们已向他示意:他实际上已被废黜,他已成为不能容忍的人了。许多有点自尊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退位的。但是不然,他的(说得温和点)犹豫不决还在继续;他跟随着麦克马洪军团,简直是一个累赘;他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巴黎政府坚持要麦克马洪去援救巴赞。麦克马洪表示拒绝,因为这无异于把他的军团派去送死;八里桥则坚持自己的主张。

“至于皇帝,他没有反对过这一点。他也不会想到去反对政府以及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这样的智慧和毅力的摄政后的意旨。”

这个人的温顺使我们感动,因为他 20 年来一直认为,服从他的个人意志是拯救法国的唯一途径,而现在,当“巴黎强迫执行违反兵法上最基本的原则的作战计划”时,他却没有反对,因为他似乎从来不会想到去反对如此等等的摄政后的意旨!

对实行这个致命的进军的军队状况的叙述,连一切细节都确实地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判断^①。其中只有一个说轻了的情况。德·法伊的军在强行军的退却中竟能不经过战斗而把“几乎全部辎重”丢光;但是,这个军好像没有估计到这个情况的全部好处。

^① 见本卷第 71、84 页。——编者注

8月21日,军团开往兰斯。23日,它进到贝特尼维耳(在直通凡尔登和麦茨的路上)附近的絮维普河。但是补给的困难迫使麦克马洪立刻折回到铁路线上;因此,24日军队折向左而到了勒太耳。在那里,25日整天用于给部队分配粮食。26日,司令部转移到东面12英里的土尔特隆;27日,又转移到更东6英里的勒申—波浦勒。在这里,麦克马洪发现德军8个军包围他,于是下令重新向西退却;但是当夜从巴黎来了坚决要他向麦茨进军的命令。

“毋庸置疑,皇帝本可以撤销这个命令,但是他决心不反对摄政的决定。”

这种崇高的温顺使麦克马洪不得不服从;于是,他在28日到达了东面6英里的斯通。但是“这些命令和反命令造成了运动的迟延”。在这时候,

“普军以急行军前进,而我们被辎重牵累(又一次!)^①,带着疲劳的军队花了6天才走了25里约^②”。

接着经过8月30日、31日及9月1日的战斗,于是遭到复灭,复灭的经过叙述得很全面,但是没有任何新的细节。然后,就是由此得出的教训:

“当然,这是众寡悬殊的战斗,但是,如果军事行动不是一直服从政治上的考虑,那末这个战斗也许会坚持得久些,给我军的灾难也会小一些。”

第二帝国的崩溃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的消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惋惜,——它的命运就是这样。人们通常给予遭到很大不幸的人的那种起码的怜悯心也丝毫没有给予第二帝国。甚至《hon—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

② 里约(lieue)是法国的旧长度单位,等于4.444公里。——译者注

neur au courage malheureux》(“对于失败英雄的尊敬”)——现在用法语说这句话的时候已不可能不带有某些讽刺的意味,——似乎也没有给予它。我们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能否从这个文件中得到很多好处。从这个文件来看,他那卓绝的战略远见每每因巴黎政府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发出的荒谬命令而化为乌有,而他那可以撤销这些荒谬命令的权力也由于他对摄政皇后的无限尊敬而化为乌有。关于这本少有的可怜的小册子所能说的好话,这就是它证实了“如果军事行动一直服从政治上的考虑”,那末战事一定不可避免地恶化。

载于 1870 年 11 月 5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88 号

法国境内的战斗

在战争最初的6个星期中，德军节节胜利，入侵军夺取新地区的兵力还没有完全用尽，并且前线还有法国军队抵抗他们，这时战斗一般说来还是军队与军队间的战斗。沦陷区的居民只有少数参加了战斗。固然，十来个亚尔萨斯农民曾因参战和把伤兵打成残废而被送交军事法庭处死；但是，像在巴泽耳发生的那种惨案还是罕见的例外。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就是这一惨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报界就德军在这个村庄的行为是否正当而展开的一场热烈的辩论。如果值得重新展开这场辩论的话，那末我们可以根据目击者无可非议的陈述来证明，巴泽耳的居民的确袭击了巴伐利亚伤兵，虐待了他们，并把他们抛入了中弹起火的房屋中；因此，冯·德尔·坦恩将军发出了毁灭整个村庄这一愚蠢的和野蛮的命令——它之所以是愚蠢的和野蛮的，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个命令必须烧毁里面躺着好几百个他自己的伤兵的民房。但是，不管怎样，巴泽耳是在激战中、在房屋里和街道上进行的最激烈的战斗中破坏的，当时必须立即根据报告采取措施和定下决心，并且没有时间去对证供词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在最近的6个星期内，战争的特点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法国的正规军消失了，战斗由新兵进行了，他们由于缺乏训练和经验或多或少地成了非正规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企图以大

量人员在平地上作战，他们就容易被击败；然而在村庄和城市内在街垒和设有枪眼的房屋掩护下作战时，他们却能进行顽强的抵抗。政府的号召和命令鼓励他们进行这类战斗，采用夜袭和其他为小型战争所特有的袭击行动；政府也号召在新兵作战地区的居民全力协助他们。如果敌人拥有足够的兵力来占领全国，那末这种抵抗就容易被摧毁了。但是，在麦茨投降以前敌人并没有这样的兵力。入侵军的兵力在一方面到达亚眠、卢昂、勒芒、布卢瓦、图尔和布尔日以及另一方面到达伯桑松和里昂以前就已耗尽了。敌人的兵力之所以如此迅速地耗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围的抵抗愈来愈强烈。那声名狼藉的“4名枪骑兵”倘若不冒被俘或被杀的危险，现在就不能闯入远离自己战线的村庄或城市为所欲为了。征发队必须有相当的兵力护送，而单独的步兵连或骑兵连在村庄宿营时必须特别防备夜袭，在行军中必须特别防备伏击。在德军阵地周围都有一片德军或法军都未能占领的地带，而正是在这里民众的抵抗显得最为坚强。为了镇压这种民众的抵抗，德军采用了既陈腐而又野蛮的战争公法。他们奉为准则的是：每个城市或村庄，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居民参加防御，射击他们的部队，总之，只要是帮助了法军，就必须烧光；凡他们认为不是正规军的兵士而被捉到时手持武器者，必须就地枪决；凡有根据认为某城市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犯有类似罪行时，这个城市所有身体健康的男子必须立即杀光。这些办法已残酷地实行了将近6个星期，并且现在仍在全力推行。你只要一翻开德国的报纸，就不会看不到半打关于这类军事处决的消息，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完全自然的事，是“正直的军人”以有益的严厉态度对“卑鄙的凶手和强盗”进行军事审判的普通办法。完全没有什么紊乱、掠夺、奸淫妇女和违反命令的事情。这一类的事一点

也没有。一切都是有系统地按照命令进行的：把遭难的村庄包围起来，把居民驱逐出去，把粮食夺走，把房屋烧毁，把真的犯罪分子或嫌疑分子送交军事法庭，而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准是残酷的审判和半打枪弹。在阿布利——一个有 900 居民、位于通往沙特尔的路上的村庄，第十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骠骑兵团的 1 个连在夜间遭到了法国游击队的袭击，损失了一半兵员；为了惩罚这种无理的行为，整个骑兵旅开到了阿布利，放火烧毁了村庄；两则不同的消息——两者都来自这一惨剧的参加者——都说，所有健康的男子都被挑了出来，无一幸免地被枪决或杀死。然而这只不过是许许多多事实中的一个。在奥尔良城郊的一个巴伐利亚军官写道，他的部队在 12 天当中烧毁了 5 座村庄。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法国中部，凡是德军游动队经过的地方，沿途常常是烟火弥漫、血迹斑斑。

现在，在 1870 年，简单地说这类行动是合法的作战方法，说居民或者没有被正式承认为军人的人的参战等于强盗行为而可以用火和剑予以镇压，恐怕是不行的。这一切只能够适用于路易十四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当时斗争仅仅是由军队来进行的。但是从美国独立战争起直到美国内战，无论在欧洲或美洲，民众参加战斗已不是例外而成为常规了。凡是一个民族仅仅因其军队无力抵抗而屈服时，人们都普遍地把他们鄙视为懦弱的民族。凡是一个民族刚毅地进行这样的游击战时，入侵者很快就觉察到：奉行那种血和火的古老法典是不行了。英国人在美洲⁹⁷，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在西班牙，以及 1848 年奥地利人在意大利和匈牙利，都因为害怕民众对他们的被俘人员进行报复，很快便不得不承认人民的抵抗是完全合法的。甚至 1849 年普军在巴登时，以及教

皇^①在门塔纳会战⁹⁸以后，也不敢不分皂白地枪杀战俘，尽管后者是游击队员和“造反者”。现代，残酷地奉行“斩尽杀绝”这个陈腐的法典的例子只有两个，即英军对印度西帕依起义 99 的镇压和巴赞及其手下的法军在墨西哥的行为。

世界各国军队中，普军是最不应当重复这种行动的军队。1806 年，普鲁士之所以失败，只是因为全国丝毫没有这种人民抵抗的精神。1807 年以后，指挥管理和军队的改革者尽了他们一切力量来复活这种精神。当时，西班牙树立了一个民族能够怎样抵抗入侵军的光辉的榜样。普鲁士的所有军事领导人都曾向他们的同胞指出这是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夏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在这一点上全都持有同一见解；格奈泽瑙甚至亲赴西班牙对拿破仑作战。当时普鲁士实行的整个新的军事制度，就是企图至少在君主专制制度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组织人民抵抗敌人。不仅所有身体适于服役的男子必须入伍服役，然后再转入后备军服役到 40 岁，而且 17—20 岁的青年和 40—60 岁的男子必须编入民军，即 *levée en masse*（民众武装）。民军应当在敌人的后方和翼侧举行暴动，扰乱他们的运动，截获敌人的补给品和传令兵，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武器，不加选择地使用一切手段——“这些手段愈有效愈好”——来惊扰入侵敌人，而最主要的是，

“不着任何制服，以便民军随时都可以重新以普通公民的身分出现而不被敌人识破”。

整个这一“民军条例”（即 1813 年所颁布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的名称，其制订人不是别人，正是普鲁士军队的组织者夏恩霍斯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特)是本着不妥协的民众抵抗精神制定的。民众为了进行抵抗,一切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愈有效愈好。但是这一切是普鲁士人曾经打算用来对付法军的,如果法国人现在也用这些方法来对付普军,那末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一种情形下被认为是爱国的行为,而在另外一种情形下却是强盗行为和可耻的凶杀行为。

问题在于:现在的普鲁士政府认为这个老的、半革命的“民军条例”是可耻的,并且极力以自己在法国的行为来使人忘记这个条例。但是它在法国的每一个惨无人道的行为却愈来愈使我们想起了这个“条例”;而替这种可耻的作战方法所作的辩护只能证明:如果说自耶拿会战以来普鲁士军队已无比地壮大了,那末普鲁士政府本身却在迅速地造成曾使耶拿会战得以重演的那种局面。

载于 1870 年 11 月 11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93 号

战争短评(二十七)

那些同甘必大先生一样,以为卢瓦尔军团在进行了巧妙的、配合良好的运动而迫使冯·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撤离奥尔良以后将立即向巴黎挺进的人们,注定失望了。库耳米埃附近的战斗¹⁰⁰(不管人们以后怎样称呼它)发生在11月9日,而到13日黄昏,巴伐利亚军队的先头部队看来还是留在距奥尔良仅25英里的土里附近,而没有受到骚扰。

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在初战获胜后,不仅表现了健全的理智,而且表现了精神上的力量,适时地停止了前进,这使他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要知道,甘必大先生在他后面向他的兵士们宣布,他们正向巴黎前进,巴黎在等待着他们,巴黎必须从野蛮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因此,要控制住这些新的、半守纪律的部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立刻率领他们向敌人前进,他们便会马上叫喊这是“叛变”,而当敌人真正让他们认识到厉害时,他们却又会立刻逃跑。奥雷耳在前往巴黎的路上控制住了自己的兵士,这一事实说明,他为训练他们而作出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同时他以初战的胜利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使法军获得初次胜利的部署在各方面都是合适的。冯·德尔·坦恩在奥尔良四郊的部队不会超过25000人,他所以能够继续扼守这个暴露的阵地,是因为认识到他的经过考验的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在对方任何数量的新兵中间打开一

条道路。奥雷耳可以用至少四倍于敌的兵力对巴伐利亚军队作战，于是他采取了在这种场合常用的战法：他迂回了他们的两翼，展开了大量兵力（特别是在他们的右翼的后方），以致冯·德尔·坦恩不得不立刻向他的援兵那里退却。这支援兵在 11 日（或至迟在 12 日）在土里同他会合；他们包括维提希的北德意志步兵第二十二师、阿尔勃莱希特亲王的骑兵师和第十三军（由北德意志第十七师和维尔腾堡师编成）。由此可见，集中在土里由梅克伦堡大公指挥的兵力至少有 65000—70000 人。尽管他们是由一个非常平庸的将领指挥，但是奥雷耳将军在决定攻击他们以前，还必须认真地考虑一切情况。

但是，除上述情况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迫使奥雷耳将军在采取任何新的行动以前等待一下。如果他真的打算去援救巴黎，那末他应当十分明白，他本身的兵力是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的，除非同时从要塞本身采取坚决的行动来支援他。我们知道，特罗胥将军挑选了一部分最有训练和组织最好的军队，组成了一支可以称为巴黎的积极作战的部队。这支由杜克罗将军指挥的部队，显然是用来进行大规模的出击的，而没有这种出击，像巴黎这样的要塞的防御，就同一个右手绑着绷带作战的兵士一样。

巴黎军团的这一改编在时间上和卢瓦尔军团的进军相吻合，也许不是偶然的。特罗胥将军和奥雷耳将军无疑曾企图利用气球和通信鸽相约在预定的时间采取协同行动；只要德军不先攻击卢瓦尔军团，那末我们可以期待，就在奥雷耳继续前进的同时或几乎同时，巴黎会进行大规模的出击。这个出击大概至少将以杜克罗 3 个军的全部兵力在巴黎南面进行，如果成功，同卢瓦尔军团的联系就可以在这里建立起来。同时在东北面和西北面，特罗胥的“第三

军团”将在堡垒火力的支援下进行佯攻和牵制性攻击，以阻止包围的部队向南面派遣援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相信，这一切也都在毛奇将军的意料之中，因此他不会措手不及。尽管法军将在战场上拥有巨大的兵力优势，但是我们确信，军队质量和指挥水平的差别将具有更大的意义。

要使巴黎从“野蛮人”的铁钳中解救出来的这种尝试终于有某种成功的希望，那就必须尽快地行动。除了和卢瓦尔军团对垒的5个步兵师以外，在巴黎城下现在有16个步兵师（第二、四、五、六、十二军、近卫军、巴伐利亚第二军、第二十一师和后备军的1个近卫师）。根据毛奇的看法，这些兵力完全足以有效地封锁巴黎；否则，他就会从麦茨投降后腾出的军队中调遣更多的兵力前往巴黎，而不仅仅是第二军。如果注意到巴黎城外的德军阵地到处都有构筑得很坚固的工事，而且不久将有强大的攻城炮队掩护，那末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开始得到关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消息，在麦茨投降后他同3个军（第三、九、十军）一起去向不明。从那时以后，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关于他的部队的消息是一则简讯：11月7日“第九团”在上马尔纳的肖蒙城外与流动自卫军发生了冲突。第九团隶属于第二军的第七旅，而这个军已经到达巴黎城下，因此整个消息就不可理解了。以后查明，是电报把第九旅误写成了第九团。这样，事情就弄清楚了：第九旅是第三军的第一个旅，因而它属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这次冲突的地点，以及柏林军界认为整个说来是可靠的消息，即亲王已向特鲁瓦进军，并在7日或8日到达该地的消息，使我们几乎不再有任何疑问：他选择了我们预料他的主力必定要走的路线，即“从麦茨出发，路经肖蒙和奥塞尔，在肃清卢瓦尔河上从图尔到涅维尔一线的敌

人以后，向波尔多方向挺进”^①。现在我们得悉，这支军队在桑城附近占领了云纳河线，该地距卢瓦尔河畔的纪安约 50 英里，距蒙塔耳纪仅 30 英里，而由蒙塔耳纪经过一整日的行军就可进到奥尔良以北的法军任何阵地的翼侧。根据得到的消息来看，现在马舍尔布和奈木尔的部队，可能已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派去与冯·德尔·坦恩的左翼建立联系；也可能这是第十三军行军路线上极左侧的部队。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可以预料，亲王借助游动队将很快地一方面同在土里的冯·德尔·坦恩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同在第戎的韦德尔取得联系。如果卢瓦尔军团拖延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开来时才进行攻击，那末除了当面的 7 万人外，在他的右翼和后方还将有 75000 人，那时，就不得不放弃援救巴黎的一切念头了。它将自顾不暇，并且不得不绝望地在入侵军的洪流面前退却，而这股洪流将在由沙特尔多第戎的正面上向法国中部泛滥。

载于 1870 年 11 月 16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797 号

^① 见本卷第 164 页。——编者注

筑垒的首都

如果说依据这次战争的经验彻底解决了某个军事问题的话，那末这就是大国的首都是否宜于筑垒的问题。自从做出在巴黎筑垒的决定的那一天起，关于防守这样大的要塞是否适宜以至是否可能的问题，在各国的军事书上一直争论不休。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实践，即真正围攻巴黎——现存的唯一的筑垒首都——才能得到解决。虽然对巴黎的真正围攻还没有开始，巴黎的筑垒工事却已为法国作出了这样巨大的贡献，以致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肯定地解决了。

巴黎距法国东北的国界太近，这条国界又完全没有河流或山脉可以作为防线，这就促使法国：第一，去征服国界附近的地区；第二，建立从莱茵河到北海的三层要塞带；第三，总是力图占有莱茵河的整个左岸地区，而这个企图终于使法国处于目前的地位。征服的地区被剥夺了，而国界则由 1814 年和 1815 年的条约¹⁰¹规定了下来；这些要塞正如那两年的两次入侵所证明的，几乎没有用处，根本不能阻止大军；最后，占有莱茵河的呼声在 1840 年被欧洲的反法同盟¹⁰²暂时压制下去了。而到这时，法国才像一个大国所应当做的那样，企图以它力所能及的唯一手段，即在巴黎筑垒来补救巴黎的危险地位。

在目前的战争中，法国最弱的一面由于比利时的中立而有了

掩护。尽管如此，总共只要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法国全部有组织的力量逐出了战场。一半做了俘虏，另一半则绝望地被围困在麦茨，而且这一半的投降也不过是几个星期的问题。在通常的情况下，战争就会结束了。德军也就会占领了巴黎以及他们想要占领的法国的其他地区，并且在麦茨投降以后甚至在这以前就签订了和约。法国几乎所有的要塞都靠近边境；只要在这个筑垒城市地带的正面打开一个宽度足供自由运动的缺口，就可不顾边境或沿海的其余要塞而占领法国整个中部；然后轻而易举地迫使边境各要塞一一投降。同时，甚至在游击战争中，发达的国家内地的要塞作为退却时的安全的中心，也是必需的。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中，西班牙人民所以能够进行抵抗，主要是因为有这样要塞。1809年，法军把约翰·穆尔爵士指挥的英国军队逐出了西班牙；法军虽然在野战中处处获胜，但毕竟没有征服这个国家。人数较少的英葡军队再次出现在西班牙时，如果没有无数的西班牙武装队伍的援助，就敌不过法军；这些队伍在野战中容易失败，但他们骚扰每路法军的翼侧和后方，牵制了很大一部分入侵敌军。如果国内没有大量的要塞的话，这些队伍是支持不了多久的。虽然这些要塞大都很小而且古老，但是要夺取它们，仍然必须进行正规围攻；因此当这些队伍在平地上遭到攻击时，它们便成了可靠的掩蔽所。因为法国没有这样的要塞，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一些条件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甚至游击战争在那里也不会是十分可怕的。而这些条件之一就是巴黎的筑垒工事。

9月2日，法国在要塞以外作战的最后一支部队投降了。在过了将近11个星期后的今天，11月21日，在法国的全部德军几乎有一半仍然被牢牢地牵制在巴黎周围，而其余的军队大部分也仓

卒地从麦茨开出，以保护包围巴黎的部队不受新编的卢瓦尔军团的威胁；不论这个军团的作用如何，如果没有巴黎的筑垒工事，它甚至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些工事被围已经整整两个月了，而正规围攻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这就是说，当对一个普通要塞的围攻也许早已成功地结束的时候，对于像巴黎这样规模的要塞，即使防守的只是新兵和坚决的居民，也只能开始围攻。这也证明，供应一个有 200 万人口的城市所需的粮食，看来要比供应一个虽然较小但不是周围农业区产品销售中心的天塞要塞容易一些。虽然巴黎的粮食供应工作仅仅在 9 月 4 日以后，即完全被围以前的两个星期才认真地掌握起来，但是巴黎在被封锁了 9 个星期以后仍然没有饥饿到要投降的地步。法国军队实际上只抵抗了一个月，而巴黎则已经抵抗了两个月，并且仍然牵制着入侵军的主力。这无疑比以往任何一个要塞所取得的成就都要大，而且完全证明了构筑工事所花的费用是值得的。此外还不应当忘记我们一再指出过的一点，即巴黎的防御这次是在完全不正常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它是在没有积极的野战部队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麦克马洪的军队不去色当而来到首都的话，那末，巴黎的抵抗将会怎样，它将怎样推迟以至完全阻止包围，以及还有多少入侵的敌军要被牵制在巴黎周围呢？

但是，不仅如此。巴黎的防御不但给了法国两个月的喘息时间（这在不那么绝望的情况下是极宝贵的，甚至现在还可能是极宝贵的），而且给了法国在围攻期间发生政治变化的有利机会。我们尽可以任意重复说，巴黎这个要塞跟其他任何一个要塞是一样的，但是这不会改变这样一个情况，即对巴黎这样一个要塞的真正围攻在全世界所引起的激动，比对一百个较小的要塞的围攻所

引起的激动要大得多。不管战争公法怎样，我们现在的良知不能容忍像对待斯特拉斯堡一样来对待巴黎。可以大胆地指望，在这种情况下中立国将企图出面调停；对于征服者的政治上的猜忌，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要塞最后被迫投降以前表现出来；而且，像围攻巴黎这样的规模大、时间长的行动，很可能要在某个未参战的强国的内阁里通过同盟和反同盟来解决，就像在战壕里用破坏炮队¹⁰³和破城炮队来解决一样。这种例子我们也许不久就要看到。东方问题¹⁰⁴在欧洲的突然尖锐化，能对巴黎做到卢瓦尔军团所做不到的事情，也就是使巴黎免于投降并解除它的封锁，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普鲁士不能消除它在某种程度上同俄国狼狈为奸的嫌疑（这是十分可能的），如果欧洲决定不容许俄国背信弃义地违反自己承担的义务，那末非常重要的就是使法国不被完全削弱，使巴黎不被普军占领。因此，完全有必要立即迫使普鲁士明确表示态度，如果普鲁士企图借辞推托，就马上采取措施来增加巴黎的取胜希望并加强它的抵抗。只要有3万英国兵在瑟堡或布勒斯特登陆并同卢瓦尔军团会合，就会使这个军团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的坚定性。英国步兵由于具有异乎寻常的坚韧性，甚至由于具有与此相关的缺点，即在进行轻步兵的运动时笨拙不灵，特别适于用来稳定新编的部队；他们曾在威灵顿指挥下在西班牙出色地发挥了这个作用；他们在历次的印度战争中对那些不太可靠的土著部队也起过同样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这样的英国军所产生的影响，会大大超过仅仅根据它的数量所能指望产生的影响，而当一个英国军被这样使用时，实际情况往往就是这样。如果有几个意大利师作为意大利军队的前卫向里昂和索恩河谷方向前进，他们很快就会把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部队吸引过去；此外还

有奥地利，还有斯堪的那维亚诸王国，它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威胁普鲁士并牵制它的军队；如果巴黎得到这样的消息，它本身一定宁愿忍受几乎一切饥困而决不投降，——何况那里的面包看来还是充足的，——因此，甚至在目前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巴黎的工事也能真正挽救法国，使它有可能坚持到援军到来。

载于 1870 年 11 月 21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01 号

战争短评(二十八)

如果说什么时候有过解救巴黎的机会,那就是在过去 8 天。卢瓦尔军团在从法国东部所能调来的全部军队的加强下,对梅克伦堡大公指挥的监视军进行坚决的进攻;与特罗胥全部有训练的军队所进行的 en masse (大规模) 的出击相配合;两者同时进行并且要在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率领第二军团开来以前进行,——这曾经是有成功希望的唯一计划。而如果我们看一看德军的对策,就必将得出结论:这个计划成功的希望比最初看来所能预期的大。

在上星期内,德军在巴黎城下有 17 个步兵师,包括维尔腾堡师,后者同最初错误的报道相反,并没有放弃塞纳河和马尔纳河之间的阵地。梅克伦堡大公指挥的监视军由 2 个北德意志师和 2 个巴伐利亚师组成,骑兵不计在内。在库耳米埃附近的战斗以后,奥雷耳没有跟踪追击巴伐利亚部队,而是向北和向西朝沙特尔方向进军,在那里,我们便暂时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为了对付这一进军,德军把正面转向西,冯·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扼守从埃汤普到阿布利的地区,与此同时,第十七师和第二十二师则向沙特尔和德勒前进。德勒这时再度被法军占领;据推测,奥雷耳在凯腊特里将军的部队和其他援兵的协助下,企图绕过监视军而突然出现在包围巴黎的德军面前。在毛奇伯爵看来这个企图如此严重,以致他立刻派遣了最靠近的部队,即第五军和第十二军的部队去援助

梅克伦堡大公,并命令巴伐利亚第二军和北德意志第六军以及第二十一师和维尔腾堡师准备在必要时向南出动。首批援兵的到来使梅克伦堡大公有可能在 17 日再次占领德勒,并在 18 日追击法军过沙托讷夫。在这里究竟法军哪些部队被击败,难于断定。也许是卢瓦尔军团的一部,但决不是整个卢瓦尔军团。此后,就没有听到法军以后行动的任何消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也愈来愈靠近梅克伦堡大公的左翼部队,现在应当到达能够给予支援的距离了。

看来不容怀疑,法军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卢瓦尔军团的进攻曾对毛奇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以致他毫不犹豫地下了一道命令,而这道命令如果被执行,那就意味着撤除对巴黎的包围。据我们计算,第五军和第十二军向德勒方向前进的部队至多各为 1 个旅,即共为 1 个师的兵力;但是除此以外,有 2 个巴伐利亚师、3 个北德意志师和 1 个维尔腾堡师已被指派随时准备向奥雷耳攻击。因此,在巴黎城下的 17 个师中,至少有 7 个师应当在必要时用去对付前来援救巴黎的法军,并且这 7 个师正是占领巴黎以南地区的那些部队。王储只有第二军以及第五军的大部可用来防守从舒瓦济附近的塞纳河起经凡尔赛到圣热尔门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近卫军、第四军以及第十二军的大部就必须扼守从圣热尔门起绕过哥纳斯和圣布里斯,过马尔纳河再回到巴黎上方的塞纳河的这个北部战线。这样一来,10 个步兵师便扼守一条长 40 英里的包围线,每一个师的正面为 4 英里。兵力如此分散,这就使包围圈变成了一条单纯的监视线;而特罗胥的军队,包括杜克罗指挥的 8 个师和特罗胥本人直接指挥的第三军团的 7 个师,就可以在所选择的任何一个攻击点上造成至少三倍于敌的兵力优势。在这样的优势

兵力下，特罗胥赢得胜利是有把握的。他能够突破德军的战线，夺取并破坏德军的攻城炮、弹药和仓库，并且使德军在兵力上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失，以致不用说对巴黎的围攻，就是对巴黎的严密包围，在一定时间内也不可能了。

以上我们仅分析了特罗胥的机会，而没有涉及卢瓦尔军团的机会。后者当然不能同被指派对它作战的德军 11 个师相抗衡，如果所有这些师集中在一个地点的话。但是，这种集中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如果奥雷耳发起大胆而迅速的进攻，特罗胥同时以大规模的出击相配合，那就很可能打乱毛奇的计划。凡是遭到特罗胥攻击的德军每一个军，都不可能派去同奥雷耳作战。因此，这两位法军指挥官究竟谁必须同德军主力作战，那也许是偶然的事，但法军的兵力合起来会远远超过德军能用来同他们作战的任何兵力却是事实。巴黎和德勒相距不到 50 英里，如果法军以现有的一切可用的兵力从两面同时进攻德军，那末德军几个师大概将奔走于两地之间，因而不能立即得到使用。如果进攻确实同时进行，那末法军或是在德勒方面或是在巴黎方面在数量上无疑会占几乎压倒的优势，因此，一处也得不到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深知，协同行动有多么大的障碍和困难，而且往往会遭到失败。但是目前必须指出，为了取得胜利，仅需要一个条件，即两地的进攻要准确地同时进行。此外，很明显，普军在两个军团相距 40 英里的情况下也必定会采取协同行动。

为什么不论奥雷耳或特罗胥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利用这样为他们提供的机会，这是无法解释的。在德勒和沙托讷夫附近的小战斗，当然不是那种能使卢瓦尔军团被击退的战斗；参加这些小战斗的德军不超过 3 个师，而卢瓦尔军团却至少有 8 个师。奥雷耳是

否在等待更多的援兵？他的传递情报的通信鸽是否迷了路？它和特罗胥之间是否有分歧？我们不能肯定。无论如何，这种迟延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正在继续向前挺进，目前也许离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近得能够和他协同作战了，而巴黎城下的6个师就可能留在原地。从出现这种局面时起，这两位法国将军将失去又一次获胜的机会，并且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

载于1870年11月23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03号

法国的军事形势

昨天我们曾提请读者注意这个事实：自从色当投降以来，法国的前景已大为好转¹⁰⁵，甚至麦茨的陷落以及因此腾出的达 15 万人的德军，目前对法国也不是像起初所表现的那样致命的灾难了。今天我们再谈这个问题，是想借助军事方面的一些详细情节再次证明这一看法的正确性。

德军在 11 月 24 日的部署(就我们所能够判定的)如下：

包围巴黎的：第三军团(第二、五、六军和巴伐利亚第二军、第二十一师、维尔腾堡师和后备军的近卫师)和第四军团(第四、十二军和近卫军)，共 17 个师。

掩护包围的监视军：北面有第一军团(第一军和第八军)；西面和西南面有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第十七、二十二师和巴伐利亚第一军)；南面有第二军团(第三、九、十军和后备军 1 个师，该师的一部在夏提荣附近曾受到里乔蒂·加里波第的部队严重的打击 106)；共 15 个师。

担任特种任务的：在法国东南部有第十四军(归韦德尔指挥，包括两个半师)和第十五军；在麦茨和提翁维耳附近有第七军；在交通线上至少有后备军一个半师；至少共有 8 个师。

在这 40 个步兵师中，前 17 个师目前全部用在巴黎城下；后 8 个师的部署没有变动，说明它们全部是为执行面临的任务所必需

的。用于野战的还剩下 15 个师，他们组成 3 支监视军，连同骑兵和炮兵在内，兵力总数不超过 20 万人。

总之，在 11 月 9 日以前，看来没有任何严重障碍阻挡这支庞大的军队蹂躏法国中部甚至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但此后形势大大地改变了。并不是冯·德尔·坦恩被击败并且被迫退却的情况或是奥雷耳表现出善于指挥自己的军队的情况，使我们的确比以前更钦佩卢瓦尔军团；使我们以完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个军团的，主要是毛奇为了应付它的意料中的向巴黎的进军而采取的坚决措施。毛奇不仅认为有必要甚至冒着 *de facto* (实际上) 解除对巴黎的包围这种危险而使封锁城南的大部分兵力做好还击卢瓦尔军团的准备，而且立刻改变了从麦茨开出的两个军团的运动方向，使他们向巴黎靠拢，以便在该城周围集中全部德军。此外，现在我们得知，德军还采取了在攻城炮兵纵列的四周构筑防御工事的措施。不管别人的看法怎样，毛奇显然没有把卢瓦尔军团看做是武装的乌合之众，而是把它看做一支真正的、重要的、可畏的军队。

以前对这个军团的特点不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驻图尔的英国记者的报道造成的。在这些记者中，大概连一个能够辨别一支军队不同于乌合之众的特点的军人都没有。关于纪律、训练成绩、人数、武器、装具、火炮、运输工具，简单地说，即能够据以构成对卢瓦尔军团看法的所有重要因素，发来的消息天天都是自相矛盾的。我们都了解建立这个新的军团所遇到的巨大困难：缺少军官、武器、马匹和各种物质器材，特别是缺少时间。我们以前得到的消息主要是叙述这些困难，因此，卢瓦尔军团一般地被那些不让自己的同情心去影响自己的判断的人们估计过低了。

现在正是那些记者异口同声地称赞这个军团。据说，它拥有优

秀的军官，而且它比在色当和麦茨战败的法军受过更好的训练。无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这个军团的士气看来大大高于波拿巴的军队所曾经有过的士气；有为国尽力、一致行动并为此服从命令的决心。此外，这个军团重新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被路易—拿破仑的军队完全遗忘了的事情：担任轻步兵勤务——一种掩护翼侧和后方不受突然的袭击、侦察敌情、突然袭击敌人部队、获取情报和捕捉俘虏的本领。“泰晤士报”随梅克伦堡大公的记者对此提供了证据。现在已经是普军无法得知敌军的位置而被迫盲目地行动了；以前则完全相反。军队学会了这一点，就学会了很多东西。毕竟我们不应忘记，卢瓦尔军团同它的姊妹军团——西方军团和北方军团——一样，还需要在对数量大致相等的敌军进行决战中考验自己的勇敢。但是，总的说来，它是很有希望的，并且由于某些情况，甚至一次大失败也可能不使它受到像这种失败通常给大多数新编部队所造成的那种严重损害。

事实是，普军的野蛮和暴行不仅没有把人民的抵抗镇压下去，反而使这种抵抗加倍激烈起来，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似乎普军自己也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我们几乎听不到普军烧毁乡村和屠杀农民的消息了。但是，普军的暴行已经产生了影响，游击战的规模日益扩大。我们读到“泰晤士报”的报道，说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在向勒芒进军时没有见到敌人，没有任何正规部队曾在平地进行抵抗，只有骑兵和自由射手在两翼附近进行威胁，没有任何关于法军去向的消息，而普军以相当大的队伍密集地行动，——这时，我们便不禁回想起拿破仑的元帅们在西班牙的进军或巴赞的军队在墨西哥的远征。既然这种人民抵抗精神已经激发起来，那末即使一支 20 万人的军队在占领敌国时也不会得到许多东西。这支军队会

迅速达到极限，越过极限它的部队就将弱于防御者能够用来抵抗他们的兵力；而这种状态将怎样迅速到来，就全靠人民抵抗的威力了。这样看来，只要国内人民奋起抵抗，甚至一支溃败的军队，也会迅速找到摆脱敌人追击的安全地点，而正是这种抵抗目前可能在法国发生。如果敌占区的居民奋起抵抗，即使仅仅经常截断敌人的交通线，那末入侵的敌人也将更加临近无能为力的境地。例如，假如说梅克伦堡大公在没有得到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有力支援的情况下，现在就已经前进得太远了，这并不使我们奇怪。

当然，现在一切取决于巴黎。如果巴黎再坚持一个月（关于城内贮粮情况的消息完全不排除这一可能性），那末法国一定能够建立一支相当大的野战部队，以便在人民抵抗的配合下有效地袭击普军的交通线而解除巴黎的包围。法国的建军机构看来目前正在有效地发挥作用。兵员是绰绰有余的；依靠现代工业的能力和现代交通的便利，军队正在获得出人意料的大量的武器；单是从美国就运来了 40 万支步枪；法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制造火炮；甚至正以某种方式招募或训练军官。总之，在色当投降以后，法国在改组国防方面的努力是史无前例的，而为了取得几乎是肯定的成功，仅需要一点，即时间。如果巴黎再坚持哪怕一个月，那末这将大大地加速成功的到来。而如果巴黎的粮食不能供应这样久，特罗胥就可以率领适于突围的部队去试图突破包围线；现在就断定他不会突围成功，未免太武断了。如果特罗胥获得成功，那末德军为了维持巴黎的治安，仍然需要一支至少由 3 个军组成的警备部队，因此，特罗胥能够腾出来的法军数量要比巴黎陷落后德军腾出来的兵力多。并且不论巴黎这个要塞在法军防守下能做到什么，显然，

假如法军围攻这个要塞，德军永远也不能成功地扼守它。德军用于镇压城内人民抵抗的军队数量将要和要塞围墙上抗击外部攻击的军队数量同样多。因此，巴黎的陷落可能但决不是必然意味着法国的灭亡。

现在来推测战争的这种或那种结局的可能性最不适时。我们大致上了解的只有一个事实，即普军的数量。关于别的，关于法军的数量和实际战斗力，我们则了解得太少。况且，目前精神因素正在发挥作用，而它们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关于这些因素我们只能说，它们完全有利于法国而不利于德国。然而这种情况是无需怀疑的，即交战双方的兵力正是现在比在色当投降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趋于平衡，法军只要增加不太多的受过训练的部队就能最后达到均势。

载于1870年11月26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06号

战争短评(二十九)

期待已久的风暴终于爆发了。在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行军和机动(这期间仅仅发生了一些小战斗和游击战)以后,战争又进入了一次突击接着一次突击的危急时期。11月27日,法军北方军团在亚眠附近遭到了失败;28日,卢瓦尔军团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在博内—拉罗朗附近被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击溃;29日,特罗胥从巴黎的南面进行了不成功的出击,而在30日,他大概以一切可用的部队攻击了从东北面包围巴黎的萨克森部队和维尔腾堡部队。

这种种行动是协同作战的结果,而协同作战,正如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指出的那样^①,是法军获得成功的唯一机会。假如兵力少于敌军的北方军团能够牵制住曼托伊费尔的两个军,阻止他去加强占领巴黎北面阵地的萨克森王储,那末这个军团就是使用得当了。但是情形却不是这样。北方军团在平面上的进攻很快就被兵力比它少的普军阻止住了,因为从各种消息的对照中看来,无疑只有曼托伊费尔的一个军参加了这一会战。如果北方军团利用铁路把野战部队派往南面的勒芒,或者不断地骚扰曼托伊费尔的警戒部队和分遣队,并且只在作为自己的作战基地的许多北方要塞中的一个要塞的围墙下作战,那末,这个军团就会使用得更好些。但是从

^① 见本卷第182、192页。——编者注

法国的现状和它的军队是由新兵组成的情况来看,司令官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实行退却的,即使这在战略上是必需的;因为退却会比完全失败更严重地瓦解他的部队。在当前的情况下,北方军团把自己的要塞当作可靠的掩蔽地点,它可以在那里进行整编,而毛奇也未必立刻就想派曼托伊费尔跟踪到那里去。但是,与此同时,曼托伊费尔现在可以向任何别的方向自由运动,而且如果像来自利尔的消息所说的那样(虽然这个消息遭到反驳),他已再次撤离亚眠,并已急忙折向巴黎,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北方军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西部,勒芒附近的法军第二十一军和孔利兵营的第二十二军(以前由凯腊特里指挥)到现在为止,一直在没有遭到严重失败的危險的情况下,成功地诱使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远离巴黎。我们曾经推断,德军这支部队大概前进得太远了^①,这个推断看来正被法国一致的报道证实,根据这些报道,德军又撤离了不久前被他们占领的勒芒东面和东南面的阵地,并且这些阵地现在再度被法军占领。但是,法军看来并没有用自己的正规部队对敌人进行足够有力的追击,因为我们没有收到有关任何大的冲突的消息;因此,西方军团在牵制当面的敌人方面并不比北方军团成功。西方军团现在在哪里和做些什么,我们没有听说;可能,凯腊特里和甘必大之间的突然争执恰恰在最紧要的时刻瘫痪了这个军团的运动。无论如何,既然西方军团不能击溃又不能牵制住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那末,它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利用铁路把为了野战而装备和组织好的那一部分部队派往卢瓦尔军团,以便集中兵力进行主攻。

^① 见本卷第197页。——编者注

这个主攻只能由卢瓦尔军团来进行,因为它是法军目前所有野战部队的主力;并且这个主攻也只能针对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因为他率领的军团是掩护对巴黎包围的3个军团中兵力最多的1个。据报道,卢瓦尔军团包括法军第十五、十六、十七和十九军(它们曾一度配置在奥尔良附近)以及作为预备队配置在卢瓦尔河南岸的第十八军(现由布尔巴基指挥)和第二十军。因为第十八军和第二十军曾全部或部分地参加了11月28日的战斗,所以他们大概在此以前就已渡过了卢瓦尔河,由此可见,所有这6个军都完全可能用来进攻德军第二军团。在这次战争中,法国每个军总是由3—4个步兵师编成。根据大约两星期前在维也纳一本军事杂志“战友”上登载的ordre de bataille(战斗序列),第十五军有2个师(5个旅),第十六军有2个师(4个旅),第十八军有3个师(10个旅)。即使我们撇开“布鲁塞尔报”¹⁰⁷的消息不谈(根据这个消息,卢瓦尔军团全部由18个步兵师编成,即每军3个师,并且其中许多师还应当处于编组阶段),那末仍然无需怀疑,28日的进攻是能够用12个或15个师,而不是5个或至多6个师来进行的。能说明组成卢瓦尔军团的部队的特点的是,他们被数量比自己少得多的敌军击溃了,因为同他们作战的只是3个步兵师(第十军的2个师和第五师),即不到第二军团的一半兵力。不管怎样,卢瓦尔军团一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一点不仅为德方的消息所证实,而且为卢瓦尔军团从此再也没有试图以比较集中的兵力发动新的进攻这一情况所证实。

从这一切情形可以得出结论:从外面解救巴黎的企图暂时是失败了。其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法军错过了在德军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到达前的那个星期里存在过的绝好机会;其次是因为法军

的进攻行动不够猛烈，也没有把兵力作应有的集中。组成法军新军团的新兵，如果人数不比敌人多一倍，就不能立刻指望战胜那些和他们作战的有经验的兵士；因此，把这些新兵投入战斗而不注意使可以支配的每名战士、每匹马和每门炮都真正派到战场上去，那就错上加错了。

另一方面，我们不认为亚眠和博内—拉罗朗附近的失败除了使解救巴黎的计划破产外，还会有什么别的严重后果。只要不犯严重的错误，西方军团和卢瓦尔军团的退路是完全有保证的。这两个军团的大部分兵力并没有因失败而受到损失。同这两个军团作战的德军能够追击他们多远，取决于人民抵抗和游击战争的力量，即普军不论经过哪里都特别能激起的那些因素。现在用不着担心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从奥尔良到波尔多会像王储从麦茨到兰斯那样遇不到抵抗了。由于德军在继续向南进攻以前必须可靠地占领（不单是使用大的游动队）广大的地区，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7个师不久将迅速地分散到广大的空间，而他们入侵所需的兵力就将完全丧失。法国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既然人民的抵抗精神已经激发，那末法国还能够赢得这个时间。最近3个月内制造的武器大概在各地都几乎够用，而每周都在增多的兵士人数在一定时间内必将不断增加。

至于巴黎的两次出击，直到写这篇短评时所得到的消息都非常矛盾和非常含糊不清，因此不能提出什么肯定的看法。然而，据特罗胥本人承认，直到11月30日晚所取得的战果，似乎完全没有为图尔发出的胜利欢呼提供根据。此外，马尔纳河以南还被法军扼守的全部据点都受到巴黎各堡垒的火力的掩护；唯一处于这些堡垒火力范围以外而一度被法军扼守的地点蒙梅利，又不得不放弃

了。很可能,巴黎城郊的战斗昨天已经再起,而今天可能在奥尔良和勒芒附近又发生战斗;无论如何,最近几天内必将决定战争第二次危机的结局,而这很可能将决定巴黎的命运。

载于 1870 年 12 月 2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11 号

战争短评(三十)

11月29日,巴黎第二军团从巴黎南面向勒埃和舒瓦济—勒—卢瓦方向出击,以此开始了它的进攻行动。据普方消息,杜克罗军团的第一军在维努亚指挥下在这里攻击了图姆普林格指挥的普军第六军。这次攻击看来只不过是为了扰乱普军并迫使他们加强这一段战线(因为攻击一旦成功,被围法军就可以通过这一段战线取捷径去同卢瓦尔军团会合)的一种佯动。否则,维努亚无疑就会得到别的军的支援,并且他的损失不会仅仅是几百人伤亡和一百人被俘。真正的进攻是在第二天早晨开始的。这一次,杜克罗沿塞纳河右岸在靠近塞纳河和马尔纳河的汇合处进攻,同时,在左岸对图姆普林格进行了第二次出击,在圣丹尼以西对第四军和近卫军进行了佯攻。我们不知道究竟是哪些部队担任佯攻,但据法军公报称,对图姆普林格的出击是由海军将领拉隆西耶尔·勒·努里指挥的。这位军官指挥特罗胥直接统率的巴黎第三军团7个师中的1个师,因此,可能是巴黎第三军团担任了全部助攻,这样,杜克罗的8个师就全部用来在马尔纳河实行真正的进攻。

这次进攻也必须沿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一部分军队必须沿马尔纳河右岸向东,即向谢耳前进,以便扼阻从东面包围巴黎的第十二军即萨克森军。这是另一个助攻;关于这个助攻的经过,我们知道得很少,只听到萨克森军说他们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情况也可

能就是这样。但是,杜克罗军队的主力以勒诺指挥的第二军为前导,从8座桥渡过了马尔纳河,攻击了扼守马尔纳河与塞纳河之间的地段的3个维尔腾堡旅。我们曾指出,马尔纳河在注入塞纳河以前,形成一个大S形,S形的上弯曲部即北面的弯曲部离巴黎近,下弯曲部离巴黎远。这两个弯曲部都在堡垒火力的控制下;但是上弯曲部即靠近巴黎的弯曲部由于它的形状而有利于出击,而下弯曲部即离巴黎远的弯曲部则不仅完全受到一系列堡垒的控制,而且受到马尔纳河整个左岸的瞰制;此外,这条河由于它的这种流向以及由于它有许多支流,不便于在炮火下架桥。因此,这个弯曲部的大部分地区看来好像是一个中立地带,真正的战斗则在它的两侧进行。

在这个地区西面进攻的军队,在沙兰顿堡垒和格腊韦耳多面堡的火力掩护下,向梅利和崩讷伊方向前进。在这两个地点之间有一个叫做蒙梅利的独立高地,它高出周围的平地整整100英尺,因而必然是法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据指挥维尔腾堡师的奥伯尼茨将军的电报称,法军为此派出了1个“师”;但考虑到法军首先驱逐了同他们对峙的维尔腾堡第二旅和第三旅,而后者在援军到来以前并没有把他们击退,此外,握有足够兵力的杜克罗将军显然不会仅仅派2个旅去担任这么重要的进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这里又发生了那种常见的差缩,即把泛指一般军队单位的《Abteilung》一词误译为专指由2个或至多3个旅组成的专门的军队单位的“师”。但是,不管怎样,法军夺取了蒙梅利以及这个高地下面的村庄,并且如果他们能够扼守并巩固这个高地,他们就会取得那种值得在这一天进行战斗的结果。但是,普军从第二军调来的增援部队,即第七旅到达了;他们收复了失去的阵地,而法军则被击退

到沙兰顿堡垒的火力掩护之下。

法军又在左面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他们在费藏德里多面堡和诺让堡垒的火力掩护下，在S形的上弯曲部渡过了马尔纳河，占领了分别位于这个弯曲部的张开的两端的布里村和尚皮尼村。实际上，扼守这个地区的维尔腾堡第一旅的阵地在此稍后一些的地方，即在从维耳埃到凯伊的那个高地的边缘。维耳埃是否被法军占领过，还是个疑问；普王威廉说“是”，奥伯尼茨将军则说“否”。我们只知道，法军没有守住维耳埃，进攻一越出堡垒火力范围就被击退了。

关于“背马尔纳河”作战、亦即在该河以南作战的杜克罗军团在这一天的战果，在法军公报中概述如下：

“以后，军团从8座桥渡过了马尔纳河，守住了占领的阵地，缴获2门火炮。”

这就是说，杜克罗军团重新退到了马尔纳河右岸（北岸），在那里“守住了”某些阵地，这些阵地当然是被他们“占领的”，但只不过不是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显然，给甘必大的正式报告仍然是由那些曾给拿破仑干这种事的人编造的。

12月1日，法军又一次表明，他们认为自己的出击是失败的。虽然“通报”¹⁰⁸宣称，这一天法军应当在维努亚将军指挥下从南面发起进攻，但我们从12月1日（未注明时刻）来自凡尔赛的消息中得知，法军这一天没有进行任何调动；相反，他们曾请求停战，以便他们有可能运走两军阵地之间的战场上的伤亡人员。如果他们自己认为有能力再次夺回这一战场的话，那末他们无疑会立刻重新发起战斗。因此，毋庸置疑，特罗胥的这一首次出击被击退了，而且是被兵力远远少于他的敌人击退的。我们可以推测，他不久就会作

出再次的努力。关于首次出击的经过我们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判断下一次成功的可能性是否大一些;但是如果他再度被击退,这无论对军队还是对巴黎的居民势必在精神上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与此同时,不出我们所料^①,卢瓦尔军团又表现出积极行动的征候。由图尔发来的消息所说的卢瓦尼和帕特附近的冲突¹⁰⁹,显然就是慕尼黑发来的电讯所提到的那些战斗;根据后一个电讯判断,冯·德尔·坦恩在奥尔良以西取得了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又都断言自己取得了胜利。大概一两天以后我们将从这个地区得到更多的消息,而因为我们对双方的相对位置还一无所知,所以作出预言是无益的。

载于1870年12月3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12号

① 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

战争的前途

法军卢瓦尔军团最近的失败以及杜克罗向马尔纳河北岸的退却(假定这次退却是像星期六所报道的那种决定性的退却的话)^①,最终决定了为解救巴黎而第一次采取的协同作战的命运。这次协同作战遭到了完全失败,于是人们又开始提出问题:这一连串新的失败是不是证明法军不能作进一步的有效的抵抗了呢?马上停止这场赌博,交出巴黎,签订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条约,是不是更好呢?

问题在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完全没有关于真正的战争的概念。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和普奥战争都只不过是遵循一定习俗的战争,是战争机器一经打碎或损坏就要媾和的政府之间的战争。好几代以来,我们在欧洲中部没有见到人民本身参加的真正的战争。我们倒听说在高加索、阿尔及利亚有过这种战争,那里的斗争差不多接连不断地持续了二十多年;如果土耳其的盟国曾经允许它用自己传统的方法进行自卫的话,那末我们在土耳其也许看到了这种战争。但问题在于,我们的习俗只承认野蛮人有权进行真正的自卫;据我们推测,各文明国家将按照礼节去作战,并且真正的民族将不采取那种在官方的民族被迫投降后仍然继续战斗的无

^① 见本卷第 204—207 页。——编者注

礼行动。

但现在法国人的确在采取这种无礼的行动。自以为最懂得军事礼节的普军感到烦恼的是，在法国正规军被逐出战场以后，3个月以来法国人仍然继续坚决地战斗；他们甚至做到了他们的正规军在这次战争中绝对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而他们的一些单独的行动在许多场合也是成功的；他们从敌人手里夺取了火炮和辎重，抓到了俘虏。固然，他们刚刚遭受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但这些失败同他们以往的正规军在对同一个敌人作战时所遭到的失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固然，他们用内外同时夹攻的方法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巴黎的第一次尝试完全失败了，但是，难道由此就必然要得出结论说，他们就没有可能进行第二次尝试了吗？

德军自己承认，法军的两个军团，即巴黎军团和卢瓦尔军团都是善战的。固然，他们被数量上居于劣势的敌军打败了，但是对于同老兵作战的刚编成的年轻部队来说，这也是意料中的。据“每日新闻”一位明了自己描写的事物的记者报道，他们在战场上在敌人火力下的动作敏捷而沉着；如果说他们的动作不够精确，那末这个缺点也是许多曾经取得胜利的法军所固有的。有一点可以说是正确无误的：这两个军团已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军队，而他们的敌人将被迫对他们表示应有的尊敬。无疑，他们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有包括不同数量的老兵的基干营；有战斗力参差不齐的流动自卫军，其中既包括经过训练、武器充足和军官齐全的营，也包括连基本的队列动作和持枪动作也没有学过的未经训练的新兵营；有各类自由射手：好的，差的，中等的（大部分可能属于中等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都有良好的、有战斗力的营作为核心，这些营能使

其他的营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他们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参加独立的小战斗和对射，而避免重大的失败，那末他们都将锻炼成为优秀的兵士。如果有较好的战略，他们也许现在就能取得胜利，而目前要求采取的全部战略在于推迟任何决战的时间，据我们看来，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勒芒和在卢瓦尔河附近集中的军队，还远不是法国武装力量的全部。在后方边远的地区，至少还有 20—30 万人正在组织中。他们日益接近有战斗力的部队的水平。至少在一定时间内，每天派往前线的新兵的数量必定在增多。并且除了他们以外，还有许多人来接替他们。每天都有大批的武器和弹药运来；只要有现代的兵工厂和铸炮厂，只要有电报和轮船，只要握有制海权，就不必担心缺乏武器弹药。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些兵士的战斗力也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假如他们得到两个月的时间，那末他们就会成为能够严重地破坏毛奇的安宁的军队。

在这些或多或少的具有正规性质的军队背后，还有人数众多的民军，也就是人民群众，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被普军逼上了自卫的道路，而根据普王威廉的父亲^①的说法，自卫是容许采取任何手段的。当弗里茨^②由麦茨向兰斯、由兰斯向色当以及由色当向巴黎进军时，人民起义还根本谈不上。法皇军队的败北所遇到的是某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帝国政体的 20 年已经使人民群众习惯于呆板和消极地听凭官厅的摆布。在某些地方，例如在巴泽耳，也有农民参加了真正的战斗，但这是一种例外。然而，一旦普军包围了巴黎并在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② 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周围地区实行横征暴敛的政策，一旦普军开始枪杀自由射手并焚烧援助过自由射手的村庄，一旦普鲁士拒绝了法国的媾和建议并声称他们要进行掠夺战争，这一切就立刻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的周围到处爆发了被他们的暴行激起的游击战，而现在，只要他们一踏入新的地区，那里就到处出现民军。凡是在德国报纸上读过关于梅克伦堡大公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进军的消息的人，立刻就会发现，这种不可捉摸的、时而停止时而复发的、但经常给敌人造成阻碍的人民起义，对这些军队的运动起了多么巨大的影响。甚至连法军都几乎无法抵御的这些军队的庞大骑兵部队，也由于全体居民这种积极或消极的敌对行为而大为削弱。

现在让我们看看普军的状况。只要特罗胥能够在任何一天重新进行 en masse (大规模) 出击，那末普军在巴黎附近的 17 个师当然一个也抽调不出来。在诺曼底和皮卡尔第的曼托伊费尔的 4 个师，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事情将比他们所能做的要多；况且他们还可能从那里调走。韦德尔的两个半师只有进行突然的袭击才能越过第戎，而且这种情况将要继续到伯尔福投降时为止。警卫南锡—巴黎铁路这条狭长的交通线的部队，也不可能抽出一兵一卒。第七军由于分兵把守洛林的各要塞，围攻隆维和蒙梅迪，事情也是够多的。因此，普军能在法国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地区进行野战的兵力，就只有弗里德里希—卡尔和梅克伦堡大公的 11 个步兵师，连骑兵在内无疑不超过 15 万人。

由此可见，普军用于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保证通往巴黎和第戎的两条长交通线以及包围巴黎的，大约 26 个师，然而他们直接占领的地区看来还不及法国领土的八分之一，而间接占领的地区无疑不超过法国领土的四分之一。他们可用于法国其余地区的兵

力只有 15 个师,其中 4 个师归曼托伊费尔指挥。这些军队深入法国领土的远近,完全取决于他们可能遇到的人民抵抗的力量。但是,他们所有的交通线都经过凡尔赛(因为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进军并未开辟通过特鲁瓦的新路线),并且都穿过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法国正中央,因此这些军队势必把自己的兵力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并且在后方留下一部分兵力警卫道路和镇压居民;结果,他们将很快地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兵力被削弱得同法军不相上下,而那时,局势就将重新有利于法军;不然这些德军就得编成大的机动部队沿不同的方向在法国运动,而不能固定地占领法国。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正规军可以在德军面前暂时退却,这样他们会有许多方便的机会以袭击德军的翼侧和后方。

如果法军派几支游动队(像 1813 年布吕歇尔为迂回法军的翼侧所派出的游动队那样)去破坏德军的交通线,那就会很有成效。从巴黎到南锡的交通线几乎全线都容易受到攻击。各由一两个骑兵连和一些优秀射手组成的几支游动队,如果能袭击这条交通线,破坏路轨、隧道和桥梁,袭击列车等,就会迫使德军从前线调回他们的骑兵,而后者在前线对法军的威胁是特别大的。当然,法军并不具有真正的“骠骑兵的悍勇”。

我们上面谈到的一切,都以巴黎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为前提。直到现在,只有饥饿能迫使巴黎投降。但是,昨天“每日新闻”登载的一篇驻巴黎记者的报道(如果这篇报道属实的话)消除了许多疑虑。在巴黎,除了巴黎军团的军马外,还有 25000 匹马,如果每匹以 500 公斤计算,每个居民就可得到 $6\frac{1}{4}$ 公斤(即 14 英磅)马肉,也就是说,在两个月内,每人每天可得到 $\frac{1}{4}$ 英磅马肉。此外,巴黎还有 *ad libitum* (充足的)面包和酒、大量的咸肉以及其他食品,因

此，巴黎完全可以支持到2月初。这就给了法国两个月的时间，而这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对法国来说，比和平时期的两年还宝贵。如果中央和地方都有比较明智而坚强的领导，法国就能在这一段时间内解救巴黎并恢复元气。

而如果巴黎陷落了昵?等这种可能性更大的时候，我们也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它。无论如何，法国不靠巴黎就已支持了两个多月，今后没有巴黎它也能够继续战斗下去。当然，巴黎的陷落可能损害法国人的抵抗精神，但是，最近7天的失败消息在目前也能产生同样的影响。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都不是必然要造成这种后果的。如果法军巩固几个像卢瓦尔河和阿利埃河汇合处附近的涅维尔那样的便于机动的阵地，如果法军在里昂四周构筑前进工事，使里昂像巴黎一样坚固，那末即使在巴黎陷落以后，战争仍然可以进行下去；但是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

因此，我们敢说，如果人民的抵抗精神不减弱，法国的地位甚至在最近几次失败以后，仍然是非常稳固的。控制着海洋可以运来武器，拥有大量人员可以成为兵士，已进行了3个月(最初的最困难的3个月)的组织工作，并且有再得到一个月甚至两个月的喘息时间的不坏的希望，加上这个时候普军已露出衰竭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投降，就是公开卖国。然而谁又知道在这个时期内会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欧洲的形势将怎样进一步复杂化呢？无论如何，法国人应当继续斗争下去。

普鲁士的自由射手

不久前,报纸上有一个时期几乎根本没有普军焚烧法国村庄的消息。我们原以为普鲁士当局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为了它自己的军队的利益而停止了这种行为。然而我们想错了。报纸上又大量出现了枪杀俘虏和烧毁村庄的消息。柏林“交易所信使报”¹¹⁰刊登的凡尔赛 11 月 20 日的消息说:

“17 日德勒战斗后的第一批伤员和俘虏昨日到达此间。对自由射手的处决干脆利落,应当作为范例;令他们排成一列,逐一毙以弹丸。曾经通令全军,严禁把自由射手视同战俘,并且规定不论他们在哪里,一律由军事法庭判处枪决,就地执行。对待这班卑鄙下贱的强盗和暴徒(Lumpengesindel),这种做法是绝对必要的。”

其次,维也纳“每日新闻报”¹¹¹在同一天的消息中指出:

“上星期在维耳讷夫森林中,你可以看到因从森林中射击我们的枪骑兵而被绞死的 4 名自由射手。”

11 月 26 日凡尔赛发出的官方消息称,在奉杜邦鲁主教的命令宣传圣战的教士的煽动下,奥尔良四周的居民到处对德军展开了游击战。农民假装在田里耕作,射击德军的骑兵侦察队,打死德军的传令官。为了报复这种杀害行为,所有携带武器的非军事人员均将立即处以死刑。不少教士——共 77 名——目前正在等待审判。

这只是几个例子,这样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由此看来,普军

大概要坚决把这种暴行继续到战争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再一次提醒他们注意普鲁士近代史中的某些事实，也许是有益的。

当今的普鲁士国王完全能够回忆起他的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时代：耶拿会战，向奥得河的长距离溃退，几乎全部普军的相继投降，残军向维斯拉河以东的退却以及国家军事和政治制度的完全崩溃。就在这时，在波美拉尼亚一座海岸要塞的掩护下，一部分具有主动精神和爱国思想的公民开创了对敌人进行新的积极抵抗的先例。一位普通的龙骑兵少尉席尔在科尔贝克建立了一支自由射手（法文为 francs-tireurs）部队。他率领这支部队，在民众的协助下袭击敌人的骑兵侦察队、分遣队和哨所，夺取敌人的公款、粮秣、武器和军用物资，俘掳了法国将军维克多，在法军的后方和交通线上准备了普遍起义。总之，他做了现在被当作法国自由射手的罪行的一切，而普军现在把这些自由射手称作强盗和暴徒，对于被解除武装的俘虏“殍以弹丸”。但是，要知道，当今的普鲁士国王的父亲^①曾确认席尔的行为是合法的，并且擢升了他。大家知道，1809年，当普鲁士处于和平状态而奥地利正同法国交战的时候，正是这位席尔完全同加里波第一样，带领他的团队，独力去对拿破仑作战；结果，他在施特腊耳宗德阵亡，而他的兵士被俘了。按照普鲁士的作战规则，拿破仑完全有权枪毙全部俘虏，但是他在威塞尔总共只枪杀了 11 名军官。当今普鲁士国王的父亲在军队内外舆论的压力下曾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在这 11 名自由射手的墓地上为他们树立了纪念碑。

当普鲁士实际上刚刚发生自由射手运动时，像富有思想的民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族所应当做的那样，普鲁士人就开始把这种做法加以系统化并制订出它的理论。作为自由射手运动的理论家、伟大的自由射手哲学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度任普鲁士国王陛下的元帅的安东·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1807年格奈泽瑙防守科尔贝格；当时席尔的一部分自由射手归他指挥；在防守科尔贝格的战斗中，他得到过当地居民的有力支援，而这些居民连国民自卫军、流动自卫军或地方自卫军也算不上，因此按照普鲁士最近的概念，他们肯定应被“立即处以死刑”。但是，人民的坚决抵抗给予受异族侵犯的国家和那种巨大的潜力，给格奈泽瑙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不惜用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如何最好地组织人民抵抗的问题。西班牙的游击战，俄国农民在法军从莫斯科败退途中的起义，都给格奈泽瑙提供了新的例证，因而他在1813年得以开始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实践。

早在1811年8月，格奈泽瑙就制定了准备人民起义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组织一支民军，他们不着军服，只戴一顶轻便的军帽（法文为 képi），扎黑白两色的腰带，也许还穿军大衣；简单地说，这几乎就是现在的法国自由射手的制服。

“遇有敌人的优势兵力，应当把武器、军帽和腰带藏起来，而民军士兵则扮成普通居民。”

这恰恰就是目前被普军看作要以枪弹或绞索处罚的犯罪行为。这些民军应当扰乱敌人，截断敌人的交通线，夺取或毁掉敌人的粮秣辎重，避免正规的攻击并在遇有敌人大量正规部队时退入森林或沼泽地。

“各种教派的僧侣都应接受以下命令：战争一开始，就宣传起义，用最阴森的情景描绘法国人的压迫，提醒人民回想马加伯时代的犹太人，并号召人民学习他们的榜样……每个教士都应要求本教区的教徒发誓，他们除非被

武力胁迫，决不把粮食、武器等交给敌人。”

换句话说，德国教士实际上也曾经宣传了奥尔良主教命令自己教士宣传的圣战，而现在不少的法国教士却因此在等候审判。

谁只要打开彼尔茨教授所著的“格奈泽瑙的生平”¹¹²一书的第二卷，谁就会看到，紧靠这一卷的里封面印着格奈泽瑙亲笔写的上述引语中的一段。旁边有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的亲笔眉批：

“只要一个教士被枪毙，万事皆休。”

显然，国王并不特别相信他的僧侣的英勇精神。然而这并没有妨碍他直接批准格奈泽瑙的计划；而且在几年以后，当赶走法军的那些人被当做“煽动者”而遭逮捕和迫害¹¹³的时候，这也没有妨碍得到这份文件原稿的当时缉拿煽动者的有文化的捕手之一控告不知名的作者，说他企图煽动人民枪杀僧侣！

直到1813年为止，格奈泽瑙始终不倦地既训练正规军，又准备人民起义，作为摆脱法国压迫的手段。当战争终于爆发时，起义、农民的抵抗和自由射手的出动就立刻随之而起。4月间，在威悉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发生了武装起义；不久在马格德堡附近也爆发了人民起义；格奈泽瑙还亲自给在法兰克尼亚的朋友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由彼尔茨公布过），号召他们在敌人的交通线经过的地区举行起义。当时这种人民战争也终于得到了正式承认——1813年4月21日制定了“民军条例”（到7月才颁布）；按照这个条例，凡不在常备军或后备军服役的身体健康的男子都编入各民军营，以便准备进行那种一切手段都被认为合法的神圣的自卫战争。民军应当扰乱前进和退却中的敌人，使敌人经常惊恐不安，袭击敌人运输弹药和粮食的车辆，袭击他们的传令兵、新兵和医院，

进行夜袭，消灭掉队的兵士和小股敌人，使敌人陷于瘫痪，并使他们对于一切运动都失去信心；另一方面，民军必须协助普军押送钱款、粮食、弹药和俘虏等。这项法令的确称得上是自由射手的真正指南，并且因为它是由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制定的，所以它正如当年适用于德国一样，现在也适用于法国。

但是拿破仑第一幸运的是，这项法令在普鲁士执行得极差。国王被他自己所干的事情吓倒了。没有国王的命令而由人民自己去作战，这是完全不符合普鲁士精神的。因此，建立民军的事就被搁置下来，待国王要求建立民军时再说，而国王就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格奈泽瑙很气愤，但是最后还是在没有民军的情况下对付下去了。如果格奈泽瑙现在还活着的话，那末由于他具有普鲁士的全部经验，他一定会从法国自由射手身上看到，他那人民抵抗的 beau ideal (美好理想) 如果不是完全实现了，也是大体上实现了。因为格奈泽瑙曾经是一位人物，而且是一位天才的人物。

载于 1870 年 12 月 9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17 号

战争短评(三十一)

卢瓦尔战局看来出现了短暂的间歇,这使我们有时间把各种消息和日期加以对照,从而依据这些非常混乱和矛盾的材料,对事件的真相作一个在目前条件下所能够作的清楚的概述。

11月15日,过去指挥第十五军和第十六军的奥雷耳·德·帕拉丹被任命为新编的卢瓦尔军团的司令官,从这时起,卢瓦尔军团便作为一个独立的军团诞生了。我们说不出,当时还有哪些部队编入了这个军团;这个军团实际上是不断补充起来的,至少到11月底为止是这样,那时它名义上由下列各军组成:第十五军(由帕耳埃尔指挥)、第十六军(由尚济指挥)、第十七军(由索尼指挥)、第十八军(由布尔巴基指挥)、第十九军(据普方情报是由巴腊耳指挥)和第二十军(由克鲁扎指挥)。其中第十九军无论是法方还是普方的消息都从来没有提到过,所以我们不能断定这个军曾经参加战斗。除了这几个军以外,在勒芒及其邻近的孔利兵营有第二十一军(由饶勒斯指挥)和在凯腊特里辞职后转归饶勒斯指挥的布列塔尼军。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在法国北部还有费德尔布将军指挥的第二十二军,它的作战基地是利尔。我们没有把配属卢瓦尔军团的米歇尔将军的骑兵部队包括在内,因为这支骑兵虽然人数众多,但是由于刚成立不久,人员又没有受过训练,只能当作一支志愿骑兵队或一群骑马爱好者。

这个军团的成分极其复杂，有重征入伍的老骑兵，也有未经训练的新兵和厌恶一切纪律的志愿兵；有教皇的朱阿夫兵¹¹⁴那样坚强的营，也有只是名义上叫做营的乌合之众。这个军团毕竟也规定了某些纪律，但整个说来，仍然保留着匆忙编成的迹象。德军军官在战场上同这个军团打过交道以后说：“如果这个军团再经过4个星期的训练，它也许会成为可怕的敌人。”如果把所有根本没有受过训练的、只能成为障碍的新兵除外，我们估计，奥雷耳用于作战的5个军（不包括第十九军）里面称得起兵的大约有12—13万人。勒芒附近的部队还能提供将近4万人。

如我们所看到的，同这支兵力对抗的是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军团，其中包括梅克伦堡大公所指挥的军队；现在我们从侯泽尔上尉那里得知，他们总共大概不到9万人。但这9万人凭着他们的作战经验、组织和指挥官久经锻炼的指挥才能，完全能够同两倍于自己的当面的敌人作战。因此双方取胜的机会几乎是均等的，而这一点对在3个月内从无到有地创立了这个新军团的法国人来说，就是很大的光荣了。

从法军方面来说，战局是以11月9日在库耳米埃附近进攻冯·德尔·坦恩并收复奥尔良开始的。随后是梅克伦堡大公为增援冯·德尔·坦恩的进军和奥雷耳向德勒方向的机动，这个机动迫使梅克伦堡大公把全部军队调集到德勒方向并向勒芒进军。在这次进军中，法军非正规部队对德军进行了这次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激烈的骚扰。居民进行了最坚决的抵抗，自由射手不断袭击入侵军的翼侧；但正规部队只进行了佯动，而德军无法迫使他们进行阵地战。梅克伦堡大公军队中随行的德国记者们写的一些通讯，以及他们对于这些在战争中坚决采取了最有利于自己而最不利于敌

人的战法的不道德的法国人的狂怒和愤恨，是防御者在勒芒附近出色地进行了这次短促的战局的最好证明。法国人诱使梅克伦堡大公对这支看不见的军队进行了毫无意义的追赶，一直追到距离勒芒约 25 英里的地方。梅克伦堡大公追到这样远的地方以后，就不敢继续前进而折向南面去了。显然，最初的计划是对勒芒的军队进行歼灭性的突击，然后折向南面的布卢瓦，迂回卢瓦尔军团的左翼，而恰好这时赶到的弗里德里希—卡尔的军队就可从正面和后方攻击卢瓦尔军团。但是，这个计划也和后来拟定的其他许多计划一样都落空了。奥雷耳置梅克伦堡大公于不顾，而向弗里德里希—卡尔进军，在 11 月 24 日在拉栋和梅济埃尔攻击了普鲁士第十军，而在 11 月 28 日在博内—拉朗附近攻击了普军的重兵。无疑，奥雷耳在这里对自己的军队指挥得不好。虽然这是他冲破普军的阻截来打通一条前往巴黎的道路的首次尝试，但他只让不大的一部分兵力作了行动的准备。他所做到的唯一的一点，就是引起敌人对他的军队的敬佩。他退到奥尔良前方的筑垒阵地上，把全部兵力集中在这里。他把这些兵力从右至左作了如下的部署：第十八军在极右翼，其次是第二十军和第十五军，这 3 个军全部在巴黎—奥尔良铁路以东；第十六军在铁路以西，第十七军在极左翼。这些军队如果能及时地集中起来，几乎是无需怀疑他们能粉碎当时不足 5 万人的弗里德里希—卡尔的军团。但是等到奥雷耳在他的阵地上完全巩固下来的时候，梅克伦堡大公却又向南前进了，并同他的堂弟(梅克伦堡大公现在归他指挥)的军团的右翼会合了。这样一来，梅克伦堡大公的 4 万人已经赶到，以参加对奥雷耳的协同进攻，而勒芒的法军却因陶醉于他“击退了”敌人的光荣，安然留在距决定战局命运的地点约 60 英里的地方。

此后，完全出人意外地传来了 11 月 30 日特罗胥出击的消息。应当作出新的努力来支援他。于是，奥雷耳在 12 月 1 日对普军发起了总攻，但是已经太晚了。当德军用全部兵力迎击他的时候，他的极右翼的第十八军看来由于被引向错误的道路而根本没有参加战斗。这样，奥雷耳只有 4 个军作战，这就是说，他的军队的（实际用于战斗的）数量大概只略多于敌军的人数。奥雷耳被击败了，而且看来还在实际被击败以前他就感觉到自己被击败了。由于这一点，他表现出犹豫不决：12 月 3 日傍晚他下令退过卢瓦尔河，第二天早晨又取消了这个命令，决定防守奥尔良。这种做法得到了通常的结果：“朝令夕改，一片混乱。”当普军集中进攻他的左翼和中央的时候，他的右翼的两个军显然由于接到互相矛盾的命令而让敌人截断了通往奥尔良的退路，第二十军只得在雅尔若而第十八军只得在更靠东的修利渡过卢瓦尔河。第十八军的一小部分看来被驱逐到了更加靠东的地方，因为 12 月 7 日他们被普鲁士第三军在纪安附近的讷瓦发现了，而后者从那里一直沿着卢瓦尔河右岸向布里阿尔方向追击他们。德军于 12 月 4 日晚占领了奥尔良，随即组织了对法军的追击。当普鲁士第三军沿卢瓦尔河上游的右岸前进时，第十军被派往维埃尔宗，而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则沿卢瓦尔河右岸向布卢瓦挺进。后者尚未到达布卢瓦，就在博让西附近同至少是勒芒军队的一部分遭遇，而这时勒芒的军队终于同尚济的军队会合了，并且进行了顽强的、部分成功的抵抗。但是这个抵抗不久便被粉碎了，因为普鲁士第九军正沿卢瓦尔河左岸向布卢瓦前进，而到了那里它就会截断尚济向图尔的退路。这一迂回运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尚济放弃了受到威胁的阵地，布卢瓦落入了入侵的敌人手中。解冻和不久前的大雨损坏了

道路，使德军停止继续追击。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大本营发出电报称：卢瓦尔军团已完全被打散，其中央已被突破并且它作为一个军团已不复存在。这一切说得很中听，但远不符合事实。甚至根据德方的消息也无可怀疑，在奥尔良缴获的 77 门火炮，几乎全是遗留在工事内的海军火炮。可能有 1 万名法军（连伤员在内总共 14000 人）被俘，而且其中大部分人士气都很低落。但是 12 月 5 日那些完全没有秩序的、既无武器又无背囊的巴伐利亚兵士成群结伙地沿阿尔特讷到沙特尔多的大道蹒跚而过的情形，比起上面说的也好不了多少。在 5 日和 5 日以后的追击中，德军一无所获！而如果卢瓦尔军团被击溃了，那末大家知道，普军拥有的行动积极而人数很多的骑兵，必定会俘掳这个军团的大量兵士。客气一点说，这里存在相当大的出入。解冻不能成为理由：解冻是从 9 日左右开始的，因此还有四五天的时间可以在很好通过的道路和田野上进行积极的追击。普军停止进攻的原因与其说是解冻，不如说是他们感到 9 万军队（其人数由于损失和在后方留下警备部队而减到 6 万左右）差不多筋疲力竭了。他们几乎落到了甚至对被击溃的敌人进行追击都是不明智的这种地步。普军可能向南方举行大规模的扫荡，但他们未必能占领新的地区。现在已经分为两个军团（一个归布尔巴基指挥，另一个归尚济指挥）的卢瓦尔军团，将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改编和整顿新建的营。卢瓦尔军团由于分编而不再作为一个军团存在了；但卢瓦尔军团是这次战争中没有蒙受耻辱的第一个军团。我们将来还可能听到接替了它的两个军团的消息。

然而，普鲁士却显露了兵源枯竭的迹象。尽管法律规定后备军在 32 岁以后免服现役，但是现在却在征集 40 岁和 40 岁以上的

后备军。全国受过训练的预备兵员已经耗尽。1月份将有一批约9万人的新兵从北德意志派往法国。总的说来，这可能就是我们听说得很多但至今还未见到的那15万人；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将使普军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这次战争造成的兵力损耗是巨大的并且正在与日俱增。无论是从军队寄出的书信的那种忧郁的情调还是伤亡名单都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名单中，现在主要的已经不是大规模会战中的伤亡，而是一两个、三五个人被打死的小规模战斗中的伤亡。人民战争的浪潮不断消耗着敌人兵力，将把一支最大的军队逐渐地损坏和零敲碎打地摧毁，而最重要的是，人们看不到这一点能因对方的相应损失而抵销。只要巴黎能坚持住，法军的处境就会日益改善，而在凡尔赛等待巴黎投降的那种焦急心情，是这个城市还可以威胁围攻军队的最好的证明。

载于1870年12月17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24号

战争短评(三十二)

上周的战斗行动证明,我们曾怎样正确地估计了交战双方的态势,当时我们断定,从麦茨到达卢瓦尔河和诺曼底的德军已经大大丧失了夺取新地区的能力^①。从那时起,德军占领的地区几乎丝毫没有扩大。梅克伦堡大公率领冯·德尔·坦恩的巴伐利亚军队(尽管他们漫无组织,缺少鞋子,但是在前线上没有他们却不行)以及第十军、第十七师和第二十二师,顽强地追击了尚济的军队,后者且战且退,缓慢地从博让西退到布卢瓦,从布卢瓦退到旺多姆、埃皮色及其以西的地方。尚济防守了从北面流入卢瓦尔河的小河所形成的全部阵地,而当普鲁士第九军(或至少是该军的黑森师)从卢瓦尔河左岸开来,在布卢瓦附近迂回了他的右翼的时候,他便退到旺多姆,在卢瓦河一线占领阵地。在12月14日和15日,尽管敌人发动几次攻击,他仍然守住了这个阵地,但在15日傍晚放弃了阵地,缓慢地、毫不慌乱地向勒芒退却。17日在埃皮色附近,也就是在从旺多姆和莫雷到圣加来的两条道路的汇合点附近,他同冯·德尔·坦恩的军队又进行了一次后卫战,然后继续退却,但德军看来并没有追击很远。

显然,整个这次退却是进行得十分谨慎的。自从决定把原来的

^① 见本卷第211—212页。——编者注

卢瓦尔军团分为两部分以后,其中一部分归布尔巴基指挥的应当在奥尔良以南作战,而另一部分归尚济指挥(勒芒附近的部队也归他指挥)的则应当防守卢瓦尔河以北的法国西部;在采取了这个措施以后,尚济就不能把决战作为自己的目的了。相反,他的计划必须是尽可能地坚守每一寸土地而避免卷入决战的危险,从而给敌人造成尽可能严重的损失,并且在炮火中锻炼自己的新编部队保持秩序和坚定性。在这次退却中他损失的人员自然会比敌人的多,尤其是很多人掉队,但这些都是各营最差的兵士,没有他们,他也完全可以应付。他也许能够保持他的军队的士气,同时继续使敌人对共和国的军队表示卢瓦尔军团已经赢得的那种尊敬。并且他很快就会达到这样的转折时机,即追击他的敌军由于战斗的伤亡、疾病以及由于必须派兵留守后方的补给线而被削弱,因而必定会放弃追击,或者本身也要冒失败的危险。这种转折地点很可能就是勒芒;那里,在伊夫雷-勒韦克和孔利有两个训练兵营,并有一支人数不定、组织程度不等、装备不一的军队;但是在那里组织严密的营无疑比尚济为了击退梅克伦堡大公的任何进攻所需的营还要多。普军司令官,确切些说,他的参谋长施托什将军(他实际上指挥着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的进军),大概已觉察到这一点了。果然,自从我们听说北德意志第十军于18日把尚济追击到埃皮色以西以后,现在又听说福伊格茨-雷茨将军(他指挥的就是这个第十军)于21日在蒙乃郊区击败了一支法军,并把他们逐到了诺特丹-多厄以南。蒙乃在埃皮色以南约35英里处,位于从旺多姆到图尔的道路上,而诺特丹-多厄离图尔比蒙乃要近几英里。由此可见,在把尚济的主力一直追击到勒芒以后,现在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至少是一部分兵力)大概要向图尔前进,此刻他们也许已经到达图

尔,但他们未必能长期占领这个地方。

普鲁士评论家指责卢瓦尔军团在奥尔良会战以后所进行的离心退却,并断言法军只是由于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突破了他们的中央”的强有力的行动才不得不采取这一错误步骤。我们可以同意,这次离心退却和随后把军团分为两个独立的部份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奥雷耳遭到敌人打击时的错误部署造成的。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法国要组织军队,首先需要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要有尽量多的地区,以便在那里准备组织军队的手段——人力和物力。法国暂时还无力求取决战,因此,它应当设法使尽可能多的地区不被敌人占领。既然现在入侵已经进入一个攻防双方兵力几乎平衡的阶段,防御军队也就不必要按照决战的要求来集中。相反,他们可以不冒多大危险地分成几支大部队,以便能够守住尽可能多的地区,并且用足以阻碍敌人实行长期占领的大兵力,来抵抗敌人在任何方向上所能发动的进攻。既然在勒芒附近还有约6万、也许是10万人(固然,他们的装备、训练和纪律都很差,但是正在日益改善),既然这些军队的装具、武器和补给所需的经费已经在法国西部筹集好了,那末仅仅因为战略理论要求败军在一般情况下要作为一个整体实行退却而把这一切统统放弃,就是很大的错误;在目前,只有向南运动和放弃保卫西部地区,才能达到这种要求。相反地,在勒芒附近两个兵营中现在有足够的力量可用来逐渐建立起甚至比原来的卢瓦尔军团还要强大的西方军团,而整个南方也可以为布尔巴基的部队建立补充部队。由此可见,这种措施乍看起来似乎是错误的,但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这一措施丝毫也不会妨碍全部法军在经过一段时期以后能够协同地进行决战。

图尔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介于法国西北和南部之间的最西面的一个铁路枢纽。如果图尔长期被普军占领,那末尚济无论是同波尔多政府还是同在布尔日的布尔巴基都无法取得铁路联系。但是普军以现有的兵力是没有希望守住图尔的。他们在那里的地位不会比冯·德尔·坦恩 11 月初在奥尔良的地位稳固。因此图尔的暂时失守虽然不利,这毕竟是可以忍受的。

关于德军的其他部队,我们听到的消息很少。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和第三军(可能还有第九军的一半)一起,完全不见了,而这决不能证明他还有力量进攻。曼托伊费尔的部队被迫只能起到一支执行征发任务的大游动队的作用;看来他们不可能长期占领比卢昂更远的地区。在韦德尔的周围,四面八方都有游击队活动,他只有依靠积极的行动才能在第戎坚持下去,而与此同时,他突然发现,如果他想保证后方的安全,就必须把兰格也封锁起来。我们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可以调来军队担负这个任务,他自己是派不出一兵一卒来的,而在伯尔福附近和亚尔萨斯的后备军也自顾不暇。由此可见,双方兵力大概到处都几乎势均力敌了。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谁获得更多援军的竞赛,而在这场竞赛中,法国领先的机会比 3 个月以前大得多。假如我们能有把握地说,巴黎将坚持到 2 月底,那末我们大概就可以相信法国将在这场竞赛中获胜。

载于 1870 年 12 月 23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29 号

德军在法国的状况

在德国,这次战争中兵源枯竭的情况已开始表现出来了。最初的入侵军,包括南北德意志的全部基干部队在内,约达64万人。经过两个月的战斗,这支军队的人数锐减,以致不得不把从各个步兵后备营和骑兵后备连抽调出来的第一批兵士(约为最初的入侵军人数的三分之一)派赴前线。他们在9月底和10月初开到了法国。尽管他们的人数可能达20万人,但作战军队的各营仍远没有补充到1000人的最初名额。巴黎城下各营的人数为700—800人,而麦茨城下各营的人数则更少。不久,疾病和战斗又造成了更大的减员,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卢瓦尔河时,他的3个军已减少到不足正常编制人数的一半,即平均每营450人。本月的战斗以及严寒多变的天气,势必严重影响巴黎城下的军队和掩护包围的军队;因此各营现在无疑平均不到400人。1870年征集的新兵,经过3个月的训练,将于1871年1月初做好派往前线的准备。这些新兵约为11万人,每营可以得到略少于300人的补充。我们现在听说,其中一部分已经越过了南锡,并且每天都有新的补充兵员源源开来;因此各营很快又可补充到650人左右。如果其余那些未经训练的、年纪更轻的可用的人员(补充兵)果真同本年度的新兵一起受过了训练(从许多迹象来看这是可能的),那末每个营又可多补充100人,使每营达到750人。这样就大约等于原来人数的四

分之三，并将组成一支 48 万人的军队（从德国派赴前线的共 100 万人）。由此可见，德国派出的各基干团原有的和以后补充的人员，在不到 4 个月的时间内已有一半以上死亡或成了残废。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那末就请他用以往各次战局（例如 1813 年和 1814 年的战局）中的伤亡来作一比较；同时还请他注意，在这次战争中，普军连续不断的长时间的和急速的行军必然给军队以极其严重的影响。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谈到基干部队。除开它们以外，几乎全部的后备军也被派到了法国。最初，后备军的每个近卫营为 800 人，其他营则为 500 人；但它们的人数全都逐渐增加到每营 1000 人。这些营加上骑兵和炮兵，总共为 24 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已来法国一定时间，他们在担任警卫交通线和封锁要塞等任务。但是即使担任这个任务，他们的人数看来也是不足的，因此目前后备军又在建立 4 个师（大概是在后备军的每个团设一个第三营），至少有 50 个营，5 万人。他们全部必须在现在派往法国。那些仍然留在德国看管法国战俘的部队，想必由新编的“警备营”来接替。在收到关于建立这些营的命令全文以前，我们不能断定它们由哪些人编成，而关于这个命令暂时还只有一条简短的电讯。但是，如果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上面提到的后备军 4 个新的师不依靠征集 40 岁甚至 40 岁以上的人便不能建立起来，那末除了 40 岁到 50 岁的人以外，还有哪些受过训练的兵士留给警备营呢？毫无疑问，这个措施正在耗尽德国的有训练的预备兵员，此外还耗尽整整一个年度内所征集的新兵。

后备军在法国行军、露营和作战的次数，要比基干部队少得多。这些后备军大部分住着相当好的营舍，给养充足，勤务也不繁

重；因此可以认为，其死亡和因残废离队的总人数约为4万。现在，包括目前正在建立的新编各营在内，后备军尚有25万人；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经过多久才能够——如果说总有一天能够的话——把他们全部调到国外去执行勤务。可以说，在未来两个月普军在法国的后备军战斗人员最多为20万人。

因此，到1月下半月，德军在法作战的基干部队和后备军一起大约为65万到68万人，其中15万到20万人现在正在去法国途中或正在准备出发。但这些部队大大不同于迄今在法国使用的部队。各基干营整整有一半人是20岁或21岁的没有经验的青年，冬季作战的困难对这种年龄的人的健康具有特别严重的影响。这些人很快就要挤满医院，而各营的人数又将开始下降。与此同时，后备军里越来越多的是32岁以上、几乎全都结过婚并有子女的人，也就是年龄大而在寒冷或潮湿的天气里露营几乎肯定会普遍得风湿症的人。毫无疑问，由于后备军必须防守的地区的扩大，大多数部队的行军和作战要比以前频繁得多。基干部队的兵士比以前的年轻得多，后备军的兵士则比以前的年老得多；补充基干部队的新兵几乎没有时间来受军事训练和熟悉纪律；而补充后备军的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来忘掉这些东西。由此可见，德军中包含的成分使德军在质量上比以前大大接近于同它作战的法军新编部队。但是，德军有一个优越条件，即这些成分都被并入老部队的坚强而稳定的骨干中去。

除此而外，普鲁士还有哪些兵源呢？有到1871年才满20岁的新兵和一些年纪大的补充兵。后者全都没有受过训练，几乎全都是已婚者，并且已到了不愿或不能当兵的年龄。把那些长期以来就习惯于认为自己同军队只有形式上的关系的人征集入伍，这是极其

不得人心的。而把那些身体状况虽然适合服役但由于某种原因得以完全免役的人征集入伍，那就更不得人心了。在纯粹防御性的战争中，他们全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但是在掠夺性的战争中，而且在掠夺政策的成功成为疑问的时候，是不能指望他们做到这一点的。要用一支主要由已婚男子组成的军队进行一场胜败不定的掠夺性战争，终究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战争中，一两次严重的失败，必然会使这种军队士气沮丧。普军由于战争的拖延愈成为真正的“全民武装”，它进行掠夺的能力就愈小。让德国的庸人们疯狂地叫嚷要征服亚尔萨斯和洛林吧！然而无需怀疑，德国不可能为了征服这两个地区而忍受像法国为了自卫甘愿忍受的那种艰苦、社会生活的破坏和国家生产的停顿。这班德国的庸人只要一穿上军装，开到前线，他们的狂热很快就会在法国战场上的某地或者在露营地的凛冽的寒风中冷却下来。因此，如果两个民族真正手执武器面对面，结局对他们也许是最好的了。

载于 1870 年 12 月 24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30 号

战争短评(三十三)

从圣诞节起对巴黎的真正围攻开始了。在这以前,只不过是包围了这个巨大的要塞而已。固然,已构筑好重型攻城炮的炮台并且集结了攻城炮兵,但是没有一门火炮进入阵地,没有开设一个炮眼,没有发射一发炮弹。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巴黎的南面和西南面进行的。在其他方面也构筑了胸墙,但显然只是用于防御的目的,用于抵抗出击和掩护围攻军队的步兵和野战炮兵。这些工事距巴黎各堡垒自然要比炮队在正规围攻时所应配置的地点远;在这些工事和堡垒之间,有一个没有被任何一方占领的宽阔地带,这是法军可用以进行出击的地方。当特罗胥于11月30日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出击被击退时,他仍然控制着巴黎东面这一地带的一部分地区,包括罗尼堡垒前面独立的蒙亚佛隆高地。特罗胥已开始在这个高地上构筑工事;从哪一天起,我们不确切知道,但12月17日我们听到有人提及,不论是蒙亚佛隆高地或者瓦朗各高地(在马尔纳河弯曲处),都已构筑了工事,并且配置了重炮。

除了巴黎南面的维特里和维耳茹伊弗附近的看来并没有多大作用的几座前进多面堡外,我们看到在这里防御者初次企图大规模地用挖掘反接近壕的方法来扩大自己的阵地。在这里我们自然应当拿塞瓦斯托波尔来对比。在联军开始围攻作业4个多月以后,即到1855年2月底,当围攻者深受严寒之苦的时候,托特列本开

始在当时距自己防线相当远的距离上构筑前进工事。2月28日，他在距要塞主墙1100码的地方构筑了色楞格多面堡；当日，联军对这个新工事的攻击遭到了失败；3月1日，在距要塞围墙1450码的地方构筑了另一个更向前突出的沃伦多面堡。这两个多面堡被联军称为《ouvrages blancs》（“白色多面堡”）。3月12日，在距要塞围墙800码的地方，构筑了堪察加眼镜堡，它被联军称为《Mamelon vert》（“绿色山冈”）。在所有这些工事的前面都挖有战壕。3月22日的攻击被击退了，并且全部工事，包括《Mamelon vert》右方的工事，即“采石场”，也完全构筑成功了；所有这些多面堡都有隐蔽路相连。在整个4月和5月期间，联军企图再度夺取筑有这些工事的地方，但毫无结果。他们不得不挖掘在正规围攻时采用的接近壕向这些工事逼近，而且到6月7日，当大量援兵到达的时候，他们才得以用强攻夺取这些工事。这样一来，尽管这些向前突出的野战工事遭到了当时威力最大的海军火炮的轰击，但它们使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时间推后了整整3个月。

假如把上面说的一切同蒙亚佛隆高地的防御加以对比，那末后者就显得很可怜了。12月17日，法军花了两个多星期来构筑工事以后，把炮台筑成了。在这期间，围攻军队调来了攻城炮，主要是在以前的围攻中用过的旧式炮。22日，德军筑成了对付蒙亚佛隆高地的炮台，但在法军 en masse（大规模）出击的威胁完全消除以前，以及在巴黎军团于26日在德朗西周围停止构筑阵地以前，德军并没有采取任何战斗行动。12月27日，德军炮队开始射击，一直持续到28日和29日。法军工事的火力不久即被压制住，而29日，这些工事就放弃了，据法军公报称，其原因是在这些工事中并没有守军的掩蔽穹窿。

这无疑是一次可怜的防御，而为其作的辩解就更加可怜了。主要缺陷显然在于工事的结构不完善。根据各方面的消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蒙亚佛隆高地没有一个闭合的多面堡，而只有一些背面暴露，甚至两侧也没有可靠的掩护的炮台。此外，这些炮台显然只有一个射向，即向南或向东南射击，然而在附近，在东北方向，却有兰西和蒙费尔梅两个高地，它们最便于德军对蒙亚佛隆高地进行炮击。围攻军队利用了这一点，把炮兵配置成一个半圆形来包围蒙亚佛隆高地，很快就压制住了蒙亚佛隆高地的火炮，并逐走了守军。但为什么没有构筑守军的掩蔽部呢？严寒只能作为辩解的一半理由，因为法军曾有足够的时间，而且俄军冬天在克里木的岩石上能做到的，法军在1870年12月在巴黎附近也应该能做到。当然，轰击蒙亚佛隆高地的火炮比联军在塞瓦斯托波尔所用的火炮威力大得多，但是这正是曾轰击过杜佩尔¹¹⁵的多面堡的火炮，而杜佩尔的多面堡也是野战工事，却支持了3个星期。有人推测，守备的步兵逃跑了，结果使炮兵失去了掩护。这是可能的，但这并不能为构筑这些工事的工程师辩护。根据这些工事的结构来判断，巴黎的工程指挥部一定组织得很差。

蒙亚佛隆高地的工事迅速被摧毁，刺激了围攻军队继续获取这种胜利的胃口。他们对东面的各堡垒，特别是对努瓦济、罗尼和诺让这三座堡垒进行了炮击。经过两天的炮击，所有这些堡垒几乎都被压制住了。此外还对这些堡垒采取过什么行动，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关于这些堡垒之间的防御工事的炮火，没有任何消息。但我们可以相信，围攻军队会竭尽全力向这些堡垒挖掘接近壕（尽管是一些极简单的接近壕），从而保证稳固地扼守蒙亚佛隆的阵地。如果围攻军队不管天气如何，而在这方面取得比法军更大的进

展,那是不会使我们惊奇的。

但是,所有这些事件对围攻的进程有什么影响呢?没有疑问,如果这三座堡垒落入普军手中,这将是普军的一个很大的胜利,使他们能够把炮队推进到距要塞围墙 3000—4000 码的地方。不过,这些堡垒决不是不可避免地会这样迅速陷落的。这些堡垒都设有守军的防弹穹窿;而围攻军队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把他们为数很少的线膛白炮运来。这种白炮是唯一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摧毁防弹掩蔽部的火炮;旧式白炮太不准确,不能很快奏效,而二十四磅炮(发射的炮弹重 64 磅)不能赋予足够大的射角来保证有效地进行曲射。如果说这些堡垒的炮火看来被压制住了,这也只能说明他们的火炮已经隐蔽起来,以便准备对付强攻。普军炮队可以破坏胸墙,但是还不能因此形成缺口。为了用间接的射击摧毁内岸的掩护严密的石砌部分,普军必须把炮队配置在距堡垒不超过 1000 码的地方。而要做到这点,只有挖掘在正规围攻时采用的平行壕和接近壕才行。普军常说的“快速”围攻法,仅在于从远距离上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以便能够在危险较小、时间较短的条件下挖好接近壕;然后以间接射击的方法进行极猛烈的炮击,并在围墙上打开缺口。如果所有这些措施仍不能迫使法军投降(而对于巴黎的堡垒来说,很难设想用这种办法能够迫使他们投降),那就只有用普通的方法把接近壕一直挖到斜堤,然后决定强攻。对杜佩尔的强攻是在接近壕已挖掘到距被摧毁的工事约 250 码的地方以后才进行的,而在斯特拉斯堡,对壕则用完全旧式的方法一直挖到了斜堤顶并且越过了斜堤顶。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必须再三重复我们在这些短评中屡次强调的观点,即巴黎的防御必须是积极的,而不应当仅仅是消极的。

现在是一个适于出击的空前未有的时机。当前的问题并不在于突破敌人的战线,而在于接受围攻者迫使被围者进行的那种局部性的战斗。围攻者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能在选定的任何地点取得对被围者的火力优势;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无可争辩的老真理;被围者如果不以积极、大胆和坚决的出击来弥补这个不可避免的固有的缺陷,那末他们就会错过最好的机会。据说,巴黎军队的士气已经低落;但这是毫无理由的。军队可能对自己的指挥官失去信任,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特罗胥继续无所作为,那末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自己的指挥官。

我们想用几句话谈谈某些人的奇妙臆测:即特罗胥似乎打算在巴黎陷落以后率领他的军队撤退到筑垒的半岛蒙瓦勒里安,把它当作卫城。这个异想天开的猜测,是凡尔赛普军参谋部内某些过分聪明的食客想出来的,所根据的主要事实是:在巴黎和上述半岛之间来往的马车络绎不绝。如果有人把构筑卫城的地方选在这样一个低洼的、冲积而成的、四面为高地瞰制、敌人可以了如指掌地看到军队配置情况并能从近距离射击的半岛上,那末他也真算得上是一个聪明非凡的将军了。但是,普军参谋部自成立以来,一直有这样一些超人的高瞻远瞩的人物的参与而给它带来很大的麻烦。他们总认为最可能的事情就是敌人在做最不可思议的蠢事。用德国的谚语来说,就是“他们听见草长”。凡是读过普鲁士军事著作的人,必然碰到过这类人物,但令人奇怪的只是,居然竟有人相信他们。

载于1871年1月6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41号

战争短评(三十四)

自从我们最近一次研究了交战双方在法国各地的态势^①以来,虽然发生过许多次战斗,但是变化很少,这证明我们关于双方兵力现在几乎形成均势的观点是正确的。

尚济的西方军团正扼守着勒芒前面的阵地;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在布卢瓦、旺多姆到韦尔纳伊一线上与它对峙。在旺多姆附近曾进行过多次局部的战斗,但双方军队的相对位置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这期间,尚济调集了已解散的孔利兵营中所有经过训练的、配有武器的人员;据报道,他已在勒芒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阵地作为一旦退却时的据点,并且人们估计,他现在打算重新采取攻势。因为甘必大先生已于5日由波尔多前往勒芒,所以这完全可能符合事实。关于尚济军队的实际人数和编制情况,我们仅仅知道,他在退到勒芒以前有3个军。关于同尚济直接对峙的军队的情况,我们知道的略多一点,梅克伦堡大公的军队和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原有的军队混合在一起,以致原来的 *ordre de bataille* (战斗序列) 不再有效了。我们将把这两者看做是一支军队,自从弗里德里希—卡尔担任总指挥后,他们实际上就已形成一支军队了;区别仅在于:梅克伦堡大公指挥配置在卢瓦尔河, *à cheval* (两岸)

^① 见本卷第 225—228 页。——编者注

正面向西的军队，而亲王则直接指挥配置在卢瓦尔河由布卢瓦到纪安一线正面向南、监视布尔巴基的军队。这两支军队共有 10 个步兵师和 3 个骑兵师，同时有许多分遣队留在从科梅尔西经特鲁瓦到卢瓦尔河的交通线上；这些分遣队只有被后备军新的部队替换以后才能陆续开来。

12 月 11 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到达布里阿尔，他企图向涅维尔进攻，以迂回布尔巴基的右翼，并切断他与另一部对韦德尔作战的法军的直接联系。但是，我们不久前得知，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在接到关于梅克伦堡大公突然遭到尚济的坚决抵抗的消息以后，便立刻放弃了这一计划，率领他的大部分军队转回来向图尔方面去了。如我们所知，他的军队已抵近图尔，但是没有开进该城。这样一来，我们现在了解，尚济的巧妙而大胆的退却，不仅保证了他自己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布尔巴基的安全。这位将军大约仍在布尔日和涅维尔附近。如果布尔巴基像人们所推测的那样，向东前进去攻击韦德尔或截断普军的交通线，那末我们现在就已听到他的消息了。他很可能正在整编和补充自己的军队，而且如果尚济转入进攻，我们无疑也会听到布尔巴基的消息。

在塞纳河以北，曼托伊费尔以其第一军扼守卢昂及其周围地区，同时又把他的第八军派遣到皮卡尔第。这个军在那里陷入了困境。费德尔布将军并没有使他的北方军团长期无所作为。在法国最北部从松姆河到比利时边境的三个省中，约有大小要塞 20 个；这些要塞在今天虽然在遇有大军从比利时入侵时将毫无用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却形成了一个最有利的和几乎是无法攻破的作战基地。在几乎两百年前，当沃邦设计这个三层要塞带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些要塞会成为法军抵御来自法国中心的敌人的巨大

营垒(类似扩大的四边形要塞区)。但是这成了事实,并且尽管这个地区范围小,它在目前情况下却是不可攻破的;此外,这个地区从工业资源、人口十分稠密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费德尔布由于维累尔—布雷顿讷附近的战斗(11月27日)¹¹⁶被击败而退到这个可靠的隐蔽地以后,整编并补充了自己的军队;在12月底,他又向亚眠前进,并于23日在阿吕河附近同曼托伊费尔进行了一次战斗,结果不分胜负。在这次战斗中,费德尔布用了4个师的兵力(根据他的资料为35000人)攻击普鲁士第八军的2个师(根据普军的资料为24000人)。他在这种兵力对比的条件下竟能敌得过像冯·哥本这样赫赫有名的将军,这个事实证明他的流动自卫军和新兵做出了成绩。后来,正如他本人所称,由于严寒以及军需品和辎重不足,可能还由于他不相信所属部队在苦战的第二天仍能保持坚定,他便几乎不受阻碍地退过了斯卡尔普河。冯·哥本留下第十六师的大部兵力保护交通线和包围佩龙讷城以后,对他进行了追击,并且只率领了第十五师和小阿尔勃莱希特亲王的游动队(至多为1个旅的兵力)向巴波姆和更远的地方前进。由此可见,优势当时是在费德尔布的4个师方面的。费德尔布毫不犹豫地离开自己的掩蔽阵地攻击普军。经1月2日的初战后,双方主力于次日在巴波姆附近进行了会战。费德尔布的明确报告,法军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如果根据上述材料确定双方的兵力,那末法军为8个旅,即至少33000人,而普军为3个旅,即16000—18000人)以及曼托伊费尔含糊其辞的说法,都使人不能怀疑,法军在这次会战中占了上风。此外,曼托伊费尔的夸夸其谈在德国是闻名的;大家记得,在他任什列斯维希公国的总督时,曾以身材高大著称,他表示决心“以七尺之躯捍卫每寸国土”。无疑,他的消息即使经过凡

尔赛的检查以后,也仍然是普军所有的消息中最不可靠的。同时,费德尔布并没有去扩大他的战果,而在会战以后退到位于战场后方几英里的一个村庄,因此佩龙讷城没有得到解救,并且正如本报所指出的那样,普军却得到了这次会战的全部战果。对于费德尔布为自己的退却辩解的理由,是不能信以为真的。但是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如果他只能用自己的军队击败普军的3个旅,然后退却,那末他是解救不了巴黎的。

在这期间,曼托伊费尔将很快得到大量的援兵。第七军第十四师(由卡梅克指挥)在占领蒙梅迪和梅济埃尔以后,正随带攻城炮兵纵列向他的作战地区开进。吉兹附近的一次战斗,看来是这次进军的一个阶段;吉兹在梅济埃尔到佩龙讷的直通大道上,佩龙讷自然是即将遭到炮击的下一个要塞。如果普军在各方面都进展顺利,继佩龙讷之后将要遭到炮击的可能是康布雷。

在东南方面,韦德尔自从12月27日撤离第戎以后便节节败退。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德国人才提到这一点,而这时普军仍继续保持完全的缄默;“卡尔斯卢厄日报”¹¹⁷在一个不显著的位置透露了这一消息。31日,经战斗后韦德尔又撤出了格雷城,现在正在维祖耳掩护对伯尔福的围攻。里昂军团在克雷美(据传他是一个流亡的汉诺威军官)的指挥下正在追击韦德尔,而加里波第看来正在更西的地方攻击普军的主要交通线。据说,韦德尔正在等待一支36000人的援军,他在维祖耳的态势将是相当稳定的,但是他的交通线看来远没有保障。现在我们得悉,第七军军长察斯特罗夫将军已被派到那里,并且已同韦德尔取得了联系。如果察斯特罗夫不受领新的任务,那末他将指挥在麦茨为后备军接替的步兵第十三师;此外,他还将指挥其他部队进行积极的战斗行动。看来,他的1个

营遭到了攻击，并且据说在从奥塞尔到索恩河岸夏龙的大道上的索利厄附近被击溃。至于在次要的铁路线上普军的联络情况（不包括南锡到巴黎的铁路主线的情况，因为该线防守森严，暂时是安全的），那可以从“科伦日报”¹¹⁸所发表的来自肖蒙（在上马尔纳）的一篇通讯中看出；这篇通讯的作者抱怨说，目前自由射手已第三次破坏了由肖蒙至特鲁瓦的铁路；在12月24日的最近一次，他们拆掉了钢轨的扣件，以致一列载运500名后备军的列车出了轨，接着自由射手便从森林中进行射击，但被击退了。这位记者认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诚实的而且是“可耻”的。这种说法完全与1849年在匈牙利的一名奥地利胸甲骑兵的说法相同：“这些骠骑兵难道不是可耻的暴徒吗？他们明明看见我披着胸甲，却仍然向我面部砍来。”

对于围攻巴黎的普军来说，这些交通线情况的好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交通中断几天，就会使围攻军在几个星期内受影响。普军明了这一点，现在正将其全部后备军集中在法国西北部，以便控制相当广大的地带，保证铁路线的安全。梅济埃尔的陷落给普军开辟了第二条由国境线经过提翁维耳、梅济埃尔和兰斯的铁路线；但是，它的一侧暴露给北方军团，因而是危险的。如果法军还有可能解救巴黎的话，那末截断这条交通线也许是最容易的一种方法。

载于1871年1月7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42号

战争短评(三十五)

双方进行野战的军队采取了两个容易导致战争危机的行动。第一个是布尔巴基向韦德尔的进军；第二个是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尚济的进军。

关于布尔巴基向东进军的传说，几乎流传了整整一个星期，不过这种传说和现在流传极广的其他传说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进军本身也许是一件很不错的事，但是还不能使人有理由相信它真能实现。然而，现在无需怀疑：布尔巴基至少已经率领第十八军和第二十军以及新编的第二十四军到达法国东部，取道伯桑松，绕过韦德尔在维祖耳的阵地向维祖耳和伯尔福之间的吕尔前进。1月9日，韦德尔在离吕尔不远的维累尔塞克塞耳向他攻击；发生了一次战斗，而且双方都自称取得了胜利。显然，这是一场后卫战，韦德尔大概依靠这场战斗保证了自己的退却。但是不论是谁在这第一次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一两天以后继之而来的必然是另一些将在这里导致危机的更为重要的战斗¹¹⁹。

如果布尔巴基以充足的兵力来进行这次进军，也就是说把其他地方并不是非要不可的每个人、每匹马和每门炮都利用上，如果这次进军以必要的毅力来实施，那末它也许能成为这次战争中的转折点。我们在以前就已指出德军的交通线太长这个弱点，以及法

军用大兵力进攻这一交通线来解救巴黎的可能性^①。现在赌注正是押在这一点上，能否如愿以偿那就要看赌技如何了。

目前占领法国的敌军中，几乎全部基干部队都用于围攻巴黎和掩护这个围攻了。在 35 个师（包括一直作为基干部队使用的后备军的近卫部队）中就有 32 个师用于这方面。2 个师（3 个巴登旅和 1 个普鲁士旅）归韦德尔掌握，同时察斯特罗夫指挥的 1 个师也已前去同他会合。此外，韦德尔至少还有后备军的 2 个师用于围攻伯尔福和占领阿尔萨斯南部的各个要塞。因此，由梅济埃尔经郎城和苏瓦松到巴黎以及由巴黎经奥塞尔和夏提荣到巴塞爾附近的许宁根一线东北的整个地区，连同这里全部已经夺得的要塞，都要用剩下的没有担任其他任务的后备军部队来扼守。如果我们注意到，在德国还有战俘需要看管，德国本土的要塞需要守备部队，而且只有 9 个普鲁士军（在 1866 年以前成立的）有足够的老兵可以补充后备军各营，而其他各军还要等 5 年才能提供这种补充兵员，那末我们就可以想像得到，剩下能用来占领法国这部分地区的部队是不可能太多的。固然，现在有 18 个后备营正被派往阿尔萨斯和洛林担任要塞的守备勤务，而新编的“警备营”则应该接替普鲁士国内的后备军。但是根据德方报纸报道，这些警备营的编组进行得很慢，因此，占领军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它只能勉强控制占领地区内的居民。

布尔巴基正是向这一部分德军前进的。他显然想把自己的军队插到维祖耳和伯尔福中间，从而孤立韦德尔，迫使他退往西北方向，然后单独地击败他。但是韦德尔现在可能是在伯尔福附近并且

^① 见本卷第 242 页。——编者注

已与特雷斯科夫会合,所以布尔巴基要给伯尔福解围,就必须打败他们两个;他应当把围攻军队逼退到莱茵河谷,然后才能沿佛日山脉西侧向吕内维尔前进,到了那里他就到达了德军主要的交通线。破坏法耳斯布尔附近的铁路隧道就可以长期封锁通往斯特拉斯堡的铁路线,破坏弗鲁阿尔的铁路枢纽站就可以使萨尔布吕肯和麦茨的铁路交通中断,甚至还能够派游动队到提翁维耳去破坏该地附近的铁路,以便切断德军的最后一条直达铁路线。这支游动队随时都可以退到卢森堡或比利时并在那里放下武器;这是完全合算的。

布尔巴基所抱的目的大概正是这样。由于巴黎四郊已被搜刮一空,巴黎与德国的交通线即使只中断几天,对于巴黎城外的24万德军也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而对于解除巴黎之围来说,在洛林的12—15万法军能够成为甚至比尚济对弗里德里希—卡尔的胜利还要有效的手段,因为后者在被击败时,最后还是向围攻巴黎的军队退却,以期获得他们的援助。固然,德军还有一条通过提翁维耳、梅济埃尔和兰斯的铁路,这条铁路大概是布尔巴基甚至用游动队也不能达到的,但是只要布尔巴基能够突入洛林,在敌占区内无疑就会掀起全面的人民起义;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沿这第二条铁路线运动将会遭到多么严重的威胁。此外,布尔巴基胜利的第一个后果就会是哥本被迫退却;因而也就给北方军团造成在苏瓦松和梅济埃尔之间切断这条交通线的机会。

我们认为,布尔巴基的这次进军是法国将军们在这次战争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最重要而且最有希望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再一次指出,这次进军必须适当地进行。最好的计划,如果执行不力,优柔寡断,也会毫无价值。在他同韦德尔的战斗结束以前,我们大概

无法知道有关布尔巴基的兵力或者他如何指挥兵力的任何确实消息。

但是我们听说：德军由于预见到这种情况，已决定将韦德尔军扩充为庞大的“第五军团”，由曼托伊费尔指挥，而曼托伊费尔应当把他的“第一军团”交给哥本指挥，并率领第二、七和十四军来援助韦德尔。但是第七军的第十三师已由察斯特罗夫率领前往维祖耳；第十四师刚刚占领梅济埃尔和罗克鲁阿，因此不能指望它很快到达维祖耳；第十四军就是一直由韦德尔指挥的那个军（由巴登师和哥尔茨所指挥的普鲁士第三十和第三十四团组成）；至于巴黎城下的第二军，我们估计，在巴黎投降以前是不会调动的，因为把它调走那里就会发生困难。然而即使现在就把这个军调出来，它也只能在韦德尔和布尔巴基的决战发生以后才会到来。至于从德国境内可能有的预备兵力中能否给韦德尔派出其他援军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第一，所有可以利用的后备军都已经派出或者正在派出；第二，后备营（现在仅有的后备兵力）已经训练出来的兵士刚被调走，现在只剩下一些骨干。因此，布尔巴基无论如何必须在德军所期望的援军到达以前进行第一次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战。如果他胜利了，他就将处于有利态势，可以随着这些增援部队从各个方向逐渐到来一一对付他们。

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向勒芒的进军虽然胜利了，但是仍然可能犯了德军在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错误，即他集中全部兵力来对付尚济而让布尔巴基得到了完全的行动自由。尚济无疑是他的直接的、并且在目前还是最危险的敌人。但是在尚济所在的地区是不可能取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的。尚济刚遭惨败¹²⁰，这在目前使他放弃了援救巴黎的企图，但是并没有使他丧失采取其

他行动的可能性。只要尚济愿意,他既可以向布列塔尼也可以向卡耳瓦多斯退却。在这两种场合,在他退却的终点都有一个巨大的海军兵工厂——布勒斯特或瑟堡,这两个地方都有独立堡垒可以掩蔽他的军队,直到法国舰队把他们运往卢瓦尔河以南或松姆河以北为止。所以,法国西部是法军可以交替使用进攻和后退来牵制敌人的兵力而绝不会陷入绝境的地区。如果我们得悉,由于甘必大的坚持尚济出而应战,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因为据说甘必大已经到了尚济那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甘必大无疑是要使军事考虑服从于政治考虑。尚济在遭受失败并丧失勒芒以后,除了把弗里德里希—卡尔尽可能远地向西吸引开,以便使这一部分普军在布尔巴基开始进军的时候完全不起作用以外,不能有比这更好的行动了。

处在北部的费德尔布显然过于软弱,不能对哥本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既然尚济很明显地不能打败弗里德里希—卡尔从而援救巴黎,那末他最好是把相当大的兵力派往北方,肃清亚眠和卢昂的哥本部队,并以集中的兵力向梅济埃尔到巴黎的铁路线试行突进;现在,当布尔巴基正在威胁德军的另一条铁路的时候,这样做尤其重要。交通线是军队部署中的要害;正当布尔巴基在洛林南部开始活动的时候,如果那条无论在苏瓦松或勒太耳附近都容易遭受来自北方的攻击的北部交通线受到严重威胁,我们就会看到,凡尔赛将突然出现极其严重的混乱。

载于 1871 年 1 月 14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48 号

战争短评(三十六)

从巴黎继色当之后第一次受到敌人进攻的严重威胁时起,我们就经常指出像巴黎这样一个筑垒的首都的巨大威力,但我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忘记指出,要想充分发挥巴黎的防御力量,必须有一支庞大的正规军防守它,这支军队要强大到使敌人既不能把它封锁在堡垒以内,也不能妨碍它在要塞周围的平地上机动,这时要塞可以作为它的中枢或部分地作为它的作战基地。

在正常的条件下,这样的军队当然几乎是随时都有的。法军各军团在边境附近失败以后,可以向巴黎,即向其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据点退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保持足够的兵力到达这里,并且可以得到足够的援军,以便能够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但是这一次,第二帝国的战略使法军所有的军团都从战场上消失了。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战略,其中一个军团被围于麦茨,而且根据各种征候来看,没有任何得救的希望;另一个军团就干脆在色当投降了。当普军来到巴黎城郊的时候,准备防守巴黎的全部兵力只是一些缺额一半的后备部队,一些从外地来的流动自卫军(刚刚征召来的)和地方国民自卫军(编组起来的还不到一半)。

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要塞本身的威力在夺取者看来仍然是如此强大,对这个筑有外围工事的大城市进行 *lege artis* (正规) 攻击的任务是如此艰巨,以致他们立刻放弃了这个攻击任务,

而宁愿用饥困的方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这时，昂利·罗什弗尔和其他一些人组成了一个“街垒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受命建立第三道内部防线，以便使城市适于进行符合巴黎人特点的战斗，即适于进行街垒战和房屋争夺战。当时报纸百般嘲笑这个委员会；但是来自普军参谋部的半官方的消息令人毫不怀疑，德军主要是因为预料必然会遇到坚决的街垒抵抗，所以才不得不决定用饥困的办法来迫使这个要塞投降。普军清楚地知道，堡垒及其后面的要塞围墙如果仅仅由炮兵防守，那末经过一段时间必然会被攻陷，但那时战事就会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就是新兵、甚至老百姓都会成为像老兵一样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必须逐屋和逐街地夺取，因此，考虑到防御者人数众多，进攻者无疑要付出巨大牺牲。凡是关心这个问题而去看报的人都可以看到，普鲁士“国家通报”¹²¹把这个考虑作为放弃正规围攻的主要原因。

围城是在9月19日，即在整整4个月以前开始的。第二天，指挥巴黎正规军队的杜克罗将军率领3个师向克拉马尔方向出击，结果损失7门火炮，被俘3000人。在这次出击以后，9月23日和30日，10月13日和21日又进行了同样的出击；所有这几次出击都使法军遭到重大损失，大概除了使新兵习惯了敌人的炮火以外，一无所获。28日又对勒—布尔热村进行了一次比较顺利的出击：该村被占领并且扼守了两天；但是普鲁士第二近卫师（共13个营，当时总共不到1万人）在30日又夺回了该村。法军无疑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两天，在这两天中，他们本来是可以把这个筑有坚固建筑物的村庄变成要塞的；他们也没有注意建立预备队，以便及时援助防御者。否则，这样少的兵力是不能从他们手中夺回这个地方的。

在这样几次努力以后，接着是一个月的间歇。显然，特罗胥在敢于重新进行大规模出击以前，打算加强军队的训练并巩固纪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忽视了组织前哨、侦察队和巡逻队的战斗行动，设伏和奇袭等，总之，他忽视了巴黎周围前线的兵士现在所经常做的一切，而这种行动却最能用来培养新部队对军官的信任和自信心并使他们习惯于沉着应战。部队只要了解他们能够以小部队（单独的班、半连或连）对敌人的同样的小部队进行突然袭击，打败并俘获他们，就会很快学会以一营对一营来同敌人作战。此外，他们会由此懂得什么是警戒勤务，而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在12月似乎还不懂得这种勤务。

11月28日，终于开始了一连串的出击，这些出击最后发展成为11月30日渡过马尔纳河的大规模出击和巴黎东线的全面进攻。12月2日，德军重新占领了布里和尚皮尼的一部分，第二天，法军就退过了马尔纳河。作为突破围攻者在巴黎周围的筑垒线的尝试来说，这次进攻是彻底失败了，这次进攻没有以应有的毅力来进行。但是经过这次进攻，法军得到了战线前面在此以前不属于任何一方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他们获得了从德朗西到马尔纳河岸的讷伊附近宽约2英里的地区，这个地区完全为法军堡垒的火力控制，有许多筑有坚固建筑物的、利于防御的村庄，同时还有能瞰制周围地区的法军新阵地——蒙亚佛隆高地。因此，在这里可以不断地扩大防御地区；如果牢牢地巩固这一地区，就可以继续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或者围攻者的战线显得“凸出”，以致法军有可能对它进行顺利的攻击，或者围攻者在这里集中大量的兵力，而不得不削弱战线其他地段上的兵力，从而会有利于法军的进攻。这个地区被法军控制了整整一个月。德军不得不用攻城炮

队来对付蒙亚佛隆，这样，总共经过两天的炮击便把法军赶出了该地；蒙亚佛隆一经失守，其他阵地也就放弃了。诚然，21日又在整个东北线和东线重新发起进攻，占领了勒—布尔热的一半，占领了梅宗—布朗希和维耳—埃夫腊尔，但就在当夜，这些有利的阵地又全部丧失了。部队被留在堡垒的前面，在零下9—21度的气温下就地露营，但是最后还是撤进了掩蔽工事，因为不言而喻，他们经不起在这样的气温下露营。上述这个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能说明巴黎防御中所表现的那种无决心，无毅力，那种 mollesse (萎靡不振)、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消极懈怠。

蒙亚佛隆的战斗终于促使普军由包围转而采取真正的围攻，并且使用了为应付意外情况而准备的攻城炮兵。12月30日开始对东北部和东部的堡垒进行正规的炮击；1月5日开始对南部的堡垒进行正规的炮击。这两次炮击都是毫不间断地进行的，不久以前又对城市本身进行了炮击，这是一种毫无理性的暴行。对巴黎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炮击，丝毫也不能加速它的投降，关于这一点谁都没有凡尔赛参谋部知道得清楚，而且谁也没有像凡尔赛参谋部那样经常地提出理由在报纸上说明这一点。在炮击堡垒以后，接着就挖掘正规的平行壕，至少是围攻伊西堡垒的平行壕；据说，火炮已进入靠近堡垒的炮位，如果防御者不采取比以前坚决的进攻行动，那末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听到一个或几个堡垒遭到严重破坏的消息。

但是，特罗胥仍然有意或无意地按兵不动。最近几天中为数不多的几次出击，看来正如特罗胥的非难者在“世纪报”上所說的，是太“不切实际”了。据说，兵士们拒绝服从军官。如果真是这样，那末这只是证明，兵士们已完全失去对最高司令官的信任。我们的

确不能不得出结论：更换巴黎的最高司令官已成为必要的了。全部防御行动的犹豫不决、萎靡不振和软弱无力，这一切不能完全归咎于军队的素质低劣。阵地扼守了一个月之久（在这一个月当中只有约 10 天是真正严寒的日子），却没有妥善地加以巩固，这只能责备特罗胥，因为他应当督促做好这件事。而且这一个月又是围攻的紧要关头，究竟哪一方，是围攻者还是被围者将取得这个地区的问题，到这个月底应该见分晓。不是军队，而是总司令的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使得在胜败关头形势变得不利于被围者。

但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呢？堡垒正遭受着敌人的炮击，围攻者的炮队步步逼近；而法军的炮兵，如特罗胥自己所承认的，却抵不过进攻的敌人的炮兵。如果垒墙仅仅由炮兵来防守，那末就可以准确地算出在这种情况下垒墙（石砌部分等）被毁的时间。按兵不动和犹豫不决是不能挽救它们的。应当有所作为了，如果特罗胥无能为力，那他最好让别人来试一试。

金累克曾给后代记述了一段情节，在其中特罗胥所表现的性格和在这次巴黎防御中所表现的完全一样。当腊格伦勋爵和圣阿尔诺都已决定向瓦尔那进军¹²²，而且英国的轻装师已经出发的时候，特罗胥上校——“一个谨慎的爱深思的、精通战略学的人”——拜访了腊格伦勋爵，

“人们猜测，他的使命是约束法国元帅的轻举妄动”。

特罗胥上校和腊格伦举行了会谈；结果，圣阿尔诺宣布，他决定

“只向瓦尔那派出一个师，而且把其余的部队不是配置在巴尔干山脉的前面，而是配置在中的后面”¹²³，

同时劝腊格伦勋爵也照他这样做。

而这正是土耳其军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几乎在多瑙河上取得了胜利的时候！

可能有人会说，巴黎的军队已经士气沮丧，他们再不能进行大规模的出击了，现在向普军的围攻工事出击已经太晚了，特罗胥也许是要保存自己的部队，以便在最后的时刻使用他的全部兵力等等。但是，如果说巴黎 50 万武装人员要向人数比他们少一半以上而且处在非常不利于防御的阵地上的敌人投降，那末在全世界和他们自己还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素质不如敌人以前，他们当然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绝对不能安然无事地坐着，吃尽最后一点贮粮，然后投降！如果他们士气沮丧，那末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被彻底打败了呢，还是因为他们对特罗胥失去了任何信任？如果说现在出击就已经晚了，那末再过一个月就更不可能进行了。至于特罗胥本人的末日，那末来得愈早愈好；现在兵士们的伙食还相当好，体力也还比较强，但是到了 2 月他们的情况又将如何，那就难说了。

载于 1871 年 1 月 19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52 号

战争短评(三十七)

这一周对法军来说是非常不幸的一周。在尚济失败以后,接着便是布尔巴基在伯尔福附近的进攻被击退,而现在,据普方消息,费德尔布又在圣昆廷遭到了失败¹²⁴。

对于布尔巴基的失败不可能有任何怀疑。从9日维累尔塞克塞耳的战斗起,他的行动就显得缓慢了,这证明不是这位将军犹豫不决,就是他的兵力不足。对于韦德尔为掩护伯尔福的围攻而在利森河(其他地图称为伊泽耳河)岸上构筑的筑垒阵地的攻击,直到15日才开始,而17日傍晚布尔巴基又由于对胜利失去信心,停止了这一攻击。这次攻击的兵力是不足的,现在对于这一点已没有任何怀疑了。第十五军被留在涅维尔附近。关于第十九军,我们已有一个月没有听到任何消息了;从里昂调来的部队只有一个军——第二十四军。现在我们听说有大批援军正在仓促开往第戎,但是由于敌人方面也有强大的援军迅速开到,布尔巴基就不可能立刻恢复进攻。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布尔巴基是否应当率领他的新编部队去强攻敌人用后装枪防守的筑垒阵地呢?但是我们对于这三天战斗的战术情况仍然知道得很少,也许布尔巴基当时不可能有别的做法。

普军大本营并不像伦敦这里的大多数人那样轻视布尔巴基的

进攻,这从筹划击败布尔巴基的措施时所花费的那种特别的精力便可以看出。这些措施使人们确信,凡尔赛对于布尔巴基的行动,在他刚开始向东进军的时候甚至更早就知道了。1月2日,第二军奉命向巴黎东南方的塞纳河上游地区前进。大约在同一时间,察斯特罗夫率领第十三师从麦茨近郊开往夏提荣。第十四师(察斯特罗夫的第七军的另1个师)于9日罗克鲁阿攻陷后,随即奉命从沙尔维耳开往巴黎,然后再由巴黎出发跟随第二军前进;到15日我们就已经知道它的先头部队(第七十七团的1个营)在兰格尔附近进行了战斗。与此同时后备军匆忙地由德国开往阿尔萨斯南部,而曼托伊费尔显然也正是由于法军向德军全线最弱的地点进行这第一次重大的进军,才受到新的任命的^①。如果布尔巴基有足以击败韦德尔的兵力,那末他就能把韦德尔驱逐到莱茵河谷,并把他的部队配置成这样,即在他们和韦德尔之间有佛日山脉相隔,而且把大部分兵力用来对付先后来自各个方向的援军,将他们各个击破。那时他就能突进到巴黎—斯特拉斯堡铁路线,而在这种情况下,对巴黎的包围是否还能继续下去,便很值得怀疑了。从战略观点来看,布尔巴基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他这次进军是错误的,而只能证明这次进军没有以充分的兵力来进行。本“短评”作者依然认为,解救巴黎的需时最短而且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向斯特拉斯堡—巴黎铁路进攻;这是德军所占有的唯一的直达铁路线,因为现在我们知道,经过提翁维耳和梅济埃尔的另一条铁路线由于阿尔登山脉的隧道被炸毁仍然不能通车,并且还将有一段时间不能通车。顺便指出,在这次战争中,因一个隧道被毁而使铁路运输中断几个月的事件,这

^① 见本卷第246页。——编者注

已是第二次了,可是被破坏的桥梁和高架桥每次都能在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修复。

至于尚济,由于他进行决战,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关于布尔巴基的进军,他大概在约一个月以前就知道了;他显然知道,这次进军的真正目的在于解救巴黎,同时,在这个期间,弗里德里希—卡尔军团将以全部兵力向他猛攻。他并不是非去应战不可,相反,他如果像在12月博得声誉的做法那样,缓慢地退却,同时不断进行后卫战,那末他就能够引诱敌人深入到危险的地区。他既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把他的储备物资运到安全地点,也有可能向设有要塞军港的布列塔尼退却,或者通过南特向卢瓦尔河以南退却。此外,弗里德里希—卡尔也不能率领全部兵力把他追击得很远。这样一种根据情况进行的退却,更符合于我们过去对尚济的行動的看法;他应当知道,他所得到的新的援军,无论从装具和武器或从训练方面来看,都还不适于进行决战,因此,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勒芒会战不是由军事上的原因,而是由政治上的原因引起的,应当对它负责的不是尚济而是甘必大。至于尚济现在的退却,固然会由于退却前的失败而非常困难,但是尚济特别善于退却,而且看来胜利者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能够重挫他的部队的士气。不然他们就会对这个军团“显示出瓦解的征候”的说法提出确实的证据了。至于尚济的退却是否真是离心的退却,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无论如何,仅根据他的部队一部分退向阿郎松,另一部分退向拉瓦耳这个事实还不能肯定地得出结论说,前一部分将被驱逐到科汤坦半岛的瑟堡方向,后一部分将被驱逐到布列塔尼地区的布勒斯特方向。即使如此,这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幸,因为法国舰队可以在几小时内从这个海港驶到另一个海港。布列塔尼的地形由

于有很多绿篱（像威特岛上的绿篱一样密集，但比它多得多）非常有利于防御，特别适于没有经验的军队进行防御；在那里他们的低劣的战斗素质几乎显不出来。弗里德里希—卡尔未必肯陷入这个曾经使第一共和国的军队为了镇压普通的农民暴动¹²⁵而作战多年的迷宫。

根据整个1月份的战争情况，我们应当得出下述结论：法国因为企图同时执行许多不同的任务，结果处处失败。他们只有冒着在其他地点被暂时击退的危险（当然在这些地点应当避免决战），把大量的部队集中于一点，才有希望取得胜利。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而且不赶快这样做，那末巴黎必然会陷落。但是，只要他们根据这个早已确定的原则来行动，那末不管他们今天的形势怎样不妙，他们仍然是可以取胜的。目前德军已得到今后3个月内所能希望得到的全部援军；而法军在他们的训练营地中至少应当有20万到30万人在这个期间内会被训练得能够迎击敌人。

载于1871年1月21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54号

战争短评(三十八)

战争又进入了危急时期,这次可能是真正的危急时期。从我们知道在巴黎由政府定量分配面包的时候起,便再也无需怀疑战事就要结束了。在这以后还有多久会提出投降,这是次要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这支拥有 50 万武装人员的被围军队,即将按照围攻军队任意提出的一切条件向 22 万人的围攻军队投降。至于能否不经过新的斗争就实现这一点,这要到以后才能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任何斗争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局势。巴黎能否再支持两个星期,这 50 万武装人员中是否会有一部分能突围出去,这一切对于战争今后的进程都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认为,围攻造成这种后果,特罗胥将军应负主要责任。当然,他没有能够用他所拥有的、无疑是优秀的兵士组成一支军队。他有将近 5 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把这些人训练成兵士,但是看来他们在被围末期的作战能力并不比被围初期好些。最后从瓦勒里安进行的一次出击¹²⁶,远不如前一次跨过马尔纳河的出击勇猛;在这次出击中,看来戏剧效果有余,而决死精神不足。仅用部队没有能力攻击由德军久经战斗的老兵防守的工事来辩解是不够的。为什么他们会没有能力呢? 5 个月的时间是足以把特罗胥指挥下的人员训练成很不坏的兵士的,何况包围一个巨大的筑垒城市这个情况为达到这个目的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毫无疑问,兵士在 11 月

和 12 月的几次出击以后, 士气已经低落; 但这是因为他们被敌人的优势慑服呢, 还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再相信特罗胥的那种虚假的战斗到底的决心? 来自巴黎的一切报道都一致把没有成功的原因归之于兵士对最高司令官缺乏信任, 这是对的。我们不当忘记, 特罗胥是奥尔良派, 因此他极端害怕拉一维勒特、伯利维尔以及巴黎的其他一些“革命的”市区。他害怕这些市区甚于害怕普军。这并不纯粹是我们的想像或推断。我们从一份绝对可靠的材料中了解到, 一个政府官员^①从巴黎寄出的一封信说, 各个方面都要求特罗胥坚决进攻, 但特罗胥始够拒绝这样做, 他认为这种做法会把巴黎让给“蛊惑家”。

因此, 巴黎的陷落现在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这将是紧随圣昆廷、勒芒和埃里库尔失败以后对法兰西民族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精神影响也将是很大的。此外, 在东南部将要发生的事件可能会使这次打击具有一种精神上的摧毁力量。看来, 布尔巴基在伯尔福近郊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以致使人认为他完全不明了自己的处境。布雷索耳指挥的第二十四军 24 日还在蒙贝利亚尔以南约 12 英里的紧靠瑞士边境的布拉蒙; 即使这仅仅是布尔巴基的后卫, 也仍然不能认为他的其余两个军会离那里很远。同时我们听说, 普军已经在 21 日在多耳附近截断了伯桑松—第戎铁路, 随后他们占领了这条铁路上离伯桑松更近的另一个车站圣维; 这样一来他们便把布尔巴基向里昂的退路限制在杜河和瑞士边境之间的这个狭窄地带内, 这个地带有许多平行的纵向山脉和谷地, 在这里一支较小的部队可以找到许多足以阻止像布尔巴基军团这

^① 茹·法夫尔; 见本卷第 535 页。——编者注

样一支军队的退却的阵地。我们估计，在杜河上的这些部队是察斯特罗夫的第七军第十三师，也许是 23 日到达第戎的弗兰泽茨基的第二军的一部分；和第二十一团一起编成第八旅（或者是第二军第四旅）的第六十团在第戎附近被加里波第击退，并且失掉了军旗。但是因为加里波第拥有的兵力不超过 15000 人，所以他将无力扼守该城来抵抗这时无疑即将来到的数量上占优势的普军。他将被击退，而普军将继续向杜河以及更远的地区进攻。如果布尔巴基在这个期间不能最有效地利用兵士的两条腿，那末他和他的全部军队就要冒下列危险：或者是被赶进伯桑松要塞而重蹈麦茨的复辙，或者是被驱入与瑞士毗连的汝拉的一隅而不得不在国界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放下武器¹²⁷。即使他能够带领他的大部分部队逃脱，也几乎肯定要损失大量的掉队人员、辎重以至火炮。

在埃里库尔的历时 3 天的战斗以后，布尔巴基在这个边境附近的危险的地区一天也不应当多留，因为普鲁士的增援部队正在向他的交通线前进。他解救伯尔福的企图没有实现；在这个方向上继续进攻的一切可能性都消失了；他的处境日益危险，只有迅速退却才能得到解救。但是根据各种材料来看，他对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如果他的疏忽造成第二个色当事件的话，那末这将给法国人民一个精神上极其沉重的打击。

我们说精神上的打击，是因为这个打击在物质上可能不这样严重。固然，德国当然不像甘必大所说的那样兵源枯竭，但是恰恰在目前，它的作战兵力，不论从绝对或相对意义来说，毕竟都要比今后几个月内所能提供的新的兵力要多得多。再过一个时期德军的兵力一定会减少，然而甚至在巴黎的守军和布尔巴基军团投降（如果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话）以后，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

止法军兵力重新增长。显然,普军已经放弃了征服和占领整个法国的一切希望;在南部的大片地区被占领以前,在北方的消极的、有时还是积极的抵抗(例如炸毁土尔附近摩塞尔河上的桥梁)停止以前,只要法国还没有被战争弄得筋疲力竭,我们便看不到任何足以迫使法国投降的理由。

载于 1871 年 1 月 26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58 号

战争短评(三十九)

从色当投降以来,法军的行动只有两次引起毛奇将军的严重不安。第一次大约在11月中旬,当时卢瓦尔军团在库耳米埃附近击败冯·德尔·坦恩以后,为了从西面接近巴黎,便把部队转向左面向德勒前进。当时,毛奇以在这种危急关头所应有的果断精神做了准备,万一梅克伦堡大公的兵力连同暂时派来增援他的所有部队还不足以阻止敌人前进,就立刻撤除对巴黎的围攻。敌人的前进被阻止住了,围攻可以继续。第二次,布尔巴基的向东方的进军打破了凡尔赛大本营的平静。从普军立即采取反击布尔巴基的措施上可以看出,他们把这次进军看得多么严重,韦德尔的部队——第十四军及特雷斯科夫和施美林的预备师——立即得到了两个军的加强,其中一个军,即第二军,1月2日已从巴黎城下出发。半官方消息的语调变得谨慎了;11日,“省报”¹²⁸提醒大家注意“在法国东部即将展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会战”,而布尔巴基企图在解救伯尔福以后在南锡切断普军的交通线。非官方记者说话虽然也很谨慎,但是比较坦率;我们只举出其中的一个,即“科伦日报”记者维克德的意见。维累尔塞克塞耳战斗(由于这次战斗韦德尔确保了他同伯尔福城下特雷斯科夫部队的联络以及他向那里的退路)刚一结束,维克德便说:

“已经采取了制止法军解救伯尔福的措施,而在最近几次战斗胜利以后,

我们大概可以希望,他们将不能经肖蒙向南锡或者向我们铁路上其他某个地点推进,虽然在不久以前还有某些理由担心他们能做到这点。”

1月16日,他又从南锡报道说,在曼托伊费尔率领3个师越过夏提荣前进以后,

“敌人的一个军可能占领南锡的这种担心——几天以前我们是有理由(mit Recht)担心的,——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紧接着是一篇从巴登寄来的通讯,这篇通讯开头便说:“毫无疑问,伯尔福附近的情况看来是非常严重的。”) ”

但是,维克德先生注定还要担心一次,因为第二天他不得不报道说:得到了关于法军已占领弗拉维尼(距南锡11英里)的消息。于是,警卫部队立刻增多了,加强的巡逻队也派出了,车站内20台机车全部升火待发,军官、政府官员和其他德国人都已收拾好行囊,准备立刻出发。本来以为弗拉维尼的法军是加里波第的前卫;结果这只是从佛日山来的20名自由射手,他们很快又隐蔽起来。但是南锡的普鲁士警备部队直到19日,即布尔巴基的进攻在利森河地区被彻底击退的消息传来时才完全平静下来;于是,维克德终于又可以用他以前那种语调说话了。

法国人在这一切失败以后不是应当确信继续抵抗是没有希望的吗?那些同这次进军最有直接关系的人,持的就是这种意见。而“泰晤士报”在这次进军失败以后也认为这次进军简直是荒谬的。这次进军是不是用了足够的兵力,如果成功,能不能利用战果在饥饿尚未迫使巴黎投降以前来解救巴黎,这个方向是不是威胁德军交通线的最好的运动方向,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持不同的意见。但是认为这种运动——战略上已知的运动中最有效的一种——简直是荒谬的,那就只有“泰晤士报”的毛奇们才会这样说。

这时，毛奇伯爵以他惯有的才略采取行动。在布尔巴基到达以前向韦德尔派遣援军已经来不及了；他从可能的做法中选择了最好的一种，而把援军集中在夏提荣。15日或者更早一些时候，在那里有曼托伊费尔的3个师（第三、四、十三师），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留在附近地区的第六十团（属第三军）也在那里同这3个师会合了。可以推测，这时第十四师也同曼托伊费尔的部队会合了。不管怎样，曼托伊费尔在向南进攻的时候，如果没有53个营至少也有41个营。他率领这些部队向杜河前进而把第戎城留在南面，而1月23日他在第戎进行攻击仅仅是为了牵制加里波第，很明显，他根本无意同加里波第认真作战或攻占该城而迟滞自己的进攻。相反，他坚决地实现他的主要目的——切断布尔巴基的退路。根据最近的电讯报道，这个目的差不多达到了。他的部队已到达杜河彼岸的坎惹和木沙尔；后一个地点是从第戎经蓬塔尔利埃到瑞士的铁路同伯桑松到里昂的铁路相变的地方。现在还剩下一条可以让布尔巴基逃走的好路，但是这条路要经过离木沙尔不过25英里的尚帕尼奥耳，而且现在可能已被敌人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对布尔巴基来说就只有一条在杜河发源地附近通过的乡村路了，但是他带着炮兵未必能够通过，而且这条道路在他脱离险境以前就可能被切断。如果他不能从驻扎在十分便于防守的地区的敌军中突出去，那末他就只好撤退到伯桑松堡垒的掩蔽之下，或者在平地上投降，也就是说只要他不向瑞士人缴械的话，就只好在麦茨和色当的两种命运之间进行抉择。

为什么他在伯尔福附近耽搁那么久，这是不可理解的：根据普军最近的电讯来看，他仍然在伯桑松的东北。如果在曼托伊费尔到达以前他不能击败韦德尔，那末在曼托伊费尔到达以后他要做到

这一点的希望会更加小到什么程度呢？布尔巴基在他的进攻在伯尔福附近被彻底击退以后，显然就应当立刻向安全的阵地撤退。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这是完全令人不解的。但是，如果他发生最坏的事情，那末考虑到他由麦茨到契泽耳赫斯特的神秘旅行¹²⁹以及他在利尔拒绝向共和国致敬的情况，人们对这位皇家近卫军前任司令的忠诚当然会产生怀疑。

载于1871年1月28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60号

战争短评(四十)

如果相信伯尔尼最近发来的电讯——现在没有理由不相信它，——那末我们对于布尔巴基军团的命运的推测^①就被证实了。据报道，瑞士联邦委员会接到了正式报告，说这个约有 8 万人的军团已进入瑞士领土，他们在这里当然要放下武器。越境的确切地点并没有指明，但是这大概发生在布拉蒙以南某地，而不是在蓬塔利埃以南。某些部队也许是在不同的地点越过国界的，但大部分军队看来是在勒—布雷纳（伯桑松到纽沙特的大道在这里进入瑞士领土）越过国界。

因此，又一个法军军团——婉转点说——被司令官的犹豫不决断送了。布尔巴基在指挥一个师的时候也许是一员猛将。但是，在紧要关头鼓足勇气、定下大胆的决心所需要的勇敢同在敌人的炮火下很好地指挥一个师所需要的那种勇敢是根本不同的。布尔巴基同许多具有无可怀疑的、明显的匹夫之勇的人们一样，看来缺乏毫不犹豫地定下最后的决心所需要的那种魄力。至迟在 1 月 17 日傍晚，当他本人十分清楚地知道不可能突破韦德尔的战线时，他就应当立刻决定以后该怎样办。他应当明白：普军的增援部队正从西北接近他的退却路线；由于前面是获得了胜利的敌军，后面是一

^① 见本卷第 260—261 页。——编者注

条沿着中立国边境的漫长的退却路线,他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进军的最后已无法达到,在这种情况下他首要的而且是唯一的责任就在于挽救他的军团。换句话说,他必须以他的军团的现状所允许的最大速度退却。但是定下这个退却的决心,即实际上承认他这次进军失败,看来是他所做不到的。他在距离最后几次作战地点不远的地方丧失了时间;他既无力前进,又不愿后退,因此使曼托伊费尔有时间来截断他的退路。如果他立即退却,只要每天后退 15 英里,他就能在 1 月 20 日到达伯桑松,在 21 日到达多耳郊区,即恰好在普军的首批部队到达多耳郊区的时候到达该地。这些普军部队不会是很强的;甚至用布尔巴基的前卫就足以对付他们了,即使不能把他们完全击退,也一定能把他们阻止在杜河右岸(西岸),而这就完全足以保证布尔巴基的退路的安全。特别是遇到像曼托伊费尔这样的敌人,更可以做到这一点。曼托伊费尔只有在执行毛奇的命令中没有遇到敌人抵抗的时候才能十分正确地行动,但是一遇到抵抗而需要他发挥自己的才智时,他便降到庸人以下的水平。

俾斯麦和茹尔·法夫尔达成协议的文件¹³⁰内最令人奇怪的条款之一是布尔巴基和加里波第活动的 4 个省不包括在总的停战地区之内;这样普军实际上保留着在那里想作战多久就作战多久权利。这个史无前例的条件最清楚地表明,胜利者按照真正的普鲁士精神要求得到他们仗着暂时的优势所能勒索到的一切让步。在西部,典里德里希—卡尔认为他最好不越过勒芒,在北部,哥本为要塞所阻,于是这两个地区就应当实现停战;但是在东南,当曼托伊费尔的前进有希望获得第二个色当的胜利时,在那里就不应当实行停战。茹尔·法夫尔同意这个条款,事实上就等于同意布尔巴

基向普军投降或者向瑞士人缴械，只有一点对他有利的区别，就是他把这个行为应负的责任转嫁到布尔巴基的肩上了。

总之，巴黎的投降书是史无前例的。当拿破仑在色当投降的时候，他拒绝参加同他本人和他的军队投降无关的任何谈判；他身为战俘已经无权约束政府和法国。茹尔·法夫尔先生在交出巴黎和巴黎的军队时，虽然处境和拿破仑在色当的处境完全相同甚至更坏，但他却接受了约束法国其余部分的条件。拿破仑几乎一直到他投降时为止，还能自由地同法国的其余部分保持联系；相反，茹尔·法夫尔先生在五六个工作日内，仅仅偶尔有机会知道一些巴黎以外发生的事情。他只能从俾斯麦那里得到关于堡垒线以外的军事情况的消息，而他居然敢根据敌人向他提供的这些片面的消息来行事。

茹尔·法夫尔先生必须在两个不幸之中选择一个。他可以像他已经做了的那样，根据敌人提出的条件缔结一个三周的停战协定，以此约束在波尔多的事实上的法国政府¹³¹。但是他也可以拒绝代表法国的其余部分，提议仅仅代表巴黎进行谈判，而在围攻者制造障碍的情况下，他可以像法耳斯布尔的城防司令那样，打开城门，请胜利者入城。后一方法从他的身分和他的政治前途来看也许对他更有利。

至于波尔多政府，它将不得不同意停战和进行国民议会的选举。它没有能迫使将军们拒绝停战的手段，也没有唤起人民抗议的决心。布尔巴基向瑞士人缴械是法国在最近期间所遭受的许多打击以后的又一次严重的打击，并且如同我们在预测这一事件时所指出的那样^①，我们认为，紧随巴黎投降以后的这个打击会使民心

^① 见本卷第 260 页。——编者注

沮丧,以致签订和约。至于法国的资源,则远未枯竭,斗争还可以继续几个月。下述令人惊奇的事实表明,要完全征服法国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经过7天的战斗,击退了处于完全瓦解状态的尚济军团。除了几个旅以外,没有任何部队能够抵抗他。他的面前是一片富饶的、资源消耗较少的地区。然而,他还是在勒芒停止了前进,只派出前卫继续向前追击,而且派出的距离也不远。本报读者一定记得,我们没有预料会有别的结果^①,因为有一定的根据可以说,在征服一个大国时,如果占领区的面积依算术级数增加,那末占领的困难就会依几何级数增加。

我们仍然认为,一月战局中的连续失败必然使民心动摇,以致原定的国民议会不仅要召开,而且也许要签订和约。因此这些“战争短评”也将和战争一起结束了。

载于1871年2月2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64号

^① 见本卷第256—257页。——编者注

从军事观点看法国的局势

如果说一月战中法军的一连串失败（费德尔布和尚济的失败、巴黎的陷落、布尔巴基的失败以及他向瑞士人的缴械），也就是在短短 3 个星期内所发生的这一切惊人的事件摧毁了——完全可以这样说——法国的抵抗精神，那末现在看来，德军的苛刻的要求¹³²毫无疑问地将会重新激起这种精神。如果缔结和约同继续战争一样都会使国家有彻底毁灭的危险，那末又何必缔结和约呢？有产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以及一部分农民——小私有者，直到现在都是主和派；可以预料到，他们会把主和的人选入国民议会；但是如果敌人坚持这种闻所未闻的要求，那末在他们中间同在大城市的工人中间一样，也会发出决一死战的呼声。无论如何，不应当忽视在 2 月 19 日¹³³以后有重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因为德军本身——如果相信今天“每日新闻”的消息——并没有对于事态发展的前景感到十分满足而放弃对恢复军事行动的认真准备。因此，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军事形势方面的问题。

现在被普军占领的法国 27 个省的面积为 1580 万公顷，人口（尚未投降的要塞除外）将近 1250 万人。整个法国的面积为 5424 万公顷，人口为 37382000 人。因此以整数计算，尚有 3850 万公顷的土地和 2500 万人口，即整整三分之二的人口和比三分之二大得多的土地没有被征服。的确，曾以自己的抵抗长期阻滞过敌人前进

的巴黎和麦茨陷落了。在未被征服的地区内，除里昂以外，没有一个营垒能够起到像这两个要塞所起过的那种作用。将近 70 万法军（不包括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已经被俘或者被拘留在瑞士。但是，即使三个星期的停战时间没有被用来构筑围有野战工事的新的营垒（虽然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做到这点），也还存在着弥补这种损失的其他条件。

法国未被征服的土地大部分在南特—伯桑松一线以南；它形成一片广大的地区，三面有海和中立国的边境作掩护，只有北面的边境线是暴露的，便于敌人进攻。这里有民族抵抗的力量；如果战争重新爆发，这里定能为战争提供人力和物力。在人民的正规和非正规的殊死抵抗下，要夺取和占领这个长 450 英里宽 250 英里的广大的长方形地区，单凭普军现有的兵力是不够的。在巴黎投降以后，除留下 4 个军作为这个首都的警备部队以外，可以抽出 9 个师；在布尔巴基投降以后，曼托伊费尔可以抽出 6 个基干师；也就是说总共可以抽出 15 个师，即除了哥本的 4 个师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的 8 个师以外，又有 15—17 万名兵士可以参加野战。但是哥本在北方有很多事要做，而弗里德里希—卡尔在图尔和勒芒受阻，表明他的进攻力量已完全耗尽；因此，只剩下上述 15 个师可以用来征服南方，而且在几个月内，不可能有任何新的援军开到。

法军起初将不得不主要用新编的部队来对抗这 15 个师。在涅维尔和布尔日附近有第十五军和第二十五军，在这一地区还应有第十九军（从 12 月初以来我们就一点没有听到过有关这个军的消息）。其次，还有在布尔巴基复灭时幸存的第二十四军和不久以前得到援军而增加到 5 万人的加里波第的部队，虽然我们不知道增援他们的是哪些部队，这些部队又是从哪里来的。所有这些共约

13—14 个师,甚至是 16 个师,不过从数量和质量来说他们完全不足以阻止敌人新的军团前进,如果停战期满而和约又未能签订,敌人无疑地会派遣这些新的军团来进攻他们。但是这三个星期的停战,不仅使法军的这些师有时间进行整顿,而且能使现在训练兵营中的或多或少未经训练的新兵(据甘必大估计达 25 万人),至少是其中一些最好的营,训练成能够和敌军作战的有用的部队。因此,一旦战争重新爆发,法军就可能击退敌军向南方的任何严重的入侵,即使不能把敌军阻挡在沿卢瓦尔河的边境线上或者在里昂以北很远的地方,总还可以把它阻挡在它不能严重削弱法军的抵抗力的地方。

显然,停战给费德尔布军团、尚济军团以及瑟堡和哈佛尔等地的所有其他部队提供足够的时间,以充实装备、整顿纪律和恢复士气。问题只在于它们是否会适当地利用这些时间。如果说法军的兵力不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都将大大提高,那末德军却未必能够得到什么补充。从这一方面看,停战有利于法军。

但是,除了法国南部连成一片的广大地区以外,还有两个半岛(布勒斯特所在的布列塔尼半岛和瑟堡所在的科汤坦半岛)和北方两个省及其要塞没有被占领。哈佛尔也是一个没有被占领的筑有坚固工事的沿海据点,这四个地区中,每个地区都至少有一个筑有坚固工事的沿海据点可作为退却的军队的可靠的掩蔽地;因此,现在无事可做,甚至根本无事可做的舰队就可以用来维持这些地区与南部之间的联络,并根据需要把军队从这个地点运到那个地点,并且用这种方法使战败的军队突然有可能以优势兵力恢复攻势。这样,只要西部和北部的这四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攻克的,它们就能使普军的两翼上出现四个弱点。对法军真正危险的,是由

翁热到伯桑松一线，而对德军真正危险的，除了这一线以外，还有从翁热经勒芒、卢昂、亚眠到比利时边境的一线。只要法军表现得稍微明智一点，德军的优势在这一线任何时候也不会成为决定性的优势，但是，法军在这里取得的优势在一定的条件下却可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战略形势就是这样。法军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舰队，就可以在西部和北部调动部队，迫使德军在这两个地区内保持大大超过法军的兵力，因而减弱派去南征的军队，而阻止德军南征正是法军的主要任务。法军一方面比以前更高度地集中兵力，另一方面派出更多的小股游击队，就可以用现有的兵力获得较大的战果。看来，在瑟堡和哈佛尔的兵力大大超过了防御的需要；而在敌占区中心——土尔附近的封特努瓦的桥梁被巧妙地破坏这一点表明，勇敢的游击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一般地说战争在2月19日以后将会重新爆发，那末它必然是一场真正你死我活的战争，是一场同西班牙反抗拿破仑的战争相似的战争，是一场敌人以任何烧杀手段也不能摧毁人民的抵抗精神的战争。

载于1871年2月8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869号

布尔巴基的复灭

从“旗帜报”记者的通讯中，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目击者关于布尔巴基军团在不幸的一月战局中所发生的情况的报道。这个记者当时在克雷美将军的师里，该师在进攻时为极左翼，在退却时担任后卫。他的报道虽然无疑是片面的，而且对于他没有直接看到的事情的叙述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但它仍然是一份非常有价值的材料，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以前所不知道的事实和日期，从而令人清楚地了解到这一阶段的战争情况。

拥有 133000 人和 330 门火炮的布尔巴基军团，看来未必够得上军团的称号。军官质量不坏的基干部队，其兵士在体力上不如流动自卫军，但流动自卫军未必有懂得本身最起码的职责的军官。从瑞士来的消息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说这些消息对于法军的体力状况作了更坏的叙述，那末我们不应当忘记，在饥寒交迫之中连续作战一个月对他们起了多大的影响。从所有的消息来看，他们的服装——无论是衣服或是鞋子——都破烂不堪。看来，实际上根本没有军需部门，甚至连一个按一定程序定期征收粮食并分配这样得来的粮食的简单机构也没有。

在作战的四个半军中有三个军（第十五、十八、二十军）早在 12 月 5 日就已转归布尔巴基指挥；在这以后不久大概就制定了向东进军的计划。直到 1 月 5 日，他的一切移动都只是为了集中

兵力而进行的行军，而且没有遭到敌人的阻挠；因此，这些移动并不是改进这个军团的组织的障碍，而是完全相反。1813年，拿破仑在向德国行军的期间把未经训练的新入伍者训练成了兵士。这样看来，布尔巴基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以用来进行训练。既然经过这一段时间，它的部队与敌人交锋时还是上面那种情况，那末这就不能不归罪于他。他没有表现出一个组织者的才能。

据说，原来的计划规定分四路向伯尔福前进：一路在杜河以东前进，穿过汝拉，以便占领或迂回蒙贝利亚尔和普军的左翼；第二路沿杜河谷地前进，担任正面攻击；第三路沿第二路以西的路线前进，通过鲁日蒙和维累尔塞克塞耳，进攻敌人的右翼；克雷美师则应当从第戎经吕尔前进，迂回普军的右翼。但是这个计划改变了。前三路军队全部沿着杜河谷地这一条道路前进，据说因此浪费了5天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韦德尔得到了援军；而布尔巴基全军在被击退时只有一条退路，所以又浪费了时间，并因此被切断了同里昂的交通，军队被压缩到瑞士边境。十分明显，约12万人的一支军队——而且是组织如此涣散的一支军队——成一个纵队而且只沿一条道路运动，必然会引起混乱和迟滞；但是，认为这个错误真的就这样严重，那也是不够确切的。根据以前所有的消息来看，布尔巴基的军队在接近伯尔福时，正面是很宽的，从维界尔塞克塞耳直到瑞士边境，这就是说他们利用了原来计划中提到的各条道路。但是不管迟滞的原因是什么，迟滞的情况总是发生了，而且成为埃里库尔会战失败的主要原因。维累尔塞克塞耳战斗发生在1月9日。维累尔塞克塞耳距普军在埃里库尔的阵地约20英里，布尔巴基竟花了5天的时间，一直到14日傍晚才把他的部队调到这个阵地附近，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够向这个阵地发起攻击！我们在以前的一篇

评论中指出过,这是这次进军中第一个大错误^①,现在,我们从这个记者的报道中看出,克雷美的军官们甚至在埃里库尔会战开始以前,就懂得了这一点。

在这3天的会战中,法军以13万人对付德军的35000—40000人,但没有能够夺取他们的筑垒阵地。在人数占这样大的优势的情况下,本来可以进行最大胆的侧敌运动。如果他们把4—5万人坚决地投入德军后方,同时用其余的兵力在正面牵制住敌人,那末几乎肯定可以迫使敌人退出阵地。但是他们不这样做,而只是攻击正面——筑有坚固工事的正面,因此遭受了巨大而无谓的损失。翼侧攻击进行得非常无力,德军在右翼仅仅用一个旅(克勒尔旅)就不但击退了他们,而且还守住了弗赖耶和舍讷比埃,并反过来迂回了法军的翼侧。这样一来,布尔巴基的新编部队就不得不去执行一个兵士在作战时所能受领的最困难的任务,而他们本来是可以依靠数量上的优势用机动的办法比较容易地夺取阵地的。不过,最后5天的经验大概已向布尔巴基表明,要指望他的军队有运动性,那是徒然的。

在1月17日进攻被彻底击退以后,法军便向伯桑松退却。很可能,这次退却主要是沿杜河谷地中的一条道路进行的,但是我们知道,也有大批部队是沿靠近瑞士边境的另外一些道路退却的。不管怎样,克雷美指挥的后卫在22日下午到达了伯桑松。因此,前卫在20日就应当到达这里,在21日就应当准备好向当天到达多耳的普军进击。但是情况不是这样,丝毫没有注意到普军,直到克雷美到达,才立刻把克雷美由后卫变为前卫,并在23日派他

^① 见本卷第254页。——编者注

到圣维迎击他们。第二日，克雷美奉命返回伯桑松；到 26 日布尔巴基检阅了第十八军以后企图自杀时为止，两天的时间由于犹豫不决和无所作为而浪费了。这时才开始向蓬塔利埃方向混乱地退却。但是这一天，原来在木沙尔和萨兰的德军已比逃窜的部队更接近瑞士边境，因此后者的退路实际上已被切断。这已不再是一场比速度的竞赛了；德军可以从容不迫地占领法军还能够逃脱的所有纵谷的出口，同时其他部队则从后方压缩法军。随后在蓬塔利埃周围进行了战斗，这向溃败的法军表明，他们的退路被截断了。结果是签订了勒—韦里埃尔协定¹³⁴，并且这个军团全部向瑞士缴械。

看来，布尔巴基从 1 月 15 日到 26 日的全部行动证明，他对于自己的军队已失掉了任何信心，因此也就对自己失掉了任何信心。为什么他在克雷美到达以前使自己的各路军队停留在伯桑松，因而错过了逃脱的一切机会；为什么他把军团中最好的克雷美师从伯桑松派去迎击封锁了直通里昂的道路的德军以后，又立即把它召回；为什么在这以后他又耽搁了两天，因而在伯桑松总共浪费了整整 6 天的时间，——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法解释的，除非认为布尔巴基可能非常缺少那种作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官的最主要的素质——果断精神。八月战局的旧事又演了一次。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出这种极端犹豫不决的，又是一位帝国遗留下来的将军，而共和国的将军们——不管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却没有一个人表现过这样的犹豫不决，并因此受到这样的惩罚。

载于 1871 年 2 月 18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878 号

卡·马克思 致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¹³⁵

1870年8月2日于伦敦

朋友们：

首先感谢你们寄来关于德国工人政党的详细报告！我立即将它转交给了总委员会。

你们请我做的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关系问题的的工作，由于目前实在没有时间，只得暂时搁置一下¹³⁶。

你们从我上星期寄出的总委员会宣言中可以看出，我在这个宣言中部分地引用了不伦瑞克 meeting (大会) (1870年7月16日)通过的呼吁书^①……

根据章程第三条的规定¹³⁷，总委员会不能延期召开代表大会。尽管如此，由于目前形成的非常情况，总委员会要是在这种步骤上得到各支部的必要支持，它是能够对此承担责任的。因此最好我们能正式从德国方面收到这种附有理由的建议。

以节录形式载于威·白拉克“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勒特岑审判案”1872年不伦瑞克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威·白拉克“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勒特岑审判案”

① 见本卷第6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关于卡尔·布林德¹³⁸

文章不应该题为“拿破仑亲王……”，而应该题为“我自己”。文内每提一次拿破仑亲王的名字，就至少把“我”这个代名词提二十次，以各种间接格和派生形式提到的还不算。文章中所有谈到拿破仑亲王的地方已经多次见诸报刊。文章中谈到“我”布林德本人的地方，不幸也在英国被多次披露、报道和发表，因而，十分遗憾，这一切已经为现在出版的以及过去出版的星期评论的老板和编辑们所了解。

如果撇开报纸的弄虚作假，可以得出结论说，报上对布林德的旧事轶闻有了新的提法，说卡尔·布林德如何由于种种不利的情况而不幸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尤其是经常不断有这种传闻，——这也是布林德的主要资本，——说他如何带着外交使命由即将垮台的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者临时政府派往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而实际上是被派往据说由于人民起义而即将建立的赖德律-洛兰革命政府¹³⁹。可是真倒霉！普鲁士人把派遣布林德的政府无礼地赶入了瑞士，而准备建立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的6月13日示威游行也被无礼驱散¹⁴⁰。由于由寿终正寝的政府派往尚未诞生的政府这样一个十分可笑的使命，布林德侥幸地为现存的法国政府所解救，法国政府因为他在6月13日参加了充满激愤的巴黎国民自卫军

的“和平”示威游行，将他逮捕，并最后予以驱逐出境。如果派遣他的政府继续存在，又如果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确已成立，那末卡尔·布林德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布林德由于担负了这个由巴登某某人派往巴黎某某人的使命，得以“巧妙地”完全摆脱了同已经临近的普鲁士军队相遇的危险。无论如何他还是做出了一些事情^①。

此外，在 1870 年，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本来可能与法国联合。可是卡尔·布林德在守卫着。“倘若维克多—艾曼努尔国王……”（第 519 页）但是这原来又是由一个不存在的政府派往另一个不存在的政府的使命。路易—拿破仑拒绝将罗马让与维克多—艾曼努尔，使他不得不诉诸武力来从法国手中夺回该城，从而使意大利跟法国不可能缔结同盟^②。卡尔·布林德的效劳和建议，无论多么宝贵，又遭到了拒绝。于是这个永远是 *in partibus*（非现实的）^③外交家的布林德没有改变历史的进程，只好满足于马志尼的“极为热烈的感激”。

使人不由得想起一个爱吹牛的人来，他与别人争吵的时候总是高声喊道：“朋友们，拉住我，不然我会干出可怕的事情来的。”每当卡尔·布林德准备走到历史事件前面去的时候，总有某种不利的情况妨碍他干出那种应该使他名垂千古的“可怕的事情”，这对整个世界说来是不幸，可是对卡尔·布林德先生说来或许是万

① 最后这两句话是马克思写的。在恩格斯手稿的前一页的边上，马克思为这两句话写了另外一个方案：“布林德恰好担负了这个虚构的出国使命，使他得以完全避免同当时侵入巴登的普鲁士军队相遇。”——编者注

② 直译是：“在异教的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幸吧。

但愿这是卡尔·布林德关于卡尔·布林德和为了卡尔·布林德而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至少是用英文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¹⁴²

……掌权的武人奸党、大学教授、市民阶级和啤酒酒店的小政客都说，这^①是永远防止德国同法国作战的办法。恰好相反，这是把这场战争变成**欧洲的经常性事务**的最可靠的办法。这的确是在获得了新生的德国使军事专制制度作为霸占**西方的波兰**——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必要条件永世长存下去的最好办法。这是使未来的和平仅仅变成在法国未强大到要求收复失地时的停战状态的万无一失的办法。这是使德国和法国在相互残杀之中同归于尽的万无一失的办法。

发明了这种永久和平保证的恶棍和傻瓜们，应该哪怕从普鲁士的历史中，从拿破仑为提尔西特和约¹⁴³付出惨重代价的例子中知道：用这种强力手段来压服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其结果将和预期的目的刚刚相反。而法国，即使在失去亚尔萨斯和洛林之后，都不是提尔西特和约以后的普鲁士可与相比的！

如果说，只要**旧的国家体系**继续存在，法国的沙文主义就能在下列事实即首都巴黎，从而整个法国自1815年以来几次战败后已处于无法防守的地位这一事实中，找到一定的物质根据，那末，一

^① 指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编者注

且把国境线东边移到佛日山脉，北面移到麦茨城，这种沙文主义将得到什么样的新鲜养料呵。

说洛林人和亚尔萨斯人期待着德国政府的仁政，就连最狂妄的^①条顿人也不敢这样断言。这次宣扬的是一个泛日耳曼主义和“安全”边界的原则，据说这个原则会在东方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光辉的结果。

谁没有完全被当前的叫嚣震聋耳朵或者不热中于震聋德国人民的耳朵，他就应该了解到，1870年的战争必然孕育着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战争，正如1866年的战争孕育着1870年的战争一样。

我说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除非有一种不大可能的情况发生，即在这以前俄国爆发一次革命。

如果这种不大可能的情况不出现的话，那末德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现在就应该认为是一种 fait accompli (既成事实)。

这场战争是利还是有害，完全取决于德国胜利者当前的行动。

如果他们夺去了亚尔萨斯和洛林，那末法国就会联合俄国共同对德国作战。这种战争的致命后果是没有必要加以说明的。

如果他们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那末，这场战争就会把欧洲从俄国人的独裁下解放出来，就会使普鲁士溶于德国之中，就会使欧洲大陆的西部获得和平发展，最后，它还会促进俄国社会革命的爆发 (这一革命的因素只有靠这样一种外来的推动才能得到发

^① 传单上被删去的“最狂妄的”这几个字，是在一份留有恩格斯笔迹的传单上由他添上的。——编者注

展),因而这对俄国人民也是非常有利的。

但是,我担心的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不 en masse (众口一辞地)说出他们的主张,那些恶棍和傻瓜就会肆无忌惮地继续他们的疯狂的赌博……

目前的战争开辟了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时代,因为在战争中德国证明了:它即使在没有奥地利的德意志区的情况下,也能够不依赖外国而独立行动。德国首先要在普鲁士的兵营里取得自己的统一,这完全是它应得的惩罚。但是,虽然是用这种方法,结果毕竟是获得了。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如德国北部的民族自由党和德国南部的人民党¹⁴⁴之间的冲突,将不能再徒劳无益地挡住前进道路了。局势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且将会简单化起来。如果德国工人阶级那时不能负起他们应负的历史使命,那是他们的过错。这场战争已经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间
1870年9月5日以传单形式
刊印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
宣言中曾引用这封信,该宣言
又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
民国家报”第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
加过注的传单译的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
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¹⁴⁵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们7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模仿剧。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让路易·波拿巴在十八年内表演了**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①

这样，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以前，我们已把波拿巴主义的肥皂泡看做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对于第二帝国的生命力没有看错。同样，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②，也没有错。防御的战争确实是以路易·波拿巴投降、色当失陷和巴黎宣告成立共和国而终结了。但是还在这些事件发生以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的腐朽透顶的情况暴露无遗的时候，普鲁士掌权的武人奸党已经决定要进行掠夺了。诚然，当时在这方面有一个相当讨厌

① 见本卷第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页。——编者注

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前演说中,曾庄严地声明,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发布了告法兰西民族书,其中说道^①:

“由于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以前愿意、现在仍然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才负起了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而战争事变的进程使我不免要越过法国的国界。”

威廉为了肯定战争的防御性质,不仅声明说他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只是“为了打退进攻”,并且还补充说,只是“战争事变的进程”才使他不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的进程”所要求采取的攻势行动。

因此,这个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纯粹防御性质的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心不由主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连同它那帮教授和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们一个暗示。这个在1846—1870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主义狮子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它戴上公民独立的假面具,装出一付样子,仿佛它在逼使普鲁士政府执行这个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深自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和近乎虔诚地相信路易·波拿巴毫无罪过,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把法兰西共和国撕

① 在马克思翻译并于1870年以单行本刊印的德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和以下的引文,引文以后一直到“他们立刻给了……一个暗示”这一段的文字也有所删节。——编者注

成碎块。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漂亮论据吧。

他们不敢武断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卫城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焚毁了城市，杀害了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当然嘛！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当做德国固有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爱好者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分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¹⁴⁶。

但是，更加机灵的爱国者们要求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土地，说这是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问，阿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比较起来），加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大筑垒城市几乎位于巴塞尔到盖尔曼斯海姆的半路上，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问，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佛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堡垒。如果麦茨也被并入，那末法国立刻就会失去攻击德国的两个主要作战基地，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拥有科布伦茨、美因兹、盖尔曼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专门对付法国的作战基地，并且在这次战争中就有效地利用了这些基地。难道德国有丝毫根据嫉妒在这方面只有两个较重要要塞即麦茨和斯特拉斯堡的法

国吗？此外，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与北德意志分离的时候，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斗；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¹⁴⁷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就开始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作战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1809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只要像在这一次战争中所做的那样，把它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鲁伊和兰道之间，并且沿美因兹到麦茨的道路一线进攻或应战，那末它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阿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末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包围和交通线被切断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役有所证明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和时代错误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末奥地利还可以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为了保护巴黎就可以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大得多。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其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这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和对于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为了剥夺他们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他们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他们的喉咙，而且要置他们于死地。如果说从

前曾经有过一个战胜者力求以“物质保证”来摧毁对方民族的力量，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过提尔西特和约，并用这个和约来对付普鲁士以及德国的其他地区。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像一根腐朽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但是，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当日向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这一次，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主义的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明智的监视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当然不是德国人在1792年为了用刺刀击溃十八世纪革命的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呀！也不是德国人在奴役意大利、镇压匈牙利以及瓜分波兰的时候染污了双手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都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并且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高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看到法国的麦茨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布设的庞大筑垒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受波拿巴侵犯的惨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奇耻大辱却置若罔闻。

正如在 1865 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相互保证一样,在 1870 年,哥尔查科夫同样也和俾斯麦相互保证¹⁴⁸。正如路易·波拿巴自鸣得意地认为 1866 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筋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命运的最高主宰一样,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 1870 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筋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命运的最高主宰。正如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联邦并存一样,专制的俄国也定会感觉到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是对它的威胁。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震撼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 1866 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起话来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①吗?如果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把德国推到宰割法国的道路上去,那末德国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成为俄国掠夺政策的公开的工具^②,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和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③。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

① 1870 年德文版中在“自由与和平”前面还有“独立”一词。——编者注

② 1870 年德文版中增加“这符合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等字。——编者注

③ 1870 年德文版中增加下列字句:“这就是昏聩的资产阶级爱国者为德国‘保证’的和平前景。”——编者注

做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邪魔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村的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历尽艰辛之后，还要在家里再熬受悲惨境遇的折磨^①。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数牺牲不致虚掷，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比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 1815 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¹⁴⁹。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使法国获得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 9 月 5 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欧文明向东方野蛮进行斗争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我们将和我们全世界的工人同志们一起，忠实地拥护无产阶级共同的事业！”¹⁵⁰

不幸，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阻止侵略者，那末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较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做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合适的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脆弱的材料造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

① 1870 年德文版中增加下列字句：“而爱国主义的空谈家会安慰他们说，资本无祖国，而工资是由反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的。因此，难道工人阶级还不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不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用他们的名义来讲话。”——编者注

责任。

我们同他们一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俩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位,而只是^①占据了它所留下的空位子。它不是作为一种社会的成果,而是作为一种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时期¹⁵¹沾染了洗不清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一些重要据点,而冒牌的共和党人则只是分到了一些空谈的部门。这个政府的最初几个步骤中已经明显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承袭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承袭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他们现在用共和国的名义狂言大语地允诺一些不可能兑现的事情,其目的不是要掀起一种拥护“可能的”政府的喧嚣吗?这个共和国依照它那帮资产阶级首脑中的某些人的意图,不是只应该充当奥尔良王朝复辟用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②,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他们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

① 1870年德文版中有“依靠德国的刺刀”等字。——编者注

② 1870年德文版中在“职责”一词后面有“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着”等字。——编者注

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

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¹⁵²。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抵销反雅各宾战争，以及它过去承认 coup d'état (政变) 时所表现的那种不体面的急性态度吧¹⁵³。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①。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二十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当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国家的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

Vive la République! (共和国万岁!)

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耳加思	马丁·詹·布恩
弗雷德里克·布列德尼克	凯希耳
约翰·黑尔斯	威廉·黑尔斯

① 1870年德文版中此句的结尾是：“而英国部分报刊要求这种肢解的叫嚷并不低于德国的爱国者。”——编者注

乔治·哈里斯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洛帕廷	本·鲁克拉夫特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理·默里	乔治·奥哲尔
詹姆斯·帕涅尔	普芬德
吕耳	约瑟夫·谢泼德
考威尔·斯特普尼	斯托耳
施穆茨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卓万尼·波拉……………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威廉·唐森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9月9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卡·马克思写于 1870 年 9 月 6—9 日
 1870 年 9 月 11—13 日用英文以传单形式
 刊印, 1870 年 9—12 月用德文以传单形式
 刊印, 并用德文和法文在期刊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 1870 年英文
 第 2 版, 并根据 1870 年
 的德文版校对过

卡·马克思
* 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
委员的被捕¹⁵⁴

设于不伦瑞克的国际工人协会德国支部中央委员会，于9月5日向德国工人阶级发出了宣言，号召他们不准许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并且争取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根据司令官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的命令，不仅没收了这篇宣言，而且逮捕了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甚至逮捕了印刷这一文件的不幸的印刷厂主人，并且像对待一般刑事罪犯那样，给他们戴上镣铐，解往东普鲁士的勒特岑。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9月14日
左右
载于1870年9月15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744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
第六次代表大会¹⁵⁵

1870年12月23日于伦敦

公民们：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向你们第六次代表大会祝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就再次证明，比利时无产阶级甚至当血腥的和兄弟残杀战争使整个欧洲充满恐怖，暂时使社会舆论无暇他顾的时候，仍然不倦地坚持着他们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

我们特别满意地指出，比利时支部在对待这次战争的态度上遵循了符合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行动路线，宣布了符合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即拒绝一切侵略意图，支持法兰西共和国。而且我们的比利时朋友们在这方面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们行动完全一致。

自从普鲁士人占领卢昂以后，我们和法国所保持的最后联系就暂时中断。可是在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工人中却异常迅速地掀起了反对侵略战争、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尤其是在德国，这个运动所具规模之大，使得普鲁士政府觉得必须为了它的反动掠夺政策的利益来镇压工人。设于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被逮捕了；该党的许多党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且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中代表工人阶级观点和利益的两个议员，公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也被关入监狱。国际被指责向所有这些公民发出了实行一次广泛革命阴谋的信号。我们所面临的无疑是声名狼藉的所谓国际在巴黎的阴谋的翻版，这个阴谋据说是被波拿巴的警察破获的，但是后来证明是一种不攻自破的捏造。国际工人运动尽管遭到种种迫害，仍然日益发展和壮大。

这次代表大会使你们能够确定支部和其他附属团体的数目，以及其中每一个组织的人数，从而对我们的运动在比利时的成就得到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希望你们把这个说明我们协会在比利时的状况的统计资料通知总委员会。我们将尽力给这个统计资料加上其他国家的材料。自然我们会把这个材料保守秘密，我们从引用事实也不会公开发表。

其次，总委员会希望比利时支部能在 1871 年内考虑一下历次国际代表大会关于向总委员会提供经费的决议。这次战争使大陆上的大部分国家都难以提供经费；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比利时的工人们也正经受着这次战争所造成的普遍萧条的影响。总委员会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提醒比利时支部，没有物质上的支援，总委员会就势难开展如它所期望的那种规模的宣传活动。

由于比利时书记、公民赛拉叶不在，总委员会特委托本人向

代表大会发出此项通知。

敬礼和兄弟情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 1871 年 1 月 1 日“国际报”
第 103 号，最后三段被省去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国际报”，并根据
手稿校对过；发表时删去的
几段按手稿恢复

卡·马克思 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当俾斯麦指责法国政府，说

“它使得在法国不可能通过报刊和议会讲坛自由发表意见”

的时候，他显然只是想开一个柏林式的玩笑罢了。如果您想知道法国的“真正舆论”，那就请向凡尔赛“通报”¹⁵⁶的编辑和著名的普鲁士警探施梯伯先生请教去吧！

由于俾斯麦的特别命令，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先生已经以叛国罪被逮捕，其实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敢于履行他们作为德国议员所承担的责任，即在联邦国会里抗议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投票反对新的军事拨款，表示同情法兰西共和国，抨击想要把德国变成普鲁士兵营的企图。社会民主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委员们由于发表了类似的意见，从去年9月初以来就受到苦役犯般的待遇，直到现在还背着叛国这样一个可笑的罪名。同样的命运也落到许多散发过不伦瑞克宣言的工人身上。在类似的借口下，莱比锡“人民国家报”¹⁵⁷的副主编赫普纳先生也以叛国罪被起诉。在普鲁士境外出版的少数几家独立的德文报纸都被禁止输入霍亨索伦王朝的领土。

主张给法国以光荣和平的德国工人集会每天都为警察所驱散。按照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将军天真地叙述的普鲁士官方理论，每一个“企图阻挠普鲁士实现其对法战争的预定目标”的德国人，都要以叛国罪论处。假如甘必大先生及其同僚，像霍亨索伦王朝一样，被迫用武力来压制舆论的话，那他们只要采用普鲁士的办法，借口战争来宣布全法国戒严就行了。在德国土地上只有被关在普鲁士监狱里的法国士兵。但是，尽管如此，普鲁士政府还是觉得必须停止一切法律的效力，严格地保持戒严状态，也就是严格地保持最粗暴、最可恶的军事独裁方式。法国的土地上驻有将近 100 万德国侵略军。可是法国政府还是能够安安稳稳地不采取“使得有可能自由发表意见”的普鲁士办法。请把德国的情况和法国的情况比较一下吧！可是，对于俾斯麦对言论自由的无所不包的爱来说，一个德国原来已经太小了。当卢森堡人流露出他们对法国的同情的的时候，俾斯麦就把这种感情的流露当做他废除关于中立的伦敦协定¹⁵⁸的一个借口。当比利时的报刊犯了类似的过失的时候，普鲁士驻布鲁塞尔的大使冯·巴兰先生就要求比利时政府不但要禁止报纸发表任何反普鲁士的文章，甚至还要禁止刊登旨在鼓舞法国人进行自己的解放战争的新闻。《pour le roi de Prusse》^①废除比利时的宪法，——这真是非常非常谦虚的要求。斯德哥尔摩的几家报纸刚刚拿威廉·亚涅山大^②的众所周知的“虔敬”开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俾斯麦马上就向瑞典内阁提出了气势汹汹的照会。甚至在圣彼得堡那个地方，他居然也发现了过于自由的报纸。由于

① 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转意是：白白地。——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4 页脚注。——译者注

他的低声下气的请求，书报总检查官把彼得堡的主要报纸的总编辑召到他那里去，吩咐他们注意不要对这位忠于沙皇的普鲁士臣仆作任何非难。这些总编辑中的一个，扎古利亚耶夫先生，极其疏忽大意，竟把这次 *avertissement* (警告) 的秘密在“呼声报”¹⁵⁹ 上泄露出去了。他立即被俄国的警察抓起来并被驱逐到某个偏僻的省份去。如果以为这些宪兵措施仅仅是由于战争寒热病的发作而产生的，那就错了。相反地，这是普鲁士法律原则的真正的有计划的应用。普鲁士刑典里确实有一个古怪的条款，根据这一条，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他本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有了“侮辱普鲁士国王”或“背叛普鲁士”的行为或言论，都要受到起诉！法国目前不仅是为它自身的民族独立，而且是为德国和欧洲的自由而战斗，幸而它的事业决不是没有希望。

谨向阁下致敬

卡尔·马克思

1871年1月16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1月19日
“每日新闻”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英国工人阶级
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
立场的决议草案¹⁶⁰

1.工人阶级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首先应当集中全力迫使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2.像建议者所理解的那种英国为保卫法国而进行的武装干涉,只能在一定的时期有效,而这种时期早已过去。

3.英国不仅不能有效地干预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而且本身也不能抵御欧洲大陆的军事专制制度,除非它能重新取得运用它的实际军事力量——它的海军——的自由,而要重新取得这种自由,只有宣布不受巴黎宣言¹⁶¹的约束。

弗·恩格斯于 1871 年 1 月 31 日
提出
载于 1871 年 2 月 4 日“东邮报”
第 123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
联合会委员会¹⁶²

1871年2月13日于伦敦

公民们：

总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收到了你们12月14日的来信。你们7月30日寄出的上一封信，我们也收到了；这封信已经交给了西班牙书记公民赛拉叶，委托他代表我们给你们写回信。但是公民赛拉叶不久就到法国为共和国战斗去了，而且接着就被困在巴黎。你们所以没有收到还在他手头的你们7月30日的那封信的回信，那就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现在，总委员会在本月7日的会议上授权信末签名人——弗·恩·暂时负责同西班牙通信，并且把你们最近的这封信交给了他。

我们按期收到了下面几种西班牙文的工人报纸——巴塞罗纳的“联盟”周报、马德里的“团结报”（到1870年12月为止）、帕耳马的“工人报”（到停刊为止），新近还收到了帕耳马的“社会革命报”（仅仅是创刊号）¹⁶³。这些报纸使我们经常了解到西班牙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社会革命的思想愈来愈成为你们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共同信念。

毫无疑问，旧政党的空洞的豪言壮语，正如你们所说的，吸引

了人民的过多的注意力，因而给我们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年代中到处都发生过。在法国，在英国，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过去曾经不得不反对，而且现在也还不得不反对旧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即反对贵族的或资产阶级的、君主派的或者甚至是共和派的政党的影响和活动。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将同其他政党的政策显然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就总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在德国，组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谓国民代表会；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现在，在法国也刚刚选出了工人的代表，他们将在国民议会中大声宣布我们的原则。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形。

我们高兴地知道你们想把你们国家的各个支部的会费转给我们，我们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笔会费。会费请通过伦敦的任何一

家银行用汇票汇给我们的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汇票请用挂号信寄给信末的签名人，地址是：伦敦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总委员会驻在地），或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他的住址）。

我们还很感兴趣地等待着你们答应寄给我们的那份关于你们联合会的统计材料。

至于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当前的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是无从考虑召开的。但是，如果和平很快就恢复，——这是很可能的——总委员会马上会研究这个重大问题，并且会考虑你们提出的在巴塞罗纳召开代表大会的友好邀请。

我们在葡萄牙还没有支部；同这个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这对你们来说也许比我们容易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你们就这件事再写一封信给我们。同样，我们相信，如果你们能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建立联系，以后把所取得的结果告诉我们，那至少在开始时是比较好的。现在，如果你们能给我们寄一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¹⁶⁴来看一看，那你们就给我们的工作帮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有益的忙。

在其他各国，国际运动虽然障碍重重，但是仍在继续发展。在英国，北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会中央理事会 (Trades' Councils) 不久以前已经直接加入我们的协会，通过它们，这个国家的两个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工人也就加入我们的协会了。在德国，我们现在正受着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和一年前我们在法国所受到的路易·波拿巴的迫害是一样的。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其中已经有五十多人被投入监狱——真正是在为国际的事业受苦；他们之所以被逮捕和受迫害，是因为他们用全部力量反对侵略政策，要求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友好。在奥地利，我们的许多朋友也被关在监狱里，但

是运动还是在发展。在法国，我们的各地的支部都成为反抗侵略的灵魂和力量；它们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夺得了地方政权；里昂、马赛、波尔多、土鲁斯都发挥了前所未见的毅力，这应当完全归功于国际会员的努力。在比利时，我们有强大的组织；我们的比利时各支部刚胜利地开过自己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士，不久以前在我们各支部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看来在开始平息下去。我们从美国接到了消息，说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支部，即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和捷克人（波希米亚人）支部，此外，我们同一个很大的美国工人组织——劳工同盟（Labor League）¹⁶⁵仍然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

希望很快能得到你们的新消息，向你们致兄弟般的敬礼。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弗·恩·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俄国状况¹⁶⁶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

阁下：

英国政府声称，它对俄普同盟一无所知。而在德国却任何人也不怀疑存在着这种同盟。相反地，亲普鲁士的报纸为此兴高采烈，而反普鲁士的报纸则气愤不已。其中有一家报纸“人民国家报”认为，格莱斯顿先生之所以否认同盟，只是想暗示：这种条约与其说是同盟，勿宁说是臣服，在这一点上格莱斯顿先生是正确的。的确，凡尔赛和彼得堡之间，“您的至死效忠的威廉”和他的较为审慎的外甥亚历山大之间的函电往还，使人对今天大陆上两大军事帝国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顺便说一下，这些函电首先发表在“圣彼得堡报”¹⁶⁷上；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报刊却没有将这些函电的内容全部披露，尤其是对威廉皇帝至死效忠的保证保持缄默。不管怎样，通信的全文使人毫不怀疑，威廉皇帝想表明他如何深深地感激俄国和准备怎样为它效劳。因为皇帝已年逾七旬，而未来的王位继承人^①的情绪又使人怀疑，所以俄国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要趁热打铁。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王储。——编者注

此外俄国国内的情况也很难令人满意。财政遭到近乎绝望的破坏；以特殊形式实行的农奴解放和与此有关的其他社会政治改革把农业生产破坏到几乎难于置信的程度。政府时而赐与、时而废除、时而又恢复的各种自由主义性质的不彻底的措施，使得有教养的阶级有充分可能形成某种舆论；而这种舆论和现政府迄今所遵循的外交方针显然完全相反。俄国的舆论实质上有着鲜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性质，就是说，它敌视斯拉夫人的三大“压迫者”：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土耳其人。它不能容忍和普鲁士结成同盟，正如它不能容忍和奥地利或土耳其结成同盟一样。此外，它还要求根据泛斯拉夫主义的精神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传统俄国外交的平静迟缓但极周密稳妥的秘密行动，对它的耐性是极为严重的考验。不管在会议¹⁶⁸上获得多大的成功，对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说来都无足挂齿。他们听见的只是自己受压迫的同胞的“痛苦呻吟”；他们感到最需要的是用强力手腕、掠夺战争恢复神圣俄罗斯失去的无上威权。此外，他们知道，未来的王位继承人^①也具有与他们同样的思想。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以及向南方和西南方修建的大规模战略铁路已能有效地为进攻奥地利或土耳其或同时进攻这两个国家服务，那末这难道不是促使俄国政府和亚历山大皇帝本人采取波拿巴的老办法，趁目前与普鲁士的同盟还似乎可靠的时候，借助对外战争来暂时解除一下国内困难的强大动力吗？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最近发行 1200 万英镑公债具有完全特殊的意义。的确，证券市场上出现了爱国主义的抗议书（据传无人签名，看来一直到最后还无人签名），不过听说，售出的公债超过了规

① 亚历山大王储，未来的皇帝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定的数字。这 1200 万英镑除了某些别的用途外还有什么用途，施特廷的“波罗的海报”¹⁶⁹给我们做了报道，这家报纸多年来不仅对于俄国的情况消息最灵通，而且它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发表这些消息。据该报驻彼得堡记者报道（新历 3 月 4 日消息），俄国军事当局从普法战争中认识到，迄今俄国建造要塞所遵循的筑垒方法是完全不适用的，因而陆军部已经制定了必要的修改计划。

“据报道，新的方法是建造单独的堡垒，这种方法应首先用来修建需要立即兴修的最重要的边防要塞。应首先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和莫德林等要塞建造单独的堡垒。”

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得姆布林（即伊万城）利莫德林（它的正式俄文名称是诺沃格奥尔斯基也夫斯克）正是以华沙为中心的控制波兰王国大部分国土的三个要塞。现在所以没有在华沙建筑单独的堡垒，只是因为它许多年来已经有了这样的堡垒。就这样，俄国在紧张地巩固它对波兰的控制，加强它对奥地利的作战基地，而匆忙进行这样的工作对欧洲和平说来绝非吉兆。

所有这一切，目前还可称为纯粹防御性的措施。不过上述的那位记者继续写道：

“俄国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就开始的军事准备工作仍然在加紧进行。不久前陆军部已下令成立第四营。所有各团，包括驻在波兰王国的各团，都已开始执行这一命令。已经组成战时在铁道上和电讯方面执行勤务的队伍以及卫生连。正在加紧训练人们执行各种勤务，而卫生连里甚至在训练如何急救伤员，如何止血，如何使失去知觉的人复苏。”

几乎大陆上所有大规模军队的步兵团平时都是由三个营组成，无疑由平时转向战时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第四营。路易—拿破仑在宣战的那一天也是下令成立第四营。在普鲁士，接到动员令后采

取的第一步就是成立第四营。奥地利和俄国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不管怎样解释突然要为波兰的要塞修建单独的堡垒、突然要 empressement (急于) 在俄国军队中设立普鲁士的 Krankenträger (担架队) 以及成立铁道和电讯队伍 (这个国家的铁路线和电报线都很少), 成立第四营这一点总是鲜明地表明了俄国实际上已经越过平时与战时的分界线。谁也不能设想, 俄国采取这种步骤是有一定目的的; 而如果说这种步骤意味着什么, 那只是要进攻某人。可能这也就是需要这 1200 万英镑的原因。

您的忠实的 恩·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3 月 15 日
左右
载于 1871 年 3 月 16 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 1900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泰晤士报”编辑¹⁷⁰

阁下：

3月16日贵报发表了贵报驻巴黎记者的报道：

“卡尔·马克思……曾写信给他的一位在巴黎的主要信徒，说他不满意这个城市的协会（指国际）会员所采取的立场”云云。

看来，贵报记者的这篇报道是取自3月14日的“巴黎报”。该报在那篇报道中还答应全文发表这封硬说是我写的信。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然刊载了一封信，信上注明：1871年2月28日于伦敦，好像还有我的签名，信的内容和贵报记者的报道相同。我必须声明，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弗·恩格斯起草于1871年3月21日
以复述卡·马克思来信的形式载于
1871年3月22日“泰晤士报”第
2701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
的草稿译的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等
报纸编辑部的声明¹⁷¹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我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托，请求您在贵报登载如下的声明：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

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¹⁷²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¹⁷³的罪人，而像“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¹⁷⁴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

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尊敬您的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

约·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3月22日于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3月21日
载于1871年3月23日“泰晤士报”
第27018号、1871年3月25日
“东邮报”第130期以及国际的其他
机关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卡·马克思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¹⁷⁵

办得最有成绩的一家巴黎警察报纸“巴黎报”，3月14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耸人听闻：《Le Grand Chef de L'Internationale》（“国际的最高首脑”）（《Grand Chef》，大概是施梯伯的《Haupt-Chef》¹⁷⁶的法文译法）。

那篇文章开头这样说道：“众所周知，他是德国人，更糟糕的是，还是普鲁士人。他叫卡尔·马克思，住在柏林”云云。“真想不到！这个卡尔·马克思不满意国际的法国会员的做法。单凭这一点就可看出他的特色。他认为他们过分注意政治，对社会问题关心不够。这就是他的看法，他刚才写信给他的战友，国际的一位巴黎祭司，公民赛拉叶，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卡尔·马克思要求国际的法国会员，特别是巴黎的会员不要忽视他们的协会只有一个唯一的目标：劳动的组织和工人协会的未来。但是他们不组织劳动，反而加以破坏，因此他认为必须使这些违法乱纪者尊重协会的章程。我们声明，只要卡尔·马克思先生的这封值得注意的信向国际会员一宣布，我们就有可能予以发表。”

3月19日的“巴黎报”果真刊载了一封说是由我署名的信。这

封信立刻为巴黎所有的反动报刊，以后又为伦敦的报纸转载了。不过这时“巴黎报”探听到我住在**伦敦**，而不是住在**柏林**。因而这一次和第一次的报道不同，信上注明是伦敦。但是这个过迟的更正有这样一个问题，即硬要我转弯抹角地经过巴黎和我住在伦敦的友人赛拉叶通信。正如我已经在“泰晤士报”上声明的^①，这封信彻头彻尾是无耻的捏造。

正是这家“巴黎报”和巴黎其他的“正派报纸”散播谣言，说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似乎通过了超出它权限范围的把德国人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伦敦的几家日报赶忙抓住这条使它们感到高兴的新闻，幸灾乐祸地在自己的社论里大谈其国际终于进行的自杀。使它们感到不快的是，今天“泰晤士报”刊载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如下声明^②：

“英国报刊纷纷报道，似乎国际工人协会的巴黎会员秉承反德同盟的意旨，竟然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这个报道完全违背事实。无论是我们协会的巴黎联合会委员会，也无论是它所代表的任何巴黎支部，都从未想到做出这样的决定。所谓的反德同盟纯粹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玩弄的把戏。它是由赛马俱乐部倡议成立的，由于科学院、交易所、某些银行家和工厂主等的支持才得以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从来就与它毫无关系。

这种诽谤的目的十分明显。在这次战争爆发前不久就有人企图把国际当做替罪羊，要它承担一切不愉快事件的责任。现在又是在耍这种手法。例如，瑞士和普鲁士的报纸指责国际是制造不久前

① 见本卷第 311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12—313 页。——编者注

在苏黎世发生的侮辱德国人事件的罪人，而像‘里昂信使报’、‘吉伦特信使报’、‘自由’等法国报纸则报道说，日内瓦和伯尔尼的‘国际会员’在普鲁士大使主持下举行了什么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仿佛拟定了计划，要夺取里昂，让联合一致的普鲁士人和国际会员来共同洗劫该城。”

这就是总委员会的声明。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很自然，他们都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自己共同的敌人。只要能消灭它，一切办法都是好的。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德国书记 卡尔·马克思

1871年3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3月29日“人民国家报”
第26号、1871年3月31日“平等报”
第6号(有删节)、1871年4月23日
“先驱”杂志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卡·马克思
致“工人报”编辑部¹⁷⁷

1871年3月31日于伦敦

公民们：

正如我已经在3月22日的“泰晤士报”上声明的^①，所谓我给国际巴黎会员的信，只不过是在帝国污水沟里培植起来的一家低级报纸“巴黎报”捏造的谎言。不过，所有欧洲的“正派报纸”看来也都得到指示，把捏造作为反对国际的最有力的武器。在这些衷心维护宗教、秩序、家庭和财产的人看来，捏造不是什么应受指责的罪行。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马克思

载于1871年4月8日
“工人报”第23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工人报”校对过

^① 见本卷第311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致“泰晤士报”编辑¹⁷⁸

阁下：

请允许我再次借用贵报篇幅驳斥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

3月30日的巴黎电讯中引用了“高卢人报”¹⁷⁹的一段话；这段话在“据传巴黎革命系由伦敦发动”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下，点缀了上星期六的伦敦各报。“高卢人报”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在编造使巴黎的 *petite presse*（下流报纸）成为全世界话柄的闵豪森故事方面，完全可以和“费加罗报”¹⁸⁰及“巴黎报”媲美，看来这家报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酷爱新闻的公众会始终恪守《Credo, quia absurdum est》（“我相信它，因为它荒唐”）^①的原则。但是，甚至闵豪森男爵能否“在2月初”梯也尔先生尚未获得任何官职的时候就在伦敦发动由这位梯也尔先生企图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而引起的“3月18日起义”呢？“高卢人报”不仅无中生有地说阿西和布朗基这两位先生到了伦敦，在那里和我举行秘密会议共同策划阴谋，而且还虚构出两个人来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意大利的总代理人班提尼”，另一个是“英国的总代理人德莫特”。“高卢人报”也恩准了最初由“巴黎报”授予我的“国际最高首脑”的称号。恐怕

① 据说这是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的一句话。——编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将不顾这两家可尊敬的报纸，一如既往，既不要什么“首脑”，也不要什么“总统”。

阁下，我有幸做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4月3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4月4日“泰晤士报”
第27028号和1871年4月6日
“每日新闻”第778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

弗·恩格斯

* 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¹⁸¹

安特卫普有 500 名雪茄烟工人失去了工作。工厂主要他们进行选择：要么解散他们的工会（属于国际工人协会），要么被解雇。全体工人毫无例外地坚决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工厂主便关闭了他们的企业。

工人们有 6000 法郎（1600 塔勒）的现金；他们已经和荷兰、英国的雪茄烟工人取得了联系，不让工人从那里流入。他们将从英国得到相当大的经济支援；已经寄来 176 英镑（1200 塔勒）；以后还将继续给予援助。不过，安特卫普人希求的只是贷款，他们声称，他们有能力偿还给与他们的一切援助。如果德国的雪茄烟工人或其他工会有能力支援他们的安特卫普兄弟，那末希望他们一定这样做。钱款请寄交：安特卫普博姆加德斯街 3 号菲·克楠。德国的雪茄烟工人们，只要工厂主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要求，不让他们在你们中间招收工人到安特卫普去，无论如何总是你们的义务。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4 月 5 日
载于 1871 年 4 月 12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0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¹⁸²

鉴于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送请总委员会批准该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公民托伦作为工人阶级代表被选入国民议会，却用最卑鄙的方式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因此将他开除出协会的决议：

鉴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法国会员无疑地应该站在巴黎公社的队伍中，而不应该留在篡夺权力的和反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批准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并宣布将公民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没有可能较早地就这一问题采取措施，因为直到4月25日才收到上述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决议的原文。

1871年4月25日提出
载于1871年4月29日“东邮报”
第135期、1871年5月14日“国际
报”第122号、1871年5月24日
“人民国家报”第4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东邮报”、“国际报”、“人民
国家报”校对过

弗·恩格斯 再论“福格特先生”¹⁸³

从福格特先生遭到惨败的 1859 年奥格斯堡战役¹⁸⁴以来，看来他已经厌倦于政治。他以全付精力钻研自然科学，据他自己说，以前他在这方面就有过“惊人的”发现。例如，当居欣迈斯特尔和洛伊卡特阐明了肠内寄生虫的极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因而在科学上真正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福格特先生作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发现，即肠内寄生虫可分为两类：呈圆形的属圆类，呈扁形的属扁类。现在他在这个伟大的成就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更伟大的成就。由于发现大量史前时期的人骨化石，使得对不同人种的头骨进行比较研究风靡一时。学者们把头骨量来量去，比来比去，争论不休，但是得不出任何结果，最后福格特却以常有的胜利信心宣布他找到了谜底，即所有一切人的头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椭圆形的（长头骨），一种是圆形的（短头骨）。福格特简单地运用他的寄生虫原理就得到了最善于观察、最勤奋的科学家经过多年的顽强劳动还无法得到的东西。如果说在这些惊人的发现上再加上一个政治动物学上的新种的发现，即“硫磺帮”¹⁸⁵的发现，那末即使要求最苛刻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人一生能有福格特的这么些劳绩也就足够了。

但是我们的福格特的伟大精神是不知道安息的。政治对于这

位甚至在啤酒店也创立伟业的人来说仍然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1860年 anno（夏天）所受的打击已被安然忘却，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已不再发售，一切令人不快的事情早已化作烟云。我们的福格特在德国庸人的如雷掌声中进行了讲学旅行，神气十足地端坐在自然科学家的各种大会上，端坐在人文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代表大会上，混入了真正大学者的行列。所以，现在他又以为自己似乎相当“正派”，以为在政治上也负有教导德国庸人的使命，正如他在自然科学问题上曾教导他们的那样。这时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小拿破仑¹⁸⁶在色当投降，普鲁士人兵临巴黎城下，俾斯麦要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这正是福格特发表重要言论的好时候。

这次的言论标有这样一个标题：“卡尔·福格特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1870年俾尔版。其中收了十二封信，这些信最初发表在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上，并由福格特的“通报”——俾尔的“商业信使报”¹⁸⁷予以转载。福格特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反对德国的普鲁士化；使他十分恼火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完全追随可恨的社会民主党人即“硫磺帮”。不必叙述小册子的全部内容，因为某个福格特对这些事情的想法丝毫不会使人感到兴趣。而且他所提出的论据，只不过是在啤酒店里闲谈政治的庸人们最常用的论据，不同的只是福格特这次反映的是瑞士庸人们的观点，而不是德国庸人们的观点。我们感兴趣的，只是福格特先生本人的耐人寻味的变化多端的人格。

因此，我们现在把福格特的小册子拿来和他的“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¹⁸⁸——这是使他长期感到十分头痛的一本倒霉的书——加以对照。我们发现，尽管精神上极其近似，文笔也是同样粗糙（福格特在第10页上谈到他的“观点”是用“自己的耳朵”听到

的，自然他的耳朵完全是特殊的^①），但是福格特先生现在谈的和他十一年前所宣扬的刚好相反。“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庸人相信，干预路易·波拿巴当时准备发动的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对德国是不合算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路易·波拿巴描绘成为各国人民的“法定”的解放者；必须保护他，使他免受共和主义者以至某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惯常攻击。冒牌的共和党人福格特也这样做了，虽然在他这样做的时候，脸上显得很勉强，好像胃痛似的。有些好议论别人的人和“硫磺帮”里的人都断言，好样的福格特所以要给自己招来这些麻烦，要做这些丑态，只是因为他从波拿巴那里拿了英国人所谓的《consideration》（“津贴”），亦即拿了现金。传出了种种可疑的事情。福格特曾向不同的人说过，只要他们愿意按照他的意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即在报刊上称颂路易·波拿巴的解放人民的意愿，他就送钱。甚至布拉斯先生（众所周知，从他主编“北德总汇报”¹⁸⁹以来，他的崇高德行就是无可置疑的）也公开地“拒绝了福格特打算给他安置的法国食槽”。不过我们不想在这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上多做文章，让我们姑且假定福格特的胃痛和丑态都是天生的。但是从色当不幸事件发生以来，福格特先生完全变了。关于法国皇帝本人，这位“各民族的解放者”，他还谈得比较含蓄。他只说：

“革命已经站在他的背后。即使战争不爆发，帝国也势难在土伊勒里宫迎接 1871 年的新年。”（第 1 页）

至于法国皇帝的妻子！他说：

“毫无疑问，如果欧仁妮获得胜利（须知这个缺乏教养的、甚至识字不多

① 双关语：《eigene》既是“自己的”，又是“特殊的”。——编者注

的西班牙女人，正在或者更正确些说过去曾在一长串狂热的神甫和农民的龙尾巴簇拥下进行战争)，如果欧仁妮获得胜利，那末局势会立刻变得更糟”，即比普鲁士人获得胜利后还要更糟云云。

所以，1859年法国人战胜奥地利人是“各民族的解放者”波拿巴的胜利；而1870年法国人如果战胜普鲁士人，则是识字不多的欧仁妮及其龙尾巴的胜利。进步是很显著的。

路易·波拿巴的龙尾巴被批评得更厉害，因为现在发现他也有这样的东西。第2页就谈到“帝国的骇人听闻的挥霍浪费”。第16页谈到“领导帝国军队和政府的败类”。这样的挥霍和这样的败类早在1859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风行得势。福格特那时完全看不到它们，而现在把它们完全看清楚了。这又是一个进步。但是还不仅如此。虽然福格特没有直接骂他以前的“解放者”，但他还是不能不从一位法国学者的信中摘引了几段，其中说道：

“如果你有势力，就请你设法使我们摆脱最大的耻辱——cell de ramer l'infâme(即不让无耻之徒路易·波拿巴回来)。亨利五世，奥尔良王室，任何一个霍亨索伦，无论谁都行，就是不要这个皇袍加身的坏蛋，这个坏蛋把他接触过的一切都染污了。”(第13页)

不过不管以前的皇帝和他识字不多的夫人以及他们的龙尾巴是怎样的糟糕，福格特还是安慰我们说，在这个家庭里毕竟有一个人是例外，此人就是常被称作普隆—普隆的拿破仑亲王。据福格特说(第33页)，普隆—普隆曾对福格特本人说过，“如果南部的德国人是另一种做法(即如果他们不和普鲁士人一起反对法国人)，他会不再尊重他们”，他相信战争定会招致不幸的结局，并且毫不隐讳他的这种看法。现在还有谁会责备福格特忘恩负义呢？他这位“共和主义者”甚至在“亲王”倒霉的时候还友好地向他伸出援助之

手,为他提供他将来争夺那“无耻之徒”的位置时可以援引的证据,——这种情形谁看到会不动心呢?

“研究”中谈到俄国和俄国的政策时,完全是用赞赏的口吻;这个帝国从它废除农奴制以来“与其说是解放运动的敌人,勿宁说是解放运动的朋友”;波兰最好与俄国合并(1863年的波兰起义正是证明了这点!),——而且福格特认为,俄国

“成为各斯拉夫民族日益争取团结在它周围的强大核心”,

乃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1859年俄国的政策和路易一拿破仑的政策一唱一和,在福格特眼中当然曾是一大伟绩。现在完全变了,现在我们读到的是:

“我毫不怀疑,斯拉夫世界和日耳曼世界的冲突即将来临……而且俄国将领导这场冲突中的一方。”(第30、31页)

接着说,在德国兼并亚尔萨斯之后,法国在这场冲突中会立即投向斯拉夫方面,甚至会尽力设法加速这场冲突的发生,以便索还它的亚尔萨斯;所以,在1859年似乎对德国来说曾是幸事的同一个法俄同盟,现在却被说成是对德国的威胁和可怕的怪影。但是福格特了解自己的德国庸人。他知道,他可以对这种庸人随便乱说,丝毫也不用怕前后矛盾。不过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福格特十一年前要无耻地吹嘘,说什么俄国和波拿巴法国的同盟是德国和欧洲自由发展的最好保证呢?

至于普鲁士!在“研究”中曾明显地向普鲁士示意,它应当间接地支持路易一拿破仑反对奥地利的计划,只限于保卫德意志联邦的领土,然后“在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劳”。未来的北德意志联邦的疆界——厄尔士山脉,美因河和大海

——当时已被用作诱惑普鲁士的钓饵。“研究”的第二版是在意大利战争期间出的，那时波拿巴分子的处境不妙，不能再在托辞和闲谈上浪费时间，于是在这一版的后记中，福格特就已经直言不讳：他劝普鲁士在德国发动内战，来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由普鲁士吞并整个德国。他断言，如果说意大利战争要费时数月，那末这样统一德国则用不了几个星期。果然，恰好七年之后，正如路易一拿破仑的想法，普鲁士完全按照福格特像鸚鵡学舌般随声附和的波拿巴的唆使行动起来；它马上开始自相残杀的战争，暂时争取北德平原作为酬劳，建立（至少在北部）统一的中央政权。而福格特先生怎么样呢？福格特先生现在突然开始抱怨“1870年的战争是1866年的战争的必然后果！”（第1页）他埋怨普鲁士的贪得无厌的掠夺政策，普鲁士向来“像猛虎扑羊似地冲向猎取物”（第20页）。

他写道：“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和人民比普鲁士更配得上这样的称号”（强盗国家）。（第35页）

他痛哭德国为普鲁士所吞并，认为这是德国和欧洲所能遭到的最大的不幸（第八封信和第九封信）。这就是俾斯麦执行了福格特的忠告的结果，这也就是福格特向俾斯麦提出了忠告的结果。

可是，到目前为止，对我们的福格特说来似乎一切还是顺利的。过去的丑事在庸人们的记忆中真的已经全无痕迹，“研究”已经完全被人遗忘。福格特又能冒充体面的公民和正派的民主主义者，甚至还能以他的“政治书信”跟德国庸人的平庸潮流完全违背来把自己略微炫耀一番。甚至福格特在兼并亚包萨斯和洛林问题上的观点跟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不幸吻合，也只能为他增添光彩：既然

福格特没有投到“硫磺帮”那一边去，那末结论必然是“硫磺帮”跟着福格特走了！可是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不久前公布的路易—拿破仑秘密开支表上的一行小字：

《Vingt-il lui a été remis en Août 1859...fr.40000》.

“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¹⁹⁰

福格特？这是哪一个福格特？这里没有做更确切的说明，这对福格特到来是多么不幸！自然，要是这里写着：日内瓦的卡尔·福格特教授，住在哪一条街，门牌多少号，那末福格特可以说：“这不是我，这是我的兄弟，我的妻子，我的大儿子，无论谁都可以，只是不是我。”可是单单写个“福格特”！没有注明外表特征、名字、住址的福格特，只能是那个福格特，那个驰名全世界的学者，首先发现圆的和扁的肠内寄生虫，椭圆的和短的头骨以及“硫磺帮”的伟大科学家，他的赫赫声誉甚至为掌管秘密经费的警察所熟知，以致对他不必做任何确切的标记！而且，难道另外还有那么一个福格特在1859年为波拿巴政府帮过这样大的忙，致使该政府在这年8月（当时福格特恰好在巴黎）赏给了他4万法郎吗？福格特先生，正是您帮过这样的忙，这是人所共知的；您的“研究”一书就可作为此事的证明；“研究”的第一版在春季问世，第二版在夏季问世；您自己承认过，从1859年4月1日到夏季，您曾向许多人说过，只要为波拿巴效劳，您就送钱；1859年8月，战争结束后，您在巴黎。考虑到这一切情况之后，难道我们还必须相信，波拿巴在1859年8月下令付与4万法郎的那个直接指称的“福格特”，是另外那么一个谁也不知道的福格特吗？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凭着一切圆的和扁的肠内寄生虫起誓：您如果不向我们提出相反的证据，我们就不能不认为，这里所说的福格特就是您。

但是，您也许会说，这种说法无非是以现在的法国政府，即公社社员，也就是那些被称为“硫磺帮”的共产党人的声明为根据的，谁会相信这些人呢？对这一点可以这样回答：“皇室文件和通信”是由“国防政府”公布的，这是该政府负责的官方行动。而您是怎样看待这个政府，怎样看待茹尔·法夫尔、特罗胥等人的呢？

关于这些人您在第 52 页上写道：“现在推举出来的人们，就其智慧、精力以及信念之坚定而论，是不比任何人差的；但是他们无法做到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福格特先生，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为了对这种他们很少得到的热情赞誉表示感激，他们至少是能够把您的名字划掉的！

不过，福格特先生，正如您自己所说的，“金钱毕竟是个人人格所受损失的等价物”（第 24 页）；如果您的尊贵的人格由于您在 1859 年的政治飞跃而受到某种“损失”，——但愿只是精神上的，——那末就请以这种“等价物”作为慰藉吧！

去年夏天当战争的喧嚣甚嚣尘上的时候，您曾

“相信，这幕滑稽剧完全是法国政府为了用表面的扩军备战来掩饰帝国的惊人浪费才搞出来的。在路易—菲力浦时代**钻木虫**扮演了这个角色：超过预算的秘密开支都记入了建造舰只的木料开支帐上；而在帝国时代，用全球的**钻木虫**也不能够抵偿全部的超支”（第 4 页）。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您如此心爱的虫子上来，即回到**钻木虫**上来。它们属于哪一类呢，是圆虫还是扁虫呢？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只有您福格特先生，并且您也的确把它解决了。正如“通信”所证明的，您自己属于“**钻木虫**”之列，因为您也吞食了“超过预

算的秘密开支”，而且是吞食了 4 万法郎。至于您属于“圆虫”一类，所有认识您的人都是知道的。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5 月 5 日
载于 1871 年 5 月 10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8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卡·马克思

—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¹⁹¹

卡·马克思写于 1871 年 4—5 月
1871 年 6 月中旬以单行本形式
在伦敦出版,并于 1871—1872 年
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 1871 年英文第三
版,并和 1871 年和 1891 年
的德文版校对过

卡·马克思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THIRD EDITION, REVISED.

Printed and Published for the Council by
EDWARD TRUELOVE, 256, HIGH HOLBORN.

1871.

Price Twopence.

“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的扉页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迎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这些人在当时是这样地迷信巴黎负有在一切历史动乱时期代表全法国的使命,竟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完全足以证明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确有法律根据。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上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①。然而当时在惊慌无备的混乱中,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人又已经逼近巴黎,巴黎只得容忍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真正的军事力量,并使他们的队伍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① 见本卷第292页。——编者注

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游说欧洲各国朝廷，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它们出面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特罗胥的这篇漂亮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一流人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末9月4日侥幸得势的人们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向巴黎人民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他们或者立即投降，或者自己掌握起自己的命运。这些毫无廉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暂时则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由狡黠的特罗胥任命指挥巴黎军队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在整个巴黎被

围期间的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¹⁹²)。到1871年1月28日¹⁹³,骗子们终于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在投降时以自甘屈辱到极点的真正英雄气概,表现出了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种角色下流之至,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没有敢于担当。这批 capitulars¹⁹⁴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文件滑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¹⁹⁵。

促使国防政府的几个主要成员谋求这种结局的,还有一些完全是特殊的、个人利害的考虑。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他后来被茹尔·法夫尔特别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的爆发,好在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这个伪证制造犯在9月4日后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帝国

时代就在“旗帜报”¹⁹⁶的丢丑事件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罪。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就把他监禁起来了。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喊，巴黎正在释放它的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中的约·密勒^①。他在帝国时代钻营内务大臣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 Société Générale¹⁹⁷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期间盗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¹⁹⁸的主笔。这家财政部的报纸用官方谎言蒙哄一般的交易所投机者，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经常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跑来跑去，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败退大发横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身分巧妙地利用饥谨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②；他们正好是

①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上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1871年的法文版上是“福斯泰夫”。——编者注

② 在英国，犯人度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给予假释证，犯人持有这种证件可以在狱外自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 ticket-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 ticket-of-leave men（假释犯）。（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稍微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忽然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大主教的宫廷遭受了抢劫；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¹⁹⁹。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取缔报刊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一手干出的²⁰⁰。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震惊了全法国²⁰¹。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堡垒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堡垒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²⁰²，早已不是大臣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

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 48 小时的轰击……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对人类的一种贡献……

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²⁰³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不该限定只轰击 48 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高官厚禄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他那曾使他获得《Mirabeau— mouche》（“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冒牌英雄的口吻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 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利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殊不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致受到他们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²⁰⁴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²⁰⁵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

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当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当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像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当时一样，他在他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喊道：L'Empire est fait——帝国造成了。梯也尔忘记了他那些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忘记了他因路易·波拿巴愚弄了他并且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没有人人为的议会制度的气氛，这个小人就会一钱不值，而这是他知道）而对路易·波拿巴产生的私怨，竟参加了第二帝国从法国军队攻占罗马起到对普战争的一切可耻勾当；他以对德国统一的恣意攻击挑唆了这场对普战争，因为他并不把这种统一看做是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却把它看做是对保持德国的分裂状态这一法国的世袭权利的伤害。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²⁰⁶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在这场内战中，他蒙俾斯麦的恩许，把在色当和麦茨被俘的军人骗去攻打巴黎²⁰⁷。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他终生都极端墨守陈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他所不能理解的秘密；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

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企图都斥为大逆不道了。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渝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这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王朝的大臣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下最后一次当大臣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那时只限于用眼泪鼻涕来回答，他像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鳄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在波尔多的时候^①，他为挽救法国面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薪；这就是他在1869年给他的巴黎选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的一个1830年的众议院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

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会生涯同样卑鄙齷齪，——甚至在现在，当他扮演法兰西的苏拉这个角色时，还是情不自禁地用他那可笑

^① 1891年的德文版中作：“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

的傲慢态度显示出他的行为的卑污。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交给普鲁士统治的巴黎投降一举，是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结束，而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哥自己说的，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取政权的当天就开始了的。另一方面，这一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协助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割断，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真正能代表法国的人，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接到关于当前选举的消息。并且，根据投降书的专门一项规定，选出国民议会只是为了决定和战问题，而在必要时，则由它缔结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所指定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但这些戒备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全国各地去作竞选旅行，以便把正统派²⁰⁸的死尸复活起来；这一派和奥尔良派应该一起替换当时已为全国所唾弃的波拿巴派。他不怕正统派。这些人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一派的活动，用梯也尔（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话来说，

“一向只限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根柱石来支持”。

因此，还有什么党比这个党更适合做反革命的工具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

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 1816 年的《chambre introuvable》^{①209}去。在 1848—1851 年的共和国时代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打头阵的却是他们党内的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地主议会”²¹⁰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和约的先决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的确没有时间犹豫不决。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负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完全耗尽了全国的财源。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 50 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 50 亿赔款以及过期补缴的 5% 的利息²¹¹。这一切应该由谁缴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以后，财富所有者才能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重担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于是，法国空前的经济破坏就推动了这班爱国的地产和资本的代表人物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用国内战争即奴隶主叛乱来结束对外战争。

阻碍这个阴谋实现的，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于是采用了一切办法来激怒巴黎：“地主议会”发出反对共和国的

① 在 1871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地方官和容克地主的议院）”。——编者注

极疯狂的叫嚣；梯也尔本人含糊其词地说共和国没有法律根据，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颁布杜弗尔那些要彻底破坏巴黎工商业的关于处理过期商业期票和房租的法令²¹²；按普野—克尔蒂约的主张，对任何出版物都每份征收两生丁税金；对布朗基和弗路朗斯判处死刑；查封共和派报纸；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恢复由八里桥^①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任命 *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 213 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听他使唤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先生经手借了 20 亿债款。我们要问：

(1) 据说这笔生意有几亿佣金落入了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野—克尔蒂约和茹尔·西蒙的腰包，此事是真是假？

(2) 据说约定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债款²¹⁴，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总有某种原因迫使他们急急忙忙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曾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最无耻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正如他回到德国以后公开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用讥讽口吻说过的那样。

① 见本卷第 49 页脚注。——编者注

二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 *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阴谋分子们厚颜无耻地毫不掩饰他们解除巴黎武装的真正用意，用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鄙的谎言作为借口，要求巴黎交出武器。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 *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或其邻近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没有对巴黎开战的借口，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厚颜无耻的撒谎手段，说

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亦即解除 9 月 4 日革命武装的一个开端。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 月 4 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唯一的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 9 月 4 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 1869 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不免要投降，以便取得路易·波拿巴签字的护照，免得到凯恩去旅行²¹⁵。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终究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此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 9 月 4 日的革命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必须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堡垒上威吓着它，也在所不顾。但是，中央委员会对于人家硬要把巴黎进行的内战，竟抱着厌恶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

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何等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于是梯也尔就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个常备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去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军民的和好，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耳·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而梯也尔则早已预备好了宣布他的 *coup d'état* (政变) 措施的告示。这些告示结果只好用一个宣言来代替，宣称梯也尔宽宏大量地决定把国民自卫军自己的武器赏给国民自卫军，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在 30 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 300 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3 月 18 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这个革命的临时政府就是中央委员会。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变动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 3 月 18 日一直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康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一连四次命令第八十一常备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

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利浦统治的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²¹⁶报馆，在那里起着这家好斗报纸的傀儡负责经理（*gérant responsable*^①）和决斗手的双重作用。在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握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抛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²¹⁷。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唆使特罗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²¹⁸——去蹂躏巴黎。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列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竭力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唆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者营去攻打工人营，他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诬蔑无产者营怯阵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

① 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接着有下面一句：“其职务是遇报纸被控告判罪时由他去受监禁。”——编者注

感到洋洋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的仇敌的显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 canaille（暴徒）的 la fine fleur（精华）”的计划。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海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和地主议员们在议会中对此严守缄默，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就不寒而栗。在他们看来，这个胜利意味着人民报复的时刻已经迫近。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²¹⁹，都在他们眼前浮现了。但是他们只是受了一场虚惊。甚至对市警都不但没有予以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或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许多重要阵地。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习气是如此迥然不同，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最奢华的街区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体面人物”，其中有各式各样的 petits crevés（纨绔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极有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怯懦地以和平示威游行作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

列队行进，遇到国民自卫军的巡逻队和哨兵，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

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 *sommations*（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²⁰，直到这样做不见效时，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①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体面社会”一出现，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②）。在秩序党的这次伟业发生的地方，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徒手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队践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经由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样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简直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这次示威是以

① 贝热瑞。——编者注

② 马尔儒纳尔。——编者注

有名的窜奔凡尔赛收场的。当梯也尔已经用夜袭蒙马特尔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竟坚决不肯把这个内战继续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本来应该立即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彻底消灭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使秩序党能够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在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大的胜利者相互说了许多温和的和解话语，而在内心却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在适当的时机把他们扑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向巴黎作了第二次进攻。被解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被俘的巴黎人，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厄内斯特·皮卡尔把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的行列中间踱来踱去，恣意耍笑他们，而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则由她们尊贵的(?)女侍簇拥着，站在阳台上拍手喝采，称赏凡尔赛暴徒的卑鄙罪行。被俘的常备团士兵都被冷酷地一律枪毙。我们英勇的朋友、铸造工人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杀了。加利费(即他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在一篇宣言中夸耀说，正是由他下令把他的士兵出其不意地包围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官一起全部杀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由于发布了把从公社方面俘掳来的任何常备军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了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列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仗义豪侠、光明磊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拯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生命的那个弗路朗斯²¹，切成了碎块。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在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他如同一个被允许扮演塔梅尔兰角色的议会中的大

拇指般的小人物一样，带着妄自尊大的虚荣，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甚至不愿对伤兵救护站守中立。再没有比伏尔泰就已预见过的这种可以暂时恣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²²²（见附录第 35 页^①）。

公社在 4 月 7 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²²³。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还依然如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这些正直人士就是梯也尔和他那一帮充当部长的假释犯。不过，枪毙俘虏是暂时停止了。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开始大批枪毙俘虏，并且一直继续进行到底。躲藏有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在这里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去了。4 月 25 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忠仆）一个个枪毙了。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误认为打死了而没有死，他名叫舍弗尔，曾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调查团证明了这件事。当托伦就这个调查团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出来答复。谈起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业绩，

^① 见本卷第 386—387 页。——编者注

就会是对这个军队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在报道在木兰—萨克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社员和在克拉马尔进行大批枪杀的消息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大敏感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一一列举出那些轰击巴黎、在外国侵略者的卵翼下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的一切暴行（而这些暴行仅仅是开始），那就太可笑了。在这一切惨象当中，梯也尔已忘记他的关于在他的侏儒肩膀上负有重大责任的议会辞令，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洋洋得意地说 *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并且不断地大张筵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欢宴，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谈如初，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²²⁴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利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十八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各个统治时代，政府被置于服从议会监督，即服从有产阶级直接监督的地位。一方面，它

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国家政权也就随着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①。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1830年的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交给了资本家，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他们用这次屠杀向工人阶级证明，所谓“社会”共和国不外是用共和国来对他们实行社会奴役；同时又向资产阶级的大批保皇派和土地所有者阶级证明，他们可以安心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担负管理方面的操心事务和享受管理方面的金钱实惠。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而秩序党是一个现在已经和生产者阶级公开对抗的占有者阶级中所有一切敌对党派组成的联盟。他们共同管理的最适当形式，原来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这是一种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贱民”的政体。据梯也尔说，议会制共和国“使它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少分裂”，可是它在这个

^① 1871年德文版中，这句话的末尾稍有改动：“国家政权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编者注

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挖成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个政府下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还使国家政权受到相当限制，而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限制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威胁，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而无耻地利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讨伐，使它一方面不得不赋予行政机关以愈来愈大的权力来镇压反抗，另一方面不得不逐渐剥夺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用以防范行政机关的一切手段。于是代表这个行政机关的路易·波拿巴就把统治阶级的代表们驱散了。第二帝国原是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

这个以 *coup d'état*（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而以宝剑为王笏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政府对有产阶级的公开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末了，它还声称它已经把一切阶级团结到复活了的国家荣誉的幻想周围。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治国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庆祝了自己纵横世界的欢乐；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看来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莫大耻辱，是一切齷齪事物的温床。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统治制度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却把这个国家政权

的以及由这个政权拯救了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尽行揭穿了。帝国制度是那由新兴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摆脱封建制度的工具建立起来，尔后又由已经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的国家政权的最淫贱和最后的形式。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面。巴黎无产阶级用以欢迎二月革命的“社会共和国”口号，不过是表示了希望建立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模糊意向。公社正是这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原是旧政府权力的驻在地和中心，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活动中心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对了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恢复和巩固帝国遗传下来的这个旧政府权力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

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卑鄙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这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也如社会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 *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

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压迫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另一方面，用等级授职制²²⁵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在这个国家政权产生以前存在过并且后来构成这个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的复活。公社制度被误认为是企图用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²²⁶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去代替在各个巨大民族那里虽然最初是用政治强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强大因素的统一。公社与国家政权间的对抗状态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特殊的历史条件可能阻碍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典型发展，而造成例如英国那样的状态，即主要的中央国家机关由贪污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参会议员，城市里凶狠的济贫所监督和郡里事实上世袭的治安法官加以补充。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以为公社是企图恢复它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曾经

享有过、而在路易一拿破仑时代被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排除了的对乡村的统治。其实，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们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東西了。只有俾斯麦那种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经常喜欢从事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²²⁷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那种作为对 1791 年法国旧城市制度的拙劣模仿品的普鲁士城市制度，要仿效那种把城市管理机关贬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构附属轮子的城市制度。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常备军^①和官吏。公社存在本身就是对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通常累赘和必要伪装的君主制度的否定。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的，而只是伴随它出现的一些现象。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②，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局。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

① 1871 年和 1891 年德文版为“军队”。——编者注

② 1871 年和 1891 年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

不变状态同时并存。因此，公社应当应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劳动一旦被解放，大家都会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属性了。

说也奇怪，虽然近六十年来写过和讲过不少关于工人解放的话，可是只要工人们在什么地方断然当家做主，那些替两极即资本和雇佣奴隶劳动（土地私有者现在只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对立的现代社会辩护的人，立刻就弹起辩护的调子来反对他们。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白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现象还没有发展，它的自欺欺人的妄想还没有被揭穿，它的淫乱的实况还没有尽行暴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消灭构成全部文明基础的所有权！是的，诸位先生，公社曾想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权。它曾想剥夺剥夺者。它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颇为聪明而能领悟到现存制度不能长存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令人厌恶地、大声疾呼地鼓吹合作制生产。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作为一句空话或一种骗局，如果它要排除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总的计划组织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末，请问诸位先生，这不就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吗？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并没有想 *par décret du peuple*（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得自己的解放，同时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经济发展

而不可遏制地趋向着的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用鄙视的微笑回答奴才报人的粗野谩骂，回答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谈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谈家用先知者万无一失的口吻宣讲其不学无术的滥调和宗派主义的臆造。

当巴黎公社亲自领导起革命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自己的“天然尊长”^①的管理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执行了这个工作，并且他们所得报酬的最高额，据科学界一位权威^②说，还不及伦敦国民教育局一个秘书所得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的时侯，——旧世界看见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简直气得发疯了。

这终究是工人阶级被公认为能够发挥社会首倡作用的唯一阶级的第一次革命；这是除了富有的资本家以外的巴黎中等阶级的广大阶层——小贩、手工业者和商人都一致公认的。公社英明地解决了一向是中等阶级内部纷争起因的债权利债务问题，因而拯救了这个阶级²²⁸。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曾参加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可是随后制宪议会立刻就毫不客气地把他们交给债主们去任意宰割了²²⁹。可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还不只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感觉到他们必得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

①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这里加有：“即有产阶级”。——编者注

② 在德文各版上这里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

之间决定取舍。帝国大量盗窃社会财富，庇护大规模的金融诈骗，人为地加速资本集中并因而使一大部分中等阶级遭受剥夺，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到破产。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用狂欢纵饮从道义上激怒了他们；帝国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 frères ignorants (无知兄弟会)²³⁰，从而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帝国激怒了他们的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骤然推入了这次造成许多灾难而结果只落得帝国颠覆的战争。真的，在波拿巴派高官显宦和资本家那帮 bohème (流氓) 从巴黎逃跑以后，以共和联盟²³¹名义出面的中等阶级真正的秩序党，就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面，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诬蔑，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重考验，将来会知道。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²³²，这是完全正确的。从凡尔赛发出而由著名的欧洲报界雇佣文丐传遍全球的最骇人听闻的谎言，就是硬说“地主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 1815 年以后不得不付予 10 亿赔偿金²³³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 1789 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 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土地征收了每法郎加 45 生丁的附加税，但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做的；而现在他们却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 50 亿赔款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相反地，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就已经声明，战争的重担应当由真正的战争发动者负担。公社一定会使农民免除血税，一定会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一定会用他们自己选举出来并对他们负责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现今吸吮他们血液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它一定会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专横压

迫；它一定会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很会打算盘的。他们会发觉，给教士的款项如果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信神程度自愿捐出，那将是完全合理的。这就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能够直接带给法国农民的重大益处。所以这里用不着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为了农民的利益去解决的更复杂和真正切身的问题，如关于像梦魇一样压在农民小块土地上的抵押借款问题，关于日益增多的 prolétariat foncier (农村无产阶级) 问题，关于农民本身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竞争而日益加速受到剥夺的问题。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秩序党创立的。在 1849 年和 1850 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 1850 年 1 月和 2 月所颁布的一切法律²³⁴，据它自己承认，都是反对农民的。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开始迅速破灭的（而且实质上是和“地主议员”的意向敌对的）幻想，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于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照顾呢？

“地主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末不出三个月就会爆发普遍的农民起义。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如此怯懦地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这样，既然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也

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那末，由于它同时又是工人的政府，是争取劳动解放的勇敢战士，它就是十足国际性的。当着把法国两省归并给德国的普鲁士军队的面，公社把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并到了法国方面。

第二帝国是普天下诈骗勾当的节日。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掠夺法国人民的勾当。甚至在目前，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在因它叛变而招致失败的对外战争和因它阴谋勾结外国侵略者而挑起的国内战争之间的空隙中，乘机利用在法国全境对德国人进行警察迫害来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①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和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并且干着俄国的肮脏勾当。公社则对波兰的英雄儿子^②表示尊敬，让他们领导巴黎的捍卫者。为了更鲜明地表明由公社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而另一方面当着波拿巴将军率领的波拿巴军队，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²³⁵。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工作。它所采取的某些措施，只能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属于这类措施的有：禁止面包工人做夜工；用违者严惩的手段禁止利用各种借口课收工人罚金来减低工资——这是雇主们

① 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

② 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

惯用的方法，他们一身兼任立法者、审判官和执行吏，而且把罚金纳入私囊。另一个这一类的措施是把一切企业主已逃跑或已停业的工厂和作坊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保证企业主有权获得补偿。

公社的那些很审慎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适合于城市被围的情况。各大金融公司和建筑包工们在欧斯曼^①庇护下不知盗窃了巴黎多少财物，所以公社没收他们财产的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的理由多得多。霍亨索伦王室和英国寡头执政者们虽然都靠掠夺教会得到大批财富，但是对于只从没收教会财产上得到 8000 法郎的公社，否则还是要大发雷霆。

凡尔赛政府稍微恢复了元气，便开始采取极残暴的措施对付公社；它在法国各地压制一切言论自由，甚至禁止召开大城市代表会议；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各地设置暗探，其规模远胜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宪兵检察官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拆阅一切寄自巴黎和寄往巴黎的信件；在国民议会中，只要谁稍微想替巴黎说句话，就立刻有疯狂的呵叱声把他压下去，这种情形甚至在 1816 年的《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人不仅对巴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战争，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这种情形下，公社若不愿可耻地背叛自己的使命，能像在太平盛世那样遵守自由主义的程式吗？如果公社政府的性质和梯也尔政府一样，那末巴黎方面就没有理由查封秩序党的报纸，而凡尔赛方面也没有理由查封公社的报纸了。

“地主议员们”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的怀抱里

① 欧斯曼男爵 (Haussmann) 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塞纳省省长，亦即巴黎市的行政长官。为便于镇压工人起义，他曾进行了一系列改建巴黎街道等工作。（弗·伊·列宁主编的 1905 年俄译本注。）——编者注

去，而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劳伦特教堂的秘密²³⁶，这自然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因波拿巴的将军们惯于打败仗、签降书以及在威廉斯赫埃²³⁷卷香烟而滥发给他们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尖刻的讽刺。公社把一个曾在里昂因破产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①予以撤职和逮捕，对于当时仍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向俾斯麦出卖法国并向绝妙的比利时政府发号施令的那个伪造证件的茹尔·法夫尔说来，这难道不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吗？但是，公社并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误。公社公布了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它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告诉民众。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出现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只是由于传统关系，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他们年年重复自己反对现存政府的刻板的声明，因而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在3月18日以后，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正像过去这种人阻碍以前各次革命的充分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一段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

① 布朗舍。——编者注

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²³⁸、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自从1848年2月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虽然街道上连一个警察也没有。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什么杀人事件、抢劫事件和袭击个人的事情；看来似乎警察已经把他们的保守朋友带到凡尔赛去了。”

荡妇们已经跟着自己的庇护者，跟着那些保卫家庭、宗教、尤其是保卫财产的人一起逃光了。现在又由真正的巴黎妇女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和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妇女一样英勇、高尚和奋不顾身。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生番，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和巴黎这个新世界面对面相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那里麇集着一切旧制度的食尸鬼，即渴望撕食人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以及甘做尾巴的陈腐共和派，他们以出席国民议会支持了奴隶主的叛乱。他们希望凭靠那个充当政府首脑的老朽不堪的小丑的虚荣心，把议会制共和国保持下去；他们拙劣地模仿1789年，在Jeu de Paume^①召开了幽灵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腐朽东西的议会，只是靠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才维持住幽灵般的生命。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而这种谎言是从梯也尔嘴里发出的。

梯也尔对塞纳—瓦瑟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① 网球厅，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他向议会说，“这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和最开明的议会”；他向他的杂牌军队说，这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他对外省说，由他下令轰击巴黎是无稽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后来他又向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射击它。”

他向巴黎大主教说，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处决和报复行为 (!)，全是谎言。他向巴黎声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公社的巴黎“不过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贱民”的真正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²³⁹的巴黎，闲逛男女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这个巴黎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丐、荡妇目前正麇集在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消遣，它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娼妇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好得多。被打死者真的被打死了，伤者的呼声也不是假装的，而且在他们面前演着的这场戏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²⁴⁰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来征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实行的第二次企图，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接着，按照政府的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迁往凡尔赛。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和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常备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大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坚决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往援助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²⁴¹，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他们的战斗口号是《Vive le 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瓦伦顿手下的宪兵以及比埃特里手下的市警和 mouchards（侦探）。假若不是帝国的被俘兵员逐渐到达，那末这支军队就会小得可怜，而俾斯麦放回被俘兵员的数量标准，是使得一方面能够维持内战，另一方面又能够继续保持凡尔赛对普鲁士的卑贱屈从地位。在这次战争中，凡尔赛的警察必须监视凡尔赛的军队，而宪兵则必须站在最危险的岗位上，以便带引军队前进。陷落的堡垒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

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愈来愈紧张了。凡尔赛没有接到过一封

可以稍微使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们”感到振奋的表示拥护的呈文。相反地，从各方面派来的代表团和送来的呼吁书，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吻坚决要求同巴黎议和，而议和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实行的各种自由，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呼吁书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的通令中饬令国家的检察官把“呼吁议和”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指定在4月30日按照他强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政法在全国进行地方选举。他时而利用他那些省长所玩弄的阴谋手段，时而利用他那些警察机关所发出的威胁恫吓，满以为外省进行的选举定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它从未有过的道义力量，以为他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那受到他自己的公报赞扬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演出一出议和的小滑稽剧。这出滑稽剧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把巴黎中等阶级分子拉到梯也尔方面来，并且主要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借自己对梯也尔的信任来掩盖他们叛卖巴黎的行为。3月21日，即在梯也尔还没有军队的时候，他向国民议会声明说：

“无论如何，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声明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所以我断然决定要保护它。”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²⁴²，而他的“地主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狂吠

起来。做出这番勋业之后，他就把“既成事实”降低成假定的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们已被准许明目张胆地违犯法律，在德勒搞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的无止境的会谈中讲到的那些条件——尽管他的话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在口气和分寸上经常变化——总是归结于一点：必须向

“那一小撮应对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人的被杀负责的罪犯”报复。

当然，这里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即巴黎和法国应该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就像梯也尔本人在1830年曾经承认路易-菲利浦是最好的共和国一样。然而，就连这些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中提供的官方解释弄得暧昧不明了。不仅如此，他还通过他那位杜弗尔去行动。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一向担任戒严状态下的大法官；现在1871年在梯也尔治下是如此，在1839年路易-菲利浦治下和在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²⁴³也是如此。当他不承担部长职务时，他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同时他又以攻击自己颁布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他现在不仅通过国民议会匆忙颁布了许多镇压性的法律，一旦巴黎陷落，就可以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²⁴⁴；他还仿佛以下述措施预示了巴黎未来的命运：他把他觉得过分冗长的军事法庭的审判程序加以简化²⁴⁵，并且制定了一道新的极残忍的流放法。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不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刑。地主义议会当时还不敢暗示说巴黎人在它眼中不是叛乱者，而是强盗，所以它暂且只得把报复巴黎的准备局限于杜

弗尔的新流放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议和滑稽剧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引起“地主议员们”的狂怒，梯也尔就不能把自己的滑稽剧继续演下去，那些“地主议员们”由于头脑愚钝，既不能了解他所玩弄的把戏，又不能了解他那种虚伪、造作和延宕的必要性。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演出了一幕议和剧。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故作多情的漂亮话，其中有这样一段：

“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只有一个，这就是巴黎的阴谋，这个阴谋迫使我们去杀害法国人。但是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渎神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停止惩罚来缔结和约，只有那一小撮罪犯需另当别论。”

他对那些打断他讲话的“地主议员们”的狂喊声回答道：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可惜吗？忍心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在议会上发表的自以为像海妖的歌声一样迷人的言辞置若罔闻。在法国仅存的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8000人。补选和复选的结果对梯也尔政府更加不利。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所必需的物质援助，而且连最后一点起道义力量作用的权利，即认为自己是全国普遍意志表达者的权利，也完全丧失了。而使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反议会，这就公开地威胁了篡夺政权的凡尔赛议会。

在俾斯麦看来，期待已久的采取断然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用统治者的口吻命令梯也尔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最后签订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唯命是从地遵循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在普野—克尔蒂约的陪同下到法兰克福去。普野—克尔蒂约是卢昂“著名的”棉纺织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卑躬屈膝的拥护者，在他看来，第二帝国除了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了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²⁴⁶以外，是无可非议的。当梯也尔还任波尔多刚一任命他当财政部长的時候，他马上就開始攻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说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甚至厚颜无耻地立即试图——虽然徒劳无益（因为没有请示俾斯麦）——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制来打击亚尔萨斯，而这样做据他说是与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都不抵触的。此人把反革命看做在卢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命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最后完成他的卖国勾当吗？

当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到达法兰克福的时候，盛气凌人的俾斯麦就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一：“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媾和条件！”而他的条件就是缩短军事赔款偿付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各堡垒，直到将来俾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裁决者。为此，俾斯麦欣然应允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他不食言，他把第一批赔款的支付期延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签订了和约；5月18日，这个条约就在他们的努力下经国民议会批

准了。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被放回这一段期间，梯也尔觉得比以往更需要把他的议和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对巴黎进行血腥屠杀的准备工作。一直到5月8日，他还对劝他议和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同意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只有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地主议员们”坚决要求他解释这个诺言的时候，他避而不答，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没有耐心的人，他们未免太性急了。请他们再忍耐一个星期吧。一个星期以后就再不会有什么危险了，那时任务就会和他们的豪勇和能力相称了。”

一到麦克马洪能向梯也尔保证说他很快就会打进巴黎时，梯也尔就向国民议会声明，说他

“将手持法律走进巴黎，迫使那些洒流了士兵鲜血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全部抵偿自己的罪责”。

当决定的时刻已近的时候，他对国民议会声明说，就是不会留情的。他向巴黎声明说，对巴黎已经宣判了；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声明说，政府允许他们任意向巴黎报复。最后，当叛徒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时，梯也尔就于5月22日向“地主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硬不愿了解的他那出议和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了！”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子的时候，这种制度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真正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这种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报复行为。财富占有者和财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愈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 1871 年的空前未有的卑鄙行为比较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 1848 年 6 月的暴行也要相形见绌。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人攻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正像兵痞们的残暴兽行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护者和报复者的文明社会所固有的精神一样。这种在战事结束以后还大肆杀戮，以致为如何处置成堆的尸首感到困难的文明社会，真是太出色啦！

要想找到与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多少相像的东西，就必须回到苏拉和两届罗马三执政的时代去²⁴⁷。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残酷迫害，不过这一次是迫害整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究隐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任意摧残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多管炮来整批整批地击毙俘虏，他们没有“手持法律”，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惨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个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写的另一面、更加丑恶的一面吧。

一家伦敦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受伤的人躺在贝尔—拉雪兹墓地的墓石间听天由命地死去；临死前绝望挣扎的 6000 个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地道中徘徊蹀

踢；街上到处追逐着不幸的人群，用多管炮击毙他们。在这个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无耻地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嚣声从大饭店的 *cabinets particuliers*（特别间）中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爱德华·爱尔威先生在曾被公社查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²⁴⁸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实在是太轻佻了，恐怕还要每下愈况。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而这是完全不合适的；要是我们不愿意得到 *Parisiens de la décadence*（堕落时代的巴黎人）的称号，就必须制止这种情形。”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陀的一段话：

“于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以前，下贱和放荡的罗马又滚到毁坏过它的身体和玷污过它的心灵的那种淫乱泥坑里去了。——*alibi proelia et vulnera, alibi balneae 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筵席）。”²⁴⁹

不过爱尔威先生忘记了一点：他所说的“巴黎居民”只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丹尼、吕埃伊和圣热尔门大批奔回的那些 *francs-fleurs*（逃亡者）的巴黎的居民；这真是“堕落时代”的巴黎。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社会，每次取得血腥的胜利时，都要发出受到世界各处响应的毁谤的狂吠，来淹没它的受害者即为争取美好的新社会而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喊声。工人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这场骇人听闻的变化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意识中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搞了一次反对文明社会的阴谋！巴黎人民满腔热血地为公社牺牲生命，自古以来没有

一次战斗有这么多人自我牺牲。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这个公社不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而是一小撮罪犯用暴力夺取的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里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的邪恶魔鬼把她们变成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实行绝对统治的两个月内采取的温和态度，只能同它进行保卫时表现的英勇精神相比拟。这证明什么呢？不过是证明公社在两个月内用温和态度和人道精神遮盖了它那恶魔般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能在临死挣扎时随意发泄！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要把无产阶级千刀万剐，那他们就休想凯旋回到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放火啦！”同时向它的远及穷乡僻壤的走卒们低声下达这样一个口号：“把我的一切敌人都当做一般放火犯来搜杀”。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褻渎”砖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

某些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杀人、放火和破坏”，试问这是不是准许放火？英国军队毫无道理地烧毁了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²⁵⁰，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夏托登那样的城市和无数乡村，试问这是不是放火？梯也尔向巴黎轰击了六个星期，借口是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试问这是不是放火？在战争当中，火也和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一种正当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进攻者不能利用这些房屋巩固阵地。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

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奴隶们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却根本不许用这种方法！公社把火当做最严格意义上的防御工具来使用。它使用火是为了不让凡尔赛军队开进欧斯曼特意修建得适合炮击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上去；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退却，这同凡尔赛军队在进攻时往前面投掷手榴弹一样，这种手榴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房屋少。直到现在还不能肯定，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枪杀俘虏时，才开始使用火。而且，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以前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但是，它这样说自然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而已。为此，特罗胥还预备了大量煤油。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但是十分爱惜他们的巴黎住宅。何况梯也尔又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报复。当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就绪，而普鲁士人又已经封锁了一切出口的时候，他就喊道：“我是不会留情的！赎罪应该不打折扣，审判应该严酷无情！”如果说巴黎工人像汪达尔人一样行动过，那末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人行为^①，而不是凯旋胜利者的汪达尔人行为，如那些毁灭了古代邪教世界极宝贵文物的基督徒有过的汪达尔人行为；然而就是后一种汪达尔人行为也被历史家认为是正当的行为，因为它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对正在崩溃的旧社会所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和比较不关紧要的事情。巴黎工人的这些措施与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

^① 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部落，曾多次与罗马作战，公元455年曾占领罗马，破坏了无数文物。汪达尔人行为指破坏文物的行为。——译者注

历史的巴黎毁灭的那种汪达尔人行为更是不相同了！

但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为首的 64 个人质啊！1848 年 6 月，资产阶级及其军队恢复了早已绝迹的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的战争风俗。自此以后，欧洲和印度一切民众起义的镇压者们就比较严格地遵照这种野蛮风俗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社会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又恢复了扣留人质的风俗——硬要一些完全无辜的人们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动负责。我们已经说过，由于梯也尔在战争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毙被俘公社社员的人道做法，所以公社不得不为拯救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既然凡尔赛人还继续枪毙俘虏，那他们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要自己的人质去替死。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²⁵¹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那场血腥屠杀以后，试问公社怎么还能继续饶恕那些人的生命呢？难道连这个用以抵御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兽行的最后抵制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开玩笑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凶手是梯也尔。公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和许多其他教士来交换梯也尔扣留住的布朗基一人。但是，梯也尔执拗地拒绝这种交换。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了死尸之后对他更加有用。在这里，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在 1848 年 6 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曾经多么愤激地高声责备起义者杀死了大主教阿弗尔啊！其实他们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杀死的。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曾目睹此事，他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就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

秩序党在举行自己的血宴时总是散播许多诽谤自己的受害者的言论，这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自认是从前的封建主们的合法继

承人；从前的封建主们认为自己有权使用各种武器对付平民，而平民手里有任何武器都是犯罪。

统治阶级为了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发动内战来镇压革命而进行的阴谋，即我们从9月4日事件起一直考察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鲁门止的这个阴谋，是以巴黎的血腥屠杀为终结的。俾斯麦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大概认为这些废墟是普遍毁灭各大城市的第一步，关于这种普遍毁灭，当他还只是以一个普通地主身分充当普鲁士1849年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的议员²⁵²时就梦想过了。他洋洋自得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的绝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国家要人一样，目光短浅，只看到了这个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难道历史上有过一个战胜者决定采取不仅替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充当雇佣凶手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胜利吗？普鲁士和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地，公社接受了和约的初步条件，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可见，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干得像一个卑鄙的凶手，因为这不会招致任何危险；它是一个雇佣凶手，因为它曾事先讲定一旦巴黎陷落就要付给它五亿行凶赏钱。上天注定要假手于信神的和仁义道德的德国去惩罚不信神的和荒淫无耻的法国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律师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并未迫使欧洲各国“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御用工具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违法罪犯，却只是激起它们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把侥幸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少数受害者引渡给凡尔赛刽子手！

在这场现代最可怕的战争结束以后，战胜的军队和战胜的军队联合起来共同残酷杀害无产阶级。这个前所未闻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社会遭到了彻底失败，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现在表明是政府玩弄的十足的欺骗勾当，这种欺骗勾当的唯一目的不过是要推迟阶级斗争，当阶级斗争变成内战的熊熊火焰时，这种欺骗勾当也就被抛在一边了。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在反对无产阶级时，各民族政府是一致的！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①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兵痞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它们之间的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并且规模愈来愈大，所以归根到底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将取得胜利，那是毫无疑问的。而法国工人阶级不过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罢了。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表明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质，而现在它们却向全世界大喊大叫，说这一切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工人协会，即在于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梯也尔责备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把自己说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禁止国际的法国会员跟国外的国际会员保持任何联系；梯也尔的1835年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每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主要任务。“地主议员们”狂吠起来反

^① 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约在春末夏初。这里指的是5月28日，即公社的最后一日。——译者注

对国际，而欧洲各国报刊则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①对国际做出这样的评论：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和最刚毅的成员…… 这是些完全忠实的、真诚的、有见识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纯洁的和正面意义上的狂信的人物。”

满脑子警察气味的资产阶级，自然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看做一种秘密阴谋团体，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国举行暴动。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先进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阶级斗争无论在何处、以何种形式、在何种条件下表现出来，自然总是由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首先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性生存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总 委 员 会：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H.巴特里	凯希耳
德拉埃	威廉·黑尔斯
阿·埃尔曼	科尔布
弗·列斯纳	罗赫纳

^① 大概是指罗比耐。——编者注

J.帕·麦克唐奈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米尔斯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罗奇	罗沙
吕耳	萨德勒
奥·赛拉叶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廉·唐森

通 讯 书 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
 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P.卓瓦基尼……………意大利
 捷维·莫黑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柯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5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附 录

—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来，在人行道上脸向着马路排成四五行。侯爵加利费将军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侧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查阅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拍拍某一个人的肩膀，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点点头。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是不问情由就被赶到街中心去，于是那里很快就形成了另外一个较小的队伍……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军官骑在马上向加利费将军指出了一个人和一个女人，仿佛他们犯过什么特别的罪恶。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伸出双手跪倒在地上，用痛切的言语来申诉她没有犯什么罪。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冷酷的面孔和毫不介意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的表演对我不会有什么效果（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édie）’……在这一天，凡是一个人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都要倒霉。有一个人特别使我吃惊。显然，他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只因为他长有一个破鼻子……像这样挑选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以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把他们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枪声继续了一刻多钟。这就是把那些被仓猝定罪的可怜虫执行枪决。”（“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这个加利费，即“他的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地卖弄色相闻名的妻子的面首”，就是在战时曾以法国的“毕斯托军曹”知名的那个人。

“‘时报’（它是一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消息，记述一些没被当场击毙尚存一息的人们被活埋的凄惨情景。有大批这样的人

被活埋在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上,其中有许多人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察觉不到这种情景,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邻近的居民常被隐约传去的呻吟声惊醒,到第二天早晨,他们看见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从地里伸出来。由于这样,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我丝毫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我能够证明一件事实。布律涅耳同他的爱人一起于上月24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横陈到27日午后。掩埋队来抬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医院。虽然她中了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旗帜晚报”²⁵³ 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二

6月13日的伦敦“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²⁵⁴：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党举行的公开大会上”²⁵⁵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1869年3月25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

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

“如 1869 年 7 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将同盟即日内瓦的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²⁵⁶。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 7 月和 9 月发表的)^①,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为总委员会在 9 月 9 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① 见本卷第 3—9、285—294 页。——编者注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在一篇“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²⁵⁷（6月24日）充当了虔诚的告密者的角色，引证了——除了其他类似的玩意之外——同盟的上述文件作为国际发表的文件，并且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更加彻底。它刊载这篇文章是在上述那封辟谣信已发表于“泰晤士报”十一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早就说过：所有耶稣会教徒中最坏的是新教徒。

卡·马克思
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的信

致弗·格林伍德先生

1871年6月8日

阁下：

能否请您将下面的短篇日内在贵报惠予刊载？

顺致敬意

卡·马克思

致“派尔—麦尔新闻”编辑

阁下：

从贵报昨日刊载的巴黎通讯中得悉，在我以为自己是住在伦敦的时候，我却由于俾斯麦—法夫尔的要求而在荷兰被捕了。您难道不觉得，这个消息只是近两个月来不断由法国和普鲁士警察捏造、由凡尔赛报纸予以发表、并由欧洲其他报纸纷纷转载的无数耸人听闻的有关国际的谣言之一。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6月8日于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载于1871年6月9日

“派尔-麦尔新闻”第1972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派尔-麦尔新闻”，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附函是
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
的通告的声明²⁵⁸

致“黎晤士报”编辑

阁下：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号召它们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斗争，直到把国际消灭。为了评价这个文件，只要举出几件事实就够了。

在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茹尔·法夫尔由于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把国际成立日期推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就引证“它（国际）在1869年3月25日发的传单”。但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当他还是一个颇为年轻的律师的时候，为了替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辩护，他就施展过这种伎俩。当时他硬说他宣读的是卡贝著的小册子中的一些摘录，实际上他宣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一些话。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审判时被揭发出来了，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

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国际的文件。例如，他说：

“如 1869 年 7 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一类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正是将“同盟”即日内瓦的 *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 的章程——茹尔·法夫尔引证的就是这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仿佛有一部分也是反对帝国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波拿巴检察官所捏造的警察言论来反对国际，这些言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驳倒了。

大家知道，国防总委员会在关于前次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 7 月和 9 月发表的）^①，揭露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无益——由总委员会发动游行示威来反对俾斯麦，以支持国防政府；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到共和国。由于预期茹尔·法夫尔将到伦敦来，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无疑是本着最善良的愿望），然而这是违背总委员会的意愿的，因为总委员会在 9 月 9 日的宣言中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要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那末这位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① 见本卷第 3—9、285—294 页。——编者注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一 霍耳博恩街 256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
载于1871年6月13日“泰晤士报”
第27088号、1871年6月17日“东
邮报”第142期、1871年6月18日
“国际报”第127号、1871年6月21日
“人民国家报”第50号以及国际
的其他机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泰晤士报”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
编辑部的声明²⁵⁹

致“泰晤士报”

本协会总委员会为答复贵报 1871 年 6 月 19 日所载关于国际的社论，特委托我通知贵报如下：

贵报将“巴黎报”以及诸如此类报纸所公布的纯系凡尔赛警察捏造的假巴黎宣言同我们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混为一谈。

贵报断言：

“在总委员会的宣言中也完全赞同地引证了我报最近引用的比斯利教授的‘政治短评’，因而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授与前皇帝以社会救主的称号是多么公正。”

但是总委员会在它的宣言中根本没有引证“政治短评”中的任何东西，只是提到了一位作者（他是一位著名的和受人敬重的法国学者）关于参加这次巴黎革命的国际会员的个人品质所作的证明^①。这同“前皇帝”，同被他拯救的社会有什么关系呢？协会的“纲领”根本不是像贵报所说的那样，即在“七年前”由托伦和奥哲尔两位先生“准备的”。它是由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朗—爱克街圣

^① 见本卷第 384 页。——编者注

马丁堂的公开大会上选出的临时委员会通过的。托伦先生从来不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在草拟这个纲领时他根本不在伦敦。

贵报断言，“米里哀尔”是“最残酷的公社委员之一”。但是米里哀尔从来不是公社委员。

贵报接着说：“我们还应当指出不久以前担任协会主席的阿西”，等等。

阿西从来不是国际的会员，至于“协会主席”一职，早在 1867 年就被撤销了²⁶⁰。

卡·马克思写于 1871 年 6 月 20 日
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0 年第 1 版第 13 卷第 2 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给“旗帜报”
编辑部的信²⁶¹

致“旗帜报”编辑

您在关于国际的社论(6月19日)中写道:

“在不久前为保卫公社而发表的两个宣言(伦敦的和巴黎的)中,巴黎组织的宣言具有更真实更坦率的优点。”

对您不幸的是,“巴黎”宣言不是我们在巴黎的组织发表的,而是“凡尔赛的警察”发表的。

您断言:

“伦敦的国际分子同他们的巴黎弟兄同样热烈地主张‘旧社会应当被摧毁,也将被摧毁’。他们把焚毁公共建筑物和枪毙人质说成是‘消灭社会的巨大努力’,这次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将再接再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协会总委员会请您确切地指出,我们宣言的哪一页、哪一行有您强加给我们的那些话!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6月20日
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
的信的声明²⁶²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我就“每日新闻”星期二所载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先生的信，做如下声明：

1.关于说总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会在凡尔赛造成有人被处死或放逐的后果”的谰言，总委员会认为它的巴黎朋友们对于这一点会比侯里欧克先生判断得更正确。

2.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正式文件都由全体委员（不论出席的或缺席的）署名，是总委员会的通例^①。

3.至于说什么这篇宣言

“虽然显系经过某个萨克森人或凯尔特人的润色，但决非出自英国人的手笔”，

总委员会提请注意，国际性组织的文献自然不能带有哪一个民族的特色。况且总委员会在这一点上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宣言以及以前总委员会所发表的许多文件，都是由德国通讯书记卡尔

^① 恩格斯的手稿中接着有：“但这一次曾作为例外，正式征询过缺席的委员的同意。”——编者注

• 马克思博士起草的。宣言是一致通过的，也没有经过任何人润色。

4. 去年，乔治·杰科布·侯里欧克曾自荐为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但是遭到了否决。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6月21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6月20日
载于1871年6月23日“每日新闻”和
1871年6月24日“东邮报”第143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给“旁观者”和“观察家”
编辑部的信²⁶³

致“旁观者”（及“观察家”）编辑

阁下：

如果您公布这一事实，即目前充斥于英国报刊的巴黎的一切假宣言和“国际”的其他出版物（它们首先刊载于臭名远扬的“巴黎报”）无例外地都是凡尔赛的警察捏造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将十分感激。

此致

敬礼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6 月 21 日
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0 年第 1 版第 13 卷第 2 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卡·马克思 致“每日新闻”编辑²⁶⁴

阁下：

由 30 人以上组成的总委员会，当然不可能自己直接草拟它的文件。它不得不将这一工作委托给委员会的这个或那个委员，而自己保留有否决文件或修改文件的权利。我写的“法兰西内战”这一宣言曾由国际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因而它是表达总委员会观点的正式文件。至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个人指责，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个问题上，总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只得信赖我的正直。所以我支持一位总委员会委员^①的建议，要约翰·黑尔斯先生在他给侯里欧克先生的回信^②中说明我是宣言的作者。对这些指责，只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我在此建议茹尔·法夫尔之流向法院控诉我诬蔑他们。鲁埃林·戴维斯先生在他的信中写道：

“请到法国人彼此间这样随便地指责对方的人格卑鄙，真令人失望。”

这种教训人的话，不是带有曾经常受到威廉·科贝特嘲笑的

① 弗·恩格斯。——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398—399 页。——编者注

英国人身上的那种假自负的味道吗？法国的 *petite presse*（下流报纸）为警察服务，捏造最卑鄙的谣言诽谤公社社员——被枪杀的、被俘的或是隐藏起来的公社社员，英国报纸虽然表面上轻视 *petite presse*，但是迄今还在重复这种诽谤，请问鲁埃林·戴维斯先生，这两种报纸哪一种更坏？例如，正是在英国，而不是在法国，可以压制像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这样的人在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内对已故的帕麦斯顿勋爵所提出的如此严厉的指责²⁶⁵，要知道，在这件事上，有失体面的不是法国人。

卡尔·马克思

6月26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
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载于1871年7月1日“东邮报”第
144期和1871年6月27日“每日
新闻”（被任意删节）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
“每日新闻”校对过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侯里欧克和
鲁克拉夫特的信的声明²⁶⁶

致“每日新闻”编辑

阁下：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全权委托我来答复贵报星期一所载乔·杰·侯里欧克和本·鲁克拉夫特两位先生的信。从总委员会会议记录上可以看到，侯里欧克先生曾获准参加 1869 年 11 月 16 日总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表示希望成为总委员会委员，并希望参加应于 1870 年 9 月在巴黎举行的最近一次国际工人协会全协会代表大会。侯里欧克先生退席后，约翰·韦斯顿先生提出他作为总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但是这一提议所引起的反应，使韦斯顿先生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而将它撤回了。至于鲁克拉夫特先生声称，在投票表决宣言时，他未出席会议，对此我应当指出，鲁克拉夫特先生曾出席 1871 年 5 月 23 日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当时曾正式宣布，宣言“法兰西内战”的草案将于 5 月 30 日的应届总委员会会议上予以宣读和讨论。因此鲁克拉夫特先生完全有可能决定，他是否要出席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他不仅知道，按照总委员会的通例，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都由全体委员署名，不论他们出席与否，而且他还是这个通例的最热烈的拥护者之一，他

曾不止一次地发言反对破坏这一通例的企图；而且就在5月23日他还和别人一起反对了这样的企图。那时他出自本意地告诉总委员会说，“他完全同情巴黎公社”。在6月20日星期二晚上举行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鲁克拉夫特先生不得不承认，甚至到这时他还没有读过宣言，只是根据报刊上的评论来判断它。关于奥哲尔先生的反驳，我只能这样说：大家以为他会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曾经告诉过他总委员会最近要发表宣言；我们曾经问过他，他是否反对在宣言上有他的署名，他的回答是“不反对”。让社会舆论自己去做结论吧。我还能补充一点，总委员会已一致接受了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两位先生的辞职。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 约翰·黑尔斯

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6 月 27 日
载于 1871 年 6 月 29 日“每日新闻”和
1871 年 7 月 1 日“东邮报”第 144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每日新闻”

卡·马克思
致“新自由报”编辑弗里德兰德²⁶⁷

尊敬的朋友：

能否请您将下列声明在贵报刊登并将该天报纸寄一份给我。

您的忠实的朋友 卡尔·马克思

致“新自由报”编辑部

维也纳“新闻报”²⁶⁸刊载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晚会”的小品文，署名是缩写字母W。在这篇小品文里我很荣幸地被作者提到。据W说，他曾在赫尔岑家的晚会上遇见我。他甚至记得我在那里的讲话。

我是坚决反对赫尔岑的人，一直避免和他见面，因此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怀疑，具有如此丰富的想像力的W是否到过伦敦。“大理石的楼梯”，此地是只有宫廷里才有的，W却甚至在赫尔岑的“小宅第”里看到了。

我在此建议这位不甘心让“巴黎报”及诸如此类的警察报纸

专美于前的 W 说出自己的姓名来。

卡尔·马克思

1871年6月30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7月4日
“新自由报”第246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自由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附
函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
致“派尔—麦尔新闻”
编辑格林伍德²⁶⁹

阁下：

我在“每日新闻”上曾经声明——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转载了我的声明——“对茹尔·法夫尔之流的指责，只由我一个人承担责任”^①。

您在昨日的贵报上说，这些指责是“诬蔑”。我声明，诬蔑者正是您。您既如此无如又无礼，这不是我的过错。如果我们是在大陆上，我将要以另一种方式向您追究责任。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6月30日于伦敦
西北区哈弗斯托克小山

载于1871年7月8日
“东邮报”第14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
根据手稿校对过

^① 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 宣言“法兰西内战”和
英国报纸

伦敦 6 月 30 日。自伦敦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件公诸于世的文献,像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那样,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大型报刊起初本来打算施展其保持完全沉默的惯技,但是,只过了几天它们就深深感到,这一次再这样做已经行不通了。“电讯报”²⁷⁰、“旗帜报”、“旁观者”、“派尔—麦尔新闻”、“泰晤士报”都不得不纷纷就这一“值得注意的文件”发表社论。接着,报纸上就出现了专门就宣言中某几点发表议论的读者来信。然后又是社论,而到了周末,各家周刊又发表了评论。所有的报刊都不得不一致承认国际是欧洲的一支巨大的力量,对这支力量必须加以考虑,而且不能用故意不理睬它的存在的办法来消灭它。所有的报刊都不得不承认宣言的文笔高超;用“旁观者”的话来说,宣言的语言就像威廉·科贝特的语言那样坚强有力。资产阶级报刊对这个如此坚决地捍卫无产阶级观点和毅然决然地维护巴黎公社的文件,几乎是一致起来反对的,这本是意料中的事。由巴黎警察报纸编造出来的施梯伯式的文章²⁷¹和完全属于另外一个组织(巴枯宁派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文件,——茹尔·法夫尔企图把这些文章和文件的责任都推卸给

国际——尽管总委员会提出公开抗议，仍然被硬加到国际的头上。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到后来，这一切叫嚣连庸人都感到厌烦了。“每日新闻”敲了退堂鼓，而“观察家”——唯一的一家行为真正体面的报纸——在一篇详尽的文章中坚决地为国际做了辩护。就在报刊叫嚣的影响下，总委员会的两个英国委员声明自己退出总委员会，其中一个（奥哲尔）早已同资产阶级唱一个调子，另一个（鲁克拉夫特）自从被选入伦敦国民教育局的时候起，显然就更加听从“可敬的”人物的意见了；他们的辞职被一致同意了。他们已经被另外两个英国工人^①代替了，他们很快将体会到，在决定关头背叛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一个英国教士鲁埃林·戴维斯在“每日新闻”上抱怨宣言对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进行了尖锐的攻击；他希望判明这些指控的真伪，即使是通过由法国政府对总委员会起诉的办法也行。第二天，卡尔·马克思在同一家报纸上发表声明说，作为宣言的作者，对这些指责由他本人承担责任^②；但是，看来法国大使馆并没有接到对马克思控以诽谤罪的指令。最后，“派尔—麦尔新闻”声明说，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国家活动家的人格本身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他的公开活动才能受到攻击。不言而喻，如果那些说明英国国家活动家的人格的情况一旦公诸于世，那末，寡头政治和资产阶级世界的最后审判日就要到了。

维也纳报纸“漫游者”²⁷²所发表的无耻之徒涅恰也夫颂扬涅恰也夫的文章，所有的德国报刊都照登了；文章中把他的功绩与谢列

① 约·罗奇和阿·泰勒。——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

布廉尼科夫和艾尔皮金的功绩同时吹捧。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将要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三个可敬的人物。现在只说一点，即艾尔皮金是有名的俄国间谍。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6 月 30 日
载于 1871 年 7 月 5 日
“人民国家报”第 54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卡·马克思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²⁷³

致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

公民们：

协会总委员会认为有责任把有关美国大使华施贝恩先生在法国国内战争时期的行为的材料印发给你们。

—

下列声明是罗伯特·里德先生发表的，他是苏格兰人，在巴黎住了十七年，在国内战争时期曾任伦敦“每日电讯”和“纽约先驱报”²⁷⁴的记者。应该顺便指出，“每日电讯”为了凡尔赛政府的利益，竟把里德先生寄给该报的那些简短的电讯报道也歪曲了。

目前正在英国的里德先生准备以 affidavit^①的形式来证实他的声明。

“警报声混杂着大炮的轰隆声，整夜不息。无法安睡。我在想，欧美的代表们在哪里呢？他们岂能眼看着无辜鲜血汇流成河而不设法调解一下吗？想到这里，我再也不能平静下来，我知道华施贝恩先生住在城里，于是决定马上去见他。这大概是4月17日的事；不过，确切的日期可以从我给莱昂斯勋爵的信中查出来，因为我在当天就给他写了信。当我动身去华施贝恩先生官邸，穿

① 向法官提出的声明，等于宣过誓的证词。——编者注

过爱丽舍园街的时候，途中碰到许多救护马车，满载着伤兵和垂死的人。炮弹在凯旋门周围爆炸，梯也尔的一长串牺牲者名单上又加上了许多无辜者。

到了歌奥街 95 号，我就问看门人，去见美国大使怎么走法，于是我被领到二楼。在巴黎，楼梯或你的住宅所在的那层楼几乎可以一丝不差地说明你的财产状况和社会地位；这是一种社会气压表。在窗户面向大街的第一层楼的住宅里，可以找到侯爵，而在窗户面向院子的第五层楼上，可以看到贫寒的工匠；把他们隔开的楼梯说明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社会鸿沟。我在上楼的时候，没有看见穿红色便服和长筒线袜的健壮的仆人，我就想：‘是呀！美国人是不乱花钱的，而我们简直是铺张浪费。’

走进秘书的房间时，我问华施贝恩先生在不在。‘您想见到他本人吗？’——‘是的。’秘书通报了我的来访，于是我被领去见他。他懒洋洋地坐在安乐椅上读着报。我以为他会站起来，但他继续坐在那里，没有放下报纸。在一个人人们通常是彬彬有礼的国家里，这种行为是极不礼貌的。

我对华施贝恩先生说，要是我们设法进行调解，那从我们方面说来，是不人道的。无论如何，我们有义务试一试；而且这样做的时机似乎特别有利，因为当时普鲁士人坚决要求凡尔赛对问题作最终解决。美英共同施加影响将大大有利于和平。

华施贝恩先生回答说：‘巴黎人都是些暴徒，让他们放下武器吧！’我反驳说，国民自卫军有拿起武器的合法权利，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当人道精神被侮辱的时候，文明世界有权利干预，所以我请求您在这件事上同莱昂斯勋爵合作。华施贝恩先生说：‘这些凡尔赛人什么也不愿意听。’我说：‘如果他们拒绝，那他们将负道义上的责任。’华施贝恩先生说：‘我并不这样认为。在这方面我什么也不能做。你最好还是亲自去见莱昂斯勋爵吧。’

我们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我大失所望地离开了华施贝恩先生。我发现他是一位无礼而傲慢的人，完全没有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兄弟感情。当考莱勋爵任我国驻法国代表时，我曾有幸同他交谈过两次。他那坦白而亲切的态度，同这位美国大使冷冰冰的、傲慢的、摹仿贵族式的语调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同时也劝莱昂斯勋爵，为了人道，英国有责任尽力促进和解，因为我相信，只要不列颠政府不愿受到一切人道者的咒骂，它就不能对像克拉马尔车

站和木兰—萨克的大屠杀那样的兽行漠然视之，更不用说讷伊的惨状了。莱昂斯勋爵通过他的秘书爱德华·马利特先生口头回答我说，我已把我的信送交政府了，并且今后也愿意转交我对这个问题的任何其他有关报道。当时情况对于进行调解特别有利，只要我国政府那时施加自己的影响，就不致于发生巴黎的大屠杀。如果不列颠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如何这不是莱昂斯勋爵的过错。

我们还是回过来谈华施贝恩先生吧。5月24日，星期三早晨，我路过卡普勒林荫道；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看见是霍萨特博士，他站在华施贝恩先生旁边，华施贝恩先生当时坐在敞篷马车上，周围围了一大群美国人。塞喧之后，我就同霍萨特博士谈起来了。话题很快就转到周围发生的可怕事件；华施贝恩先生带着相信自己正确的神情，对我说道：‘**凡是公社社员和一切同情公社的人，都要枪毙。**’唉，我知道，他们杀害老人和小孩，只因为这些人的全部罪状就在于**同情公社**，但我没有料想到会从华施贝恩先生嘴里半正式地听到这一点；然而，当他**重复**这一句残忍的话时，他还有时间去救大主教哩。”²⁷⁵

二

“5月24日，华施贝恩先生的秘书出席了在第十一区区政府召开的公社会议，他带来了普鲁士人关于在下列条件下调解凡尔赛人同公社社员之间的纷争的建议：

停止军事行动；

公社和国民议会双方都进行改选；

凡尔赛军队撤离巴黎，驻扎在防御工事及其周围；

国民自卫军继续守卫巴黎；

凡过去或现在在公社军队中服役的人，不应受到任何惩处。

公社在非常会议上接受了这些建议，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必须给法国两个月的期限，以便准备制宪议会的普选。

同美国大使馆的秘书还举行了第二次会面。公社在5月25日早晨的会议上，决定派五名公民——其中包括韦莫雷尔、德勒克吕兹和阿尔诺德——

作为全权代表，前往文森，根据华施贝恩先生的秘书的通知，普鲁士代表就在那里。但是，到了文森城门口，国民自卫军的哨兵不准这个代表团过去。由于同美国大使馆的那位秘书又举行了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会面，公民阿尔诺德才从他那里得到了通行证，于5月26日前往圣丹尼，但是他在那里……也没有受到普鲁士人的接待。

美国的这种干预的结果（这种干预使人相信普鲁士人会恢复中立态度，相信他们有意充当交战双方的调解人），是防线在最紧要的关头瘫痪了两天。虽然为了使这次谈判能严守秘密，曾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是国民自卫军的士兵们很快就知道了这次谈判，他们完全相信普鲁士的中立态度，跑到了普鲁士阵线方面去，当了俘虏。大家都知道，普鲁士人如何卑鄙地利用了这种轻信行为；有一部分逃跑的被他们的哨兵枪杀了，而被俘的则引渡给凡尔赛政府。

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华施贝恩先生一直不断地通过他的秘书要公社相信，他是热烈同情公社的，似乎只是由于他的外交官身分才使他不便公开表示这种同情，并且要公社相信，他是坚决谴责凡尔赛政府的。”

第二个声明是巴黎公社的一位委员^①写的，他也像里德先生一样，准备在必要时以 affidavit 的形式来证实这个声明。

为了全面地评价华施贝恩先生的行为，必须把里德先生和巴黎公社委员的这两份指出同一计谋的两个方面的声明联系起来看。一方面华施贝恩先生对里德先生说，公社社员都是名副其实的“暴徒”；另一方面他又要公社相信他同情公社的事业，相信他看不起凡尔赛政府。就在5月24日这同一天，他一方面当着霍萨特博士和许多美国人的面，对里德先生说，不仅公社社员，甚至连一般同情公社社员的人都将无条件地被处死；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他的秘书通知公社，不仅公社委员，而且连公社军队的全体战士都能保全生命。

^① 奥·赛拉叶。——编者注

亲爱的公民们，我们请你们把这些事实告诉美国的工人阶级，要他们来决定，华施贝恩先生是否是美利坚共和国的合适代表。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H.巴特里
凯希尔	威廉·黑尔斯	科尔布
弗·列斯纳	乔治·米尔纳	托·莫特斯赫德
查·默里	帕·麦克唐奈	普芬德
约翰·罗奇	吕耳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海·荣克——瑞士；P.卓瓦基尼——意大利；捷维·莫里斯——匈牙利；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詹姆斯·柯恩——丹麦；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7月11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卡·马克思写
1871年7月18日左右印成传单，并载
于1871年7—9月国际的许多机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传单译的

卡·马克思
致“晨报”编辑²⁷⁶

阁下：

您在今天的一篇社论里引用一系列类似“伦敦、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已起来反对可恨的资本”等等的话，而且承蒙您的好意，认为这些话是出自我的手笔。

请允许我声明，作为您这篇文章的根据的全部引文，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巴黎警察已习惯于几乎每天要用我的名义散布谎言，以便取得攻击凡尔赛被俘的国际会员的罪证；大概您是被他们散布的某些谎言引入了歧途。

阁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1871年7月11日于哈佛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

载于1871年7月13日“晨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晨报”

卡·马克思 致“旗帜报”编辑

阁下：

在今天早晨的“旗帜报”上，贵报驻巴黎记者引用了“法兰西报”²⁷⁷上的一封信，信上注有“1871年4月28日于柏林”字样，并且似乎还有我的署名。我要指出，这封信和不久以前在“巴黎报”以及其他法国警察报纸上发表的硬说是我写的所有其他信件一样，从头至尾都是伪造的。如果“法兰西报”说这封信是取自德国报纸，那末它也同样是说谎。德国报纸从来不会在伪造信上注明柏林字样。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7月13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7月17日“旗帜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旗帜报”

弗·恩格斯

* 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²⁷⁸

马志尼在他的“告意大利工人书”中宣称：

“这个几年前在伦敦成立的协会，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和它合作……一小撮人企图直接领导大批在祖国、志向、政治主张、经济利益以及行动方式都各不相同的人，这一小撮人的结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动。因此我拒绝和他们交往，稍后意大利工人支部也拒绝和他们交往”云云。

我们来看一看事实。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举行以后，该会选出的临时委员会举行会议时，鲁·沃尔弗少校就提出了马志尼亲自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不仅没有对“直接领导大批人”等等提出异议，不仅没有说这“一小撮人的结局，或者将是完全停止活动，或者必将独断地行动”，而是相反，章程是本着中央集权的密谋即赋予中央机关以独断权力的精神起草的。宣言是以马志尼惯用的风格起草的：资产阶级民主、给予工人政治权利以保持中等和上等阶级的社会特权。

这个宣言和章程草案自然遭到了否决。但是意大利人仍然是协会的会员，直到某些想利用国际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法国资产者又提出一些问题时为止。在他们遭到失败以后，首先是沃尔弗，接着是其他一些人退出了协会²⁷⁹。国际就这样和马志尼断绝了关系。不久以后，临时中央委员会为答复韦济尼埃的文章，在列日的报

纸上声明，马志尼从来不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他的宣言和章程草案都被拒绝²⁸⁰。马志尼曾疯狂地攻击巴黎公社，他也在英国报刊上进行攻击。每当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时，他总是这样做的；1848年六月起义后，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对起义的无产者的攻击是这样令人愤慨，甚至连路易·勃朗都在报刊上写文章反对他。而当时路易·勃朗曾屡次宣称，1848年的六月起义是波拿巴派的暗探干的！

马志尼所以称马克思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头脑，不容异己的性格”等等特点的人，显然是因为马克思很成功地破坏了马志尼对国际策划的阴谋，不容异己地反对老阴谋家掩饰不周的贪求权力的野心，从而使他永远无法再危害协会。所以国际应该为自己的会员中有这样一个人而感到十分满意，这个人的“头脑”和“性格”是如此具有“破坏性”和“不容异己”，以致他能保证国际存在七年之久，为了使国际获得今天的光荣地位，他所做的事比任何人都多。

至于马志尼所说的已经在英国开始出现的协会的分裂，实际是委员会有两个同资产阶级一鼻孔出气的英国会员^①，认为我们关于内战的宣言太尖锐了，因而退出了协会。代替他们的是另外四个英格兰人^②和一个爱尔兰人^③参加了总委员会，结果总委员会比以前更强大了。

国际没有瓦解，现在它第一次被所有英国报刊公认为欧洲的一支强大的力量，伦敦从来没有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像总委员会关

① 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编者注

② 泰勒、罗奇、米尔斯和罗赫纳。——编者注

③ 麦克唐奈。——编者注

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那样，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本小册子的第三版现在已经问世。

必须使意大利的工人们了解，伟大的鼓动家和密谋家马志尼对他们只有一个忠告：**尽可能提高文化水平、进行学习**（似乎没有资金，这也能办到！）……**尽量多办消费合作社**（甚至不是生产合作社！）——**并且寄希望于未来!!!**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7 月 28 日
载于 1871 年 8 月 31 日“自由思想”
杂志第 9 期、1871 年 9 月 13 日“玫瑰小报”第 255 号（部分刊载）以及
许多其他意大利报纸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自由思想”杂志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59 年
“苏联共产党历史问题”杂志
第 6 期（译自另一意大利报纸）

卡·马克思
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附函²⁸¹

1871年8月7日于伦敦西北区哈弗斯
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号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鉴于“公报”为驳斥“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审判延期的文章而写的短评已经在欧洲报刊上引起许多反应，附上的材料可能会引起贵报读者的兴趣^①。其中引用的一封信，是由一位答应为几个被捕者出庭辩护的律师写的。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① 见本卷第422—423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致“泰晤士报”编辑

阁下：

“泰晤士报”关于凡尔赛再度延期审判被俘公社社员的评论，无疑击中了目标，反映了法国公众的情绪。“公报”对这种评论的愤怒答复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由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的发表，大量的抗议书投向了巴黎的报纸，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些抗议书当然是不会被登载的。我这里有一封法国人的来信，这个人由于职务关系有可能熟悉其中的情况，因此他关于审判莫名其妙地延期的原因所作的记述或许有一定的价值。下面是这封信的几段摘录：

“到目前为止，谁也不知道第三军事法庭何时开庭。看来，这是因为格里马耳上尉即 Commissaire de la République (国家公诉人) 被另一个更可靠的人所替换。在最后一分钟，看了他起草的准备在法庭宣读的起诉书之后，发现这位公诉人有点像是共和党人，他曾在费德尔布之流统率下在北方部队中服役，等等。于是突然有另一个军官来到他的办公室，将委托书交给他并且说：我是接替您的人。这件事是这样出乎可怜的上尉的意料，他差一点发了疯……

梯也尔先生坚决想自己包办一切。他的这种狂热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他不仅不顾法庭保持公正态度的固有规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所有的 juges d' instructions (法院侦查员) 开会，而且甚至竭力挑选认为可以出庭

的听众。他通过圣伊雷尔先生亲自分发入场券……

同时在萨托里,被捕者像苍蝇般地死去,——铁石心肠的死神比这位渺小的国家要人的法庭判决干得更麻利些。在凡尔赛的单身牢房里关着一个不会说一句法语的身材魁梧的小伙子。据说他是爱尔兰人。究竟他是怎么落到这般境地的,现在还不得而知。在被捕者里面也有个名望很高的人,他叫……他在牢房里已经呆了两个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他进行审讯。这多么卑鄙。”

您的顺从的仆人 正义

1871年8月7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40年第1版第13卷第2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卡·马克思
致“国际报”编辑²⁸²

阁下：

您在一篇题为“国际协会”的文章中说：

“工人盲目地用自己少得可怜的积蓄供总委员会委员们任意享受，使他们得以在伦敦过舒服的生活。”

应当向您指出，除总书记领取每周 10 先令的津贴外，总委员会的所有委员无论现在和过去一直是**无报酬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请您日内在贵报刊载这封信。

如果贵报继续散布这一类诽谤言论，我将向法院起诉。

谨致

敬礼

卡·马克思

1871 年 8 月 17 日于伦敦

载于 1871 年 8 月 23 日
“人民国家报”第 68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并根据
“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
致“舆论”周报编辑²⁸³

私人信件

阁下：

我不仅要求您在贵报立刻发表随信附上的答复^①，而且坚决要求您在贵报刊登过诽谤言论的同一地方刊登**详尽而彻底的辟谣声明**。

如果我不得不对贵报诉诸法律，我将感到非常遗憾。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马·

写于 1871 年 8 月 19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1 年第 1 版第 24 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① 见本卷第 426—427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致“舆论”周报编辑

阁下：

今日出版的贵报上，您从俾斯麦的臭名昭著的“国民报”²⁸⁴评载了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极端恶毒的诽谤言论。其中有这样的话：

“卡尔·马克思说：‘资本用工人的精力和生命做生意’，可是这位新救主本人，并不比这好多少。他拿了工人靠自己的劳动从资本家那里挣来的钱，而他慷慨地付给工人作为交换品的则是可能将在一千年以后才存在的国家这样一张支票。向我们证明社会主义鼓动家们卑鄙地出卖灵魂的是些多么富有教益的事实，他们多么无耻地滥用受托给他们的钱财，他们是怎样指着鼻子互相责骂啊！所有这些，我们从他们党的代表大会和机关刊物上知道得很多了。这是个可怕的充满污秽的火山，里面喷射出来的不可能是比巴黎公社更好的东西。”

为了答复“国民报”的那些出卖灵魂的下流文人，我想只说一点就够了：我从来没有向英国的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要过或领取过一文钱。

除总书记领取每周 10 先令的工资外，国际总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是**无报酬地**工作的。总委员会每年向全协会代表大会提出的财务报告，向来都得到一致批准，从来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议。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8月19日于哈弗斯托克小山

载于1871年8月26日
“舆论”周报第518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舆论”周报,
并根据草稿校对过

卡·马克思
致“高卢人报”编辑²⁸⁵

1871年8月24日于布莱顿

阁下：

因为贵报发表了关于我同“纽约先驱报”一位记者谈话的报告的摘要，我希望您把我寄给“纽约先驱报”的下列声明也予以发表。现将这项声明以原本形式即用英文附录于后^①。

我有幸做您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致“纽约先驱报”编辑

1871年8月17日于伦敦

阁下：

我在8月3日的“先驱报”上看到了关于我同贵报一位记者谈话的报道。兹声明如下：这篇报道中认为是我所说的这些话，不论对于和法国最近事态有关的一些个别人物的意见，或是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我都不应当负任何责任。报道中认为是我所说的这些话，其中有一部分的内容我确实谈到过，但我并不是那样

^① 在“高卢人报”上发表时保留了英文原文。——编者注

讲的；而另一部分，我根本没有讲过。

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载于 1871 年 8 月 27 日
“高卢人报”第 1145 号

第一封信原文是法文
第二封信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高卢人报”

卡·马克思 给“太阳报”编辑德纳的信²⁸⁶

1871年8月25日于布莱顿

阁下：

首先我应当请您原谅我长期沉默。我早就要给您回信了，实在因为工作太忙，以致损害了健康，医师认为必须把我送到这儿来洗几个月海水澡，严格禁止我做任何工作。

回到伦敦以后，只要有好机会迅速写出点东西来刊印，我一定要实现您的愿望。

我已经给“纽约先驱报”寄去一份声明，表示我对该报记者硬加在我身上的那些胡言乱语和十足的谎言^①完全不负任何责任。我不知道“纽约先驱报”是否刊登了这篇声明。

流亡到伦敦来的公社社员的人数日益增多，而我们援助他们的资金日渐减少，因此，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处境十分凄惨。我们准备号召美国人给以援助。

为了使您对法兰西在 République Thiers (梯也尔共和国) 统治下的情况有所了解，我应当把我自己的几个女儿的遭遇告诉您。

我的二女儿劳拉嫁给了医师拉法格先生。在巴黎开始第一次

^① 见本卷第 428—429 页。——编者注

被围的前几天，他们离开巴黎到拉法格的父亲所在的波尔多去。拉法格的父亲身患重病，很想同自己的儿子见一面。儿子照料着他，在他逝世以前，一直守在病榻旁边。以后，拉法格和我的女儿就住在波尔多，拉法格有一所房子在那里。在公社时期，拉法格担任国际波尔多支部的书记，因此曾作为该支部的代表被派往巴黎。为了熟悉当地的情况，他在巴黎逗留了六天。在整个这段时期，波尔多的警察并没有打扰他。大约在5月中，我的两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到波尔多去，从那里与拉法格一家人前往离西班牙边境不远的、比利牛斯山区的巴涅尔—德—品雄。我的患过严重胸膜炎的大女儿在那里洗矿泉浴，进行治疗。拉法格夫妇照料病危的孩子，而我的小女儿则在家庭悲哀容许的限度内去欣赏吕雄近郊的美丽风景。吕雄是病人和 beau monde（上流社会）的疗养地，因此它不太可能成为进行政治阴谋的地方。何况我的女儿拉法格夫人又遭到了不幸——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时，就在埋葬了孩子以后不久，是谁在8月的第二个星期出现在他们的家里呢？是大名鼎鼎的凯腊特里，人人都知道他在墨西哥战争时期所干的卑鄙事情，都知道他在普法战争时期充当的暧昧角色，此人起初是巴黎警察局长，后来是 soi-disant（所谓的）布列塔尼的总司令，现在又当上了上加龙省的省长；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土鲁斯的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陪同这一对可尊敬的先生前去的是一些宪兵。

有人在头一天晚上预先通知了拉法格，他立刻就越过了西班牙国境；他在波尔多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准备了一张西班牙的护照。

虽然他的父母都是法国人，但是他是在古巴诞生的，因此可算作西班牙人。我的女儿们的住宅遭到了搜查，她们本人曾被

République Thiers (梯也尔共和国)的这两位握有大权的代表严厉地反复盘诘。她们的罪名是带去了革命的通讯。这种通讯只不过是她们写给母亲的几封信,其内容对于法国政府说来当然是不愉快的;此外就是几份伦敦报纸!宪兵对她们的房子守卫了几乎一个星期。我的女儿们必须答应在做好动身的一切必要准备后立即离开法国,因为她们住在法国就是一种危险;然而与此同时,她们发现自己处于受警察 haute surveillance (崇高监视)的地位。凯腊特里和德尔佩克满以为我的女儿们没有护照,但是幸而她们都带有完好的英国护照。否则也会无耻地对待她们,就像对待德勒克吕兹的妹妹以及法国的其他一些妇女一样,这些人同她们是一样无辜的。现在她们尚未回来,可能在等待拉法格的消息。

与此同时,巴黎的报纸却开始散布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例如“高卢人报”把我的三个女儿变成了我的三个兄弟,说他们都是尽人皆知的、危险的国际密使,虽然我连一个兄弟也没有。梯也尔的巴黎机关报“法兰西报”对吕雄事件虚伪地大事渲染,说拉法格先生可以不遭受任何危险,平安无事地返回法国,而这时法国政府却在请求西班牙政府把拉法格当做**巴黎公社的委员**(!)逮捕起来,其实他从未参加过公社,而且作为波尔多的居民也不可能参加公社。果然拉法格被捕了,最初由宪兵押送到巴尔瓦斯特罗,在那里的市监狱里度过了一夜,然后又被押送到韦斯卡,韦斯卡的省督根据西班牙内务大臣的电报命令,应当把他送到马德里去。据8月23日的“每日新闻”报道,他最后被释放了。

在吕雄发生的一切以及那些报纸的做法^①,只不过是梯也尔

① 根据保留下来的这封信的手稿片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在吕雄和西班牙发生的这一切。”——编者注

这帮先生们妄想对我即国际总委员会关于内战的宣言的作者进行报复的可怜企图而已。在他们的报复和我的女儿之间有一张英国护照，是啊，梯也尔先生在对待强大的外国时是多么胆小，而对他本国的手无寸铁的同胞却是那样不择手段。

至于克吕泽烈，我不以为他是一个叛徒，不过，当然，他承担了他没有足够毅力去完成的事情，因而给公社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如今他在哪儿，我不知道。

现在 addio (再见吧)！

您的老朋友 卡尔·马克思

载于 1871 年 9 月 9 日“太阳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太阳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卡·马克思
致“真理报”²⁸⁷编辑

1871年8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编辑先生：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总书记约翰·黑尔斯先生今天在“每日新闻”上得悉，勒诺先生将一篇号召法国农民放火烧毁世界上所有一切砦堡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宣言妄加于国际。黑尔斯先生当即给阿西的辩护人莱·比果先生发出如下电报：

“妄加于国际的纵火宣言，全是捏造。我们愿意在英国法官面前立誓证实这个声明。”

因此，我亟希望通过贵报告诉法国公众：在法国政府军进入巴黎以后，所有用国际名义在巴黎刊印发表的宣言，无一例外，全是捏造。

我不仅以个人名誉担保这一声明，而且愿意在英国法官面前立誓（《the affidavit》）做出相应的声明。

我有根据认为，这种卑鄙的捏造甚至不是直接出自警察机关，而是出自某位B先生之手。此人同那些被“旗帜报”（托利党报纸）

最近称作“名誉可疑的报刊”的巴黎报刊之一有联系。

阁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载于 1871 年 9 月 3 日“夜晚报”第 862 号
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报纸；并载于 1871 年
9 月 10 日“国际报”第 139 号和 1871 年
9 月 13 日“人民国家报”第 74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夜晚报”，
并根据手稿校对过

卡·马克思 致“旗帜晚报”编辑

阁下：

9月2日贵报载有贵报驻柏林记者的“译自‘科伦日报’一篇关于国际的有趣文章”。这篇文章指责我靠工人阶级生活。在贵报记者那篇通讯所标明的日期8月30日以前，“科伦日报”上没有这样一篇文章，因此贵报记者根本不可能根据这份报纸来翻译这篇文章。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这篇文章在两个多星期以前就在柏林“国民报”上登出了，而与贵报记者的译文一字不差的英文译文于8月19日就登载在伦敦的“舆论”周报上。但随后出版的一期“舆论”已经刊登了我对这种诽谤的驳斥^①，现在我要求您务必在日内出版的贵报上刊登这项驳斥声明，现将该声明副本一份附上。普鲁士政府用尽一切手段竭力通过英国报刊散布这种卑劣的诽谤言论，是有其原因的。这篇文章不过是政府将对国际实行迫害的先兆而已。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9月4日于哈布斯托克小山

载于1871年9月6日“旗帜晚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旗帜晚报”

^① 见本卷第426—427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就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给总委员会的建议²⁸⁸

财务报告

(1) 为代表会议寻觅会场。

(2) 为代表会议代表寻觅下榻的旅馆；建议租用从前租过的那家在莱斯特广场上的旅馆。

(3) 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两个问题。

(4) 总委员会全体出席代表会议，并有权参加讨论，但只有一定人数的总委员会委员充任代表，享有表决权。这些委员的人数，俟代表会议的代表总数明确后，由总委员会确定。

(5) 现在住在伦敦并且是得到承认的国际会员的法国人，应派出三名代表，代表法国出席代表会议。

(6) 在代表会议上，如果某一国家的国际会员没有代表时，其代表将由该国的通讯书记担任。

马克思于 1871 年 9 月 5 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1936 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
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²⁸⁹

应以总委员会名义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

(1) 1. 代表会议结束后, 任何一个支部, 在未向总委员会缴清本年度会费(每个会员缴一辨士)以前, 无论总委员会或各国的中央委员会均不承认其为协会的支部。

(2) 2. (L) 至于因政府的阻挠而现时无法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国家, 建议这些国家的代表根据各该国的特殊情况提出组织计划, (N) 协会可以进行改组, 改用其他名称; (J) 但是绝对禁止建立任何秘密团体。

(3) 3. 总委员会应向代表会议提出自上届代表大会以来国际的工作报告。

(5) 5. 总委员会建议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及时发表对过去和现在迫害国际的各国政府的答复问题; 代表会议应指派一个委员会, 委托它在代表会议闭幕后草拟这一答复。

(4) 4. **必须实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 建议各国中央委员会, 为避免误会起见, 今后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 冠以它们所代表的国名; 地方支部及其委员会, 定名为该地区的支部或委员会²⁹⁰。

(6) 6. ^①

(3) 7. 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 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和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 但没有表决权。

8. 委托总委员会颁布新版的章程, 附入与章程有关的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由于法国目前仍然通用章程的被歪曲了的法文译本, 而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又是根据法文译本翻译的, 因此总委员会应提供符合原文的法文译本, 并将其寄往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及荷兰。德文版本。

章程本文用三种文字并列印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1年9月9日左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弗·恩格斯的
手稿译的

① 在手稿中被删去的第6项的文字为: “凡设有协会经常性组织的国家的联合会委员会, 应呈交关于它们从各地区征收的会费数目的报告。”——编者注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1871年9月17—23日²⁹¹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²⁹²

1871年9月18日在代表会议一个委员会
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马克思：从日内瓦成立了由巴枯宁和其他人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时起，争论就开始了。马克思宣读了总委员会在1868年和1869年3月给同盟的两个通知²⁹³；在第二个通知中，提出解散同盟、提供关于同盟成员及其支部数目的材料作为接受他们加入国际的条件。这些条件始终未得到履行；事实上同盟始终未解散，而是一直保留着特殊的组织。日内瓦支部的机关报“平等报”在1869年12月11日指责总委员会，就总委员会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未答复报上的文章。总委员会表示不同意这一指责，它认为，参与报上的论战不在它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是它准备答复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要求和申诉。这个通告曾下达各个支部²⁹⁴；它们全都赞同总委员会的做法。瑞士委员会谴责了“平等报”，同该报编辑部决裂了。编辑部的成员有所更换，从那时候起，“进步报”，后来是“团结报”²⁹⁵成了同盟的信徒们的机关报。以后，在洛克尔举行了代表大会，会上双方即罗曼语区联合会和汝拉联合会（同盟）公开分裂了²⁹⁶。总委员会静待情况的发展；它只是不允许新的委员会作为罗曼语区委员会与已有的罗曼语区委员会同时出

现。违背我们的章程、鼓吹放弃任何政治行动的吉约姆，在战争一爆发时就发表了一项呼吁书²⁹⁷，盗用国际名义要求建立一支军队去援助法国，从而同我们的章程更加抵触了。

弗·恩格斯记录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²⁹⁸

1871年9月21日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1) 罗伦佐——一个原则问题；——这已经解决了。

(2) 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报纸的政治态度也是政治；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攻击政府。问题只在于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情况而定，而不是按照规定办事。

(2) 放弃政治是荒谬的；因为可能选出坏人而提议放弃政治，正如因为出纳员可能逃跑而不缴纳会费。正如因为编辑可能像议员一样被人收买而不出版报纸。

(3) 政治自由——特别是结社、集会和出版的自由——是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手段；我们的这些手段是否会被夺走，难道是无所谓的吗？如果有人侵犯这些手段，难道我们不应当起而反抗吗？

(4) 有人鼓吹放弃政治，说从事政治就等于承认现存制度。存在总是存在，我们对它承认与否，*se fiche pas mal*（它毫不在乎）。但是，如果我们利用现存制度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手段来反对现存制度，难道这就是承认吗？^①

① 恩格斯手稿中用弧线标出的第2、3、4条，原来写在手稿的右边，是对本文的增补。——编者注

(3)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存在着**而且要进行政治活动。向工人的党鼓吹放弃政治,就是破坏国际。单单是对形势的估计、为社会目的而施加的政治压迫,就**迫使**工人从事政治,鼓吹放弃政治者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怀抱。在巴黎公社已经把工人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

(4)我们要消灭阶级。唯一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而我们不应当从事政治吗?所有主张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关心不让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又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问题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9 月 21 日
左右
第一次用法文发表于 1934 年“布尔
什维主义手册”杂志第 20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提纲手稿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恩格斯本人做的 1871 年 9 月 21 日伦敦

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实践，现存政府——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都迫使工人不得不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这一点已经最明显不过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鼓吹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承认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

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等于承认现存制度。但是，既然这个制度把反对它的手段交到我们手中，那末利用这些手段就不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 1934 年
“共产国际”杂志第 29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
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
代表会议的决议²⁹⁹

一

关于总委员会的成员³⁰⁰

代表会议建议总委员会对委员人数的增添加以限制，并且在增添委员时不要过多地拣选一个民族的公民。

二

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³⁰¹

1. 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决定，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各国的中央委员会，今后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该国的国名；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

2. 所有地方分部、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

3. 因此，所有分部、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

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4. 但是，决定的第 1、2 两条，不适用于附属国际的各工会。

三

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³⁰²

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区域和地方的委员会以及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

四

关于向总委员会缴纳数额为每个会员

一辨士^①的会费³⁰³

1. 总委员会应印发每张值一辨士的会费券，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2. 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没有地方委员会时，则向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费券。

3. 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章程的专页上。

4. 每年 3 月 1 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均应将与所用会费券价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① 德文版在“辨士”一词后面附有：（“格罗申”），法文版在这一处和下面的“一辨士”构印作：“十生丁”。——编者注

5. 这些印明个人会费金额的会费券，须注明当年日期。

五

关于成立女工支部³⁰⁴

代表会议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

六

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³⁰⁵

1. 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将最初的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五条以及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³⁰⁶付诸实施。

2. 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总委员会可能向它提出的问题。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将给工人阶级带来共同利益，因此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

3. 每年 8 月 1 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在本国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每年 9 月间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4. 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国际的工会和支部通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七

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³⁰⁷

提议总委员会照旧赞助各国工会要求同所有其他国家的相应工会建立联系的日益增强的愿望。总委员会作为沟通各国工会之间联系的国际机构，它的工作的成效，将主要取决于各团体对国际进行的劳动普遍统计所给予的协助。

提议所有国家的工会理事会将自己的地址通知总委员会。

八

关于农民³⁰⁸

1. 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在下次代表大会前提出报告，说明通过什么方法使农民加入工业无产阶级的运动。

2. 同时提议联合会委员会派宣传鼓动员前往农业地区，以便组织公开集会，宣传国际的原则和建立农村支部。

九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³⁰⁹

鉴于：

章程的导言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宣称：“土地巨头和资本巨

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³¹⁰；

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曾通过如下决议：“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³¹¹；

总委员会就公民投票（1870年）前夕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会员密谋事件发表的声明中说：“按本会章程的精神，本会在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在美国的所有支部的专门任务，毫无疑问是不仅要成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组织中心，而且要支持上述各国的任何一种有助于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的政治运动”³¹²；

最初的章程的歪曲了的译文给曲解章程提供了凭据，这种曲解已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和活动带来危害；

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正在残酷地镇压工人的一切争取解放的尝试，并竭力用暴力来保存阶级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①有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鉴于：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① 在德文版上不是“由此产生的”，而是“在其上建立的”。——编者注

工人阶级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本身力量的团结，同样应当成为它在反对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①的政权的斗争中的杠杆，——

代表会议提请国际会员们注意，

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

十

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府阻挠的 国家的总决议³¹³

在因政府阻挠而现时无法设立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国家内，协会及其地方性团体可以进行改组，改用各种其他名称；但是，无论现在和今后，成立任何真正的秘密团体都是绝不许可的。

十一

关于法国的决议³¹⁴

1. 代表会议坚信：一切迫害只能使国际的拥护者加倍振作，并且组织支部的工作即使不是用建立大中心的方法，至少在小工厂和通过自己的代表彼此建立联系的小工厂的联合会内，将继续进行。

2. 根据这一点，代表会议提议所有支部坚持在法国继续宣传

^①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不是“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资本家”，而是“它的剥削者”。——编者注

我们的原则，并把国际的一切出版物和章程尽量运入自己国内。

十二

关于英国的决议³¹⁵

代表会议提议总委员会号召伦敦的英国支部成立伦敦联合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得到外地支部和参加国际的团体^①公认后，即由总委员会承认为英国联合会委员会。

十三

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³¹⁶

1. 代表会议同意把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增补为总委员会委员。
2. 代表会议声明，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3. 代表会议对西班牙联合会的会员就国际组织的情况提出报告表示兄弟般的感谢。这个报告再次证明了他们对我们的共同事业的忠诚。
4. 总委员会应立即发表声明，表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 恰也夫阴谋完全无关， 恰也夫是用欺骗方法僭取了国际的名义^②。

① 在德文版上，“团体”一词为《Gewerksgenossenschaften》，法文版上为《Sociétés de résistance》，即工会。——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在“僭取”之后增添了“和使用”等字。——编者注

十四

关于给公民吴亭的委托³¹⁷

请公民吴亭根据俄文报纸的材料在“平等报”上发表关于涅恰也夫审判案的简短报道。该报道必须在发表前先呈交总委员会。

十五

关于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³¹⁸

代表会议授权总委员会确定——根据事态的发展——应届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①的时间和地点。

十六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³¹⁹

鉴于：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已经宣布解散（见 1871 年 8 月 10 日从日内瓦给总委员会的信，签署人为同盟书记、公民尼·茹柯夫斯基）；

代表会议在 9 月 18 日的会议（见本通告第二项）上决定，国际现有的一切组织，今后应按共同章程的精神和文字，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分部、支部、联合会等等，并冠以该地地名；

因此，现有的支部和团体，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

①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在“代表会议”前面尚有“可以用来代替代表大会的”等字。——编者注

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旨在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①；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今后应以此精神解释和运用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第五条³²⁰，即“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等等^②，——

代表会议宣布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问题已获解决。

十七

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³²¹

1. 宣布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对代表会议的权限问题所提出的各种反对意见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第 1 条的简要叙述，该条全文将在日内瓦的“平等报”上刊出^③。）

2. 代表会议批准总委员会 1870 年 6 月 29 日的决议³²²。

同时，鉴于目前国际受到的迫害，代表会议号召发扬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阶级受到鼓舞；

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的全体正直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各个支部；

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决定请分裂出去的汝拉各

① 在法文版上不是“协会共同目标”，而是“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无产阶级群众所遵循的共同目标”。——编者注

②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不是“等等”，而是“但是它们有权向应届代表大会申诉”。——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 462—465 页。——编者注

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

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国际的任何机关报^①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上予以讨论的问题，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

通 知

不准备发表的决议将由总委员会的通讯书记通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

根据代表会议的决定并以代表会议的名义——

总 委 员 会：

罗·阿普耳加思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 H. 巴特里
德拉埃	欧仁·杜邦（因公在外）
威·黑尔斯	乔·哈里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
弗·列斯纳	罗赫纳
沙·龙格	孔·马丁
捷维·莫里斯	亨利·梅欧

^① 在法文版和德文版上不是“国际的任何机关报”，而是“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编者注

乔治·米尔纳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约翰·罗奇
吕耳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泰勒
威·唐森	爱·瓦扬
约翰·韦斯顿	

通讯书记：

奥·赛拉叶——法国；卡·马克思——德国和俄国；弗·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阿·埃尔曼——比利时；J.帕·麦克唐奈——爱尔兰；勒穆修——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海尔曼·荣克——瑞士；托·莫特斯赫德——丹麦；沙·罗沙——荷兰；约·格·埃卡留斯——美国；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执行主席 弗·恩格斯

财务委员 海尔曼·荣克

总书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10月17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于1871年9—10月拟定、校订和准备付印
1871年11—12月分别用英文、德文和法文印成小册子，并在国际各机关报上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英文版本译的，
并根据德文版本和法文
版本校对过

卡·马克思
伦敦代表会议关于
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的决议

关于分裂：

1.代表会议应该首先审查不属于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汝拉各团体的联合会委员会对代表会议的权限问题所提出的反对意见（见该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 9 月 4 日致代表会议的信）。

第一条反对意见：

“只有按通常程序召开的全协会代表大会，才有权对罗曼语区联合会内发生分裂这一如此严重的问题作出判断。”

鉴于：

在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发生纠纷时，总委员会有权解决这些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进行申诉的权利，由应届代表大会做出最后决定（见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第七条）；

按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第六条，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

暂时开除出国际，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³²³；

总委员会的这些权利曾得到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承认（当然只是在理论上），因为公民罗班不止一次地代表该委员会请求总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见总委员会记录）；

即使代表会议不享有全协会代表大会所具有的权利，但至少也具有比总委员会更大的权利；

实际上正是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的联合会委员会，而不是罗曼语区联合会的联合会委员会，通过公民罗班要求召开代表会议就这次分裂做出最后决定（见 1871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记录）；

因此，代表会议不接受第一条反对意见。

第二条反对意见：

“对一个联合会不给以进行辩解的机会而予以谴责，是与最起码的公道相抵触的…… 今天（1871 年 9 月 4 日）我们间接地知道，9 月 17 日将在伦敦召开非常代表会议…… 总委员会本来应该将此事通知所有地方组织；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总委员会却对我们保持缄默。”

鉴于：

总委员会已委托它的全体书记将召开代表会议一事通知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支部；

瑞士通讯书记、公民荣克没有通知汝拉支部委员会，是由于下列原因：

这个委员会显然违反总委员会 1870 年 6 月 29 日的决定 324，甚至在它最近给代表会议的信中，仍然使用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这一名称；

汝拉各支部的委员会有权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对总委员会的决定提出申诉，但它无权漠视总委员会的决定；

因而，在总委员会看来，汝拉支部委员会从法律上说是并不存在的，公民荣克也就没有权利承认它，直接邀请它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

汝拉支部委员会对于以总委员会名义提出的问题未给予公民荣克任何答复；自从公民罗班成为总委员会委员时起，上述委员会的声明书总是通过公民罗班转交总委员会，而从来不通过瑞士通讯书记；

又鉴于：

公民罗班代表上述委员会起初请求总委员会，后来由于遭到总委员会的拒绝，又请求代表会议将分裂问题提出讨论；因此，总委员会和它的瑞士通讯书记完全有理由认为，公民罗班会通知他的通讯者们关于召开他们本人所力争召开的代表会议一事；

代表会议选出的调查瑞士纠纷的委员会听取了公民罗班的证词；双方提交总委员会的全部文件均已转交这个委员会；不能设想上述委员会只是在9月4日才知道要召开代表会议一事，因为它在8月就已向公民M^①建议，请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代表会议；

因此，代表会议不接受第二条反对意见。

第三条反对意见：

“取消我们联合会的权利的决定，会对国际在我国的存在造成极有害的后果。”

鉴于：

^① 马萨。——编者注

任何人也没有提出要取消上述联合会的权利，
代表会议不接受这条反对意见。

2. 代表会议批准总委员会 1870 年 6 月 29 日的决议。

同时，鉴于目前国际受到的迫害，代表会议号召发扬团结一致的精神，这种精神应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能使工人阶级受到鼓舞；

代表会议建议汝拉各支部的全体正直工人重新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各个支部。

如果这种联合不能实现，代表会议决定请分裂出去的汝拉各支部定名为“汝拉联合会”。

代表会议预先声明：如果自称为国际机关报的任何报刊效法“进步报”和“团结报”，在它们的篇幅内当着资产阶级公众讨论那些只应在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以及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或者在联合会代表大会或全协会代表大会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上予以讨论的问题，那末总委员会今后有责任一概予以公开揭露和拒绝承认。

1871 年 9 月 26 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于 1871 年 9 月 21 日
提出
载于 1871 年 10 月 21 日
“平等报”第 20 号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平等报”

卡·马克思
致“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
周刊”出版者³²⁵

1871年9月23日于伦敦西北区

女士们：

兹寄上我的女儿燕妮关于她和她的两个妹妹在逗留巴涅尔—德—吕雄(比利牛斯山区)期间遭到法国政府迫害的一篇简要的报道^①，供贵刊登载，如果你们认为它能引起贵刊读者的兴趣。我以为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对梯也尔共和国具有特征意义。

关于我逝世的消息，是巴黎的一家波拿巴派报纸“自由未来报”编造的。

从星期日起在伦敦举行国际工人协会的秘密代表会议。它将在今天闭会。

承蒙寄赠极有趣的报纸，十分感谢。

女士们，我有幸仍然忠实于你们

卡尔·马克思

载于1871年10月21日“伍德
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3期
(总第7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

① 见本卷第704—715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³²⁶

1871年9月25日在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的报道

关于国际，卡·马克思说道，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国际会员们本身所不能支配的情况。国际的建立本身，也是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而绝不是由于国际参加者的努力。建立国际不是某几个能干的政治活动家的事；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不能创造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条件。国际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信念的象征。它的任务就是把劳动的力量组织起来，在工人运动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之间建立联系并把它们联合起来。促使国际获得这样巨大发展的情况，是由于全世界劳动人民遭受到日益加剧的压迫。国际获得成就的秘密就在于此。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不可辩驳地证明，工人阶级必须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国际所遭到的各国政府的迫害，同古罗马时代第一批基督徒所遭到的迫害很相似。起初这些基督徒也是人数不多，但是罗马贵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获得成功，罗马帝国就要灭亡。古罗马时代的迫害没有挽救了帝国，而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

国际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在国际成立以前，工人阶级所有的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当中的

激进分子为它建立起来的社团，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下发起的；固然，假如这一运动获得成功，那只会对工人阶级有利。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

接着，他指出，二月革命³²⁷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所支持的反对执政党的运动。二月革命给予工人阶级的仅仅是些诺言，它以统治阶级的另一批人代替了统治阶级的这一批人。六月起义是反对整个统治阶级的，其中也包括统治阶级中的最激进的部分。在1848年让一些新人物上台执政的工人们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用一批压迫者代替了另一批压迫者，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

在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当中，最近的和最伟大的运动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巴黎公社有过很多不正确的理解。公社未能建立起阶级统治的新形式。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

载于1871年10月15日“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世界报”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³²⁸

巴黎首饰匠、前巴黎工人团体联合会³²⁹首饰匠代表、前国民自卫军营长、前巴黎公社财政委员会出纳主任古斯达夫·杜朗，在伦敦冒充流亡者，过去和现在一直为法国警察机关充当密探，对流亡的公社社员，特别是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进行监视，并且已领取酬金 725 法郎。总委员会对上述情节已掌握了最充足的证据，因此，

总委员会斥责古斯达夫·杜朗的可耻行为，并将他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本决议应在国际的所有机关刊物上公布。

弗·恩格斯于 1871 年 10 月 7 日提出
载于 1871 年 10 月 14 日“人民国家报”
第 83 号、1871 年 10 月 19 日“人民报”
第 122 号、1871 年 10 月 21 日“平等报”
第 20 号、1871 年 10 月 23 日“解放报”
第 19 号以及其他机关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涅恰也夫
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³³⁰

国际工人协会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公开声明：

涅恰也夫从来不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或代表；

他声称^①他创建了布鲁塞尔的国际支部并受布鲁塞尔支部委托前往日内瓦，他的这种说法是谎言；

涅恰也夫是为了欺骗和牺牲俄国人而盗用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1871年10月14日

卡·马克思写
载于1871年11月1日“人民国家报”
第88号、1871年11月3日“玫瑰小报”
第306号、1871年11月5日“平等报”
第21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并根据
“人民国家报”校对过

① “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文声明在这里加有：“（人们从圣彼得堡的政治审判案中才知道这点）”。——编者注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 1871 年
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³³¹

在 1871 年 10 月 17 日会议上
通过的总委员会决议

致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

公民们：

鉴于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规定：“每个新成立的支部或团体，如欲加入国际，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第五条规定：“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³³²

总委员会批准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章程，但须作如下的修改：

一、第二条应删除“说明其生活来源”一语，只说：“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共同章程第九条规定：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Every bran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members it admits.》)³³³

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加以调查,尽管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例如对于流亡者、罢工工人等等,——没有生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他们行为端正的保证。但是,如果要求申请者把说明其生活来源作为加入国际的一般条件,那将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

二、(1)鉴于共同章程第四条规定:《The Congress elects the member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with power to add to their number》(“代表大会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并授予总委员会增加新委员的权利”)³³⁴,因此,共同章程承认选举总委员会委员的方式只有两个:或者由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由总委员会加聘;因而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一语,是和共同章程相抵触的,共同章程没有给予任何分部、支部、小组或联合会以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

组织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其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有任何抵触。”³³⁵鉴于前述各点,

总委员会不能批准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中的前述条款。

(2)确实曾建议伦敦的各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而总委员会为了不违反共同章程,一向采取如下做法:

首先,它规定每一个支部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名额,并保留有根据这些代表能否胜任他们所应负担的全面领导职务来决定接

受或不接受这些代表的权利。这些代表之成为总委员会委员，不是由于他们是自己支部派出的代表，而是由于根据共同章程，总委员会有权加聘新的委员。

在最近这次代表会议做出决议以前，伦敦委员会既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委员会又是英国的中央委员会，因此它认为，除了委员会直接加聘的委员之外，再接受由相应的支部直接提名的委员是适当的。

如果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同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选举混为一谈，那是非常错误的，后者甚至不是一个像布鲁塞尔联合会委员会和马德里联合会委员会那样的由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全国委员会。

由于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只是由巴黎各支部的代表组成的，这些支部的代表就完全可以凭限权代表委托书参加这样一个委员会，在其中维护本支部的利益。相反地，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是由共同章程规定的，它的成员除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委托书外，不能接受任何其他限权代表委托书。

(3)总委员会准备按照共同章程规定的、伦敦其他支部均无异议的条件，接受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两名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三、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有这样一款：

“支部的每个成员必须作为本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这个条款如果照字面来解释，是能够被接受的，因为它只是说，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成员不能作为任何其他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但是如果注意到在它前面的条款，那末上述条款的含义就只

能是完全改变总委员会的选举程序,并且违背共同章程第三条的规定而把总委员会变成伦敦各支部代表的会议,在这个会议里整个国际工人协会的影响将为各地方组织的影响所代替。

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第十一条的上述条款的这种含义完全得到了证实,因为这个条款规定必须在支部成员的身分和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之间作出选择。

有鉴于此,总委员会不能批准上述条款,因为它与共同章程相抵触,它剥夺总委员会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利益而自由补充自己成员的权利。

四、总委员会相信,1871年法国人支部会了解所建议的修改的必要性,并毫不犹豫地使自己的地方性章程符合于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文字和精神,从而避免发生任何分歧。在目前条件下,任何分歧都只能阻碍国际工人协会的发展。

敬礼和平等

代表总委员会并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法国通讯书记 奥古斯特·赛拉叶

卡·马克思于1871年10月17日
提出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奥·赛拉叶的
手抄稿译的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
章程和组织条例³³⁶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民族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有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各国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

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³³⁷。

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①的中心。

第二条 本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 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地点在规定的地点集会，无须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这样选出的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过去一年的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① 德文版上在“合作”之前加有：“有计划的”。——编者注

第五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为进行各种事务所必需的负责人员,即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等。

第六条 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行动时,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和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七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细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该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由全国性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章程中这一条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同时不管是否存在法律造成的障碍,并不排斥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

第八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个和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

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都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个支部对它所接受的会员的品质纯洁负责。

第十条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

时,应该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有出席代表的三分之二赞成修改。

第十三条 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之处,将另由可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的条例来补充。

组织条例

按历届代表大会(1866—1869)和

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决议修订

一

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条 国际工人协会的每一个会员有参加选举全协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被选为代表的权利。

第二条 每一个支部,不论其成员多少,均有权派遣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第三条 每一个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只有一票表决权。

第四条 代表的费用,由选出代表的支部和小组负担。

第五条 如某一支部无力派遣代表,可与邻近支部共同选举一名代表。

第六条 成员在500人以上的支部或小组,每超过500人即有权增派代表一名。

第七条 今后只有加入国际并向总委员会缴清会费的团体、支部或小组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享有表决权。同时,国际的经常性组织遭到法律禁止的那些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合作团体的代表,可以参加代表大会有关原则问题的讨论,但不得参加有关组织问题的讨论以及这些问题的表决。

第八条 代表大会的会议分两种:讨论组织问题的秘密会议以及讨论和表决大会议程中列有的一般问题的公开会议。

第九条 总委员会制订代表大会的议程。议程中须包括上次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和总委员会补充提出的问题,以及各支部和小组或它们的委员会提请总委员会批准的问题。

所有支部、小组或委员会,如果要把上次代表大会没有提出的问题提交将举行的代表大会讨论,应于 3 月 31 日前通知总委员会。

第十条 总委员会负责组织代表大会并通过联合会委员会将大会议程及时通知各个支部。

第十一条 代表大会为它所应讨论的每一个问题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每一个代表可提出他愿意参加的委员会。每一个委员会应研究各支部和小组对交由该委员会审查的问题所提出的报告。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在公开会议上只宣读总报告。委员会此外还决定,上述报告中的哪些报告应当作为关于代表大会工作的正式报告的附录。

第十二条 代表大会在其公开会议上,应首先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问题;然后讨论其余问题。

第十三条 对有关原则问题的一切决议,均须举行记名投票(appel nominal)。

第十四条 每一个支部或支部联合会，至迟均须在每年召开代表大会前两个月^①向总委员会提出关于该组织本年度内的工作和发展情况的详细报告。总委员会根据这些报告编写一个总报告，并在代表大会上宣读。

二

总委员会

第一条 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仍用总委员会名称。设有国际经常性组织的各国中央委员会，应定名为联合会委员会，冠以各该国的国名。

第二条 总委员会必须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三条 总委员会应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经常出版关于国际工人协会所关心的一切情况的通报和报告。

为此目的，总委员会应收集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寄给它的一切材料以及它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另一些材料。

用各种文字编写的通报应免费寄发各联合会委员会，由各联合会委员会转发给自己的支部，每个支部一份。

总委员会在无法印行此等通报时，应每三个月给各联合会委员会寄发书面通知一次，供各该国的报纸，而主要是供国际的机关报发表之用。

第四条 每一个想加入国际的新支部或团体，必须立即将其申请通知总委员会。

^① 法文版为“前一个月”。——编者注

第五条 总委员会有权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和小组，但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提出申诉的权利。

但在设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地方，总委员会在决定接受或不接受新的支部或团体之前，须听取属于联合会委员会权限范围以内的意见；但总委员会仍有临时决定问题的权利。

第六条 总委员会也有权将任何支部暂时开除出国际，听候应届代表大会裁决。

第七条 总委员会有权解决属于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团体或支部之间、或各全国性组织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但是，它们保留有向应届代表大会进行申诉的权利，应届代表大会的决定才是最终决定。

第八条 由总委员会任命执行特殊任务的一切代表，均有权出席联合会委员会、区域和地方的委员会以及地方支部的一切会议并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

第九条 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的共同章程和条例，应按总委员会颁布的正式文本印行。

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所有其他文字的译文，均应在发表前提请总委员会批准。

三

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第一条 总委员会向一切支部和附属团体征收会费，数额为每个会员每年一辨士。

这笔会费用来支付总委员会的下述开支：总书记的薪金，通讯

及发表文件的费用,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开支,等等。

第二条 总委员会应印发价值一辨士的固定式样的会费券,每年向各联合会委员会按要求数量供应这种会费券。

第三条 这种会费券应粘贴在会员证或协会每个会员均须持有的那份章程的专页上^①。

第四条 每年3月1日,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均应将与所用会费券价值相符的金额寄给总委员会,并交回剩余的会费券。

第五条 这些印明个人会费金额是会费券,须注明当年日期。

四

联合会委员会

第一条 联合会委员会的费用由所属各支部负担。

第二条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月至少呈交一次报告。

第三条 联合会委员会应向总委员会每三个月提出一次有关所属各支部的组织工作和财务状况的报告。

第四条 每一个联合会均有权不接受或者开除个别团体或支部。但它无权取消它们的国际组织的名称;它只能向总委员会提出将它们临时开除的建议。

^① 在德文版和法文版上,第三条为“联合会委员会向各地方委员会,在没有地方委员会时,则向各支部按其会员人数寄发会费券”。下面德文版和法文版的第四、第五和第六条相当于英文版的第三、第四和第五条。——编者注

五

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第一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根据当地条件和本国法律的特点制订自己的地方性章程和条例。但是,此种章程和条例的内容,不得与共同章程和条例有任何抵触。

第二条 所有地方支部、小组及其委员会,今后一律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支部、小组和委员会,冠以该地地名。

第三条 因此,所有支部和小组,今后不得再用宗派名称,如实证论派、互助主义派、集体主义派、共产主义派等等,或者用“**宣传支部**”以及诸如此类的名称成立妄想执行与协会共同目标不符的特殊任务的分立主义组织。

第四条 本节第二条不适用于附属国际的各工会。

第五条 建议国际的所有支部和分部以及附属国际的工人团体,废除各该支部或团体中的主席职位。

第六条 建议在工人阶级当中成立妇女支部。但是,不言而喻,这项决议绝不应妨碍由男女工人混合组成的旧支部的存在和新支部的建立。

第七条 如报刊上有攻击国际的言论时,就近的支部或委员会须立即将该报刊寄总委员会一份。

第八条 协会所有机关报均应每三个月公布一次国际所有委员会的地址以及总委员会的地址。

六

关于对劳动的普遍统计

第一条 总委员会应将章程中涉及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的第六条以及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所做的决议付诸实施。

第二条 每个地方支部均应任命一个专门的统计委员会,以便随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复本国联合会委员会或总委员会可能向它提出的问题。

鉴于统计委员会书记的工作将给工人阶级带来共同利益,因此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

第三条 每年 8 月 1 日,联合会委员会应将在本国收集的材料寄往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则应根据这些材料写成总报告,提交每年 9 月间举行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

第四条 应将拒绝提供所需材料的国际的工会和支部通知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对此采取相应措施。

第五条 本节第一条中提及的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说:

由工人阶级自己进行的对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将是国际联合行动的伟大范例。为了行动起来有些把握,应该熟悉所要涉及的材料。工人一旦开始这项巨大的劳动,就会证明: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代表大会建议在设有本协会分部的每个地区,应立即开始工作,按下述调查大纲所示各点收集实际资料;代表大会号召欧

洲和美国的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的工作；报告和实际资料应寄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报告，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这个报告将同附录一起提交每年的例行代表大会，经代表大会批准后，由协会出资刊印。

调查大纲如下（当然每个地区均可有所改动）：1.生产部门的名称。2.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3.该生产部门从业工人的人数。4.工资：(a)学徒工资；(b)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中间人所付的工资额。平均每周工资，平均每年工资。5. (a)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b)如有小企业主和家庭生产这一类生产形式，则调查其中的工作日的长短；(c)夜工和日工。6.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7.对工场和劳动条件的评定：房屋拥挤，通风不良，光线不足，采用瓦斯照明，清洁条件等等。8.劳动对身体的影响。9.道德状况。教育。10.生产情况：生产是季节性的或全年内开工比较平衡的；是否经常发生较大的波动，是否遭到国外的竞争，它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或国外市场服务，等等。

附 录

1871年9月17日至23日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印行经过重新修订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条例”的标准版，这是从以下考虑出发的：

一、共同章程

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通过了1864年11月在伦敦公布的协会临时章程，仅对它做了少许补充。这次代表大会同时做出决

定(见“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日内瓦版第27页注释),要总委员会公布经代表大会通过的、所有人均须遵守的章程和条例的正式文本。由于日内瓦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在携经法国时为波拿巴政府所没收,总委员会未能执行这一指示。后来,由于当时英国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的干预,记录终于被退还,然而这时日内瓦已经出版了法文本,并且其中的章程和条例立即被所有讲法语的地区翻印了。这个文本在许多方面都是错误的。

1.伦敦临时章程的巴黎版曾被认为是准确的译本;但是制定这个译本的巴黎委员会在章程的引言中作了极其重大的改动。在答复总委员会的质询时,巴黎委员会说,在法国现有的政治形势下,这些改动是必要的。由于英语知识不够,他们对章程的有些条文又做了错误的理解。

2.在应赋予临时章程以定稿性质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为此目的而任命的委员会仅简单地删去了所有提到临时性问题的地方,但是却不曾注意到,这些地方有许多都包含有绝非临时性质的极其重要的论点。在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后公布的英文版本上,又做了同样的删节。

二、组织条例

到目前为止,同章程一起公布过的只有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通过的组织条例。因此,必须把其后各次代表大会和不久前伦敦代表会议通过的最近几个条例合成一个整体。

这次修订曾利用了下列出版物:

“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1864年伦敦版；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7年伦敦版；

“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工人代表大会”1866年日内瓦版；

“1867年9月2日至8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67年绍德封版；

“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8年布鲁塞尔版；

“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1868年伦敦版；

“关于1869年9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

“关于1869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总委员会公布，1869年伦敦版；

“1869年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个代表给日内瓦各工人支部的报告”1869年日内瓦版；

“1871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1871年伦敦版。³³⁸

在有关巴塞尔代表大会方面，也参阅了在巴塞尔以传单形式出版的关于代表大会各次会议的德文报道和总书记在代表大会期间所做的劄记。

这次修订利用这些不同资料的情况如下：

共同章程

引言部分。——在“上述理由”之后恢复了“创立了国际工人

协会”一语。见临时章程第 13 页³³⁹。

“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这一论点³⁴⁰被省去了，因为这个论点有两个同样有效的、但互相矛盾的说法。而且这个论点的真正涵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紧接着的那段话和后面紧接着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一语中。

第三条按临时章程第三条恢复。

第四条为 1867 年伦敦版章程第三条的一部分和第四条全部。

第五条为 1867 年章程第三条的引言部分。“主席”一词按巴塞爾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一条取消³⁴¹。

第六条为 1867 年章程的第五条。“合作的团体”改为“协会的全国性团体和地方性团体”，因为在某些译本中，这个用语被错误地理解为“合作社团体”。

第七条为 1867 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八条为 1867 年章程的第十条。

第十条为 1867 年章程的第八条。

第十二条为 1867 年章程中的组织条例的第十三条。

第十三条为 1867 年章程的第十二条。

1867 年章程的第七条取消，因为这一条同洛桑代表大会的一项决议相抵触。见“洛桑代表大会记录”第 36 页。

组 织 条 例

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一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条例的第十一条（“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 年日内瓦版第 27 页等等）；1867 年章程的第十条（该条是不完全的）。

第二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九条;1867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三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三条;1867年章程的第十一条。

第四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条;1867年章程的第九条。

第五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九条;1867年章程的第七条。

第六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二条;1867年章程的第八条。

第七条为巴塞尔通过的组织条例的第八条。

第八条取自“国际代表大会举行办法”(“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布鲁塞尔版),并以上面援引过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其他材料作了补充。

第九条第一部分同第八条的来源相同。第二部分为洛桑代表大会的决议(会议记录第74页第一条)。

第十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一条b项;1867年章程的第一条b项。

第十一条为巴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举行办法的第三条和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为举行办法的第十条。

第十三条为举行办法的第七条。

第十四条为举行办法的第四条。

二、总委员会

第一条为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二项第一条。

第二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一条;1867年章程的第一条。

第三条头两段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1867年章程的第二条和

第一条 a 项。第三段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三条。最后一段为洛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 37 页第二条。

第四条至第七条为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至第七条。

第八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三项。

第九条为伦敦代表会议 9 月 18 日和 22 日会议的决议。

三、应向总委员会缴纳的会费

第一条第一段为洛桑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 37 页第三条,以及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九条。第二段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 1867 年章程的第四条。

第二条至第六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四项第一条至第五条。

四、联合会委员会

第一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和 1867 年章程的第六条。

第二条为同上第五条。

第三条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正式报告”第 50 页附录,关于组织问题的会议第 3 号决议。

第四条为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六条。

五、地方性团体、支部和小组

第一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第十四条;1867 年章程的第十二条。

第二条至第四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二项第二条至第四条。

第五条为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第一条。

第六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五项。

第七条为在巴塞尔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第二条。

第八条为同上第三条。

六、对劳动的普遍统计

第一条至第四条为伦敦代表会议的第六项第一条至第四条。

第五条为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日内瓦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伦敦版第4页)。

根据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并代表伦敦代表会议

总委员会：

罗·阿普耳加思	马·詹·布恩
弗·布列德尼克	G.H.巴特里
德拉埃	欧·杜邦(因公在外)
威·黑尔斯	乔·哈里斯
胡利曼	茹尔·若昂纳尔
哈里埃特·罗	弗·列斯纳
罗赫纳	沙·龙格
孔·马丁	捷维·莫里斯
亨利·梅欧	乔治·米尔纳
查·默里	普芬德
约翰·罗奇	吕耳
萨德勒	考威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唐森
爱·瓦扬	约翰·韦斯顿

通 讯 书 记:

- 列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
 阿·埃尔曼·····比利时
 托·莫特斯赫德·····丹麦
 奥·赛拉叶·····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沙尔·罗沙·····荷兰
 J.帕·麦克唐奈·····爱尔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
 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
 海尔曼·荣克·····瑞士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勒穆修·····美国的法国人支部

执行主席 沙尔·龙格

财务委员 海尔曼·荣克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10月24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1871年11—12月分别用英文和
 法文、1872年2月用德文印成
 小册子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英文版本译的,并根据
 德文版本和法文版本校对过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柯克伦的信的声明³⁴²

致“东邮报”编辑

阁下：

10月31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由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署名的关于国际的信。请您把我对这封信的答复刊登在贵报上。首先来谈亚·贝·柯先生

“不了解，奥哲尔先生现在是否仍是该协会英国分部的主席”。

国际总委员会（亚·贝·柯先生称为该协会英国分部）的主席职位，早在1867年9月就被取消了。众所周知，在我们发表了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今年6月）以后，奥哲尔先生就退出了总委员会。

亚·贝·柯先生在欧洲报纸上看到了一些关于我们今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成员的谣言，就把这些消息归之于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正如10月27日“泰晤士报”一篇文章的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的，在这次大会上选出了国际工人协会临时委员会，但是根本没有像亚·贝·柯先生认定的那样，选举了“奥哲尔先生为主席、克里默和威勒尔两位先生为书记”。

亚·贝·柯先生接着以下面的“真实文件”来证实他的消息的可靠性。

第一，

“红旗是普遍仁爱的象征”。

这份真实文件无非是巴黎警察机关不久前以国际的名义散布并受到总委员会及时批驳的无数伪造文件之一的序言。

第二，

“在俄国人米哈伊尔·巴枯宁主持下的日内瓦纲领（很难设想，纲领怎能在谁的主持下）于1869年7月由伦敦总委员会通过”。

这个日内瓦纲领无非是日内瓦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章程；在茹尔·法夫尔关于国际的通告中它已经被引用。我在答复这个通告时曾经声明（见6月13日“泰晤士报”），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文件。相反地，它发表了一个宣布同盟的章程无效的文件^①。

此外我还可以补充一点，不久前在伦敦举行的代表会议，已和米哈伊尔·巴枯宁创立的同盟彻底分手；“日内瓦报”³⁴³——亚·贝·柯先生所属政党的教条的可敬代表——袒护同盟，反对国际。

第三，亚·贝·柯先生从他那叠“真实文件”中抽出了一段从我们的朋友欧仁·杜邦写的一封私人信中摘出的被歪曲了的话，这段话在很早以前曾由前波拿巴派的检察官奥斯卡尔·特斯屠发表过³⁴⁴。还在亚·贝·柯先生动身到欧洲去寻找这种“可靠消息”以前，这段话就在所有英国报纸上刊登了。

^① 见本卷第392—394页。——编者注

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先生称我们的协会是“卑鄙的”。那末,我应当怎样来称呼一个把立法工作托付给这位亚历山大·贝利·柯克伦的协会呢?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 约翰·黑尔斯

于海—霍耳博恩街 256 号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10 月 31 日
载于 1871 年 11 月 11 日“东邮报”
第 163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弗·恩格斯

* 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

伦敦 11 月 4 日。我们目前正处于工商业繁荣昌盛的时候，——这个我们，指的是官方的英国，指的是大资本家们。市场上资本充斥，在到处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为了使人类受惠和使企业主发财而设立的招摇撞骗的公司，有如雨后春笋。看来目前最时兴的是采矿、开采沥青、在大城市兴办铁轨马车、设立冶金工厂；有人登广告出售在伏尔加流域和新墨西哥的矿场；有人在萨瓦、汝拉、汉诺威等地收买沥青矿；据称里斯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在敷设铁轨马车道，如此等等。所有这些股份公司，不言而喻，只有一个目的——把股票行市高抬一时，以便企业主们能够有利地推销他们的股票，至于股东们将来怎么样，那他们是不放在心上的：“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过三四年，所有这些招摇撞骗的公司就会有六分之五连同上了当的股东们的钱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把积蓄投给这些“资本雄厚、财源茂盛”的企业的，一向主要是积蓄不多的人，而且他们这样做总是恰恰在股票行市被哄抬到顶点的时候，——他们这是活该。股票投机是把积蓄不多的人的好像是、而且一部分也实在是自己挣得的钱财装进大资本家腰包里去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最笨的傻瓜也会看得很清楚，在目前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

资本，相反地，一切现有资本都不过是无偿攫取来的他人劳动的产品。如果说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最近在德国和奥地利也广为流行起来，如果说王公们、高利贷者、帝国首相们、神甫们伙同一气来谋取小人物的积蓄，那只是我们所欢迎的。

金融市场上的这种资本充斥现象，只是目前大工业所处的繁荣状态的反映。几乎在生产的所有部门，特别是在英国的以铁和棉为原料的这两个主要工业部门，呈现着已经好久没有过的一片繁荣景象。

郎卡郡的纺纱厂主终于又有足够的棉花来大规模扩大生产，——他们也没有放过机会。单单在小小的奥尔丹一个地方就在新建 15 家纺纱工厂，平均每厂有 5 万纱锭，总计起来就有 75 万纱锭，也就是说几乎等于所有参加关税同盟³⁴⁵的国家（亚尔萨斯除外）现有纱锭的总数！此外还应该加上相应数量的织布机。郎卡郡其他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机器制造厂接到好几个月的订货，有些甚至接到一年的订货，而且只要它们能提供所要的机器，要多高的价钱都行。简单地说，就是 1844 年的再现，当时在中国市场开放³⁴⁶以后，厂主们一心只想尽可能多生产商品，因为如他们所说，他们得供应 3 亿人的衣着！然而接着来的是 1845 年和 1847 年的令人心寒的打击，这时忽然发现，3 亿中国人到目前为止，一直还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做衣服穿。生产过剩的英国商品在所有的市场的货栈里堆积如山，找不到销路，而企业主和投机家则成百成千地破产。这种情况现在也将重演。这些人丝毫没有接受教训。但是，即使他们接受了某种教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照样会强迫他们不断地重复人们早已熟悉的经济高涨、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并且规模一次比一次更大地重复，直到无产阶级起义终于使社

会不必再作这种无意义的循环为止。

有一位施维茨格贝尔先生以我没听说过的一个什么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国家报”上要求我详细解释我在“人民国家报”上讲的关于艾尔皮金先生的话^①。我同施维茨格贝尔先生无话可谈，而且我也根本不能对随便一个陌生人解释此事。但是，如果艾尔皮金先生本人想就此事同“人民国家报”进行交涉，那末我愿为他效劳，在这种情况下就请编辑部把我的地址告诉艾尔皮金先生，让他直接同我交涉。

弗·恩格斯写于 1871 年 11 月 4 日
载于 1871 年 11 月 10 日
“人民国家报”第 91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① 见本卷第 409—410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 1871 年法国人
支部的决议草案³⁴⁷

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决议
1871 年 11 月 7 日会议通过

一、预先的说明

总委员会认为, 1871 年法国人支部提出的关于共同章程中有关总委员会成员的条款应做根本改变的观点, 同它所应当讨论的问题毫不相干。

至于这个支部对总委员会的辱骂, 则将由各国的委员会和联合会委员会来做出正确的判断。

总委员会仅仅指出:

从巴塞尔代表大会(它是在 1869 年 9 月 6 日至 11 日举行的)以来, 还不到三年, 而上述该支部别有用心地硬说已过三年。

1870 年, 普法战争前夕, 总委员会在给所有的联合会——其中包括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总通告中, 曾建议将总委员会驻地迁离伦敦³⁴⁸;

得到的回答是一致坚持保留总委员会现在的驻在地，并延长总委员会的任期；

1871年，总委员会在刚一有可能的时候就召开了代表会议，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可能采取的唯一措施；

在这次代表会议上，来自大陆的代表们宣称，在他们的国家里已经有人担心，把过多的法国流亡者加聘到总委员会中会破坏总委员会的国际性；

代表会议（见“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第十五项^①）“授权总委员会确定——根据事态的发展——应届代表大会或可以用来代替代表大会的代表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至于上述该支部以自己成员中有人曾经是巴黎工人团体的主席而自命为“法国革命力量”的唯一代表，则总委员会指出：

总委员会当然可以考虑某人过去是工人团体的主席，但是这决不能作为这个人“有权”被总委员会接纳并在总委员会代表“革命力量”的论据。如果是那样，总委员会就应当接纳曾经是巴黎首饰匠协会主席和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书记的古斯达夫·杜朗先生为委员。何况，总委员会委员应当代表的是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而不是这个或那个团体的意见和利益。

二、1871年法国人支部在10月31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对10月17日决议提出的异议

(1)关于支部章程第二条中的这样一点：

^① 见本卷第458页。——编者注

“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说明其生活来源，提供行为端正的保证”等等。

支部声称：

“共同章程规定支部应当对其成员的行为端正负责，因此也就承认支部有权使用它认为必需的任何手段来取得保证。”

从这种观点出发，一个由 teetotalers (戒酒协会会员) 成立的国际支部就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性章程中写上这样一条：“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宣誓决不饮用任何酒类。”一句话，个别的支部借口要用它们“认为必需的那种办法”来履行保证其成员品质纯洁的责任，总是能够在地方性章程中规定当加入国际的最荒唐、最无理的条件。

总委员会在其 10 月 17 日决议的第一条里指明，往往“没有生活来源完全可以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总委员会认为，支部可以不必重复这一点，不必说“流亡者以自己的贫穷这个最可信的见证使自己免受任何怀疑”。

对于“罢工基金会”是罢工工人的“生活来源”的说法，首先可以这样反驳：这种“基金会”常常是虚构的。

其次，英国官方的调查表明，大多数英国工人——一般说来他们的境遇比他们在大陆上的弟兄们好一些——有时由于罢工和失业、有时由于工资的不足和拖欠或由于其他原因，而不得不经常去典当、借债，也就是说去找那些非采取不能容许的干预公民私人生活的办法就不能被证实的“生活来源”。

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支部把“生活来源”只看做是“行为端正的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所提出的“凡欲被接受为支部成员者，必须提供

行为端正的保证”的建议是符合这个目的的，因为它规定（见 10 月 17 日决议第一条）：“在可疑的情况下，支部可以把生活来源作为行为端正的保证加以调查。”

要么就是，支部在其章程第二条内故意把说明“生活来源”说成是除了它有权要求的“行为端正的保证”之外的加入支部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总委员会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式的新做法，是与共同章程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的”。

(2)关于总委员会否决支部章程第十一条中的这一款：

“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支部答复说：

“我们决不是不知道……共同章程的文字含义给予它（总委员会）接受或不接受代表的权利。”

这清楚地证明支部并不了解共同章程的文字含义。

事实上，共同章程只承认**两种**选举总委员会的方式——或者是由代表大会任命，或者是由总委员会自行加聘，**没有任何一处**讲到总委员会可以接受或不接受支部或小组的代表。

接纳由伦敦各支部直接提出的代表作委员，一向都是总委员会的**行政措施**。总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只是行使了它所享有的加聘成员的权利（见 10 月 17 日总委员会决议第二条的第 2 点）。

使总委员会不得不采取这种加聘方式的特殊情况，在总委员会的 10 月 17 日决议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说明。

总委员会在这同一决议中（第二条第 3 点）声明，它准备按照接受伦敦各支部其他代表的**同样条件**接受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的代表。但是它不能当真考虑这种要求：不顾共同章程而为该支部规

定一种特权地位。

1871 年法国人支部在其章程第十一条中写上了这样一款：“将派一个或几个代表参加总委员会”，是企图仿佛以共同章程为根据，取得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它装出一副对这种臆想的权利似乎深信不疑的姿态，而且在它本身还没有得到总委员会承认以前（见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第四条³⁴⁹），就毫不犹豫地于 10 月 17 日“根据权利”派遣两名持有 20 个有表决权的支部成员发给的“限权代表委托书”的代表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最后，这个支部在其最近的来信中又再一次坚持它有“义务和权利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为了给自己的无理要求辩护，支部企图以公民埃尔曼在总委员会里的情况为先例。它假装不知道，公民埃尔曼被加聘为总委员会委员是由比利时代表大会³⁵⁰推荐的，而且他在总委员会里决不代表列日支部。

(3) 关于总委员会拒绝承认支部章程中如下一点：

“支部的每个成员必须作为本支部的代表参加总委员会”，

支部回答说：

“为了回答这一点，我们只想指出，我们的章程是在我们支部范围内生效的；我们的协议只是考虑到我们自己，只与我们自己有关，这一要求与共同章程毫不抵触，因为共同章程没有提到这一点。”

很难理解，共同章程没有提到派代表参加总委员会的权利，怎么能够令人信服地用来论证在总委员会里当代表的条件。而地方性的支部章程只是在支部范围内生效，倒容易理解得多。虽然如此，却不能同意，地方性的支部章程“只是考虑到它自己，只与它自己有关”。因为比如说，总委员会批准了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

第十一条,那就势必要在所有其他支部的章程里也加上这一条;而这一条一经加以普遍化,就会把总委员会根据共同章程所拥有的加聘成员的权利完全勾销。

有鉴于此,

(一)总委员会保持它在 1871 年 10 月 17 日做出的决议完全有效。

(二)如果本决议在 11 月 21 日总委员会开会以前不为支部所接受,则各个通讯书记将把 1871 年法国人支部章程、该支部代表在 10 月 17 日会议上向总委员会递交的委托书、总委员会 10 月 17 日的决议、1871 年法国人支部在 10 月 31 日会议上向总委员会所做的答复以及 11 月 7 日总委员会的最后决议分发给各国联合会委员会,在没有联合会委员会的国家则发给地方组织。

代表总委员会并受总委员会委托

1871 年 11 月 7 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给“法兰克福报和
商报”编辑部的声明³⁵¹

在“法兰克福报”第 326 号第二版的一篇注明“伦敦 11 月 18 日”的通讯里有这样一段话：

“国际伦敦支部在上次会议上通过了下列决议：‘查理·迪耳克爵士在为人民的事业的斗争中建树的卓越功绩，理应受到人民的感激；因此建议授予他国际工人联合会名誉会员的称号。’在以前的一次会议上科苏特被选为会员。”

国际没有名誉会员这样的制度。上述决议或许是伦敦的一个小团体做出的，这个团体起初定名为“国际民主协会”，后来取名为“共和大同盟”。它和国际毫无关系。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德国通事书记 卡尔·马克思

写于 1871 年 11 月 24 日

载于 1871 年 11 月 28 日“法兰克福报
和商报”第 33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法兰克福报和商报”

弗·恩格斯
致马德里国际工人协会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1871年11月25日于伦敦

自从公民罗伦佐参加上次代表会议回去以后，我们没有从你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我给你们写过两封信；在11月8日寄给你们的那最近一封挂号信中，我请你们立刻给我们来信，并说明沉默的原因。迄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但是我们得到消息说，有极少数国际会员企图在协会的队伍中制造纠纷，策划反对代表会议决议和总委员会的阴谋，散布各种诽谤言论³⁵²。无须怀疑，你们所以令人费解地保持沉默，大概是因为你们收到了具有这种内容的信。如果是这样，请你们把那些对我们的指控或诬蔑告诉我们（这是你们的义务），以便我们予以驳斥。

无论如何你们不能再继续沉默，这是违背我们的共同章程的，章程规定你们应当定期向我们提出报告。我们要求你们立刻答复这封信；如果你们不答复，我们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们的沉默是有意的，你们相信了上述的诽谤言论而没有勇气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得不按照国际的利益所要求我们做的那样采取行动。

弗·恩格斯写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西班牙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给“意大利无产者报”
编辑部的声明³⁵³

致“意大利无产者报”编辑部

公民们：

贵报第 39 号登载了都灵工人的一篇宣言，其中说：

“我们公开宣布，伦敦大委员会把社会主义放在次于政治的地位的决议刚一发表，就由‘无产者报’编辑部向我们报道了，这样的决议不具有正式的性质，因为大委员会鉴于许多欧洲的协会也会像我们一样一致拒绝这个决议，就把它撤销了。”

这种说法使总委员会不得不作如下声明：

(1) 总委员会从来没有做过把社会主义放在次于政治的地位的任何决议；

(2) 因此它不可能撤销这样的决议；

(3) 任何欧洲的或美国的协会都不可能拒绝这样的决议，而且也没有拒绝过总委员会的其他任何决议。

总委员会对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

这种态度是根据：

(1) 共同章程，章程中**绪论部分**的第四段中说：“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

标。”^①

(2) 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即对章程的一种正式的和具有约束性的解释,宣言里说:

“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赞助劳动解放的事业,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³⁵⁴

(3) 洛桑代表大会决议(1867年),其中关于这一点说道:“工人的社会解放同他们的政治解放是不可分割的。”³⁵⁵

(4) 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1871年9月),它依据上述各项决议提请国际的会员注意: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它的经济运动是和政治行动密切联系着的^②。

这样替总委员会规定的立场,总委员会始终遵守着,而且将来仍将遵守。因此总委员会宣布,不知道是由谁转告“无产者报”编辑部的上述消息是捏造的和诽谤性的。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意大利书记 弗·恩·

附言:我刚才收到了日内瓦寄来的“社会革命报”³⁵⁶,该报报道说,汝拉的一个小组反对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③。总委员会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一俟总委员会得到这一通知,它将采取必要的措施。

1871年11月29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草稿译的

① 见本卷第475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456页。——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16—522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给朱·博里昂尼的委托书³⁵⁷

1871年11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公民朱泽培·博里昂尼已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今授予他接受新会员和组织新支部的权力，条件是他和新接受入会的会员和支部必须承认协会的正式文件对他们有约束力，这些文件就是：

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成立宣言，

各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1871年9月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受总委员会委托并代表总委员会

意大利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1935年第1版第26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弗·恩格斯

* 关于欧洲各国的国际支部的状况³⁵⁸

关于代表会议做出的有关政治行动的决议,我很高兴告诉你们,从最近一期马德里“解放报”³⁵⁹和巴塞罗纳“联盟”周报(12月3日)可以清楚地看出,西班牙联合会完全赞同这一决议。在西班牙把国际变为单独的和独立的政党,现在已经是确定的事情。我们在西班牙的情况好极了:不到三个月就增添了19000到20000个新会员!在丹麦,国际成立才不过三个月,单是在首都一地国际就拥有2000会员,而这个城市比米兰还小;在那里,农民也大批地站到国际方面来,并且那里正在准备为最近的选举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运动,结果很可能使我们在丹麦议会中得到强大的代表权。

德国和荷兰的情况很好。在法国,我们有26家报纸,在那里,偏偏跟梯也尔先生的意愿相反,支部正在重新建立起来。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12月5日
和10日之间
载于1871年12月12日
“人民报”第144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
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
报纸编辑部的声明³⁶⁰

1871年12月6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致“人民罗马”编辑

编辑先生：

我相信您的正直，请您将随信附上的声明予以发表。既然战斗，就要正直地战斗。

请接受崇高的敬意

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 弗·恩格斯

国际工人协会

致“人民罗马”编辑部

在“人民罗马”第38期上，公民朱·马志尼发表了题为“关于国际的文件”的一系列文章的头一篇。他预先告诉读者说：

“我……从我所能利用的一切来源收集了它的全部决定，它的有影响的委员的所有口头声明和书面声明。”

这就是他发表的文件。他引用了两段来作为开头。

一、“放弃〈政治行动〉竟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某些法国的国际创始人答应路易一拿破仑，只要他向工人提供我不知是什么样的物质利益，他们就停止一切政治行动。”

我们要求公民马志尼为这种说法提出论据，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诬蔑。

二、“巴枯宁在和平和自由同盟 1868 年伯尔尼代表大会上所发表的一篇演说中说：我希望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都得到平等；不这样就谈不到正义的思想，就不可能建立和平。冗长的演说已经把工人欺骗够了。必须告诉他们，他们应当要求什么，如果这一点他们自己不知道。我是集体主义者，而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我要求废除继承权，那只是为了更快地达到社会平等。”

公民巴枯宁是否讲过这些话，这与我们毫无关系。对总委员会说来，重要的只是要指出以下几点：

(1) 正如马志尼自己所说的，这些话不是在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讲的，而是在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的代表大会上讲的；

(2) 1868 年 9 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的代表大会曾在一项特别决定中声明，它同和平和自由同盟的这次代表大会毫无共同之处³⁶¹；

(3) 在公民巴枯宁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根本不是国际的会员；

(4) 总委员会始终反对屡次想以狭隘的宗派主义的巴枯宁纲领来代替国际的广泛的纲领（它也使巴枯宁的信徒能够加入它的队伍）的企图；采用巴枯宁的纲领立刻就会使绝大多数国际会员被开除；

(5) 因此，国际绝对不能对公民巴枯宁的私人行动和他的言

论负责。

至于公民马志尼答应要在最近发表的有关国际的其他文件，总委员会预先声明，国际只对它所发表的正式文件负责。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并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意大利书记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 1871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报”
第 144 号、1871 年 12 月 12 日“玫
瑰小报”第 345 号、1871 年 12 月
21 日“人民罗马”第 43 期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人民罗马”，并
根据恩格斯的法文、意大利
文草稿校对过

卡·马克思 致“东邮报”编辑³⁶²

阁下：

查理·布莱德洛先生在最近写给贵报的信中，利用12月12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我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作为对我进行粗暴谩骂的借口。他写道：“我十分感谢卡尔·马克思对我的敌视。”

我对查理·布莱德洛先生的敌视！自从“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发表以后，布莱德洛先生的声音就同诬蔑国际和我个人的全世界大合唱融成一气了。我对他就像对其他诽谤者一样，只有鄙夷地报以沉默。这是这个极端自尊的人的可笑虚荣心所不能忍受的。我不理会他的诬蔑，就是我对他进行了“诬蔑”。我的沉默使他气得发狂；他在公共集会上宣布我是**波拿巴分子**，要知道，原因就是我在“内战”这篇宣言中揭示了产生第二帝国的历史条件。现在他又更进一步，把我变成**俾斯麦的警探**。可怜的家伙！他无论如何必须表明，他不久以前在巴黎从卑鄙的艾米尔·德·日拉丹及其党羽那里得到的教训，对他并不是毫无用处。现在，我在促使他的这封信得到最广泛的传播，来“把他交给”德国公众。如果他要那样盛情，给他的诬蔑披上更具体的形式，我还要“把他交给”英国法庭。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1年12月20日于伦敦

载于1871年12月23日
“东邮报”第169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弗·恩格斯 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³⁶³

几乎没有必要来谈现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处境如何。一方面，重大的巴黎事件使它得到了这样大的威力，这样广的传播，这些都是它从来没有达到过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梯也尔和哥尔查科夫、俾斯麦和博伊斯特、维克多—艾曼努尔和教皇、西班牙和比利时，都联合起来反对它。到处都在攻击国际：旧世界的一切势力，军事法庭和民事法庭，警察和报刊，反动地主和资产者都在争相迫害国际，在整个大陆上，恐怕没有一个地方不在千方百计地使这个他们望而生畏的伟大的工人兄弟同盟处于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

正当旧社会的一切势力联合起来用暴力手段破坏国际，而团结一致比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加必需的时候，瑞士某个角落里的一群人数不多的、并且自己承认是在日益减少的国际会员，竟然认为有必要发表一个公开的通告，来在国际会员中间制造纠纷。这群自称为**瓦拉联合会的国际会员**，主要是这样一帮人：他们已经有两年多在巴枯宁的领导下不断地破坏瑞士法语区的团结，并且热心地同各国某些与他们气味相投的大人物私下通讯，来和国际的统一活动相对抗。当这些阴谋诡计还只局限于瑞士，或者还只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时候，我们不想比较广泛地来谈论它们，但是上面所提

到的那个通告使我们不得不发表意见。

汝拉联合会借口总委员会今年召开的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代表会议，于 11 月 12 日在自己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拟定了一个给国际所有各支部的通告，他们把这个通告印制了许多份，然后散发到世界各国，他们在通告中建议各个支部坚决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为什么必须以代表会议来代替代表大会，这至少对于我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人看来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我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去参加代表大会，那末在他们返回之后免不了会立即被捕入狱；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的代表会处于同样的情况。而召开代表会议（在会议上没有公开的辩论，而只是举行事务性的会议）则完全是可能的，因为不会把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名字公布出来。代表会议的缺陷在于：它不能解决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不能修改章程和通过任何立法性质的措施，它应当只限于通过事务性的决议，以保证更好地贯彻代表大会的章程和决议所规定的组织原则。但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所要求的也只是这一点：要讨论目前迫切需要的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召开代表会议也就足够了。

其实，对于代表会议及其决议的攻击只是一种借口。就连该通告也只是顺便谈到这一点。相反地，通告起草人更加深刻得多地看到了弊病的根源。他们断言，根据代表大会的章程和最初的决议，国际似乎只是“一些自治的（独立的）支部的自由联盟”，其目的是通过工人自身去解放工人，

“而没有任何的、哪怕是按照自由协商建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

所以，总委员会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但是据说这个最初的原则很快就被歪曲了——首先是由于授权给总委员会

自行增加新的成员，而后来则由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受到了更大程度的歪曲，根据这些决议，总委员会有权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暂时开除个别的支部，有权在代表大会做出决议之前预先解决一些争论的问题³⁶⁴。据说这样一来就把危险的权力授予了总委员会，而那些独立的支部的自由联合，则变成了“服从纪律的支部”的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因此

“各支部完全掌握在总委员会的手中，它可以任意地拒绝接纳它们或者暂时让它们停止活动”。

我们的德国读者很懂得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组织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一切将显得非常奇怪。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已经在这里丑态毕露的巴枯宁学说，目前还没有渗入德国。原来，在自己旗帜上首先是写着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的口号的工人组织，竟不应当受执行委员会的领导，而应当受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领导！但是，对于巴枯宁及其娄罗们来说，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借口；他们实际上是别有用心。

“未来社会应当只是国际将具有的组织形式的普遍化而已。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使这个组织尽可能地接近我们的理想……国际是未来人类社会的萌芽，它现在就应当正确地反映我们的自由和联盟的原则，并且应当抛弃在它身上出现的任何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

我们德国人因为神秘主义而遭到诽谤，但是我们离这种神秘主义还远呢。国际是未来社会的原型，在这种社会里再也不会凡尔赛的屠杀，不会有军事法庭，不会有常备军，不会有暗中检查往来书信，不会有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³⁶⁵现在，正当我们必须以全力自卫的时候，有人却建议无产阶级不要按照每时每刻都迫使它进行的斗争的要求把自己组织起来，而是按照某些空想家关于未

来社会的不着边际的想像把自己组织起来！我们来设想一下，我们自己的德国的组织如果这样组织起来，会成什么样子。我们会不去进行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去为我们章程的每一个条文、代表大会的每一个决议是否是未来社会的确切反映而绞尽脑汁。我们会不要我们的执行委员会，而要一个简单的统计通讯局。让这个统计通讯局尽力而为地去和独立的支部打交道吧，——这些支部独立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它们不应该承认任何权威的领导机关，哪怕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自由协商建立起来的权威的领导机关；要知道，它们要是承认，就会破坏它们的首要使命——成为未来社会的确切的原型！关于团结力量，关于共同行动，则根本谈不上了。如果在每一个支部中少数都要服从多数，那这就是一种违反自由原则的罪行，就是承认会导致权威主义和专政的原则！如果施梯伯和他的娄罗们，如果所有的暗检室³⁶⁶，如果所有的普鲁士官军们都奉上级命令要加入社会民主组织，以便毁灭它，那末委员会，或者更确切地说，统计通讯局，无论如何也不敢加以阻止；要知道，这会意味着实行教阶制的和权威的组织！而主要的是没有任何服从纪律的支部！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末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早期基督教徒这群奴隶曾经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任何拳打脚踢，并且的确通过摇尾乞怜在三百年后使自己的宗教获得了胜利，——而这种革命方法无产阶级是无论如何不会仿效的！你们看，正像早期基督教徒把自己幻想的天堂作为自己组织的榜样一样，我们也应当把巴枯宁先生的未来社会的乐园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也应当放弃斗争，而从事

祈祷和期待。而这些向我们宣扬这种胡说八道的人，却自命是唯一的真正的革命者！

谈到国际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说：目前国际的情况并不坏。在应届代表大会做出决定以前，总委员会有责任实现巴塞尔决议，而它一定会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像它毫不客气地把托伦和杜朗之流驱逐出去那样，它也会关心把施梯伯之流关在国际的门外，尽管巴枯宁认为这是一种独裁作风。

但是这些恶劣的巴塞尔决议是怎样产生的呢？说起来非常简单。它们是由比利时代表提出来的，而且当时谁也没有像巴枯宁和他那些在目前这份通告上签字的朋友们，其中包括施维茨格贝尔和吉约姆，那样热烈地表示拥护它们！的确，当时情况不同。当时这些先生们曾希望获得多数并且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手里。当时无论怎样扩大总委员会的职权，他们都觉得不够。而现在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发现葡萄原来是青的。现在总委员会应当被贬低到简单的统计通讯局的地位，只求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声誉不致受到损害了。

而这些人，这些职业的宗派信徒（尽管他们拥有各种神秘的早期基督教教义，在国际中只占极少数），竟恬不知耻地责备总委员会，说它的委员们想

“使自己特殊的纲领和自己个人的学说在国际中占统治地位；他们把自己个人的观点冒充为唯一在协会中具有公民权的正式理论”。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凡是有可能注意观察过国际的内部发展过程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些人，几乎三年来主要地就是在想办法强迫协会接受他们的宗派信条作为共同纲领；当这点做不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玩弄欺骗手段，把巴枯宁分子的空话冒充为国际的共

同纲领。虽然如此，总委员会只是对这种伪造勾当提出了抗议，而至今还没有否认他们有权属于国际，或者是有权在他们自己的招牌下任意宣传他们的宗派主义的谎言。至于总委员会如何对待这个新的通告，现在来谈这一点还为时过早。

这些人自己出色地证明了，他们利用自己的新组织能够获得什么东西。凡是在没有受到反动政府暴力阻挠的地方，国际从巴黎公社的时候起都做出了巨大的成绩。而在瑞士的汝拉——最近一年半来完全由这些先生们总揽一切的地方，情况怎样呢？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吧（见 11 月 23 日出版的日内瓦周刊“社会革命报”）：

“这些可怕的事件对我们各支部一定产生了一部分是使人沮丧的，一部分是良好的影响……接着就是无产阶级应该向资产阶级进行的巨大战斗的开始，人们也开始考虑起来……有些人为了掩盖自己的怯懦而躲开（s'en vont），另一些人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表示自己忠诚于国际的新生原则。这就是整个国际，其中也包括我们联合会的现代内部发展过程中的具有特征意义的事实。”

说这一切发生在整个国际中是一种新奇的论断，实际上那里发生的恰好是相反的情况。但是说汝拉联合会的情况是这样，却是完全对的。只要听一听这些先生们自己说些什么吧！穆蒂埃的支部受害最少，但它也一无所成：

“如果没有建立新的支部，那末，仍然应该存在希望”云云；但是这个支部“由于居民良好的情绪而处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林朗惹支部缩小成小小的工人核心。”

俾尔的两个支部，像纽沙特尔的支部和洛克尔的支部一样，对委员会的信一次也没有答复；俾尔的第三个支部

“现在是僵死的”，尽管“国际在俾尔重新活跃起来还有一些希望”。

圣布勒兹的支部是僵死的；律谷的支部不知怎么样消失了；洛克尔的中央支部在长期挣扎后瓦解了，但现在又勉强强烈地恢复起来，显然是为了往代表大会选派代表；拉绍德封的支部处于危急的状态；库尔特拉里的钟表匠支部现正在变成一个接受瑞士钟表匠联合会章程的工会，这样，它就在接受一个不属于国际的团体的章程。这个州的中央支部暂时停止了活动，因为它的成员在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建立了什么单独的支部（这并不妨碍这一中央支部派两个代表与圣伊米耶和桑维耳耶这两个支部的代表同时去参加大会）；卡特巴的支部在经历了一段具有光辉成就的时期之后，由于当地资产阶级的阴谋而瓦解了，科尔热蒙的支部也是如此；最后，在日内瓦现在还有一个支部。

以统计通讯局为首的独立支部自由联盟的人们，在一年半内把一个原先确是不很庞大和人数不很多的，但毕竟是蓬勃发展着的联盟，就是变成了这个样子。而这还是在一个他们有充分活动自由的国家里发生的，是当国际在其他所有地方都获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发生的！可是正当他们自己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他们遭到失败的悲惨情景的时候，正当他们发出这种无力的和绝望的哀号的时候，他们竟要求我们强迫国际离开它所遵循的使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道路；竟要求我们使国际走上那条使汝拉联合会从比较兴盛落到完全瓦解的道路！

弗·恩格斯写于 1872 年 1 月 3 日

左右

载于 1872 年 1 月 10 日

“人民国家报”第 3 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人民国家报”

卡·马克思 致“东邮报”编辑

阁下：

查理·布莱德洛在1月7日的“国民改革者”367上写道：

“我们只想指出，马克思博士过去曾给他的政府提供情报。”

兹郑重声明：这是既荒谬又卑鄙的诽谤。我要求布莱德洛先生举出哪怕一件使他有丝毫理由说这番话的事实。为了使她安心，我补充一句，我不打算要求与他“决斗”。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1872年1月16日

载于1872年1月20日
“东邮报”第173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卡·马克思 致“东邮报”编辑

阁下：

但丁在他的不朽的诗篇中说过，对放逐者的最残酷的折磨之一，是必须跟各种败类打交道^①。当我不得不跟查理·布莱德洛先生之流那样的家伙进行一个时期公开辩论的时候，我深刻地体会到这段怨言的正确性。但是，无论如何，我再也不会容许他利用他企图与我挑起争执的做法作为他在国外进行自我吹嘘的廉价而方便的手段。

他发表了对我的指责，要是这一指责在德国公布出来，一定会使得他成为各党派取笑的对象。我当时就要求他举出使他哪怕有丝毫理由进行这种既荒谬又卑鄙的诽谤的事实^②。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替自己辩护，而是为了揭露他。他以小经纪人那种不体面的圆滑伎俩，企图把我弄上“公意法庭”，而自己逃避责任。

难道他真的以为，某一个布莱德洛，或者巴黎的 *demi-monde* (名誉可疑的) 报刊的编辑，或者柏林的俾斯麦报纸的编辑，或者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或者纽约的“刑法报”，或者“莫斯科

①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十七歌。——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523 页。——编者注

新闻”368,只要对我进行了诬蔑,我就必须出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声誉,甚至站到必定是由这些“正直先生”的朋友们所组成的“公意法庭”面前去吗?

我跟查理·布莱德洛先生的账已经了结,现在我让他完全安心地自我欣赏,如果这能给他一点慰藉的话。

阁下,我仍然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

写于1872年1月27日左右

载于1872年1月28日

“东邮报”第174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弗·恩格斯
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³⁶⁹

2月7日于伦敦西中央区海—霍耳
博恩街256号国际工人协会

致“玫瑰小报”编辑

公民：

佛罗伦萨的“自由思想”杂志不断地攻击国际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好像伟大的工人协会是这家杂志所维护的受俸神甫—唯理论者协会的对头似的。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回答这些攻讦是多余的，可是这家杂志竟卑鄙地在意大利散布俾斯麦报刊上有关国际及其总委员会的无耻谰言，这时我不得不提出抗议了。因此我给“自由思想”写了如下一封信，请将该信在“玫瑰小报”上发表。

敬礼和兄弟情谊

总委员会意大利书记 弗·恩格斯

致“自由思想”编辑鲁伊治·斯蒂凡诺尼先生

阁下：

1872年1月4日“自由思想”第1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国际

和伦敦最高委员会”的文章，关于它我应当说几句话。

这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很愿意知道，恩格斯先生凭什么权力充当意大利的代表？”

我绝不要求而且从未要求代表意大利。我很荣幸地在总委员会中担任专门受委托与意大利进行通讯联系的书记，在执行这项委托时，我应该代表总委员会，而不是代表意大利。

其次，文章中引用了一些从柏林“新社会民主党人报”³⁷⁰抄来的伦敦通讯，其中充满了对总委员会和整个国际的十分卑鄙的诬蔑。对于这种诬蔑，我不打算回答。谁也不会同这种报纸进行辩论。全德国都清楚地知道“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什么报纸：这是一家靠俾斯麦出钱维持的报纸，是普鲁士的政府社会主义的机关报。如果您需要关于这家报纸的更确切的材料，请写封信给您的莱比锡通讯员李卜克内西，他一定会给您提供足够的数量。我只想补充一点，要是您对于这种诬蔑国际的言论这样大感兴趣，那末在“费加罗报”、“高卢人报”、“小报”及其他巴黎的 *demi-monde*（名誉可疑的）报纸、伦敦的“旗帜报”、“日内瓦报”、维也纳的“每日新闻报”以及“莫斯科新闻”上，您可以找到成千上万条这样的东西，——这都是一些权威报纸，您可以不必再去引用可怜的施奈德尔。

在编辑部的按语中说道：

“可能这是暗指 1850 年卡尔·马克思在科伦建立的共产主义的秘密团体；正像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这个团体被揭露以后，许多可怜的人落入普鲁士警察的手中，而主角却在伦敦安然无恙。”

谁要是说这种话，他就是撒谎者。我曾经属于这个团体³⁷¹。它不是马克思创办的，不是在 1850 年创办的，也不是在科伦创办的。

在此以前，它已经存在了十年。科伦支部由于自己不谨慎落入警察手中的时候，马克思和我因受普鲁士政府迫害，侨居英国已经一年了。要是您愿意更详细地了解，请您去问问多特蒙特的市长兼普鲁士议会和德国议会的议员贝克尔先生，科伦市参议员、医生克莱因先生，“维斯巴登日报”³⁷²的编辑毕尔格尔斯先生，伦敦总委员会委员、成衣匠列斯纳先生。他们在这次共产党人案件中都被判了罪³⁷³。

这篇辟谣声明请在贵刊最近一期上发表为荷！

谨致崇高的敬意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载于 1872 年 2 月 20 日
“玫瑰小报”第 50 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玫瑰小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的
警察暴行的声明³⁷⁴

瑞士当局认为可以按照俄国外交部违背联邦宪法直接向伊韦尔登法庭提出的简单要求，在日内瓦对公民吴亭的住宅进行搜查，他们卑鄙地借口说他可能与伪造俄国钞票一案有关，在这件丑闻中，不管听起来有多么奇怪，负责追查伪币制造犯的俄国五等文官卡缅斯基竟是这些罪犯的主要头目。吴亭的文件遭到扣押，他的全部俄文、德文和英文的信件被交给一个俄国翻译去检查，而且当局连这位翻译的姓名也拒绝宣布。公民吴亭在 1871 年 12 月以前是国际的机关刊物“平等报”的编辑，因此他的来往信件大部分是国际的通讯，而且在信上都有国际的各种委员会的印章。要不是国际的法律顾问公民昂伯尔尼——总委员会对他深表感谢——出面干涉，吴亭的文件和他本人就要被引渡给俄国政府，而瑞士与俄国政府之间根本就没有引渡罪犯的条约。

俄国政府由于在国内碰到日益增长的反抗，就利用像涅恰也夫这些与国际毫无关系的人制造的所谓密谋，以便在国内借口自己的反对者是国际会员而将他们送交法庭。现在它又更进了一步。它在它的忠实藩臣普鲁士的支持下，开始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要求西方国家的法庭迎合它的需要去迫害国际。它开始在一个共和

国里活动,这个共和国的当局就赶紧变成俄国的恭顺仆人。总委员会认为,现在需要做的是向各国工人公开斥责俄国政府的计谋以及它的西方帮凶们的奴颜婢膝的行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2年2月20日
载于1872年2月24日“东邮报”
第178期、1872年3月2日“国际
先驱报”第1号以及其他刊物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

卡·马克思的遗稿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草稿³⁷⁵

卡·马克思写于 1871 年 4—5 月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全文载于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 年版
第 3(8)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英文译出

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初稿

国防政府

战争开始以后四个月，当国防政府投给了巴黎国民自卫军一点小惠，即允许他们在比桑瓦耳³⁷⁶显示他们的战斗能力的时候，这个政府认为促使巴黎投降的有利时机已经到了。在专为讨论投降问题而召开的巴黎区长会议上，特罗胥在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其他同僚在场和支持下，终于透露了他的“计划”。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晚间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这些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事变的发展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测。”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特罗胥的计划就是要巴黎和法国投降。实际上，他是普鲁士军队的总司令。茹尔·法夫尔自己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就曾这样露骨地供认：应当打倒的敌人不是普鲁士士兵，而是巴黎的（革命者）“蛊惑家”。由此可见，国防政府对人民的种种冠冕堂皇的承诺不过都是些存心骗人的谎言罢

了。国防政府有步骤地实施这一“计划”——派波拿巴的将军们负责巴黎防务、瓦解国民自卫军、借茹尔·费里的渎职失政制造饥饉。巴黎工人在10月5日、10月31日等日子里几次想用公社来代替这批卖国贼的尝试，竟被当做与普鲁士人的串谋而遭镇压³⁷⁷！投降之后，假面具揭下了（被扔到一边）。仰仗着俾斯麦的恩典，这批 capitulards³⁷⁸变成了一个政府。他们作为俾斯麦的阶下囚，同俾斯麦缔结了全面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解除了法国的武装，使任何继续抵抗成为不可能。正是这批 capitulards，在波尔多以共和国政府姿态重新复活之后，通过自己的前任大使梯也尔和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以所谓国民议会的多数的名义，远在巴黎起义之前便急切地哀求俾斯麦来解除巴黎的武装、占领巴黎、镇压“它的 canaille（暴徒）”，这些都是俾斯麦从法国返回柏林途中在法兰克福亲口对他的膜拜者们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讲出的。让普鲁士人占领巴黎，是国防政府“计划”的底蕴。这帮人从在凡尔赛粉墨登场以来为了央求普鲁士进行武装干涉而表现的一副恬不知耻的嘴脸，甚至使欧洲的待价而沽的报纸也为之瞠目失色。自从巴黎国民自卫军不再在 capitulards 指挥之下而是把枪口指向 capitulards 以来，他们的英雄业绩甚至使那些最抱怀疑态度的人也不得不把“卖国贼”一词烙到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及其一伙的无耻额角上。公社缴获的文件最后提供了这些人叛国大罪的法律证据。这些文件中有一些是受命执行特罗胥“计划”的波拿巴派 sabreurs（武人）的信件；这些丑恶的家伙在这些信件里就嘲弄讥笑他们自己的“巴黎防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

因此，很明显，现在组成凡尔赛政府的这批人，只有发动内战、断送共和国、在普鲁士的刺刀庇护下使君主制度复辟，才能逃脱铁案如山的卖国贼应有的命运。

但是，——而这对第二帝国的人物，以及那些只有靠第二帝国的土壤和空气才能变成冒牌人民喉舌的人物，是最具特征意义的，——共和国如果胜利，就不仅要给他们烫上卖国贼的烙印，而且还要把他们当做普通罪犯交付刑事法庭审理。只要看看**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费里**这帮梯也尔手下的国防政府的要人就够了！

国民议会的一位议员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一系列在时间上前后分属二十来年的证据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凭着一大堆无比复杂的大胆捏造的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所以，**茹尔·法夫尔**这个口甜似蜜的家庭、宗教、财产、秩序的辩护士，原来老早就该受 Code pénal (刑法) 究办了。遇到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他都免不了被判处终身苦役的命运。

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凡尔赛现任内务部长，他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官位没有成功，在9月4日自封为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①。这位**厄内斯特·皮卡尔**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从前，当**厄内斯特·皮卡尔**跟**茹尔·法夫尔**之流恬不知耻地提名他那位宝贝兄弟为塞纳—瓦瑟省的立法团议员候选人的时候，

① 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马克思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财政部长（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

第二帝国政府曾公布两份文件：一份是巴黎警察局的报告（1867年7月31日），说这位阿尔图尔·皮卡尔曾经作为一个《escroc》（“骗子手”）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另一份是1868年12月11日的文件，根据这份文件阿尔图尔自己供认了当他在帕勒斯特罗街5号 Société Générale³⁷⁹的一个分公司任经理期间，曾经盗用过30万法郎。厄内斯特不仅派他的这位宝贝阿尔图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该报创刊于帝国时期，一直出版到今日，这是一份天天诋毁共和主义者为“强盗、土匪、partageux（均产者）”的报纸）的主笔，而且在他一当上“国防政府”的内务部长以后，还用阿尔图尔在内务部和股票交易所之间给他当财务纤手，利用他得到的国家机密去大发横财。

厄内斯特和阿尔图尔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了。正如多泪善哭的茹尔·法夫尔一样，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也是一个应受 Code pénal（刑法）究办、该被判处苦役的人。

这个三人合唱队中的最后一人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还是一个吃不上饭的穷律师；他不满足于制造巴黎的饥馑，而且还巧妙地利用这饥馑刮了大笔钱财。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在巴黎被围期间侵吞公款的经过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无怪乎正是这帮只有在受普鲁士刺刀保护的王朝下才可望免于苦役刑的人，正是这帮只有乘内战的混乱才能得到假释证的人，正是这些亡命之徒，才被梯也尔一眼挑中，被“地主议会”作为最可靠的反革命工具接受下来！

无怪乎当4月初被俘的国民自卫军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

“羔羊们”和凡尔赛的暴徒们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尔先生“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中间踱来踱去，恣意拿他们要笑”，同时，“梯也尔夫人、茹尔·法夫尔夫人以及一伙与她们类似的容光焕发、兴高采烈的贵妇们，在省政府的阳台上”看着令人发指的景象拍手喝采。无怪乎正当法兰西的一部分在征服者的铁蹄下痛苦地挣扎着，正当巴黎——法兰西的心脏和头脑——为反抗内奸进行自卫而终日不断流着它的最宝贵的鲜血时……梯也尔们、法夫尔们及其同伙却沉湎于路易十四皇宫里的狂饮闹宴；如梯也尔为庆贺茹尔·法夫尔从卢昂（他是被派去和普鲁士人进行勾结（向普鲁士人乞怜的）返回而举办的盛大 *fête*（宴会）就是一例。这是漏网罪犯们的恬不知耻的狂欢暴欲。

如果说国防政府最初曾用梯也尔做他们的外交大使，派他去向欧洲各国宫廷乞求，以法国重立国王为代价来换得各宫廷对普鲁士的干涉；其后，他们又派他巡视法国各省，同各地的 *châteaux*（封建主砦堡）进行串谋，并暗暗地准备那应和投降一起猝不及防地加到法国头上的大选，那末梯也尔则用这些人做了他手下的部长和高级官员。他们是靠得住的人。

在梯也尔的行动中，有一点颇为神秘难解，这就是他在加速巴黎革命上的轻率冒失行为。梯也尔用了这样一些办法来激怒巴黎：要他的“地主议员们”发出反对共和国的叫嚣，威胁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颁布杜弗尔（梯也尔的司法部长）的使巴黎商业濒于破产的、关于商业期票 *échéances*（支付期限）的三月十日法令，任命奥尔良派人物充任使节，把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课征新的报刊税，查封巴黎的共和派报刊，恢复

最初由八里桥^①宣布的、但随着帝国政府在9月4日倾复而取消了的戒严,任命 *décembriseur* (十二月分子)³⁸⁰、前参议院议员维努亚为巴黎总督,任命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为警察局长、任命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他做了这些事还不满足,竟以微弱的兵力挑起了内战:让维努亚进攻蒙马特高地,并企图首先从国民自卫军那里夺走属于他们的,而且只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才依巴黎投降协定留在他们手中的大炮,以便解除巴黎的武装。

这种 *d'en finir* (把它解决掉)的狂热是从哪儿来的呢?解除巴黎武装、镇压巴黎,当然是进行王朝反革命的首要条件,但是,像梯也尔这样一个老奸巨猾的阴谋家,若非为压倒一切的极其紧迫的动力所驱使,是不会在缺乏应有的准备的情况下,手头只有少得可笑的力量就贸然着手而使这桩棘手事业遭到失败的危险的。动机原来是这样。梯也尔由他的财政部长普野—克尔蒂约经手借了一笔债款,按规定是立即支付20亿,以后再分期陆续支付数十亿。在这项借款交易中,为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茹尔·西蒙、普野—克尔蒂约等这些显贵公民准备了一笔真正的御用 *pot-de-vin* (酒钱)。但是,在这项交易上有一层障碍。在合同最后签字盖章之前,立约一方要求一项保证——平定巴黎。所以才有梯也尔的孟浪行动。所以才对竟敢干涉这桩好买卖的巴黎工人表现出那样野蛮的仇恨。

关于茹尔·法夫尔们、皮卡尔们等等,我们所说的已足以证明他们是这种假公济私勾当的宝贝同谋者。至于梯也尔本人,尽人皆

^① 见本卷第49页脚注。——译者注

知，在路易—菲力浦治下他两度组阁，捞了 200 万；在他任首相时（1840 年 3 月），众议院曾指责他从事交易所投机活动，为了回答这个指责，他那时流了眼泪鼻涕；他像茹尔·法夫尔以及著名喜剧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一样，随时都能拿出这种货色。人们同样也都知道，为了挽救法国由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梯也尔先生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 300 万法郎的年俸，这个数目恰恰和路易·波拿巴在 1850 年因允许梯也尔先生及其在**立法议会**中的党羽废除普选权而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数目相等³⁸¹。梯也尔先生自定年俸为 300 万法郎，这就是他在 1869 年给他的巴黎选民描绘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第一着。说到普野—克尔蒂约，此人是卢昂的一位棉纱厂厂主。1869 年，厂主会议宣布为“征服”英国市场而必须普遍降低工资，他就是那个厂主会议的领导人——这条毒计当时被**国际**挫败了³⁸²。普野—克尔蒂约在各方面都狂热地、甚至可以说是卑躬屈膝地拥护第二帝国，只是在一点上他觉得第二帝国不好，那就是第二帝国和英国缔结的商约损害到他自己开办的工厂的利益。作为梯也尔先生的财政部长，他的第一步是痛斥那个“可恨的”商约，并宣布必须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保护他自己的工厂。他的第二步是这样一个**爱国**的尝试，即以恢复旧日的保护关税来打击亚尔萨斯，借口是没有任何国际条约阻挡着他对亚尔萨斯重新实施保护关税。借助这一妙着，他自己在卢昂的工厂就会摆脱牟罗兹的那些敌对工厂的危险竞争。他的最后一步是赏给他的女婿罗什—朗贝尔先生一份礼物——派他为卢瓦尔总收税官，这是落到统治的资产阶级手里的肥脏之一；普野—克尔蒂约曾经对他的帝国时代的前任曼涅先生十分不满，就是因为曼涅先生曾把这一大肥缺赏给了自己的儿子。所以，这位普野—克尔蒂约确实

是执行上述那项勾当的适当人选。

3月30日“号召报”383载,前任巴黎市长茹尔·费里于3月28日向市税稽征所的官员发出通令,禁止……继续为巴黎课征任何市税。

种种政治小骗局,——小人的肚肠……溃烂的良心……无休止的议会阴谋策划者……无聊的权术和计谋……重复他的关于自由主义、关于《libertés nécessaires》(“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说教……热衷于……以有力的理由反驳认为有失败的可能……头头是道的反驳论据……一种卑劣透顶的英雄主义……侥幸得逞的议会计谋……

厄·皮卡尔先生是一名强盗,在整个巴黎被围困期间,他一直在交易所利用我们军队的失败投机取巧。

屠杀,叛卖,纵火,暗杀,诽谤,造谣。

梯也尔自己在区长等会议上(4月25日)的演说中说:

“杀害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的人”不过是一小撮罪犯,——“以及那些有充分证据可以被认为是这些罪行的共谋犯或是协助犯的人,就是说极少的一小撮人”。

杜弗尔

杜弗尔想用对外省报纸进行法律起诉的办法击溃巴黎。因报

刊鼓吹“和解”而对之进行审讯，实在荒唐。

杜弗尔在梯也尔的阴谋策划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他用他的三月十日法令搅动了负债累累的整个巴黎商业；用他的关于巴黎房租的法令威胁了整个巴黎。颁布这两项法令都是为了惩罚巴黎，因为它曾经挽救了法国的荣誉，延续了向俾斯麦投降达六个月之久。杜弗尔是一个奥尔良党人，是一个就议会意义而言的“自由派”。因此，他一向是镇压部长和戒严部长。

他第一次出任大臣是在 1839 年 5 月 13 日，即在共和党的 dernière prise d'armes (最后一次武装起义) 失败以后³⁸⁴，所以他是当时七月政府的残酷无情的镇压大臣。

1849 年 6 月 2 日³⁸⁵，曾被迫于 (1848 年) 10 月 29 日取消戒严的卡芬雅克，召来两位路易·菲力浦的大臣进入他的内阁 (杜弗尔任内务部长，还有维维延)。他是在普瓦提埃大街³⁸⁶ (梯也尔) 要求之下任命他们的，因为普瓦提埃大街要求保证。他希望用这种办法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得保皇党的支持。杜弗尔使用了最非法的手段使卡芬雅克当上了候选人。恫吓和贿选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杜弗尔在法国散布大量诋毁别人的印刷品来攻击其他候选人，尤其是攻击路易·波拿巴，这一点并没有妨碍他后来成为路易·波拿巴的部长。杜弗尔再度成为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戒严部长 (这次戒严是为了对付国民自卫军为反对法军炮轰罗马等事所举行的示威)。现在，他又成为戒严部长，这次戒严是在凡尔赛宣布的 (戒严地区是塞纳—瓦瑟省)。宣布任何省戒严的大权已授予梯也尔。现在，正像 1839 年和 1849 年一样，杜弗尔要求新的镇压法、新的出版法、“简化军法审判手续”法。他在分发给各总检察官的一份通告里，痛斥“议和”这种呼声是报界的一项罪行，应严惩不贷。对

法国司法界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只有一位总检察官(马延省的)^①写信给杜弗尔提出辞职……

“当此内战之际，行政当局命令我卷入党派斗争，对那些我的良心认为完全无辜的公民仅为他们呼出和解这一字眼而予以迫害，因此，我无法给这样一个行政当局效力。”

杜弗尔在1847年属于阴谋反对基佐的“自由联盟”，正如他属于1869年的阴谋反对路易·波拿巴的“自由联盟”一样³⁸⁷。

至于说到三月十日法令和房租法令，应当指出，杜弗尔也好，皮卡尔也好(两人都是律师)，他们的最好的顾主都是属于不愿由于巴黎被围而损失一个小钱的房东和阔老们。

现在，也和1848年二月革命后一样，这些人对共和国说的是当初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Je vais t'assassiner, mais c'est pour ton bien.》(“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

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

在维努亚企图占领蒙马特尔高地以后(3月18日4点钟，他们在红宫花园被枪决)，勒康特将军和克列芒·托马就被第八十一常备团的那些情绪激昂的士兵们抓起来枪毙了。这是一项不顾中央委员会的几位代表的力劝而执行的私审的即决行动。勒康特这个带着肩章的凶手，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军队开枪射击一群手无寸铁的妇孺。士兵没有射击人群，而是把他枪毙了。克列芒·托马曾做过军需官，是一个在六月屠杀(1848年)前

^① 路·瓦什隆。——编者注

夕被国民报派(他做过该报的 *gérant* (经理) 临时提拔起来的“将军”；他的军刀除了染满巴黎工人阶级的鲜血之外,从未沾濡过其他敌人的血迹。他是蓄意激起六月起义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那次起义的最残暴的刽子手之一。1870年10月31日,巴黎无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突然袭击设在市政厅的“国防政府”并且将政府人员逮捕起来的时候,这些自封官爵的人们,这些被他们的一个同伙皮卡尔最近称为 *gens de paroles* (说话算话的人),都立下了信誓:他们一定让位给公社。他们以此获释之后,随即把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开来进攻那些过于轻信而释放了他们的人。然而,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即塔米济埃先生,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显职。他拒绝背弃自己的信誓。于是克列芒·托马的运气又来了。他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来代替塔米济埃。他是执行特罗胥“计划”的最合适的人选。“他从不向普鲁士人作战”,他只向国民自卫军作战,他瓦解、分裂、诽谤中伤国民自卫军,把国民自卫军中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全部清洗掉,唆使国民自卫军的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布置使国民自卫军损兵折将的“出击”,好让它备受嘲笑。这个家伙被六月屠杀中的冤魂所缠定,当他在3月18日嗅到又要屠杀巴黎人民的气息时,他完全不是出于官方差遣而是情不自禁地又重新登上战争舞台。人民的怒火一爆发,他就成了私审的牺牲品。而那批把巴黎交给 *décembriseur* (十二月分子) 维努亚处置以便断送共和国、并根据普野—克尔蒂约所立合同领取 *pots-de-vin* (酒钱) 的人们,现在居然大嚷大叫:杀人犯!杀人犯!急于吮吸“无产者”鲜血的欧洲报纸也响应了他们的这种嚎叫。“地主议会”里上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的闹剧;这回仍和从前一样,他们这两位朋友的尸首,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对付敌人的武

器。他们要巴黎和中央委员会对它们无法控制的一桩事件负责。人们都知道，在 1848 年 6 月的日子里，“秩序人物”怎样就巴黎大主教被杀事件掀起了震荡全欧的反对起义者的愤怒叫嚣。其实，他们甚至在当时就已经从大主教手下的那位陪伴他到街垒去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的军队而不是被起义者射杀的，可是，大主教的尸体正好服务于他们的目的。现任巴黎大主教达尔布瓦先生是公社为了对付凡尔赛政府的野蛮暴行、进行自卫而扣押的人质之一，从他给梯也尔的一封信看来，他似乎有一种奇特的预感，即**特朗斯诺南爸爸**³⁸⁸切望在他身上投机，想利用他的尸体激起一种神圣的愤怒情绪。凡尔赛的报刊几乎没有一天不宣告达尔布瓦已被处死；要是从“秩序人物”的层出不穷的暴行、违反所有战争公法来说，如果不是公社，任何别的政府早就会批准把达尔布瓦处死了。凡尔赛政府刚刚取得第一次军事胜利，率领宪兵杀害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的德马列上尉便立即得到梯也尔的勋绶。弗路朗斯在 10 月 31 日救了“国防”政府成员的生命。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逃亡者）被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因为他在多面堡里枪杀了我们被俘的英勇同志杜瓦尔，因为他的第二件功绩是枪决了几十名被俘的站到巴黎人民方面的常备军士兵，并且用“十二月的方式”³⁸⁹揭开了这次内战。加利费将军——用伦敦的一个廉价文巧的微妙形容语来说，是“在化装舞会上素以服饰号称第二帝国奇观之一的那位迷人的侯爵夫人的丈夫”——在吕埃伊附近对国民自卫军的一个队长、副官和士兵发动“突袭”，立即把他们枪决，随即发布一份公告来夸耀他的这项功绩。这些只是凡尔赛政府正式谈到的并引以为荣的谋杀事件中的几桩。第八十常备团的 25 名士兵被第七十五常备团作为“叛

逆”执行枪决。

“每个从共产主义者队伍中俘获的穿着常备军制服的人立即就地枪决，毫无宽赦。政府军极端凶暴。”

“梯也尔先生向议会报告了处死弗路朗斯的令人兴奋的细节”。

凡尔赛。4月4日。梯也尔这个其貌不扬的侏儒，谈到押往凡尔赛的俘虏时说(在他的公告中)：

“正直人士(比埃特里的爪牙!)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维努亚抗议对起义的军官或常备军士兵表示任何怜悯。”

4月6日。公社关于报复(和人质)的法令：

“鉴于凡尔赛政府公开蹂躏人道的法律和战争的法律，它犯下了连入侵法国的外敌都干不出来的骇人暴行……特此决定……”(法令各条列后)³⁹⁰

4月5日。公社公告：

“凡尔赛匪徒每天都在屠杀和枪决我们的俘虏，每时每刻我们都获悉又干下新血案的消息……人民，甚至当他们愤怒的时候，仍像憎恶内战一样地憎恶流血，但是，他们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敌人的野蛮虐杀，因此，无论代价多大，都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³⁹¹

“对巴黎作战的市警每天领10个法郎。”

凡尔赛。4月11日。高级军官和其他目击者津津有味地叙述战俘(并非逃兵)遭到冷酷枪杀的骇人听闻的细节。

达尔布瓦在给梯也尔的信中抗议

“以过分的残暴行动增加自相残杀的战争恐怖”。

德盖里(马德兰教堂主持)也以同样的语气写道：

“这些处决激起了巴黎的强烈愤怒，可能导致可怕的报复”。“已经这样决定：今后再有一人被处死，这里就从拘禁的许多人质中处死二人。请你考虑，

我以教士身分向你提出的要求是多么迫切、多么绝对地必要。”

在这种种暴行发生时，梯也尔却告诉各省省长说：《L'Assemblée — 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Elle aussi a le coeur léger（议会也很很松）^①）。

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会”十五人委员会³⁹²恬不知耻地“正式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臆造的就地处决和报复行为”。但是，特朗斯诺南爸爸在他的关于炮轰巴黎的4月16日通告中说：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梯也尔表明了，他至少在一件事上，即在发表谎话连篇的公报上，超过了他膜拜的英雄拿破仑第一。（当然，巴黎是在自己轰击自己，以便能够中伤梯也尔先生！）

为了回答波拿巴派恶棍们的这些凶暴的挑衅行为，公社只限于拘禁一些人质，提出要进行报复的威胁，但是它的威胁一直没有付诸行动！甚至于化装为军官的宪兵，甚至于身上搜出炸弹的被捕市警，都没有交付军事法庭！公社不肯让这些爪牙鹰犬的血玷污自己的双手！

3月18日之前的几天，克列芒·托马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一份将四分之三的国民自卫军解除武装的计划。他说：

“暴徒的精华集聚在蒙马特尔周围，并且和伯利维尔一致行动。”

国民议会

那批在凡尔赛当权的人物早将所有要塞交给了敌人，出卖了

^① 这是借用内阁首相奥利维耶的话。向普鲁士宣战前夕奥利维耶声称，他“轻松地”承担战争的责任。——编者注

毫无防御的巴黎。2月8日在敌人的压力下选出了国民议会，这个凡尔赛议会只有一个目的——根据1月28日在凡尔赛签字的投降协定明白规定的唯一目的，即决定是继续战争，还是签订和约；如果要签订和约，便商定和约的条件，并保证尽可能迅速地使普军从法国领土上撤退。

尚济，巴黎大主教等人

尚济的被释放几乎是和赛塞的撤退同时发生的。保皇派记者们都一致认定这位将军要被处死的。他们想把这项可爱的行动加在红色党人头上。他们说曾三度下令要将他处决，这次他真的要被枪毙了。

旺多姆广场事件^①以后，凡尔赛是一片慌乱。预料3月23日会向凡尔赛进攻，因为公社运动的领袖们已经宣布了：如果国民议会采取任何敌对行动，他们就要向凡尔赛进军。议会没有采取什么敌对行动。相反地，它通过了一项同样紧急的动议，决定在巴黎进行公社选举等等。议会用这些让步承认了它的无力。就在同时，保皇党在凡尔赛酝酿着种种阴谋。波拿巴的将军们和奥马尔公爵³⁹³。法夫尔公开承认他已经接到了俾斯麦的一封信，信中宣称如果到3月26日还不恢复秩序，德军就要占领巴黎。红色分子看穿了他的小把戏。旺多姆广场事件是这个贗造文契的老手、卑鄙恶劣的耶稣会教徒茹尔·法夫尔挑起的，他（在3月21日？）登上凡尔赛议会的讲坛，来侮辱那些把他从卑微中提拔起来的人民，挑拨巴黎和外省的对立。

^① 见本卷第617—619页。——编者注

3月30日。公社公告：

“今天，那些你们甚至不屑追击的罪犯们，竟滥用你们的宽大胸怀，就在巴黎城的大门口筑起了一个进行保皇阴谋的巢穴。他们制造内战；他们使用一切腐败的手法；他们愿与任何人结伙共谋；他们竟无耻到乞求外国的援助。”³⁹⁴

梯也尔

4月25日，梯也尔在接待塞纳省各区区长、区长助理、城郊市镇参议员时说：

“共和国确实存在着。行政首脑不过是一个普通公民。”

依梯也尔看来，法国从1830年到1871年的进展就在于：在1830年，路易-菲利浦是“最好的共和国”；到了1871年，路易-菲利浦王朝时的大臣化石，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梯也尔先生是以僭越开始他的统治的。国民议会任命他为议会内阁的首脑；他把自己任命为法国行政的首脑。

国民议会和巴黎革命

在外国侵略者的命令下召开的国民议会，根据1月28日凡尔赛协定的明文规定，只是为着一个目的选出的：或是决定继续战争，或是确定议和条件。巴黎的 capitulars（投降派）在号召法国人民参加投票的时候，自己就明白地规定了议会的这项特殊任务，议会的成分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Capitulars 奴颜婢膝地接受了停战协定，这个协定的条款本身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因而议会在实际上只能签订一个屈辱的和约；为了完成这项特殊工作，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

共和国是在9月4日由巴黎人民宣告成立的，而不是由在市政厅中擅自建立国防政府的讼棍们宣告成立的。它受到法国举国一致的欢迎。它通过以巴黎的长期抵抗为基础的五个月的战争为自己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共和国进行的、并且是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这一战争，那末，在色当投降以后，帝国就会被俾斯麦恢复起来，而以梯也尔先生为首的讼棍们就不会是代表巴黎投降，而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不至于到凯恩去旅行而投降，也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地主议会。只是由于巴黎开始了共和革命，地主议会才集聚起来。地主议会并不是一个制宪议会，像梯也尔先生重复说得令人发呕的那样；如果不是仅仅作为共和革命中发生的事件的记录者，那它连宣布波拿巴王朝被推翻的权利都没有。因此，法国的唯一的合法权力就是以巴黎为中心的**革命本身**。进行这次革命不是为了反对小拿破仑，而是为了铲除产生第二帝国的、并在第二帝国政权下得到登峰造极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如果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不被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生力量所铲除，法国就会变成一具尸体，像这次对普鲁士的战争鲜明地揭示的那样。地主议会只从革命手中取得了代表权去签订由现任“行政当局”承担起来的卖身给外国侵略者的灾难性条约。因此这个地主议会竟企图把革命说成自愿的投降派，乃是骇人的僭越。它对巴黎的战争不过是在普鲁士刺刀庇护下的一次怯懦的Chouannerie³⁹⁵。这是谋害法国的露骨阴谋，其目的在保持堕落的、衰退的、腐烂的阶级的特权、垄断地位和奢侈生活，正是这些阶级已把法国拖向深渊，只有真正社会革命的海格力斯的巨手才能把它挽救出来。

梯也尔的最精锐的军队

还在成为“国家要人”以前，梯也尔先生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但是，矮人所特有的虚荣心这一回却使他丢丑，使他受到无以复加的嘲笑。他的秩序军是：出于俾斯麦的恩典刚从普鲁士监狱中遣送回来的波拿巴兵痞的渣滓、教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瓦伦顿的“市警备队”396、比埃特里的过去的市警以及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不过是军队里的密探、而在梯也尔先生手下构成军队精华的瓦伦顿的科西嘉宪兵，而且所有这些都处在带着肩章的 mouchards（侦探）监视之下，由丧尽廉耻、临阵脱逃的十二月分子元帅们指挥。就是这一批乌七八糟的该绞杀的东西，梯也尔先生美其名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如果说他允许普鲁士人还驻扎在圣丹尼，这只是他想要用凡尔赛的这支“最精锐的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梯也尔

种种政治小骗局。无休无止的议会阴谋策划者梯也尔先生，一向只不过是一个“能干的”报人，一个巧鼓舌簧的“辩客”，一个玩弄议会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权术、卑鄙奸诈和阴谋诡计的巨匠。这个邪恶的侏儒在半个世纪中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真实的思想代表。当他置身在反对派之列时，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他那 *libertés nécessaires*（必不可少的自由）的陈腐说教，轮到他上台时便压制这些自由。当他在野时，他常常用法兰

西的宝剑来恫吓欧洲。他的外交成就实际上是什么呢？那就是：在1841年咽下了伦敦公约的耻辱³⁹⁷；以反对德国统一的激昂言论加速了对普战争；1870年，他遍访欧洲各宫廷进行乞求，给法国丢脸；1871年他签署了巴黎投降书，接受了“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并向普鲁士央求到了一个让步——让他在自己的被蹂躏的国家里发动内战并给他以发动内战的手段。当然，现代社会中隐藏着活力始终是他这号人所不知道的，可是他竟连现代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领悟。例如，他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竟然轻蔑地把修铁路指斥为荒诞的怪事；甚至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也激烈反对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措施。这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信念、没有胆识的人。

由于渴望着炫耀自己、舞权弄势、染指国库，所以当他被排挤到反对派地位时，他总是不择手段地煽动民众情绪，挑起大祸，以便取代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他同时也是一个最浅薄的墨守陈规的人，等等。他辱骂工人阶级为“贱民”。他的一个从前在立法议会中的同僚贝累先生（是和他同时的人，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委员）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他这样说：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asservissement），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他们都是些罪犯！”

无怪乎梯也尔先生已经叫他的内务部长厄内斯特·皮卡尔下令防止“国际协会”和巴黎通消息了（3月28日议会会议）。梯也尔给他的省长和专区区长的通告说：

“人数远远超过坏工人的善良工人们应当了解：如果面包又一次从嘴边飞掉了，那他们应该责怪那些搞国际的能手，那些人自封为劳动的解放者而实际是劳动的暴君。”

没有国际……^①

(现在谈谈钱的事)。(他和法夫尔已经把他们的钱汇到伦敦去了。)谚语说：匪盗失和，真相败露。因此，我们要结束他的脸谱的描绘，最好不过是援引一下在伦敦出版的、属于他的凡尔赛将领们的主子的机关报。3月28日的“形势报”³⁹⁸写道：

“梯也尔先生每次出任大臣总是推动士兵去屠杀人民。他杀父乱伦，侵吞公款，抄袭剽窃，贩卖暗算，野心勃勃，impuissant(毫无才能)。”

狡诈诡计、托辞推诿的能手。

七月革命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代，他挤掉了他旧日的恩人拉菲特而第一次钻得了大臣的位置。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他旧日的合作者阿尔芒·加莱尔投入监牢。他靠着充当对付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监狱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利浦的宠信。但是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是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起义的巴黎共和党人和制订取缔报刊的九月法令，后来这些法令被当做已经用钝的工具一样丢开了。1840年，他再度凭权谋登台后，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方案。整个民主党人，除了“国民报”派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都反对这个方案，认为这是企图危害巴黎的自由。梯也尔先生在众议院讲坛上答复他们的强烈指责时说：

^① 手稿中这一句话没有写完。——编者注

“什么话？你们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吗？…… 这样的设想是不顾一切现实。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敢于在某个时候轰击巴黎。什么话？一个政府用炸弹炸开残废军人院或名人纪念堂的穹顶，纵火烧掉你们家庭的住宅以后，还能站在你们面前请求你们批准它的存在么！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路易—菲力浦的政府也好，波拿巴摄政的政府也好，都没有敢从巴黎撤走，然后来轰击它。对城防工事的这种使用法，留给了这些工事的最初策划人梯也尔先生。

1848年1月，当那不勒斯的炮弹国王^①炮击巴勒摩城的时候，梯也尔先生又在众议院发表演讲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好吧，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48小时的轰击。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对人类的一种贡献。诸位先生，五十年前，当奥地利人行使战争权利，为了避免长期围困而想炮轰利尔城的时候，后来，当英国人也是行使战争权利而炮轰哥本哈根的时候，最近，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纳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多一点，梯也尔就成了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炮击罗马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了，他百般颂扬他的朋友尚加尔涅将军，因为他的这位朋友用大刀挥砍那些对这一破坏法国宪法行为表示抗议的

①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巴黎国民自卫军。

1848年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位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了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希望这能帮助他撵走对手而强使路易-菲力浦任用他。于是梯也尔在众议院中喊叫道：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从共和国宣告成立起直到 coup d'état (政变) 止，镇压二月革命就成为他的唯一工作。

二月革命爆发后最初几天，他忧心忡忡地隐藏了起来，而巴黎工人却对他如此鄙视，甚至不屑于恨他了。但是，他那种尽人皆知的怯懦——这曾使阿尔芒·加莱尔在听到梯也尔自己吹嘘“有一天要死在莱茵河岸上”以后回答说：“你将死在阴沟里”——使他不敢在六月起义者被屠杀、亦即人民力量被击溃以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最初，他只限于秘密指挥普瓦提埃大街总会的阴谋，这个阴谋后来导致帝国的复辟；直到局势相当明朗，他才重新公开露面。

巴黎被围期间，有人问巴黎是否准备投降，茹尔·法夫尔回答说：要说出“投降”一语，先得炮击巴黎！这就说明他对普鲁士人炮击的抗议不过是演戏，表明普鲁士人的炮击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而梯也尔的炮击才是冷酷的现实。

议会小丑。

他在官场上已经混了四十年。在政治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他从来没有倡导过一项有益的措施。他好虚荣、喜猜疑、贪图享乐，从来没有写过和谈过正经事。在他看来，事物本身只是供他动笔杆耍嘴皮的因由。除了对高官厚禄和自我炫耀的渴求之外，他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甚至于他的沙文主义也不例外。

他以他那庸俗的职业报人的本色，时而在他的公报里嘲笑他的凡尔赛俘虏的样子难看，时而报道地主议会“轻松愉快”，时而发布占领“木兰—萨克”（5月4日）并俘掳300人的公报，使自己成为笑料。

“其余叛乱分子拔腿奔逃，在战场上遗弃150名伤亡者”，他恶狠狠地补充说：“这就是明天公社在它的公报中所能庆贺的胜利。”“巴黎不久即将从压迫它的凶残暴君下解放出来。”

巴黎——这个对他作战的巴黎人民群众的巴黎，不是“巴黎”。“巴黎——那是富人的、资本家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难道不是世界妓院？）。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劳动的、思想的、战斗的巴黎，人民的巴黎，公社的巴黎，是一群“贱民”。梯也尔先生对待巴黎乃至对待法国的整个态度就是这样。以“和平游行”和赛塞的逃窜来表现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麇集在凡尔赛、吕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门的那批人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宗教、家庭、秩序、财产人物”的荡妇们的巴黎；（真正“危险的”，剥削和游堕阶级的巴黎）（《franc-fileurs》³⁹⁹），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把“内战只当做惬意消遣”的巴黎——这才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⁴⁰⁰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他带着庸俗报人的本色，连维持表面的尊严都不会，但是他为了不违背“正统派”的礼节而杀害妇

女和儿童(被害者的尸体是在讷伊的废墟中发现的)。他硬要用汽油弹燃烧克拉马尔来点缀他下令在法国举行的市镇选举。罗马历史学家们在描述尼禄的性格时,最后都以这个魔君自诩有吟歪诗、演喜剧的天才这一点作结语。但是,若把一个像梯也尔那样的区区职业报人、议会小丑扶上台去,他一定会使尼禄相形见绌。

他允许波拿巴“将军们”肆意对巴黎进行报复,这只是在起着他作为阶级利益的盲目工具的作用;但是,他在公报、演说、宣言的小插曲里流露出他这个报人的虚荣、庸俗和低级趣味,这倒是在起着他个人的作用。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乱的奴隶主。南方人是为着劳动奴隶制和脱离合众国而战。而巴黎是为着劳动的解放和使政权脱离梯也尔这帮想成为法国的奴隶主的国家寄生虫而战!

他在对区长们的演说中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本届议会是法国所曾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之一。”

“只要秩序和劳动不受到那些自封为共和国利益的特别保护人的经常危害”,

他就要拯救共和国。

他在议会的4月27日会议上说:“议会比他本人还要开明!”

他在辩嘴时一向以痛斥维也纳条约作为王牌,但他自己签订

的巴黎条约⁴⁰¹，不仅割让了法国的一部分（不仅使将近半个法国被占领），而且甚至不要求俾斯麦具体列出并证明他所花的战费就承担了几十亿赔款！他甚至于不让波尔多的议会逐节讨论他的降书！

他一辈子都在责难波旁分子，责难他们是跟在外国军队屁股后面回来的，责难他们在缔结和约⁴⁰²后对待占领法国的盟国上有失尊严，可是他自己在他们签订的条约里对俾斯麦要求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他4万军队来制服巴黎（这是俾斯麦在德国国会中讲的）。就安内攘外来说，巴黎有它的武装的国民自卫军，完全足以保障安全。但是，梯也尔除了使巴黎向外国人投降之外，还要使巴黎向他本人及其同伙投降。规定这一条款就是规定要打内战。他开始这场战争不仅是在普鲁士的默许下，而且还依靠它提供的便利，即依靠普鲁士慷慨地从德国监牢里遣返给他的法军俘虏！他在他的公报里，在他以及法夫尔的议会发言里，对普鲁士卑躬屈膝；在他要求俾斯麦进行干涉未果（正如俾斯麦自己声明的）之后，他还是每隔一星期就用普鲁士的干涉来威胁巴黎。和这个小丑、这个沙文主义的大信徒相比，波旁分子简直可说是尊严的化身了！

普鲁士被击溃后（1807年的提尔西特和约），它的政府感到，只有经过一次巨大的社会更新（大变动）才能挽救它自己和全国。它在封建王朝的范围内，把法国革命的成果小规模地移植到普鲁士去。它解放了农民，等等⁴⁰³。

俄国在克里木的战败——虽然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或许可能为它挽回荣誉，在巴黎的外交胜利也可能使外国人感到眩晕——在国内揭示了它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腐朽；于是它的政府在

战后解放了农奴，改革了全部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⁴⁰⁴。在这两个国家里，大胆的社会改革都受到了阻碍，都有其局限性，因为这些改革都是由君主赏赐的，而不是（并非）由人民夺得的。虽然如此，仍然发生了一些巨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取消了统治阶级的最恶劣的特权，改变了旧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两个国家感到，沉疴大病只能用勇敢的措施来医疗。它们感到，只有进行社会改革，唤起民众振兴的因素，才能对付胜利者。1870年法国的灾祸在近代世界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事！它表明：官方的法国、路易·波拿巴的法国、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法国是一具腐烂的尸体。这批趁人民惊慌失措时攫取政权，并依靠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而继续控制政权的无耻之徒，他们的第一个企图是什么呢？就是在普鲁士的庇护之下，用路易·波拿巴的兵卒和比埃特里的警察来谋杀从巴黎开始的民众振兴的光荣事业；召唤所有被七月革命打倒的旧正统派的幽灵和被二月革命打倒的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冥顽不化的骗子手，共同举行一次反革命的庆宴！这种太不自爱的英雄行为是历史记载中闻所未闻的！但是，最能说明时代特点的是：它并没有引起官方的欧洲和美国方面普遍的愤怒呼声，反而激起了一股同情和对巴黎狂暴诋毁的逆流！这证明忠实于自己历史先例的巴黎是在谋求法国人民的复兴：使他们成为复兴旧社会的斗士，使人类的社会复兴成为法国的民族事业！这是使生产阶级摆脱剥削阶级以及它们的仆从和国家寄生虫而得到解放；这些剥削阶级的仆从和国家寄生虫证明这句法国谚语的正确：《les valets du diable sont prie que le diable》（“小鬼比阎王爷厉害”）。巴黎已经举起了人类的旗帜！

3月18日：政府对

“所有期刊不分性质每份征印花税两生丁”。“在戒严状态解除之前，禁止发行新报刊。”

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同集团都曾依次**执政当权**：在(旧波旁分子)**复辟时期**是大土地所有主；在(路易—菲力浦)七月议会王朝时期是资本家，而波拿巴派和共和派分子则一直在幕后挟怨争斗。他们的种种党争和阴谋当然都是打着**公众福利**的幌子进行的，这些王朝被人民革命打倒了，另一个又登台了。(二月)共和国的建立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这时，资产阶级的所有各集团联合为**秩序党**，这是土地所有主和资本家为维持对劳动的经济奴役、维护保障这种奴役的国家压迫机器而结成的党。共和代替了王朝，因为单单王朝这个名称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驾驭另一集团，意味着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意味着一方的得胜和另一方的屈辱)，而**共和**则是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集团的、集所有人民**剥削者**之大成的无名股份公司；实际上，正统派、波拿巴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耶稣会教徒，伏尔泰信徒，彼此抱成了一团。他们已经不再躲藏在王冠的庇护之下，已经不能再把他们的那些党争粉饰为争取人民利益的斗争从而使人民对它们发生兴趣，已经不再彼此分高下。他们的阶级统治是与生产群众的解放直接公开对抗的——**秩序**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经济政治条件的代称，是奴役劳动的代称；资产阶级制度的这种无名形式或共和形式——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秩序党**的共和国，是一切政治制度中最**可憎**的制度。它的直接任务，它的唯一的 *raison d'être* (存在意义) 就是镇压人民。它是阶级统治的**恐怖**。做法是这样的：人民奋身战斗、完成革命之后，宣布共和，为召开国民议会扫清了道路，然后，那些以有名的共和言论为其“共和国”保证的资产者们，就被这个由战

败的共和死敌组成的议会的多数推上前台。这些共和派受命负责激怒人民,使他们落入举行起义的圈套,然后用火和剑加以消灭。以卡芬雅克为首的“国民报”派在二月革命以后就起了这一作用(六月起义)。这些共和派对群众犯下了这桩罪行之后就失势了。他们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尽管他们还被允许在反对无产阶级的共同斗争中支持**秩序党**,但同时他们却被逐出政府,不得不退至后排,而且只是受到“宽容”而已。这时候,联合起来的保皇派资产者变成了共和国之父,“秩序党”的真正统治开始了。人民的物质力量暂时被破坏,反动派的勾当——消灭由四次革命争得的一切成果——开始一桩一桩地干了起来。**秩序党**的种种行为,加上这帮下流坯的厚颜无耻——他们竟把人民当做战败者来对待,竟用人民自己的名义,用共和国的名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把人民弄到了愤怒欲狂的地步。当然,这种**无名**的阶级专制的短暂形式是不能延续长久的,它只可能是一种过渡阶段。它知道它是坐在革命的火山口上。另一方面,即使秩序党在对工人阶级的作战中、在发挥其**秩序党**的作用方面是团结一致的,然而它的不同派系彼此勾心斗角的斗争,在革命的物质力量已被破坏,它的统治因而似乎稳固下来(得到了保证)的时候,立即全面爆发起来:每一派都想使它的特殊利益在旧社会制度内占得上风,每一派都想使本派的谋位者登基复辟,使个人的野心得逞。反人民的共同战争和反共和国的共同阴谋相结合的这种情况,加上统治者内部纷争和勾心斗角的阴谋,造成了社会的瘫痪,引起了中等阶级群众的厌恶和迷惘,“扰乱”他们的生意,使他们陷于一种长期的动荡不安状态中。在这种制度下创造了(产生了)专制制度的一切条件,但这是不安定的、以议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首的专制制度。于是 *coup d'état*

(政变)的时刻来到了，这帮无能的坏蛋不得不让位给随便哪一个侥幸得逞的野心分子，这样就结束了阶级统治的无名形式。路易·波拿巴就是这样把已存在四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在整个时期内，梯也尔是秩序党的《âme damnée》(“忠实走狗”)；这个党曾以共和国名义对共和国进行战争，即对人民进行阶级战争，实际上创造了帝国。现在梯也尔起着完全和那时候一样的作用，只不过那时他仅仅是议会的一个阴谋家，而现在是在行政首脑罢了。如果他不被革命击败，那他现在也会和那时一样不过是一个权宜的工具。不管换来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它的第一项措施必然是踢开那个将法国交给普鲁士和炮轰巴黎的人。

梯也尔对路易·波拿巴有满腹牢骚。这个人曾把他当做工具和傻瓜使用。波拿巴在 coup d'état 之后逮捕了他，使他受了惊(把他吓破了胆)。波拿巴取消了议会制，从而把他一笔勾销，因为像梯也尔这样一个纯粹的国家寄生虫、一个只会饶舌的人只有在议会制度下才能起政治作用。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一味为拿破仑擦皮靴的梯也尔曾如此长久地描述拿破仑的功勋，以致产生一种幻想，仿佛这些功勋是他自己完成的。在他看来，拿破仑第一的合法模仿者不是小拿破仑，而是小梯也尔。尽管如此，路易·波拿巴所干的每一桩卑鄙勾当——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起到对普鲁士作战止，没有一桩没有得到梯也尔的支持。

只有他这种头脑空虚浅陋的人才居然会产生这样的幻想，仿佛一个以他作为首脑，其国民议会一半属正统派、一半属奥尔良派，其军队由波拿巴的将军们掌握的共和国，一旦得到胜利，不会把他一脚踢开。

再没有比一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装模作样地想扮演（正在扮演）帖木儿—塔梅尔兰的角色更令人作呕的了。对他说来，采取残暴行动不仅是一项职务，而且是他的想入非非的虚荣心的戏剧性表演（舞台效果）。他要写“他的”公报，表现“他的”严峻，要有“他的”军队，“他的”战略，“他的”炮击，“他的”汽油弹，要以让十二月匪帮对巴黎进行报复的冷酷来掩饰“他的”怯懦！真是卑鄙到无以复加的英雄行为！他对自己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在全世界制造的喧嚣洋洋得意！他满以为自己是一个伟人：他这个侏儒，这个淌口水的议会小丑，在世人眼里该是多么高大（雄伟）！在这次战争的一幕一幕可怕的场面中，看到爱好虚荣的梯也尔所装出的滑稽像，的确令人忍俊不禁！梯也尔先生是一位有丰富想像力的人，他身上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和艺术家的虚荣，甚至能骗得他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和自己的伟大。

梯也尔的所有演说、公报等等里贯穿着一股趾高气扬的虚荣气息。

这个令人作呕的特里布累。

从蒙瓦勒里安高地（用汽油弹）进行的漂亮的轰击毁坏了特尔纳街区要塞围墙内的一部分房屋，引起一场大火和震动整个巴黎的一次可怕的大炮轰鸣。炸弹是蓄意投向特尔纳街区和爱丽舍园的。

爆炸弹，汽油弹。

公 社

光荣的英国廉价文丐有一个辉煌的发现：公社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自治政府的那类东西。当然不是。它不是饱食终日的市议员们、假公济私的教区委员们和穷凶极恶的习艺所监工们操纵的那种城市自治。它不是大块土地拥有者、满袋金银、头脑空空的蠢材们操纵的那种郡的自治。它不是“无俸法官”⁴⁰⁵的司法丑物。它不是借助于寡头俱乐部和阅读“泰晤士报”来管理国家的那种政治自治。它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

在这场食人生番进行的战争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坐在政府首席上的可憎矮鬼的“文雅的”尖叫声！

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从未停止片刻，而且一当凡尔赛确信公社因过分仁慈而不至执行其报复法令时，他们就立即恢复灭绝人性的残杀！

（凡尔赛的）“巴黎报”说：13名在克拉马尔火车站被俘掳的常备军士兵被就地枪决，所有押到凡尔赛的穿常备军制服的俘虏，其身分一经核对属实，也将就地枪决！

小仲马先生叙述说：一个虽然没有将军头衔但执行着将军职务的年轻人，（被押解着）沿一条道路才走了几百码便被射杀。

5月5日。“口令报”⁴⁰⁶报道：据凡尔赛出版的“自由”晚报报道，“在克拉马尔叛乱分子中间找出的正规军士兵，全部（被那位自比林肯的梯也尔！）就地枪决”（林肯承认对方的交战权利）。“而在所有法国的市镇墙上诋毁巴黎人是凶手的正是这些人！”这些匪徒！

德马列。

公社特派代表团（在4月27日）前往比塞特尔调查国民自卫军第一八五步兵营的四名兵士遇害事件，在那里，代表们访问了仅得生存（重伤）的舍费尔。

“伤者声称，4月25日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地方，他和那三位战友遭到骑兵的突袭，并且要他们投降。由于当时已不可能对包围他们的队伍进行有效抵抗，他们就扔下了武器投降。敌兵们当即围住他们，将他们俘掳，但对他们并没有施加任何暴力或威吓。他们被俘才几分钟，来了一个骑兵队长，举着手枪冲向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就对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开枪，后者当即被击毙，然后他又照样对国民自卫军舍费尔开枪，舍费尔胸部中弹，倒在他的战友旁边。另外两名国民自卫军慑于这种卑鄙凶焰，向后退避，但是疯狂的队长直趋他们，又开了两枪把他们打死。这批骑兵干完这桩凶残卑鄙的暴行之后，和他们的队长一起撤走，留下惨遭他们毒手的牺牲者直躺在地上。”⁴⁰⁷

“纽约论坛报”⁴⁰⁸超越伦敦报纸。

梯也尔先生的“法国从来没有过的最开明的、最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和他的那个“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正是异曲同工。在欺诈的口实下选举出来的这个衰老的 *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几乎完全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4月30日在梯也尔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市镇选举表明了这些人与法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如何！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内残存的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取其整数）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占200名，奥尔良派占600名，公开的波拿巴派占7000名，其余的全是共和派或共产主义者^①（5月5日“每日新闻”驻凡尔赛记者）。以奥尔良

^① 指公社的拥护者。——译者注

派的木乃伊梯也尔为首的这个议会正是代表着少数人的篡夺，这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吗？

巴 黎

梯也尔先生再三把公社说成是一小撮“罪犯”和“假释犯”的工具，巴黎的渣滓的工具。然而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六个多星期以来却一直抵挡着由战无不胜的麦克马洪统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天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

巴黎人的壮举不仅驳倒了他。巴黎的各阶层都发表了意见。

“决不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马特尔遭到的突袭混为一谈，后者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

这一番话是谁说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们去到凡尔赛讲了这番话……**共和联合同盟**……**共济会会员的示威游行**⁴⁰⁹等等。

外 省

Les provinciaux espiègles (调皮捣蛋的外省人)。

如果梯也尔哪怕是在刹那间曾经认为外省的确都是和巴黎的运动相敌对的，那他也会竭尽全力向它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方便来使它们了解这一运动及其“种种惨象”了。他会邀请外省人来观察这一运动的全部真实的情况，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耳闻目睹确信这一运动原来真是如此。但他决不！梯也尔和他的“国防人士”为了防备外省发生拥护巴黎的总起义，企图用一道**谎言的墙壁**把它们包围起来，像他们在普鲁士人包围巴黎时期不使消息从外省透

入巴黎的做法一样。只许外省通过凡尔赛的 camera obscura (变形镜) 来观察巴黎 (只有凡尔赛报刊散布的谎言和诽谤传到各省, 垄断视听)。两万名假释犯在打劫杀人——这种诽谤败坏着首都的声誉。

“同盟认为它的头一项义务就在于阐明真相, 恢复外省和巴黎之间的正常关系。”⁴¹⁰

现在, 轮到他们来围困巴黎的时候, 他们还和他们自己被困在巴黎时一样。

“像从前一样, 造谣是他们钟爱的武器。他们取缔、没收首都的报纸, 拦截通讯, 拆查信件, 因此, 外省只能得到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一伙人愿意发给他们的那些消息, 根本不可能核对那些话是否确实。”

梯也尔的公报、皮卡尔的通告、杜弗尔的…… 各市镇的招贴。凡尔赛的强资报纸和德国人。小“通报”⁴¹¹。重新实行异地旅行须持通行证的制度。无孔不入的 mouchards (侦探) 大军。(在普鲁士权力管制下的卢昂等地) 不断逮捕, 等等。散布在巴黎四郊的成千上万的警官接到宪兵、警察局长瓦伦顿的命令: 凡是在这座叛乱的城市里刊印的报纸, 不问其倾向如何, 一律予以没收, 并当众销毁, 与神圣的宗教裁判所鼎盛时期的做法一模一样。

梯也尔政府最初呼吁^①各省组织国民自卫军战斗营, 并把它们开到凡尔赛来对付巴黎。

正如里摩日的报纸⁴¹²所载, “外省拒绝派遣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要求的志愿战斗营, 以此表示了它们的不满。”

在梯也尔周围聚集起来的唯一的“外省”军队是少数布列塔

① 手稿中在这几个字上面还写着: “在从俾斯麦那儿获得被俘的军队以前……恐慌地呼吁……”——编者注

尼省蠢物，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喊着《Vive le Roi!》（“国王万岁！”）

选举。5月6日“复仇者报”⁴¹³。

杜弗尔先生的出版法（4月8日）。公开宣布是为了对付外省报纸的“过激言论”。

其次是在外省进行的大批逮捕。外省被置于**嫌疑犯处治法**⁴¹⁴统制之下。

对外省的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

4月23日。**哈佛尔讯。**市镇参议会曾派出三个参议员前往巴黎和凡尔赛，其使命是进行斡旋调停，以便在维持共和、赋予全法国以市镇选举权的基础上结束内战……4月23日，皮卡尔和梯也尔接见了里昂来的代表——他们的答复是：“不惜一切战争到底。”

里昂代表们的呈文于4月24日由格雷波提交议会⁴¹⁵。

外省各城的市镇参议会派代表团到凡尔赛去请求当局答应巴黎所提出的要求，这是极大的冒犯行动；全法国没有一个市镇发出赞许梯也尔和“地主议会”的行动的声明；各省的报纸，据杜弗尔在发给各地总检察官的反对议和的通告中抱怨说，也像这些市镇参议会一样，

“竟把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和自行僭位的巴黎公社相提并论，并且斥责前者没有承认巴黎的市政权等等”，

而更糟的是，这些市镇参议会，例如**奥希的市镇参议会**，

“一致要求它立即向巴黎提出停战，并要求2月8日选出的议会自行解散，因为它的任期已满”（杜弗尔4月26日在凡尔赛议会的发言）。

应当记住，这些还都是旧的市镇参议会⁴¹⁶，而不是在4月30

日选出的市镇参议会。它们派出的代表团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梯也尔决定不再亲自接见它们，而指派一个内阁助理去接待它们。

最后，4月30日的选举——这是对国民议会和对产生国民议会的那次突然选举的最后判决。如果说，各省到这时为止只对凡尔赛进行消极的抵抗，没有以起义来支持巴黎，这是由于旧政权在各省仍然保有据点，帝国使外省陷入了昏迷状态，而战争又使这种状态维持下来。显而易见，矗立在外省和巴黎之间的仅仅是凡尔赛军队、凡尔赛政府和谎言的长城。一旦这条长城坍塌下来，外省和巴黎便会联合起来。

最突出的特点是：这些人（梯也尔等这一伙人）因为普选权在共和制度下仍可能给他们带来不测风云，所以在1850年借助一次议会阴谋取消了**普选权**（波拿巴当时帮助他们，以便使他们落入圈套，使他们陷入完全听凭他摆布的境地，以便在 coup d'état（政变）之后宣布他自己不顾秩序党及其议会的反对，恢复了普选权）；而现在，当普选在波拿巴统治下已经被弄成了仅仅是行政当局手中的玩物，仅仅是行政当局从事欺骗、意外行动和弄虚作假的机器之后，同是这一帮人又成了普选权的狂热拥护者了，他们把普选作为自己对付巴黎的“合法”依据。（**城市联盟代表大会**）（5月6日“号召报”！）⁴¹⁷

特罗胥、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外省人

有人可能要问，像梯也尔、法夫尔、杜弗尔、加尔涅—帕热斯（另外只有少数几个同类的流氓）这批衰朽不堪的议会小丑和阴谋家，怎么会在每次革命之后不断重新浮到表面上来，篡夺行政大权呢？这帮一贯利用革命和叛卖革命、枪杀实现革命的人民、夺回人

民从以前各届政府争得的少数自由主义让步的人们，怎么能做到这点呢？（他们自己就曾反对这些让步。）

这很简单。首先，那些人尽管非常不得人心，像二月革命后的梯也尔那样，而人民出于宽宏大量还是把他们放过去了。每次人民顺利起义以后，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就喊出和解的呼声，这种呼声在人民陶醉于自己胜利的最初阶段得到人民的响应。在这最初阶段过去之后，只要人民还掌握物质力量，像梯也尔和杜弗尔这种人就隐蔽起来，暗中干他们的勾当。一旦人民被解除武装，他们立刻重新抛头露面，并被资产阶级捧为他们的 *chefs de file*（头领）。

或者是像法夫尔、加尔涅—帕热斯、茹尔·西蒙等人（另外还有几个较年轻的同类人物）和9月4日以后的梯也尔本人那样，原先是路易—菲利浦治下的“体面的”共和反对派，后来是路易·波拿巴治下的议会反对派。他们在革命把他们推上台时自己奠定的反动制度，保证他们获得反对派的地位，而对真正的革命家则加以流徙、处死和放逐。人民忘记他们的过去，中等阶级把他们看做是自己人；他们的声名狼籍的过去既被遗忘，于是他们又出来重新开始他们的叛卖活动和无耻勾当。

5月1日深夜：克拉马尔村已落入军队手中，火车站在起义者手里（这座车站控制着伊西堡垒）。第二十二猎兵营突然出现（值勤哨兵把他们的侦察队放了进来，因为口令已被叛徒泄露给他们），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多数在床上酣睡的守军，只俘掳60人，用刺刀挑死起义军300名。而且俘虏中的常备军士兵随后不经审讯即被枪决。梯也尔在他5月2日给各省长、民政当局和军事当局的通告

中厚颜无耻地说:

“它(公社)逮捕了一些将军(克吕泽烈!)只是为了要枪毙他们,它组织了一个完全不像样的社会拯救委员会!”

拉克雷特尔将军指挥下的军队以 coup de main (奇袭)占领了位于伊西堡垒和蒙鲁日之间的**木兰—萨克多面堡**。守军由于指挥官**加里安**叛变、把口令出卖给凡尔赛军队而遭到了突袭。150名公社社员被刺刀挑死,300余名被俘。“泰晤士报”的记者说,梯也尔先生在应当表现坚决的时候很软弱(这个懦夫在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危担惊的时候永远是软弱的),而在可用某些让步取得一切的时候却又很坚决(这个流氓在他使用实力屠杀法兰西、大模大样地装腔作势而个人又能确保安全的时候,永远是坚决的。他的全部智力就在于此,像**安东尼**所说的那样,梯也尔是一个“正人君子”^①)

梯也尔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5月4日):

“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凡尔赛人装扮成国民自卫军。”) (“大多数的公社社员正在酣睡,在睡梦中被杀或被俘”。

皮卡尔:“我们的炮兵没有轰击,但是诚然射击过”(皮卡尔的报纸“市镇通报”)。

“被关在囚牢中的奄奄一息的**布朗基**、被宪兵砍头的**弗路期斯**、被维努亚下令枪决的**杜瓦尔**,在10月31日曾把他们抓到手中,但并没有伤害他们。”

^① 见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第三幕第二场(安东尼关于布鲁土斯的话)。——编者注

公 社

1. 为工人阶级采取的措施

面包工人的夜班工作被禁止(4月20日)。

在公、私工厂里,废除了厂主等(制造商)(大小雇主)擅自僭取的私人裁判权(这些厂主在诉讼中身兼法官、执行吏、胜利者和当事人);废除了他们擅自制定使他们能够用罚金、扣款等处分来掠夺劳动者工资的刑法典的权利;雇主违反这条法令时将受处罚;3月18日以后勒取的罚金和扣款必须发还工人(4月27日)。当铺里的典当物品停止出售(3月29日)。

巴黎的一大批作坊和工厂已经关闭,因其所有者业已逃跑。这是工业资本家的老办法,他们认为,“根据政治经济学规律的自发作用”,他们不仅有权利从工人劳动中汲取利润,把这当做工人劳动的条件,而且有权利截然停工,把工人抛到街头——在任何胜利的革命威胁到他们“制度”的“秩序”的时候制造一次人为的危机。公社非常英明地任命了一个公社委员会,由它同各行各业选出的代表合作,共同商讨如何把业主遗弃的作坊和工厂转交给工人合作团体,并给予逃亡的资本家以若干补偿(4月16日);(这个委员会还负责统计被业主遗弃的工厂的数目)。

公社向各区政府下令,在发放75生丁的补助金时,对国民自卫军的所谓非正式配偶、母亲、寡妇,应一视同仁,不得有所区别。

至今在巴黎专为“秩序人物”蓄养的公娼——但为着这些人物

的“安全”起见曾被置于警察淫威的人身奴役之下，——公社把她们从这种含垢忍辱的奴隶处境中解放了出来，而且扫除了培植卖淫制度的土壤和人物。那些高级娼妓——荡妇们——在秩序的统治下当然不是警察和官长们的奴隶，而是他们的主人。

当然，公社没有时间来改组国民教学（教育）；但是，公社清除了其中的宗教和教权主义成分，因而在人民的思想解放上开了一个端。它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组织（初级的和职业的）教育（4月28日）。公社下令，所有学习用品如书籍、地图、纸张等等，概由学校教师分别向所属的区政府领取，然后免费分发给学生；任何教师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向学生收取这些学习用品的费用（4月28日）。

当铺：凡1871年4月25日以前典押的价值不超过20法郎的衣物、家具、内衣、书籍、被褥、劳动工具，可以从本年5月12日起凭当票无偿取回（5月7日）。

2. 为工人阶级，但主要是为中等阶级采取的措施

4月份以前的最近三个季度的房租全部免缴：凡已付出这三个季度中任一季度的房金的人，有权把这笔付款转作今后的预付房金。此项法令也适用于有家具设备的公寓。房主限令房客搬家的通知，在未来的三个月内无效（3月29日）。

Échéances（到期票据的支付）（票据满期）：对过期票据暂停追索（4月12日）。

所有这一类商务票据从本年7月15日起在两年内（分期分批）偿还，债款不得索取利息。到期的债款总额均分为八份，按

每三个月为一期逐期支付（第一期从7月15日起）。只有这些应分批偿付的债款逾期未付时，才允许根据法律进行追索（4月16日）。杜弗尔的租借和期票法已经使巴黎大多数的循规蹈矩的店主陷于破产。

直到今天以前利用职务发财的公证人、法警、拍卖人、捕役以及其他司法官吏，都转变为公社的公职人员，像其他工人一样从公社领取固定的工资。

由于医学院的教授们已经逃走，公社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建立一些不再寄生于国家的**自由大学**；给予考试及格的大学生们以行医的条件，不论有无医学博士学位（学位由学院授予）。

由于像其他司法人员一样始终愿意在任何阶级政府下供职的**塞纳省民事法庭**的法官们，已逃亡一空，公社任命了一位律师来处理最紧迫的事务，直到各级法庭通过普选改组后为止（4月26日）。

3. 一般措施

废止征兵制。在当前的战争中，每个能服军役的人都应服役（国民自卫军），这是清除所有隐藏在巴黎的奸细和懦夫的最好措施（3月29日）。

禁止赌博（4月2日）。

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宗教预算；全部教会产业被宣布为国家财产（4月3日）。

公社根据私人报告进行了调查，发现“**秩序政府**”在原有的一架断头机以外，又下令制造一架新的（更合用、更便于搬运的）断头

机，并且预付了造价。公社下令在4月6日将新旧两架断头机当众烧毁。凡尔赛的报纸，在全世界的“秩序”报纸的呼应唱和下，把这件事说成这样：巴黎人民所以烧毁这两架断头机，是为了对公社委员们的嗜血行为表示抗议！（4月6日）三月十八日革命之后，所有政治犯被立即释放。但是公社知道，在路易·波拿巴及其宝贝继承者国防政府的统治下，很多人并没有任何罪状，纯粹出于政治嫌疑而被禁锢在牢狱之中。因此，公社责成它的一位委员——普罗托进行调查。他开释了150名已被囚禁六个月而始终没有受过一次审讯的人；其中很多人还是在波拿巴统治时被捕的，他们已被囚禁一年，但没有任何罪名，也没有经过审讯（4月9日）。这个最足以说明国防政府特征的事实，使他们暴跳如雷。他们咬定公社释放了全部罪犯。但是究竟是谁释放了已定罪的呢？是伪造文件犯茹尔·法夫尔。他上台之后坐席未温，就赶紧释放了在“旗帜报”事件中因盗窃和伪造文件而被判刑的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泰费尔，竟然胆敢返回巴黎，但是他被重新送回到适合他身分的住所里。不仅如此，凡尔赛政府还释放了全法国的Maisons Centrales（各中心监狱）里的被判罪的小偷，条件是参加梯也尔先生的军队！

下令毁除旺多姆圆柱，因该柱

“纪念野蛮行为，象征粗暴武力和虚假荣誉，推崇军国主义，否定国际权利”（4月12日）⁴¹⁸。

弗兰克尔（德国人，国际会员）当选为公社委员一事被宣布有效：“因为巴黎公社的旗帜就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外国人能成为公社之一员”（4月4日）⁴¹⁹；稍后，弗兰克尔被选为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4月21日）。

“公报”开始公布公社会议的记录(4月15日)。

巴斯噶尔·格鲁赛颁布保障外国人财产免受征用的法令。巴黎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样礼遇外国人(4月27日)。

公社废除了政治宣誓和职业宣誓(5月4日)。

拆除圣奥诺莱区昂茹街上的(1816年 chambre introuvable (无双议院)建立的)名为“路易十六赎罪教堂”的纪念建筑物(5月7日)。

4. 公安措施

解除“忠诚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3月30日)。

公社宣布,公社的队伍里不允许既在公社占有席位,又在凡尔赛议会占有席位(3月29日)。

报复法令。从未执行。被捕的只有神职人员:巴黎大主教和马德兰教堂主持;耶稣会教团的所有头目;所有主要教堂的受俸神甫;这些人一部分是作为人质被捕,一部分是由于与凡尔赛方面串通,再一部分是由于企图逃避把教堂财产交给公社(4月6日)。

“保皇党人作战如同野人;他们枪毙俘虏,杀害伤员,炮轰野战医院,他们的军队把枪托举到空中,然后阴险地突然开火。”“公社的公告”⁴²⁰。

关于这些报复法令,应当指出:

首先,巴黎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在资本家、有闲者、寄生虫们出走之后,除巴黎的僧侣之外,都向凡尔赛交涉要求停止内战。巴黎大主教和马德兰教堂主持只是在成为人质之后,怕“他们自己流血”,才给梯也尔写了信。

其次,在公社公布关于报复、拘捕人质等法令之后,比埃特里

手下的羔羊和瓦伦顿手下的宪兵并没有停止残暴虐待凡尔赛手中的俘虏,对被俘的巴黎士兵和国民自卫军的屠杀只是暂时中止,但在凡尔赛政府一看到公社宽厚过分,不会执行它的四月六日法令时,便立即加倍凶狠地恢复屠杀。这时,大规模的屠杀又重新开始。公社没有处决一个人质,一个俘虏,甚至那些化装成国民自卫军潜入巴黎充当间谍的宪兵军官也未处死,只将他们逮捕而已。

克拉马尔多面堡被突袭(5月2日)。火车站**在巴黎人手中**,屠杀,用刺刀挑死,第二十二猎兵营(加利费?)不经过任何手续就地枪毙常备军士兵(5月2日)。位于伊西堡垒和蒙鲁日之间的**木兰—萨克多面堡**,由于指挥官**加里安叛变**,把口令出卖给凡尔赛军队,而在夜间遭到突袭。公社社员在床上酣睡时突遭袭击,他们的大部分被屠杀(5月4日?)。

4月25日,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此事已被公社派往比塞特尔的特派代表们证实,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地方遭残害的四人中仅存的一人在那里,他的名字叫**舍弗尔**)。这四名士兵被骑兵包围了,由于无法抵抗,在骑兵迫令下投降,并被解除武装。这些骑兵丝毫未伤害他们。但是骑兵队长随后跑来了,用手枪把他们逐个击倒。他们被弃置原地。舍弗尔身受重伤,但得残存。

十三名在克拉马尔火车站被俘的常备军士兵被就地枪毙,解到凡尔赛的所有穿常备军制服的俘虏,一俟他们的身分核对清楚也将被处决(凡尔赛的“自由报”)。目前正在凡尔赛的小仲马叙述说:一位虽然没有将军头衔但执行着将军职务的年轻人,被押解着沿一条道路才走了几百码,便被一个波拿巴的将军下令射杀。宪兵把巴黎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包围在一些住宅中,将房屋浇上煤油,然后纵火焚烧。一些国民自卫军士兵的尸体(被烧焦的)被

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出（4月20日“口令报”）。“他们无权得到救护。”

梯也尔、布朗基、大主教、尚济将军。（梯也尔说，他的波拿巴分子们宁愿被枪毙。）

搜索住宅等等。卡季米尔·布伊被任命为一个调查团的主席，调查9月4日独裁者们所干的勾当（4月14日）。私人住宅被搜查，文件被没收，但家具未搬走，也未被拍卖。（被没收的文件是属于9月4日人物、梯也尔等人以及波拿巴警察的。）例如在监狱总督察拉丰私邸中的搜查（4月11日）。梯也尔一伙因为是卖国贼，他们的住宅（财产）受到搜查，但是只有文件被没收。

在自己内部的逮捕：这使特别需要政治偶像和“大人物”的资产者为之大吃一惊。

（5月6日“每日新闻”巴黎通讯）“不管公社掌握的是怎样一种权力，但是这个权力经常在易手，我们今天不能知道明天大权将操在谁的手中，这种情况令人恼怒，然而也令人沮丧…… 在这一切无穷无尽的更替变动中，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缺乏一只手来总理一切。公社是一簇等量原子的聚集体，他们彼此相互猜忌，没有一个人被赋予约束别人的最高权力。”

封闭报纸！

5. 财政措施

见5月6日“每日新闻”。

主要开支用于战争！

从没收得来的只有8928法郎，并且全部取自神职人员等。

5月6日“复仇者报”。

公 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色当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土鲁斯等地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⁴²¹。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9月4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没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当时的运动领袖们轻信了这些 gens de paroles (说话算话的人),这些人当时曾立下 parole d'honneur (信誓):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所有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领袖们刚一允许特罗胥和费里逃命,后者就开来了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向他们突袭。应当记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没经过一次全民投票的笑剧⁴²²。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中间仅有的一个人不愿食言而提出辞职^①的机会,用任命克列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办法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起的作用正像科西嘉 spadassins

① 塔米济埃。——编者注

(匪徒) 替路易·波拿巴起的作用一样；对于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们，当时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利用中等阶级对于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胆小恐惧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以便制造一个盲目反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企图保持他们篡夺的政权的一贯手法。因为他们在 9 月 4 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所以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反动恐怖时期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一个伪造的民意批准。

如果 1870 年 11 月初在巴黎胜利地建立了公社（当时，法国其他各大城市已开始成立，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的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奋发的热情，正如目前巴黎的英勇斗争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的战争，高举起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的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它可能像电流似地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群众，而不会派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 10 月 31 日的公社**受骗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的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次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9 月 4 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得以恢复；它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这种抵抗是在它的敌人领导下进行的——从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了这个共和；而且，这一革命还在向工人阶级的心灵逐步深入。共和不再是某种已经过去了的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阴险的律师和花言巧语的辩客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向世人遮蔽起来，但是却一

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断时续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断断续续的运动中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国防政府和“投降计划”的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使用手法使它流产;最后公社终于在3月26日胜利地宣告成立,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 coup d'état (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有生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限制为只是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立奋斗。

国防政府只是在最初意外的情况下,作为一种 pis aller (下策)、作为战争中的必要措施才被容忍的。而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有生力量(除了波拿巴主义的支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骗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争得了它反对串谋的首次胜利,但是这一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 capitulards (投降派)的僭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来本来属于他们的、因而在投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

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 *de facto* (实际上) 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Capitulards 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对普鲁士的投降一举控制巴黎。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这一点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强加在他们身上——就是要 4 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 30 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这 4 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 巴黎根据一项非常简单的计划，在现行军事组织上增加了一套政治的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选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选出总代表、团长，由他们来代表一个区，和其他 19 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 20 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 3 月 18 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至今还坚持着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在选拔上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他们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种种劣迹和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声名显赫的人物——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还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这种指责。

公社的性质

以其无孔不入而且极其复杂的军事、官僚、僧侣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一样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僧侣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从属物;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官吏代替封建显贵,把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系统的按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统一计划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疆域的、城市的、省份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这一政权的辖制范围和职能,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这种威势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的天堂及其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起来,成为独立于社会之上又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交由那些担任经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

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 1848 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它们的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摈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君主专制时代,它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而且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用来对外攻击,用来为法国在大陆上建立大体与法国相仿佛的一些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强力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且成为补充直接经济剥削的第二重剥削人民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最后,在 1848 年革命斗争时期,它成为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制度、愚民的僧侣、奴性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脱离社会已经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低能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这时,它已无需乎用旧欧洲为反对 1789 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的武装同盟来作借口了。它看起来不再像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了。这种国家政权在第二帝国得到了它的最后、最高的表

现：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付薪俸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的装饰性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了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生产者的“秩序”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来掩盖今天的贪污腐化的闹宴，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下流勾当的万恶渊藪。乍看起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于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分子的胡作非为。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是以超越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治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耻辱，也给受它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耻辱。

9月4日只是击败那个曾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和国重新恢复。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面，也就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面，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强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利用来把国家政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

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夺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作为求解放的口偈加以热烈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中的虚幻错觉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它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后可能形式。它虽然剥夺了统治阶级以前的政治地位，但却是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种种败德辱行可以放肆发展的闹宴。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创始一个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是第二帝国的消极经济基础；那个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它最后的一次胜利的。只有因对全社会负有新社会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无产阶级，即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命的无产阶级，才

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组织起来的窃居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充当社会公仆的政府权力。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着农民消极支持同无产阶级进行的积极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最露骨淫贱的形式。第二帝国是在反对无产阶级中产生的。摧毁它的也是无产阶级，但无产阶级摧毁它，并不是把它当做政府（集中化）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强大的、外表上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形式，因而也就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的集中表现是对内腐败透顶，对外昏愤无能，从头到脚卑鄙齷齪。

但是，当阶级统治的这样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了。它的最后的和最发达的时期是从1848年5月到 coup d'état (政变) 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议会制的帝国，正是这个制度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的议会制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家已照这种式样加以复制，——但它也只是一种笑剧，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而已。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寿终正寝了，工人阶级革命当然不会去复活它。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

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過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从它的敌人的政府下解放出来……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当局(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⁴²³

(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它立刻消除捐税和国情的这种根源和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篡夺政府的这种经常危险。)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而且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也不可能维持耗费资财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了血税和那要求无止境地增加一切国税和国债的根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一大幸运,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了“独立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贼匪。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以议会方式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高俸厚禄的阿谀之徒、闲职大员等高位权贵们,这个阶层从群众中吸取有教养的分

子,并利用他们去反对居于等级社会下层的群众自己。现在这种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 12 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 240 英镑;根据一位科学界权威赫胥黎教授的估计,这种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所谓国家事务的神秘性和特殊性这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它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它的工作;它像密尔顿写他的“失乐园”一样所得的报酬只是几英镑;它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刚愎自用,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混乱情况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管公社的个别措施的价值如何,公社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理论。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已被俘获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而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率先领导起社会运动,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末,任何政府

Latin Reason - the personal force of the word analysis, of the solution of labor from the ^{reality} suspension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means of labor, caused by the laborer himself or forcing the gift of nature as the secondary and subordinate we will the real life
of the religious, which comprises quiet eyes of the dream, as the political journey in force and person of the State
of things, as the line or at the level of things, as the fact of general repetition of the political steps
expressed as ways of actions. It takes its own way with its steps, substance before the work itself, thus it is the
of these and therefore of all these (how it does not repeat a particular which it repeats the substance of labor, it is the fund
without ending of individual life, whenever by regular, fixed, individual actions, one is absorbed
from the law of the work, but it is that the individual interest exists without stop in one step is different step
in particular actions only. It is not the substance itself and not only. It is the substance itself
just yet is by doing with the substance and not only of the substance itself by repeating the substance
of labor only in the substance itself with substance of the substance itself by repeating the substance
the substance of labor itself and not only of the substance itself by repeating the substance
doing with the substance itself and not only of the substance itself by repeating the substance
repeating of labor itself and not only of the substance itself by repeating the substance

法兰西内战“初稿中的一段手稿

都不可能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行动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会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会代替常备军;大批国家寄生虫会被排除;教师会代替僧侣等级;国家法官会改换为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会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务会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务。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篡夺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的政治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篡夺、欺骗、权诈才能由少数人把它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公社以下述措施来开始**解放劳动**——它的伟大目标:它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为非作歹的活动,杜绝把大宗国民产品浪费在供养国家恶魔上的根源,另一方面,以工人的工资执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实际行政职务。由此可见,公社是以大规模的节约,不但以政治改造,而且以经济改革来开始其工作的。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使社会革命加强武装，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这里不仅需要改变分配方法，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勿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续、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农 民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缴付。”⁴²⁴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

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缴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末，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费用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在经办这笔生意上牟利。由谁来清偿战费，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切身攸关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它首先代表着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地主议员”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税就会转嫁到他们的肩头。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重复着“地主议员”的叫喊说：他们——大地主们——“代表农民”，这种农民当然出于心地质朴，非常急切地想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十亿赔偿金——革命赔偿金⁴²⁵的好“地主们”再缴纳几十亿战争赔款。

正是这一批人对农民增收了45生丁的附加税⁴²⁶，用这种办法蓄意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用革命的名义、用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增加这笔税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的肩头上卸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的！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在农民身上。秩序党要派税吏牢牢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使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盘踞在他们那小块土地上的典押债魔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工作人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

要捣毁这个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的全部司法蜘蛛网，即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打算盘的人！如果神职人员的薪俸不再由税吏向他们威逼勒索，而是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宗教本能的“自发行动”，他一定会认为这样非常合理！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然而第二帝国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 1849 年和 1850 年，法国农民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己本身对抗政府的宪兵，这样他们就开始表示出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秩序党在 1849 年、特别是在 1850 年 1 月和 2 月颁布的各项反动法令⁴²⁷，按其质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里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末 *coup d'état*（政变）之后，法国若干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恰恰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第二帝国是建立在将错觉人为地培育为力量的基础上，建立在传统偏见的基础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的基础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地主议员、砦堡领主、榨取 10 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所有主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下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

自然结果。地主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的三个月统治，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举行反对他们的起义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会很快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改变为自由联合的劳动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制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即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还是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的、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那种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的阶段。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 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了。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已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缠附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种种巧取豪夺，把他们压低到印度农民的地位；

同时，他们随时随刻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和被贬到农村无产者的地位。因此，造成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隔阂的东西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是唯一即使在其目前经济条件下也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末，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他们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遭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榨取、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保留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党在它的随从仆役、娼罗、国家寄生虫、mouchards（侦探）、“荡妇”，以及那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的补充的下等流氓（一般刑事犯）跟随下，已离开了巴黎（从巴黎出走）。但是，中等阶级里面的真正有生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并且带着他们的真正特色挺身而出。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⁴²⁸，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代表着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 社会各阶级的公社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是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斗，凡尔赛是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斗；“地主议员”最焦虑的是怕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做他们的《taillable à merci et miséricorde》（“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的周围，他们宣布这个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里，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们立刻在1848年9月19日由于《concordats à l' amiable》（“友好合同”）429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暴露它同时也是债主的胜利，是富有的资本家对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他们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①。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第二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滥用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股票经纪人、铁路大王、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编者注

Crédit Mobilier (动产信用公司) 之类诈骗公司的掠夺, 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 (股份公司) 的抢劫。如果说, 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 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 那末, 它在精神上则被这个制度的无耻闹宴所激怒。战争中的种种丑行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 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 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 这个中等阶级感到: 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 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他们感到: 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 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 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 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 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 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社会 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正像第二帝国曾经破除了对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无组织的“普选”的幻想一样, 这次内战破除了对“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力量都承认: 在法国和在欧洲, 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 这种共和国应该夺去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 而代之以公社; 公社应该公开宣布“社会解放”为共和国的伟大目标, 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任何别种共和国只能是以跨进某种形式的帝国为其最后目标的所有保皇党派——联合在一起的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

巴派——的**无名恐怖**，只能是干完了自己的肮脏事以后总要以帝国告终的**阶级统治的无名恐怖**！

地主议会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 1848—1851 年的试验、镇压巴黎的内战熟视无睹，而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之需要共和，只是把它当做一种阴谋组织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在 1848 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由于六月起义被镇压，他们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扫清了建立**无名统治**的道路时为止。1871 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挤到后台，去给梯也尔的统治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 Salle des Paume（网球厅）里举行他们党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 1789 年前辈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⁴³⁰！他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耳歌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们更不用谈像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了。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样的人和“地主议员”对他们的侮辱，沉醉于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咳声叹气，使自己备蒙羞辱！

工人和孔德

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的阶段，但不应忘记，他们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

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所拒绝 431。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回答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回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

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受人民欢迎些，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良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斥为异端的。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担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进行的这一点，也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一群共和主义骗徒手里；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

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运用着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尊贵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圣，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种种辱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状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他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们管理着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总是要坚决背弃社会主义的创举的！事实上，他们确实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⁴³²。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

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但是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了，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淹没在乌托邦寓言的云雾之中了。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的那些乌托邦创造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的”，那末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 *défaillances*（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compris）：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

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制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难道他们永远不许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en s' 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他们的胜利，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⁴³³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首先是拯救法国，使它免于统治阶级强加于它的毁灭和腐化所必需的；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也说得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的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延续国际斗争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在色当之后的自卫战争中，沙文主义资产阶级到处起着瘫痪作用，于是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就暴露出来了：表现在法国的投降上，表现在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上！也表现在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

伎俩上^①，表现在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上。他们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被对外国人的蓄意迫害所迷惑，而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蓄意挑起的运动是怎样在革命的巴黎的呼声前消散（消失）的呀！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做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②（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毁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专断命令下行动起来的时候，巴黎的工人打击了他们本国的阶级统治者，从而痛击了外敌；他们争得了作为所有国家工人的先锋的地位，从而消除了派系集团！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真正的各国“民族”产业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财政、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个幌子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地主议会”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谎言了！

^① 见本卷第 312—313 页。——编者注

^② 列奥·弗兰克尔。——编者注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的全部生计被剥夺（将他们置于死地）。它取缔了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的机构。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把外省的全部权势既然这样交给了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的和资本家的巴黎的镇压，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操在农民的敌人手中的外省权力的镇压。

凡尔赛的“通报”（3月29日）宣称：

“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首先是因为巴黎宣布了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其次才是因为巴黎用这种行动发出了使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公社“公报”，4月1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权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它要为法国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争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巴黎放弃了它的表面上

大权独揽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揽事实上是巴黎滥用权力，——但它并没有放弃它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这种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已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⁴³⁴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着整个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进行战斗，作出牺牲，以此准备着法国的思想、道德、行政、经济的复兴，法国的光荣和繁荣。”（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⁴³⁵

梯也尔先生在巡游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己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桩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的老角色也与波拿巴派同流合污了。因此必须求援于乡居的正统派地主。他们一直不问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辈。就是这批人赋予了凡尔赛议会以它的类似路易十八的《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的明显性质，它的“地主议会”的性质。由于虚荣心的驱使，他们当然相信，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溃，在外国侵略者的庇护下，他们的时机终于又像 1814 年和 1816 年那样到来了。可是，他们仍然只是受人利用的工具。随他们怎样行动，他们也只能像 1848—1851 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无名的”恐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们所发表的带有自己党派特点的狂语不过为上述那种结伴合伙增添滑稽性质而已。因此，他们只好容忍贝里公爵夫人的监狱产婆当他们的首领，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义者当他们的部长。他们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是——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异配合，他们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惩罚它的背叛（République une et indivisible）（“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说法，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统一），可是他们自己的头一项举动恰恰是背叛统一，因为他们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和取消它的首都称

号”，并要把议会设在一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现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约束，而代之以封建主砦堡在本省和本地的领主权势。他们所要的是一种反动的法兰西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变成只是人为机体的统一，它依靠着宪兵和红黑军队，压制着现实社会的生活，像梦魇一样骑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种存在于法国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那些“地主议员”，他们反对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单一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孔德派的观点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现在的财产的阶级形式——一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

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的“恩德”和雇佣劳动制度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会同样地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建立在事物本性基础上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有“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预言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主张。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城市组织。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社会财产形式，绝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二月革命曾被唤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以《^fA bas les grands voleurs！
^fA bas les assassins！》（“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的呼声宣布这次革命。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贪污有更广阔的场所！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 *maison dorée*（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现身，巴黎是英勇的，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巨大任务满怀热情！陈尸场上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

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巴黎的英勇妇女代替了荡妇！刚毅的、坚定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雄伟豁达的巴黎！鉴于敌人的野蛮暴行，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巴黎所决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这批曾经掌握这座巨大城市并且把它据为私有的、无用的、多疑的、自私的败类。任何第二帝国的头面人物将无权再说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

(4月23日“真理报”)：

“巴黎的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自从公民自己担任警察职务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一次夜间抢劫事件报案。”

* 片 断

梯也尔论地主议员

这个党

“只会使用三种手段：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 这样一种政府永远不会成为法国的政府”（1833年1月5日众议院）。

国防政府

就是这个特罗胥在他的著名纲领里说：“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茹尔·法夫尔在通告里说，“决不会让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尺领土”；杜克罗也这样表示：“或死或胜，不然誓不回见巴黎”。后来杜克罗在波尔多发觉，原来他那条命还必须用来镇压巴黎“叛乱者”（这些坏蛋知道，他们在逃往凡尔赛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各种罪证带走，为了消灭这些罪证，他们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用气球发出去的告各省宣言⁴³⁶）

“迄今由帝国制度、君主制度和议会政府所强加于我们的统一，无非是专制的、违背理智的、横暴的、苛敛无厌的中央集权制度。巴黎所要的政治统一是由所有地方的起首创作用的力量的自愿联合……”所有的联合起来的公社的一种中央代表组织。“结束那属于政府和僧侣的旧世界，结束军阀结治、官僚制度，结束利用专利与特权投机取巧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一切，无产阶级才沦于奴隶地位，国家才遭受种种不幸和灾难。”（4月19日公社公告）⁴³⁷

宪兵和警察

20000 名宪兵(由法国全国各地调到凡尔赛来的,在第二帝国时总共有 30000 名)和 12000 名巴黎警察,这就是法国从来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的基干。

巴黎的共和派议员

“巴黎的共和派议员既没有对炮轰巴黎提出抗议,也没有对就地处决俘虏和中伤诬蔑巴黎人民提出抗议。相反,他们以出席会议,保持沉默,去为所有这些行为捧场,以他们作为共和派所享有的威信去支持这些行动。他们已变成了保皇党的同盟者和自觉的帮凶。我们宣布他们出卖了他们的代表当选证书,出卖了共和国。”(共和国保卫者总协会 438)(5 月 9 日)

“中央集权使巴黎陷于瘫痪,使所有其他各地丧失生气。”(拉梅耐)

“今天,一切都归于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可以这样说,就是国家本身。”(孟德斯鸠)⁴³⁹

旺多姆广场事件,等等

由各连推举代表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普军进入巴黎时,把国民自卫军自己募款铸造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些大炮和多管炮被国防政府恰好遗弃在普鲁士人即将占领的街区。

3 月 18 日清晨,政府向国民自卫军强烈呼吁,但是 40 万名国民自卫军中只有 300 人响应。

3 月 18 日晨 3 时,警察和几营常备军到达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准备突袭看守大炮的警卫兵,用强力夺取大炮。

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抵抗。常备军士兵不顾勒康特将军的威胁

和命令 levèrent la crosse en l'air (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当天,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在同一个时候被部下士兵们枪毙。

(“常备军士兵把枪托高举到空中,和起义者携起手来。”)

奥雷耳·德·帕拉丹的告捷书已经印好,关于在巴黎准备 décebrisation^①的文件也已被发现。

3月19日,中央委员会宣布解除巴黎戒严状态,20日,皮卡尔宣布塞纳—瓦瑟省处于戒严状态。

3月18日(晨:他仍相信自己可以获胜)张贴在墙上的梯也尔公告宣称:

“政府已决定采取行动。擅自企图建立政府的罪犯必须依法究办,被夺去的大炮必须交还军械库。”

到傍晚,由于夜袭已经失败,他就向国民自卫军呼吁:

“政府并不准备进行一次 coup d'état (政变)。共和国政府除了共和国的安全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目的。”

他只是要

“取缔叛乱委员会”……“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居民不熟悉的人。”

深夜,由皮卡尔和奥雷耳签署致国民自卫军的第三个公告宣称:

“一些被引入迷途的人们……顽强抵抗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政府决定让你们保持你们的武器。坚决地紧握着武器,以便建立法纪,挽救共和国,使它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

^① 意即 1851 年 12 月 2 日式的政变。——编者注

(17日,舍耳歇企图诱使他们解除武装。)

3月19日中央委员会公告:

“戒严状态已解除。兹召集巴黎人民进行公社选举。”

中央委员会在同一文件中告诉国民自卫军:

“你们曾责成我们组织巴黎的防御,保卫你们的权利……此刻我们的当选证书已告期满;我们将它交还给你们,我们不愿意占据那些被民愤刚推翻的人的位置。”⁴⁴⁰

他们让政府成员安然地向凡尔赛撤退(甚至包括那些已在他们掌握中的人,如费里)。

原定于3月22日举行的公社选举,由于秩序党的示威,延期至3月26日。

3月21日,国民议会狂呼反对在“致公民和军队(士兵)”的公告结尾处写上《Viv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万岁!”)的字样。梯也尔:“这可能是一个很合法的提议”云云(“地主议员”的异议)。茹尔·法夫尔大声疾呼,反对共和国高于普选权的说法,向“地主议员”的多数献媚,用普鲁士的干涉来威胁巴黎人民,并挑起——秩序党的示威。梯也尔:“无论如何,他不会派遣武装力量去攻击巴黎。”(当时做不到,因为还没有军队。)

中央委员会对于自己的胜利是如此无把握,以致他们急切地接受了巴黎的区长们和代表们的调停……梯也尔的固执使它(委员会)多维持了一两天,而这时委员会认识了自己还有力量。革命者犯了无数错误。他们不去解除警察的武装,反而给他们打开大门;他们奔向凡尔赛,在那里被当做救星来欢迎;让第四十三常备团撤离巴黎;把所有和人民联欢的士兵都遣散回家;允许反动派就

在巴黎中心组织起来；不去惊动凡尔赛。特里东、雅克拉尔、瓦罗兰、瓦扬认为必须立刻赶走保皇派……法夫尔和梯也尔拚命向普鲁士当局乞求援助……以便镇压巴黎的起义运动。

特罗胥和克列芒·托马一心一意想阻挠国民自卫军加强武装、加强组织的一切试图。中央委员会已决定准备向凡尔赛进军并开始行动，这件事公社并不知道，甚至是和公社明确表示的意愿直接违背的……

贝热瑞……由于蒙瓦勒里安以及设在库尔贝瓦的炮台，公社士兵不能固守住讷伊桥，但他不把这座桥炸毁，结果保皇派得以占领这座桥，在那里加强防御工事从而保持一条通向巴黎的交通路线……

正如李特列先生在一封信里所说（4月20日“每日新闻”）：

“既然巴黎被解除了武装，既然巴黎被维努亚、瓦伦顿、帕拉丹之流缚住了手脚，共和国已被断送了。巴黎人已了解到这点。面临着不战而降和冒险投入一场结果难料的可怕斗争的抉择，他们宁愿战斗；而我不得不为此对他们表示钦佩。”

向罗马进军，是卡芬雅克、茹尔·法夫尔和梯也尔干的事情。

“一个具有共和政体一切内部优点和君主政体外部力量的政府。我指的是**联邦共和国**……这是一个由许多社会组成的新社会，它能够随着新加入的成员的数目的增加不断扩大，直到它的力量增强到足以保证其成员的安全。这类共和国……能够维持其巨大规模，**内部也不会腐化**。这种社会的形式能防止一切困难。”（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9章第1节）⁴⁴¹

1793年宪法⁴⁴²：

第七十八条——共和国每一市镇设市镇行政机关；每一专区设中介行政机关；每一省设中心行政机关。**第七十九条**——市镇官吏由市镇会议选出。**第八十条**——地方行政官吏由省的和专区的复选人会议选任。**第八十一条**——

市镇政府和行政机关每年更换其成员的半数。

执行委员会。第六十二条——由二十四名委员组成。**第六十三条**——每省的复选人会议选出一名候选人。立法团从总名单中选择委员会成员。**第六十四条**——执行委员会在每届立法团任期的最后一个月会议上更换其成员的半数。**第六十五条**——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监督总政务。**第六十六条**——执行委员会在其成员之外任命负责共和国总政务的首脑官吏。**第六十八条**——这些首脑官吏并不组成一个委员会，他们是分立的，彼此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权力。**第七十三条**——执行委员会可将其所任命的官吏免职和撤换。

巴黎的秩序党一方面受到了茹尔·法夫尔在国民议会中发出内战号召的鼓动——他说普鲁士人已提出威胁：如果巴黎人不立刻投降，就要进行干涉——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人民对他们的忍耐和中央委员会对他们采取的消极态度，因而大胆决定进行一次 coup de main (突袭)；于是他们就在 3 月 22 日在和平游行——反对革命政府的和平示威的幌子下，闹了起来。这的确是一次奇特无比的和平示威。

“整个运动好像是突如其来的。对它事先毫无防备。”

“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在他们的前列有埃克朗、科特洛贡和昂利·德·佩恩等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一群人对个别的国民自卫军哨兵(岗哨)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哨兵们奔回旺多姆广场，国民自卫军立刻从广场开向新小田街。与骚动者相遇时，他们奉命不得开枪，而骚动者却叫喊着“打倒杀人犯！打倒委员会！”前进，侮辱国民自卫军，夺取他们的枪枝，用手枪向公民马尔儒纳尔(旺多姆广场参谋部的中尉)(中央委员会委员)射击。贝热瑞将军要骚动者撤退(解散、后退)。大约经过五分钟击鼓和 sommations(相当

于英国的宣读骚扰取缔令)⁴⁴³。他们以诬蔑的叫嚣作答。两名国民自卫军受重伤倒下。这时，他们的战友们还犹豫不决，向天空开枪。骚动者企图强行冲破警戒线，并解除他们的武装。贝热瑞下令开枪，那些胆小鬼就飞奔窜逃。meute (骚动) 立即被粉碎，射击也停止了。有人从几所房子里向国民自卫军开枪。两人——瓦兰和弗朗所瓦——被打死，八人受伤。在那些“和平人士”作鸟兽散的街道上，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和手杖刀(在和平街上可以拾到许多)。莫利奈子爵从背后(被他自己的人)击毙，身上还发现有一柄用链条系住的匕首。

集合的军鼓敲过了。在这次“徒手”示威通过的街道上扔着许多手杖刀、手枪、匕首。在起义军未接到向这群人开枪的命令以前，对方已用手枪射击。示威者就是进犯者(谢里敦将军从窗口亲眼看到这种情况)。

这不过是用手枪、手杖刀和匕首武装起来的巴黎反动派企图达到维努亚以他的市警、士兵、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达到的目的。巴黎的“下等人”竟然不让巴黎的“绅士们”解除他们的武装，这真是太糟了！

1849年6月13日，当巴黎国民自卫军为了抗议法国军队进攻罗马的罪行，举行一次真正“徒手的”、“和平的”示威游行的时候，尚加尔涅将军用刀斩、枪击的手段对付他们，他的密友梯也尔对他倍加称赞。宣布了戒严，新的镇压法令，新的流放，一个新的恐怖统治！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不去做这些事，却在这次冲突中严格地保持守势，允许袭击者(带着匕首的绅士们)安静地回家去；由于纵容了他们，又没有向他们追究这次冒险行动的责任，以致他们胆大到竟敢在两天以后，在凡尔赛派来的海军上将

赛塞指挥下，又一次纠合起来，再度试图发动内战。

而这次旺多姆事件却在凡尔赛激起了一阵响彻全世界的“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的叫喊。请注意，甚至梯也尔，尽管他老是谈论两个将军被杀害事件，但一次也不敢向外界提起这次“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的事件。

正像在中世纪那样，只许骑士对平民使用任何武器，而不许平民进行自卫。

（3月27日。凡尔赛。梯也尔：

“有人指责我在谋求建立君主制，我正式否认。当我就职时，共和国已是一个既成事实。在上帝和人面前，我宣布我决不出卖它。”）

在秩序党第二次暴动后，巴黎人民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中央委员会甚至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不听它那些最有毅力的成员的劝告，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而凡尔赛当时在海军上将赛塞逃亡和秩序党的国民自卫军可耻失败以后，正惊慌失措，乱成一团，因为那里还没有组织起任何抵抗力量。

在公社选举时，秩序党通过投票又进行了较量，他们在再度失败之后，完成了从巴黎的大出走。在选举进行中，资产阶级分子（在区政府院子里）与国民自卫军起义者握手言欢，但他们私下所谈的不外是“大批处决”、“多管炮”、“放逐到凯恩去受煎熬”、“集体枪杀”。

“昨天的逃窜者今天想用甜言蜜语把市政厅中的人们稳住，以待聚集在凡尔赛的地主义员们和波拿巴的将军们有足够力量对他们开火。”

梯也尔通过4月2日事件第二次对国民自卫军开始了武装攻击。战斗在靠近巴黎的库尔贝瓦和讷伊之间进行。国民自卫军被打败，讷伊桥被梯也尔士兵占领。从巴黎出击并一度占领库尔贝

瓦、皮托、讷伊桥的几千名国民自卫军失利。许多人被俘。许多起义者被当做叛逆立即枪杀。凡尔赛军队首先开的火。

公社：

“凡尔赛政府已向我们进攻。它不可能指靠军队，所以派遣了沙列特的教皇的朱阿夫兵、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瓦伦顿的宪兵去轰击讷伊。”⁴⁴⁴

4月2日，凡尔赛政府派出了主要是由**宪兵、海军陆战队、林警、警察**组成的一师军队。**维努亚**率领两个步兵旅、**加利费**率领一个骑兵旅和一个炮兵连向库尔贝瓦推进。

巴黎。4月4日。米里哀尔。（声明）

“巴黎人民没有任何进攻意图……这时政府命令由前帝国士兵组成的御用军队，在前参议院议员统率下向巴黎进攻。”⁴⁴⁵

“法兰西内战”二稿

(1) 国防政府。巴黎的议员特罗胥、 法夫尔、皮卡尔、费里

巴黎工人在 9 月 4 日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受到了法兰西举国一致的欢迎。以巴黎的抵抗为基础（核心）的五个月的防御战争，为共和国争得了存在的权利。如果没有这次以共和国名义进行的防御战争，征服者威廉^①是会恢复他的“好兄弟”路易·波拿巴的帝国的。在巴黎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囚禁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巴黎的惊慌无备的时刻，有一伙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擅自在市政厅里就职。梯也尔、茹尔·法夫尔、皮卡尔之流在当时是这样地深信巴黎负有领导法国的历史使命，他们竟举出了他们曾在 1869 年被选入立法团的事实，来证明他们有资格组成国防政府。

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前次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了^②。如果说，他们没有征询巴黎的意见就攫取了政府，那末，巴黎也没有理会他们的抗拒

① 指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法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征服者威廉”，于 1066 年征服英国，马克思在这里作了讽刺性的对比。——译者注

② 见本卷第 292 页。——编者注

而径自宣布成立了共和国。而他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去向欧洲各国的宫廷乞求,如果可能,就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来买得外国的调解。巴黎之所以容忍这些人的统治(容忍他们僭取政权),是因为这些人曾郑重其事地宣誓保证:只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认真保卫巴黎,就只有(不能不)武装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国民自卫军,并使他们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可是,武装巴黎就无异是武装社会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人就无异是共和国战胜法国的阶级统治。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里承认,特罗胥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了;于是特罗胥当着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的面,向巴黎区长会议讲了如下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巴黎有没有些许可能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做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我一直是坚持着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抵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安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断。”

(特罗胥的这篇简短的演讲词,在停战以后由当时在场的一位区长科尔崩先生公布了)。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胥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不过是使巴黎和法国投降而已。为了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他们要使巴黎经受血腥屠杀和饥馑的痛苦,并且要使这段时间延续到掩护这些9月4日

的篡位者不致再遭十二月分子报复的时候。如果“国防”并不单是“政府”的虚伪幌子，那末这些擅自就职的政府成员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公开宣布特罗胥的“计划”，叫巴黎人民或者立即向征服者投降，或者自己掌握防务。这些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发表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说特罗胥这位“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碉堡上的一块石头，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尺领土”。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特罗胥的计划有步骤地被付诸实现。实际上，被任命统率巴黎军队的那些万恶的波拿巴强盗们，在私人通信中厚颜无耻地讥嘲他们深悉内幕的这种可笑防御（例如参看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在巴黎投降的时候，骗子们揭下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暴露了自己（现了原形）：它是“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投降时也认为充当这种角色对他那号人说来都太无耻了。这批 capitulards（投降派）⁴⁴⁶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一些证明他们卖国勾当的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对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他们会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⁴⁴⁷。

国防政府的一些最有影响的成员之所以热中于谋求这种结局，还有一些十分急切的个人利害的考虑。只看看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和茹尔·费里吧！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

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因为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本着同样的自我诅咒的英雄精神，闭了一次嘴，直到内战的动乱给他机会，他才在凡尔赛议会里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

(皮克事件)就是这个伪证制造犯，刚一握权，就立即出于同情释放了两位同行兄弟皮克和泰费尔。这两个人甚至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经因为犯盗窃和伪造文件罪而被判处苦役，其中的一个泰费尔竟敢在公社成立以后回到巴黎，不过立刻就被送回到适合于他的地点。而这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对全欧洲说，巴黎正在释放它的监狱里的所有罪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钻营路易·波拿巴的内务大臣没有成功，在9月4日自封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内务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钱财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在任 Société Générale⁴⁴⁸的一个分公司经理期间盗用过30万法郎，因而根据他的自供被判了罪(见1868年12月1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这两份报告在第二帝国时代就已经公布过了。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把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指派为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在整个巴黎被围困期间把他这位兄弟当成他的财务纤手；阿尔图尔利用厄内斯特掌握的国家机密在交易所里大发横财，万无一失地利用法国军队的节节败退进行投机活动，同

时用内务部机关报“自由选民”^①上发表的失实新闻和官方谎言蒙哄交易所的一般投机分子。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已落到公社手里了。无怪乎当第一批被俘的巴黎国民自卫军在凡尔赛受到比埃特里的“羔羊们”的残暴至极的虐待时，厄内斯特·皮卡尔这个凡尔赛政府中的约·密勒“双手插在裤袋里，在一群一群的俘虏中间踱来踱去，恣意拿他们耍笑”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被围期间以巴黎市长的身分巧妙地利用城内的饥馑刮了大批钱财，而这种饥饿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他的乱政失职造成的。文件证据现在已经落在公社手中。当他将来不得不报告他乱政失职的那一天，就会是他受裁判的一天。

因此，这些人之所以成为工人的巴黎的死敌，不仅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寄生虫，被围期间的巴黎叛卖者，而且首先因为他们是一些普通的罪犯，这些罪犯只能够在巴黎这个法国革命的堡垒变成废墟时，才有希望得到假释证。这些亡命之徒最适合当梯也尔的部长。

(2)梯也尔、杜弗尔、普野— 克尔蒂约

从“议会意义”上说，事物只是发表议论的借口，用来陷害对手，伏击人民，或者作为演说者本人卖弄技巧的题目。

这方面的能手梯也尔先生，这个邪恶的侏儒，将近半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

^①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定稿中作了订正：厄内斯特·皮卡尔是国防政府的财政部长；“自由选民”是财政部的机关报（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

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出他的说谎才能了。像所有的矮人一样，他渴望着炫耀自己，贪求名利地位；他智力贫乏，却富于奢想；追求享乐，怀疑一切，他渊博机敏，善于掌握（学到）事物的表面，并借此发挥大套废话；他是才能少见的辩客，浅薄透顶的作者；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的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只有民族偏见和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为了绞杀革命，他时刻准备排挤对手，枪杀人民；当处于反对派地位时，他恶毒阴险；一旦执掌大权，他面目可憎；要挑起革命时，他不择手段；此人的社会活动史也就是他的国家的灾难编年史。这个矮子喜欢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是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靴子的。他的对外政策，从1841年的伦敦公约⁴⁴⁹起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他在普鲁士侵略者庇护下进行的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不言而喻，对这样一个人来说，现代社会中比较深刻的变动，始终是一部天书；他那副头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耍嘴皮了，所以甚至连社会表面发生的最明显的变化也不能理解。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违反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一·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而在路易·波拿巴时代，他把对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任何改革都斥为大逆不道。虽然他有些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他冥顽不化地死守着陈规旧例的传统；他在多年的官场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益处的事情。恐怕只有旧世界才会因为自己的大厦顶上冠有小拿破仑和小梯也尔这样两个人物而感到骄傲。在这种人身上，所谓文化成就只

不过表现在精心讲求荒淫生活和……^①自私自利上。

曾在复辟时期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的梯也尔，靠着充当对付贝里公爵夫人的密探和监狱产婆而博得了路易-菲力浦的宠信，但是当他第一次当上大臣时（1834—1835年），他的活动的中心内容还是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起义的共和党人和制订取缔报刊的残暴的九月法令⁴⁵⁰。

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提出了加强巴黎防务的计划。在共和党对这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企图提出抗议时，他回答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加强城防就会危害自由！你们首先就是存心毁谤，竟以为有某一个政府为了保持政权而企图在某个时候轰击首都……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难立足一百倍。”

是的，除了梯也尔先生本人和他的那些持假释证的部长以及像畜牲般的“地主议员”的政府以外，再没有哪一个法国政府敢这样干了！而且干得这么典型，把一部分设防工事交到普鲁士战胜者和庇护者手里。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②在巴勒摩城动手的时候，梯也尔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摩发生的事情。当你们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恐（在“议会”的意义上）。究竟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

（如果是被自己的政府在外敌注视和纵容之下轰击的，那当然一切都会是正确的了。）

① 原稿此处漏字。——编者注

② 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究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对，就是为了要求享受它的权利，它竟得到了 48 小时的袭击。”

（如果袭击延续四个星期以上，那一切又会是正确的了。）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从这个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真的，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将对人类的一种贡献……

当为自己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王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好，过了一年光景，这位心地高洁的人变成了正统派乌迪诺统率的法兰西共和国军队炮击罗马的阴险倡议人和最狂热的辩护者（辩解者）了。

二月革命前几天，因受基佐的排挤、长期不能获得权势而满腹忿懑的梯也尔，一嗅到了风暴的气息，就又在众议院中喊道：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转到了热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手中，我也决不因此背弃（放弃）我所拥护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不是像这个小人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用共和国替代了路易-菲力浦。从共和宣告成立起直到 coup d'état（政变）止，镇压这次革命就成了梯也尔先生的唯一工作。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忧心忡忡地隐藏起来，殊不知人民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敢受到人民泄恨的处置。虽然如此，尽管他有无人不知的神奇勇气，他还是继续回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卡芬雅克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巴黎无产阶级的物质力量淹没在血泊中的时候为止。这时，供他这种人

活动的场地已被扫清。他的时运再次降临。他变成了“秩序党”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思想领袖，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无名王朝，在这个无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工人阶级，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

(复辟王朝是贵族地主的王朝，七月王朝是资本家的王朝，卡芬雅克的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王朝，在所有这些王朝统治时期，一群组成波拿巴党的贪得无厌的冒险分子渴望掠夺法国但没有成功，这倒使他们有资格充当“秩序、财产、家庭、宗教的救主”了。

这个共和国是联合在一起的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以及作为他们尾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无名王朝。)

(3)地主议会

如果说这个政府是由在波尔多开会的地主议会产生的，那末那个议会则是由“国防人士的政府”事先策划成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曾派梯也尔巡游各省，要他在各地预告未来的事态发展，并且为突然举行大选作好准备。梯也尔必须克服一桩困难。且不说波拿巴派已引起法国人民的厌恶，即使他们大批当选，也会立即恢复帝国，并且会把梯也尔先生一伙人打发到凯恩去旅行。奥尔良党又人少势孤，填不满他们自己的席位和波拿巴派所腾出来的席位。因此，势必要复活正统派。梯也尔并不惧怕这项差使。正统派要成立现代法兰西政府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作为争权夺利的对手也就微不足道；这个党的全部活动，用梯也尔的话来说，一向只限

于依靠“外敌入侵、国内战争和无政府状态”这三种手段(1833年1月5日梯也尔在众议院的演说),因此,这个党是反革命势力最合适的盲目工具。一小部分被1789年的革命剥夺了财产的正统派,由于当上了拿破仑第一的奴仆而恢复了原有产业,但大部分的正统派是由于在复辟时期分发的10亿法郎的赔偿金和私下的封赠而重置了产业。在路易-菲利浦和小拿破仑两个前后相续的王朝统治下,他们退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甚至这种情况也成为他们重建财产而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条件。他们免除了在巴黎的宫廷花费和当代表的花费,只是在法国外省的各个角落里坐收从现代工业树上落到他们châteaux(砦堡)里来的金苹果,因为铁路抬高了他们的地价,农业资本家把农艺学应用到他们的土地上来又提高了土地的出产,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的无穷无尽的需求保证了他们的产品的市场扩大。正是这些使他们恢复物质财富、重新提高他们作为现代奴隶主股份公司的合伙者的重要地位的社会因素,也障蔽着他们受不到现代思想的沾染,使他们可能处在农村的闭塞无知状态中,什么也不忘记,什么也不学会。他们这些人纯粹是供梯也尔这种人进行加工的消极材料。这个邪恶的矮鬼在执行国防政府委托给他的使命时,越出了他的权限,而为自己获得了这样多的选票,以致要把国防人士从与他分庭抗礼的主子变成对他甘拜下风的奴仆。

选举的圈套既然已经这样设好,巴黎的capitulards(投降派)便突然吩咐法国人民要在一周之内选举一个国民议会,这个议会的任务,根据俾斯麦口授的1月28日协定的条款,只是决定和战问题。这次选举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举行的:没有考虑商议的时间,半个法国处在普鲁士刺刀统治之下,另一半正受着政府阴谋的

暗中摆布,巴黎又和外省隔绝;尽管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法国人民却本能地感到:capitulards所承受的停战条款本身除了决定,à courtance(不管怎样也要)接受和平以外,根本没有留给法国任何的抉择(选择)余地,而为了批准这个决定,法国最坏的人是最合适的人。因此便产生了在波尔多出现的地主议会。

但是对于旧制度下的闹宴和地主议员们的真正历史事业,我们仍须加以区别。地主议员们突然发现,在由他们自己和奥尔良派组成的、夹杂有一些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少量波拿巴派的巨大多数中,他们居然是最强大的集团,于是便当真相信了他们盼望已久的昔日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的确,法国又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又被推翻了,波拿巴又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又抬头的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转,要滚回到1816年的《chambre introuvable》(“无双议院”)去——它的疯狂而愤怒地诅咒革命洪水及其吓人惨象、它的要求“砍去巴黎的头颅并取消它的首都称号”、它的以封建主砦堡的地方势力突破国家统治网的“地方分权制”、它的宗教说教、它的陈腐已极的政治教条、它的绅士架子和轻浮粗鲁的作风、它的世世代代对劳苦大众的蔑视、以及它的从oeil de boeuf^①中观察世界的观点,都将恢复。然而实际上,这些正统派只能作为生产资料垄断者而充当秩序党的股东。从1848年到1851年,他们只不过是“议会制共和国”这个空位王朝的一个派别,所不同的是当年代表他们的是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如贝利耶、法卢、拉罗什雅克兰之流),而现在他们只得从农村地主这种庸碌之辈中物色自己的代表人物了,因而给议会添上了

① 直译是:“公牛的眼睛”。这里指的是凡尔赛宫廷中一个装有椭圆形窗户的前厅,廷臣都在这里等候觐见。——编者注

另外一种情调，以封建色彩掩盖了它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他们种种荒唐的大话（说教）只不过更加烘托出他们的强盗政府的自由主义。他们被诱而僭取了超出选民委托的大权，他们只好看着那些自封的统治者的脸色过日子。虽然 1814 年和 1815 年的外敌入侵 451 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用来反对他们的致命武器，他们却出于毫无见识的盲目愚昧，自己承担起来他们的资产阶级敌人这次将法国拱手送给外敌的史无前例的投降的责任。法国人民起初以为所有高贵的布索那克们久已被埋葬，如今看到他们重又出现，感到惊讶和耻辱，他们已经明白：不仅需要进行十九世纪的革命，而且必须彻底完成 1789 年的革命，即把这些畜牲赶到农村中一切牲畜的最后归宿——屠宰场里去。

(5) 内战的开始。3 月 18 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马。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

解除巴黎的武装，假如只是作为实现反革命阴谋的一个必要条件，本来可以从长计议，审慎从事；但是既然解除巴黎的武装是那急迫的、具有不可抵抗的吸引力的财政条约中的一款，它就是刻不容缓的了。因此，梯也尔必须来一个 *coup d'état*（政变）的尝试。于是他就发动了内战：他派 *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452 维努亚率领一大队市警和几团常备军去夜袭蒙马特尔高地。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国民自卫军与兵士们的和好，他的这个罪恶企图没有得逞，第二天，他在一份贴到巴黎墙上的宣言里告诉国民自卫军说：他宽宏大量地决定把他们的武器赏给他们，他并且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暴徒”。

在 30 万名国民自卫军中,只有 300 人响应了他的号召。3 月 18 日的光荣的工人革命完全控制(掌握)了巴黎。

指挥蒙马特尔的防卫工作并在 3 月 18 日清晨成为革命领导者的中央委员会,既不是一时权宜的机构,也不是密谋的产物。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国防政府按照投降条件解除法国的武装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 4 万人的护身军队,目的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各连代表——大多数是工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它的主要力量是在工人居住的郊区,但是它很快地就得到了除旧波拿巴军队之外的全体国民自卫军的承认。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 capitulars (投降派) 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和拉-维勒特。这样便保全了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大炮。在 1 月 28 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出的武器总数之内。从国民议会在波尔多集会起到 3 月 18 日止这一整个期间,中央委员会一直是首都的人民政府,它强大到能够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采取如何激烈的措施,也不管军队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而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防御立场。

9 月 4 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抗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 3 月 18 日的革命才能显示出来,而这种显示就是一次革命。这次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 and 政治条件,这些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

洲好像受到一次电击而悚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变动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幻觉而已。

国民自卫军击溃维努亚，只是给予统治阶级策划的反革命阴谋的一次挫败，但是，巴黎人民立刻把他们这一自卫的事件变成了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在篡位者的王位出缺之后，9月4日的革命恢复了共和国。围困期间巴黎的顽强抵抗构成了外省进行防御战争的基础，同时迫使外国侵略者承认了共和国，但是它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要到3月18日才能显示出来。3月18日的革命是要铲除旧世界制度所依据的阶级统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这些条件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的地步。欧洲好像受到一次电击而悚然一震。它一时似乎怀疑在它眼前发生的这些惊人的政治和军事变动的真实性，还以为这也许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一些血腥的恶梦而已。巴黎工人阶级在脸上还带着因长期挨饿而出现的皱纹，而且又处在普鲁士军队的刺刀之下，却一跃而夺得了维护进步等等旗手的地位。

洋溢着历史首创性的崇高热诚的巴黎工人的革命，认为保持无产阶级不犯他们的天然尊长（上等人）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罪行，是与它的荣誉攸关的事情。

克列芒·托马、勒康特等等

但是，玷污这次革命的那些可怕的“暴行”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他们的敌人硬加在他们身上的所有暴行中，只有两件事情不是凡尔赛的蓄意诬蔑或廉价文丐杜撰的谰言，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关于这两件事，我们要

简单交代几句。

勒康特将军是被选出执行夜袭蒙马特尔（罪恶工作）的雇佣凶手之一，他在皮加尔广场上曾一连四次命令他的第八十一常备团的兵士开枪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他的士兵并没有射击妇孺，而是在3月18日下午在红宫花园里把他抓起来枪毙了。法国士兵在工人阶级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自然不会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完全改变。克列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枪毙的。

克列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利浦的统治后期被吸收加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在里面起着傀儡（负责的 *gérant*（经理））和打手的双重作用。“国民报”一派利用了二月革命，靠欺诈取得了政权，他们便把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升任“将军”。这是六月大屠杀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大屠杀的最凶狠的刽子手之一。在这以后，他的将军头衔突然中止。他隐没起来，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阶级代表们庄严地允诺，担保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当然，他们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却嗾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部队——他们现在代替了路易·波拿巴手下的科西嘉部队——去蹂躏误信他们的誓言的人民。当时只有塔米济埃先生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立即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克列芒·托马“将军”便被推上他的职位。此人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

自卫军作战。他无尽无休地制造借口阻挠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千方百计地唆使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去反对工人分子以瓦解国民自卫军，排除那些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对无产者营妄加以怯阵的罪名而把它们解散，实际上这些无产者营的英勇果敢精神现在连最狂暴的敌人也为之震惊。克列芒·托马感到得意的是，他又重新取得了他以前在六月屠杀事件中那种个人充当巴黎工人阶级仇敌的显赫地位。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的一份彻底消灭“巴黎 canaille (暴徒) 的 la fine fleur (精华)”的计划。好像被六月的冤魂所缠住似的，在维努亚失败以后，他又情不自禁地以一个业余密探的身分出场！

中央委员会竭力想从士兵们的粗鲁的私审判决下救出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这两个罪犯，但没有成功。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应负的责任，就像亚历山得拉公主驾进伦敦城时对被挤死者应负的责任一样。茹尔·法夫尔假慈悲地咒骂巴黎这个凶手的渊藪。地主议会扮演了一场歇斯底里的“痛心”剧。这些人除非为了寻找使人民流血的借口，是从来不流他们的鳄鱼之泪的。利用头面人物的尸体当做内战的武器一向就是秩序党爱用的诡计。在1848年，他们曾经怎样就巴黎大主教仿佛被六月起义者杀害的事件而掀起了震荡全欧的恐怖叫器！其实他们从大主教的大司铎雅克美先生这个目击者的证词中，完全知道大主教是被卡芬雅克自己的士兵枪杀的！在现任巴黎大主教^①——一个毫无殉道者气质的人——写给梯也尔的信中，透露出一种敏锐的疑虑，即他的凡尔赛的朋友们将以他被公社处决引为快事，因为他们急切希

^① 达尔布瓦。——编者注

望根据这项可爱的举动来定公社的罪！然而，当大喊“杀人犯”的目的已达时，梯也尔便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宣布“凶杀案”是“很少”几个不知名人物私下干的事情，从而淡然了结了这件事。

“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一听到人民胜利的消息——报复的信号——就不寒而栗，他们对人民的行动与他们自己历来庆祝人民失败的传统方式迥然不同而极其惊讶。甚至对市警都没有解除武装和逮捕下狱，反而给他们洞开了巴黎城门，让他们安然撤退到凡尔赛；对“秩序人物”不仅毛发未动，而且容许他们在巴黎正中心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轻易地夺去一些重要阵地。当然，他们把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和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容大量，解释为只是工人自觉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四天以前维努亚用大炮和多管炮所没有做到的事情。一群吵吵闹闹的“绅士们”从最奢华的街区出发，其中有各式各样的 *petits crevés* (纨绔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帝国猪仔。这些人列队行进，沿途喊叫着“打倒杀人犯！打倒中央委员会！国民议会万岁！”在他们行进中遇到国民自卫军的散兵哨的时候，就横加侮辱，并勒令缴械。最后，他们汇合在旺多姆广场上，企图在辱骂的喊叫中把国民自卫军赶出他们的总参谋部，并冲过警戒线。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起初只是提出通常的 *sommations* (相当于英国宣读骚扰取缔令)，但是这样做对于阻止进犯者并不见效。于是国民自卫军的一位将军^①才下令开枪，这些暴徒立刻抱头鼠窜。有两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打死，八名受重伤；

① 贝热瑞。——编者注

在暴徒们作鸟兽散的街道上，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手杖刀，这些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和平”游行的“徒手”性质。当1849年6月13日巴黎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徒手”示威游行时，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用刀斩、马队践踏和枪击对付游行队伍。当时立即宣布了戒严，开始了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但是在同类情况下，“下等阶级”的做法却迥然不同。3月22日的窜逃分子既没有受追袭，他们在逃窜中也并未受扰，事后也没有受到法院侦查员(juge d'instruction)的传讯，所以他们过了两天又能来一次由海军上将赛塞率领的“武装”示威。甚至在他们第二次滋事的可耻失败以后，他们像巴黎其他市民一样仍被允许参加公社的投票，在选举中进行较量。他们在这场不流血的战斗中打输了，最后撤出了巴黎，没受任何损伤地完成了他们的大出走，身后拖着荡妇、瘪三和首都的其他危险分子。所谓3月22日“赤手空拳的市民”被屠杀，原是一种神话，无怪乎梯也尔及其“地主议会”都不敢喋喋不休地谈论，只委托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

如果要挑剔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从3月18日到这些“秩序人物”大出走时期内在对待这些人的行动上的过错，那就是他们过分温和，温和得近似软弱了。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另一面吧！

秩序党在他们夜袭蒙马特尔失败以后，于4月初开始了他们向巴黎的正规进攻。从巴黎逃出的维努亚，因为用十二月的方式揭开了内战，因为冷酷无情地屠杀被俘的常备军士兵，因为卑鄙地谋害了我们的英勇朋友杜瓦尔，竟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

章!加利费,即那个在第二帝国的闹宴上以无耻的装扮而闻名的女人的心上人,在一篇正式宣言中,夸耀他如何用突袭和收买叛徒的办法,卑鄙地杀害了连同副官和队长在内的一队巴黎国民自卫军。宪兵德马列也得了勋绶,因为他像屠夫一样地打光明磊落、仗义豪侠的弗路朗斯切成了碎块;关于这次暴行的“令人兴奋的”细节,梯也尔洋洋自得地向议会作了传达。扮演着帖木儿—塔梅尔兰角色的这个大拇指般的小人物梯也尔,在万分可耻的得意忘形中,拒不承认那些反对他这个小人的尊严的“叛乱者”享有交战一方的一切权利和惯例,甚至于拒绝给予“伤兵救护站”的权利。

公社在4月7日颁布了一项报复法令,宣布公社有责任保卫自己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时候,枪决俘虏是停止了,但凡尔赛对俘虏的残暴虐待并没有停止;关于这些俘虏,梯也尔在他的一份公报中竟然说:

“正直人士的忧伤的目光,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种无耻民主制度下的如此无耻的面孔。”

但是,当梯也尔和他那些十二月政变的将军们知道公社的法令只不过是一种威胁,甚至连那些在巴黎被捕的伪装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爆炸弹的市警都得到了赦免,他们就又全盘恢复了旧的一套干法,并且一直继续到今天。一些国民自卫军士兵在贝耳—埃潘向 peloton (一队) 占压倒优势的骑兵投降,后来被骑在马上 的骑兵队长一个个枪毙了;躲藏有巴黎军队和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房屋,被宪兵们团团围住,浇上煤油,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巴黎的救护队运出去了;木兰—萨克多面堡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由于叛徒出卖遭到突袭,在睡梦中被刺刀挑杀(公社社员在睡梦中受到突袭);克拉马尔的大屠杀(枪杀),穿着常备军制服

的俘虏们被就地枪决，——所有这些在梯也尔公报里用轻率口气报道的功绩，只不过是这次奴隶主叛乱中的几桩事件而已！但是面对着为最卑鄙的阶级利益所驱使的凡尔赛阴谋分子在法国废墟上制造的目前这次国内战争，面对着在俾斯麦的庇护下和在俾斯麦士兵的监视下对巴黎进行的轰击，只列举几桩个别的残酷事实，未免荒唐可笑！梯也尔在公报中报告这些事情的轻率态度，甚至使不大敏感的“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然而，正像西班牙人常说的，这些都是“正常的”。在统治阶级与威胁着他们的特权的生产阶级进行的战斗中，总是充满着这类暴行，但没有一次像在这次战斗中那样，被压迫者显示了这样过分的人道，而他们的敌人表现得如此卑鄙无耻……梯也尔永远遵循着中世纪浪游骑士的老格言：一切武器只要是用来反对平民的都是正当的武器。

梯也尔给各省省长写道：《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

贝耳—埃潘事件

在维耳茹伊弗附近的贝耳—埃潘发生这样的事件：4月25日，四名国民自卫军士兵被一队骑兵包围，并被勒令缴械投降。由于无法抵抗，他们服从了，并没有受到骑兵的伤害。稍后，骑兵队长（加利费手下的一位宝贝军官）疾驰而来，用手枪一个个地枪毙了俘虏，然后和他的骑兵队离开了。三名自卫军士兵牺牲，一位名叫舍费尔的身受重伤，但活下来了，后来被送到比塞特尔的医院。公社派了一个调查团到医院记下了这位奄奄一息的士兵的证词，并发表在它的报告上。当国民议会中的一位巴黎议员就这份报告向陆军部长提出质问时，“地主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

不让陆军部长出来答复。干这种谋杀罪行倒无所谓，但加以谈论就会是对他们“光荣的”军队的侮辱。

梯也尔在发给他的省长们的一份公报中说：《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在平静地开着会”）（像奥利维耶那样 *coeur léger*（轻松）^①），这句话充分说明了议会是以怎样恬静的心情来看待内战中的暴行的；行政当局和它的那些假释犯在梅也尔举办的珍饈盛宴上，在德国王公们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这表明甚至勒康特和克列芒·托马两人的幽灵也没有败坏他们的胃口。

(6) 公 社

在色当之后，里昂、马赛和土鲁斯的工人，都宣告成立公社⁴⁵³。甘必大用尽全力扑灭它。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举行的起义（它们被堪与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匹配的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用虚假的借口，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了下去）就都是公社推翻骗子政府的尝试。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所在。正因为如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巴黎雷鸣般的《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的呼声把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梦见普鲁士帝国的睡梦中惊醒过来！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① 这是借用内阁首相奥利维耶的话（见本卷第588页）。——编者注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 3 月 20 日宣言中说：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贩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像统治阶级及其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以往在它们相继获得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一样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驯顺的警察、僧侣、卑贱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地盘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都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枝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 1848—1851 年秩序党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以议会仅仅作为点缀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所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

取的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既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也同样地贬低一切阶级，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死亡的法国议会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像蟒蛇一样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政府寄生虫，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必须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它的按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的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进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处境更加困难、抵抗更加有组织、要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发展，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的形式和规模，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无所偏

袒的样子。这种政权把群众现存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安然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越来越发展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强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发展，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革命所许下的、似乎保证了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破坏。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进行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也就是否定这一内战以其名义进行的那种“秩序”。这只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作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不得不在第二帝国前面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两大对抗的社会力量都表示漠视和敌视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以摧毁议会权力亦即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阶级专制的直接外形。这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二十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⁴⁵⁴，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交易所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径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些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卑鄙齷齪就无阻拦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升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鬼魅世界。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分子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造成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荒诞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普鲁士本来渴望把这种纸醉金迷的、血腥的、污秽的制度在欧洲的重心从巴黎移到柏林去，而它的刺刀把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腐朽性以及在这种制度下繁荣滋长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尽行揭穿了。

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和最卑鄙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

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所要做的是不去恢复它。

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面。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确定的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篡夺行为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城市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留归公社。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官吏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控制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会变得不可

能,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国家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被废除,实行压迫的物质力量会被摧毁。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回到私人清修生活的范围里去,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学校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摧毁精神压迫的力量,使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成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上的税款由公社公职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拨给各项公共需要(用在各项公共需要上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政府的镇压力量和控制社会的权威会这样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理应属于政府权力的职能,应当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勤务员来执行。

(7) 结束语

艰苦奋斗、努力劳动、用心思索的巴黎,为历史首创精神的热诚所激发,充满着现实的英雄气概,这是正处在诞生的阵痛中的新社会;和它截然对立的是凡尔赛的旧社会,即彻底虚伪、塞满谎言的世界。它的真正代表就是地主议会,那里面麇集着体现法国历代阶级统治的一切旧制度的啾啾作语的食尸鬼,领头的的是一个老朽不堪的议会小丑,他们的剑柄握在一群当着自己的普鲁

士征服者炮轰巴黎的帝国 capitulars（投降派）手中。

法国在第二帝国崩溃时堆集起来的大量废墟，对他们说来只是把以前的全部废墟垃圾，即正统派或奥尔良派的垃圾挖掘出来并抛到地面上来的好机会。

他们努力在一切过去的流亡集团的尸臭气氛中燃起生命的火焰。（他们呼吸的空气就是一切过去的流亡集团的尸臭。）

他们共同谋害生命，只顾自己的阶级私利，妄想撕食法国社会的尸体，维护奴隶主的共同利益，憎恨现在，对巴黎作战——除此以外，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

他们的一切一切都是滑稽可笑的，从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那个老古董若贝尔伯爵起，此人在路易十四宫里召开的国民议会上喊道：“我们是国家”（“国家就是我们”）⁴⁵⁵（他们的确是脱离社会的国家的幽灵），到那些向梯也尔卑躬屈膝的共和派止，他们在 Jeu de Paume（网球厅）集会，来表明与他们的 1789 年前辈相比已堕落到什么地步。

他们的领头是梯也尔，他们的大多数分裂为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这两个集团，追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旧式的”共和派。这两个集团各自策划着自己的复辟；共和派则图谋议会制共和国的复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梯也尔的老年人的虚荣心上，而暂且为梯也尔的统治充当共和的装饰，并且当他们尽力诱骗巴黎投入梯也尔的怀抱、企图令赛塞解除巴黎武装未果之后，以自己的在场认可波拿巴的将军们对巴黎的战争！真是一些愁容骑士！他们甘愿忍受的屈辱表明，作为阶级统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共和制度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梯也尔正是针对着这些人间聚集开会的塞纳—瓦瑟省的区长们，他们还需要什么：“不是他这个普通的公民在做国家的

首脑么？”从1830年到1870年的进展在于：从前路易—菲力浦是最好的共和国，现在路易—菲力浦的大臣——小梯也尔本人是最好的共和国。

他们不得不借助于退休的波拿巴派将军所指挥的帝国士兵、宪兵、警察来干他们的真正工作即对巴黎作战，当他们怀疑他们——像1848—1851年当政时一样——只不过是制造帝国再度复辟的工具，他们又不寒而栗了。教皇的朱阿夫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沙列特的布列塔尼兵，实际上是他们的“议会”军队，与帝国的现实力量相比仅仅是军队的幻影而已。他们一听到“共和国”这个名称就怒气冲天，同时他们却以它的名义接受了俾斯麦的口授条件，以它的名义把法国剩余的财富滥花在内战上，以它的名义诋毁巴黎，以它的名义制定将来对叛乱者定罪的法律，以它的名义篡夺号令法国的权力。

他们统治的根据是普选制。但他们在1815年到1848年当政期间一直反对普选；共和国建立反对他们的普选制之后，他们于1850年5月把它废除了；而现在他们又把它当做帝国的淫贱遗产接受下来，忘记了这样一来就是接受了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帝国！他们这些人即使用普选也无法立足了。

他们指责巴黎背叛民族的统一，可是他们的头一句话就是以取消巴黎的首都称号砍去民族统一的头颅。巴黎所做的事似乎也是他们所需要的，不过做得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梦想恢复反动的过去，——而是维护革命的未来。梯也尔这个沙文主义者，从3月18日以来就用“普鲁士干涉”威胁巴黎，在波尔多坚决主张“普鲁士干涉”，事实上，他也是只用普鲁士授予他的工具来反对巴黎。和这个沙文主义的小丑相比，波旁分子简直可说是尊严的化身了。

万一他们得逞，不管他们的复辟采取什么名目，不管哪个侥幸成功的谋位者成为首脑，复辟实际上只能恢复帝国，即恢复这些腐朽阶级的统治的最后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形式。如果他们恢复了帝国，——一旦他们的任何一个复辟计划成功，他们势必要恢复帝国，——他们只会加速他们所代表的旧社会的腐朽，加速他们所反抗的新社会的成熟。他们的幽暗目光只看到那些旧制度的政治门面，而且他们梦想在这些制度的头上安一个亨利五世或巴黎伯爵来恢复这些制度。他们看不到，这些政治上层建筑所依据的社会机体已经消逝，这些制度只可能在如今已过时的那些条件下、在法国社会的那些过去的阶段中一度存在；法国社会现在只能容许或者是作为其腐烂状态的帝国制度，或者是作为其新生状态的劳动共和国。他们看不到，政治形式的更替只是社会本身经历的现实变化的政治表现。

普鲁士人怀着对战争胜利的狂喜心情注视着法国社会的痛苦挣扎，并以夏洛克的卑鄙贪心，以 Krautjunker（顽固守旧的容克地主）的粗暴无耻趁火打劫。其实把帝国移植到德国土地上，对他们自己已经是一种惩罚。他们注定要解放法国的潜在力量，这些力量必将把他们连同旧秩序一起全部吞没。巴黎公社可能倒下，但是它所创始的社会革命必将胜利。它的策源地遍于全球。

* 片 断

梯也尔公报里的谎言

凡尔赛的大骗局，它的虚伪性质，没有比在梯也尔这个职业说

谎家身上体现和集中得更完全的了，对于他说来，“事物的真实性”只就其“议会意义”而言才存在，也就是说，只作为谎言而存在。

他在答复大主教的信里冷冰冰地否认“硬推在凡尔赛军队头上的臆造的处决和**报复行为**（!）”，并由他的“地主义会”专门指派一个调查团来证实这无耻谎言。他当然知道波拿巴的将军们洋洋自得地宣布的种种暴行。不过，从“议会意义”上说，这些都是虚构。

他在4月16日就炮轰巴黎一事发表的通报中说：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当然，巴黎是在炮轰自己，好使世界相信它在作战！

稍后又说：“我们的炮兵没有轰击，但是**诚然射击过**。”

梯也尔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5月4日）：“巴黎从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的控制下得到解放**”（采取杀害睡梦中的国民自卫军士兵的手段）。

一支杂牌军队——这是蒙俾斯麦的恩典从监狱里释放回来的波拿巴军队残部，以瓦伦顿的宪兵和比埃特里的市警为核心，以教皇的朱阿夫兵、沙列特的朱安兵、卡特利诺的万第兵为装饰，全部由临阵脱逃的十二月分子投降派将军们指挥，——这样一支军队被他颂扬为“**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精锐的军队**”。当然，如果普鲁士军队到现在还驻扎在圣丹尼，那只是因为梯也尔想用这支“精锐军队中的**最精锐军队**”的军容去吓唬吓唬他们。

如果“最精锐的军队”是这样，那末，凡尔赛的颠倒时代的议会也就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开明的和最自由地选出的议会**”了。但是，梯也尔颠倒反常达到的顶点，是他对区长们说他是“一个从来

不食言的人”，当然，他的守信是议会意义上的守信。

他是最真挚的共和党人，而“议会比他本人还要开明”（4月27日的会议）。

他对区长们说：“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而非议会的意义上讲，是我从来不守信用。“本届议会是法国所曾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之一。”

他把自己比做林肯，把巴黎人比做南方叛乱的奴隶主。南方人是为了保持劳动奴隶制而想从合众国脱离出来。而巴黎是为了劳动的解放而想使政权脱离梯也尔先生和他所代表的利益。

波拿巴的将军、宪兵和朱安兵对巴黎发泄的报复行为，是反对劳动的阶级战争的一种必然行为。但是，梯也尔在他的公报小插曲里，却借这种暴行可笑地自比为自己的偶像——拿破仑第一，并且给全欧洲留下了笑柄，因为他竟厚颜无耻地宣称，法国军队由于对巴黎人作战，已经挽回了在对普鲁士军队作战中所丧失的声誉。所以，整个战争仿佛只是儿戏，好使这个矮鬼的幼稚的虚荣心得到表现，当他想到居然能描述他自己的军队在他自己的秘密统率下所进行的他自己的战役时，就飘飘然起来。

在巴黎和外省问题上，他的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巴黎实际上已抗击了“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达两个月之久，尽管这支军队得到普鲁士人的秘密援助；原来这个巴黎只是想要梯也尔使它摆脱“凶残的暴君”，所以才对梯也尔进行战争，虽然只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不倦地把公社说成一小撮罪犯、假释犯、渣滓。巴黎所以对他作战，是因为巴黎想要他来使它摆脱“压迫它的可憎暴君”。然而就是这一“小撮”亡命之徒，却抗击了由百战百胜的麦克马洪

统率的、受梯也尔本人的拿破仑式天才所鼓舞的“法国从未有过的最精锐的军队”达两个月之久！

巴黎的抵抗仿佛并非真实，而梯也尔关于巴黎的谎言则是真实的。

巴黎的一切有生力量不满足于只用行动壮举来驳斥他，还企图用言词说服他，使他脱离他的说谎世界，但终于无效。

“决不当把巴黎的运动和蒙马特尔遭到的突袭混为一谈，后者只不过是这一运动的导因和起点；这一运动是普遍的，是深入巴黎人心的；甚至那些由于某种原因置身局外（不参预其中）的大多数人，也不否认这一运动的社会合法性。”

这一番话是谁对他说的呢？是**工商会代表**，亦即代表着七八千名工商业者发言的一些人。他们去到凡尔赛亲口告诉他这一番话。还有**共和同盟**、**各共济会分会**⁴⁵⁶也派出代表，举行示威游行，作了同样表示。但他顽固到底。

他在关于木兰—萨克的公报中说（5月4日）：

“俘掳 300 人，其余叛乱分子拔腿奔逃，在战场上遗弃 150 名伤亡者……这就是公社在它的公报中所能庆贺的胜利。巴黎不久即将从压迫它的凶残暴君下解放出来。”

但是，这个战斗的巴黎、真正的巴黎并不是他的——那个巴黎。他的巴黎，本身就是一个议会谎言。“富人的、游手好闲者的、资本家的巴黎”、世界妓院——那才是他的巴黎、那才是想重归于梯也尔的巴黎。真正的巴黎是“贱民”的巴黎。以“和平游行”和赛塞的仓惶逃跑来表示其勇气的巴黎，目前麇集在凡尔赛、吕埃伊、圣丹尼、勒河岸圣热尔门的那批人的巴黎，以及随着跟去的那些依附于“家庭、宗教、秩序人物”、首先是依附于“财产人物”的荡妇们

的巴黎，游堕阶级的巴黎，从望远镜中欣赏战斗的进行、把内战只当做惬意消遣的 francs-fileurs (逃亡者) 的巴黎，——这才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⁴⁵⁷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凡尔赛的亡命之徒是梯也尔先生的法国。

如果说，巴黎想靠梯也尔、他的“地主议会”、décembrisers (十二月分子)、宪兵来摆脱公社是无稽之谈，那末，说他的“外省”想靠他和他的“地主议会”来摆脱巴黎也同样是无稽之谈。

在和约还没有在法兰克福最后签订以前⁴⁵⁸，他呼吁各省把它们国民自卫军战斗营和志愿军开到凡尔赛来对巴黎作战。各省断然予以拒绝。只有布列塔尼省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他们作战时打着白旗，每人胸前缝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嘴里喊着《Vive le roi!》(“国王万岁!”)”法国外省就是这样响应他的号召的，所以，他不得不从俾斯麦那里要回被俘的法军，使用教皇的朱阿夫兵(这是他的法国外省的真正武装代表)，并把 20000 名宪兵和 12000 名市警当成他的军队的核心。

尽管他力图用谎言的城墙、思想封锁和警察封锁把巴黎和各省隔绝(隔离)开来，但各省不仅不给他送来对巴黎作战的战斗营，还向他派遣了这样多的坚持与巴黎议和的代表团，以致他决定不再亲自接见它们。各省递交的大部分呈文建议：立即和巴黎缔结停战协定，解散国民议会，“因为它的任期已满”，给予巴黎所要求的市政权利；这些呈文的语调是如此不堪入耳，以致杜弗尔在发给各省省长的“反对议和的通告”中对之大加诋毁。另一方面，“地主议会”和梯也尔却没有从外省接到一份表示拥护的呈文。

但是，外省揭破梯也尔捏造的关于外省“谎言”的 grand défi (最大挑战)是 4 月 30 日的市镇选举。这次选举是根据他的议会的

一项法令、在他的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在被肢解的法国境内残存的 35000 个市镇所选出的 70 万名（取其整数）市镇参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当选者总共还不到 8000 名！补选的结果对他们更加不利！这一情况清楚地表明：靠出人意和虚伪借口而当选的国民议会是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法国、外省的法国、不算巴黎在内的法国！

但是，外省大城市准备在波尔多召开市镇参议员代表大会的计划，被梯也尔根据 1834 年他颁布的一项法令和 1855 年的一项帝国法令⁴⁵⁹禁止了，这一计划迫使梯也尔招认了“他的外省”，正如“他的”巴黎一样，原是一个谎言。他指控外省，说它们也和“背信弃义的”巴黎相像，切望“奠立共产主义和叛乱的基石”。南特、维恩、莎姆伯里、利木、卡尔卡松、翁热、卡尔庞特腊、蒙彼利埃、普里瓦、格勒诺布尔等城的市镇参议会最近通过的决议又一次回答了他：这项决议要求并且坚持与巴黎议和，

“绝对肯定共和国，承认公社权利”，正如维恩市镇参议会所说，“这种权利是 2 月 8 日当选人在他们竞选公告书中作过许诺的。为了终止对外战争，它（国民议会）都割让了两省，答应了给普鲁士 50 亿法郎，那末，为了结束内战，它还有什么不应该做的呢？”

（恰恰相反，这两省不是他们的“私有”财产；至于那 50 亿法郎的付款单，那末全部问题在于这是应由法国人民而不是由他们来支付的。）

因此，虽然巴黎能正当地埋怨外省只限于和平请愿，没有援助巴黎来反对政府的全部力量……外省还是毫不含糊地揭破了梯也尔和国民议会所说的似乎他们是外省的代表的谎言，外省宣布了，他们所谓的外省是谎言，正像他们的整个存在都是欺诈和招摇撞

骗一样。

总委员会引以自豪的是，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巴黎的光辉革命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事实并不是像一些蠢才所想像的那样，仿佛巴黎或任何其他国际支部从一个中心接受 *mot d'ordre*（命令）。事实是，既然所有文明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精华都属于国际，而且都浸透了国际的思想，他们在各地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就定然会走在最前面。

从^①投降的那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政府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首都的所有连、营、炮队（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 *capitulards*（投降派）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

武装的巴黎是阻碍反革命阴谋实现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讲得很坦率。如果“地主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清楚究竟，那末，梯也尔把巴黎交给 *décembriseur*（十二月分子）维努亚、波拿巴的宪兵瓦伦顿和耶稣会教徒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三人宰割这一事实，则

① 原稿中从此处起有三页没有标记页码，在第二段前写有“第9页”的字样。——编者注

已令人对他们想解除巴黎武装的最后目的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如果说，这批穷凶极恶的罪犯对他们的目的直言不讳，那末，他们用来挑起内战的借口则是极端无耻的、极端卑鄙的（极端露骨的）谎言。梯也尔宣称，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所以应当归还给国家。而事实则是这样：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俾斯麦的俘虏们按照投降条件把法国出卖给俾斯麦的时候，为自己保留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护身军队，目的显然是为了镇压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除了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设法把 capitulards 背叛地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的大炮和多管炮运到了蒙马特尔、伯利维尔、拉—维勒特。这些大炮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征服者的政府武器总数之内。但梯也尔竟敢用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这种捏造的借口挑起内战！

夺取这些大炮显然只是全面解除巴黎国民自卫军武装，亦即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一项准备措施。可是，这个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各外强的承认；并用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的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势必立即让位给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及其假释犯们就一定会投降，以便取得护照和保护证书，免得到凯恩去旅行。握有全权去同普鲁士媾和的国民议

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革命的真正体现者是武装的巴黎,因为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它为这个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它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大规模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命令不得不自行解除武装,承认9月4日人民革命的唯一目的只不过是把政权从路易·波拿巴及其宠臣手里转交给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掌握;或者是为法兰西的事业进行奋不顾身的斗争,当时要把法国从完全复灭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并使它获得新生,唯一的途径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那产生了第二帝国并且已在这个帝国庇护下弄到完全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经受在驻扎城下的普鲁士军队的监视下去同法国阴谋分子进行斗争的一切风险。但是,巴黎的人民政府——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竟对内战抱着厌恶的态度,因此它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僭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达到如何威胁的程度,始终是继续保持着纯粹防御的立场。

3月18日清晨,巴黎被《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说:“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失职和叛卖行为,已经了解到: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了解到:夺取政权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必须立即履行的职责和绝对权利。”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像占有者阶级中的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在胜利时刻所做的那样。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把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各省的特权的垃圾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最终地建立国家上层建筑的最后的中世纪障碍。在第一帝国时期,它取得了它的最终的形式,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在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联合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战争中的产物。在以后的那些议会统治时期,由于政府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掌握政府权力就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争夺的对象。它的政治性质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和深化,与此同时,政府权力就愈益具有资本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的性质,具有为以暴力保证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的性质,具有纯粹是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人民革命以后——这些革命标志着阶级斗争进程(发展过程)中的新进展阶段——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表现得更加残酷无情、更加赤裸无隐。七月革命把国家机器的管理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了资本家,这也就是从离工人较远的敌人手里夺来转交给了工人的直接的敌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国家权力对于工人阶级采取了表现得更加露骨的敌视和镇压态度。二月革命升起了“社会共和国”的旗帜,这样它从一开始就证明了:国家政权的真正意义已被揭露:它冒充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武装力量、假装体现着社会的共同利益——站在相互敌

对的私人利益之上并把它们保持在各自的活动范围之内——的面具已被戳破；它作为阶级专制的工具的秘密已被识破；工人们要求共和制，已不再把它当做旧的阶级统治制度的一种政治变形，而是把它当做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革命手段。统治阶级面对着“社会共和国”的威胁，本能地感觉到：过去的那些王朝的称号本身就意味着某一集团的胜利和另一集团的失败，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压倒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土地压过资本或者资本压过土地；而无名的议会制共和国的统治则能够变成统治阶级所有相互敌对的集团的股份公司。与工人阶级对立的、迄今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管它以怎样的特殊形式占有群众的劳动，但是它有一个共同一致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或者作为地主和资本家直接地，或者作为地主与资本家的国家寄生虫间接地来保持劳动受奴役的地位、坐享劳动的果实；这就是强制推行那种使生产者群众，“贱民”，成为只是上等人汲取财富和进行统治的泉源的“秩序”。因此，急于以首先大肆掠夺财产来证明自己是财产保护者的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及波拿巴派冒险分子，便纠合起来，组成“秩序党”——这是无产阶级在欢呼“社会共和国”声中进行的这次革命的实际结果。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不仅是统治阶级的恐怖统治。国家政权到了他们的手里就变成了资本家、地主、他们的国家寄生虫用来压制生产者的革命愿望的公开的内战的工具。

在君主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在野集团还往往在人民面前谴责当权政府的镇压措施及其宣布的原则；统治阶级的反对派集团采用为人民利益呼吁、装出人民保护者姿态、要求维护人民自由权利的办法来使人民关心他们的派系争执。但是，在无名的共和制

度下，统治阶级的各个集团把过去旧制度的一切镇压手段都混合起来（从所有过去制度的武库里取出一切镇压的武器），无情地加以运用，共同举行叛逆的庆宴。他们卑鄙无耻地否认他们过去的声明许诺，践踏他们的“所谓”原则，诅咒他们自己以这些原则的名义挑起的革命，并且诅咒共和国这个名称本身，虽然只有这种共和国的无名统治才能广泛地容纳他们共同参加反对人民的十字军。

由此可见，这一最残酷的阶级统治形式同时也就是最丑恶的、最令人恶心的形式。它只是把国家政权当做进行内战的工具，所以它只有靠延续内战才能保持这种政权。秩序党的统治是以议会的无政府状态为首，加上它的各个集团不断进行阴谋活动，企图恢复各自偏爱的制度，而与存在于其狭隘圈子以外的整个社会公开作战，因此秩序党的统治就成了令人最难容忍的无秩序的统治。当秩序党在对人民群众的战争中摧毁了人民群众的一切抵抗手段，把束手无策的人民群众置于行政当局的刀剑之下的时候，秩序党本身以及它的议会制度也被行政当局的刀剑赶出舞台了。因此，秩序党的议会制共和国只能是一个空位王朝。它的自然结果是**帝国制度**，不管它是第几帝国。采取帝国形式的、以宝剑为王笏的国家政权，声称它依靠农民阶级，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劳动和资本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以破坏议会制度，从而破坏国家政权对统治阶级的直接屈从状况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不侮辱工人阶级但使工人阶级屈服而拯救了统治阶级；它声称它所谋求的即使不是公共福利，至少也是国家荣誉。因此，它被宣布为“秩序的救主”。虽然它有损于统治阶级及其国家寄生虫的政治自尊心，但是它表明它是资产阶级“秩

序”的最合适的制度，它为资产阶级的一切工业欲望、卑鄙齷齪的投机活动、整个骄奢淫佚的生活提供了充分发展的活动范围。表面上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国家，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切齷齪事物的温床。普鲁士的刺刀揭穿了国家的彻底腐朽性以及似乎应由这个国家拯救的社会的全部腐朽性，但是，这种帝国制度是“秩序”的、即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如此不可避免的政治形式，以至于普鲁士自己之所以要把它的巴黎中心所在地推翻，无非是为了把它移到柏林去。

帝国并不像它的前驱正统王朝、立宪王朝、议会制共和国那样，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政治形式，它同时还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淫贱、最完整、最后的政治形式。它是近代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

附 录

附 录

卡·马克思关于国防政府的 发言记录⁴⁶⁰

摘自 1871 年 1 月 17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他想利用很多英国委员出席的机会，做一次很重要的声明。奥哲尔最近在圣詹姆斯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关于法国政府所谈的一切，是与真情不符的。我们在第二篇宣言中曾写道，临时政府的某些委员从 1848 年革命以来就染上了可耻的污点^①。而奥哲尔声称，对于他们绝不能有任何责难。只可把法夫尔看做是共和国的代表，而绝不能把他看做是尽善尽美的爱国者茹尔·法夫尔。但是现在人们对法夫尔的议论，把他提到了首要地位，而共和国几乎看不见了。这就是法夫尔的活动的实例。1848 年革命以后，法夫尔由于弗洛孔生病而当上了内务部秘书。推选他的是赖德律—洛兰。法夫尔的第一批措施之一就是将军队调回巴黎，使得资产阶级后来能够枪杀工人。不久以后，人民看出国民议会原来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便发动了一次同情波兰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群众冲进了会议厅⁴⁶¹。主席坚决请求路易·勃朗去向游行讲几句话，安抚他们一下，他照办了。同俄国打仗也许可以挽救共和国。过了几天，茹尔·法夫尔首先就要求给

^① 见本卷第 292 页。——编者注

予他全权把路易·勃朗作为游行者的同谋犯加以究办。议会以为法夫尔曾得到政府方面相应的指示，但是所有其余的政府委员都谴责了这项措施，说它是法夫尔个人的企图。临时政府故意策划一项阴谋，挑起了六月起义。在人民遭到枪杀以后，法夫尔曾主张撤销执行委员会⁴⁶²。27日，他起草了关于把被捕者不经审判予以流放的法令，于是有15000人被送去服苦役。11月，议会不得不审查一部分还没有被送去服苦役的被捕者的案件。仅在布勒斯特一地就有1000人需要释放。在那些被当做最危险分子送交军事委员会审判的被捕者中，也有许多人需要释放，其他的人则只被判处短期监禁。后来有人主张大赦，法夫尔总是表示反对。他曾同一些人设法争取建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除二月事件以外的一切革命。他协助通过了过去所有出版法中最卑鄙的出版法⁴⁶³，这些出版法曾被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法夫尔在七月王朝时期与波拿巴分子有过勾搭，他曾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把拿破仑引进了国民议会。他曾不遗余力地要实现罗马远征⁴⁶⁴，而这是建立帝国的第一步。

发言报道载于1871年1月21日“东邮报”
第121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三月十八日 革命的发言记录⁴⁶⁵

摘自 1871 年 3 月 21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叙述了巴黎的情况。他说道，赛拉叶已经提到的在这个星期内收到的巴黎信件说明了以前认为不可理解的情况。以前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少数人突然夺取了很多大炮并且不肯交出来。所有的报刊和所有的记者都写道，应该惩治这些人，但是法国政府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迟迟未动。从我们巴黎委员会得到的消息说，这些大炮是国民自卫军士兵筹款置备的，并且希望把它们保存在自己那里。在选举以后，他们明白了，在所选出的那种议会⁴⁶⁶下面，共和国决不是处于安全状态的。普鲁士人进入巴黎的时候，大炮被搬到了市区的另一部分，以使它们不受普鲁士人的侵犯。当时政府对这些大炮抱有贪心，并企图把它们从国民自卫军手中夺走。奥雷耳·德·帕拉丹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警察局长^①。在拿破仑时代，他曾当过宪兵队长并且是教徒。当他的军队在同德国人的会战中吃败仗的时候，他曾遵照奥

① 在 1871 年 3 月 28 日的会议上，恩格斯声明说，他的 3 月 21 日的发言记录有一个错误：“把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和瓦伦顿混为一个人了。被任命为警察局长的是后者”。——编者注

尔良派主教杜邦鲁的命令在教堂里举行 5 小时的赎罪礼。这项任命使人们对政府的意图一目了然。

当时国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抵抗。260 个营中的 215 个营，士兵和军官一起，共同组织了中央委员会。每连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区委员会或街区委员会，再由这些委员会选出中央委员会。

20 个区中只有 5 个区没有选出代表。当议会迁到凡尔赛的时候，政府就企图肃清巴黎的革命者并夺走他们的大炮。对刚开进巴黎的军队打算让维努亚来率领，维努亚曾经在 1851 年的 *coup d'état*（政变）期间，指挥士兵枪杀过街道上的群众。清晨，军队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当国民自卫军发现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就去夺回大炮，士兵们也倒向人民方面了。现在城市掌握在人民的手里，没有转到人民方面来的军队被调到凡尔赛去了，议会不知道怎么办。

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一个是名人——其中没有费里克斯·皮阿和类似他那样的人，——但是他俩在工人阶级中间却是很出名的。委员会里有 4 个国际会员。

公社必定在日内选出来。中央委员会宣布，必须保证出版自由，但这不是对腐朽透顶的波拿巴派报刊而言。在所通过的决议中的最重要一项决议说，必须遵守和谈的先决条件。普鲁士人仍在附近，如果能做到使他们站在斗争之外，成功的机会就增多了。

发言报道载于 1871 年 3 月 25 日“东邮报”
第 130 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32 年 3 月 18 日
“真理报”第 7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 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 的发言记录⁴⁶⁷

摘自 1871 年 3 月 28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说，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支持共和主义运动，而在于这个运动在目前环境下是否将按照我们的道路发展。有些人像彼得·泰勒等人一样，只是要求共和国，但是必须指出，废除君主制度，必然要废除国家教会、上议院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在英国，任何共和主义运动要是不转变为工人阶级的运动，就不能发展。既然产生了这种运动，那末也就应该知道它将要怎样发展。要使我们的理想能够在实践中实现，必须先建立共和国。我们必须注意共和主义运动的动向，国际的委员应该参加这个运动，设法使它朝着需要的方向发展。要是共和主义运动带上资产阶级性质，它就会变成少数人的运动。工人阶级不能同一切传统形式一刀两断。

公民恩格斯说，在美国也像在英国一样有压迫，但是共和制度使工人阶级有许多机会进行宣传。在人烟稠密的州有工人运动，然而人烟稀少的地区还很多，有碍于工人运动的加强。

公民马克思表示深信，任何共和主义运动要是不变成社会运动，绝不能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目前运动的首领当然没有这种意图。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1 年 4 月 11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说道，他还应该报告一件事实。最近一个时期，报刊上充满了有关协会曾经做出一些荒唐事的流言。巴黎的一家报纸报道了最新的流言，说什么马克思似乎在 1857 年当过俾斯麦的私人秘书。

接着恩格斯说道，不能不谈谈巴黎的形势。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时候，事情进行得很好，而在选举⁴⁶⁸以后却是只讲不做了。向凡尔赛进军，应当是在凡尔赛还软弱的时候，可是这个有利的时机被错过了，看来现在凡尔赛占了优势并在逼迫巴黎人。人民是不会长久容忍别人把他们引向失败的。巴黎人正在失去土地，几乎无益地消耗弹药，吃光自己的储备粮。只要巴黎的一面还开放，用饥饿是不能迫使他们投降的。法夫尔已经拒绝普鲁士人的帮助⁴⁶⁹。1848 年 6 月，战斗在四天就结束了，但当时工人没有大炮。现在战斗不会这么快就结束。路易一拿破仑铺设了宽阔的街道，为的是可以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工人，然而现在这却方便了工人：他们将在街道上用大炮射击敌人。工人有 20 万人，

他们比在过去所有一切起义中都组织得好得多。情况是困难的，时机已经不像两星期以前那样好了。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32 年 3 月 18 日
“真理报”第 77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1 年 4 月 25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马克思……或者报纸^①。这在将来是会安排好的，因为公社与伦敦之间的贸易往来将由一个跑外的经纪人办理，他将同时负责送交我们的信件。

赛拉叶和杜邦已被提名为第十七区空缺的候选人⁴⁷⁰。赛拉叶曾来信说，杜邦定会当选，可是从选举以来，他就没有再来信；不过很可能他把信寄到曼彻斯特去了。可见，远不是所有发出的信件都按照地点投递到的。

费里克斯·皮阿和韦济尼埃在巴黎诽谤赛拉叶和杜邦，而当赛拉叶以控告来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抵赖。必须马上写信到巴黎去，讲清楚皮阿为什么要诽谤赛拉叶和杜邦。（根据公民莫特斯赫德的建议，总委员会委托公民马克思起草这封信⁴⁷¹。）

拉法格由巴黎防御工事线之外的邮局寄出了一些信件，因此这些信件在铁路沿线滞留了：信件既受到法国政府方面又受到普鲁士政府方面的检查。信里的大部分消息已陈旧，但也有报纸上没有谈到的一些事实。信中说，就同巴黎被围时期一样，外省现在很

^① 马克思发言的开头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因为总委员会记录簿缺少了这一页。——编者注

少知道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巴黎,如果不算那些正在进行战斗的地方,却从来没有这样安静。中等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加入了伯利维尔国民自卫军。大资本家都逃走了,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则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不能想像人民和国民自卫军的热情是多么高;凡尔赛人要想进巴黎,那真是愚蠢。巴黎不相信外省的起义,并且知道优势兵力正在集结起来反对它,但是它并不害怕,所担心的倒是普鲁士的干涉和粮食不足。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如果不颁布这些法令,四分之三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就要破产。杜瓦尔和弗路朗斯的被害,使人们都想为他们报仇。弗路朗斯的家属和公社派了专人详细调查他们的死因,但是他一无所获。弗路朗斯是在一所房子里被杀害的。

还得到了某些有关伪造电讯的消息。布鲁托在检查国防政府的帐目的时候,发现国防政府曾拨款制造改良的可搬动的断头机。断头机被找出来并且按照公社的命令当众烧掉了。煤气公司欠了市政府 100 多万法郎,但是它根本不想还债;只是在查封了它的财产以后,它才交出了相应数额的法兰西银行票据。许多记者的电讯和报道把这一切完全说成另外的样子。最引起他们恼怒的,是公社的管理费用很低。高级负责人员每年只得到 6000 法郎,其他公务人员只得到工人的工资。

宣言^①将在下次会议以前拟好。

发言报道载于 1871 年 4 月 29 日“东
邮报”
第 135 期(未提作者姓名)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
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 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弗·恩格斯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1 年 5 月 9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然后公民恩格斯宣布说，宣言^①还没有草拟好。公民马克思病得很重，宣言的起草工作使他的病势更加恶化了。但是宣言在星期六可以草拟出来，小委员会⁴⁷²可以在下午 5 时以后的任何时间在马克思那里集会。

公社的一位使者到了伦敦，他带来了一些好消息。公社不得不采取了一些严厉措施来防止没有通行证的人钻到城里来。已经发现凡尔赛的奸细在城里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主攻被击退了。凡尔赛的军队打算从国民自卫军的阵地和要塞围墙之间冲进来，但是它现在只能在一个地方，即在它先前已经遭受挫折的那个地方进犯。防御正在加强。公社失去了一块不大的土地，又重新占领了克拉马尔。即使凡尔赛军队占领了要塞的围墙，在围墙后面还有街垒，在这些街垒中将出现前所未有的战斗。这些街垒将第一次用枪炮和组织正规的军队来防卫。交战双方的军队现在接近势均力敌。凡尔赛招不到外省的军队，凡尔赛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兵力派到外省去维持各城市的秩序。梯也尔甚至不能准许市

^① “法兰西内战”。——编者注

镇议会的代表们在波尔多集会讨论政治问题；他不得不援引拿破仑的法律来阻止它⁴⁷³。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1941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 的发言记录⁴⁷⁴

摘自 1871 年 5 月 23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说明，他由于生病而没有能完成他答应起草的宣言，但他希望，宣言可以在下星期二草拟出来。谈到关于巴黎的斗争问题时，马克思说，他担心结局快要到来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扮演着梯也尔的宪兵角色的普鲁士人正在帮助镇压巴黎公社。俾斯麦、梯也尔和法夫尔勾结起来密谋消灭巴黎公社；俾斯麦曾在法兰克福肯定地说，梯也尔和法夫尔曾请求他参与此事。结果表明，他本来就打算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只是不用德国士兵的生命来冒险，——这并不是因为当问题涉及到利害关系时他会珍惜人命，而是因为他希望法国更加卑躬屈膝，以便有可能向它提出更多的要求。他允许梯也尔拥有的士兵数目超过协定的规定，但是他只答应向巴黎输送数量有限的粮食。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过去历史的重演。上等阶级过去总是联合起来镇压工人阶级。在十一世纪，法兰西的骑士和诺曼底的骑士之间发生了战争，当时农民举行了起义。骑士们马上就忘掉了自己的纠纷并且联合起来压制农民运动。为了说明普鲁士人如何执行警察的职务，可以举出一

件事实：在普鲁士人所占领的卢昂，有 500 人遭到了逮捕，逮捕的借口是他们是国际的会员。国际正在引起恐惧。若贝尔伯爵——老古董，1834 年的部长，一个以支持采取措施反对报刊而闻名的 人物——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在这次演说中说道，在恢复秩序之后，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追查国际的活动和打垮国际。

载于 1871 年 5 月 27 日
“东邮报”第 139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并根据“东邮报”校对过

卡·马克思驳资产阶级报刊 诬蔑国际和巴黎公社 的发言报道

摘自 1871 年 6 月 6 日总委员会会议报道

公民马克思请总委员会注意英国报刊正在散播关于巴黎公社的无耻谰言。这些弥天大谎是法国和普鲁士的警察蓄意制造的，因为他们害怕真相大白于天下。有人硬说米里哀尔是公社最疯狂的委员之一。其实他从来就不是公社委员，但是因为他是巴黎的议员，所以需要找个借口来枪毙他。英国报刊为梯也尔帮腔，扮演了警察和警犬的角色。为了替梯也尔的血腥政策辩护，而对公社和国际进行诽谤。报界对于国际的宗旨和原则是很清楚的。报刊上登载过国际在帝国时期在巴黎遭受迫害的消息。报界代表曾出席过国际工人协会的各种代表大会，报纸上也报道过这些代表大会的工作。虽然如此，各报仍然刊登了这样的报道，说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有芬尼亚兄弟会、烧炭党人、玛丽安娜社⁴⁷⁵以及其他一些秘密团体。报上仍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上校汉德逊是否知道据说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的地址？所以要捏造这一切，只是为了证明对国际采取任何措施都是理所当然的。“上等阶级”在国际的原则面前感到恐惧。

马克思还想请大家注意马志尼在“现代评论”⁴⁷⁶上写了一篇文章

章指摘巴黎公社。马志尼一向反对工人运动，这件事并不是像应该的那样为许多人所知道。马志尼曾谴责 1848 年 6 月的起义者。路易·勃朗就这一点做了回答，他在当时要比现在勇敢一些。

当负有家室重累的比埃尔·勒鲁在伦敦谋得工作的时候，正是马志尼给他告了密。事实说明，马志尼带着他那套老式的共和主义思想，什么也没有懂得，什么也没有做成。他用他那套民族主义的口号使意大利走上了军事专制。他在自己想像中建立的国家，对他说来就是一切，而现实存在的社会对他说来毫无意义。人民越快地摆脱这种人就越好。

载于 1871 年 6 月 10 日
“东邮报”第 141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 记者谈话的记录⁴⁷⁷

7月3日于伦敦

……我直截了当地谈到了本题。我说，看来世界上的人们不大了解国际是什么；人们强烈地憎恨它，但是未必都能说出究竟憎恨什么。某些自认为能比别人更深刻地洞察国际的秘密的人断言，国际是个一面有着工人的诚实和善良的微笑，另一面有着恶棍阴谋家的狞笑的两付面孔的雅努斯。我请求马克思把这类见解所无法道破的秘密解释明白。学者笑了起来，我觉得好像他是由于我们这样怕他而感到好笑。

马克思用非常讲究的汉斯·布赖特曼⁴⁷⁸语言谈起来：这里没有任何秘密，阁下，有的也许只是人们的愚蠢，他们偏偏忽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公开活动的，并且发表有关它的活动的极详细的报告，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读到它。您花一个辨士就可以买到一份我们的章程，花一个先令便能得到一些小册子，从这些小册子里，您差不多能够像我们一样知道我们的一切。

我说：“差不多”，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会不会最重要的东西是我认识不清的呢？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并且作为一个旁观者向您提出问题：这种普遍对你们的组织不表同情的态度除了证明一般人的无知的敌意以外，是不是还证明了什么别的？虽然您已经说过了，但能否允许我再问您一次：国际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您看一看组成国际的人——工人就明白了。

我说：对，不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士兵来判断指挥他们的政府。我认识你们的一些会员，并且完全承认他们不是搞阴谋的人。何况千百万人都知道的秘密已不成其为秘密。但是，如果这些人只不过是某个勇敢的——请原谅我这样说下去——但不太选择手段的委员会的工具呢？

马克思博士说：没有什么能证明这一点。

我说：那末巴黎最近的起义呢？

马克思博士说：首先，我请您证明那里有过什么阴谋，证明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既成形势的必然结果。就假定说有阴谋，那末又有什么可以证明国际协会参与其事呢？

我说：在公社各机关里有许多协会会员。

马克思博士说：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会员搞的阴谋了，因为他们以个人身分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宣布整个起义都是由共济会会员发动的，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还是试着找一下别的解释吧。巴黎的起义完全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成为这一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但是最有才能的工人往往同时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不过决不能要协会本身对他们的活动负责。

我说：外界对这一点却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议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甚至还在议论金钱的援助。是否可以，您所指出的协会活动的公开性质，排除了任何秘密联系的可能性呢？

马克思博士说：什么时候出现过不利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联系来进行工作的组织呢？但是，像谈论来自某个教皇统治和阴谋的中心的有关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法令一样来谈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这就是完全不懂得国际的实质。要是那样，在国际里就需要有集权的政府；但实际上它的组织形式恰恰给地方的主动性和

独立性以最大的自由。其实，国际完全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府；与其说国际是指挥力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联合。

我问：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说：目的是通过夺取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目的是利用这一政权来实现社会任务。我们的目的应当广泛到能包括工人阶级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如果赋予这些活动以特殊的性质，就意味着使它们只合乎工人的某一个集团的要求，只合乎某一个民族的工人的需要。但是怎么能够号召所有的人去为少数人的利益而联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的协会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就会失掉被称做国际的权利。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在新堡和巴塞罗纳，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在法国，层出不穷的迫害法令以及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对抗，看来将使社会战争这种暴力结局成为不可避免。但是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国际不会就这个问题下达什么命令，甚至未必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表示同情并给以自己章程规定范围内的援助。

我问：这种援助又是什么性质的呢？

马克思博士说：我举例来给您解释。罢工是解放运动的最常见

的形式之一。从前，在一个国家内宣布罢工时，由于从别国输入工人，罢工便遭到失败。现在国际几乎完全消除了这种情况。它得到准备罢工的消息之后，就把这些消息传播给自己的会员，他们立刻就知道，斗争所在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就是禁区。这样，老板们就只好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了。在大多数场合下，罢工者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援助。必要的资金，由他们在自己或与他们有更直接联系的团体成员当中募集；但是如果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如果罢工得到协会的赞同，就可以由公积金中拨款来接济罢工者。前几天巴塞罗那雪茄烟工人罢工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个例子⁴⁷⁹。但是协会感兴趣的并不是罢工，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支持。在金钱方面，协会不可能从罢工得到什么好处，而损失倒是可能的。让我们把事情的实质简要地总括一下。工人阶级在日益增长着的财富中仍然是无产者，在日益豪华奢侈的世界中仍然是穷光蛋。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工人不可能指望别人的援助。因此，在他们面前就产生了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绝对必要性。工人应该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现存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应该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知名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会和互助会、合作社商业和合作制生产，——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在这些组织间建立充分的团结，便是国际协会的事情。国际的影响已开始各地感觉到。在西班牙有两家报纸宣传它的观点，在德国有三家，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有三家，在比利时有六家，在瑞士也有六家。现在，我向您叙述了国际是什么之后，大概您自己对它那些被臆造出来的阴谋也会得出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那末马志尼也是你们的组织的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说(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们的成就是不会很大的。

我说: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一直相信,他是最进步的观点的代表。

马克思博士说: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们是不愿意和资产阶级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现代运动,而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未来的高度发展的民主主义的使徒。也许在1848年以前,当英国人所谓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获得发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的人。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都倒向反动派,无产阶级再不想知道他们了。

我说:有人说你们的组织内有实证论的因素。

马克思博士说:绝无此事。我们中间有实证论者,也有实证论者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而事情照样办得不错的。但是这决非他们的哲学的功劳,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哲学只是企图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

我说:既然如此,我认为现代国际运动的领袖们应当制定自己的哲学,就像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协会一样。

马克思博士说:完全正确。例如,很难期望我们能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要是我们把我们的战术建立在譬如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穆勒描述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希望表明,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

我说:您对美国的看法如何?

马克思博士说:我们活动的基本中心,目前是在旧欧洲国家。在此以前,许多情况都使人以为,工人问题在美国并不会具有如此

压倒一切的意义。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像在欧洲一样，随着那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的并与资本分离开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工人问题正在很快地提到第一位。

我说：我想，在英国，不论预期的结局如何，都可以不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达到它。在群众集会和刊物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的英国方法，使人可以这样指望。

马克思博士说：我在这一点上不像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级在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时，总是表示准备接受多数的决议。但是，请您相信，一旦当它在自己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

载于 1871 年 7 月 18 日“世界报”和
1871 年 8 月 12 日“伍德赫尔和克拉
夫林周刊”第 13 期（总第 65 期）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巴黎公社时期
的第一国际”1941 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

弗·恩格斯关于马志尼和国际的 关系的发言报道

摘自 1871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会议报道

公民恩格斯说，刚才有人谈到教皇，现在应该来谈谈反教皇了⁴⁸⁰；他要报告的就是朱泽培·马志尼曾在自己的报纸上攻击国际^①。马志尼宣称，他相信意大利人民热爱他，而他自己也热爱意大利人民，然后接着说：

“协会产生了，全部秩序将有被破坏的危险（教皇用的也是这些字眼），这个协会是几年前成立的，从一开始我就拒绝加入。协会由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指挥，其灵魂是卡尔·马克思，这是一个具有大智大慧，但是像蒲鲁东一样有一副破坏性的头脑的人，一个具有不容异己的性格，即嫉妒别人的影响的人。由不同国籍的人组成的总委员会，在讨论现代社会的灾难问题时不可能有一致的目标，对于这些灾难的消除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和民主同盟的意大利人支部（伦敦）才退出了协会。协会的三个基本原则是：第一，否认上帝，即否认一切道德；第二，否认祖国，使它溶合在公社的集体中，而互相仇视似乎是公社必然遭到的命运；第三，否认财产，也就是说，剥夺工人的劳动果实，因为个人财产权无非就是人人都有权支配他所生产的东西。”

马志尼在结束他对这三点的评论时，建议意大利工人阶级在

^① 见本卷第 418—420 页。——编者注

他的旗帜下牢固地组织起来，结成一个反对国际的同盟。他建议意大利工人相信意大利的未来，为意大利的未来和意大利的荣誉而工作，在工人中建立合作商店（不是生产合作社），以便人人都能得到尽可能多的利益。

请注意，马志尼在一个重大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他在一个地方说，“从一开始就拒绝加入国际”，但是他又在下面写道，他已经退出了国际。不妨设想一下，一个人怎么能退出他从来没有加入过的团体。其实马志尼从来就不是国际的成员，但是他曾企图把国际变成他的工具。马志尼草拟了一个纲领，并送交临时委员会审查，但是这个纲领遭到了否决。以后马志尼为了同一目的，又做了新的尝试，——通过沃尔弗少校，此人后来被揭露是警探，——当这些尝试遭到失败后，直到最近，他才不再干涉国际的事务。

至于上面提到的对国际的指责，它们不是虚构就是无稽之谈。第一点指责说国际强求信奉无神论，这是谎言，在总委员会书记答复茹尔·法夫尔通告的那封信中已经驳斥了这种谎言^①。第二点指责说国际否认祖国，这是无稽之谈。国际力求团结，而不是分裂。它反对关于民族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目的是各族人民的分离，暴君们往往利用这个口号来散播偏见和仇恨⁴⁸¹；拉丁族和条顿族之间的竞争造成了最近这次毁灭性的战争，拿破仑和俾斯麦都同样利用了它。第三点指责只是暴露了马志尼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问题上的无知。国际不是主张废除而是主张确立这种保证每个人的劳动果实的个人财产。现在，群众的劳动果实落入少数人的腰包，马志尼却建议原封不动地保持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而国际

^① 见本卷第 392—394 页。——编者注

主张消灭这种制度。国际竭力要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自己劳动的果实。来自意大利的信件都说，意大利的工人同国际走同一条路，马志尼的肤浅的诡辩不能把他们引入歧途。

载于 1871 年 7 月 29 日
“东邮报”第 148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弗·恩格斯关于召开 1871 年 伦敦代表会议的发言记录⁴⁸²

摘自 1871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恩格斯提出建议：“在 9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的在伦敦召开协会的秘密代表会议。”他说，由于战争所造成的情况，各支部在去年授权总委员会缓期召开一年一度的代表大会；现在情况并无多大改进。在法国，召开代表大会是不可能的。在德国，协会正遭到迫害，而且任何一个敢于参加代表大会的人，都要冒着被关进监狱的危险。在西班牙，协会也遭到迫害，而在比利时则没有任何自由。因此，如果考虑到这一切情况，就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开会，即英国和瑞士。但是公民罗班已经谈过在瑞士的协会会员中所发生的分裂。况且情况又是这样：即使召开了代表大会，也只有不多的支部能够派代表参加，可是总委员会必须就未来的政策问题同各支部进行磋商并使自己的全权得到批准，而这只有通过召开它所建议的秘密代表会议才能办到。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1936 年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总委员会记录簿

卡·马克思驳奥哲尔的发言报道⁴⁸³

摘自 1871 年 8 月 1 日总委员会会议报道

公民马克思说，他想再谈一个问题。原来，在土地和劳动同盟⁴⁸⁴的会议上，有一位他不认识的希普领先生——此人从其声誉看来是奥哲尔先生的助手，——批评了“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并且说马克思已经脱离总委员会。讲这种话，只是说明希普领先生无知，并不能证明他有才干，即使他是作为奥哲尔先生的傀儡讲的也好。说什么马克思承认是他提出了宣言中的那些指责，他就脱离了总委员会！——但是要知道，这样做是经过总委员会批准的，为的是让像奥哲尔先生那样替梯也和法夫尔诸公辩护的人，再也不能说他们不知道宣言中的指责是否正确。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公开承认自己是宣言的作者，就是向那些被指责的人提出了挑战，要他们出来控告作者犯了诬蔑罪，由法庭来审理这个案件^①。但是这样做对他们是不利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奥哲尔先生为什么不满意，这当然是不难理解的：他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极端无知，任何一个读报的人如果这样无知也是不可原谅的。奥哲尔说，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是无可疵议的，其实人人都知道，法夫尔在他的一生中是法国工人阶级和一切工人运动的仇敌；他是 1848

^① 见本卷第 401 页。——编者注

年六月血案的罪魁；他是 1849 年远征罗马的主谋，正是他设法把路易·勃朗赶出了法国，把波拿巴迎回来也有他的份。尽管如此，奥哲尔先生还恬不知耻地出面宣称：“茹尔·法夫尔的声誉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自以为是国际最积极的成员之一的奥哲尔先生想多少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就应当知道，这样说是毫无根据的。不是他故意说这种谎话，就是这种话表明了难以原谅的无知。最近五年以来，奥哲尔先生对于国际一无所知，因为他从未履行自己的义务。主席的职位已被代表大会撤销 485，因为它被发现毫无用处，并且徒有虚名。奥哲尔先生是国际的第一任，也是唯一的一任主席；他从未履行自己的义务；总委员会没有他也完全可以工作；因此主席的职位就被撤销了。

载于 1871 年 8 月 5 日
“东邮报”第 149 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东邮报”，并根据
总委员会记录簿校对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 开幕式上的发言记录⁴⁸⁶

摘自 1871 年 9 月 17 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马克思：总委员会召开代表会议，是为了同各国代表商定各种必要的措施，来消除协会在许多国家所遭到的危险，并且着手进行符合形势需要的新的组织工作。

其次，是为了对使用一切可能手段来不断破坏协会的各国政府制订出对策。

最后，是为了彻底解决在瑞士发生的纠纷问题。

在代表会议进行期间，无疑还会发生其他次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应当得到解决。

公民马克思还说，必须对俄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因为它企图把协会牵涉到一个众所周知的对一个秘密团体的审判案件里去，而这个团体的主脑人物全是同协会毫不相干的或者是敌视协会的⁴⁸⁷。

本届代表会议是不公开的，但是当全体代表返回本国时，总委员会将公布代表会议认为必须公布的决议。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译的，并
根据罗沙的记录草稿校对过

卡·马克思关于工联的发言记录⁴⁸⁸

摘自 1871 年 9 月 20 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

马克思以为巴塞尔代表大会没有通过这样的决议,经过检查后,他承认代表大会曾通过这样一个决议⁴⁸⁹。这是良好的愿望;当时他本人也认为这件事是可能的,现在他确信,工联不会赞同这样的联合了。马克思说道,工联是少数工人贵族的组织。低薪工人是不能加入的:每天被经济发展从乡村赶往城市的大批工人,长期留在工联外面,而最贫苦的群众从来都进不了工联。出生在伦敦东区的工人的情形也是一样,那里十个工人中只有一个工人参加工联。农民、短工从来不加入这些团体。

工联本身是没有力量的——它们始终是少数。它们不能领导无产者群众,可是国际却对这些人发生直接的影响;国际不需要组织工联来吸引工人;国际主义的思想一下子就把他们吸引住了。这是唯一能取得工人完全信任的团体。

语言的隔阂也阻碍了工联的国际主义团结。

二

马克思不同意斯廷斯对工联的担心⁴⁹⁰；工联——甚至其中组织得最好的，在美国有分支的——如果不转向我们，永远也做不了什么事；工联对英国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⁴⁹¹采取了旁观态度。

自从有了国际，形势就改变了；如果工联想运用自己的力量，那末依靠我们的帮助便什么都能够做到。工联的章程里有一条是禁止工联干预政治的；工联只是在国际的影响下才采取了政治行动。许多年来总委员会都同工联保持着联系；有过一个委员会⁴⁹²；现在总委员会还同三个大城市——曼彻斯特、北明翰、设菲尔德的工联有联系。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丁的记录译的，
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
草稿校对过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 行动的发言记录⁴⁹³

摘自 1871 年 9 月 20 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公民罗伦佐要我们遵守条例，公民巴斯特利卡也仿效他。我拿起“章程”和“宣言”的原本，无论在前者或后者中都能读到：总委员会有责任将他们的工作纲领提交代表大会讨论⁴⁹⁴。在总委员会提交代表会议讨论的工作纲领中，所谈的是协会的组织问题，瓦扬的提议正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因此，罗伦佐和巴斯特利卡的反对意见是没有根据的。

几乎在所有的国家内，国际的某些会员根据对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⁴⁹⁵的曲解，进行了放弃政治的宣传，而这种宣传是各国政府绝不想加以取缔的；甚至在德国，施韦泽和其他从俾斯麦那里领取薪俸的人士，都企图使支部的活动适合于政府的政策。在法国，这种放弃政治的罪恶做法使法夫尔、皮卡尔等人在 9 月 4 日取得了政权；同样的放弃政治的做法使巴黎在 3 月 18 日成立了一个包括许多波拿巴分子和阴谋家在内的专制独裁的委员会，这些人故意把本来他们应该用来巩固革命的革命最初几天白白地放过了⁴⁹⁶。

不久以前在美国召开的工人代表大会⁴⁹⁷，决定要认真地研究

政治问题，并且决定今后要选举那些负有维护本阶级利益使命的、像他们本人一样的工人为自己的代表，来代替那些以玩弄政客手腕为职业的人。

在英国，工人较难进入议会。因为议员不领取任何薪金，而工人所有的只不过是靠自己劳动赚来的生活资料，所以议会对工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资产阶级顽固地拒绝付给议员们薪金，他们很懂得，这是防止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议会代表的一种手段，

但是不应当认为，在议会里有工人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如果他们像德·波特尔和卡斯提奥一样被封住了嘴，如果他们像曼努埃尔一样被赶出议会，那末这种压制和不容异己的做法会对人民起很大的影响；相反地，如果他们像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一样得到在议会讲坛上讲话的机会，那末全世界就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不论在前后哪种情况下，都会为我们的原则建立巨大的威信。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对法战争时期，当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开始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以期不使工人阶级对所发生的事件负任何责任的时候，整个德国都为之震动，甚至在仅仅因啤酒价格才进行革命的慕尼黑，也发生了要求停止战争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各国政府是敌视我们的^①；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给它们以反击。每一个被选进议会的工人，都是对政府的一次胜利。但是必须选出真正的人，而不是托伦之流。

马克思支持公民瓦扬的建议和弗兰克尔提出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认为必须在建议前面加上一段理由，阐明这一声明的意义，也

① 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上，在这句话前面写道：“从七月革命时起，资产阶级就采用各种手段使工人不知不觉地受到阻挠。我们的报纸到不了群众手里。讲坛就是争取威信的最好工具”。——编者注

就是指出：协会不是第一天要求工人从事政治，而是一向都提出这个要求的。

第一次发表于 1934 年“共产国际”
杂志第 29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译的，
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
草稿校对过

卡·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 行动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1 年 9 月 21 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马克思说，他昨天已经表示赞成瓦扬的建议，因此，他不会反对这项建议。他在反驳巴斯特利卡时说，代表会议一开始就决定，只讨论组织问题，而不讨论原则问题。在讲到援引组织条例时，他提醒说：应当把章程和成立宣言看做一个整体；他再一次宣读了它们^①。

他叙述了有关放弃政治问题的始末。他说，不应当对这个问题作过多的争论。创造出这种理论的人是好心好意的空想家，但是，那些现在又要走这条道路的人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他们在体验过残酷的斗争以后，放弃了政治，从而把人民推到表面上的反对派即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行列中去，而我们在反对各国政府的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派。我们应当揭露甘必大，使人民不再受骗。马克思赞成瓦扬的意见。为了回击国际所遭受的迫害，我们必须向各国政府挑战。

反动派存在于整个大陆上；他们是普遍的和恒久的，——甚

^① 在一份记录草稿上接着是这样写的：“他反对主张不谈政治的人，说他们是宗派主义者。”——编者注

至在美国和英国也如此，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

马克思认为，对瓦扬的建议的措词应当做某些修改，因此，同意吴亭的建议⁴⁹⁸。

第一次发表于 1934 年“共产国际”
杂志第 29 期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马丁的记录译的，
并根据记录草稿校对过

卡·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国际 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记录⁴⁹⁹

摘自 1871 年 9 月 22 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你们知道，在德国，协会是不能以它真正的名义存在的，因为法律禁止地方性团体加入任何外国团体。但是协会在这个国家里却存在着，并且用早就加入协会的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德勒斯顿代表大会再次庄严地证实了加入协会⁵⁰⁰。因此，对这个国家，无须乎像对那些迫害协会的国家一样采取任何措施或发表任何宣言。

马克思说，如果他对德国大学生没有好评，那末他对工人是无可指责的。在使阶级斗争激化的前次战争期间，德国工人的表现是十分出色的；此外，**社会民主党**非常清楚：波拿巴和威廉发动这次战争，与其说是为了进行征服不如说是为了压制现代思想。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被逮捕^①，并被送到俄国边界线上的一个要塞里，大部分委员直到现在还以叛国罪名被囚禁在监狱里。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毫不畏惧地向帝国国会宣称他们是国际协会的会员，他们反对战争和拒绝投票赞成

① 见本卷第 295 页。——编者注

任何军事贷款。政府不敢在会议进行期间逮捕他们；他们俩只是在走出国会大门时才被警察抓住，送进监狱。

在巴黎公社期间，德国工人在集会上和自己的报纸上不断声明他们支持巴黎革命者。当公社失败时，他们在布勒斯劳召开了大会，普鲁士警察妄图阻挠而无效。在这个会上，如同在德国各个城市举行的其他会上一样，他们向巴黎公社致敬。最后，在威廉皇帝和他的军队凯旋归来、进入柏林时，人民高呼“公社万岁！”来迎接胜利者^①。

公民马克思指出，他在谈到英国的时候，忘记讲以下一点意见：你们知道，在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之间，早就存在着十分强烈的对抗，产生对抗的原因倒不难一一列举。对抗的根源是语言和宗教的不同^②，以及爱尔兰工人给英国工大造成的工资竞争。在英国，这一对抗成了革命的绊脚石，而且被政府和统治阶级巧妙地加以利用，政府和统治阶级深信，任何绳索都不可能把英国工人和爱尔兰工人结合在一起。的确，要在政治基础上团结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经济基础上来看，问题就不是这样了；双方都在成立国际支部，而作为国际支部，是应当朝着一个统一的目标共同前进的。爱尔兰支部将很快成为人数众多的支部。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译的，
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
草稿校对过

① 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中接着有这样一句话：“工人们表明了，他们是在德国代表社会主义意愿的唯一政党。”——编者注

② 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中，在这句话的后面还写着：“爱尔兰受到的长期压迫”。——编者注

卡·马克思关于秘密团体 的发言记录

摘自 1871 年 9 月 22 日国际工人协会
伦敦代表会议的会议记录

马克思宣读以下这个建议：“在因政府阻挠而现时无法设立国际协会经常性组织的国家内，协会及其地方性团体可以进行改组，改用各种其他名称；但是绝对禁止成立任何真正的秘密团体。”^①

秘密组织是一回事，而真正的秘密团体又是另一回事；相反地，必须同后者进行斗争。

在政治情况恶劣到连集会权利都成为非法的法国和意大利，参加秘密团体（这种团体的结果总是不好的）的倾向会十分强烈，并且，这种组织形式妨碍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因为这些团体不是对工人进行教育，而是要工人服从束缚工人的独立自主和模糊他们意识的那些强制性的和神秘的法规^②。

马克思要求通过他所宣读的建议。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第一国际
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版

原文是法文
俄文是按罗沙的记录议的，
并根据马丁和罗沙的记录
草稿校对过

① 参看本卷第 456 页。——编者注

② 在马丁的记录草稿中，还有以下这样一段话：“秘密团体会破坏国际协会的性质；它们对烧炭党是适合的；它们不符合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编者注

燕妮·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编辑的信⁵⁰¹

女士：

这封私人信（最初是寄给一个朋友的）可能引起公众的兴趣，因为通过这封信多少能够说明当今法国政府的恣意胡为，法国政府根本不顾个人的安全和自由，不惜以绝对虚假的借口逮捕外国人和本国国民。

我的妹夫拉法格先生、他的妻儿、我的小妹妹和我，在巴涅尔—德—吕雄度过了6月和7月，我们曾打算一直住到9月底。我想，在比利牛斯山区多住一些时候，每天利用吕雄著名的矿泉水，可以使我摆脱我的严重胸膜炎的后遗症。Mais dans la République Thiers l'homme propose et la police dispose.（可是在梯也尔共和国里，谋事在人，成事在警察。）拉法格先生的一位朋友在8月1日或2日就已经通知他，说一两天内警察会突然光临他家，万一在家里遇上了，一定会把他逮捕起来，他们的借口是：在公社时期，他曾一度到过巴黎；他曾作为国际的密使在比利牛斯山区进行活动；最后的但并非较不重要的一条，是因为他是他妻子的丈夫，就是说，他是卡尔·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先生知道，在目前这帮法律家的政府的统治下，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他们不断地把人们关入监狱而不提出任何逮捕的理由，因此他便

遵照对他的劝告，越过国境，在西班牙的一个小城镇博索斯特住下来了。在他离开几天以后，即8月6日，拉法格夫人、她的妹妹爱琳娜和我曾在博索斯特探望过拉法格。拉法格夫人认为她的小儿子由于健康情况当天不能离开博索斯特（她十分担心这个孩子的身体，因为他的哥哥就是在几天以前死去的），她决定留下来和丈夫多住一两天。因此，我的妹妹爱琳娜和我就单独返回吕雄。

我们平安地穿过西班牙的那些崎岖道路，顺利地抵达福斯。在那里，法国的关税稽察员向我们提了几个一般的问题，往我们车里看了几眼，看我们是否携带了违禁物品。因为我们除了大衣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于是我就吩咐马车夫驾车，这时在我们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此人正是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共和国的检察官）^①德扎加尔男爵，他说：“我以共和国的名义请你们跟我走。”我们就离开马车，走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个极讨厌的家伙——很不像女人的女人——在等着我们，她是奉命来搜查我们的。因为我们不想让这个粗鲁的家伙来碰我们，便提出由我们自己来脱外衣。这个长得像男人一样的女人根本不理睬这一点。她跑出房间，很快就回来了，一起来的有共和国的检察官，他非常粗暴地对我的妹妹说：“如果你不让这个女人搜查你，我可要亲自动手了。”我的妹妹回答说：“你没有权利触摸一个英国公民，我有英国的护照。”但是我们看出英国护照并不怎么受重视，出示这种护照并未博得男爵德扎加尔先生的特别尊敬，因为看样子他真的准备说到做到了，我们便答应听任这个女人来搜查。她甚至把我们外衣的缝边都拆开了，进而还要我们脱下袜子。至今我似乎还能感觉到

^① 初审法庭的检察官。——编者注

她的蜘蛛般的手指在拨弄我的头发。她在我身上只找到一份报纸，在我的妹妹那里搜到一封已经撕碎的信，她就带着它们跑去见她的同伙男爵德扎加尔先生。我们被送上我们的四轮马车；当我们住在比利牛斯山区时期一向为我们充任“向导”并对我们依依不舍的马车夫，被强迫打发走了，换了另一个人。在车上，我们对面坐着两名官吏，这样我们就在一辆装满了税务官和警察的马车的伴随下出发了。过了不久，我们的护卫队已经确实认为我们并不是那样危险，我们并不图谋杀害我们的守卫者，于是便离开我们，我们也就由车上的两名官吏看管了。我们在这样的保卫下穿过了一村又一村，在经过圣贝阿时，这个还算大的市镇的居民成群地聚拢来，他们显然以为我们是小偷，至少也以为我们是走私犯。八点钟，我们疲惫不堪地到达了吕雄，穿过市立公园，在那里有成百上千的人在听音乐，因为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正是举办音乐会的旺季。我们的马车在省长凯腊特里伯爵先生的公馆前面停下来了。由于这位大人不在家，命令我们在他的门口等候，至少等了半个小时，一直有人在监视着。最后，传下了命令，把我们送回家，房子原来已经被宪兵包围了，我们立刻上楼去，打算梳洗一下（我们从清晨五点钟就上路了），但是，一名宪兵和一名便衣警察甚至跟着我们走进了卧室，所以我们没有梳洗，又回到客厅去恭候省长的光临。时钟敲了九点、十点，凯腊特里先生还没有来，这时他正在公园里听音乐，据说他决定在最后一个和声响完以前绝不离座。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里挤满了 *mouchars*（侦探），他们走进房间里来就好像是走进他们自己的房间似的，他们就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坐在我们的椅子和沙发上。我们很快就被一群各色各样的警察包围了；从一切迹象看来，共和国的这些忠实奴仆是在

帝国时期学成出师的，——他们完全掌握了自己光荣的手艺。他们采用各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阴谋诡计来引我们说话，但是当他们的看出他们的一切努力并不见效，便一直瞪着眼睛望我们，那种样子只有“专干这行的”才能做得出来，最后到十点半钟，省长驾到，与他同时来的还有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法院侦查员、治安法官、土鲁斯和吕雄的警官等人。他们命令我的妹妹到隔壁房间里去，土鲁斯的警官和一名宪兵也跟着她走开了。对我的审讯开始了。我拒绝说出有关我的妹夫和其他亲友的任何消息。至于我本人，我说，我在治病，到吕雄来就是为了进行矿泉治疗。凯腊特里先生对我软硬兼施，达两个多小时，最后他就威胁我，要是我再拒绝做证人，就把我当做同谋犯。他说：“明天法律会强迫您宣誓作证的，因为——允许我告诉您，——拉法格先生和他的妻子已经被捕了。”这时我很不安，因为我妹妹的孩子还在病中。

最后，轮到我的妹妹爱琳娜了。当她要说话的时候，他们叫我背向着她。在我面前站着一名军官，以防我会对她做任何手势。遗憾的是，我只听到他们一步一步地逼着妹妹对他们所提出的无数问题回答“是”或“不是”。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方法向她逼供的。原来凯腊特里先生指着我的书面声明（由于背向着他，我未能看到他的姿态），说的却是与我实际上所说的正好相反的话。因此，妹妹害怕与我讲的不一致，就没有驳斥那些似乎是我做的声明。对她的审讯，直到两点半钟才结束。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少女，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在非常炎热的八月天旅行了九个小时，而且在博索斯特时就没有吃过一点东西，被反复审讯到深夜两点半钟！

土鲁斯的警官和几名宪兵在我们家里度过了下半夜。我们躺下了，但是不能入睡，因为我们在绞尽脑汁地想设法派一个人到

博索斯特去预先通知拉法格先生，如果他尚未被捕。我们向窗外望了一下，宪兵们在花园里踱来踱去。走出这所屋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受到严密的监禁，甚至不准我们与女仆和房东太太见面。第二天，房东太太和仆人都具了结。总检察官德尔佩克先生和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又对我审问了一个多小时。这位吹牛英雄德扎加尔男爵先生对我念了许多大段的引文，同时指出了如果我再拒绝做证人我将受到的那种惩罚。然而这些先生们是白费唇舌。我平静地但是斩钉截铁地说，我绝不宣誓，并且仍然毫不动摇。

对我的妹妹的审讯，这次只有几分钟。她也是坚决拒绝宣誓。

在总检察官临走以前，我们要求他准许我们给母亲写几行字，因为我们担心报纸上也许会登载我们被捕的消息，这消息会使我们的父母焦灼不安的。我们提议当着德尔佩克先生的面用法文来写这封信。信的内容无非是“我们平安”数语而已。这位检察官拒绝了我们的要求，他的借口是我们可能有暗语，在“我们平安”这种话里面可能包藏着什么秘密的涵义。

这些法官胜过了道勃雷和佛其慈。这里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们真是愚蠢得令人难以思议：当他们发现我们的女仆把人家寄给拉法格先生的许多关于出口绵羊和公牛的商业信件交给我们时，就大喊大叫：“公牛、绵羊，这是阴谋，阴谋！绵羊是指公社社员，公牛是指国际的成员。”

在白天结束以前和晚间，我们又受到好几个宪兵的照顾，有一个宪兵就坐在我们对面，甚至我们吃饭的时候也是如此。

第二天，8日，省长和另一个人来访问我们，据我们推测，那人大概是他的秘书。“法兰西报”登载的关于我们这次谈话的报道是

完全不确切的和虚构的，许多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报道。现在我们还是回过来谈谈这位省长吧。

凯腊特里先生在做了冗长的开场白以后，很诚恳地通知我们说：当局弄错了；现已查明，对拉法格先生起诉是毫无根据的，他并没有罪，因此可以随意回到法国来。“至于令妹和您本人”，——凯腊特里先生一面说，我想，他一面心中在盘算：天上的仙鹤不如手中的家雀，——“你们的罪证比拉法格先生的要严重多了”（这样一来，我们突然从证人变成了被告），“大概要把你们驱逐出法国。但是政府释放你们的命令，一天之内就要下来了。”然后他又用长辈的口吻说：“无论如何：我劝你们以后还是安分点，pas trop de zèle（不要太热心）！”接着，被我们设想为秘书的那个人突然问道：“国际在英国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吗？”我回答说：“是的，非常强大，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凯腊特里先生叫着说：“噢！国际，这是一种宗教！”凯腊特里先生临走时再一次以名誉担保，保尔·拉法格没有事了，要我们立即写信到博索斯特，把这告诉他，劝他回到法国来。但是我觉得在凯腊特里先生的钮扣孔上佩带着一条荣誉军团的红色绦带，由于我总认为荣誉军团的骑士们的名誉完全不同于一般凡人的名誉，所以我想谨慎一些没有坏处，我没有劝拉法格先生返回吕雄，相反地，我请一位朋友给他送去一些钱，使他能更走远一些，到西班牙的内地去。

宪兵们处处与我们形影不离，我们白白地等待答应释放我们的命令。夜间十一点钟，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走进我们的房间，但是他并没有给我们送来释放令，而是要我们收拾起必要的东西，跟他前往 une maison particulière（一座特别的房屋）。我知道这是违法的，然而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跟我们一起在家的只有几个

妇女，而检察官却由一大批宪兵护随着。为了不给这位胆小的吹牛家德扎加尔先生以使用粗暴手段的乐趣，我们吩咐哭哭啼啼的女仆准备好我们的外衣等物，我们还设法安慰房东太太的女儿，答应她我们很快就回来，然后我们才登上已坐有两名宪兵的四轮马车。在这异国他乡的深夜，真不知道要把我们送到哪儿去。

原来把我们送到了 *gendarmerie* (宪兵营) 的营棚里。他们给我们指定了一间卧室，从外面牢牢地顶住我们的房门，便把我们单独留下了。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整个第二天，直到五点半钟，我决定要了解一下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就要求见省长。凯腊特里先生来了。我问他，在他答应让我们自由以后，却把我们送到 *gendarmerie* 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他回答说：“由于我的干涉，才准许你们在 *gendarmerie* 过夜。政府(梯也尔先生)本来要把你们送进土鲁斯附近的圣果当监狱。”然后凯腊特里先生交给我一封附有两千法郎的信，这封信是波尔多的银行家寄给拉法格先生的，在此以前凯腊特里先生一直扣押着这封信。他宣布说，我们自由了，不再被驱逐出法国，而且像拉法格先生一样，可以随意决定是否留在这个国家里。

这一次我们大意了，竟把凯腊特里先生所谈的有关拉法格的话通知了拉法格夫人。

10日，我们收到一张到西班牙去的 *laisser-passer* (通行证)，但是他们没有把我们的英国护照交还我们。我们白白地为它奔走了十天。凯腊特里先生写信告诉我们，说他将护照送往巴黎去了，虽然多次提示，仍未寄回给他。

这时我们才深信，他们把我们从小小的吕雄 *gendarmerie* 放出来，只是为了把我们关进大的 *gendarmerie*——梯也尔共和

国。我们成为俘虏了。没有护照，我们就不能离开法国，显然，他们准备把我们一直留在法国，以便一有机会可以再把我们逮捕起来。

土鲁斯的警察厅每天指责我们，说我们作为国际的密使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上进行活动。他们又说，“可是省长已经采取断然措施来安定 (pour rassurer) 上加龙的居民。”不错，是给了我们一张到西班牙去的 *laisser-passer*，然而住在西班牙的拉法格夫人的遭遇又是如此，我们简直不愿意在西得的国土上寻找一个避难所。

拉法格夫人后来告诉我们的那些事实，使我们又回想起 8 月 6 日的那一天。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的马车夫在福斯被迫离开了我们。事后，*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德扎加尔先生和几名警界的“绅士”假惺惺地企图说服他回到博索斯特，用编造的口实劝拉法格先生前来福斯。幸好一个诚实的人胜过半打警探。这个机灵的年轻人明白这些甜言蜜语里有问题，便毅然拒绝去找拉法格先生。于是宪兵们和税务官员就在检察官的带领下向博索斯特进军了。男爵德扎加尔先生认为“慎重是勇敢的最大要素”^①，他事先就宣布：要是没有足够的卫兵，他绝不到福斯去捉拉法格先生；又说，他带着一两名宪兵对付不了像拉法格先生这种也许会使用枪炮的人。德扎加尔先生弄错了——给他准备好的不是子弹，而是一顿拳打脚踢。他从博索斯特归来时，忽然想起去干预一群聚在一起庆祝农村节日的农民。那些爱好自由不下于爱好山区空气的骁勇山民，把高贵的男爵着实地揍了一顿，把他撵走了。他吃了亏可并未学到乖！但是我扯远了。

^① 这句说已用作成语，摘自莎士比亚剧本“亨利四世”前篇第五幕第四场。——编者注

我刚才谈到德扎加尔先生及其扈从向博索斯特出发。不久他们便抵达这个市镇，找到了拉法格全家下榻的旅馆，因为博索斯特的居民只有两家旅馆，或者不如说，只有两个客栈。他们还没有文明到拥有一定数量的客栈。正当德扎加尔先生站在麦斯旅馆的大门口时，拉法格先生却在他的那些好朋友即农民的帮助下从后门走出去，爬上山头，顺着那些只有向导、山羊和英国旅行者才熟悉的羊肠小道逃走了，因为在那些大路上都有西班牙的马枪兵守卫着。西班牙的警察热心地帮助他们的法国同行。拉法格夫人真是命中注定要受到警察国际团结的全部恩赐。凌晨三点钟，四名西班牙军官闯入她的卧室，用马枪直对着拉法格夫人带着孩子睡的那张床。可怜的病儿突然惊醒，便大声哭叫，但是这并不妨碍西班牙军官们搜查房间的每一个小洞和每一条裂缝，看看其中有没有拉法格先生。最后，他们确信他们追捕的人已经溜走，便宣布要带走拉法格夫人。这时旅馆老板——一位很值得尊敬的人——出面干涉，他说西班牙政府绝不会同意引渡妇女。他说得对。拉法格夫人被允许留在博索斯特，但是从此以后便一直受到警探的监视。一队密探把他们的总司令部设在旅馆里。在一个星期天，省长本人和 *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 甚至不辞劳苦地从吕雄到博索斯特来看看拉法格夫人。但他们由于好奇心未得到满足，便玩起 *rouge et noir* (红与黑)^①聊以自慰；这种赌博同玩巴卡拉纸牌，是目前住在比利牛斯山区的凡尔赛 *petits gras* (纨绔少年) 唯一认真从事的工作。

我差一点忘记说明为什么凯腊特里先生没能看到拉法格夫

① 赌博的纸牌游戏。——编者注

人。事情是这样的：一位从吕雄来的法国农民把凯腊特里先生这次访问的消息通知了自己在博索斯特的几个西班牙朋友，这些人当然立刻就把它告诉了拉法格夫人。

比利牛斯山区的法国居民和西班牙居民建立了攻守同盟来对付他们各自的政府。这一次他们就侦察了省长的官方密探；尽管他们在法国边境上常常遭到阻拦，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设法传递我们想知道的消息。最后，凯腊特里先生下令，任何人甚至向导如果没有规定的通行证，不得前往博索斯特。这项措施当然没有妨碍我们仍像过去那样得到消息；它不过是更加激怒了比利牛斯山区的农民，他们对凡尔赛的“地主议会”早就抱有敌对情绪。

我后来听说，在法国其他地方，农民也是十分仇视自己的所谓代表，即当权的地主。梯也尔先生在执行一个伟大的革命任务！他在他的省长、教士、乡村的武装看守者和宪兵的帮助下，很快就要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

当我们被释放出 *gendarmerie* 以后不久，拉法格夫人就把拉法格先生逃走的消息通知了我们。后来我们从博索斯特的一个居民那里知道，拉法格先生在韦斯卡被捕，有些西班牙人建议把他引渡给法国政府。在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治安法官把我们的英国护照退还给我们了。我们知道拉法格夫人因孩子生病滞留在博索斯特，同时又不知道丈夫的命运究竟如何，正在焦急不安，为了使她不再焦急，我们立刻决定到韦斯卡去，打算向省督了解一下西班牙政府对拉法格先生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到了圣塞瓦斯田，我们高兴地知道拉法格先生已被释放。于是我们立即返回英国。

在结束这封信的时候，不能不简短地谈一谈我们的房东太太

C夫人和女仆于8月6日当我们不在家时受到的遭遇，因为同这件事比较一下，警察对待我们真可以说是礼遇有加了。那天上午十一点钟，省长、总检察官、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等等人冲进了我们的家。他们因为没有把拉法格先生抓到手而大发雷霆，迁怒于C夫人这样一个患心脏病多年的妇女，迁怒于我们的女仆。他们对这个可怜的女孩子非常粗暴，因为她不愿意说出她的主人的去向。

然而省长从一个男孩子即C夫人的园丁口中把这件事打听出来了，他便立刻打发他到福斯去，躲在篱笆后面窥伺我们，当我们一到就通知procureur de la République这些大人先生们。

要是凯腊特里先生在与普鲁士人作战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使他的翼侧和后方免遭突袭，设置观察哨和派遣侦察员到前面去，使敌人的部队措手不及，那末布列塔尼的仗就会打得好些，以然，这就是就凯腊特里在福斯的战术的成就而言！

他们不允许我们的房东太太在她自己的厨房里生火，命令她不睡床而睡地板。然而后一项命令她没有服从。省长抓着她的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硬说是拉法格先生的儿子。C夫人不止一次地要他相信，他弄错了，但是徒然无效；最后，她竭力想证实孩子的身分（她怕孩子会被带走），就大声喊道：“饶了我吧！孩子只会讲本地话！”起先省长甚至对这个论据也还不太相信。可能，这位相信“国际是一种宗教”的凯腊特里先生，这时想起了上天恩赐使徒说不同语言的奇迹⁵⁰²。

C夫人之所以受到这样的虐待，原因之一就是她一生中从来没听说过国际，因此不能说出这个秘密团体在吕雄的活动。顺便说一句，对于一个消息最灵通的会员说来，这也是一项力不胜任的任

务——至少在凯腊特里先生为国际协会开始积极宣传以前。后来他们又说C夫人不该赞扬她的房客拉法格先生。但是主要的罪行是，她没有能指出哪里藏有炸弹和煤油。

是啊！的确是要在我们家里寻找炸弹和煤油。

这位大权在握的官员发现了一盏为孩子热牛奶的小夜灯，就开始郑重其事地仔细检查这盏小灯，他是如此小心翼翼，似乎这是一个可以用来把煤油从吕雄洒到巴黎大街的伪装爆炸物。甚至冈豪森也没有这样想入非非。法国政府是 capable de tout (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当局真的相信荒诞的煤油寓言——自己病脑幻想的产物。他们真的以为巴黎的妇女“既非兽又非人，既非男又非女”，而是一些《pétroleuses》⁵⁰³——生来嗜火的火怪的变种。

他们在这方面并不比他们的先知和师傅“巴黎报”的昂利·德·佩恩逊色，听说此人真以为他以我父亲名义所写的那些声名狼籍的信件不是昂利·德·佩恩写的，而是卡尔·马克思写的。

对于已经失去理智的政府可以鄙薄地报以沉默，而对于那些由这个政府的无聊小丑扮演糊涂虫和讨厌鬼的滑稽戏，则可以付之一笑，如果这些滑稽戏不变为千百个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悲剧的话。请想一想在凡尔赛军事法庭前面的那些《pétroleuses》吧，想一想最近三个月在水上监牢里被慢慢折磨死的妇女吧！

燕妮·马克思

1871年9月于伦敦

载于1871年10月21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3期(总第75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工人协会 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⁵⁰⁴

小委员会起草的决议

鉴于：

(1) 美国的每一个支部都有权派代表参加纽约的美国联合会委员会，于是该委员会便具有真正代表机构的性质；

(2) 国际在美国的组织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纽约的联合会委员会；

(3) 无论在协会的章程中或者在国际为美国特别规定的组织原则中，都没有任何条文妨碍任何支部在本民族中扩大协会的影响；

总委员会建议继续维持纽约的美国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直到国际在美国由于扩大而必需召集美国所有支部来选举新的联合会委员会为止。

1871年11月5日总委员会通过
载于1871年11月25日“社会主义者报”
第8号和1871年12月2日“伍德赫尔和
克拉夫林周刊”第3期（总第81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是按埃卡留斯的
手抄稿译的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是马克思在 1870 年 7 月 19—23 日写成的。1870 年 7 月 19 日，即普法战争爆发的当天，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关于这次战争的宣言。宣言在 7 月 23 日为总委员会常委会通过，接着在 1870 年 7 月 26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批准。宣言首先用英文刊登在伦敦 1870 年 7 月 28 日“派尔—麦尔新闻”第 1702 号上，几天以后以传单的形式印行了一千份。英国的许多地方报纸也全文或摘要转载了宣言。宣言曾送交“泰晤士报”编辑部，但该报拒绝发表。

鉴于宣言的第一版很快就销售一空，所印的册数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总委员会在 1870 年 8 月 2 日决定再增印一千份。1870 年 9 月，第一篇宣言又和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一起用英文再版；在这一版中，马克思改正了第一篇宣言在第一版中的刊误。

8 月 9 日，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把第一篇宣言翻译成德文和法文并加以传布。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马克思、荣克、赛拉叶和埃卡留斯。宣言用德文首次发表在莱比莱比锡“人民国家报”1870 年 8 月 7 日第 63 号上，译者是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得到宣言的这个德文本之后，对译文作了彻底的加工，对全文的几乎一半重新进行了翻译。宣言用这个新的德译本发表在 1870 年 8 月的“先驱”杂志第 8 期上，同时以传单的形式单独出版。1891 年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的时候，恩格斯在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版中发表了总委员会的第一、第二两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译第一、第二两篇宣言的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译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

宣言用法文发表于 1870 年 8 月“平等报”、1870 年 8 月 7 日“国际

报”第82号和1870年8月7日“米拉波报”第55号。宣言也用总委员会所设委员会译成的法文以传单形式出版。

第一篇宣言于1870年8—9月首次用俄文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人民事业”第6—7期上；在1905年，第一、二两篇宣言收入了由列宁审订的按1891年德文版翻译的“法兰西内战”的版本中（见注191）。后来，这两篇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又多次用俄文和“法兰西内战”本文一起发表过。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从1869年10月2日至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自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这家报纸因为发表大胆的革命言论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被逮捕，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变动，但报纸的总的领导仍然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工作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卓越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是它的撰稿人，经常帮助编辑部并且一贯地为它纠正路线。尽管“人民国家报”有某些缺点和错误，它仍不失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

“先驱”（《Der Vorbote》）月刊是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1年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尔。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有系统地发表国际的文件，报道协会的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

“平等报”（《L'Égalité》）是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从1868年12月至1872年12月在日内瓦以法文出版。在1869年11月—1870年1月，混入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分子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它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但是在1870年1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设法更换了编辑部的成员，清除了其中的巴枯宁分子，以后该报又开始支持总委员会的路线。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是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从1869年到1873年在德·巴普的直接参加下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经常发表国际的文件。

“米拉波报”（《Le Mirabeau》）是1868年至1874年在佛尔维耶出版的比利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

“人民事业”（《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是一批俄国革命流亡者于1868年至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的报纸（1870年4月以前为杂志）；创刊号是巴枯宁主编的，从1868年10月起，编辑部（其中有尼·吴亭等人）同巴枯宁决裂并反对他的观点；从1870年4月起，它是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机关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登载国际的文件。——第3页。

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3—14页。——第3页。

3 拿破仑第三政府企图巩固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的摇摇欲坠的第二帝国政权，于1870年5月举行了公民投票（全民投票）。提付表决的问题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来，即要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着反对一切民主改革。尽管政府采取了这种蛊惑性的伎俩，公民投票仍然表明了反政府力量的增长：投票反对政府的有150万人，拒绝参加投票的有190万人。政府在准备公民投票的同时，广泛采取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措施，对工人组织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歪曲它们的目的，用“赤色恐怖”来吓唬中间阶层。

国际的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职工会联合会在1870年4月24日发表宣言，揭露了波拿巴派玩弄的公民投票，并号召工人们拒绝参加投票。在公民投票的前夕，政府以警察捏造的谋刺拿破仑第三的罪名逮捕了巴黎联合会的会员；政府还利用这一罪名在法国各城市里对国际会员发动大规模的迫害运动。在1870年6月22日至7月5日举行的对巴黎联合会会员的审判中，完全揭露了这一罪名的虚伪性；但是波拿巴的法庭仅以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为罪名对在法国的许多国际会员判处了徒刑。

在法国对国际的迫害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广泛抗议。——第3页。

4 指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举行的政变，第二帝国的波拿巴政体即由此肇始。——第4页。

5 “觉醒报”（《Le Réveil》）是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原为周刊，从

1869年5月起改为日报,从1868年7月至1871年1月在巴黎出版,由沙·德勒克吕兹主编。从1870年10月起反对国防政府。——第4页。

- 6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是一家法国日报,左派共和党人的机关报,1869年12月至1870年9月在巴黎出版。该报经常刊载有关国际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的材料。——第5页。

- 7 指十二月十日会(为纪念该会庇护人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这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阀等组成。虽然1850年11月该会在表面上被解散了,实际上它的党羽还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且积极地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73—176页)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

支持路易·拿破仑的掠夺计划的沙文主义的示威游行,是波拿巴分子于1870年7月15日在警察的配合下组织的。——第5页。

- 8 萨多瓦之役于1866年7月3日发生于捷克,交战双方是: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的军队为另一方。它是以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告终的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历史上这次战役又称凯尼格列茨(现为格拉杰茨—克拉洛维)之役。——第6页。

- 9 1870年7月16日在不伦瑞克和7月17日在开姆尼斯举行的工人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爱森纳赫派)为表示抗议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而召开的。

1870年7月16日不伦瑞克大会的决议,马克思引自1870年7月20日“人民国家报”第58号。——第7页。

- 10 “战争短评”是弗·恩格斯大量的军事著作的一部分,在这里,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分析了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事件。“战争短评。”包括59篇紧密联系的军事评论文章,其中40篇的标题是“战争短评”(每篇加编号),其余则用各种不同的标题。

撰写论述普法战争的文章的直接原因是，“派尔—麦尔新闻”的撰稿人之一梯布林(塔朗)建议马克思向该报投寄军事通讯。马克思把这个建议转给恩格斯。恩格斯把头三篇文章寄给马克思，由马克思看了后转寄给编辑部。至于以后的文章，恩格斯为了使它们及早发表，就直接寄给“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

恩格斯评论普法战争的文章都是紧随着所发生的事件写的。恩格斯仔细地研究了他所能得到的有关战事的一切资料，如英国、德国和法国报刊的消息，法国和德国的最新电讯。尽管这些消息不完整而且互相矛盾，恩格斯在文章中除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对个别细节叙述得不确切外，仍然能够描述出战争的真实过程。

恩格斯在开始写“战争短评”时预定每周两篇；但是头三篇文章一发表，引起了读者很大兴趣和整个报界注意，以后“派尔—麦尔新闻”的编辑格林伍德便建议恩格斯不限数量地为该报寄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恩格斯每周写三篇甚至四篇文章。

格林伍德不止一次地未经恩格斯的同意修改他的文章。恩格斯在他的信中曾指出，“战争短评(三)”中的各种军语曾被任意修改，而这些修改证明格林伍德不懂军语；“战争短评(十三)”中还加了最后一段(见注44)。

“战争短评”是从1870年7月29日至1871年2月18日在“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的；除了头三篇著名《乙.》以外，其余各篇都没有署名，而且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恩格斯。恩格斯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极受欢迎。许多报刊都在自己的评论中转述了这些文章的内容。从此恩格斯在他的朋友中间就有了“将军”的绰号。

恩格斯在世时，他的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没有再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维·阿德勒保存的“派尔—麦尔新闻”的剪报(每篇剪报的右上角或左上角都有恩格斯的亲笔签名)，许多年以来都没有让广大读者知道。在维·阿德勒死后过了几年，即在1923年，恩格斯的文章才被编成以“战争短评”为总标题的英文单行本在维也纳石印出版。“战争短评”的俄文本在1924年第一次出版。

“派尔—麦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是1865年至

1920年在伦敦出版的日报,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采取保守派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0年7月至1871年6月曾同这家报纸保持联系。

该报除了刊载恩格斯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外,还刊载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并摘要地刊载第二篇宣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派尔—麦尔新闻”有一段时期曾经是“伦敦唯一没有被收买的报纸”。但是在1871年6月底,该报参加了资产阶级报刊因巴黎革命而发起的反对共产国际的总的诽谤运动。这种情况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报断绝了一切联系。——第11页。

- 11 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代替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见注29)。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在普选权基础上产生的联邦国会的立法权受到严格限制:它所通过的法律要经过成员反动的联邦会议的同意和联邦元首的批准才能生效。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维尔腾堡和黑森—达姆斯塔德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使德意志的国家统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第13页。
- 12 恩格斯指的是1864年普鲁士同丹麦战争归普鲁士统治然后并入普鲁士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劳恩堡公国,以及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胜利后并吞的汉诺威王国、黑森—加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霍尔施坦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斯塔德部分领土。——第13页。
- 13 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是把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27—32岁)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在后备军中的服役期为5年。后备军制度最初是在1813—1814年在普鲁士出现;后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在平时后备军各部队只进行几次集训,在战时后备军则应当担负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在1870—

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被用来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在战时,40岁以下的成年人都要参加后备军。——第13页。

- 14 多管炮或称霰弹炮是一种装在沉重的炮架上的多管连射武器。在1870—1871年,法军装备的多管炮有25个身管,可以利用专门的机械连续进行发射。普法战争的经验表明,多管炮构造不完善,不适于野战中使用。——第14页。

- 15 朱阿夫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的称呼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部落的名称)。朱阿夫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阿尔及利亚当地居民组成的殖民地部队,后来由法国人组成,但是保持原先的东方服饰。

土耳其即阿尔及利亚猎兵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编成的一种法国轻步兵,除了军官和部分军士以外,由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组成。——第14页。

- 16 法国国民自卫军按照1868年的法令分为流动国民自卫军和地方国民自卫军。流动国民自卫军是由那些没有服现役和预备役的适龄的应征人员组成,其使命是担负边防、后方勤务和警备勤务。到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流动自卫军的编组工作还没有展开;在战争期间编入流动国民自卫军的包括20到40岁的人员。

地方国民自卫军由免服现役的人员和年岁较大的应征人员组成。

在法国正规部队被击溃以后,国民自卫军组成法国武装力量的核心。1872年国民自卫军被解散。——第15页。

- 17 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也像他对军事事件可能的进程的其他许多预测一样,完全被证实了。恩格斯所指的这一地区在8月初成为普法战争最初几次大会战的战场(见本卷第31—35页“普军的胜利”一文)。——第19页。

- 18 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时期,法国和皮蒙特军队于1859年6月24日在索尔费里诺(意大利北部)会战中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的失败决定了有利于法国和皮蒙特的战争结局。恩格斯在“索尔费里诺会战”、“历史的公断”和“索尔费里诺会战”的几篇文章中分析了会战的进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48—461

页)。——第 20 页。

- 19 指格·卡迪纳耳·冯·维德恩“莱茵河和莱茵河战局。对莱茵河地区和邻近的德法地区的军事地理和战术的研究”1869年柏林版(G. Cardinal Von Widdern《Der Rhein und die Rheinfeld— Züge. Militair— geographische und Operations— Studien im Bereich des Rheins und der benachbarten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Landschaften》. Berlin, 1869)。——第 20 页。
- 20 “时报”(《Le Temps》)是保守派的日报,法国大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从 1861 年至 1943 年在巴黎出版。该报反对第二帝国,反对同普鲁士作战;在第二帝国复灭后支持国防政府。——第 22 页。
- 21 恩格斯指 1870 年 8 月 5 日“泰晤士报”的社论,这篇社论转述了恩格斯于 1870 年 8 月 2 日发表的“战争短评(三)”中的一系列论点,但没有注明来源。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保守派最大的日报,1785 年创刊于伦敦。——第 26 页。
- 22 在 1870 年 8 月 4 日的维桑堡会战中,普鲁士王储指挥的德军第三军团的 3 个军,利用法军兵力分散的弱点,进攻并击溃了数量上比他们少得多的杜埃指挥的法军一个师(属麦克马洪第一军)。这次胜利为德军打通了向亚尔萨斯前进的道路。——第 29 页。
- 23 沙斯波式步枪是一种后装枪,以它的发明者的名字命名;1868 年法军装备了这种枪;在当时来说它的特点是战斗性能好。——第 29 页。
- 24 维尔特(亚尔萨斯)会战是普法战争中最初的大规模会战之一,这次会战发生在 1870 年 8 月 6 日,结果是麦克马洪指挥的法军遭到了失败。——第 31 页。
- 25 马振塔会战在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法军于 1859 年 6 月 4 日在通米兰的要冲中击败了奥军,攻占了马振塔,然后进入米兰;奥军由于在马振塔战败不得不撤出伦巴第的大部分地区。恩格斯在“军事事件”、“奥军的失败”和“马振塔会战”等文中论述了这次会战的进程

-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18—434页)。——第32页。
- 26 在1870年8月6日福尔巴赫(洛林)会战中,普军击溃了由佛罗萨尔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二军。在历史文献中,福尔巴赫会战也称为施皮歇恩会战。恩格斯在后来也使用后一名称。——第33页。
- 27 指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个战例。奥地利军队在1866年7月3日萨多瓦会战失败以后退向奥里缪茨(捷克称作:奥洛摩茨),企图以此诱使普军不向维也纳进攻。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普军派出掩护部队对付奥里缪茨后,向奥地利首都进攻。——第38页。
- 28 恩格斯指由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流动自卫军巴黎各营的反波拿巴行动;这次行动是在1870年8月初发生在夏龙兵营。——第39页。
- 29 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它的唯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为会议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于1850年恢复。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见注11)代替。——第40页。
- 30 法军在福尔巴赫和维尔特的失败,暴露了第二帝国制度的腐朽,因此1870年8月7—9日在巴黎、里昂、马赛和其他城市都发生了人民群众反政府的行动。8月9日在巴黎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工人占多数的大量示威群众包围了立法团的大厦,要求成立共和国并武装人民。政府为了驱散示威游行,调用了大量宪兵和正规部队。为了对付革命的威胁,组成了以八里桥为首的包括极端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政府代替奥利维耶内阁。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立法团的“左派”议员(费里、甘必大等人)由于害怕人民革命的前景,拒绝支持人民群众的行动,实际上是帮助维护波拿巴制度。——第46页。
- 31 指1793—1794年雅各宾专政时期,革命政府——社会拯救委员会(卡诺

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采取的改组法国军队的工作。被派去进行军队改组工作的国民公会委员在这次改组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按照 1793 年 8 月 23 日国民公会关于全民武装的法令,革命军队的数量到 1793 年底急剧增加,超过了 60 万人;当时把志愿兵各营同正规军队合并,任用有才干的、在士兵群众中有威信的人代替旧的指挥人员,雅各宾政府大规模地生产武器和弹药供应军队。所有这些措施使法军得以节节胜利,并且到 1794 年春天肃清了法国国土上的干涉军。——第 51 页。

32 恩格斯指 1870 年 8 月 14 日在麦茨以东发生的科龙贝-努伊会战(又称博尔尼会战)。“战争短评(十一)”对这次会战作了详尽的叙述(见本卷第 66—69 页)。——第 54 页。

33 马尔斯-拉-土尔会战(在后面第 146 页称为维昂维耳会战)发生于 1870 年 8 月 16 日。这次会战的结果,德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麦茨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第 58 页。

34 “世纪报”(《Le Siècle》)是自由主义共和派的一家日报,从 1836 年至 1939 年在巴黎出版;1870 年至 1871 年在巴黎和图尔同时出版,后来又又在波尔多出版。——第 59 页。

35 自由射手(法文 francs-tireurs),即志愿游击队员,他们分成小队队伍,参加抗击敌军对法国的侵犯。自由射手队伍最初是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同反法同盟作战时期,当敌军侵入法国时建立的。1867 年,法国开始组织自由射手协会。在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领土以后,协会会员根据专门的指令拿起了武器。当法国正规军被击溃并被困于各要塞的时候,自由射手队伍的数量大大增加了。——第 60 页。

36 在 1806 年 10 月 14 日的耶拿(绍林吉亚)会战中,拿破仑第一指挥的法国军队击溃了普军一部。在同一天,拿破仑手下的达武元帅的军队在奥埃尔施太特击败了普军主力。随后法军对两支败军进行追击,俘虏了绝大部分普军,从而迫使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第 62

页。

- 37 恩格斯引用的是普鲁士国王威廉关于 1870 年 8 月 18 日德军在格腊韦洛特战胜法国莱茵军团的电报。格腊韦洛特会战(历史文献上又称圣普里瓦会战)后,莱茵军团被困于麦茨。——第 64 页。
- 38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是英国资产阶级日报,自由党的机关报;1821 年创刊于曼彻斯特。——第 66 页。
- 39 波拿巴远征意大利时期(1796—1797 年),法军一部于 1796 年 6 月围攻由奥地利守备部队防卫的曼都亚(意大利北部),而法军的主力则去对付企图替要塞解围的奥军。1796 年 9 月,被波拿巴击溃的武尔姆泽尔的奥军躲在曼都亚;经过长期围攻和封锁以后,该地守军由于没有必需的粮食储备被迫于 1797 年 2 月投降。
- 在拿破仑法国同第三次欧洲各国同盟战争期间,由于拿破仑第一进行巧妙的机动,马克指挥的奥军于 1805 年 10 月在乌尔姆要塞被围,并且被迫投降。——第 70 页。
- 40 “旗帜报”(The Standard)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1827 年创办于伦敦。——第 72 页。
- 41 1806 年 10 月在耶拿和奥埃尔施太特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第一的先头部队抢在退却的普军前面,使他们不能到达施特廷(波兰称作:兹杰辛)和渡过奥得河;在这次战役中,被击溃的普军的残部被迫投降。——第 75 页。
- 42 色当在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一地区的南部边境;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普军于 1870 年 9 月 1—2 日在这里击败了法国的麦克马洪军团,并切断了它的退路,迫使它投降。可见,恩格斯不仅预言了法军在色当惨败的可能性,而且相当准确地判断了事件发生的地点。——第 75 页。
- 43 “阿尔及利亚人”或“非洲人”,在法国是指那些在镇压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各部落的殖民战争中官运亨通的将军和军官。麦克马洪曾经积极参加这些战争,在战争中法国指挥官对阿尔及利亚各部落广泛地采取了残酷屠杀当地居民的野蛮袭击的战术,背信弃义地破坏所签订的协定,完

全不顾一切作战规则，并且不承认对方具有交战一方的权利。——第 76 页。

- 44 在本文的后面，“派尔—麦尔新闻”的编辑格林伍德增加了以下一段话：“很可能，对斯特拉斯堡的围攻不久将以这个要塞的投降而告终。看来，德军已十分认真地行动起来。到昨天早晨为止，来自克尔方面的炮击已经昼夜不停地继续了三天三夜。同时，普军已经把自己的前哨推进到距要塞 500—800 码的地方。军火库已被烧毁，有几门刚刚进入阵地的重炮也将立即向这个地段射击。”这段话本版已经删去。

恩格斯在 1870 年 9 月 4 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格林伍德为了填满篇幅，在本文中添加了“几行关于围攻斯特拉斯堡的毫无意义的话。一有适当机会，我将就这一点写一篇文章，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恩格斯的这一意图在“战争短评（十七）”一文中实现了（见本卷第 99—102 页）。——第 77 页。

- 45 第六次欧洲各国反法同盟的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在郎城会战和奥布河岸阿尔西会战战败以及对他作战的布吕歇尔军队同施瓦尔岑堡军队会合以后，曾于 1814 年 3 月试图绕到同盟国军后方，用主力截断他们同莱茵河的交通线，以阻止同盟国军向巴黎推进。但是，同盟国军由于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拿破仑的军队，而且深知巴黎对拿破仑制度的不满已经成熟，便继续向法国首都进攻，并于 1814 年 3 月 31 日占领了它，这就加速了拿破仑帝国的崩溃。——第 78 页。
- 46 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德军第三军团和第四（麦士）军团尾随麦克马洪的夏龙军团向北推进，夏龙军团被逼到色当，在受包围后被迫投降。——第 79 页。
- 47 1830—1831 年波兰争取解放的起义期间，波兰起义者同沙皇军队于 1831 年 3 月 31 日（18 日）在离华沙不远的丹贝—韦耳克村进行会战，结果波兰人获胜；沙皇军队损失惨重，被迫退却。波兰人在丹贝—韦耳克村的胜利，迫使沙皇军队的司令官吉比奇放弃了渡过维斯拉河的计划。——第 85 页。

48 努瓦尔战斗发生在 1870 年 8 月 29 日(星期一),是北德意志第十二军和法军第五军的前卫部队之间的一次战斗。

在 1870 年 8 月 30 日博蒙会战中,北德意志第四军、第十二军和巴伐利亚第一军击溃了德·法伊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五军(属麦克马洪的夏龙军团)。这两次战役是普军对麦克马洪军团采取军事行动的两个阶段,这次军事行动以麦克马洪军团在色当被击溃而结束。——第 85 页。

49 恩格斯指 1870 年 8 月 31 日—9 月 1 日莱茵军团企图从麦茨向东北方向突围的一次失败的尝试。这几次战斗被称为努瓦斯维耳会战,结果是双方仍然留在原来的阵地上。——第 89 页。

50 指 1870 年 9 月 1 日普鲁士第三、第四军团同麦克马洪的夏龙军团之间的最后一次会战,会战的结果,法军被普军围歼。9 月 2 日法军司令官在投降书上签字,根据这个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 8 万多名官兵和将领都成了俘虏。

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复灭,并使法兰西共和国于 1870 年 9 月 4 日宣告成立。

随着法国正规军的消灭和共和国的成立,当普鲁士的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掠夺野心暴露得十分明显的时候,从普鲁士方面来说,战争已经完全失去防御性质。从这时候起,国际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组织支援法国抵御普鲁士入侵者。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本卷第 285—294 页)中分析了关于战争性质的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的任务的问题。——第 89 页。

51 但泽(格但斯克)在拿破仑第一对欧洲各国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曾经两次遭到围攻。

1807 年 3—5 月,拿破仑对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由普军和俄军联合部队组成的但泽守军对围城的法军的一个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另一支俄国部队曾试图去解围以支援守军行动。由于军火不足,在守军自由退出要塞的条件下,但泽投降了。

1813 年初,参加第六次欧洲各国反法同盟的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

包围了拿破仑军队所占领的但泽,但在通往该城的要冲遭到了顽强抵抗。但泽抵抗了将近一年,经受了三次正规围攻,最后被迫投降。——第 95 页。

- 52 意大利(又称威尼斯)四边要塞区是意大利北部维罗那、列尼亚哥、曼都亚和培斯科拉四个要塞所组成的极为坚固的筑垒阵地。在十九世纪战争中,四边要塞区作为军队作战的基地曾起过很大作用。在 1848—1849 年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维罗那由于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并掩护通往奥地利的道路,曾被拉德茨基指挥的反革命的奥军用来作为对皮蒙特军队作战的主要基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3 卷第 213—220、264—269 页)。——第 95 页。
- 53 1853—1856 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的军队包围了塞瓦斯托波尔,俄国军队从 1854 年 9 月至 1855 年 8 月进行了英勇的保卫战。——第 95 页。
- 54 角堡和冠堡是要塞主墙前面的辅助性的外部工事。——第 95 页。
- 55 在反拿破仑法国的第七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拿破仑第一的军队在 1815 年 6 月 18 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军队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溃。滑铁卢会战的失败使拿破仑帝国在 1815 年 3 月短时恢复后,终于最后崩溃。——第 99 页。
- 56 恩格斯套用路易一拿破仑于 1852 年 10 月 9 日,在全民投票和宣布成立法国第二帝国以前不久,在波尔多发表的演说中的话;路易一拿破仑为了博取民众的同情,蛊惑性地宣称:“帝国——这就是和平”。——第 103 页。
- 57 恩格斯指下列事件: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奥地利在 1848—1849 年意奥战争中对皮蒙特军队取得的胜利;奥军在镇压 1848—1849 年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时遭到的一连串失败;1849 年沙皇政府派到匈牙利援助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俄军的行动;普鲁士为了镇压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而对南德意志进行的武装干涉。——第 103 页。
- 58 军队中的代役制在法国广泛地推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它是有产阶级特

权之一，使富人都是可以付出一定的代价为自己雇佣代役人而免服兵役。在十八世纪末叶法国革命时期曾经禁止代役，然而拿破仑第一又重新使它合法化。在 1855 年 4 月军队中的代役制曾作了修改：按照新法，代役人如果不是被征者的近亲，就由国家机关选定，代役款项则列入“军队补贴”特别基金。1868 年的法律肯定了已有的代抗制。1872 年法国的代役制被废除了。——第 103 页。

- 59 指 1859 年 4 月 29 日—7 月 8 日的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战争是由拿破仑第三发动的，他企图在“解放”意大利的旗帜下，通过胜利的“局部”战争掠夺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制度。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通过战争实现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的意大利统一。奥军在马振塔和索尔费里诺失败（见注 25 和注 18）以后，拿破仑第三由于害怕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发展和不愿意促使意大利统一，同奥地利单独缔结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战争结果，法国获得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撒丁王国（皮蒙特）。威尼斯省在 1866 年以前一直由奥地利人统治。——第 104 页。

- 60 1850 年普奥关系因争夺德国霸权而尖锐化，因此普鲁士军队进行了动员。由于这次动员所暴露出来的军事制度的严重缺点、普鲁士军队的落后的武器装备以及在德国的冲突中支持奥地利的俄国的坚决反对，普鲁士不得不放弃军事行动，向奥地利投降（1850 年奥里缪茨协议）。

恩格斯把普鲁士的这次外交失败讽刺为公元前 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中罗马人在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的失败。萨姆尼特人战胜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牛轭”，这被认为是战败军的奇耻大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由此而来，即遭受极大侮辱的意思。——第 105 页。

- 61 指 1860 年 2 月普鲁士议会下院（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多数派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军队改组计划。但是政府不久设法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准了“保持军队战斗准备”的拨款，并把这笔款项用于实现预定的军队改组。1862 年 3 月，当下院的自由派多数再度拒绝批准军费时，政府

解散了议会并决定进行新的选举。1862年9月底,反革命的俾斯麦内阁组成。它在同年10月解散了新选出的议会,并且着手实行军事改革,不经过议会的批准就开支这笔款项。——第106页。

- 62 丹麦战争是1864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这场战争是以普鲁士为霸权统一德国的重要阶段。俾斯麦的容克地主政府企图把隶属于丹麦、但主要居民为德国人的什列斯维希公国和霍尔施坦公国归并普鲁士,加强普鲁士在德国的影响,压服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奥地利参加了这场战争,它和普鲁士一样,也企图侵占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战争以丹麦失败而结束。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奥普战争后并入普鲁士。——第106页。
- 63 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巴黎在塞纳省省长欧斯曼的领导下大规模地进行城市重新设计和改建的工程;这项工程的目的除了使贵族区设备完善外,还要扩建原有的街道、修建新的笔直大街,以便在人民起义时便于军队行动和使用炮兵。欧斯曼及其部属肆无忌惮地不断窃取这项工程的经费。——第107页。
- 64 恩格斯指1860年初写成并在当时以单行本出版的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的备忘录“论法军的战术”(《Ueber die Kampfweise der Franzosen》)。——第112页。
- 65 指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拿破仑法国的欧洲各国同盟战争(1813、1814年和1815年)历史中的下列事件:1814年3月31日在俄普军队战胜保卫巴黎的法军后,巴黎投降;1815年7月3日巴黎未经战斗即向英军和普军投降。——第116页。
- 66 1870年9月19日,法军第十四军在杜克罗将军的指挥下出击,企图阻止德军攻占巴黎南面的重要高地。小比塞特尔和夏提荣附近的战斗,以法军失败和溃退以及普军完成对巴黎的包围而结束。——第116页。
- 67 国防政府代表法尔和俾斯麦于1870年9月19日和20日在上梅宗和费里埃尔举行谈判。俾斯麦提出下述要求作为停战条件:交出比奇、土尔

和斯特拉斯堡,保持对巴黎的包围或者交出巴黎的一个堡垒,继续保持麦茨地区的军事行动。俾斯麦还要求把亚尔萨斯和洛林的三分之一地方割让给德国作为缔结和约的条件。在法夫尔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后,谈判即告破裂。——第 120 页。

- 68 在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在平时一个军区的全部军队统一归一个军事长官(称为军长)指挥,这个军事长官可以用这些军队来维持现存制度和镇压群众的革命发动。但是在军队的配置、组织和训练等问题上,他的职权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在战时才编成固定的军和军团,这就造成了大部队的组织不严密并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准备。——第 125 页。
- 69 指泰·拉瓦累“法国的疆界”1864年巴黎版(Th. Lavallée.《Les frontières de la France》.Paris, 1864)。——第 126 页。
- 70 里昂军团是报刊上对在里昂编成的法军第二十四军的称呼。后来这个军编入布尔巴基的东方军团(卢瓦尔第一军团)。——第 131 页。
- 71 恩格斯指特罗胥的著作:“一八六七年的法军”1867年巴黎版(《L'Armée française en 1867》.Paris, 1867)。——第 132 页。
- 72 这些材料发表在 1864 年 3 月“普鲁士王国统计局杂志”第 3 期(《Zeitschrift des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statistischen Bureau》№3, März 1864)。——第 132 页。
- 73 “全民武装”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阶级的军事文献以及官方文件中对普鲁士军队的通称。正如恩格斯多次指出的,普鲁士军队绝不是“全民武装”;它同人民群众是敌对的,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容克地主阶级国家的侵略政策的工具。恩格斯在“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1—87 页)这一著作中详尽地分析了普鲁士军事制度问题。——第 132 页。
- 74 在普鲁士军队中,由平时因各种原因缓服现役的适龄人员组成的那一部分预备兵员,叫做补充兵;补充兵(服役期规定为 12 年)在战时作补充军队之用。——第 132 页。

- 75 指 1808 年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西班牙起义。这次起义成为 1808—1814 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国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开端。在反对拿破仑军队的斗争中，西班牙人特别广泛地采用了游击战术。——第 138 页。
- 76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是英国的自由派报纸，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从 1846 年至 1930 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第 140 页。
- 77 指十八世纪拆除的旧城防工事的界线，工事所在的地方都已修了林荫道。——第 141 页。
- 78 司法厅（Palais de Justice）是巴黎的法院大楼。——第 141 页。
- 79 宗德堡（现名森纳堡）是 1864 年普奥对丹麦战争（见注 62）时控制通往阿尔森岛的渡口的杜佩尔筑垒阵地上的一个据点。经过长时间的围攻，普鲁士军队于 1864 年 4 月 18 日占领了杜佩尔阵地，迫使丹麦军队退到阿尔森岛。争夺杜佩尔阵地的战斗表明，炮兵在围攻中的作用增大了。——第 142 页。
- 80 指 1861—1865 年的美国国内战争。——第 153 页。
- 81 指北部各州的军队夺取南军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维克斯堡（密西西比州）和里士满（弗吉尼亚州，南部同盟的首府）的军事行动。在 1862—1863 年，北军不止一次地试图夺取维克斯堡，但是，直到 1863 年 7 月 1 日，在陆军部队和江河舰队的协同下经过猛烈的炮击才攻克这个要塞的一个多面堡。1863 年 7 月 3 日维克斯堡投降。
- 北军于 1862 年 4 月第一次试图攻占里士满，结果在通往该城的要冲的几次会战中遭到失败。第二次围攻里士满是在 1864 年 5 月北部各州的全部军队发动总攻势的时候。驻守里士满的南部各州的军队利用里士满附近的营垒一直抵抗到 1865 年 4 月该城被格兰特将军的军队攻陷。——第 153 页。
- 82 在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朗恩元帅指挥的法军的一个军于 1808 年 11 月 23 日在土德拉（西班牙北部）会战中利用西班牙军队兵力分散的弱点击败了他们。被击溃的西班牙军队的残部退往萨拉哥沙。——第 154 页。

- 83 指 1809 年奥地利和法国之间的战争。这次战争迫使拿破仑第一从西班牙调回近卫军和骑兵；1809 年 7 月 5—6 日奥军在瓦格拉姆附近的战败使奥地利在整个战争中失败了。按照 1809 年 10 月法国和奥地利签订的雪恩布龙和约，奥地利丧失了很大一部分领土，并且实际上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第 155 页。
- 84 为了在市区街道上建立第三点防线以防敌军突破堡垒线和墙垒线，1870 年 9 月在巴黎成立了以昂·罗什弗尔为首的“街垒委员会”。委员会发动在巴黎街道上构筑防御工事——街垒和战壕，但是这些工事在被围期间没有被利用。——第 156 页。
- 85 恩格斯指 1870 年 9—10 月巴赞和俾斯麦之间的停战谈判，10 月 24 日谈判破裂；大约同一个时候，国防政府和俾斯麦也在准备根据英国关于和解的建议谈判；1870 年 11 月 1—6 日梯也和俾斯麦在凡尔赛进行了谈判，最后毫无结果。——第 157 页。
- 86 指普鲁士在 1864—1866 年兼并新领土以扩大版图之前原有的省份，即东普鲁士、西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里、波兹南、萨克森、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省。——第 157 页。
- 87 指 1870 年 9 月中旬被派往图尔组织地方力量抵抗德军侵入并沟通对外关系的国防政府代表团（其成员有格累—比祖安、克莱米约和富里雄）。自 1870 年 10 月初到战争结束时止，代表团由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甘必大领导。图尔代表团的旨在建立和装备大量新的军队。1870 年 12 月初代表团迁往波尔多。——第 158 页。
- 88 水上波兰人 (Wasserpolacken) 是十七世纪以来对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并以前在奥得河上放送木材为生的波兰人的称呼；后来，这个称呼专指那些几百年来一直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
- 马祖尔人 是居住在波兰东北部和从前的东普鲁士南部的波兰人。尽管当局奉行强制日耳曼化的政策，居住在从前的东普鲁士地区的波兰马祖尔人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点。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文献中曾流行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居住在东普鲁士的马祖尔人已经失去了同

波兰民族的一切联系。——第 160 页。

- 89 巴登的 Freischaaren 是 1849 年德国南部和西部为了维护帝国宪法而举行起义时期加入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抗击侵入普法尔茨和巴登的普鲁士军队的志愿部队。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志愿部队没有严密的组织,尤其突出的是纪律松弛和缺乏良好的军事训练。恩格斯曾参加维利希指挥的志愿部队作战,这支部队由工人组成,以纪律严明、战斗力强著称。恩格斯曾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127—235 页)这一著作中详尽地评述了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志愿部队。

1861 年 7 月 21 日在马纳萨斯(离华盛顿 30 公里)附近的布尔河上发生了美国国内战争(1861—1865 年)的第一次大会战。北军在这次会战中或被南部各蓄奴州的正规军击败,因为北军是由缺乏训练的志愿兵组成的,其中多数人入伍才几个月。

不列颠志愿军是 1859—1861 年在英国建立的一种地方武装。根据 1863 年关于组织志愿兵部队的法律,志愿兵必须经过 30 次以上的操练,并且只有在敌人侵入英国时才应征入伍。恩格斯在有关志愿军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5 卷)中曾批评他们军事组织糟糕、军官素质低劣以及训练制度不好。——第 162 页。

- 90 吉德是欧洲许多国家军队中专门担任军队向导的部队;次第二帝国时期以及拿破仑第一时代,在法国军队中,吉德担任司令部的警卫勤务,同时是皇帝的私人卫队。——第 165 页。
- 91 在 1813 年 10 月 16—19 日的莱比锡会战中,拿破仑第一的军队败于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的联军。这次胜利的结果使德国完全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第 166 页。
- 92 1870 年 9 月 4 日第二帝国的制度复灭后,巴赞不坚决从麦茨突围,而在同年 9—10 月间开始直接同俾斯麦谈判(见注 85),企图使德军解除对麦茨的包围并利用被围困在麦茨的军队去恢复帝国。俾斯麦提出要前摄政皇后承认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作为先决条件。当时流亡在英国的欧仁妮拒绝接受俾斯麦的条件后,谈判即告中断。——第 167 页。

- 93 墨西哥远征是 1862—1867 年法国最初同西班牙和英国一起，对墨西哥进行的武装干涉；它的目的是镇压墨西哥革命并使墨西哥沦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还企图占领墨西哥，利用它作为自己站在奴隶占有制的南部一边干预美国国内战争的跳板。虽然法军占领了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并宣布成立以拿破仑第三的傀儡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安为皇帝的“帝国”，但是由于墨西哥人民进行了英勇的解放斗争，法国干涉者遭到了失败并被迫在 1867 年把军队撤出了墨西哥。法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墨西哥远征，使第二帝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第 167 页。
- 94 恩格斯指 1870 年秋天在布鲁塞尔匿名出版的拿破仑第三写的小册子“一八七〇年的战局。论色当投降的原因。一个临时参加总司令部工作的军官的著作，附有战区图和作战图”（《Campagne de 1870. Des causes qui ont amené la capitulation de Sedan. Par un Officier attaché à l'Etat — Major Général, avec les plans de la place et de bataille》）。——第 169 页。
- 95 “约瑟夫国王有关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回忆录和通信集” 1854 年巴黎版第 4 卷第 425 页（《Mémoires et correspondance politique et militaire du roi Joseph》. Paris, 1854, t. IV, p. 425）。——第 172 页。
- 96 阿尔卡迪亚村女或阿尔卡迪亚牧女是对幼稚无知、无所用心的人的讽刺性的称呼；这个用语来源于古代伯罗奔尼撒的一个地区的名称——阿尔卡迪亚，据希腊神话说，该地居民异常天真淳朴。——第 172 页。
- 97 指英国人在英国美洲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2 年）的立场；在这次战争中曾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运动和志愿民兵（美洲开拓者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活动。——第 178 页。
- 98 1867 年 11 月 3 日在门塔纳附近，法国军队协同教皇雇佣警卫军打败了为把教皇领地重新并入意大利而向罗马进军的加里波第军队；加里波第军队的战败成为反动势力更加猖獗的信号。——第 179 页。

- 99 1857—1859年印度发生了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1857年春在孟加拉军队中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所谓西帕依部队发动的,起义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极其广大的地区。起义的主要动力是农民和城市贫苦的手工业者。当地封建主所领导的这次起义,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分歧以及殖民者的军事技术优势,遭到了失败。——第179页。
- 100 1870年11月9日在奥尔良附近的库耳米耶会战中,卢瓦尔军团的新编第十五军和第十六军在奥雷耳·德·帕拉丹将军统一指挥下,击败了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冯·德尔·坦恩将军指挥的巴伐利亚第一军。——第181页。
- 101 指1814年拿破仑帝国复灭后和1815年拿破仑短期重掌政权而被再次推翻后,法国被迫同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的两个条约。
- 根据1814年5月30日缔结的巴黎和约,法国几乎丧失了了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征服的全部土地,除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的一些小块领土外,回复到1792年1月1日的疆界。
- 根据1815年11月20日缔结的巴黎和约,法国丧失了1814年巴黎和约保留下来的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境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据点。为了巩固复辟的波旁王朝的君主制度,法国东北部的边境要塞由15万同盟国军队驻守到1818年底。——第185页。
- 102 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法国所支持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的协定,结果产生了法国同欧洲各国同盟战争的危险,但是路易—菲利浦国王未敢发动战争并且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第185页。
- 103 破坏炮队是一种攻城炮队,它的使命是破坏炮眼和击毁被围要塞的火炮。——第188页。
- 104 恩格斯指1870年11月初由于俄国声明废除1856年的巴黎条约(1856

年 3 月 30 日克里木战争的参战国——法国、英国、撒丁、土耳其、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签订的和约)中有关禁止俄国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条款而产生的外交危机。俄国的这一行动曾得到俾斯麦政府的支持，后者指望用这个办法使沙皇政府对普法媾和条件采取有利于它的立场。英国和奥匈帝国曾对修改巴黎条约表示抗议，但无法有效地阻止俄国的要求。1871 年 1—3 月俄国、英国、奥匈帝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国的代表在伦敦举行国际会议并于 3 月 13 日签订协定，废除了 1856 年巴黎条约的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这样，就取消了关于禁止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拥有舰队和要塞的规定，并恢复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主权。——第 188 页。

105 指 1870 年 11 月 25 日“派尔—麦尔新闻”第 1805 号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第 194 页。

106 朱泽培·加里波第曾同他的儿子乔蒂和梅诺蒂一起指挥国民自卫军部队和从 1870 年秋天起参加普法战争的拥护法兰西共和国的外籍志愿军部队。加里波第的军队并入佛日军团后，曾在法国东部进行积极的战斗。

加里波第的一支部队在他儿子乔蒂的指挥下，从 1870 年 11 月 19 日起在夏提荣附近进行过历时两周的战斗，结果击败了德国后备军的一支部队。——第 194 页。

107 “布鲁塞尔报”(《Journal de Bruxelles》)是比利时保守的僧侣的报纸，天主教集团的机关报；1820 年开始出版。——第 201 页。

108 “通报”(《Moniteur》)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1789 年至 1901 年在巴黎出版。1799 年至 1869 年是政府的正式机关报。巴黎被围困期间，该报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第 206 页。

109 在卢瓦尼—普普里(在奥尔良西北大约 40 公里)会战中，1870 年 12 月 2 日，梅克伦堡公爵指挥集团军中的德国部队击败了法军卢瓦尔军团

- 所属的、分别由尚济将军和索尼将军指挥的第十六军和第十七军。——第 207 页。
- 110 指“柏林交易所信使报”(《Berliner Börsen- Courier》)。它是一家日报,柏林交易所的报纸,1868 年至 1933 年出版。——第 214 页。
- 111 “每日新闻报”(《Die Tages- Presse)是奥地利的日报,德国小资产阶级的人民党的机关报,从 1869 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 214 页。
- 112 格·亨·彼尔茨“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1865 年柏林版第 2 卷(G. H. Pertz. 《Das Leben des Feldmarschall Grafen Neithardt Von Gneisenau》. Band II. Berlin, 1865)。——第 217 页。
- 113 指在反拿破仑法国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里对德国知识界的反对运动的参加者的迫害。大学生体操团体(早在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期间就已经成立并积极参与了这一斗争)的许多成员,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要求统一德国。1819 年 8 月德意志各主要邦的大臣参加的卡尔斯巴德会议,通过对参加这个运动的所谓“煽动者”的镇压措施。——第 217 页。
- 114 指教皇警卫团。它是仿效朱阿夫兵(见注 15)组织和训练的,并且由法国贵族青年的志愿兵组成。在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并废除教皇的世俗权力之后,教皇的朱阿夫兵于 1870 年 9 月被调往法国,改编为“西方志愿军团”,并且在卢瓦尔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编成内参加了对德军的战斗。战争结束后,这个军团曾参与镇压巴黎公社,以后被解散。——第 220 页。
- 115 见注 79。——第 235 页。
- 116 在维累尔-布雷顿讷的战斗(又称亚眠会战;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二十九)”一文中曾用这个名称提到过这次会战,见本卷第 199 页)中,1870 年 11 月 27 日法军北方军团在诺曼底被曼托伊费尔将军率领的德军第一军团击败。——第 240 页。
- 117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是巴登政府的机关报,从 1757 年起在卡尔斯卢厄出版。——第 241 页。

- 118 指“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伦出版,它反映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普法战争时,它积极支持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沙文主义要求,反对法国的共和政体;在巴黎公社时期,它要求武装镇压巴黎的革命。——第242页。
- 119 恩格斯的推测完全被证实了。1871年1月15—17日,布尔巴基将军指挥的法军东方军团和韦德尔将军指挥的德军在伯尔福附近的利森河畔进行了决战。法军尽管在数量上占有很大优势,但没有能够取胜,并在会战后被迫开始退却,在退却过程中,布尔巴基军团被彻底击溃。恩格斯在“战争短评(三十七)”和“布尔巴基的复灭”两文(见本卷第254—255、274—277页)中叙述了这次会战(又称埃里库尔会战)和后来法军退却的情况。——第243页。
- 120 1871年1月10—12日在法国西部的勒芒会战中,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指挥的德军击败了尚济将军指挥的法军新编的卢瓦尔第二军团。后者损失惨重,被迫退却。——第246页。
- 121 指“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这是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机关报,该报从1851年到1871年用这个名称在柏林发行。——第249页。
- 122 指克里木战争期间,因俄军于1854年5月开始对锡利斯特里亚采取军事行动,英法军队为援助多瑙河战区的土军,从他们在土耳其的第一个驻军地点——加利波利——向瓦尔那调动。这一计划没有实现,因为沙皇政府慑于已开始军事准备的奥地利与联军共同行动,不得不停止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并将军队撤出多瑙河各公国。当时调往瓦尔那的联军部队后来曾被用于进攻塞瓦斯托波尔。——第252页。
- 123 亚·威·金累克“入侵克里木;入侵的开始和以后直到格伦勋爵逝世时的发展”,1863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2卷第38—40页(A. W.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Vol. II, p. 38—

40. Edinburg and London, 1863)。——第 252 页。
- 124 1871 年 1 月 19 日,在法国东北部的圣昆廷会战中,哥本将军指挥的德军第一军团击败了费德尔布将军指挥的法军北方军团。这次失败使法军一蹶不振,从而结束了它在这一地区的积极活动。——第 254 页。
- 125 恩格斯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保皇派的叛乱。这次叛乱于 1793 年 3 月在万第省开始,后来又蔓延到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两省。叛乱者主要是被反革命的神甫和贵族唆使和操纵的一部分当地农民。1795—1796 年万第和布列塔尼的叛乱被平定,但在 1799 年和以后几年仍有人试图再次发动叛乱。——第 257 页。
- 126 比桑瓦耳会战(又称蒙特列特会战或蒙瓦勒里安会战)是在巴黎被围 4 个月于 1871 年 1 月 19 日发生的。这是特罗胥组织的从被围的巴黎的最后一次出击,其目的是要彻底摧毁国民自卫军的力量,挫伤它的士气并以此让居民和军队相信继续保卫巴黎是不可能的。这次出击缺乏应有的准备,出击时进攻部队的行动不协调,也没有必要的预备队。尽管法军表现很勇敢,但是出击在所有地点都被击退。——第 258 页。
- 127 正如恩格斯预见的那样,东方军团在 1871 年 1 月 15—17 日埃里库尔会战失败后退却时,被压缩到瑞士边境,于 2 月 1 日被迫进入瑞士领土并放下武器。——第 260 页。
- 128 “省报”(《Provincial- Correspondenz》)是普鲁士政府的报纸,1862 年在柏林创刊。——第 262 页。
- 129 1870 年 9 月布尔巴基奉麦茨法军司令巴赞的命令前往前摄政皇后欧仁妮的流亡地英国契泽耳赫斯特。当时巴赞已开始同俾斯麦谈判,企图利用麦茨被困的军队恢复帝国。此行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冒险家雷尼埃分别向俾斯麦和巴赞声称,似乎欧仁妮已同意谈判并任命他为全权代表。但是布尔巴基的使命没有使波拿巴分子如愿以偿,因为欧仁妮不同意割让亚尔萨斯和洛林。——第 265 页。
- 130 指 1871 年 1 月 28 日俾斯麦和法夫尔签订的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国防政府不再抵抗普鲁士侵略者并且可耻地投降,这就出卖了法国民族

利益；法国统治阶级当时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以求利用一切力量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在签订协定时，法夫尔同意了普鲁士提出的屈辱要求：在两星期内付清 2 亿法郎的赔款；交出大部分巴黎堡垒；交出巴黎军团的野炮和弹药。但是俾斯麦和法夫尔不敢把解除大部分由工人组成的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这一条列入协定。协定中规定在最短期间内举行国民议会选举，因为媾和问题应由国民议会决定。——第 267 页。

131 见注 87。——第 268 页。

132 恩格斯指普鲁士的容克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军阀吞并法国领土亚尔萨斯和洛林的野心以及他们提出的巨额赔款的要求。——第 270 页。

133 1871 年 2 月 19 日，俾斯麦和法夫尔于 1871 年 1 月 28 日签订的停战协定期满（见注 130）。尽管法国抵抗的手段并未穷尽，但是没有恢复对普鲁军的军事行动。被国民议会正式任命为政府首脑的梯也尔，立即开始了媾和谈判，结果于 2 月 26 日在凡尔赛签署了俾斯麦强迫法国接受的初步和约的条件；后来在 5 月 10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了和约（见本卷第 375 页，以及注 211 和注 458）。——第 270 页。

134 勒-韦里埃尔（瑞士）协定是由接替布尔巴基担任东方军团司令职务的克林夏将军和瑞士军团总司令海尔佐克将军于 1871 年 2 月 1 日签订的；根据规定法军进入瑞士领土的条件的协定，法军必须向瑞士人交出武器、装具和弹药。——第 227 页。

135 这封信是马克思以德国通讯书记资格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写的，因为总委员会在 1870 年 8 月 2 日鉴于普法战争业已爆发，决定延期召开定于 1870 年 9 月 5 日在美因兹举行的应届代表大会（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95 页），并函请国际各支部批准这一决定。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在它通过的决议中完全赞同总委员会关于延期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

马克思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这封信，以节录形式保存于威·白拉克的“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勒特岑审判案”1872 年不伦瑞克版第 154 页（W. Bracke. 《Der Braunschweiger Ausschuss

der soc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 Partei in Lötzen und vor dem Gericht》. Braunschweig, 1872, S. 154)。——第 278 页。

- 136 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例如通过 1869 年 10 月 25 日邦霍尔斯特致马克思的信)请求马克思说明社会民主党人对德国农民应采取的政策的原则,并就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 年 9 月 6—11 日)关于土地公有制的决议对德国条件是否适用的问题给予指示。马克思为了帮助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正确地对待农民问题,曾打算给予详细的答复,但是因国际的事务过于繁忙,他未能完成这一工作。恩格斯在 1870 年 2 月为他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德文第 2 版写的序言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6 卷第 412—420 页),以及在 1874 年准备该书德文第 3 版时对这篇序言的补充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8 卷),曾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应的说明。——第 278 页。
- 13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600 页。——第 278 页。
- 138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想公开揭露日益陷入民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而在 1870 年 8 月底写的。布林德在马克思反对波拿巴暗探卡·福格特的论战中扮演了为后者帮凶的可耻角色,并在六十年代在德国和美国的报刊上自我吹嘘,散布诬蔑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言论(马克思给“观察家报”编辑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24—27 页)。在普法战争期间,他在英国和德国的报刊上宣传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在 1870 年 8 月 15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了布林德的言论的危害性,并建议恩格斯利用和“派尔-麦尔新闻”的关系,对这些言论进行批判。马克思也采取了措施,在“人民国家报”上向德国工人揭露布林德。保存下来的这篇文章的手稿,大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其中有马克思做的许多补充。——第 279 页。
- 139 指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是 1849 年春在德国南部和西部为维护帝国宪法举行起义的时候在巴登

成立的《帝国宪法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但被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德意志邦所拒绝》。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十分软弱无力，实际上暗中破坏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临时政府看到普鲁士军队准备对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武装干涉，决定向法国求援，布林德因而被派往巴黎。可是在1848年的六月起义失败之后，法国形势的特点是反革命继续进攻，而巴登政府所属望的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被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秩序党”和波拿巴派排挤下去。这就注定了本来就没有基础的布林德的使命必然失败。——第279页。

140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游行，反对法国政府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反对他国人民的自由，这是违背宪法的行为。这次示威游行被军队驱散而失败，表明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山岳党的许多领袖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外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到了逮捕和驱逐，或者不得不离开法国。——第279页。

141 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被镇压后，法国在1849年派赴教皇领地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军队继续占领罗马。路易-拿破仑拒绝让出意大利的首都，招致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意大利各阶层人民的极端仇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普法战争之初法国陷于外交孤立的时期，当时意大利政府由于法军继续占领罗马拒绝了法国关于缔结反普同盟的建议。意大利政府利用法国军事上的失败，于1870年9月20日将罗马并入了意大利王国。——第280页。

142 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是为了答复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对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他们请求马克思说明德国无产阶级对普法战争应采取的立场。马克思也由于“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李卜克内西等）虽然总的说来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但是在战争之初对战争做了片面的估计，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家统一的任务，认为有发表他的意见的必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通信中详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例如，恩格斯在1870年8月15日的信中草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路线，

强调指出必须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参加争取统一德国的运动,分清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和普鲁士王朝的利益,始终把德法两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放在第一位。马克思十分重视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答复,因为这是“对德国工人行动的指导”(见1870年8月1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1870年8月22日和30日之间在曼彻斯特和恩格斯见面的时候,才和恩格斯一起最后拟定了这个答复。这封信由马克思署名寄往德国。

1870年9月5日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的关于战争的宣言,引用了这封信的一部分。宣言号召德国工人阶级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事业,并建议德国工人举行群众大会和抗议集会,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兼并计划。宣言指出,它所引用的信是由“伦敦一位最老的最有威望的同志写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这封信只有宣言中所引用的那一部分保存下来。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收藏的那份宣言的传单上,有恩格斯亲笔做的许多记号,这证明该文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拟定的。——第282页。

- 143 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拿破仑第一强迫签订的这个掠夺性的提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1813年的反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第282页。
- 144 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放弃了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

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1865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与民族自由党相反，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坚持既包括普鲁士又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所谓“大德意志”计划。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的代表者。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第284页。

- 145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是马克思在1870年9月6日和9日之间写成的。

1870年9月6日，国际总委员会研究了由于第二帝国崩溃及普法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形成的新局势，决定对普法战争发表第二篇宣言，并为此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其成员有马克思、荣克、米尔纳和赛拉叶。

马克思在写这篇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普鲁士军阀、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借口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并吞法国领土的野心。总委员会在1870年9月9日召开的专门会议上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这一宣言，并且将它分送给伦敦各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都采取了沉默态度，只有“派尔-麦尔新闻”在1870年9月16日刊登了宣言的摘要。9月11—13日宣言用英文以传单的形式出版，印数为一千份。9月底又出版了将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印在一起的新版本。在这一版中改正了第一版的刊误，并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第二篇宣言的德文本是马克思翻译的，他在翻译时补充了几句专对德国工人说的话，并且省略了个别的地方。第二篇宣言的这个译本发表于1870年9月21日“人民国家报”第76号和1870年10—11月“先驱”杂志第10—11期，并且以传单形式在日内瓦出版。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版中发表了第二篇宣言；为这一版翻译宣言的

是路易莎·考茨基夫人，她在翻译时得到恩格斯的帮助。

第二篇宣言的法译文载于“国际报”（1870年10月23日第93号），部分地（全文未登完）载于“平等报”（1870年10月4日第35号）。

第二篇宣言的俄译文于1905年首次发表在由列宁审订的按1891年德文版翻译的“法兰西内战”的版本中。——第285页。

- 146 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十六世纪初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的、并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勃兰登堡选帝侯作为普鲁士的领主也就成为波兰的藩臣，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657年，当时勃兰登堡选帝侯利用了波兰对瑞典作战的困难，争得了对他的普鲁士领地主权的承认。——第287页。

- 147 指1795年4月5日普鲁士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缔结的巴塞尔和约，这个和约导致了欧洲各国的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第288页。

- 148 1865年10月，俾斯麦在比阿里茨和拿破仑第三会晤时，争取到了法国对普鲁士和意大利的同盟以及普鲁士对奥地利的战争的实际承认；拿破仑第三作出这种承认，是打算在普鲁士遭到失败时再插手这次战争，谋取利益。

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柏林和俾斯麦举行谈判时声明，俄国在战争中将采取善意的中立，并将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同时普鲁士政府则答应不给沙皇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制造障碍。——第290页。

- 149 马克思指德国封建反动势力在拿破仑统治复灭后所取得的胜利。

德国广大人民和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一起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统治的解放战争，然而这一解放战争的成果，被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中依靠反动贵族阶级的统治者所夺去。以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为核心的反革命的君主联盟——神圣同盟，成了欧洲国家的命运的主宰。随着德意志联邦（见注29）的建立，德国保持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在德意志各邦中巩固了封建专制制度，保留了贵族阶级的一切特权，加强了对农民的半农奴制的剥削。——第291页。

- 150 “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德国工人！”（《Manifest des Ausschusses der social — 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An alle deutschen Arbeiter》）宣言以传单形式在 1870 年 9 月 5 日发表，并载于 1870 年 9 月 11 日“人民国家报”第 73 号（又见注 142）。——第 291 页。
- 151 指 1848 年 6 月 23—26 日巴黎工人的英勇起义。——第 292 页。
- 152 马克思指英国工人发动的争取承认 1870 年 9 月 4 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并在外交上给予它以支持的运动。从 9 月 5 日起，在伦敦、北明翰、新堡以及其他大城市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工联在这当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人都表示同情法国人民，并在他们的决议和请愿书中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 国际总委员会直接参加了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组织工作。——第 293 页。
- 153 马克思暗指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英国积极参与了使那些在 1792 年开始对革命的法国作战的封建专制国家结成联盟的事务（英国本身在 1793 年加入了这场战争）；以及英国的执政寡头在欧洲最先承认了法国由于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建立的波拿巴制度。——第 293 页。
- 154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白拉克、邦霍尔斯特、施皮尔、屈恩、格腊勒以及印刷厂主人西维尔斯于 1870 年 9 月 9 日为发表关于战争的宣言被军警当局逮捕（见注 142）。军警当局想借此打击工人运动，阻止反对普鲁士政府军国主义计划的行动。马克思从威·李卜克内西处获得关于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被捕的消息后，就立即采取措施，揭露德国当局的这一专横举动（从这一专横举动起，开始了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粗暴警察迫害的整个时期）。关于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被捕的报道，寄给了“派尔—麦尔新闻”、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回声报”等许多报纸。马克思于 1870 年 9 月 20 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被捕的经过，强调指出这次逮捕毫无法律根据。经过数月的监禁，

到 1871 年 10 月，政府当局以警察捏造的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将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提交法庭审判。主要的罪状之一，是参加普鲁士法律所禁止的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法庭对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判处了期限不同的徒刑。以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为首的社会民主工党，虽然遭到警察的迫害，仍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反对普鲁士的掠夺计划，争取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第 295 页。

- 155 致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信，是 1870 年 12 月 20 日总委员会在讨论了比利时支部问题后委托恩格斯写的。这封信在发表时删去了最后三段，这三段在恩格斯的草稿上是有的，因带有保密性质，本来不供发表之用。

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例行的第六次半年代表大会于 1870 年 12 月 25—26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听取了财务报告，关于联合会机关报“国际报”（见注 1）的活动的报告，以及关于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状况的报告。——第 296 页。

- 156 “通报”（《Moniteur》）是普鲁士为法国居民发行的一个官方报纸的简称，于 1870 年 10 月 15 日至 1871 年 3 月 5 日由俾斯麦监督在凡尔赛出版。本文发表时该报用的名称是“法国北部共同政府及塞纳—瓦瑟省政府官方通报”（《Moniteur officiel du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u Nord de la France et de la Préfecture de Seine—et—Oise》）。——第 299 页。

- 157 “人民国家报”——见注 1。——第 299 页。

- 158 关于卢森堡中立的伦敦协定是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尼德兰、卢森堡、普鲁士以及俄国于 1867 年 5 月 11 日签订的，这个协定解决了由拿破仑第三的野心所引起的所谓卢森堡危机（拿破仑第三要普鲁士同意法国兼并卢森堡，作为对他在 1866 年普奥战争时期保持中立的补偿）。根据这个协定卢森堡被宣布为永久中立国，由缔约各国保证它的中立。

1870 年 12 月 9 日俾斯麦鉴于卢森堡对法国过于友好，因而宣称准备今后不承认它的中立，但在英国的压力下在 12 月 19 日就放弃了

这种威胁。——第 300 页。

159 “呼声报”（《Голос》）是俄国的政治和文学日报，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于 1863 年至 1884 年在彼得堡出版。——第 301 页。

160 这个决议草案是恩格斯草拟的，并由他在 1871 年 1 月 31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作为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立场问题的基础。这次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备并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讨论，目的是要使国际能影响 1871 年 1 月在英国蓬勃开展的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见注 152）。尽管 1870 年 9 月 4 日在法国成立的共和国是由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所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法国遭到普鲁士入侵的情况下仍应积极参加争取在外交上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因为这一运动能促使法国巩固国防，发动人民抗击普鲁士侵略者。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指出必须对法兰西共和国争取独立自主的无产阶级政策，严厉批评它的反人民的投降主义的政府，争取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进一步高涨的前景。

恩格斯的决议案是针对妄图攫取保卫法兰西共和国运动领导权的激进实证论者（比斯利、康格星弗等）的立场提出来的。这批人力图使无产阶级运动最终屈从于他们的影响，企图在法国正规军被打败的情况下提出由英国出兵援助法国的冒险主义要求来迷惑群众，这就造成了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的分裂和削弱。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现阶段的立场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是在 1 月 31 日，2 月 7 日、14 日、21 日，3 月 3 日和 14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进行的。保存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记录，以及发表在“东邮报”上的报道，都是片断性的，而且其中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

1871 年 3 月 14 日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第三个决议，原因是德法两国签订了停战协定，英国已承认梯也尔的反革命政府，前两个决议已没有必要。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是一家工人周报，从 1868 年至 1873 年在伦敦发行。从 1871 年 2 月至 1872 年 6 月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机关报。——第 302 页。

- 161 恩格斯指的是附于巴黎和约(见注 104)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该宣言由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等国代表于 1856 年 4 月 16 日签字。它根据 1780 年叶卡特琳娜二世政府宣布的武装中立原则确定了海上战争规则,其中规定:禁止海上抢劫,敌船上的中立国货载和中立国船上的敌方货载不得侵犯(不包括武装走私),只承认正式封锁。

恩格斯在决议草案中提出英国拒绝巴黎宣言的要求,是根据 1871 年出现的国际局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以防止沙皇俄国为援助普鲁士而参加欧洲战争,也可以抵制俄国和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府增强了的影响。——第 302 页。

- 162 这封给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是恩格斯作为总委员会西班牙临时通讯书记为答复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1870 年 12 月 14 日的来信而写的。恩格斯和国际西班牙各支部建立联系后,就帮助它们和巴枯宁主义作斗争,因为从 1871 年初起西班牙也成了巴枯宁主义活动的场所。在这个国家,巴枯宁分子在国际的机构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企图攫取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权,在 1872 年 4 月 4—11 日举行的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萨拉哥沙代表大会之前,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一直在该联合会委员会中占多数。尽管巴枯宁分子进行分裂活动,国际的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仍然得到愈益巨大的支持,这一点的表现是在西班牙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许多新的支部。——第 303 页。

- 163 “联盟”(《La Federacion》)是西班牙工人的周报,国际的巴塞罗纳联合会的机关报,1869 年至 1873 年在巴塞罗纳出版,受巴枯宁派的影响。

“团结报”(《La Solidaridad》)是西班牙报纸,国际马德里各支部的机关报,从 1870 年 1 月起在马德里出版,1871 年 1 月被政府查封。

“工人报”(《El Obrero》)是西班牙日报,1870 年至 1871 年在帕耳耳马(马利奥尔卡岛)出版。1871 年 1 月被政府查封后以“社会革命报”(《La Revolucion social》)的名称继续出版。“社会革命报”出版三期后即被查封,因为该报编者被控“侮辱国王”而受到法庭追究。——第 303 页。

- 164 恩格斯指的是 1871—1872 年出版的阿根廷工人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Anales de la Sociedad Tipografica Bonaerense》)。——第 305 页。
- 165 指 1866 年 8 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全国劳工同盟。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 年,同盟的代表凯麦隆出席了国际出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 年 8 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 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 1872 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 306 页。
- 166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 1871 年 3 月俄国在英国证券交易所推销 1200 万英镑公债。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 1871 年 3 月 16 日“派尔—麦尔新闻”;1923 年在维也纳石印出版的恩格斯“战争短评”中收录了这篇文章,以后又和“战争短评”一起再版。——第 307 页。
- 167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o Saint- P étersbourg》)是俄国外交部的机关报;1825 年至 1914 年以这一名称用法文每周出版三次。——第 307 页。
- 168 指 1871 年 1—3 月几个国家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会上讨论了俄国声明废止 1856 年巴黎条约中有关限制俄国黑海主权的条款的问题(见注 104)。——第 308 页。
- 169 “波罗的海报”(《O stse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35 年起在施特廷(波兰称为兹杰辛)出版。——第 309 页。
- 170 这封信是恩格斯受马克思的委托草拟的,写信的原因是法国警察报纸“巴黎报”发表了一封捏造说是马克思写的信,并利用它大作文章,说这

“证明”国际的法国会员和德国会员之间存在矛盾；所有参加诬蔑国际的各国资产阶级报刊都转载了这封信。马克思在 1871 年 3 月 21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巴黎报”的报道是挑拨性的谎言，并且声明，他已经写信给采用“巴黎报”这则报道的“泰晤士报”编者予以驳斥。

1871 年 3 月 22 日“泰晤士报”以转述的形式发表了这封信，可是在此以后该报仍继续诽谤国际，它刊载了波拿巴派报纸“自由”的撰稿人的一篇短评，歪曲马克思来信的含意。马克思在 3 月 28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揭露了“泰晤士报”的这一新的诬蔑行动。

“巴黎报”（《Paris-Journal》）是和警察当局有联系的反动日报；1868 年至 1874 年由昂利·德·佩恩在巴黎出版。它支持第二帝国的政策，第二帝国崩溃后支持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对国际和巴黎公社进行卑鄙的诽谤，号召镇压公社社员。——第 311 页。

171 写这个声明的原因是反动的“巴黎报”发表了关于国际巴黎支部开除德国人的诬蔑性挑拨言论。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在答复总委员会询问的一封信专门信中驳斥了这种言论。总委员会在 3 月 21 日的会议上一致同意了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写的总委员会声明。这个声明发表在 1871 年 3 月 23 日的“泰晤士报”上，并被收入 1871 年 3 月 23 日马克思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中（见本卷第 315—316 页）。——第 312 页。

172 赛马俱乐部是巴黎的贵族俱乐部，创立于 1833 年。——第 312 页。

173 1871 年 3 月，住在苏黎世的德国所有者为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在该城召开庆祝大会。一群被拘留在瑞士的法国军官在会上和德国人发生了冲突。反动报刊为了继续挑拨离间以达到破坏各国工人国际联系的目的，企图将此事归咎于国际的活动。国际瑞士支部特别发表声明，揭露了资产阶级报刊的诬蔑诽谤。该城的许多工人联合会也发表声明，证明国际会员与冲突事件完全无干。——第 312 页。

174 “里昂信使报”（《Le Courrier de Lyon》）是 1834 年至 1939 年出版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

“吉伦特信使报”（《Courrier de la Gironde》）是从 1792 年起在波尔

多出版的反动日报。

“自由”（《La Liberté》）资产阶级喉舌，1865年至1944年在巴黎出版；1870年至1871年巴黎被围期间先后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866年至1872年属艾·日拉丹所有，支持第二国际的政策，主张对普鲁士作战，反对国防政府。——第312页。

- 175 马克思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中收有他本人在3月21日写的总委员会致“泰晤士报”等报纸编辑部的声明（德译文略有改动）（见本卷第312—313页）。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信用德文载于1871年3月29日“人民国家报”第26号和1871年4月23日“先驱”杂志第4期；用法文载于1871年3月31日“平等报”第6号，“平等报”上发表的文字对头两段有所删节。这封信除载于国际的机关报外，还发表在1871年3月26日“未来报”上。

“未来报”（《Die Zukunft》）是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从1867年起在科尼斯堡出版，从1868年起在柏林出版。——第314页。

- 176 《Haupt- Che》（“主脑”）是普鲁士警官施梯伯在1852年审判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见注373）对暗探奸细舍尔瓦尔的称呼，施梯伯为了达到挑衅的目的，力图说明舍尔瓦尔在同盟中起领导作用，并造成他和马克思以及被告等有联系的假象（见卡·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314页。

- 177 马克思给“工人报”编辑部的信是为了答复编辑部秘书菲·克楠的要求而写的，克楠曾要求马克思揭露“巴黎报”为诬蔑国际而捏造的、并为各国反动报刊所转载的谎言。“工人报”编辑部将马克思的这封信由法文译成佛来米文发表，并在前面加了这样一段按语：“大家早已知道，我们的敌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不择手段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敢相信，他们竟会无耻到用国际会员名义造假信的地步。可是这样的事确实发生了。不久前在所有的大报上都可以读到‘卡尔·马克思’关于法国工人行动的一封信。安特卫普支部曾就此事致书卡尔·马克思，请他

予以说明。下面就是这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的答复。”

“工人报”（《De Werker》）是一家周报，国际佛来米支部的机关报，稍后成为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以后又成为比利时工人党的机关报。1868年至1914年以佛来米文在安特卫普出版。该报曾刊载国际的许多文件。——第317页。

178 马克思把与此类似的一封信寄给“每日新闻”，在那里于1871年4月6日刊登出来。——第318页。

179 “高卢人报”（《Le Gaulois》）是保守的君主派日报，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喉舌，1867年至1929年在巴黎出版。——第318页。

180 “费加罗报”（《Le Figaro》）是法国保守派的报纸；从1826年起在巴黎出版；该报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关系。——第318页。

181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的比利时和荷兰支部的一位组织者菲·克楠1871年3月29日的来信中得知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举行罢工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组织对罢工的雪茄烟工人的国际援助。恩格斯在1871年4月4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报道了罢工的消息，根据他的提议，会议决定写信给英国工联并派遣代表团去交涉此事。1871年4月5日总委员会向英国工联发出了援助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呼吁书，呼吁书由约·格·埃卡留斯署名，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恩格斯还为此写信给威·李卜克内西，请他促进组织对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进行援助的工作。

英国许多工联以及布鲁塞尔的工人都响应总委员会的号召，对安特卫普的雪茄烟工人提供了经济援助，布鲁塞尔的雪茄烟工人也宣布了罢工。总委员会的援助，使得捍卫自己工会组织的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能够把罢工坚持到1871年9月并使厂方接受了他们的要求。——第320页。

182 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将工人阶级事业的叛徒托伦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于1871年4月16日发表在巴黎一个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政治和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上。

1871年2月托伦作为巴黎工人的代表当选为国民会议议员，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后，他仍然留在镇压巴黎革命的凡尔赛议会中，拒绝执行公社关于工人议员应当同这个反动议会决裂的要求。托伦的叛变表明右翼蒲鲁东主义者公开转向反革命。总委员会早在接到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之前，已经根据伦敦报纸关于托伦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的报道，在4月18日的会议上初步讨论了关于托伦的叛变行为问题，并决定公开谴责他的背叛。4月25日，总委员会在接到决议的原文后，重新审查了托伦的问题，并批准了将他开除出国际的决议。

在恩格斯草拟的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托伦的决议的手稿中，个别地方曾由马克思做了修改。决议用英文发表于4月29日“东邮报”第135期；曾用法文发表于5月14日“国际报”第122号；用德文发表于5月24日“人民国家报”第42号和1871年7月的“先驱”杂志第7期。手稿中的最后一段话，只在“国际报”发表的文本中刊出了，该报发表的决议后面有恩格斯作为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的署名。——第321页。

- 183 恩格斯的“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是对马克思在1860年发表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395—691页）的补充，马克思在那本小册子中揭露了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卡·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造谣诽谤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人物。

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是1870年秋第二帝国崩溃后福格特又发表一个小册子“卡尔·福格特给弗里德里希·科尔布的政治书信”（《Karl Vogt's Politische Briefe an Friedrich Kolb》, Biel, 1870），他在这本小册子中企图掩饰他过去和波拿巴派的关系。恩格斯在文章中也利用了报刊上公布的证实马克思在1860年所做的关于福格特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的结论的新材料。还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之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0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就报道过这些消息。4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31号刊载了一则基本上是摘自马克思给李卜克内西的那封信的简短报道：

“在正式公布于法国政府报告中的‘皇室文件和通信’（《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里有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

的接受波拿巴赠款的人的名单，在它的字母《V》下有这样一条：

《V ogt; il lui est remis en août 185940000 Fr.》

翻译出来是：

“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给这则以马克思主义发表的报道加了一段按语，其中说道：

“有些党员指责我们忽视福格特的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文章，不满足于援引马克思的有名小册子作为论据，现在看来他们会满意了。但是，我们要请我们的巴黎朋友给我们寄一份完整的名单来；我们确信，在那上面我们将会找到我们的某些老朋友，他们曾经充当福格特的‘同谋’从波拿巴主义那里得到好处，现在又出于同样的动机，以同样的热情来充当俾斯麦的爱国主义的推销人了。”——第322页。

- 184 马克思在他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中把福格特1859年控告奥格斯堡“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的行动，讽刺地称做“奥格斯堡战役”；福格特控告“总汇报”，是因为该报转载了揭露他是波拿巴暗探的传单“警告”。法院拒绝了福格特的控告，随后他就发表了一个诬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卑鄙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马克思写的反对福格特的小册子就是对这一诬蔑的回答。——第322页。
- 185 “硫磺帮”原来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1859年，福格特诽谤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诬蔑马克思的拥护者，称他们为“硫磺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402—420页）。——第322页。
- 186 “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1851年法国立法议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第323页。
- 187 恩格斯按照法国政府机关报的名称，讽刺地称呼瑞士俾尔城（伯尔尼州）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

Courier》)为福格特通报(《Moniteur》)。该报在1853年至1909年以此名称出版。五十至六十年代它反映波拿巴的观点;该报编辑部和福格特有密切联系。——第323页。

- 188 C. Vogt. 《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 Genf und Bern, 1859. 关于此书的评论, 请看马克思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502—551页)。——第323页。
- 189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反动的日报, 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机关报; 1861年至1918年在柏林出版。——第324页。
- 190 恩格斯引自“皇室文件和通信”1871年巴黎版第2卷第161页(《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 Tome II, Paris, 1871, p. 161)。——第328页。
- 191 “法兰西内战”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著作之一; 它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 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基本原理。这一著作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而写的。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 马克思就开始细心搜集和研究所有关于公社活动的消息, 如法国、英国、德国的报纸材料, 巴黎来信中提供的情况等等。马克思在1871年4月18日总委员会会议上, 建议就法国“斗争的总趋向”发表一篇告国际全体会员的宣言。总委员会把起草宣言的工作交给了马克思。4月18日以后, 马克思就开始了这项工作, 一直继续进行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的初稿和二稿(见本卷第533—662页和注375); 随即着手宣言的定稿工作。1871年5月30日, 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的两天以后, 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

“法兰西内战”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左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三十五页的小册子发表, 印数一千份。由于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 不久又出了英文第二版, 印数两千份, 在工人中间减价销售。马克思在这一版中更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 并在“附录”里增补了第二号文件。宣

言下面总委员会委员的署名中做了如下的变动：抽掉工联主义者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名字（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表示不同意宣言，并且退出了总委员会），同时增添了总委员会新成员的名字。1871年8月出了“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马克思在这一版中除去了前两版中个别不确切的地方。

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荷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并以单行本出版。

德文本是由恩格斯翻译的，于1871年6—7月先后发表于“人民国家报”（6月28日，7月1、5、8、12、16、19、22、26和29日的第52—61号）；1871年8—10月在“先驱”杂志部分地发表，此外，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在译文中做了几个不大的改动。1876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的新的德文本，在文字上做了一些订正。

1891年，在为迎接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纪念版时，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这一版写了导言；他在导言中，强调指出巴黎公社经验的历史意义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公社做的理论总结的历史意义；此外，还做了一些有关加入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的活动的补充。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收进了这一版；此后在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这两篇宣言也都通常与“法兰西内战”一起刊印。

“法兰西内战”的法文译文最初于1871年7—9月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报”上刊出。1872年在布鲁塞尔出了法文版单行本，译文曾由马克思加以校订。他在寄给他的校样上做了大量修改，把好些地方重新译过。

1871年，在苏黎世第一次出了“法兰西内战”俄文第一版。后来铅版印刷的以及胶版翻印的许多版本都以这一版为依据。1905年，出版了由弗·伊·列宁校订的“法兰西内战”俄文本（敖德萨“海燕”出版社版），这次是根据1891年德文版翻译的。列宁校订“法兰西内战”时，在译文中使用了精确的经济政治术语，除去了1905年的前一版的大量歪曲和不妥之处，恢复了那些在前一版被沙皇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的地方。

列宁在校订“法兰西内战”第三章译文时做的改动特别大。后来,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其他著作中引用“法兰西内战”时,又把所引用的很多地方重新译过(根据 1876 年和 1891 年的德文版)。列宁对“法兰西内战”俄译文的修改以及他自己翻译的一些段落,在编辑本版时都曾予以注意。——第 331 页。

- 192 阿尔丰斯·西蒙·吉奥给苏桑的信发表于 1871 年 4 月 25 日“公报”第 115 号。

“公报”(《Journal Officiel》)是“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的简称。该报出版于 1871 年 3 月 20 日至 5 月 24 日,是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它是沿用 1870 年 9 月 5 日起在巴黎出版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的名称(在巴黎公社时期,梯也尔政府的报纸也用此名称在凡尔赛出版)。3 月 30 日的报纸是用“巴黎公社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Commune de Paris》)的名称出版的。——第 337 页。

- 193 1871 年 1 月 28 日,俾斯麦同国防政府的代表法夫尔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见注 130)。——第 337 页。

- 194 Capitulars(投降派)是对 1870—1871 年巴黎被围时期主张巴黎投降的人的卑称;后来在法文中,这个词被用来泛指投降主义者。——第 337 页。

- 195 宣言发表于 1871 年 4 月 28 日“复仇者报”第 30 号。——第 337 页。

- 196 “旗帜报”(《L'Étendard》)是波拿巴派的法国报纸,从 1866 年至 1868 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由于被揭发靠欺骗行为作财政来源而停刊。——第 338 页。

- 197 指 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它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1852 年创办。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的有价证券进行投机。Crédit Mobilier 同第二帝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1867 年,该银行破产,1871 年停业。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许多文章中揭示了 Crédit Mobilier 的真正本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 12 卷第 23—40、218—227、313—317 页)。——第 338 页。

- 198 “自由选民”(《L'Électeur libre》)是一家周报(普法战争时期起改为日报),共和派右翼的机关刊物,1868年至1871年在巴黎出版;1870年至1871年同国防政府的财政部有联系。——第 338 页。

- 199 指 1831 年 2 月 14 日和 15 日巴黎发生的反对正统派和反对教会的行动,这些行动得到外省的响应。为了对正统派在贝里公爵追悼会上举行示威表示抗议,会上的群众捣毁了奥塞鲁瓦的圣热尔门教堂和以同情正统派闻名的大主教凯朗的宫廷。奥尔良派的政府由于想打击对它抱敌视态度的正统派,没有采取措施来干涉群众的行动;捣毁教堂和大主教宫廷时在场的梯也尔曾关照国民自卫军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

1832 年,当时的内务大臣梯也尔下令,逮捕了正统派的法国王位僭望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贝里伯爵夫人,随即将她置于严格监视之下,并对她施以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宣扬她的私婚,从而破坏她的政治声誉。——第 339 页。

- 200 马克思指梯也尔(当时任内务大臣)在镇压 1834 年 4 月 13—14 日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起义中所扮演的卑鄙角色。这次起义是巴黎工人以及依附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共和派的秘密的人权协会领导下进行的。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军阀干下了许多暴行,例如,他们曾在特朗斯诺南街上把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杀死。梯也尔是起义时以及起义被镇压后对民主派实行残酷镇压的主要指使者。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 1835 年 9 月颁布的反动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裁判活动,对出版采取了严峻的措施。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定期刊物的保证金,对反对私有制和现存国家制度的言论实行监禁和课以大量罚款。——第 339 页。

- 201 1841 年 1 月,梯也尔在众议院提出在巴黎四周建立城防工事(要塞围墙和独立堡垒)的计划。革命民主派认为这是借口加强巴黎防御而对人民运动实行镇压的准备措施。当时曾有人指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梯也尔的计划才规定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的工人区附近建筑特别坚固的大批堡垒。——第 339 页。

- 202 1848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炮击巴勒摩城,企图镇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成了1848—1849年意大利各公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残酷地炮轰墨西哥,因而获得炮弹国王的绰号。——第339页。
- 203 1849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对罗马共和国进行干涉,其目的是扑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共和国尽管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终于被推翻,罗马也被法军占领。——第340页。
- 204 马克思指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暴地镇压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对起义的镇压,造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獗,使保守的帝制派的地位更加巩固。——第340页。
- 205 秩序党是1848年成立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是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奥尔良派(奥尔良王朝的拥护者)的联合。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秩序党的反人民政策的破产,被路易·波拿巴集团利用来建立第二帝国的制度。——第340页。
- 206 见注102。——第341页。
- 207 梯也尔想加强凡尔赛军队来镇压革命的巴黎,曾要求俾斯麦允许他扩大部队员额(按照1871年2月26日签订的初步和约,梯也尔的部队总人数不得超过4万人)。梯也尔政府向俾斯麦保证军队只用来镇压巴黎的起义,于是按照1871年3月28日签订的卢昂协定,遂获准将凡尔赛军队的人数增至8万人,不久以后,又增至10万人。德国司令遵照这些协议,急忙将法国战俘(主要是在色当和麦茨投降的部队)遣送回国。凡尔赛政府把这些部队安置在秘密营中,施以思想训练,使他们仇恨巴黎公社。——第341页。
- 208 正统派是法国于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在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颠覆以后他们才形成为政党。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居民丝毫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

- 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只是在 1871 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大进军以后，他们才开始活跃起来。——第 343 页。
- 209 《Chambre inirouvable》（“无双议院”）是 1815—1816 年（复辟时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第 344 页。
- 210 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是《assembly of rurals》（《rurals》相当于法文《les ruraux》），意即“乡绅会议”、“地主议会”。这是对 1871 年的国民议会的卑称。该议会的绝大部分议员都是反动的保皇党人；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外省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630 名议员中约有 430 名是保皇党人。——第 344 页。
- 211 指俾斯麦所提出的作为初步和约条件之一的赔款要求。和约于 1871 年 2 月 26 日由梯也尔、茹·法夫尔同俾斯麦、南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在凡尔赛签订。根据这项和约，法国把亚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赔款 50 亿法郎；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军占领的一部分法国领土仍由德军继续占领。正式和约是 1871 年 5 月 10 日在法兰克福签订的（见本卷第 375 页）。——第 344 页。
- 212 1871 年 3 月 10 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延期清偿借约”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凡是在 1870 年 8 月 13 日到 11 月 12 日期间立的借约，规定在立约后的七个月内清偿。11 月 12 日以后立的借约则不得延期。法令实际上没有允许大部分债务人延期付款，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工人和居民中的贫苦阶层，并使许多小工商业者破产。——第 345 页。
- 213 D éembreiseur（十二月分子）是指 1851 年 12 月 2 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者和这种政变行动的拥护者。维努亚直接参加了政变，曾用军队镇压法国一个省的共和派的起义。——第 345 页。
- 214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从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应当得到 3 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1871 年 6 月 20 日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遂被通过。——第 345 页。

- 215 凯恩是法属圭亚那(南美)的城市,是政治犯服苦役和流放的地方。——第 347 页。
- 216 “国民报”(《Le National》)是 1830—1851 年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法国日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第 349 页。
- 217 1870 年 10 月 31 日当麦茨投降、勒一布尔热失守、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与普鲁士人开始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的政权机关——社会拯救委员会。在工人的压力之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定于 11 月 1 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政府便利用这一情况,借助于尚拥护它的几营国民自卫军,背弃了它的辞职诺言,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它的政权。——第 349 页。
- 218 “布列塔尼部队”即布列塔尼别动部队,特罗胥把它当做宪兵部队用来镇压巴黎的革命运动。
科西嘉部队是第二帝国宪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 349 页。
- 219 1871 年 1 月 22 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发起革命的示威游行,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命令守卫市政厅的布列塔尼别动队枪杀示威群众,逮捕游行,下令封闭巴黎所有的俱乐部,禁止群众集会,勒令许多报纸停刊。政府血腥地镇压了革命运动以后,立即准备巴黎投降。——第 350 页。
- 220 *Sommations* 是政府为了驱散示威和集会而采取的一种警告形式。根据 1831 年的法令,这种警告在鼓声或喇叭声中重复三次以后,政府就有权使用武力。
骚扰取缔令(Riot act)于 1715 年在英国生效,禁止十二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集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如果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散去,则使用武力。——第 351 页。
- 221 10 月 31 日事件发生时(见注 217),国防政府的成员被扣留在市政厅

中,有一个起义者曾提议将他们枪决,但为弗路朗斯所阻止。——第 352 页。

222 见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第 22 章。——第 353 页。

223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4 月 6 日“公报”第 96 号上发表的巴黎公社 1871 年 4 月 5 日公告。

马克思提到的人质法令,是公社于 1871 年 4 月 5 日通过的,发表于 4 月 6 日的“公报”(马克思注的是它在英国报纸上公布的日期)。按照这项法令,所有被控告与凡尔赛有勾结的人,在他们的罪行被证实后一律当做人质扣押。巴黎公社想采取这种措施来阻止凡尔赛军队对公社社员的枪杀。——第 353 页。

224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3 月 2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80 号。——第 355 页。

225 授职制(investiture)是指中世纪封建主给藩属授予封地或授予神职的办法。这种制度的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摆布。——第 360 页。

226 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该党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第 360 页。

227 “喧声”(《K ladderadatsch》)是带有插图的、讽刺性的周刊,从 1848 年起在柏林出版。

“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 年起在伦敦出版。——第 361 页。

228 指 1871 年 4 月 16 日巴黎公社颁布的关于一切债务延期三年偿付并且取消利息的法令。这项法令缓和了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处境,而不利于放债的大资本家。——第 363 页。

- 229 马克思是指 1848 年 8 月 22 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友好合同”(《concordats à l' amiable》)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能证明是因革命造成的业务停滞而沦于破产的债务人可延期偿债。于是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彻底破产,只好受大资产阶级债主们的宰割。——第 363 页。
- 230 Frères ignorantins(无知兄弟会)是 1680 年产生于兰斯的一个宗教团体的绰号,这个团体的成员承担了献身教育穷人子弟的义务;在这个团体所办的学校中,学生主要是受宗教教育,得不到什么其他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以此暗指资产阶级法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权主义性质。——第 364 页。
- 231 外省共和联盟是由旅居巴黎的外省小资产阶级人士组成的政治组织。它曾号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会。——第 364 页。
- 232 大概指的是巴黎公社的“告农村劳动者”(《Aux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这份文件曾于 1871 年 4 月至 5 月初在公社的各报上公布,并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第 364 页。
- 233 马克思是指查理十世的反动政府在 1825 年 4 月 27 日所颁布的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对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剥夺地产的前流亡者给以赔偿。赔偿总额约十亿法郎,以三厘无期公债支付,这笔赔偿费大部分落到了法国大地主、高级宫廷贵族手中。——第 364 页。
- 234 指将法国分为若干军区的指令和授予各军区司令以处理地方事务的广泛权力;授予共和国总统以任免区长的权力;将农村教师置于省长控制之下的农村教师法;加强僧侣对教育领导方面的影响的国民教育法。马克思在“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对这些法令曾有所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第 99—100 页)。——第 365 页。
- 235 旺多姆圆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法国的胜利,于 1806—1810 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建立的。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于 1871 年 5 月 16 日拆除。——第 366 页。

- 236 1871年5月5日“口令报”(《Mot d'Ordre》)公布了证实修道院的种种罪行的材料。在圣安东郊区的毕克普斯修道院里,搜查后发现有把女修道士放在小修道室里监禁多年的情况,并且找到了拷打的刑具。在圣劳伦特教堂发现了一个秘密坟墓,这是凶杀罪行的证据。在公社为反宗教宣传而出版的小册子“教士罪行录”(《Les Crimes des congrégations religieuses》)中也公布了这些材料。——第368页。
- 237 威廉斯赫埃(加塞尔附近)是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前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被普鲁士人俘虏后,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囚于此。——第368页。
- 238 在外地主(来自《absent》——“缺席者”)是通常不居住在自己地产上的大地主,这里指的是那些把爱尔兰地产上的收入挥霍于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中饱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第369页。
- 239 *Francs- file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给在巴黎被围时从城里逃跑出去的资产者起的嘲讽性的绰号。*francs- fileurs*的读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这就使这一绰号具有幽默性质。——第370页。
- 240 科布伦茨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贵族保皇党人逃亡和准备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的极端反动的大臣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科布伦茨。——第370页。
- 241 在巴黎公社时期,公社社员把在布列塔尼招募来的、怀有保皇情绪的凡尔赛部队叫做“朱安兵”,这是把他们比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在法国西北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参加者。——第371页。
- 242 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巴黎公社,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里昂、马赛以及法国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3月22日,里昂的国民自卫军和劳动者夺取了市政厅。3月26日巴黎代表团到达以后,在里昂便宣布成立公社,但是,为准备选举公社而成立的临时委

员会,尽管拥有一些武装力量,由于同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缺乏联系,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里昂劳动者于4月30日进行的新的发动,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

马赛起义居民占据了市政厅,逮捕了省长,成立了省委员会,决定于4月5日进行公社的选举。马赛的革命发动于4月4日被炮击该城的政府军队所镇压。——第372页。

- 243 指杜弗尔在1839年5月四季社举行武装暴动时期为巩固七月王朝而进行的活动,以及杜弗尔在1849年6月第二共和国时期在反对在野的小资产阶级山岳党时所起的作用。

1839年5月12日以布朗基和巴尔贝斯为首的秘密的共和社会主义团体——四季社——的革命发动,没有依靠群众,而且带有密谋性质;这次发动遭到了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为了与革命危险作斗争而组成了一个新内阁,杜弗尔参加了这一内阁。

1849年6月,在山岳党反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见注140),当时担任内务部长的杜弗尔,提议实行一系列法令对付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第373页。

- 244 指国民议会通过的“报刊违法行为惩办法令”,它使过去的反动的出版法(1819年和1849年)的条款重新生效,对那些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出版物规定了严厉的惩罚,直到封闭;这里还指恢复以前被撤职的第二帝国官员的职位;关于追还被公社没收的财产的手续的特别法;以及没收财产以刑事罪论处的规定。——第373页。

- 245 杜弗尔向国民议会提出的关于军法审判程序的法令,进一步缩短了1857年军事法典上规定的审判程序。法令确认部队司令和陆军大臣有权擅自进行司法追究,而不必经过预审;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定案(包括审阅上诉状)和执行判决。——第373页。

- 246 指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保护关税政策,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30%的进口税。商约授予法国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货的权利。商约签订以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流入

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第 375 页。

- 247 指公元前一世纪在古罗马的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在罗马奴隶主共和国发生危机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局面。

芬拉专政（公元前 82—79 年）——苏拉是奴隶主贵族的走卒，他在专政时期曾大规模地屠杀与他为敌的奴隶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统治下，第一次宣布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经审判，人人得而诛之。

第一届和第二届罗马三执政（公元前 60—53 年，公元前 43—36 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第一届是庞培、凯撒和革拉苏，第二届是屋大维、安东尼和列庇都斯三人。三执政的统治是为消灭罗马共和国和建立罗马单一的君主政权而斗争的一个阶段。三执政广泛地采用了在肉体上消灭自己敌人的手段。第一届和第二届三执政垮台以后，接着就开始了自相残杀的流血的内战。——第 377 页。

- 248 “巴黎报”（《Journal de Paris》）是从 1867 年起在巴黎发行的周刊，拥护保皇党奥尔良派。——第 378 页。

- 249 这两段引文是马克思从法国政论家爱尔威发表于 1871 年 5 月 31 日“巴黎报”第 138 号上的一篇文章中摘出的，该文引用的塔西陀的“历史”中的那段话，见该书第 3 篇第 83 章。——第 378 页。

- 250 1814 年 8 月，英美战争时英军在占领华盛顿以后，纵火焚毁了国会大厦、白宫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筑。

1860 年 10 月，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殖民战争时，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了北京附近的圆明园——中国建筑和艺术精华。——第 379 页。

- 251 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御用军，在罗马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参加内讧，并常常扶助自己方面的人登上王位。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雇佣兵及军阀横行霸道的同义语。——第

381 页。

- 252 马克思把普鲁士于 1849 年 1—2 月根据普鲁士国王在 1848 年 12 月 5 日反革命政变日钦赐的宪法所选举的议会,叫做普鲁士的“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因为它同 1815—1816 年法国极端反动的“无双议院”很相像。根据宪法,该议会由享有特权的“贵族院”和第二议院组成,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能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这就保证了容克地主官僚集团和右翼资产阶级分子在第二议院中的优势。选入第二议院的俾斯麦是该院极右派容克地主集团的首领之一。——第 382 页。
- 253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是“旗帜报”(见注 40)的晚报版,1857 年至 1905 年在伦敦发行。——第 387 页。
- 254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就 1871 年 6 月 6 日茹尔·法夫尔的通告发表的声明,曾收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二、三版以及 1871、1876、1891 年的德文版中。声明也曾单独发表在许多报纸上(见本卷第 393—395 页)。——第 387 页。
- 25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6 卷第 13 页。——第 387 页。
- 256 指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6 卷第 353—355 页)。——第 388 页。
- 257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 1828 年起在伦敦出版。——第 389 页。
- 258 1871 年 6 月 6 日,茹尔·法夫尔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了反对国际的通告,通告呼吁它们一致组织起来迫害国际工人协会。1871 年 6 月 11 日在总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这个通告的问题,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声明。声明送给了国际各机关报的编辑部以及一些英国资产阶级报纸。1871 年 6 月 13 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声明,并得到会议的批准;恩格斯曾就此问题在会上发言,他指出,在资产阶级的日报中,只有 1871 年 6 月 13 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这个声明,“派尔—麦尔新闻”刊载了声明的摘要。后来,总委

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通告的声明曾用英文载于 1871 年 6 月 17 日“东邮报”第 142 期；用法文载于 1871 年 6 月 18 日“国际报”第 127 号，1871 年 6 月 17 日“自由报”第 57 号，1871 年 6 月 27 日“平等报”第 11 号；用德文载于 1871 年 6 月 21 日“人民国家报”第 50 号；用西班牙文载于 1871 年 6 月 26 日“解放报”第 2 号。

“自由报”（《La Liberté》）是比利时民主派报纸，从 1865 年至 1873 年在布鲁塞尔发行；从 1867 年起为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

“解放报”（《L'Emancipation》）是国际马德里支部每周出版的机关报，1871 年至 1873 年在马德里出版；该报在西班牙进行了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在 1872 年至 1873 年，该报曾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书个别章节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1872 年，保·拉法格参加了该报编辑部的工作——第 392 页。

- 259 马克思撰写总委员会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声明，是由于 6 月 19 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诬蔑巴黎公社和国际的社论；社论的作者赞扬路易·波拿巴镇压革命工人运动的“功绩”。“泰晤士报”编辑部拒绝刊登这一声明。在马克思的信稿中，有几处曾由恩格斯做了文字上的修改。——第 395 页。
- 260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常务主席一职，根据 1867 年 9 月 24 日总委员会的决定被撤销。——第 396 页。
- 261 马克思起草的信稿的最后一段，恩格斯曾在文字上做了个别的修改。这封信没有在“旗帜报”上发表。——第 397 页。
- 262 总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是恩格斯针对着 1871 年 6 月 20 日“每日新闻”发表了英国改良主义者乔·侯里欧克的信起草的。侯里欧克妄想诽谤“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并削弱它对英国工人的影响，硬说宣言的作者与英国工人运动无关。为了讨好英国工联的首领，侯里欧克竟声称，似乎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宣言上的署名是不合法的；从而唆使她们去反对宣言。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在这个声明中以总委员会的名义宣布马克思是“内战”的作者。声明在 1871 年 6 月 20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被批准。——第 398 页。

263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起草了这封给“旁观者”和“观察家”编辑部的信，是因为这两家报纸转载了法国反动报纸关于所谓国际宣言（法国警察捏造的）的消息。马克思提议给这两家报纸各写一封信辟谣，总委员会在 1871 年 6 月 20 日的会议上同意了这一建议。但是两家报纸的编辑部没有发表这封信。

“观察家”（《The Examiner》）是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周报，1808 年至 1881 年在伦敦出版。——第 400 页。

264 马克思写信给“每日新闻”编辑，是因为在 1871 年 6 月 26 日的“每日新闻”上发表了英国教士鲁·戴维斯、工联主义者本·鲁克拉夫特和乔·侯里欧克的信。侯里欧克在 6 月 21 日总委员会发表声明之后又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进行诽谤性攻击；鲁克拉夫特在他的信中公开声称不同意“法兰西内战”的论点，并宣布退出总委员会。由于“每日新闻”编辑部拒绝刊载马克思的信的后半部，即揭露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部分，这封信就被寄予“东邮报”，该报于 1871 年 7 月 1 日发表了这封信，并发表了 1871 年 6 月 27 日总委员会会议的报告，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指出了“每日新闻”编辑部对他这封信的专横态度。1871 年 6 月 27 日“派尔—麦尔新闻”刊登了这封信的摘要。——第 401 页。

265 指英国保守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戴维·乌尔卡尔特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揭露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文章和文件；这些材料刊登在他出版的外交文件汇编“公文集”（《The Portfolio》）以及各种刊物上。马克思为揭露统治阶级的外交进行了不倦的斗争，他在 1853 年写的一组暴露性文章“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9 卷第 387—461 页）中，除了运用别的材料外，还利用了乌尔卡尔特发表的文件。同时马克思也尖锐地批评了乌尔卡尔特本人的反动观点。——第 402 页。

266 恩格斯就 1871 年 6 月 26 日在“每日新闻”发表的侯里欧克和鲁克拉夫特的信所写的总委员会声明，在 1871 年 6 月 27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批准。在总委员会的这次会议上，一致谴责了拒绝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的工联主义者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的叛变行为，对于他

们宣布退出总委员会的声明做出了决议，实际上是把他们开除出国际的队伍。——第403页。

- 267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报纸，1864年至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第405页。
- 268 “新闻报”（《Die presse》）是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日报，从1848年至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在1861—1862年，当该报采取了反波拿巴立场时，发表过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第405页。
- 269 由于“派尔—麦尔新闻”编辑格林伍德拒绝发表马克思的这封信，这封信被寄给“东邮报”，发表于1871年7月8日该报第145期。自从“派尔—麦尔新闻”刊载了攻击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的文章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同该报断绝一切联系。——第407页。
- 270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是英国自由派的报纸，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成为保守派的报纸；自1855年至1937年以此名称在伦敦出版；从1937年开始与“晨邮报”合并，此后就改称“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第408页。
- 271 指巴黎警察报刊为诬蔑巴黎公社和国际而编造的文章和假“文件”，这些文章和“文件”就类似普鲁士警察在施梯伯领导下为反对革命运动而使用的伪造文件一样。施梯伯是在科伦对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进行挑衅性审讯（1852年）的主谋者之一。——第408页。
- 272 指奥地利资产阶级日报“漫游者”（《Wanderer》），自1809年起在维也纳出版。——第409页。
- 273 在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致纽约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中，使用了英国“每日电讯”驻巴黎记者里德的信（本文第一部分），和巴黎公社委员、总委员会委员赛拉叶的报告（本文第二部分）。里德从巴黎回到伦敦后，即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建立联系，以便同他们一起保卫巴黎公社，因为里德在居留巴黎期间就已对公社深表同情。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于7月7日讨论了关于华施贝恩对公社的破坏活动问题，并通过了马克思宣读的宣言。

7月11日,宣言由总委员会一致批准,第一次印成传单在伦敦发表。纽约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接到宣言的原文后,设法于1871年8月1日发表在拥有广大读者的纽约资产阶级报纸“太阳报”上。这篇宣言在登载时,由左尔格和纽约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写了阐明公社真正意义的前言;前言指出华施贝恩是靠社会养活的寄生大家族的代表;纽约委员会号召工人们不要相信卖身投靠的资产阶级报纸发表的、出自工人阶级敌人之手的报道。

“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这篇宣言曾用英文发表于1871年8月19日“东邮报”第151期,1871年8月5日美国报纸“工人卫报”,1871年9月9日“国民旗帜”以及1871年9月30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20期(总第12期);曾用德文发表于1871年7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60号;曾用法文发表于1871年7月19日“自由”第88号;曾用西班牙文发表于1871年9月18日“解放报”第14号。

梯也尔政府为了阻挠对华施贝恩的揭露,通过自己的爪牙采取措施,禁止报刊登载总委员会的宣言。——第411页。

- 274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是美国的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在1835年至1924年发行于纽约。——第411页。
- 275 指华施贝恩实际上拒绝影响梯也尔政府并促使它同意巴黎公社的这一建议:用公社为回答对公社社员的枪杀而逮捕的达尔布阿大主教及其他人质来交换被凡尔赛人监禁在狱的布朗基(见本卷第381页)。大主教被处死后,华施贝恩在他的文章和讲演中伪善地利用巴黎公社为制止凡尔赛人的恐怖行为而被迫采取的这一措施,来诽谤巴黎公社。——第413页。
- 276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794年至1934年在伦敦出版。——第416页。
- 277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是一家正统派的日报(从1792年起),1631年至1914年在巴黎出版。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是教权派和保皇派的主要报纸之一。——第417页。

278 在意大利工人协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1871年11月1—6日举行)召开前不久,马志尼为了抵制国际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影响和阻止在意大利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便对国际和巴黎公社发动了诽谤性进攻,因此恩格斯写了“马志尼反对国际的言论”一文。

恩格斯收到国际那不勒斯支部一位领导人卡·卡菲埃罗的信和载于1871年7月13日“人民罗马”第20期的马志尼“告意大利工人书”(马志尼在“告意大利工人书”中诬蔑国际,歪曲它的创立的历史、纲领和原则),于是在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就马志尼对国际的关系(见本卷第687—689页)作了发言。恩格斯在他随信(1871年7月28日)附寄给卡菲埃罗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这次发言的主要论点。恩格斯在给卡菲埃罗的信中强调指出,必需使工人知道马志尼的活动的真实事实,揭露他的宣传的真实用意。卡菲埃罗把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分送给许多报纸,并且利用这篇文章和恩格斯寄给他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着手写作他自己的反对马志尼的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因卡菲埃罗被捕而没有写完;文章的底稿被警察没收。——第418页。

279 指马志尼的意大利信徒因总委员会讨论国际巴黎支部中的冲突问题而于1865年4月退出总委员会。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利用巴黎支部中的冲突(记者昂·勒弗尔同蒲鲁东分子弗里布尔、托伦等人之间的冲突)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总委员会对这个冲突进行讨论后,通过了马克思所写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90—92页)。——第418页。

280 指1866年2月荣克为答复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韦济尼埃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佛尔维耶回声报”(L'Écho de Verviers)上对国际领导的诬蔑而给该报编辑写的信。这封信曾由马克思校阅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86—596页)。——第419页。

281 1871年8月7日马克思给“泰晤士报”编辑部的信和与它同时寄出的恩格斯的信,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泰晤士报”于1871年7月29日登载了一篇文章,其中除了号召惩罚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以外,还承认凡尔赛监狱中因有大量被怀疑为参加巴黎革命的公民,在两个月中既无审

判,又无侦讯;该报不得不指出被囚禁者所处的恶劣环境和所受的虐待。“泰晤士报”的文章和梯也尔政府机关报想驳斥这篇文章的企图,在各国报界引起了许多反应,抗议虐待被捕的公社社员。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利用“泰晤士报”与梯也尔的“公报”之间发生的争论,在销路很广的英国报纸上为凡尔赛暴政的受害者辩护,但是没有成功。“泰晤士报”编辑部没有登载恩格斯的信。——第 421 页。

- 282 在马克思给“国际报”编辑的这封信的底稿上,恩格斯曾作了某些补充。
“国际报”(《L' International》)是 1863 年至 1871 年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日报;法国政府的半官方报纸。——第 424 页。
- 283 “舆论”(《Public Opinio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1861 年创刊于伦敦。编辑部在 1871 年 8 月 26 日“舆论”第 518 期上发表了马克思随这封私人信件附去的公开信,与此同时还不得不满足马克思的要求,就转载“国民报”对马克思和国际的诽谤一事登了一条道歉声明。——第 425 页。
- 284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从 1848 年至 1915 年以此名称在柏林出版;1870 年至 1871 年间鼓吹兼并法国领土,主张用武力镇压巴黎公社。——第 426 页。
- 285 马克思给“高声人报”编辑写这封信,是因为该报摘要转载了 1871 年 8 月 3 日美国“纽约先驱报”发表的 1871 年 7 月 20 日访问马克思的通讯报道。这篇报道以恶劣的捏造手法转述谈话内容。——第 428 页。
- 286 这封信是马克思为答复“纽约每日论坛报”前任编辑查理·德纳的 1871 年 7 月 6 日来信而写的,自从马克思为该报撰稿以后,德纳和马克思就十分熟悉了。德纳作为“太阳报”的编辑,曾要求马克思写几篇关于国际的文章。马克思决定利用德纳的建议首先来揭露梯也尔的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在法国建立的警察恐怖制度,特别是把关于他的女儿和保·拉法格在法国和西班牙遭到迫害的那些事实予以公布(后来他又把他女儿燕妮的一封信寄给了美国的一家报纸,见本卷第 704—715 页)。在给德纳回信时,马克思估计德纳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表信中

关于马克思的家属受法国当局迫害的材料。马克思的这封信到达纽约时，正在谣传他已逝世，这是一家波拿巴派报纸散布的谣言。这使德纳在 1871 年 9 月 9 日的“太阳报”上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并附了一篇简短的追悼文，而不是仅仅登载信中原来供发表的材料。后来马克思曾在美国报纸上专门驳斥了关于他逝世的谣言，并指出了这些谣言的来源（见本卷第 466 页）。

马克思写给“太阳报”编辑的这封信，俄译文是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13 卷第 2 部中，只根据保留下来的手稿片断摘要地发表了这一封信，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关于拉法格的被捕”。

“太阳报”（《The Sun》）是美国一家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从 1868 年起在纽约出版，编辑是查理·德纳。——第 430 页。

- 287 “真理报”（《La V érit é》）是 1870 年 10 月至 1871 年 9 月 3 日在巴黎出版的激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日报，起初支持巴黎公社，后来反对公社的社会措施。——第 434 页。
- 288 关于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给总委员会的建议，由马克思在 1871 年 9 月 5 日会议上提交总委员会审查并获得批准。现存的建议手稿是由恩格斯写的，其中有马克思做的修改。手稿开头写的“财务报告”一语，是建议总委员会为代表会议准备这样一篇报告。——第 437 页。
- 289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初步草案于 1871 年 9 月 9 日由马克思提交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并得到常务委员会的批准。后来草案又经过补充，增添了关于成立女工支部和关于对工人阶级进行普遍统计这两条。9 月 12 日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报告对决议草案进行讨论，并予以批准。在代表会议上，这些建议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其中一部分后来以定稿形式编入正式出版的代表会议决议（见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第二、三、四、十项——本卷第 451、452、456 页）。手稿中在决议草案上加的重复号码（用**黑体字**排印的），显然是在总委员会会议对草案进行讨论以后注上的，这表明原拟在代表会议上进行审查的次序有所改

变。

手稿是恩格斯写的,其中有马克思做的补充。——第 438 页。

290 这里援引巴塞尔代表大会决议是不确切的。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并未通过关于国际地方性组织名称问题的决议;这样的决议是在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后来载入国际工人协会组织条例(见本卷第 482、490 页)。——第 438 页。

291 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是在 1871 年 9 月 17—23 日举行的。

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的应届代表大会应该在巴黎举行。但是在法国,波拿巴政府对国际各支部进行的警察迫害,使总委员会不得不把应届代表大会的开会地点改为德国的美因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86 页)。普法战争的爆发使得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召开;在法国内战时期国际会员受到残酷迫害,特别是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这种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也是做不到的。根据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国家的联合会都主张把代表大会推迟,并授权总委员会考虑确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同时,由于必须采取便于促进国际思想上的团结和组织上的巩固的共同决定,由于同巴枯宁派和其他加紧进行分裂活动的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势在必行,另外还有些其他的紧迫任务,因此就需要所有各国的国际代表举行一次代表会议。还在战争时期,从 1870 年 8 月 2 日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总委员会里提出了代表会议的问题。但是直到 1871 年夏天才有了召开这种代表会议的现实可能性。大多数联合会都同意总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应该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秘密代表会议的主张。1871 年 7 月 25 日总委员会会议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决定于 9 月份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召开国际工人协会秘密代表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筹备伦敦代表会议进行了大量的工作。8 月 15 日、9 月 5、12、16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有关代表会议的组织 and 纲领的问题。

代表会议由于开会时所处的情况,与会者的范围比较狭窄:参加工作的有 22 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 10 名有发言权的代表。未能派代表出

席会议的国家则由通讯书记代表。马克思在代表会议上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代表会议总共开了九次会议，都属于秘密的工作会议性质。有关代表会议的报告不得公布。

代表会议的记录以及其他有关会议的材料，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6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936年莫斯科版）。

本卷正文中，与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一起发表了那些由恩格斯记下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罗沙和马丁做的不完全的会议记录中保存下来的马克思的几篇发言，收在卷末的附录中（见本卷第693—703页）。——第441页。

- 292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的发言，是1871年9月18日在一个由伦敦代表会议选出来审查巴枯宁派在瑞士罗曼语区国际支部进行分裂活动问题的委员会中做的。巴枯宁派在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企图把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以便攫取国际的领导权；在这一企图失败以后，他们继续从事他们对总委员会的破坏活动：他们利用“团结报”、“进步报”以及暂时受了他们影响的“平等报”来攻击总委员会和宣传巴枯宁思想。在1870年4月4—6日于绍德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用欺诈的手段取得了微弱多数的代表资格。为了回答巴枯宁派想在代表的名额中再增加自己的拥护者的企图，支持总委员会的日内瓦支部的代表们宣布拒绝服从虚构的巴枯宁派多数所做的决定。总委员会批驳了巴枯宁派妄想使由于绍德封代表大会上的分裂结果而产生的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委员会取得瑞士国际组织中央领导机构资格的企图。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派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得到国际大多数支部的支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领导方面不敢在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而在伦敦代表会议开幕几个星期以前宣布同盟解散，打算在国际中秘密地继续进行它的破坏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伦敦代表会议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巴枯宁派的活动和他们所宣传的那种对工人运动起瓦解和离间作用的思想。伦敦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同意马克思的发言中所做的结论，并揭露巴枯宁

分子罗班想掩饰巴枯宁派在瑞士进行分裂活动的企图。巴枯宁派同盟的问题经过委员会审查以后，伦敦代表会议进行了讨论，并于9月21日批准了马克思代表委员会做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他所提出的决议案（见本卷第458—459和462—465页）。——第443页。

293 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393—394页。——第443页。

294 见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第443页。

295 “平等报”——见注1。

“进步报”（《Le Progrès》）是巴枯宁派的报纸，它公开反对总委员会；该报是法文报，由吉约姆编辑，从1868年12月到1870年4月在洛克尔出版。

“团结报”（《La Solidarité》）是巴枯宁派的周报，1870年4月至9月在纽沙特出版，1871年3月至5月在日内瓦出版。——第443页。

296 手稿上写错了。这里指的是1870年4月4—6日在绍德封举行的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见注292）。手稿中提到的洛克尔是巴枯宁派的活动中心之一。——第443页。

297 这里指的是由巴枯宁分子詹·吉约姆和加·布朗起草并于1870年9月5日在纽沙特（瑞士）发表的宣言“告国际各支部”。宣言从非阶级的立场出发，把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说成是“欧洲自由的体现”，而且还建议国际会员组织志愿部队，拿起武器去保卫它。——第444页。

298 占伦敦代表会议工作主要部分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中得到全面阐述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是在代表会议的9月20日和21日第六、七两次会议上讨论的。出席代表会议的巴枯宁分子巴斯特利卡和罗班，还有西班牙支部的代表罗伦佐，企图破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宣称，代表会议没有资格研究这个问题。在辩论的过程中，巴枯宁派

遭到了揭露和孤立。代表会议以多数票决定委托总委员会准备决议的最后文本(见本卷第454—456页)。除保存下来的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提纲外,后面还刊载了由恩格斯本人写的、附在会议记录上的1871年9月21日会议发言摘要;这个发言还有马丁的更简短的法文记录。——第445页。

- 299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大部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并由他们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许多决议都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拟的决议的初步草案(见本卷第438—439页)以及他们在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为基础;因此,代表会议其他代表所提出的许多决议案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决议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大部分是恩格斯做的,因为他是代表会议负责整理和翻译决议的秘书。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代表会议委托代表们在国际各支部口头传达通过的决议。用英文、法文、德文正式出版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工作交由总委员会负责,总委员会又把出版它决定要发表的那些决议的准备工作委托给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担负了全部整理和起草代表会议决议最后文本的工作(有很多决议是以草稿形式通过的)。把决议译成法文和德文的工作,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英文本和法文本,于1871年11月初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通告在伦敦以单行本发表(英文本是:《Resolut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ssembled at London from 17th to 23th September 1871》. London, 1871);德文本是在莱比锡发表的,时间看来是在1871年年底;决议还用法文在1871年11月19日“平等报”第22号、1871年11月26日“国际报”第150号上发表过;用德文在1871年11月15日“人民国家报”第92号、1871年12月“先驱”杂志第12期上发表过;用西班牙文在1871年11月27日“解放报”第24号上发表过;用意大利文在1871年11月23日“人民报”第136号上发表过节译的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第451页。

- 300 第一项决议——“关于总委员会的成员”,由维雷肯和德·巴普提出,经过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发了言)以后,于9月22日

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通过；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四个关于总委员会成员的决议只发表了第一个（即本项决议）和第四个（见“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第十三项”第一条）。第二个和第三个决议规定把总委员会委员从提名到选举之间的考验期延长到三个星期，此外还授予各国支部提名各该国的通讯书记的权利。这两个决议被收入伦敦代表会议记录以及总委员会记录簿（1871年10月16日会议）。——第451页。

- 301 第二项决议——“关于各国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于1871年9月18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上通过。本项决议的第一条略经修改后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二节第一条；第二条至第四条相应地列为第五节第二条至第四条（见本卷第480和483页）。决议是为了打击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分立主义活动，他们企图把自己的宗派主义原则强加于国际的地方组织，以与国际的共同纲领和章程相对抗，并将这点在地方支部的定名上反映出来。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有自称为互助主义派即主张通过互助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伪装拥护集体主义的巴枯宁派、追随资产阶级哲学家奥·孔德的实证论者等等。——第451页。
- 302 第三项决议——“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于1871年9月19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决议的最初底稿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决议的初步草案（见本卷第439页）；本项决议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二节第八条（见本卷第481页）。——第452页。
- 303 第四项决议——“关于向总委员会缴纳数额为每个会员一辨士的会费”，由弗兰克尔提出，于9月20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通过。弗兰克尔是作为负责制定比较经常地收集会费措施的委员会的报告人提出这项决议案的。在准备代表会议期间，马克思在1871年9月9日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会费的问题。本项决议略经修改后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三节（见本卷第481—482页）。——第452页。

- 304 第五项决议——“关于成立女工支部”，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于1871年9月19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通过。马克思在论证他所提出的决议案时强调指出，必须在那些有大量妇女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里成立妇女支部。本项决议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五节第六条（见本卷第483页）。——第453页。
- 305 第六项决议——“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由马克思于1871年9月19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为总委员会的建议提出，经吴亭和弗兰克尔加以补充后通过。
- 马克思在论证本项决议时指出，普遍统计对于组织援助别国罢工工人的活动，以及基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精神的其他共同行动说来，特别重要。本项决议载入组织条例，列为第六节第一条至第四条（见本卷第484页）。——第453页。
- 306 指1867年总委员会在伦敦发表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文本。这个文本反映了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年）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年）对章程所做的修改。在1864年公布的临时章程的文本中，这一条——没有后来补充上去的最后一句话，——被列为第六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7页）。
- 所说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决议载入组织条例第六节，见本卷第484—485页）是以马克思所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第二点c项为基础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14—215页）。——第453页。
- 307 第七项决议——“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1871年9月20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五次会议上讨论德拉埃的建议时，由弗兰克尔、巴斯特利卡、吴亭、赛拉叶、罗伦佐、德·巴普提出。德拉埃的建议受到了马克思以及代表会议的其他代表的批评，并被否决（见注488）。本项决议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定稿的。——第454页。
- 308 第八项决议——“关于农民”，由马克思提出，于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通过。马克思在发言中强调必须在农村进行宣传，他建议讨论保证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群众联盟的问题。——第

454 页。

- 309 1871 年 9 月 20 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瓦扬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这个草案讲的是:政治问题同社会问题的不可分的联系和使工人的力量在政治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必要性。在讨论瓦扬的决议案以及赛拉叶和弗兰克尔对它所做的补充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见本卷第 445—450、696—700 页和注 298)。他们的发言成了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基础,这个决议的起草工作是由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进行的,总委员会为此于 1871 年 10 月 7 日成立了一个有恩格斯参加的委员会。决议的新文本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他们在这个决议案中精确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政党,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达到其最终目的——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必要条件。

1871 年 10 月 16 日,总委员会批准了恩格斯就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案所做的报告。

根据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增加一个第七条 a 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8 卷),其中重申了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第九项决议的基本部分。——第 454 页。

- 3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5 页和第 13 页。——第 455 页。
- 311 “1867 年 9 月 2 日至 8 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67 年绍德封版第 19 页(《Procès-verbaux du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éuni à Lausanne du 2 au 8 septembre 1867》. Chaux-de-Fonds, 1867, p. 19)。——第 455 页。
- 312 卡·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83—484 页。

臆造的国际法国支部密谋事件——见注 3。——第 455 页。

- 313 “关于国际经常性组织受到政府阻挠的国家的总决议”（第十项），由马克思以总委员会的名义，于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提出。本项决议内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拟走的决议的初步草案中已有论述（见本卷第438页）。马克思在论证他所提出的这一议案时做了关于秘密团体的发言（见本卷第703页）。——第456页。
- 314 “关于法国的决议”（第十一项），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讨论国际法国组织状况问题时由吴亭提出。本项决议是以马克思在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主张为基础的。代表会议就这一问题所通过的几个决议中只发表了本文所载的头两个；第三个决议责成比利时、西班牙、瑞士罗曼语区的联合会委员会保证法国人支部和总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并把由法国流亡者成立的支部吸收进各该国的联合会。第四个决议建议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告法国工人的宣言：号召同反革命政府进行公开斗争，并且要不怕迫害而按照总委员会章程上的原则成立国际组织。最后一个决议没有付诸实行，因为10月24日总委员会的会议决定不发表宣言，以免不利于被监禁的公社社员。——第456页。
- 315 “关于英国的决议”（第十二项），由马克思于1871年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提出。马克思在论证他所提出的建议时指出，总委员会以前反对为英国成立一个联合会委员会，因为，英国工人有代表在总委员会就可以使他们受到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学说的教育，并且可以防止资产阶级攫取英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权。然而，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巴黎公社以来，总委员会活动规模之巨大，已经使得有必要在英国也成立联合会委员会了。——第457页。
- 316 “代表会议的特别决议”（第十三项）：第一个决议由德·巴普提出，于9月22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上通过；第二个决议是9月22日在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通过的，其基本内容是马克思就国际在德国和英国的状况所做的发言中包含的结论。马克思在这篇发言中谈到德国工人对巴黎公社的支持，还谈到吴亭所提出的建议。第三个决议于9月20日在第五次会议上通过。通过这个决议，是因为代表会议上宣读了西班牙联合会关于西班牙国际组织的建议。第四个决议是德·巴普

于 9 月 22 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就吴亭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而提出的;吴亭的报告揭露了巴枯宁派在俄国进行的阴谋。马克思在就这个问题发言时指出,资产阶级报刊利用涅恰也夫密谋事件对国际工人协会进行诬蔑(见本卷第 470 页)。——第 457 页。

- 317 第十四项决议——“关于给公民吴亭的委托”,由瓦扬提出,于 1871 年 9 月 22 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通过。这项决议的提出和通过,是因为吴亭报道了涅恰也夫案件的情况。马克思建议把关于涅恰也夫案件的报告提交总委员会。——第 458 页。
- 318 第十五项决议——“关于应届代表大会的召开”,由德·巴普和斯廷斯于 1871 年 9 月 22 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九次会议上提出,提出时措辞略有不同。——第 458 页。
- 319 第十六项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由马克思于 1871 年 9 月 21 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提出。在这次会议上,当这个问题经过一个委员会讨论(见本卷第 443—444 页和注 292)以后,马克思做了关于同盟以及巴枯宁派在瑞士的分裂活动的报告。本决议以及第十七项决议,都是根据这一报告而通过的。——第 458 页。
- 320 “国际工人协会。关于 1869 年 9 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 1869 年布鲁塞尔版第 172 页(《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r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 p. 172)。——第 459 页。
- 321 第十七项决议——“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由马克思于 1871 年 9 月 21 日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提出。决议单行本中发表了这个决议的摘要。决议全文刊载于 1871 年 10 月 21 日“平等报”第 20 号(见本卷第 462—465 页)。——第 459 页。
- 322 指由马克思执笔的总委员会决议。这个决议不顾巴枯宁派的无理要求,保留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称和这个委员会作为瑞士罗曼语区国际各支部中的领导机关的地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90 页)。——第 459 页。

323 “国际工人协会。关于 1869 年 9 月在巴塞尔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 年布鲁塞尔版第 172 页。——第 463 页。

324 见注 322。——第 463 页。

325 马克思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出版者的信，与本卷附录中发表的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信（见本卷第 704—715 页），于 1871 年 10 月 21 日同时刊登在该周刊上。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于 1870 年至 1876 年在纽约出版的周刊，是国际的美国第十二支部的机关刊物，该支部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组成，1872 年 3 月被总委员会开除出国际。——第 466 页。

326 马克思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讲话，是在 1871 年 9 月 25 日在伦敦为庆祝这个纪念日而举行的特别集会上做的。在这次集会上，马克思被推选为主席。出席这次集会的，有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世界报”报道了 9 月 25 日集会的情况，并摘要转述了马克思讲话的内容。本卷发表的只是报道中转述马克思讲话内容的部分。

“世界报”（《The World》）是美国一家日报，民主党的机关报；1860 年至 1931 年在纽约出版。——第 467 页。

327 指法国 1848 年的二月革命。——第 468 页。

328 1871 年 10 月 7 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审查了替法国警察机关效劳、并以 1871 年法国人支部领导者之一的身份混进国际的杜朗进行间谍活动的问题。杜朗同警察官员的来往信件曾被提交总委员会。按照警察机关的指示，杜朗应该打入伦敦代表会议充当密探，并且钻进总委员会。关于开除杜朗的决议是由恩格斯起草并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

决议由马克思署名，用德文载于 1871 年 10 月 14 日“人民国家报”

第 83 号,用法文载于 10 月 15 日“自由报”第 174 号、10 月 21 日“平等报”第 20 号、10 月 22 日“米拉波报”第 118 号,用意大利文载于 10 月 19 日“人民报”第 122 号,用西班牙文载于 10 月 23 日“解放报”第 19 号。随同决议一起在“人民报”发表的,还有恩格斯的附言:“‘人民报’编辑先生:总委员会委托我将下列决议寄上,请贵报予以发表。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意大利书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0 月 13 日于伦敦。”

“人民报”(《La plebe》)是恩·比尼亚米主编的报纸,1868 年至 1875 年在洛迪出版,1875 年起在米兰出版;1871 年每周出版三次。起初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左翼的机关报;1871 年至 1873 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实行总委员会的路线。该报刊登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和国际的许多文件。——第 469 页。

329 工人团体联合会是巴黎的工会以及其他工人团体的联合组织,1869 年在国际的倡导下成立。联合会包括有 50 个工会和工人团体,每个单位向联合会派出代表一人至三人。联合会为罢工工人组织互助,同国际保持密切联系。——第 469 页。

330 这篇声明是马克思根据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写的。会议委托总委员会发表一项声明: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涅恰也夫密谋完全无关。声明的文稿经总委员会于 1871 年 10 月 16 日批准。

1869 年,涅恰也夫同巴枯宁建立了联系以后,在许多俄国城市展开了成立“人民惩治会”这种密谋组织的活动。涅恰也夫所组织的小组里面鼓吹庸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彻底破坏”,散发无政府主义的传单。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学生和各阶层居民的代表人物加入了涅恰也夫的组织,因为对沙皇统治的尖锐批评和对它进行坚决斗争的号召吸引了他们。涅恰也夫利用巴枯宁给他的“欧洲革命联盟”代表的资格,企图冒充国际的代表,从而蒙蔽他所成立的组织的参加者。

由于涅恰也夫的组织被破获以及该组织的参加者于 1871 年夏在彼得堡受审,涅恰也夫为达到自己目的而采取的恫吓、威胁、招摇撞骗等等冒险手法遂被揭发出来。资产阶级报刊就利用这个案件的材料,无中生有地对国际加以中伤,而实际上涅恰也夫同国际毫无关系。

总委员会的这个声明是由恩格斯译成法文的。声明用德文载于

1871年11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88号(由卡·马克思以德国和俄国的书记身分署名),用法文载于1871年11月5日“平等报”第21号、1871年10月18日“谁来了!”第14号,用意大利文载于1871年11月3日“玫瑰小报”第306号、1871年10月19日“人民报”第122号。——第470页。

- 331 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是马克思写的,1871年10月17日经总委员会一致批准。

1871年法国人支部是由法国流亡者于1871年9月在伦敦组成的。密探杜朗混入了支部组织,不久为总委员会所揭发。支部的领导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起来行动,同他们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在1871年10月14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审查。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马克思做了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本决议案。保存下来的决议本文是在总委员会担任法国通讯书记的赛拉叶的手抄稿。——第471页。

- 332 见注320。——第471页。

- 333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年9月28日创建”1867年伦敦版第5页(《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Founded September 28th, 1864》. London, [1867], p. 5)。——第472页。

- 334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年9月28日创建”1867年伦敦版第5页。——第472页。

- 335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年9月28日创建”1867年伦敦版第7页。——第472页。

- 336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最初文本是由马克思在1864年10月用英文写的,同年11月1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为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5—18页)。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章程经过某些补充和修改,同附在章程后面的组织条例一起由大会批准。

1866年秋,章程和组织条例由马克思和拉法格译成法文,于11月底在伦敦出版单行本,出版这个单行本时考虑了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主要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99—603页)。但是这个版本没有流传开来。1867年章程和组织条例的英文本在伦敦出版了,出版英文本时考虑了1864年临时章程通过以后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对章程所做的修改。国际后来的两次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通过了一系列决定,这些决定是对章程的补充。但是流传的章程文本中都没有反映这些补充和修改。日内瓦代表大会和洛桑代表大会以后出版的英文本中也有许多重要的不确切的地方。此外,由于章程没有各种文字的正式版本,以致在好多国家出现了不准确的章程译文。1866年出版的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的法文译本就把关于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作用这一最重要的论点歪曲了。鉴于所有这一切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准备伦敦代表会议的时候就拟了一项关于颁布新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439页)。伦敦代表会议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用英文、德文和法文颁布新的标准版章程和组织条例的决议案,同时还决定,所有别种文字的译文也都应该经过总委员会的批准。

1871年9月底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准备了新版文本,同时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附录”部分重新写过,其中详细叙述了所有修改和补充的理由。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本和法译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监督下翻译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正式版本(《General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在伦敦以单行本出版,1871年11月上半月出版了英文本,12月出版了法文本。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文是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发表的,另外还发表于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在恩格斯参与下翻译的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正式版本,由于总委员会缺乏资金而没有出版。“人民报”出版社和“平等”周报出版社出版了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节译本。——

第 475 页。

337 这一段和前一段都带有宣言性质。由于中央委员会为起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员会其他委员的坚持,马克思把这两段话加进了 1864 年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马克思在准备共同章程的 1871 年版的时候把这一段里“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前面的话全部删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6 页)。——第 476 页。

338 马克思列举的是下列各版本的国际文件: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 Long Acre, London》, 1864.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Founded September 28th, 1864》. London, [1867].

《Congrès ouvrier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enu à Genève du 3 au 8 septembre 1866》. Genève, 1866.

《Procès-verbaux du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éuni à Lausanne du 2 au 8 septembre 1867》. Chaude-Fonds, 1867.

《Troisièm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 rendu officiel》. Bruxelles, 1868.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Resolutions of the Congress of Geneva, 1866, and the Congress of Brussels, 1868》. London, [1869].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rendu du 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tenu à Bâle, en septembre 1869》. Bruxelles, 1869.

《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 1869》.

Published by the General Council.London, [1869].

《Quatrième Congrès d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tenu à Bâle, du 6 au 11 septembre 1869. Rapport du délégué aux Sections de la Fabrique de Genève》. Genève, 1869.

《Resolut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Assembled at London from 17th to 23 th September 1871》. London, 1871. —— 第 487 页。

- 33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6 页和本卷第 476 页。—— 第 488 页。
- 34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6 页。—— 第 488 页。
- 341 巴塞尔代表大会批准了 1867 年 9 月 24 日总委员会关于撤销总委员会主席一职的决定。马克思指的是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 第 488 页。
- 342 这个声明是恩格斯写的, 因为 10 月 31 日的“泰晤士报”刊载了英国保守党议员亚·贝·柯克伦的一封信; 柯克伦重复了英法反动报刊关于国际的谰言, 并且企图诬蔑国际工人协会, 为此他利用了巴枯宁派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文件。在 10 月 31 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 由恩格斯宣读了这个声明, 并得到了会议的批准。由于“泰晤士报”编辑部拒绝发表总委员会的声明, 它被发表在“东邮报”上。—— 第 493 页。
- 343 “日内瓦国民、政治和文学报” (《Journal de Genève》) 是带有保守倾向的日报, 1826 年出版。—— 第 494 页。
- 344 指奥·特斯屠在他 1871 年为供警察保安人员使用而出版的国际文件汇编里发表的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秘密通知信的片断; 这封信驳斥了巴枯宁派对国际领导的诬蔑造谣。马克思写的这封通知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35—443 页) 分别由各通讯书记署名, 由总委员会分发给所有的支部。特斯屠发表的那个片

断,是摘自被法国警察机关查获的由法国通讯书记欧·杜邦署名的通知信(见O.T.estut.《L'Internationale》,3 édition.Paris—Versailles,1871,p.237—238)——第494页。

345 确定了共同税界的德国各邦的关税同盟,是1834年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的。后来,这个同盟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一些小邦以外的德国所有各邦。由于必须建立统一的德国市场而成立的关税同盟,促进了1871年实现的德国政治统一。——第497页。

346 指由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1844年签订中美和法协定,而为英国、美国、法国消除了实行贸易扩张的障碍。——第497页。

347 总委员会在1871年10月17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决议。它在决议中指出,支部章程与共同章程的抵触使支部加入国际发生了困难(见本卷第471—474页)。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了攻击。支部的答复经过一个委员会的讨论后,于1871年11月7日被提交总委员会讨论。

法国通讯书记赛拉叶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了由马克思写的决议案,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本决议是由两份手稿保存下来的。一份是马克思的手迹,另一份是赛拉叶的手迹。在赛拉叶的手抄稿(看来是被通过的决议的最后文本)里,把在马克思原稿中有的最后一段删去了,而在倒数第二段里说明总委员会10月17日的决议是最后的决议。1872年初,1871年法国人支部解散了。一个拥护总委员会的新的法国流亡者支部在伦敦成立起来。——第499页。

348 见卡·马克思“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4页。——第499页。

349 见注323。——第503页。

350 见注155。——第503页。

351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是小资

产阶级民主派的日报；从 1856 年至 1934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从 1866 年起用这个名称）。

声明中提到的共和大同盟是 1871 年在英国成立的小资产阶级组织。它的领导人有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布莱德洛、工联主义者奥哲尔、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勒·吕贝、韦济尼埃等人。同盟宣布其宗旨为联合各国共和主义者实现普遍的繁荣幸福，提出了一个由民主要求同成立全世界联邦共和国的号召等等拼凑而成的纲领。同盟的活动家妄想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他们纠合其他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反对国际总委员会。——第 505 页。

352 指巴枯宁派的活动。1870—1871 年，他们在西班牙的许多城市里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部（见注 162）。——第 506 页。

353 1871 年 11 月 23 日“意大利无产者报”发表了所谓的都灵工人宣言，这个宣言反映了巴枯宁派对国际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进攻。因此恩格斯写了这一声明。

“意大利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 Italiano》）是意大利的一家报纸，1871 年在都灵每周出版两次，由警探特尔察吉主编；该报袒护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1872 年至 1874 年报纸以“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的名称出版。——第 507 页。

35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3 页。——第 508 页。

355 “1867 年 9 月 2 日至 8 日在洛桑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1867 年绍德封版第 19 页（《Procès-verbaux du Congrès d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éuni à Lausanne du 2 au 8 septembre 1867》.Chaux-de-Fonds, 1867, p. 19.）。——第 508 页。

356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是 1871 年 10 月至 1872 年 1 月在日内瓦出版的周报，1871 年 11 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正式机关报。——第 508 页。

357 给朱·博里昂尼以接受国际工人协会新会员的权利的委托书，是恩格

斯为答复国际洛迪支部的一位领导人恩·比尼亚米 1871 年 11 月 14 日的来信而草拟的；比尼亚米在信中报道了在费拉拉以及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城市建立国际支部的消息，并请求发给罗马尼亚的一些公民（其中包括朱·博里昂尼）以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新的支部的委托书。——第 509 页。

- 358 恩格斯的这篇短文刊登在“人民报”的“最新消息”栏里，并且开头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国际会员从伦敦来信写道”。这大概是恩格斯给该报编辑恩·比尼亚米写的一封信的一部分，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第 510 页。

- 359 “解放报”（《L' Emancipacion》）——见注 258。——第 510 页。

- 360 恩格斯写的这个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几篇对国际进行诬蔑攻击的文章给意大利几个报纸编辑部的声明，除了寄给“人民罗马”以外，根据恩格斯在他的草稿中的记载，还在 1871 年 12 月 5—7 日寄给了其他几家报纸：“口令报”（《Il Motto d' Ordine》），“契切罗瓦基奥报”（《Il Cice - ruacchio》），“平等”周报（《L' Eguaglianza》），“人民报”（《Plebe》），“意大利无产者报”（《Proletario Italiano》），“玫瑰小报”（《G az- zettino Rosa》）。

“人民罗马。宗教哲学、政治、文学周刊”（《La Roma del Popo- lo》）是 1871 年至 1872 年在罗马出版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它曾刊登马志尼攻击国际的文章。——第 511 页。

- 361 恩格斯指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 年 9 月 5—13 日）关于拒绝和平和自由同盟邀请正式参加它的即将举行的伯尔尼代表大会的决定。决议允许国际会员只以私人的方式参加这个代表大会（见“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1869 年布鲁塞尔版第 40 页。《Troisième Congrès d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mpte rendu officiel》. Bruxelles, 1868, p. 40）。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其中有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于 1867 年在瑞士建

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播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在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1868年9月21—25日在伯尔尼举行),巴枯宁提出了一个宣布必须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实现“阶级平等”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在代表大会上遭到多数票的否决;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由于没有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便退出了和平和自由同盟,并于同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512页。

- 362 马克思写这封信给“东邮报”编辑,是因为1871年12月11日“国民改革者”发行人、资产阶级激进派查·布莱德洛在伦敦的公开演说中以及在写给“东邮报”的信中(12月16日发表),对马克思进行了诬蔑性的攻击。马克思在1871年12月1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了布莱德洛的攻讦同资产阶级政客与报纸对国际的诋毁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诋毁在“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发表以后更是有增无已;马克思还指出了布莱德洛同卖身投靠的法国资产阶级新闻界有亲密的关系。

由于“国民改革者”在1872年1月发表了布莱德洛的许多新的诬蔑信件,马克思写了几个揭露它们它们的声明(见本卷第523、524—525页)。——第514页。

- 363 恩格斯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瑞士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桑维耳耶代表大会(1871年11月)所通过的给国际全体支部的一份旨在反对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通告。文章由恩格斯随同1872年1月3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一并寄出,他在信中强调,必须立即发表这篇文章。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后,恩格斯请李卜克内西给他寄几份载有这篇文章的报纸,以便转寄到意大利去,因为巴枯宁派利用桑维耳耶通告在那里发起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诽谤运动。国际的许多机关报都起来反对桑维耳耶通告;1871年12月24日的“平等报”发表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关于谴责通告企图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在西班牙,1871年11月27日“解放报”第24号发表了拉法格的一篇揭露通告的诬蔑的文章。

国际在德国、英国、荷兰、美国的支部以及意大利的米兰支部，都批驳了桑维耳耶通告；西班牙许多受巴枯宁派影响的支部，还拿不定主意公开表示同意桑维耳耶通告。为了彻底揭穿巴枯宁派的宗派主义破坏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1月着手撰写总委员会的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516页。

- 364 见“关于在瑞士巴塞爾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9月6日至11日”[1869年]伦敦版第21页（《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 1869》. London, [1869], p. 21）。——第518页。
- 365 不伦瑞克的刑事法庭——指不伦瑞克的地方法庭，1871年10月曾在该法庭审判普鲁士当局逮捕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员（见注154）。——第518页。
- 366 暗检室是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许多其他国家邮政部门所属的秘密机构，从事暗中检查信件的活动。暗检室从欧洲君主专制时代起就已存在。——第519页。
- 367 “国民改革者”（《The National Reformer》）是英国的周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刊物，从1860年至1893年在伦敦出版。——第523页。
- 368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是周刊“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的简称。它是德国小资产阶级侨民于1852年在纽约创办的，从1853年3月18日到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发行。该报于1853年刊登了一些文章诬蔑马克思以及与马克思有联系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是反动派的日报，受

到官僚和地主上层人物的支持,从 1756 年出版到 1917 年。——第 524 页。

- 369 恩格斯给“玫瑰小报”编辑部写这封信,是因为“自由思想”杂志在意大利掀起了一个诽谤国际的运动。“自由思想”从 1866 年至 1876 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枯宁同盟的成员鲁·斯蒂凡诺尼担任编辑。

为了破坏国际的影响,斯蒂凡诺尼主张建立一个所谓“唯理论者总协会”。他煽动地说,这个协会的使命就是实现国际的原则,但是“没有国际的缺点”。他还宣传赎买地主地产、建立农业新村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思想,把这说成是使劳动者完全摆脱剥削的万应灵药。斯蒂凡诺尼的纲领没有被意大利工人接受,他的建立“唯理论者协会”的方案也没有实现。

恩格斯把唯理论者讽刺地称为“受俸神甫”(来自拉丁文 *praebenda*, 意即天主教教会靠捐献得来的产业),这是影射他们想靠捐献建立土地基金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

恩格斯的这封信除了在“玫瑰小报”上刊登以外,还于 1872 年 2 月 22 日在“自由思想”杂志上发表(不带附函部分)。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是意大利的一家日报,从 1867 年至 1873 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 1871 年至 1872 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从 1872 年起,受巴枯宁派控制。——第 526 页。

- 370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crat》)是从 1871 年至 1876 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第 527 页。

- 371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由于正

义者同盟(它是工人、手工业者的秘密联合,产生于三十年代,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支部)的改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制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的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集团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同盟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的前身。——第 527 页。

- 372 “维斯巴登日报”(《Wiesbadener Zeitung》)是德国的保守派的报纸,在 1872 年至 1881 年出版。——第 528 页。
- 373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 年 10 月 4 日—11 月 12 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 11 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罪证是普鲁士警探编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当局从被共产主义者同盟开除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7 名被告人被分别判处 3 年至 6 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449—456、457—536 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 528 页。
- 374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这篇声明在 1872 年 2 月 20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保存下来了由荣克抄写的这篇声明的副本。除了篇末说明中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报刊以外,在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1872 年 4 月 6 日第 99 期、葡萄牙的国际里斯本支部的机关报“社会思想报”(《O Pensamento Social》)1872 年 3 月第 6 期上也曾刊登这篇声明。——第 529 页。
- 375 “‘法兰西内战’草稿”是马克思在 1871 年 4—5 月间写成的。在 3 月 18 日革命后的最初几天,马克思就开始仔细地研究有关巴黎事件的所有材料,收集剪报,从英法报纸上摘录大量的材料。4 月下半月马克思动手写初稿,大约写到 5 月 10 日左右,接着写“法兰西内战”二稿,这一工作在 5 月中结束,随后就开始“法兰西内战”的定稿工作,把它写成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的形式。有关巴黎公社最后一个星期的

剪报和马克思笔记本上摘录的材料,没有在三稿中,而是直接在宣言中加以利用。

“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的手稿,都是写在大张的纸上。篇幅最大的初稿的手稿,看来是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它共占 11 张纸,由于两面都书写,故共有 22 页,从第 1 页至第 22 页,除了当中的第 6 页和第 13 页以外,都有马克思标的页码。二稿的手稿,根据马克思标的页码(不是每张纸上都标有)来看,共有 13 张,保存下来的有 11 张(其中 8 张是一面书写,3 张是两面书写)。在保存下来的第五节:“内战的开始。3 月 18 日的革命。克列芒·托马。勒康特。旺多姆广场事件”之前的第四节,看来是手稿的丢失部分。未标明页码的最后三页(见本卷第 656—662 页)主要是对二稿的个别地方的修订。马克思在进行“法兰西内战”的定稿工作时,通常用垂直线和斜线把初稿和二稿中已利用过的地方划掉,所以初稿和二稿的手稿中大部分地方都划有这种垂直线和斜线。只有马克思用横线划掉的辞句,本版才未收入。两部手稿中有许多在工作时标用的标记、括弧、方括弧等,本版均未收入。

马克思在他的草稿中摘引或者提及公社的指令和公告时,通常都是按照它们发表的日期或者在伦敦见报的日期来引用。

“‘法兰西内战’草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以及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逝世后长时期内未发表过。初稿的一些片断最初发表在 1933 年 3 月 14、18 日“真理报”第 72、76 号上。初稿和二稿的全文第一次用原文(英文)和俄译文发表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1934 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3(8)卷中。——第 533 页。

376 比桑瓦耳战役,或叫做蒙瓦勒里安战役——见注 126。——第 535 页。

377 1870 年 10 月 5 日在古·弗路朗斯领导下,国民自卫军工人营在巴黎市政厅前示威,要求国防政府举行公社选举,采取措施巩固共和国,并与入侵的敌人坚决斗争。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并且规定国民自卫军除非得到命令不准集会和武装示威。

关于 1870 年 10 月 31 日起义,见注 217。——第 536 页。

378 Capitularls——见注 194。——第 536 页。

- 379 见注 197。——第 538 页。
- 380 见注 213。——第 540 页。
- 381 指根据 1850 年 5 月 31 日法令实行新的选举资格限制，这项法令是法兰西共和国立法议会根据以梯也尔为首的秩序党提议通过的，秩序党被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在 1850 年 3 月和 4 月的议会补充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吓坏了。新的选举法打击了城乡工人和贫苦农民，它规定只有定居三年并直接纳税的人才能参加选举。法国的选民因此减少了 300 万左右。
- 1850 年选举法通过后不久，议会就把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 1850 年的年薪由 60 万法郎增加到 300 万法郎。——第 541 页。
- 382 诺曼第的工厂主为了顺利地同英国工厂主进行竞争，企图削减纺织工人的工资，这在 1868 年底—1869 年初引起了索特维耳—勒—卢昂纺织工人的大罢工。罢工工人向国际请求援助，国际总委员会通过伦敦的工联和法国的工会为罢工的工人募款。正如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虽然罢工失败了，但是它促进了诺曼第纺织工人的组织和团结，造成了卢昂、埃耳伯夫、达尔讷塔耳等地的工会的建立，并且巩固了英法工人间的兄弟联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421—424 页）。——第 541 页。
- 383 “号召报”（《Le Rappel》）是维·雨果和昂·罗什弗尔创办的左翼共和派日报，从 1869 年到 1928 年出版。它曾尖锐地抨击第二帝国，在巴黎公社期间它主张支持公社。——第 542 页。
- 384 指 1839 年 5 月 12 日布朗基派四季社的武装暴动（见注 243）。——第 543 页。
- 385 马克思手稿中的笔误：杜弗尔和维维延进入卡芬雅克政府，分别任内务部长和公共工程部长，是在 1848 年 10 月 13 日。1849 年 6 月 2 日，杜弗尔是在奥迪隆·巴罗内阁中任部长。——第 543 页。
- 386 指普瓦提埃大街委员会，即所谓秩序党（见注 205）的领导机关。在这个

委员会中占优势的是以梯也尔为首的奥尔良派。——第 543 页。

- 387 马克思在讲到 1847 年“自由联盟”时,是指 1846 年选举后法国众议院中形成的所谓“进步保守派”。这一派别的主要活动家是奥尔良分子日拉丹、托克维尔、杜弗尔等。“进步保守派”要求基佐政府实行一系列符合大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改革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选举权以巩固七月王朝。他们反对基佐,揭露基佐政府成员所干的卑鄙勾当。

自由联盟是 1863 年立法团选举时在共同反对帝国的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奥尔良派和部分正统派的联盟。1869 年竞选时曾企图重新组织自由联盟,但因 1863 年加入这一联盟的各党派间发生分歧而遭到了失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茹·法夫尔、茹·西蒙等)于 1869 年主张同保皇派结成联盟,他们支持奥尔良分子杜弗尔为候选人,但是,杜弗尔没有当选。——第 544 页。

- 388 暗指当时任内务大臣的梯也尔在残酷镇压 1834 年 4 月 13—14 日巴黎的共和党人起义中,特别是在血腥屠杀特朗斯诺南街居民中所起的作用(见注 200)。——第 546 页。

- 389 指按照 1851 年 12 月 2 日波拿巴政变的方式行事。——第 546 页。

- 390 1871 年 4 月 6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6 号。——第 547 页。

- 391 1871 年 4 月 6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6 号。——第 547 页。

- 392 十五人委员会是国民议会为配合梯也尔政府同革命的巴黎作斗争而于 1871 年 3 月 20 日建立的组织。参加委员会的主要是保皇党人,也有支持梯也尔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委员会曾号召外省组织志愿军与公社斗争,但没有得到支持。公社失败后,委员会停止了活动。——第 548 页。

- 393 马克思大概是准备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利用这些说明保皇党人在凡尔赛国民议会中的阴谋的例子。在这一时期马克思所做的报纸摘录中,有关于奥马尔公爵及其兄弟茹安维尔亲王在凡尔赛的阴谋活动,关于波旁系和奥尔良系合并的传闻,以及关于把法国王位让给奥马尔公爵的计划等资料。——第 549 页。

- 394 1871年3月30日“巴黎公社公报”第1号。——第550页。
- 395 Chouannerie(朱安叛乱),见注125。——第551页。
- 396 “市警备队”(从1871年起改称共和国近卫军)是1830年七月王朝政府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在巴黎建立的军事化的警察(包括步兵和骑兵);在1871年它是凡尔赛反革命军队的一支突击力量。
教皇的朱阿夫兵——见注114。
朱安兵——见注241。——第552页。
- 397 1840年,由于俄、英、奥、普和土耳其缔结了帮助土耳其苏丹对付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的伦敦公约(见注102),支持穆罕默德-阿利的法国,面临着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和欧洲各国结成反法同盟的威胁。法国政府被迫放弃了对穆罕默德-阿利的支持,而这意味着法国政策在近东遭到严重失败。由于这个让步,法国政府才得以参加签订关于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军舰进出黑海海峡的1841年伦敦公约。这个公约于1841年7月13日由俄、英、法、奥、普的代表为一方,土耳其的代表为另一方共同签订。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三版中,举出上述的第一次伦敦公约(即1840年公约)作为法国外交失败的例子。——第553页。
- 398 “形势报”(《La Situation》)是1870年9月至1871年8月2日在伦敦用法文出版的波拿巴派日报;它对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持反对态度。——第554页。
- 399 Francs- fileurs——见注239。——第557页。
- 400 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见注240。——第557页。
- 401 维也纳条约是参加反拿破仑战争的各国由于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结果而于1815年5—6月间在维也纳签订的。为了恢复各正统王朝的统治,维也纳条约违背民族统一和各民族独立的利益,任意修改了欧洲的地图。
巴黎条约是指1871年2月26日法国和德国间签订的初步和约(见注211)。——第559页。

- 402 见注 101。——第 559 页。
- 403 马克思是指普鲁士在 1806 年反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被击败以后（这次失败表明了普鲁士封建农奴制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腐朽性），于 1807—1811 年实行了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由于这些改革，农奴的人身依附废除了，但是所有的封建义务仍然保存着，只有征得地主的同意才能进行赎买；普鲁士实行了有限的地方自治，改组了军队和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第 559 页。
- 404 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勇保卫战，俄军攻下土耳其要塞卡尔斯以及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失利，使俄国得以在巴黎和会（1856 年 2—3 月）上玩弄外交手腕，利用英、奥、法之间的矛盾，大大地减轻了结束沙皇俄国战败的克里木战争的和平条件；大大地限制了割让与土耳其的领土的范围，俄国保留了它在高加索的统治和在阿速夫海设置舰队和要塞的权利。和会决定结束奥地利对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占领，这给奥地利在巴尔干的扩张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 马克思所说的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实行的改革，是指 1861 年的农奴制改革，地方管理方面的改革（1864 年地方自治局改革和 1870 年市政改革），1864 年的采用新诉讼法以及财政制度的改革。实行这些改革是俄国向资产阶级民主制过渡的重要步骤。——第 560 页。
- 405 “无体法官”（《Great Unpaid》）是英国对担任调解治安法官之职，但不领一文薪俸的人的谑称。——第 565 页。
- 406 “口令报”（《Le Mot d'Ordre》）是共和派左翼日报，从 1871 年 2 月 3 日起在巴黎由昂·罗什弗尔编辑出版。3 月 11 日被巴黎总督维努亚勒令停刊，在巴黎公社时期于 4 月 8 日复刊，一直出版到 1871 年 5 月 20 日。该报尖锐地抨击凡尔赛政府和国民议会中的保皇派多数，但是它并没有完全站在公社方面，它曾反对镇压巴黎反革命分子的措施。——第 565 页。
- 407 关于公社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枪杀国民自卫军情况的结果的报道，载于

1871年4月29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19号和“口令报”第65号。马克思引用的是“口令报”发表的关于委员会报告的消息。——第566页。

408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马克思于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曾为该报撰稿。为该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当时发行很广的进步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在美国国内战争时期，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主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倾。——第566页。

409 工商会代表的声明，马克思是从1871年4月13日“号召报”第669号上摘引的。

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是1871年4月初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组织。它企图在凡尔赛和巴黎之间进行调停，建议在承认共和国和巴黎市政自由的基础上达成协议，以使用和平方式取消公社，结束内战。

共济会会员的示威是指1871年4月29日巴黎共济会会员到城防工事处要求凡尔赛军队停止军事行动的示威游行。4月26日和29日，公社为了得到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同情在市政厅和共济会会员（他们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治观点）举行了会见。由于共济会会员的停战建议遭到梯也尔的拒绝，他们在这两次会见中声明支持公社。在4月29日的会见之后举行了上述的示威游行，公社派代表团参加了这次游行。——第567页。

410 马克思引自1871年4月17日“号召报”第673号的巴黎权利共和同盟决议。——第568页。

411 马克思指的是“市镇通报”（《Moniteur des communes》）。这是公社时期在凡尔赛出版的法国政府报纸，以梯也尔政府“公报”的晚报附刊形式出版。——第568页。

- 412 马克思指的是 1871 年在里摩日出版的法国共和派报纸“共和保卫报”（《La Défense républicaine》）。——第 568 页。
- 413 大概是指 1871 年 5 月 6 日“复仇者报”对 1871 年 4 月 30 日市镇议会选举结果的评价。
“复仇者报”（《Le Vengeur》）是共和派左翼日报。从 1871 年 2 月 3 日起在巴黎出版；3 月 11 日被巴黎总督维努亚下令查封。在巴黎公社时期于 3 月 30 日复刊，一直出版到 1871 年 5 月 24 日。该报曾支持公社，刊载它的正式文件和各次会议的报道。——第 569 页。
- 414 马克思指 1858 年 2 月 19 日立法团通过的“嫌疑犯处治法”。它使政府和皇帝有无限权力把一切有敌视第二帝国体制嫌疑的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任何地方，甚至驱逐出法国领土。——第 569 页。
- 415 由议员格雷波交给国民议会的里昂市镇参议会的呈文，要求停止内战以及凡尔赛同巴黎议和。它同时建议明确划清议会和巴黎公社的权限，把公社的活动限制在市政问题上。——第 569 页。
- 416 指帝国时代在政府当局的强大压力下于 1865 年选出的市镇参议会。——第 569 页。
- 417 城市联盟（全名为共和城市爱国联盟），是害怕巴黎公社失败后王朝复辟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 1871 年 4—5 月间酝酿成立的组织。联盟临时委员会在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见注 409）的积极参加下决定 1871 年 5 月 9 日在波尔多举行市镇参议员代表大会，以设法停止内战，巩固共和国，并正式成立联盟。但凡尔赛政府禁止召开城市联盟代表大会，临时委员会随即停止了活动。
1871 年 5 月 6 日的“号召报”上曾发表了原拟召开的城市联盟代表大会的纲领。——第 570 页。
- 418 1871 年 4 月 13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03 号。——第 576 页。
- 419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3 月 3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0 号发表的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第 576 页。

- 420 1871年4月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5号。——第577页。
- 421 由于传出色当战败、巴黎发生革命、帝国于1870年9月4日崩溃这些消息，法国许多城市发生了工人的革命武装起义。其中如里昂、马赛、土鲁斯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公社。各省的公社，特别是里昂的公社，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取消警察官僚机构，释放政治犯，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对大资产者征税，无偿发还小当铺的典当物品等等）。国防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地方公社。——第580页。
- 422 1870年10月31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的地位不稳，国防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于1870年11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巴黎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由于国防政府对居民施加压力，不断进行蛊惑性宣传，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等等，它还是获得了多数票。——第580页。
- 423 马克思引自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22日告巴黎市民书，这一号召书曾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并载于1871年3月2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4号。——第589页。
- 424 马克思用这句话表达一篇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缴付赔款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内容；这篇文章载于1871年3月24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3号。——第594页。
- 425 见注233。——第595页。
- 426 1848年3月16日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决定对每一法郎直接税加征45生丁的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全部重担都落在农民身上，在农民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大地主和天主教教士便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农民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使他们成为反革命的后备军。——第595页。
- 427 见注234。——第596页。
- 428 大概指外省共和联盟（见注231）。——第598页。

- 429 《Concordats à l' amiable》—— 见注 229。—— 第 599 页。
- 430 1789 年 6 月 20 日, 针对路易十六政府企图破坏自行宣布为国民议会的三级会议开会的做法, 第三等级的议员齐集于凡尔赛的网球厅, 宣誓不制成宪法决不解散。网球厅的宣誓是成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奏的事件之一。—— 第 601 页。
- 431 指巴黎无产者— 实证论者协会。协会的纲领带有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倾向。1870 年初, 总委员会考虑到协会的工人成分, 接受它为国际的一个支部; 同时对协会的纲领做了尖锐的批判。—— 第 602 页。
- 432 法伦斯泰尔—— 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 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
伊加利亚—— 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所描述的幻想的共产主义国家。—— 第 603 页。
- 433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3 月 2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80 号。—— 第 605 页。
- 434 马克思引自 1871 年 4 月 1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91 号社论。—— 第 608 页。
- 435 引自 1871 年 4 月 19 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 宣言发表在 1871 年 4 月 20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10 号。—— 第 608 页。
- 436 告各省宣言—— 见注 435。—— 第 612 页。
- 437 见注 435。—— 第 612 页。
- 438 共和国保卫者总协会是 1871 年 2 月在巴黎成立的资产阶级民主组织, 它的目标是为共和国而斗争。协会支持公社并指责凡尔赛政府的政策。这里所引的该协会的决议载于 1871 年 5 月 9 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 129 号。—— 第 613 页。
- 439 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 年日内瓦版第 2 卷第 165 页 (Ch. Montesquieu, 《De l' esprit des loix》. Genève, 1748. Tome second, p. 165)。—— 第 613 页。

- 440 1871年3月20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79号。——第615页。
- 441 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48年日内瓦版第1卷第204—206页。
——第616页。
- 442 1793年宪法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雅各宾革命专政时期国民公会所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是十八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宪法中最民主的一部宪法。——第616页。
- 443 见注220。——第618页。
- 444 马克思引自1871年4月2日公社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告巴黎国民自卫军书”，这篇宣言载于4月3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3号，并以布告的形式发表。——第620页。
- 445 米里哀尔的话引自1871年4月4日“复仇者报”第6号。——第620页。
- 446 Capitulars——见注194。——第623页。
- 447 1871年4月28日“复仇者报”第30号。——第623页。
- 448 Soci é ég é ale——见注197。——第624页。
- 449 伦敦公约——见注397。——第626页。
- 450 在特朗斯诺南街屠杀共和党人和九月法令——见注200。——第627页。
- 451 指1814年和1815年以英、奥、普、俄为首的第六次和第七次反法同盟对法国的入侵，其目的在于推翻拿破仑第一的帝国，并让波旁正统王朝复辟。——第632页。
- 452 D é embriseur——见注213。——第632页。
- 453 里昂、马赛、土鲁斯的公社——见注421。——第641页。
- 454 指十九世纪中叶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的金矿对发展国际贸易的影响。——第645页。

- 455 马克思讽刺地影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一句成了君主专制制度的座右铭的名言：“朕即国家”。——第 648 页。
- 456 见注 409。——第 653 页。
- 457 *Francs- fleurs*——见注 239。
科布伦茨城的亡命之徒——见注 240。——第 654 页。
- 458 1871 年 5 月 10 日缔结的法兰克福和约确定了法国和德国媾和的最后条件。这一条约肯定了 1871 年 2 月 26 日初步和约(见注 211)中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的规定。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支付赔款的条件更苛刻了,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也延长了,——这是俾斯麦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的代价。法兰克福和约掠夺了法国,使德法之间未来的军事冲突必不可免。——第 654 页。
- 459 大概指严格限制市镇参议会权力的 1831 年“市镇组织法”和禁止各地市镇参议会建立联系的 1855 年“市镇组织法”。
关于在波尔多召集市镇代表大会的计划,见注 417。——第 655 页。
- 460 马克思在 1871 年 1 月 17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国防政府的发言,是为了反对奥哲尔于 1 月 10 日在伦敦圣詹姆斯大厅的群众大会上对这个政府及其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的赞扬;当时法夫尔正准备到伦敦去参加即将召开的修订 1856 年巴黎条约中有关黑海中立条文的国际会议。奥哲尔提出了一项决议,该决议赞扬国防政府,但完全不符合总委员会在关于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中对这个政府所做的阶级评价。由于马克思对奥哲尔的言论进行了批评,总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国际成员在群众大会和各种会议上的行为必须要有原则性的问题。
这篇发言,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其他发言一样,以记录的形式保存在总委员会记录簿中。本卷所收的这段时期的记录,在 1871 年 5 月以前是约·格·埃卡留斯记录的,以后就是约·黑尔斯记录的,这些记录简单、零碎,而且常有一些重大的错误。根据约·格·埃卡留斯的记录发表在“东邮报”上的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也有

这些缺点。有时这些报道比记录完全一些(因此在个别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言报道在本版中是按照报纸上的报道刊印的)。按照总委员会的规定,记录必须在总委员会的下次会议上核准,此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要求,记录中也常常记下他们关于记录中有错误的声明。——第 665 页。

- 461 指 1848 年 5 月 15 日革命俱乐部组织的巴黎的民众示威游行,参加者有 15 万人,主要是工人。游行者向应于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会议厅,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并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由于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完满的答复,参加示威游行者就宣布解散制宪议会并成立革命政府。游行队伍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资产阶级部队驱散了。——第 665 页。
- 462 指制宪议会为了代替已经卸下全权的临时政府而于 1848 年 5 月 10 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 1848 年 6 月 24 日卡芬雅克专政确立时为止。——第 666 页。
- 463 指制宪议会于 1848 年 8 月 9 日和 11 日通过的反动的出版法。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出版机关应该支付一大笔押金,这样一来,进步的工人报纸和杂志只好停刊了。同时对于反对政府、反对现行制度和私有制的言行,也规定了严厉的惩治办法(坐牢和罚款)。这个出版法是根据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类似法律制订的。——第 666 页。
- 464 罗马远征——见注 203。——第 666 页。
- 465 恩格斯的这个发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关于 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公社社员英勇斗争以及巴黎公社活动的一系列讲话和报告的第一篇讲话。恩格斯根据巴黎来信所做的发言,一开始就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歪曲 3 月 18 日事件的真正性质的报道。附有恩格斯发言记录的总委员会会议记录,起初把日期错写为 3 月 14 日,后来马克思审阅会议记录时,亲自将日期订正为 3 月 21 日。——第 667 页。
- 466 恩格斯指 1871 年 2 月 8 日选出、2 月 12 日在波尔多召开的成员极端反

动的国民议会(见注 210)。——第 667 页。

- 467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英国共和主义运动的演说中,总结了 3 月 28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总委员会的讨论,是根据由黑尔斯、韦斯顿、荣克和赛拉叶组成的总委员会代表团所做的关于他们参加共和主义群众大会的报告进行的。在代表团的报告中指出,赛拉叶在威灵顿音乐厅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他们一致通过了支持巴黎工人的决议。同时代表团还指出,群众大会通过了一个由奥哲尔提出的极端温和的、不超出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要求的决议。

在辩论中,总委员会委员们批评了奥哲尔和其他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立场,因为他们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限制了共和主义运动的纲领。——第 669 页。

- 468 指 1871 年 3 月 26 日举行的公社选举。巴黎人民起义胜利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自 1871 年 3 月 18 日至 28 日执掌政权,以后中央委员会把全权交给了公社。——第 671 页。
- 469 恩格斯的这个看法,在记录中记得非常简短。它是针对着法夫尔在 1871 年 4 月 10 日的国民议会中的发言而说的。法夫尔在发言中企图否认凡尔赛政府的罪责:它实际上同俾斯麦缔结联盟,以便镇压巴黎公社,他假惺惺地宣称,似乎政府拒绝了俾斯麦建议给予的援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一系列口头演说和报刊文章中,首先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一再揭露了法国反革命资产阶级为了镇压工人运动而勾结外敌的卖国阴谋(见本卷第 374—385 页)。——第 671 页。
- 470 赛拉叶于 1871 年 4 月 16 日的补充选举中由巴黎第二区选入公社;总委员会委员欧仁·杜邦也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他由于不能从英国前往巴黎而没有选上;在这次选举中,让·马·昂·杜邦由第十七区选入了公社。——第 673 页。
- 471 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于 4 月 26 日写信给巴黎的列·弗兰克尔,他在信中揭露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费·皮阿对赛拉叶的百般诽谤。——第 673 页。

- 472 指国际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或小委员会,它是由早在 1864 年国际工人协会进行活动初期为制定协会的纲领和章程而成立的委员会产生的。参加常务委员会的有各国通讯书记、总委员会总书记和财务委员。未被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明文规定下来的常务委员会,只起工人执行机构的作用;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草拟日后要提交总委员会审阅的国际的文件。——第 675 页。
- 473 见注 417 和 459。——第 676 页。
- 474 马克思在 1871 年 5 月 23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使会议就揭露凡尔赛政府和抗议梯也尔准备对公社社员进行残酷迫害问题展开了讨论。恩格斯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中(记录只留下了这个发言的极简短的记述),指出了曾假装答应给巴黎公社参加者以宽大处理的梯也尔的背后背弃行为。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在英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制止凡尔赛政府的野蛮行为。——第 677 页。
- 475 芬尼亚兄弟会——爱尔兰革命兄弟会——是五十年代末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产生的一个秘密组织。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兄弟会会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不止一次地指出了芬尼亚运动的弱点,批评了芬尼亚兄弟会会员的阴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竭力使它走上进行群众性发动并和英国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道路。
- 烧炭党人 是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在意大利、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法国活动的一个秘密阴谋团体的成员。
- 玛丽安娜 (Marianne) 是法国一个秘密共和组织的名称,成立于 1850 年;在第二帝国时期,该组织以反对拿破仑第三为目的。——第 679 页。
- 476 “现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月刊,从 1866 年起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提到的马志尼的那篇文章载于

- 该杂志 1871 年 6 月号。——第 679 页。
- 477 这篇访问马克思的报道，是纽约“世界报”驻伦敦记者 R·兰多尔写的，1871 年 7 月 18 日发表于该报，并转载于 1871 年 8 月 12 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 13 期（总第 65 期）。报道的开头部分和最后一段，是描述谈话的情况和记者本人的议论，此处从略。兰多尔在文章末尾声明，谈话内容是他追记的。——第 681 页。
- 478 指一种特殊的英语和德语的混合语，美国幽默作家查理·高弗莱·李兰德（1824—1903）的幽默作品“汉斯·布顿特曼歌谣”就是用这种语言写成的。——第 681 页。
- 479 看来，“世界报”记者的记录是不准确的。1871 年春天在巴塞罗纳发生的罢工不是雪茄烟工人而是纺织工人的罢工。1871 年雪茄烟工人的罢工发生在安特卫普和比利时的其他城市（见注 181）。——第 684 页。
- 480 在恩格斯发言以前，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罗马教皇庇护九世攻击国际的言论的报告。——第 687 页。
- 481 恩格斯指的是第二帝国当权派提出的所谓“民族原则”，他们普遍地利用它来从思想上掩盖侵略计划和对外政策上的冒险。拿破仑第三冒充自己是“民族的守护者”，利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领导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其目的是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的反革命政策的工具。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揭露，请参看马克思的抨击性的著作“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4 卷第 502—551 页）和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6 卷第 170—183 页）。——第 688 页。
- 482 总委员会在通过恩格斯关于召开伦敦代表会议的建议以后，于 1871 年 7 月 25 日委托总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拟订代表会议的纲领；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把巴枯宁派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瑞士罗曼语区进行分裂活动的问题提交代表会议处理（见注 292）。——第 690 页。

- 483 马克思发言驳斥英国工联的机会主义领导人之一奥哲尔,是因为他彻底转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公然拒绝国际的原则,在报纸上和多次演说中诬蔑总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第 691 页。
- 484 土地和劳动同盟是 1869 年 10 月在总委员会的参加下在伦敦成立的。参加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有十多个总委员会委员。在埃卡留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的纲领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16 卷第 598—603 页),除了若干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以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缩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马克思认为同盟能够在英国工人阶级革命化中起作用,把它看做是在英国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途径之一。但是,在 1870 年秋天之前,资产阶级分子的影响在同盟中加强了,于是它逐渐地同国际失去联系。——第 691 页。
- 485 1867 年 9 月 24 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关于撤销总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曾由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 年 9 月)批准。——第 692 页。
- 486 马克思的这篇发言以及在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其他许多篇发言,都保存在代表会议秘书马丁和罗沙用法文做的会议记录中;黑尔斯用英文做的会议记录没有保存下来。除马丁和罗沙整理过的会议记录外,保存下来的还有他们各自的记录草稿(我们所能找到的,有的是他们中间一个人的笔记,有的是两人各自记下的不同笔记)。本卷附录中发表的发言记录,是以整理过的记录稿为基础的。——第 693 页。
- 487 马克思指的是从 1871 年 7 月 1 日起在彼得堡进行的对涅恰也夫组织参加者的审判(见注 330)。——第 693 页。
- 488 伦敦代表会议就德拉埃于 1871 年 9 月 20 日在第五次会议上提出的决议草案展开了辩论,马克思在辩论中发表了关于工联的演说。德拉埃的决议草案建议成立工会的国际联合,以便“造成行政权的分散”和建立“未来的真正的公社”。德拉埃这些空想的建议(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前身,其结果必然要否定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

作用)遭到了马克思的批评。马克思在发言中还指出了当时英国工联在派系上闭关自守,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放弃政治斗争。同时,马克思也强调指出了国际争取吸引工联参加政治活动、以革命无产阶级的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工联成员的重要性。代表会议否决了德拉埃的草案,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通过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实际任务来加强工会的国际联系(见本卷第 454 页)。——第 694 页。

- 489 指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决议,其中有一条是委托总委员会实现工会的国际团结(见《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le,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 1869》. London, [1869], p. 30)。——第 694 页。
- 490 比利时代表斯廷斯在关于工会的国际联系问题的辩论中,曾表示担心各国工会团体在一旦实现国际团结之后,可能会被英国工联所吞并。——第 695 页。
- 491 指宪章运动,这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按照弗·伊·列宁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9 卷第 276 页)。宪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第 695 页。
- 492 指英国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根据国际总委员会的倡议和在它的直接参加下,于 1865 年春在伦敦建立了改革同盟,这是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马克思竭力争取实现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政策,在他的影响下,改革同盟不像资产阶级那样要求把选举权只扩大到个别住房的房主和房客,而是提出了给全国所有男性成年居民以普选权的要求。这个口号在英国

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前此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但是由于参加改革同盟领导机构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动摇,由于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执行总委员会所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残缺不全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第695页。

493 关于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的讨论,见注298和309。——第696页。

494 马克思指的是1867年在伦敦出版的国际章程以及1864年在伦敦与成立宣言同时出版的临时章程的文本(见注338)。——第696页。

495 见注336。——第696页。

496 马克思指的是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成员相当复杂的中央委员会(其中有布朗基主义者、新雅各宾派、蒲鲁东派等等)里钻进了一些可疑分子和叛徒。在1871年3月18日至3月28日公社宣布成立这段时期执行革命政府职能的中央委员会里有这类人,它的成员间缺乏政治上的一致,乃是中央委员会在其活动中犯下严重错误(例如不立即进攻凡尔赛,见本卷第615—616页)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错误也是主张放弃政治这种有害的蒲鲁东学说的结果,在3月18日事件以前,国际的巴黎联合会的许多代表曾经遵循这一学说,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进行活动时,也未能完全克服这一学说。——第696页。

497 指1871年8月7—10日举行的美国全国劳工同盟(见注165)的代表大会。——第696页。

498 指吴亭建议委托总委员会起草“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并在起草中考虑到瓦扬在代表会议讨论此问题时提出的建议以及赛拉叶和弗兰克尔对该建议提出的修正案。吴亭的建议被代表会议通过。——第700页。

499 马克思关于德国和英国的国际工人协会状况的发言,是他作为总委员会德国通讯书记的简短报告,与其他通讯书记以及各国代表的报告同

时提出的。发言中有关英国的那一部分，是对他做的关于工联问题的发言（见本卷第 694—695 页）的补充。——第 701 页。

- 500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德勒斯顿代表大会举行于 1871 年 8 月 12—15 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为缩短工作日、要求真正的普选权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其他决议。代表大会在关于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决议中，表明了它对国际的态度，认为该报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的路线是正确的。决议特别满意地提到“‘人民国家报’所支持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人协会之间的思想联系”。代表大会以这项决议实际上确认了 1868 年 9 月纽伦堡代表大会上由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它于 1869 年在爱森纳赫正式成为社会民主工党）所通过的关于加入国际的决定。——第 701 页。
- 501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这封信，曾由马克思寄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的出版者，并与他的附函（见本卷第 466 页）同时在该杂志上发表。——第 704 页。
- 502 暗指基督教的一个传说，即圣徒奇迹般地获得了用他们所不知道的语言说话的可能。——第 714 页。
- 503 Pároleuses（煤油纵火犯）是反动报纸给被凡尔赛法庭诬告于 1871 年 5 月巴黎巷战时期放火焚烧巴黎建筑物的巴黎女工所起的绰号。——第 715 页。
- 504 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是在马克思的参加下由常务委员会（见注 472）起草的，1871 年 11 月 5 日由总委员会通过。

1870 年 12 月，几个支部的代表在纽约组成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作为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机关，任期为一年。以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为首的第九支部和第十二支部，于 1871 年 7 月加入了这些支部，它们以国际的名义展开了争取资产阶级改良的宣传。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的拥护者们把自己同“外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爱尔兰人支部）特别是弗·阿·左尔格领导的纽约第一德

国人支部对立起来，企图把国际在美国的组织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1871年9月27日，第十二支部背着纽约中央委员会向总委员会提出承认它是国际在美国的领导支部的要求，同时在报纸上掀起一个运动，反对协会中的那些坚持该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支部。

总委员会在1871年11月5日的决议中，拒绝了第十二支部的要求，并确认了纽约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但是在这以后，第十二支部并未停止对中央委员会的攻击，而且还企图把总委员会的决议解释为对它的要求的支持。

第十二支部的拥护者们的活动，加强了国际在美国的各组织中的小资产阶级成分，这就引起了无产阶级支部与小资产阶级支部的分裂，于1871年12月成立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总委员会坚决支持北美联合会的无产阶级派，并于1872年3月把第十二支部开除出国际。

总委员会1871年11月5日的决议，以约·格·埃卡留斯的记录保存下来，其中有马克思做的修改。该决议于1871年11月25日曾用法文发表在法国共和主义团体的机关报（从1871年12月起是国际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1871年12月2日曾用英文发表在“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附有歪曲决议精神的评语。后来该决议又被收入“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第36页（《Briefe und Auszüge aus Briefen von Joh.Phil.Becker, Jos.Dietzgen, Friedrich Engels, Karl Marx u.A.an F.A.Sorge und Andere》, Stuttgart, 1906, S.36）。——第716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70年7月—1872年2月)

1870

- 7月19日 马克思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的会议。他报告了由于普法战争的爆发而在法国造成的局势。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写一篇关于国际对这次战争的态度宣言。
- 7月19日和23日之 马克思写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 7月20日 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可以在伦敦的资产阶级日报“派尔—麦尔新闻”上发表军事评论；还向恩格斯谈了总委员会同巴枯宁派进行斗争的情况。
- 7月22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分析了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得出波拿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必败的结论。恩格斯表示同意给“派尔—麦尔新闻”写关于这次战争的文章。
- 7月26日 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宣读了他所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总委员会批准了宣言，决定用英文出版一千份，并译成其他文字。宣言以传单形式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同时也在国际的机关刊物以及其他报纸上刊登。
- 马克思写信给流亡伦敦的德国民主主义者欧·奥斯渥特。奥斯渥特曾请他在写一篇反对战争的抗议书上签名。马克思在信中强调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给统治阶级的外交和民族对立的表现以反击的真正力量。

- 1870年7月27日左右—1871年2月中 恩格斯根据同“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的协议,写了59篇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这些文章从1870年7月29日至1871年2月18日在该报发表。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仔细研究战事的进程,做出许多深远的预测,有很多次料中了战争中最重要事件的发展。大部分文章是以“战争短评”为标题在该报发表的。
- 7月28日 马克思在给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分析了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形势,说明这两个国家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程度都已使得任何战争也不能够长期地倒转历史车轮了。他指出,第二帝国战败可能引起法国革命。
- 7月29日 马克思把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寄交威·李卜克内西,以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他还通知说,总委员会赞同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在国会所做的反对普鲁士统治集团促使战争爆发的政策的发言。
- 8月2日 与比利时支部代表在米·亚·巴枯宁指使下提出的9月5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国际应届代表大会的议案相反,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鉴于战争已经爆发,代表大会应延期召开。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的提议,并决定要求各支部授权总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代表大会。因为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流传迅速,总委员会决定把这篇宣言再增印一千份。
- 马克思在给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中解释了国际代表大会必须延期的原因,并要求支持总委员会的这一建议。马克思向瑞士的德国人支部领导者约·菲·贝克尔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还要贝克尔向他准确地提供巴枯宁的同盟在瑞士进行阴谋活动的情况;并把关于巴枯宁在1848—1849年活动

的情报寄给了俄国支部委员会,这些情报是撰写反对巴枯宁的小册子所必需的材料。

马克思通过贝克尔请求俄国支部的成员把刚刚在日内瓦出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四卷寄给他。马克思在收到这本书以后,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这一著作。

- 8月6日 马克思在给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的信中附寄了总委员会在1869年3月9日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各项决议副本,以便转给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昂·培列在日内瓦发表。
- 8月9—31日 马克思由于健康状况不好,同全家在兰兹格特休养,同时继续处理国际的事务。
- 8月10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坚信第二帝国将很快垮台,并谈了最近的战争情况。
- 8月12日 马克思校订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的德译文。这篇译文由总委员会书记约·格·埃卡留斯寄往日内瓦交约·菲·贝克尔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机关刊物“先驱”杂志8月号上发表。
马克思把德国人支部从日内瓦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从不伦瑞克寄给他的建议国际代表大会延期的决议,转寄给在伦敦的荣克,由荣克送交总委员会。
- 8月15日和1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通信中就德国无产阶级在普法战争问题上的策略交换意见,强调必须坚持不懈地为德法工人利益的一致性而斗争。
- 8月20—22日 马克思在伦敦就医。
- 8月22日和30日之 马克思赴曼彻斯特到恩格斯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他们共同起草了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他们在信中论述普法战争的将告结束的第一阶段时指出,

这场战争有变成德国方面的侵略战争的危险。在指出掠夺政策给将来欧洲和平造成的严重后果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德国无产阶级作为反对兼并和索赔政策的先进战士所负的国际任务。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利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信，在其告德国工人书中转述了这封信里的几段话。告德国工人书是在9月5日以传单形式单独发表的，9月11日又在“人民国家报”上登载。

- 8月25日 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评(十二)”，在这篇文章中，根据麦克马洪军队从兰斯退却，预言了色当的败局。文章发表于8月26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 8月31日 马克思从兰兹格特回到伦敦。
- 9月1日 马克思以国际总委员会负责联系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通讯书记身分，写信给霍布根的国际支部领导人弗·阿·左尔格；在信中阐述了自己对普法战争后果的看法，得出结论说，俄国和普鲁士必将发生冲突，而这场冲突将加速俄国社会革命。
- 9月4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论述了法军败于色当以后巴黎发生的事变，并分析了造成色当败局的战事进程。
- 9月5日 马克思收到国际会员沙·龙格从巴黎打来的关于法国第二帝国已被推翻，共在国已宣告成立的电报。
- 9月5—10日 马克思领导总委员会组织英国工人进行保卫法兰西共和国和争取英国政府承认共和国的运动。
- 9月6日 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写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在宣言中揭露普鲁士容克地主和德国资产阶级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侵略野心；他请恩格斯为这一工作提供必要的军事战略方面的资料。
- 马克思收到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的来信，信中

请求总委员会专门对德国人发表一篇关于战争的新宣言；马克思在复信中论述政治和军事的局势，并说明国际法国各支部的当前任务。

马克思会见即将以总委员会代表身分动身赴巴黎的奥·赛拉叶，同他讨论了关于帮助国际巴黎支部采取正确立场的问题。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发表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问题。马克思在发言中揭露了普鲁士政府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兼并计划，并确定了在普法战争的新阶段开始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和国际的任务。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荣克、米尔纳和赛拉叶草拟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支持赛拉叶关于把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帕廷选入总委员会的提议。

- 9月6日和9日之间 马克思从事草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的工作。他在起草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材料。
- 9月7日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会见总委员会委员欧·杜邦，同他讨论了关于法国局势和作为法国无产阶级迫切任务的建立工人政党的问题。
-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论述了法国的局势。他批评了某些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所表现的沙文主义，揭露了保皇分子的阴谋和奥尔良派的复辟计划，预言了资产阶级国防政府的即将投降。
- 9月9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宣读他所写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第二篇宣言经总委员会通过后，用英文出版一千份。
- 9月12日 马克思在给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爱·斯·比斯利的信中，敦促他襄助争取英国政府承

- 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
-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在法国同普鲁士媾和时法国无产阶级应采取的策略。
- 9月13日 马克思出席伦敦工人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大会。
- 9月13日和1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相互的通信中,就他们得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员被捕的消息交换了意见。
- 9月14日左右 马克思把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译成德文;译文在国际的德文机关刊物上发表。
- 9月14日 马克思给许多英国报纸寄去关于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员被捕的评论。这篇对普鲁士当局进行揭露的评论发表于9月15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 马克思就工人在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中应采取的策略写了详细的指示发给在比利时、瑞士和美国的国际会员,同时把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寄给自己在各个国家的支持者。
- 9月16日 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评”中的“如何击败普军”一文。这篇文章研究法国军事系统应如何改组以保国防的问题。文章发表于9月17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 为了打破资产阶级报刊对第二篇宣言的缄默,马克思在给比斯利的信中请他就国际、就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以及英国报刊对第二篇宣言所持的态度写一篇文章给资产阶级自由派杂志“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马克思保证设法使比斯利的文章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国际机关刊物上发表。
- 9月20日 恩格斯终于把停止商行工作的一切事务办理妥当,从曼彻斯特到达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地方。
- 马克思推荐恩格斯为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向总

- 委员会报告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成员被捕的消息。
- 9月27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萨克森镇压工人的情况。
- 10月 马克思接到俄国进步的科学通俗杂志“知识”的编者阿·阿·斯列普措夫的提议,请他给该杂志写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文章。
- 10月4日 恩格斯经一致通过被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 10月11日 恩格斯第一次出席总委员会会议。马克思做了关于里昂起义的报告。里昂起义是由于领导者——巴枯宁派的盲动主义策略而以失败告终的。
- 10月15日左右 恩格斯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连同他为该书再版所写的一篇序言,由“人民国家报”出版单行本。
- 10月下半月—12月初 恩格斯研究了德国军事历史家格·亨·彼尔茨的“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一书。他在自己的“战争短评”中,利用这本书的材料论证了游击战这种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形式的规律性。
- 10月18日 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提案通过决议,谴责有很多巴枯宁分子在内的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正式文件,特别是对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保持缄默。
- 10月25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拉法格在波尔多宣传国际的思想的情况。
- 11月1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论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信函和文件,并指出,在美国由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加剧,存在着进行国际原则的广泛宣传的广泛可能性。马克思还谈到纽约的国际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

- 部就普法战争发表了宣言。
- 11月10日左右 恩格斯写了“战争短评”中的“法国境内的战斗”一文。这篇文章谴责普鲁士军方残害法国自由射手的行为。文章发表于11月11日的“派尔—麦尔新闻”。
- 11月17日 由于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者们被控以叛国罪名，马克思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威·白拉克的请求，向伦敦市长证明：该党的组织没有作为一个支部正式加入国际，该党党员被接受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是作为个人处理的。马克思的证词是准备用来在诉讼过程中为该党委员会成员进行辩护的。
- 11月29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把同曼彻斯特和索尔福的工联理事会建立联系以及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委员即将受审的事情和德国工人反对继续打仗的言论报告给总委员会。
- 12月 马克思把总委员会各个时期发表的文件寄给在霍布根的左尔格。
- 12月13日 马克思把海牙成立国际支部一事告知总委员会。
- 12月18日左右 马克思要求在荷兰和弗朗德的国际会员把当地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报纸寄交总委员会。就此事发表的简短通告刊登在12月18日比利时支部机关报“国际报”。
- 12月19日 恩格斯写信给李卜克内西夫人，当时李卜克内西刚刚因在国会发言反对军事贷款而同倍倍尔一起被捕；恩格斯在信中指出德国工人及其领袖们在战争时期所表现的高度无产阶级觉悟。恩格斯同时还把英国工人和在英国的德国工人募集的捐款转寄给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以及其他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家属。

- 12月23日 恩格斯受总委员会的委托,给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写贺词。这篇贺词发表于1871年1月1日的“国际报”。
- 1870年12月下半—1871年3月中 马克思曾多次同俄国女革命家伊丽莎白·托马诺夫斯卡娅会见。托马诺夫斯卡娅是日内瓦国际俄国支部派往伦敦向马克思了解情况并接受关于俄国支部今后如何进行活动的指示的。在会见中,马克思同她讨论了有关俄国农民公社发展的问题。马克思家里的人同托马诺夫斯卡娅建立了友谊。
- 12月底 马克思收到沿帕廷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洛帕廷是为了安排使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所逃跑而到俄国去的。他把自己到西伯利亚去的办法告诉了马克思,还告诉马克思,在俄国,载有一篇多处引证“资本论”的文章的杂志“法医学文库”被没收了,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在俄国出版的情况。
- 1870年12月底—1871年1月初 马克思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

1871

- 1月 马克思从北德意志国会议员约·米凯尔那里得到关于普鲁士军队在法国遇到困难的消息;马克思通过恩格斯把这些消息转给在波尔多的拉法格,希望这些消息能被用来开展人民反抗普鲁士侵略的运动。
- 1月上半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总委员会组织了对被监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家属的经济援助。
- 1月7日 马克思收到托马诺夫斯卡娅的信,信中叙述了有关沙皇政府土地政策的几件事,并附上一份国际俄国支部机关报“人民事业”,这份报纸载有一篇关于俄国农民

改革和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文章。

- 1月16日 马克思给伦敦自由派报纸“每日新闻”投去一篇题为“关于德国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文章。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揭露俾斯麦的警察制度，并列举社会民主党人因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签订光荣的和约而遭到迫害的事实。文章于1月19日在该报发表。
- 1月17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批评英国工联领导人之一、总委员会委员乔·奥哲尔对国防政府的赞扬；马克思以过去茹尔·法夫尔的反革命活动为例，揭露了这个政府的真面目。
- 1月20日 马克思收到埃卡留斯的通知，工人报纸“东邮报”的编辑同意发表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以及国际的其他材料。
- 1月21日 马克思在给纽约国际支部创建人之一季·迈耶尔的信中，就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的活动做出指示。马克思在向他讲述国际在其他国家的状况时谈了英国工人为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而进行的运动；他在信中还谈到自己学习俄文的成绩，并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 1月2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关于奥哲尔赞扬国防政府的发言的问题。会上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在总委员会讨论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目前阶段应采取的立场问题的建议。
- 1月31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同国际西班牙支部建立联系的问题时，马克思报告了帕尔米出版工人报纸“社会革命报”的事情。总委员会委派恩格斯暂时执行西班牙通讯书记的职务。恩格斯展开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普法战争目前阶段所应采取的立场问题的辩论；他提出了

一个决议草案,并就这一问题做了发言,他在发言中强调指出,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它是帮助共和国反抗普鲁士侵略的唯一有效办法。恩格斯批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孔德主义者号召武装干涉战争这一冒险主义做法,指出必须争取英国政府采取外交措施来防止沙皇俄国的军事进攻。决议草案发表于2月5日的“东邮报”。

- 2月4日 马克思在给保·拉法格和路·库格曼的信中,严厉谴责国防政府由于惧怕巴黎工人而签订献出巴黎的协议这一叛卖行为。
- 2月12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拉法格关于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结果的报告。
- 2月13日 恩格斯同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建立通讯联系;他在信函中强调在每一个国家建立执行独立政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同时还向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介绍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
- 2月14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奥地利和德国的工人运动参加者遭到警察迫害的事情以及赛拉叶在巴黎的活动情况。马克思对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目前阶段应采取的立场的讨论进行辩论时,揭露了格莱斯顿政府在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问题上拖延不决的原因,并强调指出,不论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多大局限性,以共和政体代替君主政体还是工人阶级利益攸关的事情。
- 2月19日 马克思会见当日从巴黎回来的赛拉叶,并从他那里了解法国的情况。
- 3月2日 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夫人的信中,就如何揭穿普鲁士当局蓄意根据捏造材料对被捕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

领导人进行控告一事，提出建议。

- 3月7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在法国和美国的国际会员活动的情况；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写信给国际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向该委员会说明其职权范围。在重新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在战时应当采取的立场方面的问题时，马克思论证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其国外政策方面应当坚持的路线。
- 3月10日 恩格斯在给佐林根的国际会员卡·克莱因和弗·莫尔的信中，对德国工人在普法战争期间所采取的立场给予很高的评价。
- 3月14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就德意志国会选举的情况、倍倍尔被选为国会议员以及在纽约成立了国际爱尔兰人支部的事情做了报告。马克思在参加讨论有关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问题时指出，在法国政治局势极不稳定的情况下举行代表会议是不合时宜的。马克思重新展开了在辩论关于战时英国工人阶级应当采取的立场时所涉及的对外政策问题的讨论。恩格斯就这次讨论做了总结发言。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提案中关于对反动列强侵略政策进行斗争的第三条，取消了关于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二两条，因为法国政府已于2月26日同普鲁士达成了初步的和议。
- 3月19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到巴黎在3月18日发生革命的消息。
- 3月19日—5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研究了所有关于巴黎局势和3月28日宣布成立的巴黎公社活动的情报，同公社社员们建立了联系，并在国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上帮助他们想办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各个国家的工人举行保卫巴黎革命无产阶级和巴黎公社的群众大会和活动。

马克思给一切建立有国际支部的国家写了几百封关于巴黎公社的信，信中阐明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历史意义，呼吁对公社给以支持；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批评了公社所犯的错误。马克思仔细地研究了公社社员的经验，从报纸上做了许多摘录和剪辑，搜集各种各样的消息以及来自私人的情报。

- 3月21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革命和关于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机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手中的发言。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通过关于派代表团参加工人集会的决议，以激发英国工人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精神。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所写的一篇声明，这篇声明驳斥英国报刊所登载的德国人在法国被开除出国际的诽谤报道。声明发表在3月23日的“泰晤士报”、3月25日的“东邮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 3月21—23日 马克思写信给“泰晤士报”和“人民国家报”，揭露反动的“巴黎报”为了诽谤国际及其领导人而伪造和散发假信的行为。这封信发表在3月22日的“泰晤士报”、3月29日的“人民国家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 3月28日左右 马克思在赛拉叶再次赴巴黎的前夕同他进行了谈话。
- 3月2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总委员会关于国际如何对待英国的共和运动问题的讨论。恩格斯在发言中强调，必须使这个运动具有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方向。马克思在发言中指出，任何共和运动，如果不变为社会运动就不能成为重大的力量。
- 3月31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国际比利时支部领导人之一、安特卫普“工人报”编辑部秘书菲·克楠的来信，信中请求对安特卫普罢工的雪茄烟工人组织支援。

-
- 3月31日左右—4月中 马克思通过赛拉叶夫人得到赛拉叶关于巴黎情况和公社的措施的报告。
- 3月31日 马克思写信给安特卫普“工人报”，揭露资产阶级报刊为诽谤国际而采用的伪造手段。这封信于4月8日在该报发表。
- 4—5月 马克思时常在自己家里会见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观察家”编辑福克斯·伯尔恩，并同他谈论巴黎的事件。由于这种谈话的影响，该报比较客观地报道了公社的活动。
- 4月2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巴黎公社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委员列·弗兰克尔的来信，信中请求就公社应当实行的社会改革问题提供意见。
- 4月3日 马克思写信给“泰晤士报”编辑，驳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所说巴黎革命是由伦敦策动的诽谤言论。这封信发表于4月4日的“泰晤士报”和4月6日的“每日新闻”。
- 4月4日 恩格斯以比利时通讯书记的身分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举行了罢工。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总委员会决定向各个工联组织派出代表，并呼吁英国工人对罢工者给以支援。
- 4月5日 恩格斯把“关于安特卫普雪茄烟工人的罢工”这简短评寄交在莱比锡的李卜克内西，以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篇短评号召德国工人支援罢工者。短评于4月12日在该报发表。
恩格斯在给克楠的信中通知他国际已采取措施支援安特卫普罢工者，并要求他随时告知有关罢工的事件和按期寄送“工人报”。
- 4月6日 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详细地分析了巴黎公

社的错误,这些错误使凡尔赛人得以转入进攻;他通过李卜克内西请求倍倍尔定期寄送柏林国会会议的速记记录。

- 4月10日 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通知说,证实卡·福格特接受拿破仑第三政府秘密津贴的官方文件发表了。早在1859—1860年,马克思就曾经揭露福格特是波拿巴政府的密探。马克思关于福格特同波拿巴政府勾结的这些新证据的报道,由李卜克内西以短评形式发表于4月12日的“人民国家报”。
- 4月11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论述巴黎的局势;他指出,公社放过了进攻凡尔赛的有利时机。恩格斯还谈到西班牙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宣传工作。
- 4月12日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援引了自己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著作中做出的无产阶级必须摧毁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结论,着重指出,巴黎公社为把这一点付诸实践,做了尝试。马克思赞扬公社社员们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指示了公社活动中的错误和弱点。
- 4月13日 为了提高德国工人的一般理论水平,马克思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建议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刊登“资本论”的片断,特别是“所谓原始积累”那一章。
- 4月17日 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强调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他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公社而进入了新阶段。
马克思通过库格曼得到米凯尔的警告说,马克思如果回到德国就有遭到逮捕的危险。
- 4月18日 为了使巴黎公社的经验成为所有各国无产者的财富,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主张必须就巴黎的斗争的总

倾向发表一篇告国际会员书。

- 4月18日—5月29日 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宣言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对公社的经验进行理论的概括;他一方面不断搜集必要的资料,一方面写宣言的初稿和二稿,以后又准备宣言的最后定稿。
- 4月19日 恩格斯在给埃卡留斯的信中向他详细介绍了巴塞罗纳纺织工人罢工的情况,以便总委员会能通过曼彻斯特的工人来组织支援罢工者的活动。
- 4月25日左右 恩格斯研究来自西班牙的报道巴塞罗纳纺织工人罢工的信件和报纸。
- 4月25日 总委员会通过了恩格斯写的关于把已经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的右派蒲鲁东分子托伦开除出国际的决议草案。决议发表在4月29日的“东邮报”、5月14日的“国际报”以及国际的许多其他机关刊物上。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他在发言中分析了巴黎的局势,论述了公社的措施。马克思还把纽约中央委员会所领导的各支部的成员报告给总委员会。
- 4月26日左右 马克思会见了借以同巴黎公社委员保持联系的德国商人,并从他那里收到了公社社员们询问是否有办法出售有价值证券的来信。马克思在给弗兰克尔的复信中,告诉公社社员怎样在伦敦交易所出售有价值证券;还驳斥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费·皮阿对国际和总委员会在巴黎的代表赛拉叶的造谣中伤。
- 5月初 马克思会见了俄国民粹主义者、国际会员彼·拉甫罗夫。拉甫罗夫是因受巴黎公社委托,从巴黎来同总委员会建立联系的。

- 5月2日左右—5月22日 马克思患病，未出席总委员会会议。由于马克思患病，他的起草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的工作耽搁了下来。
- 5月5日 恩格斯把“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寄交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于5月10日在该报刊出。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要求通过该报来组织德国工人对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罢工工人给予物质援助。
- 5月9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巴黎公社社员反抗凡尔赛军队的斗争进程；谈了西班牙和比利时的罢工情况；参加了关于派代表团出席罗·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问题的讨论，在发言中对欧文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 5月11—13日 马克思再次会见德国商人，从他那里了解到巴黎的情况。马克思写信给巴黎公社委员列·弗兰克尔和路·欧·瓦尔兰，在信中把俾斯麦和法夫尔进行秘密会谈的事告诉了它们，同时还就如何巩固公社和减少同凡尔赛人斗争的困难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马克思告诉他们，他在进行向各国工人解释巴黎公社历史意义的工作，请他们向他提供为公开揭露凡尔赛刽子手们所必需的材料。
- 5月16日 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总委员会指定马克思暂时担任荷兰通讯书记。
- 5月23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强调指出，公社所宣布的原则是永存的，即使公社遭到失败，这些原则也是消灭不了的。
- 5月30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他所写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宣言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后用英文出版单

- 5月2日左右—5月22日 马克思患病,未出席总委员会会议。由于马克思患病,他的起草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的工作耽搁了下来。
- 5月5日 恩格斯把“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寄交李卜克内西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这篇文章于5月10日在该报刊出。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要求通过该报来组织德国工人对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的罢工工人给予物质援助。
- 5月9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巴黎公社社员反抗凡尔赛军队的斗争进程;谈了西班牙和比利时的罢工情况;参加了关于派代表团出席罗·欧文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问题的讨论,在发言中对欧文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 5月11—13日 马克思再次会见德国商人,从他那里了解到巴黎的情况。马克思写信给巴黎公社委员列·弗兰克尔和路·欧·瓦尔兰,在信中把俾斯麦和法夫尔进行秘密会谈的事告诉了她们,同时还就如何巩固公社和减少同凡尔赛人斗争的困难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马克思告诉他们,他在进行向各国工人解释巴黎公社历史意义的工作,请他们向他提供为公开揭露凡尔赛刽子手们所必需的材料。
- 5月16日 根据恩格斯的提议,总委员会指定马克思暂时担任荷兰通讯书记。
- 5月23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强调指出,公社所宣布的原则是永存的,即使公社遭到失败,这些原则也是消灭不了的。
- 5月30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他所写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宣言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后用英文出版单

信,通过他来影响国际那不勒斯支部。恩格斯把国际的最重要文件寄交卡菲埃罗在工人中间散发,并在同马志尼派对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影响以及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方面,做出指示。

6月2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总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工联主义者乔·奥哲尔和本·鲁克拉夫特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对总委员会发表“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进行攻击的行为。总委员会决定取消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在宣言上的签名。恩格斯建议就英国改良主义者乔·杰·侯里欧克对总委员会的攻击以及他诽谤“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的企图,寄一篇声明给“每日新闻”;他宣读了这篇声明,总委员会一致予以通过。声明于6月23日在该报发表。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决定写信给伦敦资产阶级报纸“旁观者”和“观察家”,揭穿由凡尔赛警察机关假冒国际名义伪造并由资产阶级报刊转载的许多假宣言。这两家报纸没有发表恩格斯起草的这封信。

6月26日

为了回击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及其作者的无中生有的造谣中伤,马克思写信给“每日新闻”,指出宣言是他写的,宣言中对凡尔赛政府成员提出的指控由他负全责。该报把这封信任意删节后在6月27日发表。信的全文刊载于7月1日的“东邮报”。

6月27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向“每日新闻”送交一份声明,以回击侯里欧克、鲁克拉夫特和奥哲尔对总委员会和“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的无休止的攻击。由恩格斯执笔的这篇声明指出,总委员会一致主张同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决裂。这篇声明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发表于6月29日的“每日新闻”和7月1日的“东邮报”。

-
- 6月30日 恩格斯给“人民国家报”写了一篇通讯指出,尽管资产阶级报刊妄想对“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表示缄默,以及对它进行诬蔑诽谤,这篇宣言在英国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章于7月5日在该报发表。
- 7月1日左右 马克思收到前伦敦资产阶级报纸“每日电讯”驻巴黎记者罗·里德的来信。里德表示愿意协助总委员会揭露对巴黎公社的诽谤。马克思会见了里德,里德向马克思提供了若干事实,说明美国驻巴黎大使艾·本·华施贝恩进行的破坏巴黎公社的活动。
- 7月1—3日 恩格斯在给卡菲埃罗的信中说明了宗派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严厉批评了巴枯宁的观点,揭露了马志尼想把国际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企图。恩格斯解释了国际在对待农业工人和小农方面的策略。
- 7月3日左右 马克思在同纽约“世界报”记者谈话时阐明了国际的目的和任务,并论述了国际的活动。谈话的记录发表于7月18日的“世界报”以及8月12日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
- 7月4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推荐选举詹·帕·麦克唐奈为总委员会委员,称他是爱尔兰民族解放和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恩格斯宣读了卡菲埃罗向总委员会报告同马志尼派进行斗争情况的信。马克思宣读了一封关于国际美国各支部状况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由于“派尔—麦尔新闻”参加资产阶级报刊对国际的诽谤攻势,他们已同该报断绝来往。
- 7月11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所写的给纽约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的宣言“美国驻巴黎大使华施贝恩先生”。宣言揭露了美国大使对巴黎公社的两面派做法和他的敌视巴黎公社的活动;宣言经总委员会

批准后于7月13日左右以传单的形式单独发表。马克思在会议上报告了法国警察机关的新的挑衅行为：伪造假信以便在审判巴黎公社委员阿·阿·阿西时使用。由于这些假信之中有一封是冒马克思之名写的，马克思宣读了自己写的一篇驳斥声明。

- 7月下半月 马克思研究俄国报纸“政府通报”上登载的所谓“涅恰也夫案件”的政治诉讼案材料。
- 7月18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驳斥奥哲尔公开宣称自己是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作者的说法。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法兰西内战”已用荷兰文、德文和法文出版，并准备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
- 7月25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于9月17日在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恩格斯的建议由总委员会一致同意。恩格斯也做了关于朱·马志尼和国际的关系的发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会议上产生的关于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否隶属于国际的问题发表意见，认为事实上应该把巴枯宁的同盟的盟员看做是已经脱离了国际的人，因为他们既不执行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即解散他们的秘密组织（这是加入国际的条件），也不缴纳会费。
- 7月26日 马克思通知新奥尔良的国际俱乐部和共和主义俱乐部的主席兼临时秘书沙·卡隆关于接受该俱乐部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并给他寄去一些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
- 7月27日 马克思在给瑞士的国际俄国支部成员尼·伊·吴亭的信中，告诉他由于不可能召开应届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决定于9月17日在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同时又把总委员会对巴枯宁的同盟是否隶属国际的问题的讨论结果告诉他。

- 7月28日 恩格斯在给卡菲埃罗的信中阐明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的分裂性质,并且告诉他即将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由于马志尼在意大利的报纸上发表反对国际的言论,恩格斯给卡菲埃罗寄去一篇供公开发表的文章,揭露马志尼的宣传具有资产阶级实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于8月31日在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杂志“自由思想”以及意大利的许多其他报纸上发表。
- 7月底—8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把即将在凡尔赛举行的对公社社员审判的记录予以出版。
- 8月1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反驳奥哲尔。总委员会按照马克思的建议,免去恩格斯所担任的比利时通讯书记的职务,委任他担任意大利的通讯书记。
- 8月7日 马克思把恩格斯写的附有被捕公社社员的律师来信摘要的信,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被监禁者在牢狱中遭受的折磨,以及凡尔赛当局的警吏横行不法,法院迟迟不开庭。此信未发表。
- 8月8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援助新罢业工工人的问题以及关于如何防止工贼从比利时入境的问题;他在发言中强调国际与职工会建立紧密联系的重要性。总委员会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决定在英国工人中募款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员。
- 8月9日 恩格斯写信给在巴黎的拉甫罗夫,请他代订一份必定会登载公社社员审判案报告全文的“审判通报”(《La Gazette des Tribunaux》),同时请他寄一张巴黎市区和郊区地图,以便研究普鲁士人和凡尔塞人围困巴黎时期的军事行动。
- 8月10—16日左右 马克思写信给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国际会员阿·于

贝尔，告诉他一些事实，并且给他寄去为被审公社社员进行辩护所必需的文件。

- 8月15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委托常务委员会在下次会议以前准备好伦敦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总委员会接受了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关于意大利和西班牙迫害国际的报告。
- 8月中 恩格斯把法国警察当局迫害马克思在法国的几个女儿的消息写信通知李卜克内西。
- 约8月16—29日 马克思由于疲劳过度，遵照医师劝告，在布莱顿休息。
- 8月17日和24日 马克思写信给“纽约先驱报”和“高卢人报”编辑部，抗议该报粗暴地歪曲了他同“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谈话内容。马克思的抗议载于8月27日“高卢人报”。
- 8月19日 马克思写文章驳斥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周报“舆论”，因为它转载了俾斯麦的机关报“国民报”对国际领导的诬蔑言论。马克思派人把这篇文章和写给编辑的信件带给恩格斯，请他把这些材料送给“舆论”编辑部。声明载于8月26日该报。
- 8月22日左右 恩格斯接到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弗·莫拉寄来的关于西班牙的政治状况以及国际在该国的成就的情报。
- 8月22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国际西班牙支部在美国支部来信的内容，建议呼吁美国工人援助流亡的公社社员。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这份呼吁书。
- 8月25日 马克思写信给美国“太阳报”编辑查·安·德纳，说明自己的女儿在法国被捕的经过。该报于9月9日发表了这封信。
- 8月25日和29日 马克思写信给在纽约的国际德国支部成员弗·波尔特

- 和在伦敦的美国作家蒙·丹·康威尔,请他们组织募捐来救济流亡的公社社员,并帮助公社社员安排工作。
- 8月29日左右 马克思从布莱顿回到伦敦。
- 8月30日 马克思写信给法国共和派报纸“真理报”编辑部,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在巴黎散播诬蔑国际的假宣言。该信于9月3日在“夜晚报”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
- 9月4日 马克思写信给伦敦资产阶级报纸“旗帜晚报”编辑,驳斥资产阶级报纸附和“国民报”再一次对作为国际领导人的马克思的诬蔑。这封信于9月6日在该报发表。
- 9月5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由他与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关于组织国际代表会议以及各支部派代表参加代表会议的建议。总委员会接受了这些建议。由于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的繁重,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要求,免去他们在流亡者委员会中的工作。
- 9月9日和1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会上通过他们事先起草的即将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
- 9月12日 恩格斯代表常务委员会交给总委员会一份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的工作纲领,纲领由总委员会通过。
- 9月13—15日左右 恩格斯离开伦敦到兰兹格特去了好几天。
- 9月16日左右 马克思会见国际的成员、参加伦敦代表会议的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安·罗伦佐,并与他就工人运动问题进行了谈话。
- 9月16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参加讨论关于未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的国家代表权问题以及关于总委员会的代表问题。
- 9月17—23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会上

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关于必须在每个国家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重要决议；会上还坚决回击了巴枯宁派和其他宗派主义分子对国际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的蓄意侵犯。

- 9月1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参加关于举行代表会议的程序问题的讨论。恩格斯被委托拟订决议并将决议译成各种文字。马克思做了关于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发言。代表会议通过了马克思关于选出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巴枯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问题的建议，并且把马克思选入该委员会。
- 9月1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代表会议上就代表会议的议程和国际的组织原则问题做了发言。马克思提议不允许在国际中存在带有宗派主义名称的通常由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派别。马克思建议出版共同章程的正式文本以及经过总委员会审查的各种文字的共同章程新译文，因为该章程的错误的法译文得到了传播，蒲鲁东分子和巴枯宁分子就曾利用它来证明他们的放弃政治的策略是正确的。
-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伦敦代表会议的委员会会议；马克思揭露了在瑞士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
- 9月19日 在伦敦代表会议的下午会议上，马克思建议成立女工支部，因为他看到妇女曾积极参加巴黎公社的活动。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提出必须执行章程第五条，即关于对工人阶级的普遍统计。在代表会议的晚间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国际的组织原则问题做了发言。
- 9月19—21日 恩格斯草拟总委员会提交代表会议的财务报告。
- 9月20日 马克思在代表会议的下午会议上做了关于工联问题的

发言,批评比·路·德拉埃关于建立工会的国际联合会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榜样这种空想的提议。在晚间会议上,马克思发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演说,指出放弃政治总是给工人阶级带来巨大损失。

9月21日

恩格斯在代表会议的会议上做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强调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对于夺取政权的必要性,指出宣传放弃政治就等于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中去。在这个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马克思又做了关于政治行动的发言。马克思同时以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名义做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以及关于瑞士的罗曼语地区的分裂状态的报告,该报告受到代表会议的赞同。

9月22日

在代表会议的会议上,恩格斯反驳巴枯宁主义者保·罗班,他曾攻击审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分裂活动的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对财务委员会的报告的讨论,该报告得到代表会议的赞同。代表会议通过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在农村中进行宣传以及组织国际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作为意大利通讯书记,恩格斯报告了国际意大利支部的状况。马克思也以负责联系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通讯书记资格做了报告,指出有些支部与纽约中央委员会的分歧。在讨论俄国问题时,马克思也发了言。他指出俄国社会运动的广阔前景以及在那里建立国际支部的现实可能性。作为德国通讯书记,马克思阐述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就。他也向代表会议报告国际在意大利的情况。代表会议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以密谋集团形式来组织国际支部的企图,并委托总委员会发表那些总委员会认为宜于公开的决议。

9月23日

马克思写信给“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其中附了

他的女儿燕妮写的一篇描述法国和西班牙警察当局迫害保·拉法格和马克思的女儿们的通讯。马克思的信和燕妮的通讯于10月21日在该周刊发表。

- 9月25日 马克思在伦敦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论述国际的任务和目的,阐明巴黎公社的阶级实质。这篇讲话的报道发表于10月15日“世界报”。
- 9月26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报告国际丹麦支部的活动。在关于国际在德国的活动的报告中,马克思着重指出必须召集德国工人群众大会,抗议资产阶级刊物对国际的诬蔑。在分配总委员会中的职务时,马克思又被选为德国通讯书记,恩格斯被选为意大利通讯书记;恩格斯还被选入总委员会的财务委员会。
- 9月28日—10月3日 马克思偕妻子与恩格斯在兰兹格特休息。
- 9月底—11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备以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
- 9月底—11月中 马克思写信给柏林和莱比锡的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向他们提出加强该党与总委员会的联系的任务。
- 10月3日 在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又被选为俄国通讯书记,恩格斯被选为西班牙通讯书记。
- 10月7日 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恩格斯提出把被揭露的警方密探法国人古·杜朗开除出国际的决议。由总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发表在国际的一系列机关刊物上。总委员会按照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在恩格斯的建议下,委任马克思起草关于涅恰也夫盗用国际名义的声明。马克思撰写的并由总委员会批准的声明,载于11月1日“人民国家报”以及国际的许多机关刊物上。
- 10月10日 恩格斯在写给卡菲埃罗的信中告诉他关于伦敦代表会

议的工作结果。

- 10月1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讨论关于对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进行最后一次挑选、编辑以及以总委员会通告形式公布等问题。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准备决议的付印工作。
- 10月17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常务委员会做关于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份决议草案,建议该支部改变章程中那些与国际的组织原则相矛盾的条款。总委员会通过了这项决议。
- 10月24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关于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新版本的准备工作。总委员会决定这一版印刷五千份。
- 10月底—11月底 马克思患病,有一个月未出席总委员会的会议。
- 10月31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声明,回击英国议员、保守党人亚·贝·科克伦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国际的诽谤。由总委员会批准的这篇声明发表于11月11日“东邮报”。
- 11月4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文章论英国滥设企业骗财的现象,文章载于11月10日“人民国家报”。
- 11月5日 总委员会通过了常务委员会在马克思参加下起草的决议,决议承认了纽约中央委员会的全权,并拒绝了纽约第十二支部中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要求。
- 11月6日 马克思把已经出版的英文版和法文版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寄给美国和德国的国际会员。
- 11月7日 总委员会批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决议谴责1871年法国人支部执意违反国际的组织原则,并且说明拒绝该支部加入国际的理由。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伦敦代

表会议决议的出版情况,以及国际在意大利、荷兰和德国各支部的来信内容。

- 11月9日 马克思写信给在霍布根的左尔格,建议按照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改变在美国的国际组织的结构。马克思也报道了关于与巴枯宁分子一致行动的1871年法国人支部对国际进行阴谋活动的消息。
- 马克思在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附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需要改动和更正的清单,以便出俄文版时予以注意。
- 11月13日 在马克思的住宅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见朱·加里波第·里乔蒂的儿子,他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普法战争的参加者。
- 1871年11月中—
1872年2月中 恩格斯指导米兰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泰·库诺的工作,并通过他来指导受恩格斯影响而建立的国际米兰支部的活动。恩格斯把伦敦代表会议的文件以及宣言“法兰西内战”寄给库诺,向他阐明与马志尼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必要性,并且建议加强国际在意大利北部的阵地,因为那里有许多大工业中心。
- 11月16日 马克思在写给荣克的信中说,巴黎和伦敦的首饰匠为了进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可能建立联系。
- 11月23日 马克思在写给在美国的波尔特的信中,指出国际在与宗派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并且强调说,建立国际就是为了用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组织代替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宗派来进行斗争。马克思在解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联系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时,要求国际美国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同意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利用这些决议来克服在美国的宗派主义。

恩格斯在写给国际那不勒斯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卡·帕拉迪诺的信中,说明必须召开秘密的伦敦代表会议而不能召开应届代表大会的原因。

- 11月25日 由于巴枯宁分子在西班牙积极活动,恩格斯在写给马德里的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中,驳斥巴枯宁分子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诽谤。
- 11月28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关于审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委员参加国际的案件已结束,他们被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恩格斯报告说,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罗马”上登载有马志尼的一篇攻击国际的新文章。恩格斯建议公开答复这篇文章,总委员会同意这项建议。由恩格斯撰写的答复载于12月12日意大利工人报纸“人民报”、12月21日的“人民罗马”以及其他报纸。
- 11月29日 恩格斯写了一篇总委员会的声明,送给“意大利无产者报”编辑部,指出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解放事业中的意义。
- 11月30日左右 马克思写信给伦敦的一位德国侨民、政论家西·路·波克罕,请寄去他所需要的关于巴枯宁的材料,特别是关于巴枯宁在1868年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上活动的材料。
- 12月 马克思为“资本论”德文第二版修改第一卷中的第一章。
马克思与已经离开伦敦到罗马去的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朱·卢恰尼坚持通信联系,从他那里收到关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国际在意大利的状况的报道。
- 12月12日 “人民报”以报道国际欧洲各国支部状况的形式,发表

恩格斯致该报编辑恩·比尼亚米信件的片断。

- 12月19日 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报告了英国政府开始对流亡的公社社员进行迫害的意图；说明了俾斯麦对无产阶级采取的反动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必然会使工人阶级进一步团结在国际的周围。马克思也报告了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纽约第十二支部的分裂活动，关于瑞士的巴枯宁分子妄图破坏伦敦代表会议及其决议。马克思揭露了在公共集会和刊物上对国际和马克思进行诬蔑的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查·布莱德洛。恩格斯报告了西班牙支部尽管有巴枯宁分子进行阴谋活动，还是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决定建立工人的政党；他还报告了关于郎卡郡的英国工人准备展开争取九小时工作日的宣传。
- 12月20日 马克思写信给“东邮报”的编辑，揭露布莱德洛是诽谤者。该报于12月23日发表了这封简短的信。
- 12月30日 恩格斯写信给在马德里的拉法格，请他向西班牙的国际会员说明总委员会对于在桑维耳耶举行的巴枯宁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针对伦敦代表会议决议通过的通告所采取的立场。

1872

- 1—3月初 为了答复巴枯宁派以分裂为目的的桑维耳耶通告，马克思和恩格斯准备写一篇国际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为此，他们搜集了有关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及其在各国进行的破坏活动的材料。
- 马克思继续进行“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第一卷的准备工作。
- 1月2日和9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参加讨论批准英国

- 联合会委员会章程和新成立的国际波兰支部章程的问题。
- 1月3日左右 恩格斯写了“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一文。文中揭露了巴枯宁派桑维耳耶通告的分裂性质,指出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他们的反对一切集中、权威和党纪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和具有危害性的。文章发表于1月10日的“人民国家报”。
- 1月14日 恩格斯在给都灵的工人团体“无产者解放社”书记的信中,批评了巴枯宁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并指出,无产阶级为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必须在组织上团结一致。他宣称,他不知道有什么比革命更权威的东西。
- 约1月15日—2月15日 马克思通过龙格约·卢阿商洽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并同巴黎出版商莫·拉沙特签订,以单行本的分册形式出版自己的著作。
- 1月16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讨论英国联合会委员会章程时,建议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承认英国联合会。他还表示同意新成立的波兰支部按照总委员会的建议来修改中的章程。恩格斯向总委员会报告了罗马罢工的消息。
- 马克思写信给“东邮报”编辑,驳斥布莱德洛在其所办的刊物“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新的诽谤攻击。这封信发表于1月20日的“东邮报”。
- 1月18日 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向他介绍了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情况。鉴于巴枯宁派在比利时加紧活动,恩格斯指示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他还介绍了国际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情况。
- 1月19日 恩格斯写信给在马德里的拉法格,向他介绍了国际英国支部的情况和国际在德国、法国、瑞士、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情况。

- 1月20日左右 马克思把准备再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的24个印张寄给汉堡的出版商奥·迈斯纳。
- 1月23日 马克思把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在开姆尼斯举行代表大会一事报告给总委员会,并谈了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代表大会的决议承认总委员会在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中采取的正确路线,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 1月24日 恩格斯在给库诺的信中对巴枯宁派在国家问题上的观点做了详尽的批判,并揭露他们在国际内部进行的破坏活动。他向库诺介绍了国际意大利支部的情况。
- 1月27日 马克思又寄给“东邮报”编辑一封信,揭露布莱德洛。这封信于1月28日在该报发表。
- 1月30日 马克思代表章程委员会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做了关于荷兰联合会委员会和国际工人协会苏黎世支部的章程的报告,并建议批准它们的章程;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的建议。恩格斯向总委员会做了关于米兰支部章程的报告,并建议予以批准;恩格斯的建议被通过。他还报告了协会在西班牙遭受迫害的事。
- 2月3日 马克思接受流亡在伦敦的公社社员普·奥·利沙加勒的提议,参加了由流亡的公社社员组成的社会科学研究小组。
- 2月6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前协会会员、巴枯宁主义者阿·里沙尔和加·勃朗是波拿巴政府奸细。由于法国流亡者向总委员会要求帮助,马克思在发言中强调,必须促使英国政府就巴黎公社的参加者被逐出法国一事提出抗议。
- 2月7日 恩格斯请求米兰报纸“玫瑰小报”编辑发表驳斥意大利杂志“自由思想”对国际及其总委员会散布的谣言的声明。“自由思想”曾转载俾斯麦派报刊对国际工人协会

- 的诬蔑。恩格斯的驳斥声明于2月20日在“玫瑰小报”发表。
- 2月9—1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英国记者、国际会员威·哈·赖利的邀请,为定于3月1日起出版的“国际先驱报”撰稿。
- 2月13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瑞士当局对国际俄国支部成员吴亭进行搜查的事以及柏林的联合会委员会的活动。马克思提议就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对总委员会的政治路线抱何种态度向该委员会提出质询,因为比利时联合会的机关报“自由报”对总委员会的活动表示缄默。马克思的提议得到一致通过。总委员会委托恩格斯就是否有可能把“国际先驱报”当做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而加以利用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 2月15日 恩格斯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揭露了巴枯宁及其拥护者“自由思想”的编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鲁·斯蒂凡诺尼在意大利进行的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恩格斯建议李卜克内西同斯蒂凡诺尼公开断绝关系。李卜克内西用恩格斯这封信在意大利报刊上批评了斯蒂凡诺尼。
- 2月16日 恩格斯在写给在日内瓦的贝克尔的信中,向他介绍了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在西班牙同巴枯宁派进行的顺利斗争。
- 2月18日左右 恩格斯把总委员会的一份正式委托书寄给在日内瓦的总委员会委员、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维·雷吉斯。总委员会委托雷吉斯到意大利去就地调查国际支部的实际情况和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的情况,此外还散发国际的主要文件和解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
- 2月20日 恩格斯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谈了国际在西班牙的情况,

还报告了他同“国际先驱报”出版者赖利商谈关于利用该报作为总委员会的机关报一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篇总委员会关于瑞士当局对吴亭进行搜查这一警察暴行的声明。声明发表于2月24日的“东邮报”和3月2日的“国际先驱报”，国际里斯本支部机关刊物、工人报纸“社会思想报”（《O Pensamento Social》）3月号以及其他许多刊物上。

2月20日—3月初 马克思准备写一篇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美国各支部间的冲突的报告提交总委员会。他研究了报纸上以及纽约来信中有关美国的国际联合会分裂的消息。

人名索引

二 画

八里桥——见古赞—蒙多邦。

三 画

小仲马, 亚历山大 (Dumas, Alexandre (fils) 1824—1895)——法国作家和剧作家。——第 565、578 页。

四 画

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Moltke, Helmut Karl Bernhard 1800—1891)——普鲁士将军, 1871 年起为元帅, 反动的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 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 (1857—1871) 和帝国总参谋长 (1871—1888), 普法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司令。——第 24、31、57、77、143、163、183、190、192、195、200、210、262、263、267 页。

日拉丹, 艾米尔·德 (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 514 页。

文普芬, 艾曼纽尔·费里克斯·德 (Wimpfen, Emmanuel—Félix de 1811—1884)——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五军军长 (1870 年 8 月 31 日起), 在色当战役中麦克马洪受伤后, 接任夏龙军团司令, 夏龙军团战败后在色

当投降书上签字。——第 84、86、93 页。

孔德, 奥古斯特 (Comte, Auguste 1798—1857)——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实证论的创始人。——第 601、602、609 页。

孔塞—杜美尼耳, 古斯塔夫·安都昂·玛丽 (Conseil—Dumesnil, Gustave—Antoine—Marie 1813—1877)——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军的师长, 在色当被俘。——第 44 页。

扎比茨基, 安东尼 (Zabicki, Antoni 1810 左右—1871)——波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 职业为排字工人; 1831 年后从波兰流亡国外, 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 年起侨居英国, 伦敦民主派兄弟会领导人之一, 1863 年起出版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自由之声报”, 波兰全国委员会书记,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71), 波兰通讯书记 (1866—1871)。——第 8、294、385、415 页。

扎古利亚耶夫, 米哈伊尔·安得列也维奇 (Загуляев, Михаил Андреевич 1834—1900)——俄国军官和政论家, 1862—1883 年任“呼声报”政治部主任。——第 301 页。

比果, 莱昂 (Bigot, Léon 1826—1872)——法国律师和政论家, 左派共和党人;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作为公社

- 社员的辩护人出席凡尔赛法庭。——第 434 页。
- 比斯利, 爱德华·斯宾塞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实证论者, 伦敦大学教授; 1870—1871 年为争取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支持要求英国站在法国方面出来进行武装干涉的冒险要求; 在英国报刊上为巴黎公社辩护。——第 395 页。
- 比埃特里, 约瑟夫·玛丽 (Piétri, Joseph-Marie 1820—1902)——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巴黎警察局长 (1866—1870)。——第 5、371、538、547、552、560、577、625、651 页。
- 韦斯顿, 约翰 (W eston,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木匠, 后为厂主; 欧文主义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2), 积极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第 9、294、305、385、403、415、461、491 页。
- 韦德尔, 奥古斯特·卡尔 (W erder, August Karl 1808—1887)——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普鲁士第十四军军长。——第 148、159、164、184、194、211、228、239、241、243—246、254、255、262、264—266、275 页。
- 韦济尼埃, 比埃尔 (V ésinier, Pierre 1826—1902)——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因诽谤总委员会于 1868 年被开除出国际,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联盟报”发行人和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 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第 418、673 页。
- 韦莫雷耳, 奥古斯特 (V ermorel, Auguste 1841—1871)——法国政论家, 蒲鲁东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员; 1871 年 5 月巴黎巷战时受重伤, 被俘后牺牲。——第 413 页。
- 巴泰, 昂利·茹尔 (Bataille, Henri-Jules 1816—1882)——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初期任第二军的师长。——第 25 页。
- 巴兰, 海尔曼·路德维希 (Balan, Herman Ludwig 1812—1874)——德国外交家, 曾任驻布鲁塞尔公使 (1865—1874)。——第 300 页。
- 巴赞, 弗朗斯瓦·阿希尔 (Bazaine, François Achille 1811—1888)——法国元帅, 保皇派; 1863—1867 年率领法军对墨西哥进行武装干涉,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军长, 后任莱茵军团司令, 1870 年 10 月在麦茨投降。——第 36、38、42、45、46、56、58、59、62—64、69、70—79、81、82、89、93、94、111、112、136、138、146、161、163、166—168、171—173、179、196 页。
- 巴腊耳, 欧仁 (Barral, Eugène 1808—1890)——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军队训练总监。——第 219 页。
-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革命家和政论家,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民粹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在国际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 在 1872 年的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 408、443、494、512、516、518—520 页。

巴斯特利卡, 安得列 (Bastelica, André 1845—1884)——法国和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会员, 巴枯宁主义者, 1870年10—11月马赛革命发动的参加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696、699页。

巴尔涅科夫男爵, 阿尔伯特·克利斯托夫·哥特利勃 (Barnekow, Albert Christoph Gottlieb, Freiherr von 1809—1895)——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六师师长。——第36页。

巴特里 (Buttery, G. H.)——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第384、415、460、491页。

巴特米—圣伊雷尔, 茹尔 (Barthélemy—Saint—Hilaire, Jules 1805—1895)——法国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 凡尔赛十五人委员会委员和梯也尔的办公厅主任 (1871—1873), 外交部长 (1880—1881)。——第422页。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利浦·阿尔伯。

五 画

尼禄 (Nero 37—68)——罗马皇帝 (54—68)。——第558页。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33—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新闻工作者; 蒲鲁东主义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67、1871—1872), 比利时通讯书记 (1866),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

表大会 (1872) 的代表, 曾参加保卫巴黎 (1870—1871),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后来加入法国工人党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第460、491、492页。

让罗, 若尔日 (Jeannerod, Georges 1832—1890)——法国军官和新闻工作者, 普法战争初期为“时报”的战地记者。——第26、42、43、47、69、71页。

古赞—蒙多邦, 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都昂, 八里桥伯爵 (Cousin—Montauban, Charles—Guillaume—Marie—Apollinaire—Antoine, comte de Palikao 1796—1878)——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法侵华远征军指挥官 (1860), 1870年8—9月为陆军大臣和政府首脑。——第15、49、55、129、173、345、539—540页。

兰多尔 (Landor, R.)——美国新闻工作者, 1871年为“世界报”驻伦敦记者。——第681—686页。

甘必大, 莱昂 (Gambetta, Léon 1838—1882)——法国国家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的成员 (1870—1871), 该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 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 (1881—1882)。——第138、181、200、206、238、247、256、260、272、300、336、535、580、622、641、699页。

汉德逊, 艾德蒙·纽曼斯·沃尔科特 (Henderson, Edmund Newmans Wolcott 1821—1896)——英国军官, 伦敦警察局长 (1869—1886)。——第679页。

东布罗夫斯基, 雅罗斯拉夫 (Dombrow—

- ski, Jaroslaw 1836—1871)——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巴黎公社的将军,1871年5月初起为巴黎公社所有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街垒战中牺牲。——第366页。
- 圣伊雷尔——见巴特米—圣伊雷尔,茹尔。
-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卢阿·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三十至四十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组织者之一,曾任陆军大臣(1851—1854),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第252页。
- 皮克,茹尔(Pic, Jules)——法国新闻工作者,波拿巴主义者,“旗帜报”发行负责人。——第337、576、624页。
- 皮阿,费里克斯(Pyat, 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参加过1848年革命,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有许多年利用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诽谤马克思和国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第446、449、668、673页。
- 皮卡尔,厄内斯特(Picard, Ernest 1821—1877)——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防政府财政部长(1870—1871),梯也尔政府内务部长(1871),镇压公社的刽子手之一。——第338、345、352、383、537、538、540、542、544、545、553、568、569、572、614、621、623、624、696页。
- 皮卡尔,欧仁·阿尔图尔(Picard, Eugène—Arthur 生于1825年)——法国政治活动家和证券交易商,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自由选民”周报的主编,厄内斯特·皮卡尔的弟弟。——第338、537、538、624页。
- 瓦扬,爱德华(Vaillant, Édouard 1840—1915)——法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法国社会党创建人之一,后为改良主义者。——第461、491、616、696、697、699、700页。
- 瓦兰(Wahlin)——国民自卫军战士,巴黎公社社员,1871年3月22日巴黎反革命暴乱时被杀害。——第618、637页。
- 瓦什隆,路易(Vacheron, Louis)——法国法学家,1871年任马延省总检察官。——第544页。
- 瓦尔兰,路易·欧仁(Varlin, Louis—Eugène 1839—1871)——卓越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装订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巴塞代表会议(1869)代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5月28日被凡尔赛分子枪杀。——第616页。
- 瓦伦顿,路易·恩斯特(Valentin, Louis—Ernest)——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1871年3月18日起义前夕曾代理巴黎警察局长。——第345、346、371、540、552、568、578、616、620、651、656页。

- 加莱尔,阿尔芒 (Carrel, Armand 1800—1836)——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自由派;“国民报”创办人之一和编辑。——第 554、556 页。
-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 (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临时政府成员 (1848),国防政府成员 (1870—1871)。——第 570、571 页。
- 加利费侯爵,加斯顿·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Galliffet, Gaston—Alexandre—Auguste 1830—1909)——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骑兵团团长,在色当被俘,后被放回参加反对公社的战争,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曾任凡尔赛军队的骑兵旅旅长。——第 352、353、386、546、578、620、639、640 页。
- 加内斯科,格莱哥里 (Ganesco, Gregory 1830 左右—1877)——法国新闻工作者,原系罗马尼亚人,第二帝国时期是波拿巴主义者,后为梯也尔政府的拥护者。——第 366 页。
- 加里安 (Gallien)——公社国民自卫军军官,曾把木兰—萨克多面堡驻军的口令出卖给凡尔赛分子。——第 572、578 页。
- 加里波第,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曾站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担任由国民自卫军、法国和外国志愿兵组成的佛日军团司令。——第 215、241、260、263、264、267、271 页。
- 加里波第,里乔蒂 (Garibaldi, Ricciotti 1847—1924)——朱·加里波第之子,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曾站在法国方面参加普法战争,任佛日军团的旅长。——第 194 页。
- 卡龙,沙尔·亚历山大·德 (Calonne, Charles—Alexandre de 1734—1802)——法国国家活动家,财政总稽核 (1783—1787),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流亡分子的领袖之一。——第 370、557、654 页。
- 卡贝,埃蒂耶纳 (Kabet, É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第 387、392 页。
- 卡诺,拉查尔·尼古拉 (Carnot, Lazare—Nicolas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派,抗击欧洲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第 51 页。
- 卡梅克,格奥尔格·阿尔诺德·卡尔 (Kameke, Georg Arnold Karl 1817—1893)——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四师师长,以后曾领导巴黎的围攻作业;陆军大臣 (1873—1883)。——第 36、241 页。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 (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三十至四十年代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5—6月任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政府首脑 (1848年6—12月)。——第 381、543、546、562、616、628、636 页。
- 卡缅斯基,加甫利尔·巴甫洛维奇

- (менский, Гавриил Павлович 1824—1898)——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沙皇政府的国外间谍,1872年由于制造假的阿西格那齐纸币而受到瑞士法庭缺席审判,并被判处徒刑。——第529页。
- 卡特利诺,昂利·德(Cathelineau, Henri de 1813—1891)——法国将军,保皇派,普法战争和镇压巴黎公社时期任布列塔尼和万第的志愿军指挥官。——第552、649、651页。
- 卡迪纳耳·冯·维德恩,格奥尔格(Cardinal von Widdern, Georg 1841—1920)——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写过许多战略、战术、军事地理和历史方面的著作,普法战争的参加者。——第20、21页。
- 卡斯提奥,阿德耳松(Castiau, Adelson 1804—1879)——比利时律师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3—1848年为众议院议员。——第697页。
- 卡斯塔尼,阿尔芒·亚历山大·德(Castagny, Armand - Alexandre de 1807—1900)——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的师长,在麦茨被俘。——第46页。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665页。
- 弗朗斯瓦(Francois)——法国国民自卫军战士,公社社员;1871年3月22日巴黎反革命暴乱时被杀害。——第618、637页。
- 弗兰克尔,列奥(Frankel, Leo 1844—1896)——匈牙利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巴黎公社委员,曾领导劳动和交换委员会;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第366、461、492、576、606、697页。
- 弗兰泽茨基,爱德华(Fransecky, Eduard 1807—1890)——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军军长。——第260页。
- 弗罗萨尔,沙尔·奥古斯特(Frossard, Charles - Auguste 1807—1875)——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军军长,在麦茨被俘。——第25、33、34、36—38、41、42、46、62、66、73、165页。
- 弗路朗斯,古斯达夫(Flourens, Gustave 1838—1871)——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学家,布朗基主义者,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4月被凡尔赛分子野蛮杀害。——第345、349、352、546、572、580、635、639、674页。
- 弗里德兰德,麦克斯(Friedländer, Max 1829—1972)——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新奥得报”和“新闻报”编辑部工作(五十至六十年代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新自由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64—1872)。——第405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第178、389页。
- 弗里德里希-卡尔(Friedrich - Karl 1828—1885)——普鲁士亲王,德国将

- 军, 1870年10月起为元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军团司令。——第23、26、33、37、38、43、45、69、75、93、112、158、164、183、184、188—191、193、197、199、201、202、211、212、220—223、227—229、238、239、243、245、246、256、264、267—269、271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 ilhelm 1831—1888)——普鲁士王储, 德国将军, 1870年10月起为元帅; 后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称弗里德里希三世(1888);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团司令。——第23、26、29、32、33、37、62、73—75、77、78、81、84、87、158、191、210、307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 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第106、210、215—218页。
- 弗里德里希—弗兰茨第二(Friedrich—Franz II 1823—1883)——梅克伦堡—施韦林大公(1842—1883), 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曾先后任德国沿海地区军队的司令和在巴黎南部作战的兵团司令。——第158、182、190、191、193、194、196、197、200、211、220—222、225、226、238、239、262页。
- 布伊, 卡季米尔(Bouis, Casimir 1843左右—1916)——法国新闻工作者, 布朗基主义者,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 曾任调查国防政府活动的委员会的主席, 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第579页。
- 布恩, 马丁·詹姆斯(Boon, Marti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 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 土地和劳动同盟书记,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8、293、384、415、460、491页。
- 布鲁托(Brutto)——巴黎公社社员, 曾主持检查国防政府账目的工作。——第674页。
- 布林德, 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五十年代为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 六十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 普法战争时期及其后是凶恶的沙文主义者。——第279、280页。
- 布拉斯, 奥古斯特(Braß August 1818—1876)——德国新闻工作者,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六十年代起是俾斯麦的拥护者, “北德总汇报”发行人。——第324页。
- 布朗舍, 斯坦尼斯拉(Blanchet, Stanislas 生于1833年)(真姓为普里耳Pourille)——还俗的僧侣, 商人和警察; 巴黎被围时期在国民自卫军服役, 被选为巴黎公社委员, 1871年5月被揭发和逮捕,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第368页。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 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法国无产阶级运动最著名的领袖, 巴黎1870年10月31日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公社时期在监狱

- 中。——第 318、345、349、381、572、579、580、635 页。
- 布尔巴基, 沙尔 (Bourbaki, Charles 1816—1897)——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先后任近卫军指挥官、第十八军军长和东方军团司令。——第 148、201、219、223、226—228、239、243—247、254—256、259—268、270、271、274—277 页。
- 布莱德洛, 查理 (Bradlaugh, Charles 1833—1891)——英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激进派, “国民改革者”周刊的编辑, 曾猛烈攻击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第 514、523、524 页。
- 布雷索耳, 安都昂·奥班·德 (Bressoles, Antoine — Aubin de 1828—1891)——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十四军军长。——第 259 页。
- 布律涅耳, 安都昂·马格鲁瓦尔 (Brunel, Antoine—Magloire 生于 1830 年)——法国军官, 布朗盖主义者,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 1871 年 5 月遭凡尔赛分子枪击, 受重伤,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第 387 页。
- 布吕歇尔, 格布哈尔德·勒勃莱希特 (Blücher, Gebhard Leberecht 1742—1819)——普鲁士元帅, 1793—1794 年曾参加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战争, 1806、1813—1814 和 1815 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官。——第 78、212 页。
- 布列德尼克, 弗雷德里克 (Bradnick, Frederick)——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0—1872), 1871 年为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以后曾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一起反对大会的决议。——第 8、293、384、415、460、491 页。

六 画

- 西蒙, 茹尔 (Simon, Jules 1814—1896)——法国国家活动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制宪会议议员 (1848—1849), 国防政府的成员, 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 (1870—1873),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反对巴黎公社的鼓动者之一; 内阁总理 (1876—1877)。——第 345、540、571 页。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玛丽 (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 (真姓为阿鲁埃 Arouet)——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 352 页。
-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Lef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三年徒刑, 1856 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1 月—1872 年),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参加者,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在国际里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 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8、293、384、415、460、491、

- 528页。
- 达尔布瓦, 若尔日 (Darboy, Georges 1813—1871)——法国神学家, 1863年起为巴黎大主教, 1871年5月作为人质被公社枪毙。——第381、546、547、549、577、579、636页。
- 考莱伯爵, 亨利·理查·查理·威尔斯里 (Cowley, Henry Richard Charles Wellesley, Earl 1804—1884)——英国外交家, 驻巴黎大使 (1852—1867)。——第412页。
- 艾尔皮金, 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 (Эльпидин Михаил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35—1908)——六十年代初俄国革命运动的参加者, 后来侨居瑞士, 成为沙皇暗探局密探。——第409、498页。
- 华施贝恩, 艾利修·本杰明 (W ashburne, Elihu Benjamin 1816—1887)——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 属于共和党, 曾任驻巴黎公使 (1869—1877), 实行反对巴黎公社的破坏性的挑衅政策。——第411—415页。
-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激进派政论家, 1848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委员, “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50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中被判处六年徒刑, 六十至七十年代是进步党人。——第528页。
- 吉奥, 阿尔丰斯·西蒙 (Giiod, Alphonse-Simon 生于1805年)——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的参加者, 1870—1871年巴黎被围时期为炮兵总指挥。——第337、536、623页。
- 吉约姆, 詹姆斯 (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 无政府主义者, 巴枯宁的拥护者, 国际会员, 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洛桑代表大会 (1867)、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参加者,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 “进步报”、“团结报”和“汝拉联合会简报”的编辑; 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年代里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第444、520页。
- 亚历山大 (Александр 1845—1894)——俄国大公, 亚历山大二世之子, 俄国王位继承人, 1881年起为皇帝, 称亚历山大三世。——第308页。
-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 (1855—1881)。——第290、301、307、308页。
- 亚历山德拉 (Alexandra 1844—1925)——丹麦国王克里斯提安九世之女, 1863年嫁给威尔士亲王, 亲王于1901年起为英国国王, 称爱德华七世。——第350、636页。
- 托马, 克列芒 (Thomas, Clément 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 将军,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议员, 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 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 (1870年11月—1871年2月), 背叛地破坏城防, 1871年3月18日被起义士兵枪毙。——第348—350、354、373、374、376、542、544、545、548、580、614、616、632、634—636、641页。
- 托伦, 昂利·路易 (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 右派蒲鲁东主义者, 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日内瓦

- 代表大会 (1866)、洛桑代表大会 (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的代表,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赛分子, 被开除出国际。——第 321、353、395、396、520、697 页。
- 托特列本, 埃杜阿尔德·伊万诺维奇 (Тотлебен Эдуард Иванович 1818—1884)——杰出的俄国军事工程师, 将军, 1854—1855 年英勇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组织者之一。——第 233 页。
- 米涅, 克劳德·埃蒂耶纳 (Miné, 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 米涅式步枪发明者。——第 129 页。
- 米歇尔, 亚历山大·厄内斯特 (Michel, Alexandre-Ernest)——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卢瓦尔军团骑兵师师长。——第 219 页。
- 米拉波, 奥诺莱·加布里埃尔 (Mirabeau, Honoré - Gabriel 1749—1791)——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第 340 页。
- 米尔纳·乔治 (Milner,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爱尔兰人, 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 全国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8—1872),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1872 年秋起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第 8、294、385、415、461、491 页。
- 米尔斯, 查理 (Mills, Charles)——英国工程师, 1871 年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 385、419 页。
- 米里哀尔, 让·巴蒂斯特 (Millière, Jean-Baptiste 1817—1871)——法国新闻工作者, 左派蒲鲁东主义者,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曾批评梯也尔政府, 为巴黎公社辩护, 1871 年 5 月被凡尔赛分子枪杀。——第 337、389、393、396、537、620、623、679 页。

七 画

- 吕耳 (Rühl, J.)——德国工人,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0—1872)。——第 8、294、385、415、461、491 页。
-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伟大的意大利诗人。——第 524 页。
- 里德, 罗伯特 (Reid, Robert)——英国新闻工作者, 1871 年为英美报纸驻法国通讯员, 同情巴黎公社。——第 411—414 页。
- 吴亭, 尼古拉·伊萨柯维奇 (Утин Николай Исаакович 1845—1883)——俄国革命家, 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土地和自由”社社员, 1863 年起流亡英国, 后迁瑞士; 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人民事业”编辑部委员 (1868—1870), “平等报”编辑之一 (1870—1871), 曾进行反对巴枯宁及其信徒的斗争, 1871 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七十年代中脱离了革命运动。——第 458、529、700 页。
- 希普顿 (Shipton)——英国工联主义者, 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 同奥哲尔关系密切。——第 691 页。
- 李特列, 艾米尔 (Littre, Émile 1801—1881)——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语文

-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第 616 页。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第一国际会员, 德国工人运动中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积极战士,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1867 年起为国会议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 “人民国家报”编辑 (1869—1876); 在个别问题上采取调和主义的立场,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反对普鲁士容克和资产阶级的掠夺计划, 并声援巴黎公社;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297、299、304、527、697、701、702 页。
- 庇护九世 (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 (1846—1878)。——第 179、516 页。
- 亨利二世 (Henri II 1519—1559)——法国国王 (1547—1559)。——第 126 页。
-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 昂利·沙尔。
- 沙斯波, 安都昂·阿尔丰斯 (Chassepot, Antoine-Alphonse 1833—1905)——法国军事发明家。——第 29、129 页。
- 沙列特·德·拉·康特里男爵, 阿塔纳兹 (Charette de la Contrie, Athanase, baron de 1832—1911)——法国将军, 保皇党人, 普法战争时期为教皇的朱阿夫兵的指挥官, 后为西方志愿兵军团的指挥官。——第 552、620、649、651 页。
- 麦克唐奈, 帕特里克 (MacDonnel, J. Patrick 约生于 1845 年)——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 (1871—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1872 年侨居美国, 参加美国工人运动。——第 385、415、419、461、492 页。
- 麦克马洪, 玛丽·埃德姆·巴特里斯·莫里斯 (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1808—1893)——法国反动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 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 后任夏龙军团司令, 在色当被俘,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 凡尔赛军队总司令, 第三共和国总统 (1873—1879)。——第 29、31—33、36、37、41、42、44、45、47、48、56、59、62、71—90、93、99、116、129、166、171、173、174、187、376、381、567、652 页。
-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 (Vauban, Sébastien le Prêtre 1633—1707)——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写有许多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第 100、109、111、239 页。
- 沃尔弗, 鲁伊治 (Wolff Luigi)——意大利少校, 马志尼的拥护者, 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5),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 1871 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第 418、688 页。
- 苏拉 (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 (Lucius Cornelius Sulla 公元前 138—78)——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曾为执政官 (公元前 88) 和独裁者 (公元前 82—79)。——第 342、377 页。
- 苏桑, 路易 (Susane, Louis 1810—1876)——法国将军, 曾任陆军部军械局局长多年, 写过许多法军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337、536、623 页。
- 苏舍, 路易·加布里埃尔 (Suchet, Louis-Gabriel 1770—1826)——法国元帅,

- 曾参加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第 154、155 页。
- 贝累, 沙尔 (Beslay, Charles 1795—1878)——法国企业家、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国际会员, 蒲鲁东主义者, 巴黎公社委员和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 驻法兰西银行的代表; 奉行拒绝银行国有化和不干涉银行内务的政策,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第 342、553 页。
- 贝克尔, 海爾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德国法学家和政论家, 1850 年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判五年徒刑; 六十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第 528 页。
- 贝利耶, 比埃尔·安都昂 (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正统主义者。——第 631 页。
- 贝热瑞, 茹尔·维克多 (Bergeret, Jules-Victor 1839—1905)——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 国民自卫军将军,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后迁美国。——第 351、616、617、637 页。
- 贝奈德克, 路德维希 (Benedek, Ludwig 1804—1881)——奥地利将军, 1866 年奥普战争时期同普军作战的奥军总司令。——第 38 页。
- 贝里公爵夫人, 玛丽·卡洛琳·斐迪南达·路易莎 (Berry, Marie-Caroline-Ferdinande-Louise de Naples, duchesse de 1798—1870)——正统派法国国王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 1832 年企图在万第发动暴乱推翻路易一·菲力浦。——第 339、554、608、627 页。
- 克楠, 菲力浦 (Coenen, Philippe)——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鞋匠, 安特卫普“工人报”编辑部秘书,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伦敦代表会议 (1871) 的代表; 在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上支持巴枯宁派, 后为比利时社会党组织者之一。——第 320 页。
- 克勒尔 (Keller)——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旅长。——第 276 页。
- 克鲁扎, 让 (Crouzat, Jean 1813—1879)——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十军军长。——第 219 页。
- 克雷美, 卡米尔 (Crémér, Camille 1840—1876)——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东方军团独立师师长。——第 241、274—277 页。
- 克里默, 威廉·朗达耳 (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 改良主义者; 粗木工联合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 (1864—1866),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 的参加者; 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 反对革命策略, 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 普法战争时反对英国工人声援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 后为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 (1885—1895 和 1900—1908)。——第 493 页。
-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约生于 1818 年)——科伦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2) 的被告之一, 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 528 页。
- 克吕泽烈, 古斯塔夫·保尔 (Cluseret,

- Gustave Paul 1823—1900)——法国政治活动家,国际会员,追随巴枯宁派,里昂和马赛革命起义(1870)的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军事代表(1871年4月),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第433、572页。
- 克劳塞维茨,卡尔(Clausewitz, Karl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和资产阶级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第179页。
- 杜朗,古斯塔夫·保尔·艾米尔(Durand, Gustave—Paul—Émile 生于1835年)——法国首饰匠,警探,公社被镇压后在伦敦冒充流亡者;1871年法国人支部书记,同年被揭发并被开除出国际。——第469、500、520页。
- 杜埃,阿贝尔(Douay, Abel 1809—1870)——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的师长,在维桑堡战役中阵亡。——第41页。
- 杜埃,费里克斯(Douay, Félix 1816—1879)——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军军长,在色当被俘;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凡尔赛军队第四军军长。——第37、39、42、44、46、56、60、62、71、73、84、116、171、376页。
- 杜邦,欧仁(Dupont, Eugène 1831左右—1881)——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乐器匠,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1862年起住在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年11月—1872年),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主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0年迁居曼彻斯特,并组织了国际支部,1872年参加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1874年迁居美国。——第8、294、385、415、460、491、494、673页。
- 杜邦鲁,费里克斯(Dupanloup, Félix 1802—1878)——法国神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天主教党领袖之一,奥尔良主教(1849年起),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214、217、668页。
- 杜瓦尔,艾米尔·维克多(Duval, Émile—Victor 1841—187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铸工;国际会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国民自卫军将军,1871年4月4日被俘后遭凡尔赛分子枪杀。——第352、546、572、638、674页。
- 杜克罗,奥古斯特·亚历山大(Ducrot, Auguste—Alexandre 1817—1882)——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的师长,后任第一军军长和巴黎第二军团司令;镇压巴黎公社时曾参加组织凡尔赛军队的工作,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第116、130、182、191、204—206、208、249、612页。
-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斯(Dufaure, 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内务部长(1848和1849),司法部长(1871—1873、1875—1876和1877—1879),内阁总理(1876、1877—1879)。——第345、351、372—374、539、542—544、568、569、571、575、601、625、654页。

八 画

雨果,维克多(Hugo, Victor 1802—

- 1885)——伟大的法国作家。——第 143 页。
- 佩恩, 昂利·德 (Pène, Henri de 1830—1888)——法国新闻工作者, 保皇派, 1871 年 3 月 22 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策划者之一。——第 350、617、637、715 页。
- 坦恩-腊特扎姆豪森男爵, 路德维希·萨姆松 (Tann-Rathsamhausen, Ludwig Samson, Freiherr von und zu der 1815—1881)——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巴伐利亚第一军军长。——第 148、158、164、176、181、182、184、190、195、207、220、225、228、262 页。
- 帖木儿 (塔梅尔兰) (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第 352、564、639 页。
- 金累克, 亚历山大·威廉 (Kingleke, Alexander William 1809—1891)——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自由党人。——第 252 页。
- 彼尔茨, 格奥尔格·亨利希 (Pertz, Georg Heinrich 1795—1876)——德国历史学家, 温和的保守党人, 写过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第 217 页。
- 昂伯尔尼 (Amberny)——瑞士法学家。——第 529 页。
- 卓瓦基尼 (Giovacchini, P.)——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 年为意大利通讯书记。——第 385、415 页。
- 孟德斯鸠, 沙尔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和作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 君主立宪制的理论家。——第 360、613、616 页。
- 图姆普林格, 威廉 (Tümppling, Wilhelm 1809—1884)——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六军军长。——第 204 页。
- 武尔姆泽尔, 达哥贝尔特·济格蒙德 (Wurmser, Dagobert Siegmund 1724—1797)——伯爵, 奥地利元帅, 1796 年指挥在意大利的奥军, 被波拿巴打败数次后在曼都亚要塞投降。——第 70 页。
- 林肯, 阿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1809—1865)——杰出的美国国家活动家, 共和党创建人之一, 美国总统 (1861—1865); 美国内战时期在人民群众的影响下实行了许多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 这些改革意味着转用革命的方法进行战争; 1865 年 4 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第 558、565、652 页。
- 林特恩 (Lintern, W.)——英国工联主义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0)。——第 8 页。
- 舍费尔 (Scheffer)——法国国民自卫军战士, 公社社员。——第 353、566、578、640 页。
- 舍耳歌, 维克多 (Schoelcher, Victor 1804—1893)——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左派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时期为巴黎国民自卫军炮兵军团指挥官, 1871 年国民会议议员; 妄图劝说公社向梯也尔政府投降。——第 601、615 页。
- 居莱, 费伦茨 (Gyulay, Ferenc 1798—1868)——伯爵, 奥地利将军, 原系匈牙利人, 镇压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陆军大臣 (1849—1850), 1859 年奥意法战争初期曾指挥奥地利军队, 在马振塔战败。——第 37 页。
- 居欣迈斯特尔, 弗里德里希 (Küchenmeister, Friedrich 1821—1890)——

- 德国医生,杰出的寄生虫学家,写过许多科学著作。——第322页。
- 尚济,安都昂·阿尔弗勒德·欧仁(Chanzy, Antoine-Alfred-Eugène 1823—1883)——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先后任第十六军军长和卢瓦尔第二军团司令,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219、222、223、225、226、228、238、239、243、245—247、254、256、269、270、272、549、579页。
- 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Chambord, Henri-Charles, comte de 1820—1883)——波旁王朝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国外,法国王位追求者,号称亨利五世。——第325、650页。
-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德奥杜尔(Chan-garnier, 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年6月以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游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和流放,1859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在麦茨被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351、555、618、638页。
- 法伊,比埃尔·路易·沙尔·德(Faillly, Pierre-Louis-Charles de 1810—1892)——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五军军长,在色当被俘。——第36、41、42、44、45、56、62、71、73、84、116、165、171、173页。
- 法卢,阿尔弗勒德(Falloux, Alfred 1811—188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人和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动者。——第631页。
- 法夫尔,茹尔(Favre,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1848年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外交副大臣,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1870—1871),曾同德国进行关于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4、120—123、259、267、268、329、336、337、342、345、349、368、375、387—390、392、393、401、407—409、446、449、494、535—540、549、554、556、559、568、570、576、581、582、612、615、616、617、621—624、635、636、665、666、671、677、688、691、692、696页。
- 帕拉丹——见奥雷耳·德·帕拉丹。
- 帕涅尔,詹姆斯(Parnell, James)——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0)。——第8、294页。
- 帕耳埃尔——见马丁·德·帕耳埃尔。
-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9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第402页。
- 波旁王朝(Bourbon)——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第559、561、649页。
- 波拉,卓万尼(Bora, Giovanni)——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年任意大利通讯社

- 记。——第 8、294 页。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 波拿巴, 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 约瑟夫 (Bonaparte, Joseph 1768—1844)——拿破仑第一之长兄, 那不勒斯国王 (1806—1808) 和西班牙国王 (1808—1813)。——第 172 页。
- 波拿巴, 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 (Bonaparte, Joseph—Charles—Paul, prince Napoleon 1822—1891)——拿破仑第三的堂弟, 在普法战争初期进行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 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第 279、325 页。
- 波拿巴王朝 (Bonaparte)——法国王朝 (1804—1814、1815 和 1852—1870)。——第 167、551 页。
- 阿西, 阿道夫·阿尔丰斯 (Assi, Adolphe—Alphonse 1840—1886)——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工人,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第 318、396、435 页。
- 阿弗尔, 德尼·奥古斯特 (Affre, Denis—Auguste 1793—1848)——法国神甫, 巴黎大主教 (1840—1848), 巴黎 1848 年六月起义时被政府军士兵枪杀, 当时他正企图劝说起义的工人放下武器。——第 381、546、636 页。
- 阿斯特, 恩斯特·路德维希 (Aster, Ernst Ludwig 1778—1855)——普鲁士将军, 军事工程师。——第 95 页。
- 阿尔伯特 (Albert 1828—1902)——萨克森王储, 1873 年起为萨克森国王; 德国将军, 1871 年起为元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二 (萨克森) 军军长, 后任第四 (麦士) 军团司令。——第 80、158、166 页。
- 阿尔诺德, 若尔日 (Arnold, Georges 于 1840 年)——法国建筑师,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第 413 页。
- 阿尔勃莱希特 (Albrecht 1809—1872)——普鲁士亲王, 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四骑兵师师长。——第 182 页。
- 阿尔勃莱希特 (Albrecht 1837—1906)——普鲁士亲王, 前者的儿子, 德国将军, 后为元帅, 普法战争时期任骑兵旅旅长。——第 240 页。
- 阿尔文斯累本, 康斯坦丁 (Avensleben, Constantin 1809—1892)——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军长。——第 46 页。
- 阿普耳加思, 罗伯特 (Applegarth, Robert 1833—1925)——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红木工, 粗细木工联合会总书记 (1862—1871), 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5、1868—1872),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改革同盟的领导人之一; 1871 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 后来脱离了工人运动。——第 8、293、460、491 页。
- 罗, 哈里埃特 (Law, Harriet 1832—1897)——著名的英国无神论运动女活动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7—1872) 和曼彻斯特支部成员 (1872)。——第 491 页。
- 罗奇, 约翰 (Roach,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海牙代表大会代表 (1872),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 (1872), 在委员会里附和改良派, 反对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第 385、409、415、

- 419、461、491 页。
- 罗沙, 沙尔 (Rochat, Charles)——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巴黎公社社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荷兰通讯书记 (1871—1872),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 385、461、492 页。
- 罗班, 保尔 (Robin, Paul 生于 1837 年)——法国教师, 巴枯宁主义音,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 (1869 年起), 总委员会委员 (1870—1871), 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和伦敦代表会议 (1871) 代表。——第 463、464、690 页。
- 罗昂, 阿尔勃莱希特 (Roon, Albrecht 1803—1879)——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 1873 年起为元帅, 普鲁士军阀代表人物之一, 陆军大臣 (1859—1873) 和海军大臣 (1861—1871), 曾改编普鲁士军队。——第 114 页。
- 罗比耐, 让·弗朗斯瓦·欧仁 (Robinet, Jean-François-Eugène 1825—1899)——法国医生和历史学家, 实证论者, 共和党人; 曾参加 1848 年革命, 1870—1871 年围城时期为巴黎的区长, 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盟员, 主张凡尔赛同公社和解。——第 384、395 页。
- 罗赫纳, 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约生于 1824 年)——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细木工,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 年 11 月—1867 年和 1871—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和 1871) 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 384、419、460、491 页。
- 罗伦兹, 约瑟夫 (Lorenz, Joseph 1814—1879)——奥地利军官和军事发明家。——第 104 页。
- 罗伦佐, 安赛尔莫 (Lorenzo, Anselmo 1841—1915)——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 印刷工人; 国际会员 (1869 年起),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 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书记 (1872); 反对巴枯宁派。——第 445、506、696 页。
- 罗什-朗贝尔 (Roche Lambert)——法国官员, 普野-克尔蒂约的女婿, 1871 年任卢瓦尔省总收税官。——第 541 页。
- 罗什弗尔, 昂利 (Rocheffort, Henri 1830—1913)——法国新闻工作者, 作家和政治活动家, 左派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成员 (1870 年 9—11 月); 曾谴责凡尔赛分子的反革命政策, 但同时又反对巴黎公社的革命活动, 巴黎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 八十年代末转向教权主义保皇派反动势力阵营。——第 156、249 页。
- 拉丰 (Lafont)——法国官员, 1871 年为监狱总督察。——第 579 页。
- 拉菲特, 雅克 (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金融资产阶级代表, 政府首脑 (1830—1831)。——第 339、554 页。
- 拉梅耐, 费里西德 (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法国神甫, 政论家,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第 613 页。
- 拉瓦累, 泰奥菲尔·塞巴斯提安 (Laval-lée, Théophile-Sébastien 1804—1866)——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军事地理学家。——第 126 页。
- 拉克雷特尔, 沙尔·尼古拉 (Lacretelle, Charles-Nicolas 1822—1891)——

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二军的师长，在色当被俘；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当时任凡尔赛军队第二军的师长。——第 572 页。

拉隆西耶尔·勒·努里，卡米尔·阿达耳贝尔·玛丽，克列芒芒爵 (La Roncière Le Nourry, Camille- Adalbert- Marie, baron Clément de 1813—1881)——法国海军将领，1870—1871 年巴黎被围期间任巴黎第三军团的师长，后任独立军军长。——第 204 页。

拉罗什雅克兰，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 (La Rochejaquelein, Henri- Auguste- Georges 1805—1867)——侯爵，法国政治活动家，正统派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后为第二帝国参议员。——第 631 页。

拉德茨基，约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奥地利元帅，1831 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指挥官；1848—1849 年残酷地镇压了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1857 年 2 月为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第 95 页。

拉德米罗，路易·勒奈·保尔·德 (Ladmirault, Louis- René- Paul de 1808—1898)——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四军军长，在麦茨被俘；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当时任凡尔赛军队第一军军长，巴黎总督 (1871—1878)。——第 36、38、41、42、69、165 页。

拉法格 (Lafargue, J. 死于 1870 年或 1871 年)——保尔·拉法格的父亲。——第 431 页。

拉法格，保尔 (Lafargue, Paul 1842—1911)——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 (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 (1869—1870)，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 (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法国工人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第 430—432、673、704、705、707—715 页。

拉法格，劳拉 (Lafargue, Laura 1845—1911)——卡尔·马克思的二女儿，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8 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第 430—432、466、704、705、707、710—713 页。

九 画

勃朗，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是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导人之一；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第 419、601、608、665、666、680、692 页。

荣克，海尔曼 (Jung, Hermann 1830—1901)——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家，职业是钟表匠，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 (1864 年 11 月—1872 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 (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65) 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 (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以及伦敦代表会议 (1871) 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后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之一。——第 8、294、385、415、461、463、464、492 页。

- 胡利曼 (Hurliman)——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伦敦瑞士协会的代表。——第 460、491 页。
- 迪耳克, 查理·温特沃思 (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843—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自由党激进派领袖之一, 外交副大臣 (1880—1882), 地方自治事务大臣 (1882—1885)。——第 505 页。
- 哈里斯, 乔治 (Harris,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后为宪章主义者奥勃莱恩的信徒,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9—1872), 总委员会财务书记 (1870—1871)。——第 8、293、385、415、460、491 页。
- 侯里欧克, 乔治·杰科布 (Holyoake, George Jacob 1817—1906)——英国政论家, 改良主义者,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为欧文主义者和宪章派, 后为合作运动的的活动家。——第 398、399、401、403 页。
- 欧仁妮——见蒙蒂霍, 欧仁妮。
- 欧斯曼, 若尔日·欧仁 (Hausmann, Georges—Eugène 1809—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 塞纳省省长 (1853—1870), 曾领导改建巴黎的工作。——第 107、367、380 页。
- 若贝尔, 伊波利特·弗朗斯瓦 (Jaubert, Hippolyte—Francois, comte 1798—1874)——伯爵, 法国政治活动家, 保皇派, 梯也尔内阁的公共工程大臣 (1840),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第 383、648、678 页。
- 若昂纳尔, 茹尔 (Johannard, Jules 1843—1888)——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石印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8—1869, 1871—1872) 和意大利
 通讯书记 (1868—1869), 1870 年在圣丹尼建立国际支部; 巴黎公社委员, 追随布朗基派,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第 460、491 页。
- 柯恩或柯因, 詹姆斯 (Cohn 或 Cohe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雪茄烟工人, 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7—1871), 丹麦通讯书记 (1870—1871),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伦敦代表会议 (1871) 的代表。——第 9、294、385、415 页。
- 柯克伦—贝利, 亚历山大·邓达斯·罗斯·威夏尔特 (Cochrane—Baillie, Alexander Dundas Ross Wishart 1816—1890)——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 保守党人, 议会议员。——第 493—495 页。
- 洛帕廷, 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 (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俄国革命家,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 民粹派,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0); 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一大部分译成俄文; 马克思的朋友。——第 294 页。
- 洛伊卡特, 鲁道夫 (Leuckart, Rudolf 1822—1898)——德国杰出的寄生虫学家。——第 322 页。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普鲁士国王 (1861—1888), 德国皇帝 (1871—1888)。——第 14、77、79、92、102、172、206、210、215、286、300、301、307、375、621、701、702 页。
- 威尔士亲王夫人——见亚历山得拉。
- 威勒尔, 乔治·威廉 (Weeler, George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67), 总委员

- 会财务委员(1864—1865、1865—1867),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第493页。
- 威灵顿公爵,阿瑟·威尔斯里(We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指挥军队,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第188页。
- 科尔崩,克劳德·昂提姆(Corbon, Claude - Anthime 1808—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制宪会议议员(1848—1849);第二帝国崩溃后任巴黎的区长,1871年国民会议议员。——第336、622页。
- 科尔布(Kolb)——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1)。——第384、415页。
- 科尔布,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Kolb, Georg Friedrich 1808—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323页。
- 科尔蒙太涅,路易·德(Cormontaigne, Louis de 1696左右—1752)——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写过许多筑城学方面的著作。——第144页。
-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第401、408页。
- 科苏特,拉约什(Kossuth, Lajos 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逃离匈牙利。——第505页。
- 科特洛贡伯爵,路易·沙尔·艾曼纽尔(Coëtlogon, Louis - Charles - Emmanuel, comte de 1814—1886)——法国官员,波拿巴主义者,1871年3月22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策划者之一。——第350、617、637页。
- 施美林(Schmeling)——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四预备师师长。——第159、262页。
- 施穆茨(Schmutz)——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1)。——第8、294页。
-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0—1860),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科伦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并且是这一案件的主要证人;普法战争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和在法国境内的德国间谍活动和反间谍组织的领导人。——第299、314、519、520页。
- 施托什,阿尔勃莱希特(Stosch, Albrecht 1818—1896)——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先后任德军军需长官、梅克伦堡大公指挥的军团的参谋长,驻法国的德国占领军参谋长(1871)。——第226页。
- 施韦泽,约翰·巴普提斯特(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3—1875)——德国拉萨尔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1864—1867年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7—1871);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党,1872年他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因而被开除出联合会。——第696页。
- 施奈德尔,约瑟夫(Schneider, Josef)——

德国工人,拉萨尔分子,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72年1月因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协会,曾在德国报纸上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进行诬蔑性的攻击。——第527页。

施瓦尔岑堡,卡尔·菲利浦(Schwarzenberg, Karl Philipp 1771—1820)——公爵,奥地利元帅和外交家,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的参加者,1813—1814年反法同盟联军总司令。——第78页。

施图普纳格耳,斐迪南(Stülpnagel, Ferdinand 1813—1885)——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五师师长。——第36页。

施维茨格贝耳,阿德马尔(Schwitzguébel, Adhémar 1844—1895)——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国际会员,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代表。——第498、520页。

十 画

唐森,威廉(Townshend, William)——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第8、294、385、415、461、491页。

索尼,路易·加斯东·德(Sonis, Louis-Gaston de 1825—1887)——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七军军长。——第219页。

席尔,斐迪南(Schill, Ferdinand 1776—1809)——普鲁士军官,抗御拿破仑军队的游击队长,1809年策动武装起义,在战斗中阵亡。——第215、216页。

俾斯麦,奥托(Bismark, Otto 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

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1),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曾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78)。——第6、120—123、134、144、267、268、290、299、300、327、337、339、341、343、345、346、361、368、371、375、382、383、388、390、393、426、514、516、527、536、543、549、551、552、559、582、583、605、610、623、630、640、649、651、654、656、657、671、677、688、696页。

库梅尔,斐迪南(Kummer, Ferdinand 1816—1900)——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先后任第三后备师师长和第十五师师长。——第136、158页。

爱尔威,爱德华(Hervé, Edouard 1835—1899)——法国政论家,“巴黎报”创办人之一和主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第二帝国崩溃后为奥尔良党人。——第378页。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传记材料)。——第148、170、173、183、184、199、200、207、225、266、268、269、275、276、297、298、303、306、310、385、401、415、422、423、461、492、506、508—513、526—528、667、669、671、675、687、690页。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锻工;1867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会员,国会议员(1867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支持巴黎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

- 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但是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特别是在他活动的后期。——第 297、299、304、697、701、702 页。
- 涅恰也夫,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Нечаяев, Сергей Готфридович 1847—1882)——俄国密谋革命家,1868—1869 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9 年莫斯科的革命组织的创始人;流亡瑞士(1869 年起),1869—1871 年曾与巴枯宁有密切联系,1872 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死于彼得堡牢狱。——第 409、470、529 页。
- 夏恩霍斯特,格尔哈特(Scharnhorst, Gerhard 1755—1813)——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1806 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任军事改革原则制订委员会主席;陆军大臣(1807—1810)和总参谋长(1807—1813);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第 179—180 页。
- 茹柯夫斯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33—1895)——俄国无政府主义者,1862 年起流亡瑞士,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日内瓦支部书记,1872 年为抗议开除巴枯宁而退出国际。——第 458 页。
- 泰勒,彼得·阿尔弗勒德(Taylor, Peter Alfred 1819—189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第 669 页。
- 泰勒,阿尔弗勒德(Taylor, Alfred)——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第 385、409、415、419、461、491 页。
- 泰费尔(Taillefer)——同出版波拿巴派报纸“旗帜报”有关的舞弊案的参与者。——第 337、338、576、624 页。
- 乌里克,让·雅克·阿列克西斯(Uhrich, Jean — Jacques — Alexis 1802—1886)——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斯特拉斯堡要塞司令。——第 101、121 页。
- 乌迪诺,尼古拉·沙尔·维克多(Oudinot, Nicolas — Charles — Victor 1791—1863)——法国将军,奥尔良党人,1849 年率领军队镇压罗马共和国。——第 628 页。
-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第 403 页。
-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 和 1815)。——第 7、25、37、62、70、75、78、95、112、166、172、179、215、218、273、275、282、289、341、365、548、563、584、585、596、626、630、652 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第 3—6、13、14、17、25、27—30、33—35、37—42、48、53—56、61、62、64、76、103、104、107、114、118、125、161、169—175、196、206、268、280、285、286、290、291、293、305、309、323—328、337、341、344、347—349、356、357、361、364—369、373、376、388、395、512、537、541、543、544、552、553、555、560、563、570、576、578、579、581、586、590、596、610、621、623、624、

- 626、630、631、635、641、648、649、651、652、658、666、667、671、688、692、701页。
- 哥本, 奥古斯特·卡尔·克利斯提安 (Goeben, August Karl Christian 1816—1880)——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八军军长, 1871年1月起任第一军团司令。——第240、245—247、267、271页。
- 哥尔茨, 库诺 (Goltz, Kuno 1817—1897)——男爵, 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曾指挥第十四军所属的普鲁士部队。——第246页。
- 哥尔查科夫,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798—1883)——公爵, 俄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 曾任外交大臣 (1856—1882)。——第290、516页。
- 特罗胥, 路易·茹尔 (Trochu, Louis—Jules 1815—189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侵占阿尔及利亚 (三十至四十年代)、克里木战争 (1853—1856) 和意大利战争 (1859) 的参加者, 国防政府的首脑, 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 (1870年9月—1871年1月), 背叛地破坏城防, 1871年国民议会会议员。——第49、60、97、121、130、131、149、182、190—193、197、199、202、204、206、211、220、233、237、250—253、258、259、329、335、336、343、347、349、380、535、536、545、570、580、582、612、616、620、621—623、635、641、658页。
- 特斯屠, 奥斯卡 (Testut, Oscar)——法国法学家, 和警察界联系密切, 写过一本关于第一国际的组织和历史的书, 该书是为供警察情报机关使用而出版的。——第494页。
- 特里东, 埃德姆·玛丽·古斯塔夫 (Tridon, Edme—Marie—Gustave 1841—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布朗基主义者, 国际会员, 1871年国民议会会议员, 后辞职, 巴黎公社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第616页。
- 特雷斯科夫, 乌多 (Tresckow, Udo 1808—1885)——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预备师师长和围攻伯尔福城的军长。——第245、262页。
- 埃尔曼, 阿尔弗勒德 (Hermann, Alfred)——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雕刻家, 国际比利时支部的组织者之一, 总委员会委员和比利时通讯书记 (1871—1872),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的代表, 后来支持巴枯宁派。——第384、461、492、503页。
- 埃克朗男爵, 若尔日·沙尔·当太斯 (Heeckeren, Georges—Charles d'Anthès, baron de 1812—1895)——法国政治活动家, 保皇派, 1834—1837年为俄国军队的军官, 杀害亚·谢·普希金的凶手; 1848年起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帝国参议员, 1871年3月22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策划者之一。——第350、617、637页。
-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著名的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工人政论家, 职业是裁缝; 侨居伦敦,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2), 总委员会总书记 (1867—1871), 美国通讯书记 (1870—1872), 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 后来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

- 袖之一。——第 9、294、312、313、385、415、461、492 页。
- 埃斯帕特罗, 巴尔多梅罗 (Espartero, 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进步党领袖, 西班牙摄政 (1841—1843), 政府首脑 (1854—1856)。——第 340、555、628 页。
- 格雷波, 让·路易 (Greppo, Jean-Louis 1810—1888)——法国政治活动家,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1831 年和 1834 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1870—1871 年为巴黎的区长,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第 569 页。
- 格鲁赛, 巴斯噶尔 (Crousset, Paschal 1844—1909)——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布朗基主义者,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 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 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 1874 年从那里逃走; 后来转向资产阶级立场。——第 577 页。
- 格兰特, 乌利西斯·辛普森 (Grant, Ulysses Simpson 1822—1885)——美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 共和党人,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的参加者, 1864 年 3 月起为北军总司令, 陆军部长 (1867—1868), 美国总统 (1869—1877)。——第 153 页。
- 希腊蒙公爵, 安都昂·阿尔弗勒德·阿惹诺尔 (Gramont, Antoine-Alfred-Agénor, duc de 1819—1880)——法国外交家, 1870 年任外交大臣, 奉行在法普之间挑起战争的政策。——第 14 页。
- 格里马耳 (Grimal)——法国军官, 凡尔赛分子为了惩治巴黎公社社员而设立的军事法庭的起诉人。——第 422 页。
- 格林伍德, 弗雷德里克 (Greenwood, Frederick 1830—1909)——英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 保守党人, “派尔—麦尔新闻”编辑 (1865—1880)。——第 390、407 页。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十九世纪下半叶为自由党领袖之一, 曾任财政大臣 (1852—1855 和 1859—1866) 和首相 (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第 307 页。
- 格奈泽瑙, 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德 (Gneisenau, August Wilhelm Anton Neihart 1760—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 1825 年起为元帅; 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 1806 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参加制订军事改革的原则, 1813—1814 年和 1815 年是布吕歇尔军队的参谋长。——第 179、216—218 页。
- 马隆, 贝努瓦 (Malon, Benoit 1841—1893)——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国际会员, 1866 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代表,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后辞职;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的委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 后迁居瑞士; 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流派——可能派领袖和思想家之一。——第 464 页。
- 马加伯 (或哈斯莫尼)——犹太祭司氏族, 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这个氏族的代表人物领导了反对外国统治的起义, 公元前 142—40 年为犹太统治王朝。——第 216 页。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

- 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64年成立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第280、418—420、511—513、679、680、684、687—689页。
- 马利特,爱德华·鲍尔温(Malet, Edward Baldwin 1837—1908)——英国外交官,驻巴黎大使馆秘书(1867—1871)。——第413页。
- 马丁,孔斯坦(Martin, Constant)——法国革命家,布朗基主义者,公社社员;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460、491页。
- 马丁·德·帕耳埃尔,沙尔·加布里埃尔·费里西德(Martin des Pallières, Charles—Gabriel—Félicité 1823—1876)——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军的旅长,后任第十五军军长。——第219页。
- 马尔儒纳尔(Maljournal 约生于1843年)——国民自卫军军官,国际会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公社社员。——第351、617页。
- 马尔科夫斯基(Малковскіи)——沙皇政府在法国的密探,1871年梯也尔的合作者之一。——第366页。
- 马克,卡尔(Mack, Karl 1752—1828)——奥地利将军,180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指挥官;被拿破仑第一打败,在乌尔姆要塞投降。——第37、70页。
- 马克思,卡尔(Marx, Karl 1818—1883)(传记材料)。——第8、278、294、301、311、314—316、323、385、390、395、399、401、402、405、406、407、409、415—417、419、421、424—436、443、461、466—468、492、505、514—515、523—525、527—528、665、670、671、673、675、677、679、681—687、691、693—697、699—704、708、715页。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父姓是冯·威斯特华伦 geb. von Westphalen)——卡尔·马克思的妻子,他的忠实朋友和助手。——第432、708页。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44—1883)——卡尔·马克思的大女儿,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72年起为沙·龙格的妻子。——第431、432、466、704—715页。
- 马克思,爱琳娜(Marx, Eleanor 1855—1898)——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八十至九十年代为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84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子。——第431、432、466、704—711、713、714页。

十一画

-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340、544、556、628页。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1832、1834),首相(1836、1840),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4、318、335、336、339—348、

- 350—354、356、358、364、366—381、383、412、422、423、430、432、466、510、516、536—543、546—548、550—559、563—572、576、577、579、595、601、605、608、612、614—616、618、619、621、622、625—630、632、636、639—641、648—657、675、677、679、691、704、710、713页。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伟大的英国作家。——第344、386、572、599、650、708、711页。
- 康罗贝尔,弗朗斯瓦·塞尔坦(Canrobert, François - Certain 1809—1895)——法国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积极参加者之一;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六军军长,在麦茨被俘。——第36、42、44、46、48、49、59、63、69、71、84、165、169—171页。
-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óblewski, Walerj 1836—1908)——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1863—1864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第366、461、492页。
- 梅欧,亨利(Mayo, Henry)——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年起),在联合会委员会里附和改良派;反对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第460、491页。
- 梅克伦堡大公——见弗里德里希·弗兰茨第二。
- 密勒,约瑟夫(约)(Miller, Joseph (Jo) 1684—1738)——英国著名的喜剧演员。——第338、538、625页。
- 密尔顿,约翰(Milton, John 1608—1674)——伟大的英国诗人和政论家,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第590页。
- 曼涅,比埃尔(Magne, Pierre 1806—1879)——法国国家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财政大臣(1855—1860、1867—1869、1870、1873—1874)。——第541页。
- 曼涅,阿尔弗勒德(Magne, Alfred)——法国官员,比·曼涅的儿子,卢瓦尔省总收税官。——第541页。
- 曼托伊费尔,爱得文(Manteuffel, Edwin 1809—1885)——男爵,德国将军,1873年起为元帅,1865—1866年在什列斯维希任总督和普军司令,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后为第一军团(1870年10月起)和南方军团(1871年1月起)司令,驻法国的德国占领军总司令(1871—1873)。——第199、200、211、228、239—241、246、263、264、267、271页。
- 莫里斯,捷维(Maurice, Zévy)——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匈牙利通讯书记(1870—1871)。——第8、294、385、415、460、491页。
- 莫里哀,让·巴蒂斯特(Molière, Jean-Baptiste 1622—1673)(真姓为波克兰Poquelin)——伟大的法国剧作家。——第344、632页。
- 莫利奈子爵(Molinet, vicomte de 死于1871年)——法国贵族,1871年3月22日巴黎反革命暴乱时被打死。——第618页。
- 莫特斯赫德,托马斯(Mottershead, Thomas)——英国织布工人,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丹麦通讯书记(1871—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

- 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在总委员会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反对马克思的路线。——第 8、294、385、415、461、492、673 页。
- 勒诺(Renaut)——法国律师,1871年作为巴黎公社委员腊斯土耳其的辩护人出席凡尔赛法庭。——第 434 页。
- 勒诺,比埃尔·伊波利特(Renault, Pierre—Hippolyte 1807—1870)——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巴黎第二军团第二军军长。——第 205 页。
- 勒穆修(Le Moussu, A.)——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巴黎公社社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美国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枯宁的斗争。——第 461、492 页。
- 勒鲁,比埃尔(Leroux, Pierre 1797—1871)——法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51—1852年侨居英国。——第 680 页。
- 勒康特,克劳德·马丁(Lecomte, Claude—Martin 1817—1871)——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旅长,1871年3月18日在梯也尔政府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的企图失败后,被起义的士兵枪毙。——第 348、350、354、373、374、376、542、544、614、632、634—636、641 页。
- 勒夫洛,阿道夫·艾曼纽尔·沙尔(Le Flô, Adolphe—Emmanuel—Charles 1804—1887)——法国将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会议员,曾任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长(1870—1871),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驻彼得堡大使(1848—1849和1871—1879)。——第 350、353、548、636 页。
- 勒布伦,巴特米·路易·约瑟夫(Lebrun, Barthélemy—Louis—Joseph 1808—1889)——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二军军长,在色当被俘。——第 84 页。
- 勒美特尔,安都昂·路易·普罗斯比尔(Lemaitre, Antoine—Louis—Prosper 1800—1876)(笔名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 Frédéric Lemaitre)——法国演员和剧作家,十九世纪法国剧坛上进步的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以塑造奸商罗伯尔·马克尔的形象闻名,这一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 541 页。
- 勒文费耳德(Löwenfeld)——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为后备部队总监。——第 159 页。
- 勒格廖利耶(Legreulier)——1870年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 8 页。

十二画

- 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1830—1859),由于1848年炮击墨西拿而得到“炮弹国王”的诨号。——第 339、555、627 页。
- 莱昂斯,理查·比克顿·皮美尔(Lyons, Richard Bickerton Pemell 1817—1887)——男爵,英国外交家,驻华盛顿公使(1858—1865),驻君士坦丁堡(1865—1867)和驻巴黎(1867—1887)大使,1870年9月为法瓦尔和俾斯麦之间的谈判而奔走的中介人。——第 412—414 页。
- 腊格伦男爵,菲茨罗伊·詹姆斯·亨利·

- 索美塞特 (Raglan, Fitzroy James Henry Somerset, Baron 1788—1855)——英国将军, 1854年11月起为元帅, 任克里木英军总司令 (1854—1855)。——第 252 页。
- 凯希耳 (Cairhill)——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0—1871)。——第 293、384、415 页。
- 凯腊特里伯爵, 艾米尔 (Kératry, Émile, comte de 1832—1905)——法国反动的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1870年任巴黎警察局长 (9—10月), 后领导组织布列塔尼地方武装力量; 上加龙省省长 (1871), 1871年4月在土鲁斯镇压过公社。——第 190、200、219、431、432、706、707、709、710、712—715 页。
- 雅克美 (Jacquemet)——法国神甫, 1848年为巴黎大主教的大司铎。——第 381、546、636 页。
- 雅克拉尔, 沙尔·维克多 (Jaclard, Charles—Victor 1843—1900)——法国政论家, 布朗基主义者, 七十年代初起为国际会员, 马克思的拥护者,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 巴黎公社时期为国民自卫军军团指挥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后迁居俄国。——第 616 页。
- 费里, 茹尔 (Ferry, Jules 1832—1893)——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 国防政府成员, 巴黎市长 (1870—1871),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 内阁总理 (1880—1881、1883—1885)。——第 338、536、537、538、542、580、615、621、623、625 页。
- 费德尔布, 路易·莱昂·塞扎尔 (Faidherbe, Louis—Léon—César 1818—1889)——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北方军团司令。——第 219、239—241、247、254、270、272、422 页。
- 黑尔, 威廉 (Hales, William)——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9—1872)。——第 8、293、384、415、460、491 页。
- 黑尔, 约翰 (Hales, John 生于 1839年)——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织工,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6—1872) 和书记; 曾参加改革同盟以及土地和劳动同盟,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从 1872年初起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 反对马克思及其拥护者, 企图夺取国际在英国的组织的领导权。——第 8、293、385、389、394、398、399、401、404、415、434、461、492、495 页。
- 博利约, 约翰·彼得 (Beaulieu, Johann Peter 1725—1819)——男爵, 奥地利将军; 1796年春指挥在意大利的奥军时被波拿巴打败过几次。——第 37 页。
- 博里昂尼, 朱泽培 (Boriani, Giuseppe)——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 国际会员。——第 509 页。
- 博伊斯特伯爵, 弗里德里希 (Beust, Friedrich, Graf von 1809—1886)——萨克森和奥地利的反动国家活动家, 反对在普鲁士霸权下统一德国并支持德国各小邦的独立; 1849—1866年历任萨克森政府各部大臣; 奥匈帝国外交大臣 (1866—1871) 和首相 (1867—1871), 奥匈帝国驻伦敦 (1871—1878) 和巴黎 (1878—1882) 大使。——第 516 页。
- 普野—克尔蒂约, 奥古斯丹·托马 (Pouyer—Quertier, Augustin—Thomas 1820—1891)——法国大厂主和政治活动家, 保护关税派, 财政部长 (1871—

- 1872),曾在法兰克福参加同德国签订和约的谈判(1871)。——第345、375、540、541、545、626页。
- 普芬德,卡尔(Pfänder, Karl 1918—1876)——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画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8、294、385、415、461、491页。
- 普罗托,欧仁(Protot, Eugène 1839—1921)——法国律师,医生和新闻工作者,右派布朗基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司法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后迁居英国;后来反对国际和马克思主义者。——第576页。
- 斯托耳(Stoll)——1870年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8、294页。
- 斯廷斯,欧仁(Stens, Eugène)——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国际会员,“人民论坛报”编辑,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第695页。
- 斯坦利,爱德华·亨利,1869年起为得比伯爵(Stanley, Edward Henry, Earl of Derby 1826—1893)——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人,六十至七十年代是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大臣(1858、1882—1885)和印度事务大臣(1858—1859),外交大臣(1866—1868、1874—1878)。——第486页。
- 斯坦美兹,卡尔·弗里德里希(Steinmetz, Karl Friedrich 1796—1877)——德国将军,1871年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团司令(1870年9月前)。——第23、26、37、38、46、75、93页。
- 斯特普尼,考威尔·威廉·弗雷德里克(Stepney, Cowell William Frederick 1820—1872)——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财务委员(1868—1870),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第8、294、385、415、461、491页。
- 斯蒂凡诺尼,鲁伊治(Stefanoni, Luigi 1842—1905)——意大利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唯理论者,参加过加里波第领导的进军;“自由思想”杂志的创办人和编辑,支持巴枯宁派。——第526—528页。

十三画

- 雷特兰热尔(Reitlinger)——茹·法夫尔的朋友和私人秘书。——第388、393页。
- 塔西陀(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罗马历史学家。——第378页。
- 塔梅尔兰——见帖木儿。
- 塔米济埃,弗朗斯瓦·罗朗·阿尔丰斯(Tamisier, Francois — Laurent — Alphonse 1809—1880)——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870年9—11月),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349、545、580、635页。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加者之一。——第322—330页。
- 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爱德华(Vogel Von Falckenstein, Eduard 1797—1885)——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德国沿海地区总督。——第295页。
- 福伊格茨—雷茨,康斯坦丁·伯恩哈特(Voigts-Rhetz, Konstantin Bernhard 1809—1877)——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军军长。——第226页。
- 蒙多邦·德·八里桥——见古赞—蒙多邦。
- 蒙托东,让·巴蒂斯特·亚历山大(Montaudon, Jean-Baptiste-Alexandre)——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的师长。——第46页。
- 蒙蒂霍,欧仁妮(Montijo, Eugénie 1826—1920)——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的妻子。——第34、172、173、175、324、325页。
- 蒙塔朗贝尔侯爵,马尔克·勒奈(Montalembert, Marc-René, marquis de 1714—1800)——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在十九世纪被广泛采用。——第94、95页。
- 奥哲尔,乔治(Odger, George 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鞋匠,曾参加建立工联伦敦理事会,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曾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谴责,于是退出总委员会;后来继续大肆诽谤国际领导和公社参加者。——第8、294、395、404、409、419、493、665、691、692页。
- 奥雷耳·德·帕拉丹,路易·让·巴蒂斯特·德(Aurelle de Paladines, Louis-Jean-Baptiste d'1804—1877)——法国将军,教权主义者,普法战争时期任卢瓦尔军团司令;1871年3月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181、182、190—193、195、219—222、227、345、346、348、540、614、616、656、667页。
- 奥尔良王朝(Orléans)——法国王朝(1830—1848)。——第325、367页。
- 奥伯恩茨,胡果(Obernitz, Hugo 1819—1901)——德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任维尔腾堡师师长。——第205、206页。
- 奥利维耶,艾米尔(Ollivier, Émile 1825—1913)——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六十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1870年1—8月)。——第172、173、641页。
- 奥马尔公爵,奥尔良的昂利·欧仁·菲力浦·路易(Aumale, Henri-Eugène-Philippe-Louis d'Orléans, duc d'1822—1897)——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子,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亡英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549页。
- 路透,保罗·尤利乌斯(Reuter, Paul Julius 1816—1899)——1851年在伦敦创办路透通讯社。——第53页。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 (1830—1848)。——第 103、131、329、339、340—342、349、360、373、541、543、550、553—556、560、561、571、626—628、630、635、648、649 页。
-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奥尔良公爵, 巴黎伯爵 (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é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之孙, 法国王位追求者。——第 650 页。
- 路易十四 (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 (1643—1715)。——第 178、539、648 页。
- 路易十六 (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 (1774—1792),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577 页。
- 路易十八 (Louis XV III 1755—1824)——法国国王 (1814—1815 和 1815—1824)。——第 608 页。
- 十四画**
-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第 687 页。
- 察斯特罗夫, 亨利希·阿道夫 (Zastrow, Heinrich Adolf 1801—1876)——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七军军长。——第 241、244、246、255、260 页。
- 赫普纳, 阿道夫 (Hepner, Adolf 1846—192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 普法战争时期采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后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第 299 页。
-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Церн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唯物主义哲学家, 政论家和作家。——第 405 页。
- 赫胥黎, 托马斯·亨利 (Huxley, T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自然科学家, 查·达尔文的亲密战友及其学说的普及者, 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 363、590 页。
- 维德恩——见卡迪纳耳·冯·维德恩, 格奥尔格。
- 维努亚, 约瑟夫 (Vinoj, Joseph 1800—1880)——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三军军长, 后任巴黎第二军团第一军军长和巴黎第三军团司令, 1871 年 1 月 22 日起为巴黎总督;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 凡尔赛分子预备军的指挥官。——第 97、204、206、345、346、348、350、352、540、544—547、572、616、618、620、632、634、636—638、656、668 页。
- 维提希, 路德维希 (Wittich, Ludwig 1818—1884)——德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二十二师师长。——第 158、182 页。
- 维维延, 亚历山大·弗朗斯瓦 (Vivien, Alexandre-François 1799—1854)——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1840 年任司法大臣, 1848 年任卡芬雅克政府公共工程部长。——第 543 页。
- 维克德, 尤利乌斯 (Wickedé, Julius 1819—1896)——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 普法战争时期为“科伦日报”驻德军大本营的通讯员。——第 262、263 页。

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 (Viktor Emmanuel II 1820—1878)——撒丁国王 (1849—1861), 意大利国王 (1861—1878)。——第 280、516 页。

维克多, 克劳德·维克多·佩兰 (Victor, Claude—Victor Perrin 1764—1841)——法国将军, 1807 年起为元帅, 曾参加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第 215 页。

十五画

鲁艾, 欧仁 (Rouher, Eugène 1814—1884)——法国国家活动家,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司法部长 (1849—1852 年断续地), 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 (1855—1863), 国务大臣 (1863—1869), 参议院议长 (1869—1870), 帝国崩溃后逃离法国, 七十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领袖之一。——第 26 页。

鲁克拉夫特, 本杰明 (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 职业是木器匠,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4—1871),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 (1868) 和巴塞尔代表大会 (1869) 代表,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 1871 年反对巴黎公社、反对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 他的背叛行为遭到总委员会的谴责, 于是退出总委员会。——第 9、294、403、404、409、419 页。

德·波特尔, 路易 (De Potter, Louis 1786—1859)——比利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在比利时 1830 年革命期间为临时政府成员。——第 697 页。

德让 (Dejean)——法国将军, 1870 年 7—8 月在艾·奥利维耶内阁代理陆军大臣。——第 48、50 页。

德坎, 克劳德·德奥多 (Decaen, Claude—

Théodore 1811—1870)——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的师长, 后任第三军军长, 1870 年 8 月在科龙贝—努伊战役中受重伤致死。——第 69、165 页。

德纳, 查理·安德森 (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进步新闻工作者, 四十至六十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之一, 后为“太阳报”编辑。——第 430 页。

德马列 (Desmarest)——法国宪兵军官, 杀害古·弗路朗斯的凶手。——第 352、546、566、639 页。

德盖里, 加斯帕尔 (Deguerry, Gaspard 1797—1871)——法国教士, 巴黎马德兰教堂主持, 1871 年 5 月作为人质被公社枪毙。——第 547、577 页。

德拉埃, 比埃尔·路易 (Delahaye, Pierre—Louis 生于 1820 年)——法国机械工人, 1864 年起为国际会员, 巴黎公社社员, 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1—1872), 1871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第 384、460、491 页。

德扎加尔 (Desagarre)——男爵, 法国法学家, 1871 年为上加龙省的一个法院的检察官。——第 705、706、708、710—712、714 页。

德尔佩克 (Delpech)——法国法学家, 反动分子, 1871 年任上加龙省总检察官。——第 431、432、707、708、714 页。

德尔图良, 昆图斯·赛普特米乌斯·弗洛伦斯 (Tertullianus, 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约 150—222)——基督教神学家, 科学的凶恶敌人。——第 318 页。

德勒克吕兹, 路易·沙尔 (Delescluze, Louis—Charles 1809—1871)——法

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革命家,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军事代表,1871年5月巴黎巷战时牺牲在街垒上。——第413、432页。

十六画

默里,查理(Murray, Charles)——英国工联领导人之一,职业是鞋匠;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第8、294、385、415、461、491页。

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成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一直住到1870年初;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为抗议与德国签订和约而辞职。——第279、665页。

霍亨索伦王朝(Hohenzollern)——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第6、133、300、325、367页。

穆尔,约翰(Moore, John 1761—1809)——英国将军,1808—1809年任驻葡萄牙的英军总司令。——第186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摹仿者。——第685页。

十七画

戴维斯,约翰·鲁埃林(Davies, John Llewellyn 1826—1916)——英国教士和神学家,自由党人。——第401、402、409页。

赛塞,让(Saisset, Jean 1810—1879)——法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1870—1871年巴黎被围期间领导东面堡垒群的防御阵地;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871年3月20—25日),曾妄图集结巴黎的反动力量镇压3月18日的无产阶级革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351、549、557、601、618、619、638、648、653页。

赛拉叶,奥古斯特(Serrailier, Auguste 生于1840年)——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植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70)和法国通讯书记(1871—1872),1870年9月第二帝国崩溃后,曾作为总委员会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巴黎公社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支持马克思的路线。——第8、294、297、303、314、315、385、414、461、474、492、667、673页。

谢泼德,约瑟夫(Shepherd, Joseph)——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0)。——第8、294页。

谢里敦,菲利浦·亨利(Sheridan, Philip Henry 1831—1888)——美国将军,1861—1865年美国内战的参加者,站在北部方面;普法战争时期为驻德国大本营的观察员,美国陆军总司令(1884—1888)。——第618页。

谢列布廉尼科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Серебряников,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约生于1850年)——俄国革命家,曾参加1868—1869年彼得堡的学生运动,流亡英国和瑞士,涅恰也夫的拥护者和助手。——第409页。

十八画

萨德勒(Sadler)——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第385、415、461、

491页。

二十画

饶勒斯,本扎曼(Jaurès, Benjamin 1823—1889)——法国海军军官,1871年起为海军上将,普法战争时期以陆军将军衔任第二十一军军长;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219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五 画

卡洛斯,唐——一个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理想化了的人物,是西班牙国王王菲力浦二世(1545—1568)的儿子,由于反对自己的父亲而遭迫害,死于狱中。——第341、544页。

布索那克——莫里哀的喜剧“布索那克先生”中的主角,愚昧无知的土贵族的典型。——第344、632页。

六 画

西得·康佩亚多尔——十二世纪西班牙中世纪叙事诗“我的西得之歌”、“西得轶事”和许多传奇中的主人公,民间传说中受人爱戴的英雄,成了十七世纪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悲剧“西得”的题材。——第711页。

安东尼(马可·安东尼)——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的悲剧”中的主要角色之一。——第572页。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亨利五世的一生”、“温莎的风流

娘儿们”中的人物,骗子手、胆小鬼和吹牛家。——第386页。

七 画

麦格拉——古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之一,愤怒和嫉妒的化身,转义为爱吵架的泼妇。——第379页。

佛其慈——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愚昧无知的警察的典型。——第708页。

九 画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作为身受莫大困苦仍对上帝恭顺驯服,因之得到上帝赐福的典型。——第342页。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第79、351页。

十 画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主要角色之一,残酷的高利贷

者的典型。——第 344、650 页。

特里布累——小丑，雨果的“逍遥王”一剧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第 564 页。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第 293、551 页。

十一画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第 371、569、654 页。

十二画

闵豪森——德国文学中一个肆无忌惮的吹牛家和撒谎者的名字，他的名字已成了普通名词。——第 318、715 页。

十三画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官架十足、愚昧无知的化身。——第 708 页。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第 711 页。

十四画

赫加特——古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三首三身，她管辖妖魔鬼怪和阴间的亡魂，是万恶和妖术的保护神。——第 379 页。

期 刊 索 引

二 画

- “人民报”（《La Plebe》）——洛迪出版。——第 469、510、513 页。
 “人民罗马”（《La Roma del Popolo》）——第 511、513 页。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莱比锡出版。——第 284、299、307、314、316、320、321、330、394、410、424、435、469、470、498、522 页。

三 画

- “小报”（《Le Petit Journal》）——巴黎出版。——第 527 页。
 “口令报”（《Le Mot d'Ordre》）——巴黎出版。——第 565、579 页。
 “工人报”（《Der Arbeiter》）——安特卫普出版。——第 317 页。
 “工人报”（《Der Arbeiter》）——帕耳马出版。——第 303 页。

四 画

- “巴黎报”（《Journal de Paris》）——第 378 页。
 “巴黎报”（《Paris Journal》）——第 311、314、317、318、395、400、405、417、565、715 页。
 “太阳报”（《The Sun》）——纽约出版。——第 430、433 页。
 “日内瓦报”（《Journal de Genève》）——

第 494、527 页。

五 画

- “电讯”（《Telegraph》）——见“每日电讯”。
 “平等报”（《L'Égalité》）——日内瓦出版。——第 316、443、458、459、465、469、470、529 页。
 “号召报”（《Le Rappel》）——巴黎出版。——第 542、570 页。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伦敦出版。——第 302、313、321、394、399、402、404、407、493、495、514、523、524、525、530、666、668、674、678、680、689、692 页。
 “市镇通报”（《Moniteur des communes》）——凡尔赛出版。——第 568、572、607 页。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柏林出版。——第 324 页。
 “圣彼得堡报”（《Journal de Saint-Petersbourg》）——第 307 页。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第 241 页。
 “世界报”（《The World》）——纽约出版。——第 468、681、686 页。
 “世纪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 59、251 页。
 “布鲁塞尔报”（《Journal de Bruxelles》）——第 201 页。

“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

(《Anales de la Sociedad Tipográfica Bonaerense》)——第 305 页。

六 画

“先驱”(《Der Vorbote》)——日内瓦出版。
——第 316 页。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见“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观察家”(《The Examiner》)——伦敦出
版。——第 400、419 页。

“共和保卫报”(《La Défence républicaine》)
——里摩日出版。——第 568 页。

“吉伦特信使报”(《Courrier de la Gironde》)——波尔多出版。——第 312、
316 页。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纽约出
版。——第 466、686、704、715、716 页。

“团结报”(《La Solidaridad》)——马德里
出版。——第 303 页。

“团结报”(《Le Solidarité》)——纽沙特
尔、日内瓦出版。——第 443、460、465
页。

“自由”(《La Liberté》)——巴黎出版。——
第 312、316、565、578 页。

“自由思想”(《Il Libero Pensiero》)——佛
罗伦萨出版。——第 420、526 页。

“自由选民”(《L' Electeur libre》)——巴
黎
出版。——第 338、538、624 页。

“自由未来报”(《L' Avenir liberal》)——
巴黎出版。——第 466 页。

七 画

“时报”(《Le Temps》)——巴黎出版。——
第 22、26、42、47、71、386 页。

“形势报”(《La Situation》)——伦敦出

版。——第 554 页。

“进步报”(《Le Progrès》)——勒-洛克尔
出版。——第 443、460、465 页。

“里昂信使报”(《Le Courrier de Lyon》)
——第 312、315 页。

“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伦
敦出版。——第 408、411 页。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
敦出版。——第 140、146、150、165、
209、212、270、299、301、319、386、398、
399、401—404、407、409、432、434、566、
579、616 页。

“每日新闻报”(《Die Tages-Presse》)——
维也纳出版。——第 214、323、524、527
页。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
——日内瓦出版。——第 508、521 页。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
——见“工人报”(《El Obrero》)。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纽
约出版。——第 716 页。

八 画

“夜晚报”(《Le Soir》)——巴黎出版。
——第 435 页。

“呼声报”(《Голос》)——圣彼得堡出
版。——第 301 页。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米兰
出版。——第 420、470、513、526、528
页。

“波罗的海报。波罗的海交易所新闻”
(《Ostsee - Zeitung und
Börsennachrichten der
Ostsee》)——施特廷出版。——第
309 页。

“法兰西报”(《La France》)——巴黎出
版。——第 432、708 页。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

- 巴黎出版。——第 417 页。
-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巴黎出版。——第 337、536、577、594、604、607、623 页。
-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凡尔赛、巴黎出版。——第 421、422 页。
-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第 505 页。
- “法国北部共同政府及塞纳—瓦瑟省政府官方通报”（《Moniteur officiel du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u Nord de France et de la Préfecture de Seine-et-Oise》）——凡尔赛出版。——第 299 页。
-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第 349、387、392、545、554、562、635 页。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出版。——第 426、436 页。
- “国民改革者”（《The National Reformer》）——伦敦出版。——第 523 页。
- “国际报”（《L'International》）——伦敦出版。——第 424 页。
-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布鲁塞尔出版。——第 298、321、394、435 页。
- “国际先驱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伦敦出版——第 530 页。
- “国家通报”（《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
- 九 画
- “省报”（《Provinzial-Correspondenz》）——柏林出版。——第 262 页。
- “战友”（《Kamerad》）——维也纳出版。——第 201 页。
- “觉醒报”（《Le Réveil》）——巴黎出版。——第 4 页。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 206 页。
- “复仇者报”（《Le Vengeur》）——巴黎出版。——第 569 页。
- “派尔—麦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伦敦出版。——第 10、17、21、24、30、35、39、43、47、52、56、60、65、72、76、79、83、88、93、98、102、107、111、115、119、123、127、131、135、139、143、147、152、156、160、164、168—170、175、180、184、189、193、198、203、207、213、218、224、228、232、237、242、247、253、257、261、265、269、273、277、295、307、310、390、407—409 页。
-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第 524 页。
-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 242、262、436 页。
- “柏林交易所信使报”（《Berliner Börsen Courier》）——第 214 页。
- 十 画
- “旁观者”（《The Spectator》）——伦敦出版。——第 389、400、408 页。
- “真理报”（《La Vérité》）——巴黎出版。——第 434、611 页。
-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第 26、38、108、140、196、263、311—313、315、317—319、353、389、392—395、408、421、422、493、494、565、572、640 页。
-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巴黎出版。——第 5 页。

“高卢人报”(《Le Gaulois》)——巴黎出版。——第 318、428、432、527 页。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第 411、428、430 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第 566 页。

十一画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伦敦出版。——第 416 页。

“现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伦敦出版。——第 679 页。

“莫斯科新闻”(《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第 524、527 页。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第 66 页。

“商业信使报”(《Handels-Courier》)——见“瑞士商业信使报”。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 361 页。

十二画

“喧声”(《Kladderadatsch》)——柏林出版。——第 361 页。

“联盟”(《La Federacion》)——巴塞罗纳出版。——第 303、510 页。

“费加罗报”(《Le Figaro》)——巴黎出版。——第 318、527 页。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柏林出版。——第 249 页。

十三画

“解放报”(《La Emancipacion》)——马德

里出版。——第 469、510 页。

“意大利无产阶级报”(《Il Proletario Italiano》)——都灵出版。——第 507、508 页。

“瑞士商业信使报”(《Schweizer Handels-Courier》)——俾尔出版。——第 323 页。

“新闻报”(《Die Presse》)——维也纳出版。——第 405 页。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维也纳出版。——第 405 页。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柏林出版。——第 527 页。

十四画

“漫游者”(《Wanderer》)——维也纳出版。——第 409 页。

“维斯巴登日报”(《Wiesbadener Zeitung》)——第 528 页。

“旗帜报”(《The Standard》)——伦敦出版。——第 72、274、397、408、417、434、527 页。

“旗帜报”(《L'Étendard》)——巴黎出版。——第 338、576 页。

“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伦敦出版。——第 388、437 页。

十七画

“舆论”(《Public Opinion》)——伦敦出版。——第 425、426、436 页。

地名索引*

三 画

- 凡尔登——第 55—59、62、66、69、70、74、80、81、120、121、124、126、158、160、174、287 页。
- 凡尔赛——第 124、191、206、212、214、224、237、241、247、251、255、262、307、337、345、350—352、364、367、369—372、378、398、412、416、422、536—539、543、546—549、552、557、565—570、577、578、595、598、599、601、611—613、615、616、618、619、623—625、634、636、643、647、650、651、653、654、668、671、675、713、715 页。
- 上加龙省——第 431、711 页。
- 上马尔纳省——第 183、242 页。
- 上西里西亚省——第 160 页。
- 土里——第 181、182、184 页。
- 土尔——第 55、99、100、108、111、120、121、126、160、261、273 页。
- 土尔特隆——第 174 页。
- 土德拉——第 154 页。
- 土鲁斯——第 306、580、641、710、711 页。

四 画

- 文森——第 414 页。
- 木沙尔——第 264、277 页。

- 云纳河——第 184 页。
- 日内瓦——第 126、312、316、328、388、393、443、458、470、485—489、508、522、529 页。
- 丹贝-韦耳克——第 85 页。
- 什列斯维希公国——第 240 页。
- 开姆尼斯(卡尔·马克思城)——第 6 页。
- 不来梅——第 27 页。
- 不伦瑞克——第 6、278、295、297 页。
- 韦斯卡——第 432、713 页。
- 韦尔纳伊——第 238 页。
- 孔弗朗——第 69 页。
- 孔利——兵营。——第 200、219、226、238 页。
- 厄比纳尔——第 148 页。
- 厄尔士山脉——第 326 页。
- 比奇——第 19、29、32、36、41、99、122、124 页。
- 比塞特尔——第 566、578、640 页。
- 比肯斐特——第 19 页。
- 比桑西——第 80、85、86、166 页。
- 比桑瓦耳——第 535 页。
- 比利牛斯半岛——第 154、186 页。
- 比利牛斯山区——第 431、466、704、706、712、713 页。
- 巴荣——第 48 页。
- 巴黎——第 3、5、24、25、27、32、33、35、38、

* 括弧中是现代地图上的名称，在正文中看不出所在地点的地名，则加有简短的说明。——编者注

- 44、46、48、49、51、55、56、59、60、64、71、73、75—79、81—86、90、94—97、99、116—122、124—131、136—138、140—145、147—156、158—161、163、164、173—175、181—195、197—205、207、208—213、221、224、228、229、233、235—237、241、242、244—253、255—259、262、263、268、270、271、280、282、285、288、292、297、303、311、312、315、318、323、328、335—339、341—355、357—359、363—384、386、388、389、393、397、400、403、411、413、430、431、434、435、466、469、514、535、536、538—551、553—555、556—560、563、564、567—570、572、573、575—578、579—583、587、590、598、599、601—603、606—627、630—641、645—658、665、667、668、671、673、674、677、679、682、696、704、710、715页。
- 木兰—萨克多面堡——第 353、413、557、572、578、639、651、653页。
- 瓦勒里安——见蒙瓦勒里安。
- 伊西堡垒——第 251、571、572、578页。
- 沙兰顿堡垒——第 205、206页。
- 努瓦济堡垒——第 235页。
- 罗尼堡垒——第 233、235页。
- 旺夫堡垒——第 117页。
- 格腊韦耳多面堡——第 205页。
- 费藏德里多面堡——第 206页。
- 蒙鲁日堡垒——第 572、578页。
- 蒙瓦勒里安堡垒——第 120、141、237、258、564、616页。
- 诺让堡垒——第 206、235页。
- 巴泽耳——第 90、93、176、210页。
- 巴勒摩——第 339、555、627页。
- 巴波姆——第 240页。
- 巴登公国——第 16、178、263、280页。
- 巴伐利亚王国——第 16页。
- 巴涅尔—德—吕雄——第 431、432、466、704—707、709、710、712—715页。
- 巴塞尔——第 20、46、126、244、287、487—491页。
- 巴塞罗纳——第 305、340、555、628、683、684页。
- 巴尔河——第 86、89页。
- 巴尔干山脉——第 252页。
- 巴尔勒杜克——第 55、56、74、77、81页。
- 巴尔瓦斯特罗——第 432页。

五 画

- 发棱(阿尔良山旁的发棱)——第 74、81页。
- 古巴岛——第 431页。
- 尼德河——第 23、54页。
- 龙日维耳——第 66页。
- 东普鲁士省——第 106、160、295页。
- 加利福尼亚——美国的州。——第 645页。
- 汉诺威——第 25、27页。
- 汉诺威省——第 496页。
- 北海——第 185页。
- 北明翰——第 305、695页。
- 北德平原——第 326、327页。
- 皮托——第 620页。
- 皮卡尔第省——第 149、211、239页。
- 皮尔马森斯——第 29、33页。
- 卢昂——第 3、124、158、177、228、239、247、273、297、375、539、541、568、678页。
- 卢瓦河——第 225页。
- 卢瓦尼——第 207页。
- 卢瓦尔省——第 541页。
- 卢瓦尔河——第 51、82、97、124、137、158、164、183、184、201、210、213、219、222、225、226、229、238、239、247、256、272页。

- 弗伦——第 58、78 页。
 弗顿耶——第 276 页。
 弗兰德——历史区。——第 126 页。
 弗拉维尼——第 263 页。
 弗鲁阿尔——第 45、63、69、245 页。
 瓦尔那——第 252 页。
 瓦朗高地——第 233 页。
 瓦朗西恩——第 75 页。
 兰斯——第 59、73—75、77、78、80—82、
 85、158、174、202、210、242、245 页。
 兰道——第 20、29、31、288 页。
 兰格尔——第 228、255 页。
 兰西(勒—兰西)高地——第 235 页。
 兰德列西——第 100 页。
 兰德施土尔——第 19 页。
 卡特巴——第 522 页。
 卡里尼扬——第 85、86、89 页。
 卡尔卡松——第 655 页。
 卡尔庞特腊——第 655 页。
 卡尔斯卢厄——第 169 页。
 卡耳瓦多斯省——第 247 页。
 卡拉太尤德——第 154 页。
 圣维——第 259、277 页。
 圣加来——第 225 页。
 圣丹尼——第 204、370、378、414、552、
 557、651、653 页。
 圣贝阿——第 706 页。
 圣昆廷——第 85、158、254、259 页。
 圣梅努——第 56、74、80、81 页。
 圣果当——第 710 页。
 圣彼得堡(列宁格勒)——第 300—301、
 307、382、470 页。
 圣埃鲁瓦——第 146 页。
 圣伊米耶——第 522 页。
 圣米耶耳——第 78 页。
 圣热尔门(勒河岸圣热尔门)——第 191、
 370、378、557、653 页。
 圣阿沃耳德——第 19、33、36、41、45 页。
 圣塞瓦斯田——第 713 页。
 圣摩尔(圣摩尔—德—福塞)——第 71、84
 页。
 圣布里斯——第 191 页。
 圣布勒兹——第 522 页。
 布柴——第 90 页。
 布累——第 42 页。
 布卢瓦——第 177、221、222、225、238、239
 页。
 布拉蒙——第 259、266 页。
 布莱顿——第 428、430 页。
 布宗维耳——第 42 页。
 布鲁塞尔——第 300、470、473、487、489、
 512 页。
 布宜诺斯艾利斯——第 305、496 页。
 布尔河——第 162 页。
 布尔日——第 164、177、228、239、272 页。
 布利斯河——第 19 页。
 布利斯堡——第 38 页。
 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第 702 页。
 布勒斯特——第 3、188、247、256、272、666
 页。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布列斯特)——
 第 309 页。
 布列塔尼——省和半岛。——第 219、
 247、256、272、371、431、654、714 页。
 布里(马尔纳河岸布里)——第 206、250
 页。
 布里埃——第 59、69、78 页。
 布里阿尔——第 222、239 页。

六 画

- 吉兹——第 100、241 页。
 米兰——第 510 页。
 托莱——第 19 页。
 色当——第 86—89、90—94、97、99、124、
 158、160、161、169、187、194、196—198、
 210、248、260、262、264、267、268、285、

- 323、324、337、341、551、580、581、605、623、641页。
- 汝拉——山脉和省。——第260、275、496、508、521页。
- 伏尔加河——第496页。
- 艾费耳高原——第22、23页。
- 安特卫普——第320页。
- 西里西亚——历史区。——第159页。
- 华沙——第289、309页。
- 华盛顿——第379页。
- 多耳——第259、267、276页。
- 多瑙河——第253页。
- 多特蒙特——第528页。
- 亚眠——第124、177、199、200、202、240、247、273页。
- 亚琛——第22、23、25页。
- 亚佛隆——见蒙亚佛隆。
- 亚尔萨斯省——第28、29、41、42、51、125、126、138、159、208、211、228、232、244、255、282、283、287、288、291、295、299、323、326、327、375、497、541页。
- 伊尔松——第85页。
- 伊万城——见得姆布林。
- 伊夫雷—勒韦克——第226页。
- 伊韦尔登——第529页。

七 画

- 肖蒙——第56、164、183、242、263页。
- 坎惹——第264页。
- 但泽(格但斯克)——第95页。
- 努瓦尔——第85、86、89页。
- 佛日山脉——第18、23、29、36、37、41、42、245、255、263、283、287页。
- 劳特堡——第126页。
- 杜河——第259、260、264、267、275、276页。
- 杜佩尔(杜贝尔)——第235、236页。
- 希埃尔河——第90页。
- 希耳提甘——第102页。
- 苏瓦松——第86、120、158、244、245、247页。
- 苏黎世——第312、315页。
- 麦茨——第18、19、23—25、28、33—39、41、44—46、48、53—66、69—75、78、79、81、84、89、93、94、97、99、108、111、112、120—122、124、126、136—138、144—147、157、158、160—167、169—174、177、183、186、187、194—196、202、210、225、229、241、245、248、255、260、264、265、271、283、287—289、341页。
- 麦士河(默兹河)——第55、63、74、78、80、81、85—89、90、93页。
- 麦泰河——第37页。
- 克渭希河——第20、21页。
- 克拉马尔——第249、353、412、558、565、571、578、639、675页。
- 克里木半岛——第235页。
- 里昂——第3、49、82、124、177、188、213、254、259、264、271、272、275、277、306、313、316、368、372、569、580、641页。
- 里士满——第153页。
- 里斯本——第496页。
- 吕尔——第243、275页。
- 吕雄——见巴涅尔—德—吕雄。
- 吕埃伊——第370、378、546、557、653页。
- 吕内维尔——第37、48、62、63、245页。
- 伯尔尼——第266、312、316、512页。
- 伯尔福——第18、41、56、64、124、164、211、228、241、243、244、245、254、259、260、262—265、275页。
- 伯桑松——第64、124、159、177、243、259、260、264、266、267、271、273、276、277页。
- 伯利维尔——巴黎的一个区。——第259、346、548、613、633、656、657、674页。

贝云——第 126 页。
 贝特尼维耳——第 174 页。
 贝耳-埃潘——第 353、566、578、640 页。
 贝耳克卢瓦堡垒——第 57 页。
 沙尔蒙——第 75、84、87 页。
 沙尔维耳——第 255 页。
 沙特尔——第 158、178、184、190、223 页。
 沙托讷夫——第 191、192 页。
 利木——第 655 页。
 利尔——第 75、200、219、265、555 页。
 利森河(伊泽耳河)——第 254、263 页。
 利物浦——第 416 页。
 利希滕堡——第 99、100 页。

八 画

庞日——第 54、57、63 页。
 图尔——第 158、164、177、183、195、202、
 207、222、226—228、239、271 页。
 旺多姆——第 225、226、238 页。
 明乔河——第 288 页。
 松姆河——第 239、247 页。
 易北河——第 217 页。
 些耳德何——第 51 页。
 武济埃——第 74、81、85 页。
 昂提布——第 126 页。
 宗德堡(森讷堡)——第 142 页。
 奈木尔——第 184 页。
 门塔纳——第 179 页。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舍讷比埃——第 276 页。
 佩龙讷——第 240、241 页。
 佩皮尼扬——第 126 页。
 尚皮尼——第 206、250 页。
 尚帕尼奥耳——第 264 页。
 帕特——第 207 页。
 帕耳马——第 303 页。
 波尔多——第 147、164、184、202、228、
 238、268、306、342、344、373、374、375、

431、432、536、559、582、612、629、631、
 633、649、655、676 页。
 波兹南省——第 160 页。
 波罗的海——第 15、39、48 页。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13、
 375、536、654、677 页。
 法兰克尼亚省——第 217 页。
 法耳斯布尔——第 29、99、100、108、111、
 122、124、164、245、268 页。
 罗马——第 280、340、341、351、378、543、
 555、563、616、618、628、638、692 页。
 罗库尔——第 90 页。
 罗塞耳河——第 46 页。
 罗克鲁阿——第 87、246、255 页。
 拉栋——第 221 页。
 拉瓦耳——第 256 页。
 拉涅维耳——第 78 页。
 拉绍德封——第 487、522 页。
 拉施塔特——第 20、94、287 页。
 拉-维勒特——巴黎的一个区。——第
 259、346、613、633、656、657 页。
 拉-普提特-比埃尔——第 29、99 页。
 阿温——第 85、100 页。
 阿吕河——第 240 页。
 阿布利——第 178、190 页。
 阿朗松——第 256 页。
 阿利埃河——第 213 页。
 阿耳特基尔克——第 42 页。
 阿尔艮山——第 80、85 页。
 阿尔特纳——第 223 页。
 阿尔及尔——第 15、39、48、103、337、537、
 624 页。
 阿尔及利亚——第 208 页。
 阿尔图阿省——第 126 页。
 阿尔登山脉——第 255 页。
 阿尔登运河——第 89 页。

九 画

柏林——第 16、20、25、35、40、77、78、89、

- 120、131、140、144、150、165、183、288、314、315、357、417、524、536、645、662、683、702 页。
- 律谷——第 522 页。
- 香槟省——第 78、158 页。
- 幽里希——第 102 页。
- 栋库尔——第 57、58 页。
- 勃艮第省——第 124 页。
- 迪厄卢阿尔——第 45 页。
- 契泽耳赫斯特——第 265 页。
- 耶拿——第 62、75、111、180、215 页。
- 耶利哥(伊里哈)——第 79、351 页。
- 美因河——第 13、21、326 页。
- 美因兹——第 13、18、19、21、22、25、33、94、287、288 页。
- 封特努瓦——第 273 页。
- 封特内—奥—罗兹——第 117 页。
- 南特——第 256、271、655 页。
- 南锡——第 19、32、33、36、37、41、42、44、45、48、55、56、62、63、211、212、229、242、262、263、287 页。
- 纪安——第 184、222、239 页。
- 纪韦——第 75、84 页。
- 纪旺——第 90、93 页。
- 洛桑——第 487 页。
- 洛林省——第 19、28、36、37、41、45、62、126、158、159、208、211、232、244、245、247、282、283、287、291、295、299、323、327 页。
- 洛克尔——见勒—洛克尔。
- 施皮歇恩——第 46、62、111、171、172 页。
- 施特廷(兹杰辛)——第 75、111 页。
- 施特腊耳宗德——第 215 页。
- 哈佛尔——第 149、272、273、569 页。
- 哈尔特高原——第 31 页。
- 哈美马尔克——第 142 页。
- 威悉河——第 217 页。
- 威特岛——第 257 页。
- 威尼斯——第 288 页。
- 威塞尔——第 21、215 页。
- 威廉斯赫埃——第 368 页。
- 科伦——第 21—24、38、94、527、528 页。
- 科尔贝克(科洛布热克)——第 215、216 页。
- 科尔热蒙——第 522 页。
- 科布伦茨——第 21、22、24、25、94、287 页。
- 科梅尔西——第 55、56、63、239 页。
- 科汤坦半岛——第 256、272 页。

十 画

- 乌尔姆——第 20、70、94、287 页。
- 宾根——第 19、21 页。
- 俾尔——第 323、521、522 页。
- 翁热——第 273、655 页。
- 修利(卢瓦尔河岸修利)——第 222 页。
- 高加索——第 103、208 页。
- 涅维尔——第 164、183、213、239、254、271 页。
- 茨魏布吕肯——第 23、29、33 页。
- 茹瓦尔河岸拉费尔特——第 140 页。
- 郎城——第 86、158、244 页。
- 郎卡郡——第 497 页。
- 伦敦——第 9、78、254、278、294、296、301、303、304、311、315—319、350、385、387—390、392—394、396、399、404—408、415—419、421、423、424、428、430、434、437、451、457、461、463、465、466、469、470、472—474、485—488、492—494、496、499、500、504—506、509、511、515、526—528、554、636、673、675、679—683、687、690、694、715 页。
- 厄巴第省——第 95 页。
- 特利尔——第 22、23、25、33、38 页。
- 特鲁瓦——第 56、120、183、212、239、242 页。

哥讷斯——第 191 页。
 哥本哈根——第 555 页。
 桑城——第 184 页。
 桑维耳耶——第 516、517、521、522 页。
 纽约——第 524 页。
 纽沙特尔——第 266 页。
 纽施塔特——第 31 页。
 库尔贝瓦——第 616、619、620 页。
 库尔特拉里——第 522 页。
 库耳米埃——第 181、190、220、262 页。
 库科普弗高地——第 21 页。
 夏龙(马尔纳河岸夏龙)——第 19、37、48、50、54—56、59、60、62—64、69、71、73、77、78、81、84、158、169、172 页。
 夏龙兵营——第 14、39、74、82、172 页。
 夏提荣——第 141 页。
 夏提荣(塞纳河岸夏提荣)——第 194、244、255、263、264 页。
 夏托登——第 158、379 页。
 索城——第 117 页。
 索利厄——第 242 页。
 索恩河——第 124、188 页。
 索恩河岸夏龙——第 242 页。
 索尔河(莱埃河)——第 31 页。
 索尔费里诺——第 20、38、105 页。
 格雷——第 241 页。
 格罗—坦肯——第 45 页。
 格勒诺布尔——第 655 页。
 格朗惹——第 521 页。
 格朗普雷——第 74、81 页。
 希腊韦洛特——第 55、57、69、70、78、90、146、166、167 页。
 埃坦——第 57、70 页。
 埃诺省——第 126 页。
 埃汤普——第 190 页。
 埃皮色——第 225、226 页。
 埃布罗河——第 154 页。
 埃里库尔——第 259、260、275、276 页。

埃佩尔讷——第 81、158 页。
 埃伦布莱施坦——第 25 页。
 马赛——第 3、306、372、580、641 页。
 马德里——第 432、473、506 页。
 马振塔——第 32、38、105 页。
 马里昂堡——第 100 页。
 马舍尔布——第 184 页。
 马格德堡——第 217 页。
 马尔纳河——第 56、57、96、117、190、191、202、204—206、208、233、250、258 页。
 马尔萨耳——第 99 页。
 马尔斯—拉—土尔——第 55、58、63、69、70、72 页。

十一画

第戎——第 184、211、228、241、254、259、260、264、275 页。
 尼里济——第 85 页。
 康布雷——第 241 页。
 许宁根——第 244 页。
 崩讷伊(马尔纳河岸崩讷伊)——第 205 页。
 莎姆伯里——第 655 页。
 梯叶里堡——第 77 页。
 设菲尔德——第 695 页。
 得姆布林——第 289、309 页。
 盖尔曼尔斯海姆——第 13、21、29、31、94、287 页。
 绍德封——见拉绍德封。
 绍林吉亚山——第 75 页。
 讷瓦——第 222 页。
 讷伊(马尔纳河岸讷伊)——第 250 页。
 讷布里扎克——第 159 页。
 莫雷——第 225 页。
 莫贝日——第 87、100 页。
 莫斯科——第 216、380 页。
 莫德林——第 289、309 页。
 曼恩省——第 164 页。

曼都亚——第 70、95 页。
 曼海姆——第 19、31 页。
 曼彻斯特——第 305、416、673、695 页。
 梅利——第 205 页。
 梅宗-布朗希——第 251 页。
 梅济埃尔——第 221 页。
 梅济埃尔——在色当附近。——第 59、76、81、82、84—87、90、93、149、241、242、244—247、255 页。
 勒芒——第 164、177、196、199、200、203、210、219—221、225—227、238、246、247、256、259、267、269、271、273 页。
 勒埃——第 204 页。
 勒太耳——第 77、80、81、85、86、174、247 页。
 勒特岑(吉日伊茨科)——第 295 页。
 勒-布尔热——第 249、251 页。
 勒-布雷讷——第 266 页。
 勒-洛克尔——第 443、521 页。
 勒-韦里埃尔——第 277 页。
 勒申-波浦勒——第 86、174 页。

十二画

窝州——第 86 页。
 雅尔若——第 222 页。
 絮维普河——第 174 页。
 提翁维耳——第 19、41、59、124、194、242、245、255 页。
 菲利普维耳——第 87、100 页。
 黑森-达姆斯塔德公国——第 16 页。
 舒瓦济-勒-卢瓦——第 191、204 页。
 隆维——第 211 页。
 隆吉翁——第 59、78 页。
 凯伊——第 206 页。
 凯恩——第 347、551、619、629、657 页。
 凯则尔斯劳顿——第 18、19、27 页。
 莱比锡——第 166 页。
 莱茵河——第 4、6、13、14、16、18—23、26、

27、29、40、41、51、61、78、94、100、114、125—127、169、185、245、255、288、556 页。
 莱茵普鲁士——第 18 页。
 莱茵普法尔茨——地区。——第 21 页。
 斯通——第 174 页。
 斯卡尔普河——第 240 页。
 斯特内——第 74、78、80—82、85、92 页。
 斯特拉斯堡——第 19、29、31—33、37、39、41、46、99—102、108、109、111、117、120、121、123、124、136、140、151、159、169、188、236、245、255、287—289 页。
 普鲁特河——第 7 页。
 普鲁士王国——第 5、6、13、35、65、103、106、112—114、134、135、157、160、179、188、189、215、216、218、223、231、244、282—284、288、289、299—301、307、308、326、327、343、344、347、357、371、375、382、393、529、536、539、551—553、559、560、563、581、583、588、645、649、655、657、662 页。
 普里瓦——第 655 页。
 普法尔茨公国——第 27、29、31、61 页。
 博韦——第 158 页。
 博蒙——第 85、89 页。
 博让西——第 222、225 页。
 博索斯特——第 705、707、709、711—713 页。
 博内-拉罗朗——第 199、202、221 页。

十三画

瑟堡——第 164、188、247、256、272、273 页。
 滑铁卢——第 99、111 页。
 奥伯斯坦——第 19 页。
 奥布河岸阿尔西——第 78 页。
 福斯——第 705、711、714 页。
 福尔巴赫——第 33、34、36、38、45、46、62、

65 页。
 新堡——第 683 页。
 新墨西哥州——第 496 页。
 雷米伊——第 90 页。
 雷宗维耳——第 78 页。
 奥希——第 569 页。
 奥得河——第 215 页。
 奥塞尔——第 164、183、242、244 页。
 奥里缪茨(奥洛摩茨)——第 38 页。
 奥尔丹——第 497 页。
 奥尔良——第 124、158、178、181、184、
 201—203、207、214、220—222、226—
 228 页。
 塞尔讷——见维累尔-塞尔讷。
 塞木瓦河——第 87 页。
 塞累斯塔——第 159 页。
 塞瓦斯托波尔——第 95、108、118、145、
 152、153、233—235、559 页。
 塞纳省——第 550、575 页。
 塞纳-瓦瑟省——第 369、537、543、614、
 648 页。
 塞纳河——第 96、117、141、190、191、204、
 205、239、255 页。
 塞纳河岸讷伊(讷伊)——第 5、413、558、
 616、619、620 页。
 蒙乃——第 226 页。
 蒙梅迪——第 59、72、92、99、124、211、241
 页。
 蒙梅利高地——第 202、205 页。
 蒙塔尔纪——第 184 页。
 蒙彼利埃——第 655 页。
 蒙特尔梅——第 87 页。
 蒙马特尔——巴黎的一个区。——第
 116、346、348、351、540、544、548、567、
 582、613、632、633、635、638、653、656、
 657 页。
 蒙亚佛隆高地——第 233—235、250、251
 页。

蒙费尔梅高地——第 235 页。
 蒙贝利亚尔——第 126、259、275 页。

十四画

维恩——第 655 页。
 维桑堡——第 28、29、31—33、41、47、62
 页。
 维祖耳——第 46、56、148、241、243、244、
 246 页。
 维罗那——第 95 页。
 维也纳——第 38、524 页。
 维涅耳(维涅耳-累-阿通夏特耳)——
 第 55、63 页。
 维斯拉河——第 215 页。
 维克斯堡——第 153 页。
 维昂维耳——第 58、146 页。
 维埃尔宗——第 222 页。
 维特里——在巴黎附近。——第 233 页。
 维特里(维特里-勒-弗朗斯瓦)——第
 56、71、74、99、158 页。
 维尔特——第 31、33、42、47、56、62、64、
 89、111、116、171、172 页。
 维尔茨堡——第 13 页。
 维尔腾堡王国——第 16 页。
 维累尔——第 90 页。
 维累尔-塞尔讷——第 90 页。
 维累尔-布雷顿讷——第 240 页。
 维累尔塞克塞耳——第 243、254、262、275
 页。
 维耳-埃夫腊尔——第 251 页。
 维耳埃(马尔纳河岸维耳埃)——第 206
 页。
 维耳讷夫——森林。——第 214 页。
 维耳茹伊弗——第 233、566、578、640 页。

十五画

慕尼黑——第 207、697 页。
 鲁日蒙——第 275 页。

摩塞尔河——第 18、23、24、44、45、48、51、53—55、59、63、66、70、85、146、163、172、261 页。
 德勒——第 190—192、214、220、262、374 页。
 德朗西——第 234、250 页。
 蓬塔木松——第 63、78 页。
 蓬塔尔利埃——第 264、266、277 页。

十六画

默东——第 116、129 页。
 锡埃尔克——第 41 页。
 霍姆堡——第 19、38 页。
 霍赫瓦尔特山脉——第 18 页。
 穆宗——第 85、86 页。
 穆蒂埃——第 521 页。
 穆尔格河——第 20 页。
 诺曼底省——第 149、164、211、225 页。
 诺特丹—多厄——第 226 页。
 诺伊恩基尔兴——第 27 页。
 诺沃格奥尔基也夫斯克——见莫德林。

十七画

谢耳——第 204 页。

十八画

萨瓦省——第 496 页。
 萨多瓦——第 6、39 页。
 萨托里——第 423 页。
 萨克森——普鲁士的一个省。——第 159 页。
 萨拉哥沙——第 153—155 页。
 萨韦尔恩——第 32、36、37、44、45、48、62 页。
 萨兰——第 277 页。
 萨兰堡——第 120 页。
 萨尔区——第 33 页。
 萨尔河——第 19、22、23、25、27、38、41 页。
 萨尔堡——第 23 页。
 萨尔布尔——第 120 页。
 萨尔格明——第 37 页。
 萨尔鲁伊——第 23、24、27、28、288 页。
 萨尔布吕肯——第 22、23、25、33、34、36、42、43、161、169、245 页。

译 后 记

本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70 年 7 月到 1872 年 2 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工人阶级如何对待战争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文件。

“法兰西内战”一著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发展中新的一个阶段。马克思在这本著作中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本卷第 355 页);必须把它打碎,而代以自己的无产阶级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一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共产党宣言”1872 年德文版的序言中特别说明,这一点可作为对“共产党宣言”的重要修改。马克思还指出,公社的一些基本特征表明,它正是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用来代替被打碎了的旧国家。他说,“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面”,它是这样一种“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这种共和国“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又说,“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本卷第 358、361 页)。

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的阶级斗争。他明确地指出，“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他还指出，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必须“经历它的几个下阶段”（本卷第 593 页）。

第一国际 1871 年 9 月伦敦代表会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根据巴黎公社缺乏自己政党领导的教训，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工人阶级应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的原理。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中说道：“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本卷第 455 页）。

* * *

本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十七卷（1960 年出版）翻译或校订的，其中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和“法兰西内战”一著，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的基础上，根据英文原文校订的；马克思的遗稿“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是在张芝联、张广达两同志的译文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 年版第 3（8）卷的英文原文校订的。

参加本卷译校工作的有杜章智、詹汝琮、吴达琼、冯世熹、孙家衡、周裕昶、宋书声、张慕良、孙魁、汤钰卿。参加资料工作的有孙家衡、孙魁、季丰、冯如馥、陈瑞林、陈家英。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